

第二国际
第二、三次
代表大会
文件

第二国际 第二、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年7月

第二国际第二、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20.375 插页4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468 000 册数:精装本1-1 000

*

ISBN 7-300-00980-8

D.140 定价:12.10元

参加本卷翻译和校译的有：李俊聪、王宏道、吴兴唐、周克明、苏冰娴、倪力亚、魏力、鲍万升。

全书由文献编委会第二国际组校纪英、王颖编辑、审定。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王颖（责任编辑）；祝东平（封面设计）；技术设计。

出版说明

本卷编译了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即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根据1893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议(1891年8月16—22日)》(Verhandlungen und Beschlüsse des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Kongresses zu Brüssel, 16—22. August 1891,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s "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 Berlin 1893)编译;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根据1894年瑞士格留特利联盟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1893年8月6—12日)》(Protokoll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kongresses in der Tonhalle Zürich, vom 6. bis 12. August 1893, Buchhandlung des Schweiz. Grütlivereins, Zürich 1894.)编译;两次代表大会的其他文件分别根据1975年日内瓦明科夫出版社出版的乔治·豪普特主编的《第二国际史料》第8、9卷(George Haupt, Histoire de la II^e Internationale, Tome 8 et 9, Minkoff Reprint, Genève, 1975)编译。

这两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由编译者分别编排为大会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大会记录、各国党的报告和大会决议四部分,并附代表名单。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加了各次会议和议程的标题,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加了议程标题,并统一调整了各国党的报告的标题。大会决议目录是按照决议通过的时间先后编排的,决议标题也是译者加的。

目 录

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891年8月16—22日于布鲁塞尔

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的通告	3
致各国工人联合会	3
致各国工人团体	6
致各国工人组织。《同志们,我们重申……》	9
致各国工人组织	17
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记录	
(1891年8月16—22日)	19
第一次会议(1891年8月16日上午)	19
大会议程	19
德国代表团召开预备会议	20
第二次会议(1891年8月16日下午)	22
代表资格审查	22
第三次会议(1891年8月17日上午)	24
大会议事规程	24
第四次会议(1891年8月17日下午)	25
联合权等问题	25
第五次会议(1891年8月18日上午)	26
劳工保护立法	26

第六次会议(1891年8月18日下午)	29
劳工保护立法(继续)	29
第七次会议(1891年8月19日上午)	33
劳工保护立法(继续)	33
第八次会议(1891年8月19日下午)	36
劳工保护立法(继续)	36
工人组织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	37
第九次会议(1891年8月20日上午)	39
联合权和国际组织等问题	39
第十次会议(1891年8月20日下午)	45
联合权和国际组织等问题(继续)	45
德国代表团开会讨论五一节问题	46
第十一次会议(1891年8月21日上午)	48
罢工和联合抵制	48
无产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49
第十二次会议(1891年8月21日下午)	55
无产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继续)	55
第十三次会议(1891年8月22日上午)	58
废除计件工和包工	59
男女平等	60
闭幕会议(1891年8月22日下午)	61
五一节问题	61
各国党的共同名称和出版《社会主义年鉴》	62
在瑞士召开下届国际代表大会	62
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向大会的报告	65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	65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报告	87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112
比利时工人党的报告.....	124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129
农业工人 丹麦社会民主党对农业工人问题的态度.....	136
西班牙工人党的报告.....	165
关于美国犹太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 告.....	167
法国工人党的报告.....	171
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告.....	180
法国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报告.....	187
荷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告.....	193
关于荷兰烟草和雪茄烟工业、荷兰雪茄烟工人和烟 草工人联合会组织情况的报告.....	214
关于匈牙利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状况.....	213
波兰代表团的报告.....	219
罗马尼亚工人党的报告.....	223
瑞士职业工会联合会的报告.....	238
挪威工人党的报告.....	242
阿根廷共和国工人党的报告.....	244
俄国社会党人的报告.....	247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给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1891年8月于布鲁塞尔)的报告	250
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	
关于劳工保护立法的决议	36
工人组织对犹太人的态度	38

关于罢工和联合抵制的决议	48
无产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51
关于废除计件工和包工的决议	59
关于男女权利平等的决议	60
关于五一节的决议	61
关于各国党的共同名称和出版《社会主义年鉴》	62
关于在瑞士召开下届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62

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263
------------------------	-----

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于苏黎世

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通告 ...	281
致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工人的公开信	281
第一号通告 致各国工人的公开信	284
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会、工会理事会和工人组织 ...	287
致工联格拉斯哥代表大会	289
第二号通告 致各国工人的公开信	291
致瑞士全体党员、格留特利联盟和工人团体的公开信 ...	295
第三号通告 致各国工人	297
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	299
代表大会议事规程	299
代表大会议程	300
收到的提案	300
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	
(1893年8月6—12日)	311

前 言(赫尔曼·格雷利希).....	311
第一次会议(1893年8月6日上午)	318
卡尔·毕尔克利致欢迎词.....	318
大会议事规程.....	320
第二次会议(1893年8月7日上午)	324
通过主席团人员组成.....	324
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	325
第三次会议(1893年8月7日下午)	333
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继续).....	333
代表大会议程.....	336
第四次会议(1893年8月8日上午)	338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	340
第五次会议(1893年8月8日下午)	343
倍倍尔等对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第1条补充提案 的声明.....	343
讨论通过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	344
第六次会议(1893年8月9日下午)	347
在国际上贯彻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	349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	354
第七次会议(1893年8月10日上午)	356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继续).....	356
第八次会议(1893年8月10日下午)	366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继续).....	366
第九次会议(1893年8月11日上午)	374
五一节.....	374
第十次会议(1893年8月11日下午)	384

保护女工·····	384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	390
第十一次会议(1893年8月12日上午)·····	396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继续)·····	396
农业问题·····	402
在国内和国际上扩大工会组织·····	403
恩格斯致闭幕词·····	410
关于世界性罢工的决议·····	411
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	412
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向大会的报告·····	413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	413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	435
澳大利亚社会民主联盟的报告·····	445
关于比利时工人党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 告·····	451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462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470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报告·····	480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报告·····	488
关于荷兰民主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告·····	501
意大利劳动党的报告·····	512
挪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告·····	527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告·····	530
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538
关于匈牙利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	542
关于波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告·····	551

关于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现状和过程 (1889—1893 年)的报告	559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告	568
关于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	579
关于瑞典工人运动的报告	586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告	602
西班牙劳动者总同盟代表提出的备忘录	608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告	612
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议事规程	320
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	325
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第 1 条的补充提案	328
代表大会议程	336
声援英国矿工罢工	339
在国际上贯彻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	352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	354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补充提案	368、373
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共同规定	382
关于保护女工的决议	384
关于保护女工的补充提案	389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	390
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	402
关于在国内和国际上扩大工会组织的决议 I	407
关于在国内和国际上扩大工会组织的决议 II、III	406
关于 1896 年在伦敦召开下届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409
关于世界性罢工的决议	411

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	412
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619
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收到的贺电一览 表.....	639

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891年8月16—22日于布鲁塞尔



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的通告

致各国工人联合会

1890年12月15日于布鲁塞尔

同志们：

1891年8月18日，星期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会期一周。我们怀着兄弟之情邀请你们前来参加这次盛会。

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是根据两个大会的决议发出这个邀请的。1889年在巴黎朗克里街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首先委托它做这件事情；随后，同年在巴黎罗舍舒阿尔街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设在苏黎世的执行委员会，也赋与它同样使命。

这双重委托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重要的。我们为履行这个任务而面临的情况，使我们希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正在进行思考和斗争的阶层，都将毫无例外地派遣它们的代表参加这个崇高的劳动大会，从而——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加强全世界一切工人力量之间的了解的纽带。

一切工人党和社会党，一切工人团体和小组，都一律受到邀请。我们殷切希望，它们将以满腔热情来响应我们荣幸地向它们发出的号召。

代表大会保留审查代表们的全权的权利。我们深信，代表大会将以使大家都感到满意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

同样，代表大会将宣布投票的方式和方法，并将最后确定大会的议事日程。

关于每个国家的工人状况，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告，将由各国代表提出。为此，建议各党、各团体和各小组自费把它们报告印成法、德、英 3 种文字，以便在代表大会开幕时分发给代表们。报告需要印多少份，我们将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数周内通知你们。

为了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认真地、卓有成效地进行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我们请你们在 7 月 16 日前把报名信和代表人数寄给我们。一旦我们知道参加代表大会的总人数之后，我们就将告诉各党和各团体，它们应当寄来或带来多少份报告。

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下面 3 个：

1. 从国内和国际角度来看劳工保护立法的状况，以及为有效地制订和扩充劳工保护立法而应采取的手段。

2. 联合权及其保证手段，从国际观点来看的罢工、联合抵制和合作运动。

3. 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和责任。

为了使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党、各小组和各团体有充分的时间来研究问题，我们坚决要求那些希望把他们的问题列入议程的人在 7 月 1 日前把他们的问题告诉我们。

为了共同的利益，代表大会保留最后确定议程的权利，这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列入议程的问题太多；另一方面是为了回避某些问题，它们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那些颁布了限制工人自由的法律的国家的代表来说，可能会引起不愉快。

我们将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为代表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提供方

便。

但愿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能够使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组织起来并受到决心促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这同一思想鼓舞的全体无产者达到非常必要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和从每一方面来看都是非常值得向往的完全一致。

因此，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请你们立即把你们表示同意的信给我们寄来。致兄弟般的敬礼！

受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的委托：

对外联络书记

让·沃尔德斯

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苏黎世执行委员会代表：

卡尔·毕尔克利

E. 武尔施莱格尔

致各国工人团体

1891年6月17日于布鲁塞尔

同志们：

邀请参加将于今年8月18日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通告信，敦促各个赞成召开大会的组织和党在7月1日前把它们希望列入议程的问题转交给我们。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什么新问题。我们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的前一个通知，并请你们立即把你们打算提交代表审查的提案给我们送来，以便我们能够从7月初起就把它分送给参加代表大会的各个组织。

正像邀请信中所说的那样，报名信最迟必须在7月16日前寄给我们，以便我们能够采取措施来为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切实做好准备。这次会议将从8月18日起，至25日止。

我们将尽力为大会代表在布鲁塞尔的逗留提供方便，并尽力保证这次应当促成国际社会主义工人民主党团结的国际大会获得圆满成功。为了使我们在这件伟大的事业上获得胜利，必须要有一切善意的和一切忠心耿耿的人的协助。

已经提出一些有关资格审查问题的意见，它们将由代表大会作出最后决定。代表资格将照常由各国自己审查。但在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代表大会有权作出裁决。同样，关于议程问题，包括每项议程应讨论多久的问题，也将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筹备委员

会,即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作最后决定。

此外,关于大会议事规程的一切建议,像往常一样,将由大会本身提出,我们只提出开幕日期的建议。我们想大大节省通常浪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的时间,我们将尽力做到这一点。

每个国家将提交一个关于从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来看的本国工人的状况和关于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告。报告应避免冗长、琐碎,关于各国的情况应力求简明、精确。

至于表决方式,面对交给我们的两种委托书,我们不能事先把一种表决方式强加给代表大会。我们估计,代表大会可能会赞成和宣布按国家进行表决的方式。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是赞成这种方式的。

此外,一切程序问题都不应把下面这个主要问题排挤到次要地位:全世界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和讨论使他们感兴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问题。

这是 25 年来的第一次,人民将有机会看到全世界的代表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将使全体劳动者之间业已存在的联系得到加强,并将为解决引起无产阶级强烈兴趣的重大问题做好准备。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8 月 18 日,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工联主义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的代表、法国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和结成同盟的工会组织的代表、伊比利亚^①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党的代表、尼德兰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代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最后,整个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民主党的代表,将云集布鲁塞尔。

① 即今西班牙。——译者注

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导致全体无产阶级的亲密协作，它们越团结，它们的力量就越强大。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正在等待你们的回音。我们希望，在你们的协助下，我们将完成我们所承担的任务。谨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

书 记

让·沃尔德斯

通知——除前一封通告信中提到的拟列入议程的 3 个问题之外，现补充几点如下：

根据各国之间和平的原则，同时根据八小时工作的原则，确认 5 月 1 日为国际节日（**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建议**）。

通过一个总的、统一的名称，以显示一切工人党的团结一致（**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建议取名为：国际社会党**）。

国际工人统计和各国之间的定期通讯（比利时工人党的建议）。

更正：在我们的前一封通告信中，有一个地方印错了。在列入议程的第 2 个问题中，合作运动应改为**工会运动**。

（载于《社会主义者》杂志 1891 年第 2 期）

致各国工人组织。 《同志们，我们重申……》

同志们：

我们重申我们先前的邀请，并敦促一切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派代表出席布鲁塞尔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尚未报名参加或尚未把它们代表名单寄来的团体，应迅速报名和迅速把代表名单寄来。

可以预料，这次代表大会将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从参加的党和联合会的数目来看，它将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讨论将持续进行一周。参加讨论的将有：德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西班牙、法国、荷兰、匈牙利、意大利、挪威、罗马尼亚、瑞典和瑞士等国的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联合会；还有不列颠工联、法国工会团体联合会和利夫雷法国联合会等所属的强大工会组织；最后，还有美国的重要社会主义团体。这次讨论应当使两个半球有觉悟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能就某些问题达成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

必须用劳动者的国际意志来同扩展到国际上的资本和反动派相对抗。

如果说有些公式和理论还没有被全世界所接受，它们只是普遍地被一切脑力劳动者所接受，从而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那

么，这就是解放劳动人民和使他们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奴役制度的意志。

我们都遭受到同样的压迫和剥削，我们都以解放人民的同一思想为指南，我们受到捍卫同一解放事业的利益和对这一事业的热爱的鞭策，因此我们会知道如何履行自己的义务，如何加强世界各国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如何争取实现我们认为是迫切必要的根本改革。

工人阶级已对我们表示信任，他们到处都在期待国际代表大会这个伟大的和幸福的事件的来临。我们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我们将同心协力地完成我们所承担的义务。

比利时工人党殷切希望国际工人大家庭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联合和团结起来，它将尽力为大会代表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它将尽力使他们在布鲁塞尔的逗留舒适、愉快。

为了便于各个团体和代表们了解情况，我们在下面分段作一些介绍。

大会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有几个组织向我们提出，为期一周的代表大会最好从 8 月 16 日，即**星期日**那天开始。这是最初的想法。我们觉得，回到这个想法上来是不错的。因此，代表大会将于**1891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上午 10 时开幕。开幕式将在我们工人党的活动中心、布鲁塞尔巴伐利亚广场**人民之家**举行，那里将正式接待各国代表。在第一天会议上将成立执行委员会，审查代表资格和指定大会翻译。

为了避免浪费时间，这些事务性工作绝对必须在当天结束。

第二天，即 8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将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就要立即着手讨论议程上的问题。

各国关于本国工人运动总概况的报告，将交给由代表大会选出的若干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将对这些报告作扼要的叙述和调整，然后，这些报告将立即由我们负责印刷，并在第三天分发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这样，代表们将得到一份用 3 种文字印刷的、经过概述的、包含全部基本细节的文件。宣读报告时的冗长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将被删除。

组 织 工 作

从星期一上午开始，会议将在黄金街宽敞的**圣米歇尔**旅馆举行。各会议厅将被租用来作为各委员会和各国代表团的聚会场所。

在附近建立的一家印刷所，将迅速印刷大会上提出的提案。

为了使讨论不致于拖得太长，不致于太杂乱无章，我们建议，从第一次全体大会起，每项议程分别成立一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每个国家指派的一名代表加上提出该项议程的党或团体的代表组成。委员会会议将在大会休会的时间举行，即从星期一晚上开始举行。各委员会将就每个问题提出一个简明扼要的报告，报告印刷出来后将在适当时机分发给大会代表，通过这个办法，将认真地为讨论做好准备。如果各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它们同样都能就它们将向大会提出的问题形成一个决议。如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各委员会将在大会讨论后再开会磋商，以便根据大多数代表的意见起草这个决议；如果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决议案已获得多数票的支持，则无此必要。

我们建议，每位发言人的发言时间为 10 分钟，同时还要规定从开幕那天起每个委员会占用的时间，以便列入议程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讨论。

大会讨论每天举行两次，上午会议从 9 点半至 12 点半；下午

会议从 2 点至 5 点。

我们希望会议公开举行。由于我们了解布鲁塞尔工人居民的情绪,我们可以保证,无论是大会的秩序还是大会的尊严都不会因为公开召开而受到损害。

只要可能,在会议的第一天,各国就应当指定它们参加各委员会的代表,这些代表中的某个或某些代表将被委派参加大会执行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

参照 1889 年在巴黎举行的两次代表大会即分别在罗舍舒阿尔街和朗克里街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做法,我们认为,从第一天会议开幕起,每个国家都应在组织委员会的同意下成立一个审查委员会。一旦审查完毕,就应向代表大会本身报告审查结果,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裁判,将作出最后决定。

我们确信,这种保证一切权利的审查方式不会带来任何困难。各国工人组织将协助我们完成这项由于我们从两个代表大会那里得到的委托书而变得相当棘手的任务。

此外,正像这一切都将以一丝不苟的忠诚精神来完成一样,我们深信,在以使大家都感到满意的方式来结束代表大会的这第一部分工作方面将不会有任何困难。

议 程

准备参加代表大会的一些党和团体已经提出大量问题。与此同时有几个组织也提出了类似建议。我们认为,把这些问题和建议进行分类、整理,以便把各种不同的想法提出来讨论是有益的和合乎实际的。

作为情况通报,我们不妨简单地说一下,如果我们勉强把提出的问题原封不动地全部列入议程的话,那么,摆在议程上的问题会有40个左右,单是它们的措词就会占2页多。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压缩,或者说,对最大最一般的问题进行了概括。

我们就是这样拟定议程的。至于这个日程如何安排,将由代表大会本身在开幕之日作出决定。

1. 从国内和国际角度来看劳工保护立法的状况,以及为有效地制订和扩充劳工保护立法而应采取的手段。

2. 联合权及其保证手段,从国际观点来看的罢工、联合抵制和工会运动。

3. 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和责任。

4. 各国工人组织对犹太人问题应当采取的态度(讲犹太语的工人协会美洲联合会)。

5. 利用议会制度和普选权为社会主义工人事业服务;为使工人获得解放而应当运用的策略,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必须采取的手段。

6. 社会主义工人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

7. 废除计件工和包工。

8. 使五一国际劳动节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对劳动的调整和加强工人维护各国间和平的普遍愿望服务。

9. 为了显示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团结一致,确定一个总的、统一的名称(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建议用“国际社会党”,比利时工人党建议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

10. 积极开展以下各项实际工作:(1)国际工人通讯;(2)普遍的劳工统计;(3)通过成立全国工会委员会和国际工会委员会来促进各行各业工人之间的国际谅解;(4)通过每年用各种文字出版的

社会主义年鉴和历书定期通报消息和发表有关报道；(5)在各国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鼓动。

11. 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和建议,在这个城市举行国际示威游行;确定下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国际确认

比利时工人党已拟定一个简明扼要的决议案,要求代表大会从星期一的第一次会议起明确确认全世界一切无产者的国际友爱和团结的感情这一全体无产阶级同心协力的根本基础。这个决议案将向代表大会提出,我们希望,代表大会能全体一致地予以通过。

这种简单的、全体一致的表示所包含的意义,你们像我们一样清楚。

总的看法

由于某些团体或某些知名的社会党人把我们的邀请信转交给了他们国内的一些协会,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比利时工人党委员会收到了一些信件。我们曾给各国带有各种色彩的和各种流派的大中心组织,以及一些投身于战斗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知名人士寄去一包邀请信,以便他(它)们能把这些邀请信分发给尽可能多的团体。我们确信,这样做有助于代表大会获得成功,而且也是使用了散发邀请信的唯一手段,因为国际的通讯组织远远不能胜任它所承担的任务。

我们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为共同事业服务的愿望的鼓舞。所以这种做法不可能引起任何猜忌。

食宿问题

打算托我们预订房间的代表,在接到本通告后应来信告诉我们。

一星期后,我们将寄出一张标明价格的旅馆和饭馆的名单,代表们可以自己选择舒服的、合适的、价格公道的住宿和吃饭的地方。

可以说,目前在布鲁塞尔生活资料相当便宜。对于那些想了解情况的外国朋友们,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每天的食宿费用约为5—12法郎。那些每天肯花12法郎的人,会过得相当不错。

工会代表会议

除了我们担负着组织工作任务的世界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而外,还将召开3个行业代表会议。

第一个行业代表会议是为各国冶金工人召开的。德国冶金工人联合会和比利时及法国的加入联盟的冶金工人决定召开这个会议,以便加强冶金部门所有行会的劳动者之间的团结。

第二个代表会议是为纺织工业工人召开的,即为手工织布工人、纺织工人、男女纺纱工人,为从事这一职业的男女工人召开的。德国、法国、比利时的支持者已宣布参加或接到邀请。

最后,第三个代表会议是应比利时木材工人联盟的要求而决定召开的。与会的将有细木工、木匠、制乌木家具的木工、模型工、镞工、制作椅子的工人和木雕工人所属联合会的代表。各国有关团体已接到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邀请,正像接到参加其他会议的邀请一样。

下届代表大会

关于召开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我们收到了芝加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封来信，来信要求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作出下届国际代表大会在美利坚合众国芝加哥召开的决定，开会日期定于 1893 年。

书记 让·沃尔德斯

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应立即把它们代表名单给我们寄来。

(载于《社会主义者》杂志 1891 年第 2 期)

致各国工人组织

同志们：

在把你们或你们的代表的报名表转交给你们的时候，我们顺便把关于代表大会的最新消息告诉你们。

首先，简单说一说大会日期。我们的某些法国朋友和英国朋友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们由于原先承担的义务或由于其他牵挂，很难在 16 日到达布鲁塞尔。因此，他们担心不能参加大会的头几次讨论。

一大批代表最迟应在 23 日离开，我们的义务是为所有的人提供方便，使他们能够参加全部讨论。在代表大会将要召开之前一个月，我们就已经确定在今年 8 月 16 日，即 8 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开幕式。这个日期起初是由许多工人党提出的。确定在这个日期开会肯定能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并能使大会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结束。

事实上，接待工作、大会内部组织工作和各种准备工作总要去最初几次会议的时间。这里有一些必须要办的事，如收集各国的报告，筹组各个委员会，成立执行委员会，等等。在前两个代表大会上，这些同样的工作占用的时间太多了。这次我们希望在代表们的协助下避免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已经获悉，星期日这天代表们将陆续到达。这天只能在我

们的活动中心**人民之家**接待代表们和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星期一的大部分时间将用来紧张地进行我们谈到的准备工作，只有在星期二即 18 日才能开始进行讨论和表决。为了避免批评、误会和抗议，我们呼吁代表大会在星期二中午之前不要就议程上的问题进行任何表决。

我们恳请参加代表大会的各个组织在说明它们将派出多少代表团和代表团成员的姓名的时候，尽快把附在本通知内的报名表给我们寄回来，以便随后便于进行资格审查，同时使我们能够着手准备代表证。

有关冶金工人、木材工人和纺织业工人国际代表会议的消息已经通知与前两个会议有关的人，通知各国大部分有关的联盟和协会。至于纺织业工人代表会议，这是瑞士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要求召开的，它的宗旨是为了在织布业和纺纱业工人之间奠定友好团结的初步基础。冶金工人和木材工人代表会议是为了在各个联盟之间建立联系，为了确立或发展国际友好团结。

从 8 月 16 日上午起，组织委员会将交给大会代表们一份饭馆的名单，代表们可以按照不同价格在那些地方用餐。

那些委托我们预订房间的代表，只要到达后来我们的活动中心巴伐利亚广场**人民之家**报到，就会得到一切指示。

作为情况介绍和为了给全体代表提供方便起见，我们还附上一张代表们可以投宿的旅馆的名单，同时标明食宿费用和那里使用的语言。

同志们，请接受我们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
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
让·沃尔德斯

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记录^①

(1891年8月16—22日)

第一次会议

(1891年8月16日上午)

大会议程

会议于8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点在人民之家举行,维里肯同志宣布大会开幕,并以比利时工人党的名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在暂定的议程上列有以下11个问题:

大会议程:

1. 从国内和国际角度来看劳工保护立法的状况,以及为有效地制订和扩充劳工保护立法而应采取的手段。
2. 从国际角度来看联合权及其保证手段、罢工、联合抵制和工会运动。
3. 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和责任。

① 许多同志强烈地感到缺少一份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正式记录。为了满足大家的殷切希望,我们根据报纸的报道所汇编的这份布鲁塞尔会议记录,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同志们的这个需要。面临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这个需要变得更加迫切了。——柏林《前进报》出版社编者

4. 各国工人组织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讲犹太语的工人协会美洲联合会)。

5. 利用议会制度和普选权为社会主义工人事业服务;为使工人获得解放而应当运用的策略,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必须采取的手段(荷兰)。

6. 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

7. 废除计件工和包工。

8. 使五一国际劳动节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对劳动的调整和加强工人维护各国间和平的普遍愿望服务。

9. 为了显示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团结一致,确定一个总的、统一的名称(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建议用“国际社会党”,比利时工人党建议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

10. 积极开展以下各项实际工作:

(1) 国际工人通讯;

(2) 普遍的劳工统计;

(3) 通过成立全国工会委员会和国际工会委员会来促进各行各业工人之间的国际谅解;

(4) 通过每年用各种文字出版的《社会主义年鉴》和历书定期通报消息和发表有关报道;

(5) 在各国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鼓动。

11. 关于 1893 年在芝加哥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与建议。确定下届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时间。

德国代表团召开预备会议

下午会议开始之前,德国代表团召开了**预备会议**,研究对确定

大会的最后议程如何表态。

对于前 3 个问题的讨论有人提出异议；第 4 个问题要讨论，原因是，如果断然拒绝讨论它，也许会被人认为，由于胆怯想避免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基于这个原因，德国代表团应提出一个说明理由的议程。

关于第 5 和第 6 个问题，首先应该建议把它们从大会议程上撤消。如果这个建议通不过，那就只应把参与议会制度这个原则问题和利用普选权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后半部根本不能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讨论，因为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情况，而只有有关国家的同志才有权对此作出判断。

同样，第 7 个问题也应该从大会议程上删掉，关于庆祝五一节的第 8 个问题一致同意提出讨论。反之关于第 9 个问题，即采用一个共同的、对各国都有约束力的党的名称，不能接受。根据工人运动今天的情况和各国的立法来看，第 10 个问题中的(1)、(2)和(4) 3 项要求是行不通的，应予以否决。

施米特(卡尔斯卢厄)提出一项要求德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予以支持的提案，即设立一个委员会，它在下一届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可以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要求的文本，然后，作为原则声明载入各国社会党的纲领。

关于第 11 个问题，即 1893 年在芝加哥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应予以否决，决定向大会提出最多 3 年召开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布隆斯、麦茨格尔和戈尔特施泰因)通知说，40 名德国代表带着 99 份委托书已经报到，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第二次会议

(1891年8月16日下午)

第二次会议于下午2时半开始；主席团由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组成。两位主席瓦扬(巴黎)和辛格尔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现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和对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意义。德姆布隆(比利时)悼念了对促成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在比利时宣传社会主义比在座的任何人所作的贡献都大的德·巴普。德姆布隆宣读了一篇富有情感的悼词。瓦扬进而提议向所有那些曾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贡献过力量、遭受过苦难和进行过斗争的人，首先是对那位发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号召——这句话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口号——的人表示悼念。

代表资格审查

代表大会讨论了审查代表资格的问题；沃尔德斯以比利时代表的名义作报告；比利时代表团由187人组成，代表所有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只有一个情况要说明一下：在坐的还有3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他们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与社会党代表大会无关；但是因为这3人中有两人是由非无政府主义组织派遣的，所以需要考虑的只有1个人，比利时工人党提出排除无政府主义者，因为

他们既不站在工人组织的立场上,也不站在赞成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国家立法干预的立场上,因此不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大会根据绝大多数的意见宣布不承认这个代表的资格。

德国代表团由 40 人组成,法国代表团由 60 人组成,英国代表团由 23 人组成,他们既代表社会主义组织,也代表工会组织。奥地利派遣 311 位代表,带着 18 份委托书,匈牙利 2 人,丹麦 4 人,他们代表 90 个社会主义组织和 140 个工会组织的 17 000 名成员,还代表哥本哈根的参加工会组织的 20 000 名工人。耶布森代表挪威,参加过旧的国际的代表大会的知名战士伊格列西亚斯同志代表西班牙所有有组织的工人。美国派了 6 名代表;由于两个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派和芝加哥——罗森贝格派)争代表权,所以有一份代表委托书遭到了拒绝,但根据费舍的提议,承认詹尼尔同志为代表。荷兰派遣了 9 名代表,1 名无政府主义者遭到拒绝,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德鲁克尔小姐,在她声明她不仅是把男人看作唯一敌人的女权主义者,而且也是站在工人运动的立场上之后被允许参加大会。意大利派遣了 3 名代表,波兰派遣了 1 名,罗马尼亚派遣了 5 名,瑞士派了 6 名。今天总共有 175 名外国代表和 187 名比利时代表的代表资格得到了承认。

第三次会议

(1891年8月17日上午)

大会议事规程

第三次会议于星期一上午10时在圣米歇尔会堂举行,因为在此之前使用的“人民之家”会场太小。主席团举行会议后,公布了下列**议事规程**。每天举行两次会议,上午10时至12时30分,下午2至5时。报告人的发言时间为15分钟,讨论时的发言时间为10分钟,不允许任何人对同一问题作两次以上的发言,报告人第二次发言的时间和对他第二发言的讨论时间限制在5分钟之内。原则性问题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表决,所有的提案和发言要求都向执行委员会书面提出。

英国和**法国**各有5名新代表到达,**意大利**和**瑞典**也各有1名新代表到达。

德国代表团方面选出了参加根据大会议事规程决定成立的讨论大会前3项议程的委员会的代表。**劳工保护委员会**由倍倍尔、莫耳肯布尔、武尔姆参加;**保障结社和集会权利问题委员会**由博克、迈斯特尔和塞吉茨参加,讨论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委员会由李卜克内西、辛格尔和施塔特哈根参加。

第四次·会议

(1891年8月17日下午)

联合权等问题

第四次·会议，由于委员会要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在星期一下午将近4时才开会。由于劳工保护委员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德尔波特**（法国）代表联合权问题委员会作了报告，并提出同时讨论第2个问题和第10个问题的建议，因为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有共同之处，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大会接受了这一建议。

第五次会议

(1891年8月18日上午)

劳工保护立法

在星期二上午9时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王德威尔得**(比利时)受有关委员会的委托，就大会议程上的第1个问题，即**劳工保护立法问题**作报告；他认为没有必要说明各个工业国家中的劳动立法的情况，但要了解一下巴黎代表大会以来有什么变化。各国代表对此回答说：**没有变化**！当然，巴黎代表大会促成了柏林代表会议的召开，这是社会党人取得的一次道义上的胜利，但结果怎样呢？诚然至少有个别反动政府在劳工保护法问题上被迫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其他一些国家恰恰由于有了这个决议，援引别的国家为例而放慢了自己的速度。这样看来，这次代表会议的结果对工人来说是弊多利少。在**美国**不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在一些州还把这个法律看作是违反宪法的；唯一的改善是把八小时工作日扩大到了邮递人员。在**德国**只是部分地缩短了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日。在**奥地利**仅仅原则上禁止星期日工作。在**丹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位社会党议员在议会上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法，但是遭到了坚决拒绝。在**瑞典**只任命了3个工厂视察员，这就是所做的一切。在**罗马尼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瑞士**人们试图建立老年人和伤残人保

险制，并在所有企业实施工厂法。在法国关于女工、童工和计件工规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法律，并对统计和工人委员会作了一些规定。在英国通过确定童工年龄为 12 岁的规定使儿童劳动有所改善；但人们希望对纺织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荷兰有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在比利时关于女工和童工、关于由工人和雇主同样参加的劳动委员会有一条无足轻重的法律。这就是所有情况。但就连这些可怜的决定也根本没有实行；这些决定几乎在各地都成了死条文。工厂主就像一个说“你可以给我洗澡，但是不要把我弄湿”的孩子一样。剥削者对政府说：我们愿意受到法律的限制，但前提条件是，要像现在一样毫无顾忌地进行剥削！简而言之，毫无成就的柏林工人代表会议必定已使工人相信，他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力量才能实现改革。因此要进行孜孜不倦的宣传，要派遣社会党人参加立法机构，去夺取政权和占领议会。

受委员会的委托，王德威尔得建议通过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认为：

1889 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以来，在一些国家中颁布的劳工保护法和规定根本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

特别是柏林国际劳工保护会议（它的召开，如已承认的那样，多少受到巴黎代表大会的影响，并且被看作是向工人阶级的一种让步）的讨论表明，各国政府迄今为止，既没有表示意图也没有表示愿望要对工人阶级承担义务。

相反，柏林劳工保护会议的讨论给与会各国提供了种种借口，以柏林会议决议和其他正在互相竞争的国家里缺乏劳工保护立法为挡箭牌，拒绝在保护立法方面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代表大会必须最坚决地谴责这种怀有不正当的意图的做法。

同时代表大会证实，对现存的、本身有缺陷的劳工保护立法运

用和监督不够。

因此,代表大会要求各国工人阶级,通过有力的宣传,并且运用各国工人阶级的一切有效手段拥护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使这种宣传起初除了向各国工人阶级证明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对任何有效的劳工保护立法都是敌视的而外没有任何效果,也要这样做。

此外,代表大会考虑到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必须有统一的领导,特别是考虑到劳工保护立法,特向各工人组织提出如下要求:

1. 为了制定劳工保护立法,在各国组织对劳动条件进行长期调查。

2. 为了统一制定劳工保护立法,彼此互相通报。

最后,代表大会要求全世界工人面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反抗而团结自己的力量,并且在已拥有政治权利的一切地方,不投那些不支持他们要求的人的票。”

第六次会议

(1891年8月18日下午)

劳工保护立法

(继续)

在星期二下午2时半**第六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决议案。**瓦尔柯**(伦敦家具细木工)报告了他那个行业的状况,英国劳工保护的状况,讲述了工会会员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他是社会党人,同时又是工会会员,两者都致力于改善社会状况的同一目的;如果工会想实现它的目标,就必须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要看到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所引起的困难。**瓦尔柯**指出犹太移民的入境,他们把工资压得非常低(当翻译的**李卜克内西**补充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涉及德国工人,他们因不懂英语,不了解情况,不是按伦敦工厂规定的工资标准,而是按照大陆标准领取工资,这样一来也使英国人的工资被降低了)。因此报告人说,工人们必须取得国际性的相互了解,工会只有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单纯指望政府是幻想,英国政府就是一个证明,它在议会里一次也没有提出过它在柏林会议上正式承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最低要求。

德尚(法国制帽工人)的讲话内容与刚刚发言的英国人讲的内容相似。工人状况的恶化由于关税政策而更加严重,因此建立在国

际基础的组织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工人们了解到各个国家中本行业的状况。

倍倍尔(受到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他不准备在这里讨论德国工人的一般状况,而认为应对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求^①采取一致行动。对于前5点要求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其他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提出的要求,他和他的德国同志们有不同的意见。首先他想强调指出,根据他的理解,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不是要获得一个劳工保护法,它的任务首先是向工人们阐明现今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以便使这个社会尽快消失,而且要消失得比这个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所携带的致命病菌使之灭亡的速度快。工人必须认识社会的性质,这样,如果它的最后时刻一到,工人们就能建

① 巴黎代表大会决议,全文如下

“鉴于:

资本主义生产在其飞速发展中正逐渐囊括整个世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加强;

日益加强的剥削所造成的后果,是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与奴役,是使他们体力上衰退和道德上堕落;

因此,各国工人阶级的义务和任务是,运用他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反对那种毁灭他们并威胁人类自由发展的社会组织;

然而首先要做的是,抵抗正在进一步起破坏作用的经济制度。

代表大会决定:

1. 在一切拥有现代化生产的国家里,有效的劳工保护立法是绝对必要的。

代表大会认为劳工保护立法的基础是:

(1)八小时正常工作日;

(2)禁止使用未满14岁的童工,14岁至18岁的全体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

立一个新的社会。他特别强调说,国外有人最近发表了很多意见,说在德国党内对这一任务或策略存在着原则分歧。这是错误的,不存在这种分歧,谁想试图使党离开这个任务,他自己就不得不立即离开党。

我们的党也是一个宣传党;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离我们还很远,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一切方法和途径,一方面把这部分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另一方面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就是我们对劳工保护法问题的态度,这会使工人阶级具有战斗力,更加有效地引导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管资产阶级多么不情愿,它还是被迫步步退让,被迫违反它的愿望而加强工人反对现今社会的斗争。

接着倍倍尔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帝国政府的态度,帝国

(3)除了某些按其性质需要不间断地进行生产的企业外,禁止上夜班;

(4)禁止在有害妇女身体健康的一切企业使用女工;

(5)禁止女工和18岁以下的男工上夜班;

(6)每周至少应有连续36小时的休息时间;

(7)禁止对工人健康特别有害的工业企业和工作方法;

(8)取消实物工资制;

(9)对一切工业企业(包括家庭工业在内)实行监督,监督工作由国家支付薪俸的工厂视察员(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由工人选举的)负责进行。

2. 代表大会声明,所有这些措施必须通过法律,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国际条约来保障,代表大会要求各国工人阶级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实现这些要求,并对它们的贯彻实施加以监督。

3. 此外,代表大会声明:一切男工都有义务把女工看作是权利平等的战友,并设法促使同工同酬的原则也适用于女工。代表大会认为,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是达到上述目的,以及实现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愿望的重要手段,因此大会要求充分的联合自由和结社自由。(请参见关于国际劳工保护立法的决议,《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219页。——译者注)

政府为了把世界的注意力突然引向自己，为了显示对工人友好，采取了一个果断的行动——接受瑞士国际劳工保护问题的倡议。即使外国对此抱有怀疑，从最近选举投票数目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证明，它没有受骗，没有让先发制人者占上风。正如柏林代表会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一样，帝国政府的劳工保护法案尽管名目繁多引人瞩目，但就实质而言毫无意义，而在很多方面恰恰是更坏了，因此最后连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声明反对。简而言之，在德国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或者受到蒙蔽。

关于上述决议案的个别条文，代表大会在作出决定时要当心，各工人组织不是贯彻代表大会决议的适当因素；关于劳动统计，英国等国的工会虽然作过多种考虑，但毫无疑问，没有全社会的手段，这种劳动统计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决议案的形式没有承担有关责任，所以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尽管他对这项工作不抱多大希望。

关于决议案的第三点，他必须重复一遍他昨天在委员会上已经说过的话。这些要求对他来说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根据德国的形势，任何一个不彻底承认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人我们党都不会提出来作为候选人；但根据这个决议案只要同意巴黎决议中关于劳工保护的各项要求就够资格了。每个资产阶级政党都可以赞成这点，但这样做还远远当不了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必须使那些揭社会疮疤的党旗帜鲜明，以便大家都能看清它们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承认其他国家的同志有根据自己的情况行动的自由，能同我们保持协调一致，我们就满意了。（热烈鼓掌。）

第七次会议

(1891年8月19日上午)

劳工保护立法

(继续)

第七次会议于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继续讨论劳工保护问题。

美国犹太工人的代表卡恩要求在决议中包括关于阶级斗争的声明，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阶级斗争，直到雇佣制度消灭。在工会受到热情支持的情况下，切不可忘记强调指出，单纯的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人必须夺取政权。

阿德勒博士（维也纳）指出了几个翻译上以及在阐述奥地利劳工保护状况时出现的错误。当然自从巴黎代表大会以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说奥地利根本没有劳工保护立法则是不对的。除了英国和瑞士之外，奥地利的劳动保护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有正常的工作日，禁止妇女和儿童上夜班，星期日休息。当然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规定都主要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然而，我们却缺少一些国家已很发达的东西，而没有这个东西整个劳工保护都是幻想。这里所说的是监督执行的权利，我们没有结社权和集会权，根本没有联合权。

他对决议案总的表示满意；当然八小时工作日的提出不是起源于巴黎决议，它提出的历史同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长。但是资产阶级歪曲了这种思想，正如他们伪造食品一样，他们也伪造思想，他们伪造了自由的思想，平等的思想，现在又伪造劳工保护的思想。因此需要说明，资产阶级所说的劳工保护不是我们的见解。我们在英国和瑞士看到，资本家以劳工保护的热情拥护者自居——可是劳工保护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只要其他国家还处于落后状态，他们就什么也做不成。由于资产阶级避免确立本国的劳工保护，所以国际劳工保护实际上变成一种国际剥削者的保护；因此我们必须一再重申，要从本国着手做起。——我们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一样，也算是革命的社会党人。拒绝整个议会制度，这听起来当然是激进的，但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整个议会制度、选举权、表决权、劳工保护这些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是使思想革命化和赢得进行这场革命的穷苦人的一种好的手段。我们永远不能因为这些手段而忘记了我们的目的。

讲话者最后重复了关于是否支持候选人要看他是否赞成劳工保护而定那一段话。这是不够的，他不得不投反对票。如果要求对巴黎代表大会决议表示赞成的话，他是会赞成的，因为这个决议不仅要求劳动保护法，而且还包含社会主义的原则声明。我们奥地利没有普选权，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激进政党企图根据这些要求欺骗我们；但是我们经常批驳了他们，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要求从社会的统治阶级那里是得不到实现的，然而如果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旗帜收藏起来的话，我们将不能赢得工人。（热烈的掌声。）

弗兰克尔（巴黎）反对决议案的含糊的、软弱的、不肯定的形式；他要求强调工人运动的阶级特点，既针对如法国的资产阶

级政党所说的自 1789 年以来就不存在阶级了，也针对工人阶级中的某些派别，它们宣称劳工保护的任何一个要求都是社会主义的。他也不同意结尾一段的说法，因为那一段可以让人作这样的解释，即工人只应反对工业剥削，反对自由派，但同样必须同教权主义—保守派以及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应该明确声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夺取政权上，因为只有当工人掌握了政权才能获得经济上的解放。

提出的各种修正案均呈交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

(1891年8月19日下午)

劳工保护立法

(继续)

第八次会议于星期三下午3半时举行。王德威尔得(比利时)作为劳工保护法委员会的报告人讲了话。尽管在辩论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牢记马克思的教导的工人们事业上要团结一致,他要求在大会上像在委员会里一样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

在热烈的欢呼声、喝采声中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

“代表大会基于阶级斗争的立场,并确信不消灭阶级统治,工人阶级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它声明:

1889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以来,在一些国家中颁布的劳工保护法和规定根本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

特别是柏林国际劳工保护会议(如已承认的那样,它是在巴黎代表大会的压力下召开的,并且被看作是对工人阶级的日益强大的力量的一种让步)的讨论表明,各国政府不想进行必要的改革。

相反,柏林劳工保护会议的讨论给与会各国政府提供了种种借口,以柏林会议决议和其他正在互相竞争的国家里缺乏劳工保护立法为挡箭牌,拒绝在劳工保护立法方面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

施，这种做法怀有不正当的意图，因此必须最坚决地予以谴责。

同时代表大会证实，对现存的、本身有缺陷的劳工保护立法的运用和监督不够。

因此，代表大会要求各国工人阶级，通过有力的宣传，并且运用各国工人阶级的一切有效手段拥护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使这种宣传起初除了向各国工人阶级证明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对任何有效的劳工保护立法都是敌视的而外没有任何成果，也要这样做。

此外，代表大会考虑到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必须有统一的领导，特别是考虑到劳工保护立法，特向各工人组织和政党提出如下要求：

1. 为了制定劳工保护立法，在各国组织对劳动条件和工人阶级状况进行长期调查。

2. 为了统一制定劳工保护立法，彼此互相通报。

最后，代表大会要求全世界工人团结一致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并且凡是在自己拥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利用这种权利把自己从雇佣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

工人组织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

从现在起大会转入讨论大会议程上的第4个问题：工人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

卡恩（纽约）说，他不是作为一个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工人来到这里。对于我们社会党人来说，犹太人问题与军事问题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目前形势迫使我们对这两个问题都要表态。代表大会昨天向伦敦正在罢工的细木工人表示了支持，今天代表

大会向经常罢工、经常受迫害、受攻击的犹太兄弟表示同情。有人把犹太人列为一个特殊的阶级，那么现在必须把这场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为此目的，犹太工人要求在社会民主党内占有位置，以便进行解放人类的伟大斗争。

沃耳德斯以主席团的名义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正如我们过去对受迫害的俄国革命者表示我们的同情那样，现在我们对受迫害的俄国犹太人表示同情。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现象，其根源完全在于资产阶级政党，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其他原因外，还因为犹太剥削者是比较狡猾的剥削者。对于受压迫的犹太人来说只有一个获得解放的办法：参加社会主义的行列。他以主席团的名义提出一项决议案，在经过微小的修改后该决议案被一致通过：

“考虑到，

在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原则和纲领中早已清楚地阐述过，它们不赞成民族的和种族的对立和斗争，而是进行各个国家和种族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还考虑到，

对犹太种族和讲犹太语的无产者来说，除了参加有关国家的工人组织外，没有其他办法获得解放；

代表大会认为：

反犹煽动和亲犹煽动只是资本家阶级和政治上的反动派的诡计，谴责这种煽动的目的在于分裂工人，转移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

因此，讨论由讲犹太语的美国同志提出的暂定议程上的第4个问题是多余的。”

代表大会转入议程。

第九次会议

(1891年8月20日上午)

联合权和国际组织等问题

第九次会议于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讨论大会议程上的第2个问题（联合权及其保证，罢工，联合抵制等），这个问题和第10个问题（国际组织，普遍的劳工统计等）一起讨论。格鲁西埃（巴黎）代表委员会作报告。该委员会未能就一个共同的决议案取得一致意见。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建议，通过每个国家中成立的、互相交往的委员会进行国际联系，而各国组织又分设下属委员会。他们认为，在一些国家里尽管有法律的限制，成立这种组织是可能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不顾种种惩罚和迫害，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国际联系。主要问题在于：“为了给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好基础，究竟应当怎样组织工会？”回答是：（1）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动时间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工资；（2）必须对参加工会的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能够肩负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重任。因此就必须建立一些国际组织。工人必须不再是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工人，他们必须是全世界的工人。他们在工会基础上使用的斗争手段，如罢工和联合抵制，也只有在国际范围内运用才能收效。

因此，英国和法国的多数同志提出下列决议案：

“代表大会声明：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赋予工人一种义务，即联合起来为自身的解放做好准备。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不仅要同企业主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奠定基础。

全世界的工人要相互声援，他们的联系必须冲破所谓的国家限制。必须用劳动国际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系。

因此，参加各种工会组织的工人必须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工会保持经常的联系，并且用这种办法，以及通过国际工会联合会使全世界工人的力量团结起来。

由于不同国家的立法束缚了工人的国内和国际间的联系自由，工人必须运用公众的强大力量来消除这种状况；当然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解放，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国际联系这个获得胜利的唯一保证建立起来。

鉴于目前组织这种国际联盟还有困难，鉴于有必要立即建立各国工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各国工会必须成立书记处，它的任务是收集整个工人组织所需要的统计资料 and 文件。

因为罢工和联合抵制是目前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唯一武器，工会团体必须立足于着重使用这种武器。一个组织发起的罢工和联合抵制，所有其他工人团体，而主要是其他国家的同类工人组织都必须予以支持。在有可能和不损害自己尊严的情况下，工人与其举行罢工，不如谋求调解和诉诸仲裁法庭。

必须在所有国家内进行不间断的、不断强化的、有利于工会组织的宣传，以便使所有的工人不仅在当前的斗争中团结起来，而且使他们充满信心和愿望去追求和实现他们的彻底解放。

1. 工 会

(1) 应该在所有的国家为所有的职业建立只允许工人参加的工会。

(2) 工会的目的在于维护和确立符合人类尊严的工资制，减少劳动时间，首先是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公平分配劳动产品的经济。

(3) 工会必须按其行业进行国内和国际之间的联系。

(4) 这种国内和国际间工会之间的联系不允许把它们努力仅限于工会或一定的地方，因为工人的问题到处都一样，只能通过各工会之间的联合才能解决。

2. 通讯、统计、宣传

(1) 各国工会本身必须保持紧密联系，同时也和其他国家的工会保持紧密的联系。

(2) 必须在每一个国家设立工会书记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的工会书记处进行联络，收集一切报告和统计资料，这对工会和工会联合会是有利的。

(3) 这种书记处只做管理工作。

(4) 每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工会书记处。

(5) 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诸国应该就出版历书达成协议。这种历书应该为宣传服务，首先应为农村的无产阶级服务。

(6) 书记处每年用各种语言出版一份报告，内容包括统计资料，说明宣传的结果，以及关于工会和社会主义的鼓动的结果。

3. 联合权、罢工和联合抵制

(1) 联合的自由在一些国家里完全受到压制，在另一些国家里则受到限制。所有工人组织都应提出联合自由的要求。

(2) 罢工和联合抵制是两面锋利的武器，因此工人组织只有在深入地考察了所有的情况之后才使用这些武器，首先要考虑雇主还没有挑起罢工这种情况。

(3) 必须展开大规模的宣传，使所有的工人支持那些进行罢工的工会联合会。

(4) 其他国家同类联合会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某个国家的正在进行罢工的工会取得胜利，办法是，在自己国家内发动同样的运动，或者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帮助。

(5) 工人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组织酝酿举行总罢工的可能性。

4. 结社权和联合权的法律保证

工人应该促使他们自己国家的议会和政府颁布关于工会的法律，这项法律应包括下列要点：

(1) 所有那些目的在于研究和维护雇佣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工会，应该乐于与同业的工会或非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组成联盟和联合会。

(2) 这种联盟或联合会应该自愿地与其他国家类似的联盟或联合会结成国际联盟和联合会。

(3) 每个雇佣劳动者都要参加一个工会。

(4) 每个工会必须像接纳本国人一样接纳外国人加入工会。本国人与外国人在担任工会职务时要一视同仁。

(5) 工会和工会联合会必须拥有法人所具有的权力。

(6) 职业介绍所必须完全掌握在工会或由工会管理的劳动介绍所里。

(7) 公共劳动只允许分配给工会。在工会不接受这种工作时，只允许交给那些只雇佣工会会员的企业家。

(8) 联合权要由法律来保证。这种法律要规定严惩那些危害和威胁结社权和联合权的人。

(9) 应该废除反对国际的法律以及一切束缚结社权的法律。

博克（哥达）作为补充报告人阐述了使德国工人不能接受所建议的国内联合的形式的困难；其实德国人不乏国际团结的精神，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人，和他们站在一起的瑞士人、奥地利人、荷兰人和罗马尼亚人，站立在向前看的立场上，完全赞成在决议中发表一个原则声明，国际联系的形式对他们来说只能采用工会干部体系，任何一种其他的尝试都会立即遭到统治阶级的暴力阻挠；同哈雷代表大会决议相衔接，德国代表提出下列决议案：

“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在统治阶级越来越厉害地压制工人的政治权利和使工人的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罢工和联合抵制是工人阶级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既可以用来抵御他们的敌人想给他们造成物质上或政治上的损害的企图，也可以用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但是，由于罢工和联合抵制是一种两面锋利的武器，在不恰当的地点或不恰当的时间使用它，这个武器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害处可能比益处多，代表大会劝告工人们要仔细考虑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一武器。代表大会尤其认为，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来领导这样的斗争，以便既通过数字显示出来的力量也通过物质手段的力量达到预期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代表大会劝告各国工人大力支持工会组织；同时代表大会对各国政府和企业主阶级以任何方式限制工人联合权利的一切企图提出抗议。为了保证联合的权利，代表大会要求废除一切限制结社权的法律，同时惩罚那些妨碍工人行使这种权利的人。

代表大会认为所有工人都有责任依据这种精神采取行动；因为各国组织间的合法国际联系根据现行法律是不可能的，所以代表大会建议各国组织在需要时通过彼此给予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来显示它们的团结精神。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应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

艾威林博士（伦敦）：煤气工人联合会不仅团结了本行业的煤气工人，而且联合了 70 个不同的工会。煤气工人赞同德国人的想法，这种想法非常符合他们的观点，因为煤气工人联合会已经有了一个这里要求建立的那种机构。它的书记已经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建立了通信联系，如果每个国家都已选出一个这样的书记，或者将要选出一个这样的书记，那么一个未来的组织就开始形成了。

德拉波特向法国少数派声明，他同意德国人的决议案，并且提出了一个与艾威林一致的，也为德国人所接受的修正案。

第十次会议

(1891年8月20日下午)

联合权和国际组织等问题

(继续)

在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的第十次会议上继续进行辩论。

福维奥（伯里纳惹矿工代表）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要那些有工联组织的国家的工会承担义务：规定它们的会员不得按照工联组织确定的工资工作，不执行这项规定就被看成是叛徒，其次，一旦他们被开除要予以照顾。

德尔克吕兹（法国）指出，如果德国人同意下列修正案，法国人就准备接受他们的决议案：

“尽管成立一个国际工会中心组织非常令人向往，但是它还面临着种种困难。代表大会决定为各国的工人团结提供共同的表现方式。他建议在一切可行的地方成立本国工人书记处，以便一旦发生冲突，书记处就立即互相通报，并互相支持。”

迈斯特尔（德国）以德国第二组代表（他们完全赞成法国人的修正案）的名义发言。

达申斯基作为波兰的代表发了言。我们来自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任何一个试图组织工会的人的最后结局都是被关进华沙的要

塞里；因此可以理解，我们不能同意要我们担负我们担负不起的
责任的那项提案。对于奥属波兰和普属波兰来说，我们奉行的策
略是，我们同这两个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并肩携手前进，因此我们
也不能同意委员会的形式。

弗里根（荷兰）反对要求工会进行劳动统计的做法，那只能
用国家手段进行。

帕内尔（伦敦）声明，代表各行各业有组织的工人的英国代
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一致认为：工人的幸福有赖于无产阶级国际组
织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英国人赞成
德国人的决议案。

波科尼（维也纳）说：之所发生意见分歧，是因为对社会党
代表大会在工会问题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有不同的理解。奥
地利人同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意见是，问题只是在于从原则上阐明
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其他派别的代表则认为应该提供一份关于
工会本质和工会宣传的正式的教义问答。但这样会毫无结果的。沉
默和行动比夸夸其谈和无所作为要好。我们大家知道，每一优秀
的工会工作者都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优秀的社会主
义者都是一个优秀的工会工作者。

德国代表团开会讨论五一节问题

在星期四晚上**德国代表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深入讨论了关
于**五一节**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应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
什么样的建议，并作出决议：由一个六人委员会（**倍倍尔、巴德
尔小姐、莫尔肯布尔、施米特〔慕尼黑〕、施瓦尔茨和乌尔利希**）
提出一个提案，要求把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推迟到**5月的第一个星**

期日举行；如果得不到普遍的赞同，那么就在普遍停止工作的思想不一定非与五一节的庆祝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寻求谅解。

对于德国提出的至多每隔3年举行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建议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下届代表大会应于1893年在瑞士召开；到现在为止，除了纽文胡斯以外，没有一个人同意在芝加哥召开大会。

第十一次会议

(1891年8月21日上午)

罢工和联合抵制

在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上，德国代表就议程上的第2个问题提出的决议案为各国所接受，这个决议案全文如下：

“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在统治阶级越来越厉害地压制工人的政治权利和使工人的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罢工和联合抵制是工人阶级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既可以用来抵御他们的敌人想给他们造成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损害的企图，也可以用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但是，由于罢工和联合抵制是一种两面锋利的武器，在不恰当的地点或不恰当的时间使用它，这个武器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害处可能比益处多，代表大会劝告工人们要仔细考虑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一武器。代表大会尤其认为，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来领导这样的斗争，以便既通过数字显示的力量也通过物质手段达到预期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代表大会劝告各国工人大力支持工会组织；同时代表大会对各国政府和企业主阶级以任何方式限制工人联合

权利的一切企图提出抗议。为了保证联合的权利，代表大会要求废除一切限制联合权利的法律，同时惩罚所有那些妨碍工人行使这种权利的人。

虽然代表大会殷切希望能有一个把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中央组织，但目前由于存在种种困难，这个组无法成立，所以代表大会决定，为各国工人的团结提供一种共同的表现方式。

在每一个有可能建立全国劳动书记处的国家里建立劳动书记处，一旦劳资之间发生冲突，就立即通报各国工人，以便采取措施。”

只有比利时和法国人中有少数人不同意。决议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

无产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讨论大会议程上的第3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发言人：

李卜克内西：委派了两名报告人；他代表德国；**瓦扬**代表法国；由于有共同思想和感情，翻译两位发言人的讲话就成为多余的事了。首先他想强调指出，总的来说在委员会内部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反对派报刊硬说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那是错误的；如果甚至说法国人固然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带有沙文主义情绪和从未放弃复仇思想，那么这样的说法丝毫也不真实。在委员会里根本没有提到过复仇这个词。完全相反：以为提出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就能制造不和的报刊大失所望了。对资产阶级来说，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委员会里关于这个问题只字未提。道理很简单：对于我

们社会党人来说不存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无论对德国社会党人或法国社会党人来说，都不存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如果我们的各种努力得以实现，如果德国实行了社会主义，那怎么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是一个人为的问题，它只能产生于今天的腐朽社会。

在委员会里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应讨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应采取的建议和措施，例如，在战争爆发时拒绝应征入伍和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等。正是那些在军国主义的压迫下首先遭受苦难的国家的代表立即一致宣称：所有这些建议或类似的建议都是行不通的。此外，在委员会里还讨论了除了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外还举行一个共同的国际和平示威游行是否合适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德国代表和法国代表都声明说，这是不必要的；在德国和法国，五一节已同时成为各国人民大团结的节日，在德国和法国没有一次集会不表达这种思想，在其他国家里也是这样。至于和平示威游行问题，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对此必须采取一种与慈善的资产者的集会完全不同的态度。现在有一个和平和自由联盟，我们对它表示充分的同情；但是所有这些和平朋友的社会地位妨碍他们认识军国主义的根源，使他们的一切善意的努力变得软弱无力。军国主义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阶级矛盾，今天这种战争状态就根本不可能。解放了的工人阶级还有什么理由进行民族煽动，互相残杀呢？德国工人的敌人不是法国工人，而是德国资产者，法国工人的敌人不是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而是本国的资产者，不仅我们，而且法国代表们也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军国主义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从下述事实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过去对军国主义原则上采取反对态度的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现

在一致批准军国主义要求的几百万军费。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他们不是想用这支庞大的军队来反对外国敌人，而是要用来保护他们自己，阻止社会民主党的推进，在阶级斗争中保护他们自己，维护他们的剥削特权。这里不是深入讨论军国主义的后果和下一次战争的结果的地方。在下一场战争中将有千百万人应征入伍，欧洲将全副武装，各国人民将互相残杀，这将是世界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上次普法战争同它相比，只不过是一场儿戏而已。这场战争势必使我们的文明倒退一个世纪。高举文明旗帜的无产阶级必须设法在一场浩劫毁灭我们共同的文明之前阻止战争的发生。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阻止这场灾难。如果人的兽性发作，那么理智就会沉默，人道精神就会蒙上面纱。如果人民一旦像雪崩似的互相咆哮，那么任何一个想阻挡的人都会被碾得粉身碎骨。我们必须证明，我们要消除这种武装的和平，但是，只要我们不消除构成军国主义基础的那种阶级斗争，一切努力都注定要落空。

为了使对军国主义的这种抗议、对和平的这种呼吁在全世界引起反响，他请求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消灭军国主义从而结束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唯一保证。（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决议全文如下：

“鉴于笼罩着欧洲的军国主义是持续的——公开的和潜在的——战争状态的必然结果，它是由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阶级斗争所强加的；

代表大会声明：一切旨在消灭军国主义和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努力，如果不是针对产生军国主义这个祸害的经济原因，那么无论动机如何崇高，都是徒劳无益的；

只有建立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根除军国主义，并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

所以一切想要消灭战争的人都有责任参加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唯一真正的和彻底的和平党。

鉴于欧洲的越来越险恶的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煽动，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坚持不懈地和有力地抗议和反对战争狂，以及为之效劳的同伙，并且通过完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代表大会声明，这就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可怕灾难的唯一方法，而这场战争的无法预见的灾难性后果将首先落到工人阶级头上。

在人类和历史面前，只有统治阶级应对这样的灾难负责。”

瓦扬拥护李卜克内西讲话中所阐述的决议案。荷兰的**纽文胡斯**不赞成在辩论结束时所综合的那个提案，所以他想论证下列反提案：

“代表大会

鉴于民族差别从来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只符合其压迫者的利益；

鉴于所有现代战争都是资本家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的，是他们手中握有的一种手段，用来分散革命运动的力量，并通过加强无耻已极的剥削来巩固资产阶级至高无上的统治；

鉴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为它进行挑衅而表示道歉，因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国际意志的结果；

国际社会党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定，各国社会党人将以号召人民普遍举行罢工来回答可能的宣战。”

这个提案遭到拒绝，**纽文胡斯**作了长篇发言来论证他的提案：如果仅仅想作出一个一致的决议，那么只需要用一般的套话就够

了，如像这个决议案的情形那样；如果把这个决议案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词换成基督徒和基督教，那么，救世军，如罗马教皇，总之，一切党派也都可能投票赞成。如果把资产阶级说成是军国主义的根源，那么在他看来，就好像两个男孩在打架，每一个人都指责对方有错一样。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大话，它只会使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在支部里，我属于少数派。由于在那里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弱小者会被吃掉，所以我的事业失败了。因此我要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呼吁，即使我的事业在这里也遭到了失败，那我也会感到安慰：少数派的思想在世界上第一次作为笑料出现了。——大国的国际精神比小国差。原因是大国有野心，而小国没有足够的权力这样做。由于缺乏国际主义感情就产生了沙文主义。因此在我们中间也有沙文主义者，特别是在德国人中间。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只要举福尔马尔作例子就够了，他在自己的论述中理所当然地可以援引其他德国同志在议会中的声明。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是德国人的朋友，而在朋友之间必须讲真话。这种沙文主义对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危害。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所有的社会党人都必须采取同样的态度。否则指挥官一声令下，人民就会盲目进军，互相残杀。沙文主义会在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之间作出区别。众所周知，外交家们懂得根据他们的需要把任何一场战争说成是进攻性战争或防御性战争的艺术。——至于谈到战争爆发时我们应持什么态度，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极抵抗。人们怀疑怎样进行消极抵抗；他想起了荷兰的一个行会“毛皮烘干工人”，他们甚至成功地拒绝为伟大的拿破仑服役。社会党人必须向人民讲明，如果战争被煽动起来的话，他们决不再去打仗，因为政府仇恨我们甚于仇恨其他国家的政府。你们知道当战争爆发时各国政府打

算做什么吗？它们将把社会党人驱赶到第一线，让他们互相残杀，以达到消灭他们的目的。社会党人只有拒绝互相射击，才不致成为这个阴谋的牺牲品。这样一来他们虽然有被监禁的危险，但是监禁总比死亡好。就我们方面来说，宁愿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置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之前。如果各国政府宣布战争，那么这就是一场革命。而我们方面有权用一场革命来作回答，要求人民不要拿起武器。人民不要战争。人民应起来代替政府，而国际仲裁法庭应该对各国之间的争端作出决断。如果一国人民不想服从，那么其他国家的人民就应抵制它。但在目前的形势下，战争一旦爆发，人民应该奋起反抗。恩格斯说过：发给每个人一杆长枪和 50 发子弹，那么自由就有了保证！因此我相信，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将是世界和平的胜利。

第十二次会议

(1891年8月21日下午)

无产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继续)

第十二次会议于星期五下午2时半举行。瓦扬发言反对纽文胡斯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置委员会决议案中表达得十分明确的基本原则于不顾，而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模糊观点。此外，他还证实，除荷兰人所投的两张反对票外，委员会决议案是一致通过的，所以谈不上轻率的问题。

李卜克内西：纽文胡斯硬说我们的决议太一般化了，说只要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两个词换成基督徒和基督教，那么每一个牧师都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他这个当年的牧师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阶级斗争说成是基督教教义，这对我们大家来说却是一件新鲜事。如果纽文胡斯作为德国人的朋友认为必须向他们讲真话，那么他（李卜克内西）作为一个好朋友现在也想向他讲句真话：难道我们的决议只是些套话，空话，只是些大话！这里写下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纲领。什么叫空话？就是夸夸其谈，言而无信！说要举行全世界大罢工就是一句拙劣的空话！如果我们要宣布全世界大罢工，资产阶级就会嘲笑我们！事

先宣布一场革命！只有在进行革命时才可以这样说，这是人们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更不能事先宣布。

纽文胡斯责备德国社会党人有沙文主义！要是有哪一个小党最不应该受到这种责备的话，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没有任何人比法国人更清楚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需要拿出勇气来表现国际主义精神的时候，在每个人都知道，为此他们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并受到多年监禁的处罚的时候，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在1870年不顾这种危险而反对战争，反对兼并，并承担了后果，——我们确实做了这些事，但我们没有大肆吹嘘。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沙文主义者，我要给你们指出来！不是我们，而恰恰是纽文胡斯先生！如果说什么时候曾经壮观地显示过国际主义团结精神的话，那就是在巴黎代表大会期间89名德国代表不顾德国沙文主义的反对和他们的法国兄弟结成联盟的时候！而那时纽文胡斯却在他的报纸上把这些德国代表说成是一小撮粗野的大吵大闹的人，只不过是他们领导人手中的玩偶而已。

纽文胡斯的这项建议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军法就会起作用。谁拒绝打仗，就会立即被送交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当然纽文胡斯与发生的这些斗争毫不相干！当四五百万法国人和德国人拔刀相向时，荷兰是平安无事的。

我们的决议案宣布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宣布了工人的国际组织，即各国人民的国际联盟！请您不要受空话支配！受空话支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祸害！请你从空话中摆脱出来吧！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夺取政权。通过像纽文胡斯提出的那样的决议案只能使我们变得滑稽可笑。（雷鸣般的掌声。）

纽文胡斯：当李卜克内西责备我说谎话时，不是我攻击了他

们，而是我受到了攻击。我没有说德国社会党人是沙文主义者，而是说他们当中有沙文主义者。我还反对好像只有德国人才做出了牺牲这种说法。

沃尔德斯认为，要是知道委员会里的讨论情况，那就不会说少数派被吃掉了；少数派坚持的观点是，不能忽略各个国家里的不同情况。在原则方面没有出现不同观点；但在各国实际情况不同的条件下，有必要做出一个妥协的决议，因此少数派对决议提出了修正案，让各国在战争爆发时自己去采取最适合那时情况的方法。比利时可能在军队中进行宣传，荷兰可能宣布总罢工：从这一点来看，纽文胡斯本人也会赞成上面提出的决议案。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像在第2个问题上那样不能在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那么眼光就太短浅了，太渺小了。他请求用鼓掌的方式一致通过。

大会讨论了一系列修正案；一部分英国人还要求通过：国际仲裁法庭，减少军事行动，此外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布兰亭（斯德哥尔摩）提出根据巴黎决议的精神由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要求，鲁阿内（巴黎）认为王朝的利益是战争的根源。

在沃尔德斯发表了动人的结束语之后开始表决。16个与会国中荷兰、法国（32：23）和英国以相对的多数^①投票赞成经过英国人修正过的纽文胡斯提案。而委员会提出的提案则被各国所接受，13个国家一致赞成，法国和英国大多数代表赞成，荷兰有1名代表赞成，2人弃权。

^① 原文如此。从下面宣布的对委员会提案表决的结果来看，这3个国家中赞成纽文胡斯提案的代表（除荷兰外）是少数，而不是相对的多数。——译者注

第十三次会议

(1891年8月22日上午)

第十二次^①会议于星期六上午10时举行。

波兰人提出的关于粮食贸易国有化以及设城镇面包房的提案根据主席团的建议未被列入大会议程。同时主席团还建议从大会议程中取消第5和第6个问题（议会制度问题，为解放无产阶级应采取的方法，以及和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问题）。福尔士金（荷兰）声明说，他撤回提案，因为他确信，主席团中的多数人（特别是德国人）害怕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辛格尔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这种怀疑简直毫无根据。德国人已多次明确指出，要讨论提案的原则部分。他们除反对徒劳无益的讨论而外，必须反对讨论各国自己应该采取哪些手段和策略的问题。国际代表大会对这些问题不能作出判断或发号施令，理由很简单，因为这里牵涉到的情况只有本国的同志才了解，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要求主席团的荷兰委员对他的这番话提出反驳或加以证实。德国人确实也没有理由害怕讨论全体国际无产阶级始终按照我们的意思解决的，并且整个无产阶级世界都认为解决得正确和解决得好的这个问题。德国人与荷兰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荷兰人谈革命，而

^① 原文有误，应为第十三次会议。——译者注

德国人则干革命。(掌声。)伯罗斯对主席团中的英国委员也提出同样抗议。

废除计件工和包工

贝尔特朗(比利时)就第7个问题(废除计件工和包工)提出下列决议案。由于这个提案涉及的纯粹是一个实践问题,他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论证,他要求不用费很多时间来讨论就予以通过:

“鉴于计件工和包工在大小工业企业中日渐盛行,这种支付工资的形式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使工人的贫困状况日益严重和把工人越来越变为机器;

鉴于在这种体制下竞争使工人互相对立,在计算计件工资和包工工资时是以最熟练的工人的定额作为计算标准;

最后,鉴于这种体制是工人和企业主之间,工人内部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的根源,并且在家庭手工业中也在越来越普遍地采用;

代表大会认为,这种应该受到诅咒的剥削程度最大的体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才能结束这种体制;但是代表大会认为,这决不是说,各国工人组织用它们可以支配的和它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一切手段尽快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就可以减轻。

代表大会对所谓的‘血汗制’和中间商制持同样的观点,并建议采取同样办法来对付它。”

这个决议案除1票反对外被一致通过。

男 女 平 等

妇女代表提出下列提案：

代表大会应该做出决定：要求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它们的纲领中对争取男女平等的努力给以肯定的表述，并且首先要特别提出要求：“保证妇女在民法方面和政治方面享受与男人同等的权利。”

辛格尔论述了该提案。如果说我们大家原则上都赞成男女完全平等，并且如果说在我们德国的纲领中已经包括了这种要求，那么确实还有很多国家必须提出这个要求，因此需要在这里作出决定。我们不必强调，我们不采取女权主义者的有局限性的立场，这些女权主义者以争取允许少数资产阶级妇女从事某些职业，如医师、律师等，并把这当作她们宣传的首要目标为满足。其实应该允许每个妇女从事所有的职业并拥有跟男人一样的权利。我们德国人非常愿意支持我们的女同志们提出的提案，尤其是我们在最近一次选举中看到，我们取得的成就除其他原因外在多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妇女们的不懈努力和火焰般的热情。因此主席团要求你们一致通过这个提案，这样，我们就以庄严的方式证明，整个文明世界的社会党人决不承认男女之间权利不平等。（掌声。）

王德威尔得（布鲁塞尔）反对决议案的行文，他赞成完全平等，并赞成废除一切与此相抵触的法律，但是他还想说，妇女的第一义务是呆在家里。（抗议。）

此案在表决中除 3 票反对外一致通过（热烈的掌声）。

闭幕会议

(1891年8月22日下午)

闭幕会议于星期六下午3时举行。

五一节问题

讨论了五一节的问题，报告人彼得森（丹麦）报告了委员会讨论的情况。英国人要求在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庆祝，德国人也是这个意见。这两个国家赞成提出的提案，并再一次证明国际团结的重要性。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坚持在5月1日举行庆祝，并要求普遍停止工作。最后人们一致同意下列提案，即不强求各国采取未经考虑的步骤，而是允许每个国家有考虑各自国家内存在的阻力和困难的可能性。他以主席团的名义请求一致地不经过讨论通过下述提案：

“为了保障五一节有一定的经济特点：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表明阶级斗争，代表大会决定：

5月1日是各国工人共同的节日，在这一天工人应该提出共同的要求和显示出他们的团结一致。

这个节日应该是休息日，只要各个国家的情况允许，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许多人要求不需讨论，立即表决。

罗雪尔（奥地利）反对不进行讨论。应该让极少数人说话。大部分代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提出他们组织的提案。

倍倍尔不同意讨论。不应该再翻过去的老帐，因为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另一个方面的反驳。

阿德勒（维也纳）表示反对，奥地利人并不想旧事重提，他们受委托要在全体代表面前表达他们的立场。

尽管奥地利人抗议，辩论还是结束了。

瓦扬的提案——给五一游行以和平游行的特点——在按国家进行表决时，除德国、瑞士、匈牙利和法国赞成外，其余各国均反对因而遭到否绝。规定5月1日为游行日的决定，除英国外为各国所接受，但是英国代表也解释说，他们原则上赞成这个决定，只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才不得不作出他们的决定。因此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上述决议案。

各国党的共同名称和出版《社会主义年鉴》

第9个问题（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取一个共同的名称）提交下届国际代表大会讨论。比利时工人党中央领导机关受委托出版一种国际年鉴。因此第10个问题也解决了。

在瑞士召开下届国际代表大会

大会议程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在1893年国际博览会期间在芝加哥召开下一届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由于茹尔·盖得非常疲劳，沃尔德斯作了发言：尽管对美国人的盛情邀请非常感谢，

可是实际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拒绝。这次美国同志到这里来参加大会的很多，我们希望将来的代表大会也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表现团结一致的最好途径。路途遥远，欧洲运动的目前状况，以及它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使我们不能接受前往芝加哥的邀请。相反，委员会的意见是，下届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应在瑞士召开，开会地点由瑞士同志决定。他希望参加下届代表大会的人比这一届更多！（掌声。）

沃尔德斯宣布大会议程已讨论完毕，并且还向大家报告一个愉快的消息：俄国的朋友们已保证说，组织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也将参加下一届代表大会。沃尔德斯感谢参加代表大会的诸位代表的热忱和工作。他回顾了会议召集者所担负的使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各个派别团结起来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困难的，但不是不能完成的；我们之中有缺乏耐心的人和热情的人，有冷静的人和刚毅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确实，我们大家都可以说，这种团结是肯定无疑的事实。（雷鸣般的掌声。）

倍倍尔：如果说他在最后时刻发言的话，那是为了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这项任务既紧急又令人愉快。在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中，他用激动的语言向主席团表示代表大会的感谢，代表大会超出了我们最大胆的设想，并且使我们所有的担心成为多余，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主席团孜孜不倦的工作。除了主席团之外，首先还有一个人，他的献身精神，他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以及他的毅力受到大家的钦佩。他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用握手向沃尔德斯表达这种感谢。沃尔德斯在全场的欢呼声中用亲吻表示回谢。

肖维埃（巴黎）用热烈的语言表达了大会的决心，代表们将把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的精神带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一种共同的感情使大家联合起来：憎恨资本主义。

这就是说要以战争反对战争！如果我们大家坚持不懈地传播革命思想，那么建立公社的这一天就不远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伯罗斯（英国）赞同上述意见；他希望不再需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时代不久就能到来，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

沃尔德斯高呼“社会革命万岁！”的口号，宣布大会闭幕，接着德国人唱起《马赛曲》，法国人鼓掌欢迎。

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向大会的报告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情况的报告

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要定期召开这种代表大会，从而创建一个组织，在它的帮助下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可以互相了解，抒发其抱负和愤怒，并准备把工人从政治和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所必需的手段。德国工人最衷心地拥护大会的这一决议。

在德国各地举行的成百次工人集会上，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作了报告，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了热烈地鼓掌欢呼。关于国际劳工立法和八小时工作日的宣传得到了巨大的推动。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处在 1878 年“非常法”的压迫下，有些邦政府企图给宣传巴黎代表大会决议的工作制造困难，凡是参加过巴黎代表大会的人出席的地方，它们就把这个情况作为禁止大会召开的充足理由。

虽然政府使用了这种卑鄙的伎俩（在萨克森王国尤为突出，在那里当局一贯使用最可憎的手段来打击社会民主党），但是各地的工人还是找到了各种办法来表示他们赞成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

当在“非常法”压迫下生活了 12 年之久的德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工人也利用这次机会重新显示了自己的不屈不挠的生命力的时候，社会的上层阶级却越来越难以维持现状了。

弗里德里希帝国政府在 90 天内在全欧洲面前表演的丑剧，俾斯麦接着演下去的这场戏，现已发展成最露骨的家族统治。这场戏变成了对病入膏肓的皇帝的宣战，它向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统治下仍然相当年轻的德意志帝国腐朽透顶的徇私舞弊问题投下了一缕强烈的光束。

只要老态龙钟的皇帝还坐在他的宝座上，俾斯麦一有机会就要显示他陪臣的忠诚和对皇帝主子的命令的服从。但是现在，一个被怀疑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登上了王位，俾斯麦首相便纵容他的那些遍布全国的、以他为靠山的、从数百万秘密基金中领取津贴的御用报纸来反对患不治之症的垂死的皇帝，反对皇室！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半官方报纸对皇帝陛下的侮辱和对皇室的侮辱，使自从帝国成立以来德国反对派报纸所犯的一切同样的“罪行”相形见绌。

当“皇帝的第一臣民”竭力败坏垂死皇帝弗里德里希一家的名声时，整个地方的和半官方的报纸都在大肆吹捧首相儿子的美德，尽管他的无能是尽人皆知的，却仰仗父亲的权势，被安插在薪俸最高的国家官员的职位上。在这之后，对首相儿子的宣传在首相府公开进行，为的是保证首相后继有人：国家最高和最重的职位必须由俾斯麦家族中的男子来世袭。

一方面，俾斯麦这种族阀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人民对俾斯麦的国内政策日益不满（这个政策公开声称，它的目的是要“产生百万富翁”），这两个方面在弗里德里希皇帝最终解脱了痛苦和现在的皇帝即“俾斯麦的希望”登上了皇位之后，导致

了一场灾难。

在那些所谓有权有势的人物当中，有些人早就妒忌俾斯麦的占压倒优势的影响，他们知道巧妙地利用“新皇帝”的某种倾向来加剧新皇帝和自以为不可缺少的首相之间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采取哪种最合适的方式来对付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皇帝和首相的矛盾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结果首相被解职了。俾斯麦这个大地主和大工厂老板坚决反对看来对企业主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可能有所抑制的任何保护劳工的措施，而皇帝周围的人则倾向于在这方面对工人作些小小的让步。

在对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审判(仅仅因为他们属于秘密团体而受审)中，警察局的骇人听闻的许多丑事暴露出来了。尤其是在爱北斐特的大规模审判中暴露得特别明显。在这次审判中，一个受国家津贴和由国家组织的密探和奸细系统被揭露出来了，其可恶程度超过了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务组织，这就动摇了某些上层人士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好处的信心。相反，俾斯麦想召魔驱鬼，主张更严厉地执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在权势人物中出现的这些相反的观点，使得人们未能就是否延长 1890 年 9 月底到期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问题达成谅解。因此在 1890 年 1 月 25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一项较为温和但今后要成为永久性的反社会党人法，以 169 票对 98 票遭到了否决。

由于皇帝和首相之间的争吵暗中加剧，保守派失去了领导。保守派主要由官员、土地贵族和新教教士组成，它不敢投票赞成这项较为温和的法律。天主教“中央”党不赞成有什么永久性法律。民族自由党不再同意驱逐社会党人的法令条款。于是，尽管德意

志帝国国会中的 3/4 的议员基本上赞成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措施，但这项法律没有获得多数票的支持。这次投票表决后德意志帝国国会立即被解散。

怒不可遏的俾斯麦希望从这种混乱中重新赢得他原来的影响。他想把更新和强化《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当作即将展开的竞选运动的口号。

这个用“红色幽灵”来吓唬选民的建议，就像在 1887 年选举中用“战争幽灵”，用布朗热将军及其麦宁炸弹来吓唬选民的做法一样，可是，没有得到皇帝的批准。

在国会就《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进行表决以前，1890 年 1 月 8 日，确定了 2 月 20 日为大选的日子。大选前的时间极短，但是社会民主党已充分做好参加竞选的一切准备。他们的目标除了增加自己的代表外，就是阻止那些支持《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政党的议员重新在国会中获得多数。

我们党按照一贯的做法，在凡是有支持者的地方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次竞选运动的规模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党员在为事业献身和自我牺牲方面创造了奇迹。

俾斯麦追随者的竞选口号是：向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开战！我们的口号是：打倒俾斯麦及其与人民为敌的制度！

* * *

当竞选运动正在进行时，2 月 4 日，突然颁发了皇帝给首相俾斯麦侯爵及贸易和工商业大臣的著名诏书。

在给俾斯麦的诏书中说，“为了对付由于外国竞争而使劳工制度面临的困难”，委托帝国首相“向那些其工业同我国工业一起控制着世界市场的国家的政府建议召开一次协商会议，以便对工人劳动的要求的限度作出统一的国际规定”。在给贸易大臣的诏书

中，指出了对工人劳动的要求在哪方面应作出限制。诏书宣称，“国家权力机关的任务”是：“调整劳动时间、劳动长度和劳动条件，以便健康的保持，人道待遇的提供，工人的经济需要和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要求，继续得到保证”。

皇帝的这份诏书起初使各界人士大为震惊。政府报纸曾经几次讥笑采取上面提到的那些保护劳工的措施的可能性。将近3个月前，即1889年11月14日，当有人呼吁制定调整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法案时，内务部国务秘书冯·伯提歇尔先生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说，“迄今为止确定联邦议会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提出的劳工保护问题的理由仍然有效，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使联邦议会有必要改变它的立场”。俾斯麦本人甚至屡次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上反对规定星期天为法定休息日，因为“在国家的这种干预下，工业和工人都会受损失”。而现在，规定劳动时间的长度，即采用标准工作日，被当作了“国家的任务”。同样，俾斯麦曾反对劳工保护国际立法的可能性，但现在他却不得不负起邀请举足轻重的工业国家参加研究这个问题的协商会议。

世界似乎突然颠倒过来了。在给首相的诏书中，提到了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讨论，资产阶级政党中出现了混乱和缺乏自信的心理。尽管皇帝诏书并没有宣布什么在许多其他工业国家尚未形成法律的保护工人的措施，但是资产阶级的领袖们还是对皇帝“承认社会民主党的要求”这种举动感到惊慌失措。当他们在惊恐和激动中宣称，“皇帝诏书很可能使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去优势”时，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犯下了侮辱陛下的滔天罪行。

“君主政体的支柱”宣称德皇庄严宣告的意志竟然是企图获取工人选票的诡计。用不着说，对诏书的这种评价根本不正确。但

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指望利用诏书中的某个地方来损害社会民主党和工人的关系，那注定要遭到彻底失败。既然皇帝诏书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明确要求，怎么会削弱工人同社会民主党的亲密关系呢？

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祝贺瑞士联邦政府倡议召开讨论劳工保护法的国际会议。现在如果德国政府也倡议召开这种会议，并采取决定性步骤实现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要求，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这一胜利，也许可能产生其他任何影响，就是不会使我们在选举中失去优势。

* * *

选举的结果表明，我们的敌手对皇帝诏书的效果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在1887年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11个议席和78万张选票。在1890年2月20日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20个议席和142.7万张选票，所以我们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增加了50多万^①，社会民主党一跃而成为德意志帝国最大的政党。除了第一次投票中选上的国会议员外，我们的候选人在第二次投票中在58个区都当选了。在第二次投票中，在资产阶级各政党的势力旗鼓相当的地方，我们的同志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在这第二次投票中，党的领导指示，只投那些事先发表声明，（1）反对任何一种非常法，（2）反对任何制定更严厉的刑法的企图，（3）反对任何限制普选、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企图的人的票。党的领导的这一立场，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在帝国内，特别是在国外，引起了某种反响。这些同志认为，必须把这一要求看作是同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人串通一气。他们提醒人们注意圣加仑大会的决议，该决议

^① 原文如此，应为60多万。——译者注

“根据以往的经验”忠告党员们在只有敌对政党的候选人的选举中放弃投票。

但是，圣加仑大会的决议是我们党在1887年第二次选举中与敌对政党打交道的经验的产物。而1890年的口号则是政治形势发展的产物，这时的政治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卡特尔帝国议会^①否决；二是1890年第一次投票有了结果。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防止在新国会中出现一个一开始就可以断定它倾向于按照上面的意图批准延长非常法的多数派。我们党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的压倒优势的胜利吓得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魂不附体。这些反动政党和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准备赞成任何一种镇压和束缚工人运动的暴力手段。我们如果袖手旁观，从而帮助这些反动政党在第二次选举中获得胜利，这将是一种罕见的政治上目光短浅的行动。

不是为了帮助资产阶级中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为了防止最腐朽的反动派可能取胜，我们在第二次投票时采取上述立场是必要的。相反的态度无异于政治自杀，是对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事业的最可耻的背叛。

第二次投票除了表明我们的候选人的票数大大增加外，还使我们增加了15名国会议员，这样社会民主党现在在国会的议员达到了35名。

1890年选举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纯农业地区，如梅克伦堡、普鲁士东部各省和主要是经营农业的巴伐利亚王国，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有了巨大的增长。在巴伐利亚王国和梅克伦堡的两个公国，所有选区都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在普鲁士东

^① 指民族自由党、保守党和德意志帝国党联合把持的帝国国会。——译者注

部各省，除了几个波兰选区以外，我们党没有获得选票。在这些地区，民族运动和与之结合在一起的宗教运动，完全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活，而无产阶级却被联合起来的贵族和教士用人为的方法保持在极其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再考虑一下微不足道的工业发展和政府对波兰农业地区施加的政治压力，那么，波森省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落后就非常容易解释了。

我们的运动是并且只能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从运动的这个性质中可以看出，工人群众聚集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是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从下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在高压政策统治的 12 年中，我们在城市获得的选票有了多么巨大的增长：

地 点	1878 年	1890 年
柏林	51 164	126 317
汉堡	29 629	67 303
布雷斯劳	13 065	21 555
慕尼黑	5 249	28 218
德累斯顿	17 303	25 079
莱比锡	5 822	12 921
科隆	2 189	10 646
马格德堡	6 253	17 261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4 080	12 663
柯尼斯堡	1 108	12 370
汉诺威	6 588	15 789
斯图加特	4 136	10 446
不莱梅	6 304	14 843
杜塞尔多夫	486	8 228
纽伦堡	10 162	17 045
但泽	114	3 525

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	141	4 773
开姆尼茨	9 899	24 641
爱北斐特—巴门	11 325	18 473
阿尔托纳	11 662	19 533
什切青	914	7 759
亚琛	909	1 744
克雷费尔德	467	3 030
不伦瑞克	7 876	13 621
哈雷	1 046	12 808
卢卑克	1 588	6 393

除了上面 26 个大城市外，还可以轻易地举出许多我们获得的选票大大增加的城镇，但是上面列举的数字已经足以证明我们党的成长。

在实行所谓小规模戒严的一切选区，我们党获得的选票也无一例外地有了同样的增长，这很能说明镇压措施对于一个有理想的运动能产生什么影响。下面我们列举一张不是像上面提到的柏林、汉堡、阿尔托纳、莱比锡、法兰克福、什切青那样的大城市，而是一些选区的选举统计表：

选 区	1878 年	1890 年
下巴尔尼姆	2 775	13 362
夏洛滕堡	4 763	19 169
波茨坦—施潘道	?	3 977
哈尔堡	1 763	6 860
奥滕森—平奈贝格	5 452	10 820
劳恩堡	347	2 072
莱比锡（鲁拉尔）	11 253	30 127

美因河畔奥芬巴赫	5 557	10 343
施普伦贝格	1 242	5 610

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巨大发展，加上资产阶级反对党，或者更确切地说，反俾斯麦党的普遍加强，以及以卡特尔党闻名的过去的多数派的完全瓦解，最终解决了“俾斯麦不当首相的问题”。

1890年3月10日，俾斯麦接受了对他的免职，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证明他是“不可缺少的”。俾斯麦以这种方式下台，使社会民主党普遍感到满意，正像它使工业大资产阶级、证券交易者和大地主阶级感到惊恐一样。

这些阶级早就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不能重新修订深感烦恼，因为在防止暴力革命的借口下，这条法律被证明是很适合用来镇压每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在我们的土地贵族和工厂贵族更把俾斯麦这个百万富翁的扶持者的免职看作特别是对他们的打击。尽管他们的这种恐惧不安随后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新上台的那些人继续走老路。但是这还是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过去在俾斯麦统治下发号施令的人当时感到极大痛苦。

狗急跳墙，在这种恼怒心情的驱使下，准备干一切卑鄙的勾当，他们企图以此造成灾难，从而导致已被免职的首相这个一切压榨人民的剥削者的偶像复职。

* * *

只有知悉这帮奸党的计划，才能认清人为地制造的骚乱，才能理解去年由于五一节来临在德国出现的荒唐可笑的惊慌情绪和预防措施。像傻瓜一样容易上当受骗的各国市侩们被报纸上的神秘暗示所欺骗，相信在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秘密作出了进行总革命的决定，并且相信这个革命要从5月1日起的总罢工开始。

一方面，对“红色幽灵”的害怕和恐惧在到处传播，另一方面，雇主们也准备利用五一节这个机会来普遍解雇和联合拒雇所有那些懂得代表其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人。正如后来发表的官方文件所证实的，在这个肮脏的计划中，国营大企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铁路系统管理当局，已同私营企业主的组织携手联合了。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完全摧毁全部工人组织。凡是参加工会的人都要长期被解雇。在国营工厂，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或工会组织的成员身分都是被解雇的理由。私营企业主发誓要用重罚来威胁他们雇用的工人退出工会。而一旦工人拒绝服从这种粗暴无理的要求，并被卷入骚乱时，军队和警察就出来拯救国家。

这些唯利是图的人想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在2月20日投票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进行报复。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的借口就是五一节。

当时到处都可以觉察到的、日益临近的工业危机助长了雇主们和反动派的这种意图。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失业，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工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面对这种情况，社会民主党新当选的国会议员1890年4月13日在沙勒河畔的哈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份《告德国男女劳动者》的呼吁书。呼吁书一开始就指出，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并未规定各国一律必须遵守的庆祝五一节的细则。接着，呼吁书提到了上面所列举的建议工人在5月1日这天放弃普遍停止工作的理由。与此同时，呼吁书也号召工人举行群众集会和通过请愿来表明拥护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内和国际劳工立法的要求，当然，首先是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

呼吁书中说：“不管什么地方，如果在5月1日这天停止工作不会引起冲突，那就可以这样做。”

“国会党团”^①的这一立场在国外一再被人责备说过于小心谨慎了。甚至在德国同志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它。尤其是在汉堡，那里的工人一向组织程度高，力量强大，有许多基金。汉堡一次大的群众集会决定5月1日这天普遍停止工作。这一决定付诸实施了。

雇主对工人的这一决定的回答是：把所有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人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拒于工厂大门之外。被雇主的这一行动激怒了的工人奋起罢工。首先是2000名驳船工进行罢工。接着木工和泥瓦工也开始罢工。不愿冒风险的冶金工人，在两天的“节日关门”之后返回工厂时，大吃一惊，因为雇主的通告说必须“对他们十中罚一”，即十分之一的冶金工人要被解雇。当然，所谓的为首分子更是首当其冲。在其他行业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被解雇的工人上了“黑名单”，遭到各地雇主的联合拒雇，不仅在汉堡及其附近地区，而且在全德都是这样做的。

除了要支援1万名左右的罢工工人外，还要支援其他几百名被拒于工厂大门之外的工人。在所有较大的城市，也像在汉堡一样，在庆祝五一节的活动中都有受难者。为了援助受难者，使他们至少能暂时渡过失业的难关，需要筹集几十万马克。许多工人家庭由于父亲被联合拒雇而妻离子散。大批失业工人被迫移居国外，流落异乡。另一些失业工人则想办法转到其他行业去工作。许多勇敢的工人在斗争中倒下了。莱比锡工厂主联盟所干的卑鄙勾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强迫其盟员对所有那些在5月1日停

① 这里的“国会党团”是指社会民主党的35名国会议员。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他们是党唯一可能有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他们就像中央委员会那样行动。

工的工人解雇 6 个星期，然后才按低工资雇佣他们。

当然，如果雇主需要“人手”，他们是不需要采取这些措施的。但是，当时“人手”的供给量而不是需求量越来越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给雇主提供了好机会，使他们能以最肆无忌惮和最残忍的方式来利用其社会地位。

由于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而引起的罢工和停工，都以对工人不利的结果而告终。

至于 5 月的游行，就公共集会的表现来说，既是普遍的，也是规模宏大的。凡是有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地方，在 5 月 1 日这天，他们都按照巴黎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举行了拥护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劳工立法的游行活动。尽管各地都举行了游行，但游行始终是有秩序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非常希望在 5 月 1 日这天工人和警察发生冲突，因为这可以证明有必要延长和强化《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但是，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一家有代表性的自由资产阶级机关报怀着压抑不住的恼怒心情写道：“5 月 1 日给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致命的打击”，工人们以他们的明智行为和盛大的游行挫败了他们的敌人的计划。

5 月 6 日，国会自大选后第一次开会。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提出一项符合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提议的劳工保护法案。这个法案第一次在德国国会上提出了实行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迄今为止，在绝对不受限制的剥削自由的情况下，在某些工业部门每日劳动时间实际上长达 14 小时之多，有的地方甚至更长。因此立即实施八小时工作日制意味着一次“飞跃”，在目前国际竞争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劳动保护法案中规定了一个过渡时期。劳工保护法案中的有关条款如下：

“实行此法案的企业^①，从实行之日起，所有具有 16 年工龄以上的人的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 10 小时，星期六和节假日的前一天，除吃饭时间外至多工作 8 小时。

从 1894 年 1 月 1 日起，每天最大限度的工作时间为 9 小时。从 1898 年 1 月 1 日起，每日工作时间减至 8 小时。

在从事地下作业的地方（矿工、岩盐工人等），或在工作昼夜不停的工厂，每班工作不得超过 8 小时；对从事地下作业的工人来说，这 8 小时包括上下井的时间。

14 岁至 16 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

更短的倒班时间可由订约双方当事人自由商定。”

国会会议一开幕，政府就提出了涉及同一问题的法案。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选举前颁布的皇帝诏书说过，“调整劳动时间、劳动长度和劳动条件”，因而也就是公开承认采用正常工作日。但是，政府的法案中对这个一切劳工立法的首要的和根本的要求却再也不提。在政府的法案中，只提到成年女工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应限制为 11 小时，禁止她们上夜班。至于 14 岁以下的童工和 14 岁至 16 岁的青工的每日劳动时间（按现在的规定分别为 6 小时和 10 小时），政府的法案未作任何改动。

尽管政府的法案对目前的劳动条件作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小小的改善，但是，它包含的关于所谓违反合同和使用结社权利的规定，实际等于完全取消工人的结社权利。

德国工人的结社权利一向受到严重的阻挠：几乎完全是在最

① 劳工保护法不适用于农业雇工和所谓家仆，因为这些劳动者在德国仍处于所谓仆役制的统治之下，没有结社的权利，仆役制是一种普鲁士法，是为调整主人和家仆的关系而制定的。那些住雇主房屋的学徒工和栖身在农场主或地主的土地上的农场仆人都被算作是主人的家仆。

黑暗的反动时期制定的关于政治协会和集会的法律条款也适用于工会组织。这些法律条款禁止几个协会实行联合，甚至把一个协会寄钱给另一个协会，或一个协会的执委会写信给另一个协会的执委会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联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工会（且不说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它进行的迫害）不断遭到警察局和法院的卑鄙迫害。

由于警察局和法院的专横，德国的工会组织没有哪一个没有被解散过，或者，没有被迫实行改组。

尽管多年来一直受到这样的摧残，德国工会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变得相当强大了。这一方面无疑证明工人需要这种工会，另一方面显示了工人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斗争的坚韧不拔精神。

在80年代后半期，实业比较景气，工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状况。所以，雇主阶级的全部怒气都朝着“社会民主党工会”发泄。大工业的代理人也对让工人通过他们的行业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要求（哪怕这种要求甚至是非工人阶级的成员提出来的），表现出一种不共戴天的敌意。他们借口纪律和权威，说没有他们企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要求工人绝对服从雇主及其代理人的最高意志。

好些年来，工人为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所作的每一努力，都被资产阶级报刊一贯说成是“社会民主党煽动的”结果。政府现在也这样办，把反对“滥用结社权”的非常严厉的惩罚条款列入它的所谓劳工保护法案。

为了向各文明国家的工人说明，在社会改良的旗帜下上台的、通过召开国际劳工立法会议在许多外国人眼里给自己涂上了一层对工人阶级友善的油彩的德国政府所说的“滥用结社权”是什么意思和它想采取的惩罚措施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引证一下有关条

款：

“第 153 条：凡企图通过武力、威胁、侮辱或毁谤来达到以下目的者，罚以不少于一个月的监禁。如属惯犯，则罚以不少于一年的监禁。对于任何公开号召工人擅自离开工作的人或擅自解雇工人的雇主，也予以同样处罚。这些目的是：（1）促使工人或雇主参加第 152 条^①中提到的那种联合，或者阻止他们退出这种联合；（2）促使工人停止工作，或阻止他们继续或重新工作；（3）促使雇主解雇工人，或阻止他们雇佣工人。”

这一荒谬可笑的条款，在我国那些出身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运动怀有职业偏见的职业法官手中变成了工人实行联合的一切努力的陷阱。这一条款在整个德国工人阶级中激起的义愤的风暴，终于使天主教中央党（其大部分选民在工业地区）也拒绝投票赞成它。

于是，指望这些最坏的条款能获得通过的企图落了空。但是最终通过的劳工保护法，即使像它目前这个样子，也没有满足这条法律的最基本的要求。这一点从最近颁布的所谓“处罚”条例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个条例简直是一个不利于工人的非常法。按照这个条例，如果工人不管由于什么原因放弃自己的工作而违反合同，雇主有权利扣发整整一个星期的工资。这样他们就能从雇佣关系开始时起，从工人那里追回整整一个星期的工资。既然法律已明确规定，无须提供由于违反合同而遭到的损失的证据就可以克扣工资，那么这个条例就显得更加荒谬可笑了。于是，雇主就用折磨工人的办法来使工人离开工作而不规定解约通知期

^① 这一条取消所有反对工人或雇主为了取得较好的劳动条件（其手段是停工或解雇工人）而进行联合的禁令和刑罚。

限。这样，雇主就用这种卑鄙手段从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资中捞些油水。这个条例就足以证明上述劳工保护法对于保护工人的价值了。

因此，今年，在对劳工法进行最终表决时，社会民主党的全体议员也一致投票反对政府的这一法案。他们给所谓“工人之友”的执政党带来了许多烦恼，在许多星期的辩论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政府的法案，揭穿了它的真正含意，从而粉碎了执政党欺骗工人的计划。

当延长任何一种形式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企图肯定打消了时，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就立即采取步骤，准备非常法一满期就尽快在德国国土上召开 12 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890 年 9 月 30 日，非常法期满。8 月 1 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全体成员署名的呼吁书，号召代表们参加于 10 月 12 日起在萨勒河畔哈雷举行的代表大会。

在伦敦出版的刊有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该报编辑部声明，该报出版人响应议会党团一致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满期那天停止发行《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编辑部在上述声明中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使命已经完成。”

“当党在德国的机关报被取缔时，当社会党人出版的、没有被《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砍掉的极少的几家报纸竟没有说一句捍卫党或党的原则的话时，这时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肩负的使命是，填补这个空白，挡住《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党的打击。它首先是党反对非常法的斗争机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0 月 1 日就要满期了。9 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将停止出版。”

1890 年 9 月 2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了最后一号。该

报创刊号于1879年9月问世。从当年第四季度起，该报连续出版了整整11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为该报最后一号写的一篇文章中，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接着，他写了下面这段对该报的评价，对于他的评价我们只能表示赞同：

“这个报纸也是值得为推销它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的。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①

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满之前，3月15日在柏林召开了国际保护劳工会议。我们相信，这个会议协商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次“外交官会议”提出的软弱无力的、不完备的建议，没有给德国工人阶级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如果说这个会议本身是对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致提出的呼吁各文明国家制定劳工立法的要求的让步，那么会议的讨论情况和提出的建议最清楚地表明，在我们从高谈阔论到实际行动之前，多么需要站在工人立场上进行不懈地宣传和活动。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败的时候，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全德国都像过节那样进行盛大庆祝。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举行了游行，那些过去遭到驱逐、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们返回家园的人，构成队伍的中心。

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前公布的关于这个法律实施后果的情况的材料，我们看到，有1400种刊物（其中155种是期刊）在非常法存在期间被禁止。从宣布戒严的地区驱逐出境的人数超过900人。在根据非常法或援引非常法而进行的各种诉讼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90页。——译者注

中，包括待审拘留在内，共判处了约 1 000 年监禁和徒刑。这些数字只是提供了这个可耻的法律及其实施的结果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造成的实际苦难的略图。

* * *

但是，在我们党的支持者失去法律保护的 12 年期间，党并没有发生动摇，这一点在 10 月 2 日（星期日）我们的代表大会在哈雷由威廉·李卜克内西同志宣布开幕时辉煌地显示出来了。

399 名代表从德国各地赶到会场，这证明，尽管党和它的支持者受到敌人的百般污蔑和蹂躏，但党不仅没有被破坏，而且党员人数还增加了两三倍。此外，奥地利、法国、英国、比利时、瑞士、波兰、荷兰、丹麦、瑞典和挪威的友好政党的代表还赶来参加了我们庆祝胜利的活动。哈雷代表大会实际上变成了庆祝胜利的大会。还应提到的是，从各个重要国家和世界各地纷纷发来了贺信和慰问信。整整持续了 8 天的讨论，是完全公开进行的，显示出党在一切重大的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高度一致和团结。司库奥·倍倍尔报告了党的财务情况。他说，自从在圣加仑代表大会上提出迄今为止的收支平衡表以来，党的收入达 390 509 马克 52 芬尼（折合 19 525 英镑 9 先令 6 便士）。扣除一切开支后，实际库存为 171 820 马克 90 芬尼（折合 8 591 英镑零 10 便士）。这里顺便提一下，党员同志自愿捐献的精神自哈雷代表大会后仍在继续发扬。

哈雷代表大会给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大会宣布，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给它选择了一个新的报名：《前进报》。代表大会在对国际的、给人民带来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的热烈欢呼声中结束了自己的讨论。

哈雷代表大会后，党主要由重建的机构领导，以适应《反社

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的新形势。

在帝国的几乎每一个省和邦，我们党都举行了相应的代表大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的报刊。随着党的成长壮大，党的报刊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1891年第三季度开始，在德国出版的政治报刊的情况是：每周出6次的有27种，每周出3次的有23种，每周出2次的有7种，每周出1次的有10种，两周出1次的有1种，总共有69种政治性报刊。其中有的报刊的订户超过3万户。这些报刊几乎都是靠自己的经费维持的。根据哈雷代表大会的决议，党的执行委员会还创办了一份用波兰文出版的政治刊物，它没有包括在上面的统计数字之中。

除了上述报刊外，还有《新时代》，这是每周出版一次的科学评论杂志，两种社会主义幽默杂志。还有一系列文学和教育方面的报刊，它们多半是作为党的政治刊物的增刊发行的。

正像非常法的期满给政党以新的生命一样，它也给了工会运动以新的生命。的确，最近两年来生意越来越萧条，这对罢工运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参加工会的工人几乎普遍都放弃了进攻性罢工，而只限于防御性罢工。但是在工会领域重建组织的工作目前正在加紧进行。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煤矿工人参加现代工人组织的队伍。煤矿工人在德国有30万，直到不久前还游离于总的工人阶级运动之外，或者只是参加某些地区（例如萨克森）的运动。自从1889年发生矿工大起义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从那时起，矿工组织就不断进步。现在的情况是：德国矿工终于振作起精神，成立了独立的组织，敢于维护和捍卫自身的利益，抗拒矿山所有者和矿山工厂主的意志和命令，不再受教士们的欺骗和愚弄了。以前，特别是在信仰天主教的省份，教士对矿工有决定性的影响。1889年起义期间和这年春天，工人有

机会认识到了这些穿着长袍和修道服的绅士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的“对工人的爱”的实际价值。这些切身的体验，足以擦亮当时还在跟着中央党的资产者们走的工人的眼睛。

目前，工会运动拥有 54 种报刊，其中每周出版 3 次的有 1 种，每周出版 1 次的有 24 种，每月出版 3 次的有 3 种，两周出版 1 次的有 22 种，每月出版 1 次的有 1 种。

* * *

今年的五月游行声势浩大，这一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确，鉴于恶劣的经济形势，这一次在 5 月 1 日那天实行普遍停止工作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的议会党团呼吁各地在 5 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庆祝节日。这一建议得到了普遍的赞同。所以，在 5 月 1 日只举行了群众集会或工人集会。会上，发言者指出了五月游行对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劳工立法的重要意义。在 5 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列队游行（无论在哪里都没有遭到警察的禁止）和其他形式的游行，以庆祝劳动节。各地参加游行的工人非常多。在汉堡，根据敌对报纸的估计，有 10 万人参加了游行。

为了说明德国的政治形势的特点，我们提请大家注意最近在汉诺威第 19 选区进行补选时发生的事件。前首相俾斯麦公爵到这个选区来竞选。他只是在第二次投票中，多亏得到那些当他执政时曾激烈反对他的政党的支持，才击败了我们的同志卷烟工人施马尔菲尔德。上面提到的这个选区完全是农业区，连一个较大的城市都没有。

在其他选举场合，如萨克森的市政选举，仲裁委员会^①选举，黑森州议会选举，我们党不仅控制着原有的阵地，而且赢得了新

^① 仲裁委员会很像法国的劳资调解委员会（*Conseils de Prud'hommes*）。

的胜利，得到了更多的选票，甚至有新的候选人当选。

所有这些斗争都要求付出代价。尽管《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满期了，当局并不缺乏压迫和限制我们进行宣传的手段。证明这一点的是：1890年10月以后，不仅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因上了黑名单而遭到联合拒雇，陷于穷困潦倒，而且还有无数的人受到所谓习惯法的迫害。

从1890年11月1日到今年6月底这段时期内，德国法院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编辑和演说人等总计判处了69年3个月零5天的监禁和13 936马克的罚款。由此可见，即使我们处在“新方针”下，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我们也未必可以高枕无忧。

但是，只要政治迫害仍然存在，甚至进一步加剧，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不会停止它为把无产阶级从社会的和政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牢记自己对阶级同志和全世界无产者所担负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岗位，随时做好斗争和牺牲的准备。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报告

序 言

我们向 1891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交的这份报告不敢说是完备的或详尽无遗的，它不过是最近两年即 1889 年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阶级运动中做过的比较重要的工作的概述。

我们希望大家理解，我们并不企图用英国工党的名义说话。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党，虽然迹象表明它正在形成过程中。无疑还会有人递交另外的英国报告。至于我们的这个报告，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它是力求准确的。我们希望，它所收集的事实和材料会引起我们的代表同伴的某些兴趣并对他们有某些用处。

新工联主义和社会主义

我们的报告所涉及的这两年，是充满极不平凡的活动的两年，这两年的确标志着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阶级运动史上新纪元的开始。在着手详细论述之前，先谈一下这个通常被说成是“新工联主义”运动的总趋向和意图。这个趋向和意图过去和现在都无可争辩地是社会主义的。的确，在英国就像在大陆国家一样，“工

党”和“社会党”这两个名称还不能互换。但是，它们正在迅速变成可以互换的，尽管许多“新工联主义者”首先想极力否认这一点。其次，的确，对广大人民群众（也许是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是模糊的和尚未被人意识到的，我们还没有欧洲大陆的那种社会党。但是，在联合王国，这个新运动的几乎所有的“领袖”都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过去只是遭到谴责和蔑视的词，现在正迅速变成获得工人阶级尊敬和信任的标志。这是由于工人们发现，社会主义者是他们最忠实和最可靠的朋友。由于有这种对社会主义者及其教导的信任感，工人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他们开始懂得自己生活在阶级斗争当中。有了这种认识，他们的决心就越来越大了：在联合王国也像在大陆一样，应该有一个和一切旧政党不同并与之对立的工党，一个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反对统治阶级的党，一个要参加一切议会选举，参加每一次市政选举、教区选举、学校委员会选举和其他选举的党。新工联主义获得的胜利是伟大的，把成千上万至今尚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是宏伟的，但英国工人的这种日益提高的阶级觉悟，是比这两者都更伟大、更值得注意的事实。阶级觉悟的这种日益提高应归功于社会主义者的教导，归功于他们积极的不知疲倦的工作。许多年来，他们当中有些人像使徒约翰一样在旷野里布道，但是群众并没有聚集拢来迫切要求接受新信仰的洗礼。这些使徒们没有灰心丧气，他们继续工作。今天，他们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社 会 主 义 者

现在，不管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纲领就

是“新工联主义”的纲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英国没有社会党。但是有许多社会主义党派，它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出色的工作。然而，它们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宗派。它们当中每一派都至少有自己的小集团。在这些社会主义党派中最大的、依靠许多现在已不再是它的成员的帮助在工人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可能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组织所做的工作都多的党，是社会民主联盟，其次是费边社。费边社所关心的是中产阶级全体成员的福利。这些人太诚实了，以致不满意目前的社会状况；这些人太有教养了，以致不愿同救世军共命运；这些人太优越了，以致不肯把自己同凡夫俗子相提并论。费边分子在伦敦发表了大量讲说，公布了一些有用的统计资料，在地方上他们除此之外还做了更多的工作。他们在地方上不那么优越了，在那里他们在团结社会主义者、热心帮助他们做组织工作方面出了不少力，但是他们没有清楚看到同社会民主联盟一起工作的途径。再其次就是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它除了进行出色的教育工作外，还光荣地在联合王国发起了五一节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示威。

此外，在伦敦和各个地方还有大量的社会主义团体。它们都是怀有善意的并且多少是有益的。这些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数量都很少，它们的力量和影响与其说在这些组织内部本身，不如说在新的工人阶级运动和这个运动的总趋向上。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进行的社会主义教导对群众的影响有多么深刻，这大概可以从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章程的序言中摘引的两段话中得到最好的说明。

“工联主义过去做了出色的工作。在工联主义中寄托着工人对未来的希望。正是工联主义清楚地认识到，今天只有两个阶级，即从事生产的工人阶级和拥有财产的老板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益

是彼此对立的。老板早就知道这种对立了。可是工人才开始看到这种对立，于是成立工会来保护自己，尽可能多地争取获得他们的劳动产品。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唯一希望就在自己身上，他们不可能指望从**作为阶级的老板**那里得到帮助；他们分则败，合则胜。”

这个工会的直接目标是：“改善工会会员的物质条件；使他们从役畜变成人；使每个工人的家庭生活变得比较快活和幸福；把儿童从他们今天所过的那种艰难的、使人堕落的痛苦生活中解救出来；让所有的男人和妇女比较平等地分享人世间的哭和笑、悲哀和喜悦、劳动和安逸。重要的是，所有的会员都要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和本会的目标，要接受和忠实地执行本会章程。要记住：全体工人的利益是共同的；不管侵犯哪一部分劳工的利益都是侵犯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管哪一部分劳工队伍的胜利或失败都是整个劳工队伍的胜利或失败，因为劳工队伍正是依靠它的组织和联合向着它的最终的目标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坚定地、不可阻挡地前进的。”

旧工联主义和新工联主义

目前没有必要多谈旧工联及其巨大的权力和财产。旧工联过去做的出色的工作大概谁也不会忘记或否认。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许多年来旧工联已不再是一支积极的战斗队伍；广大的劳工群众被旧工联完全排斥在组织之外。限制自己成员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旧工联的目标和任务，只是最近以来它们才认识到这种政策的自杀性质。新工联成立以后，旧工联才被迫参加新近的活动。它们现在开始承认，尽管过去取得了成就，但这并

不等于说它们现在就没有义务作出新的努力。如果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那么甚至这种重新唤起的热情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个事实是：没有加入诸如工程师工会、排字工人工会、木工和细木工工会、家具匠工会、锅炉修理工工会、铅管工人工会、石匠工会、油漆匠工会、泥水匠工会等大组织的工人和加入这些团体的人几乎一样多。例如，工程师工会在 1889 年的报告中说：“仍然非常需要有新会员入会。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实：每当和雇主争执不下的时候，常常可以发现有许多非工会会员随时准备填补我们的工作岗位，充当雇主的工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些大区，一般都是非工会会员，而工会会员则是例外。”工程师工会在 1890 年的报告中说：“有好几千符合条件的人还在我们工会之外，他们本应该在工会之内。”

一种有趣而又可悲的现象是，所有工会中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工会在 1889 年用于“疾病补助”、“丧事补助”、“退休金补助”、“事故补助”等福利事业上的钱就有 105 439 英镑 11 先令 10.5 便士。相反，在实际的劳资纠纷中用于它们自己的工会和援助其他工人的钱则只花了 1 820 英镑 17 先令 8 便士。1890 年，福利费用为 129 103 英镑 4 先令 2 便士，“斗争费用”为 5 688 英镑 11 先令。比这些数字更有说服力的是下述事实：在是否赞成八小时工作日的的问题上，在一个有 62 895 名会员的工会中只有少数人投了票：

每日 8 小时	赞成者 8 149 票
.....	反对者 1 290 票
每周 48 小时	赞成者 8 007 票
.....	反对者 1 118 票
通过法律规定 8 小时，违者惩罚	赞成者 3 275 票
.....	反对者 4 901 票

通过工会的努力实现 8 小时 …………… 赞成者 6 546 票
…………… 反对者 1 251 票

还有一个例子，目前伦敦的 14 000 名排字工人中只有 9 100 名工人是工会会员。如果说旧工联为自己和为本工会的熟练工人所做的工作已经非常之少，那么它们为非熟练工人即“普通工人”和女工就什么也没有干。然而这些“非熟练”工人是“全体工人中人数最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部分”。

新 工 联

所谓“非熟练工人”为自己所作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极不幸的是，“熟练工人”的工联从来没有认真地为自己作过这种尝试），发生在 1889 年 3 月。当时伦敦的煤气工人决定组织起来，并提出了任何其他团体还没有提出过的东西：他们以团体的名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煤气工人并不是第一次企图成立工会，他们以前在 1872 年和 1876 年就作过这种努力，尽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经验的和著名的“旧工联主义者”的支持，然而还是遭到了惨败。但是，1889 年，在许多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的值得铭记的帮助下，煤气工人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煤气工人工会成立 3 个月后，他们就能在 7 月 27 日那天举行“盛大集会”来庆祝他们取得的、比老的和富裕的工会过去取得的胜利都要伟大的胜利，即煤气公司答应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并且不降低工资，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还要提高工资。这一胜利的消息就像燎原之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伦敦人的榜样在各地方都有人仿效。各地都成立了工会分会。不久以后，那些被称为“杂工”的大量工人向煤气工人工会执委会提出申请，问他们是否也能成为会员。煤气工人联

合会执委会考虑并高兴地答应了这一请求。于是，煤气工人联合会变成“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联合会”。不仅如此，妇女入会的请求也受到热烈欢迎并得到满足。在这个工会里男人和妇女平等相待。这个工会允许妇女派代表参加年会，允许妇女在执委会担任工作。我们相信，能这样做的大工会在英国还是第一个。要介绍这个工会所做的工作，那会占去许多允许我们支配的时间。尽管经历了许多痛苦的斗争和一些失败，它今天仍然是组织得最好的非熟练工人的工会。加入这个工会的男工和女工属于 70 多个不同的工种。它为成千的男工挣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为成千上万的其他工人提高了工资：每周提高 5—50%。

这些“非熟练”的男女工人吸取了痛苦的教训，和社会主义者一起最先认识到政治行动和劳工立法的必要性。这个工会的目标之一就是“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立法”。正像它承认工人需要自己管理自己一样，它始终坚持并认真地去着手建立全国联盟和国际联盟。建立全国联盟的工作有进展。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其他“非熟练”工人工会的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的政策给这条道路带来了困难。目前有 8 个这种非熟练工人工会结成了联盟，同时有十几个工会属于“航运和陆运”联盟。这仅仅是开始。至于国际联盟方面，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现在和 13 个或 14 个代表着 10 个不同国家的有组织的工人的协会或联合会建立了直接联系。在谈到国际联盟这个问题时，谈谈这个工会在爱尔兰的工作情况不是多余的。在爱尔兰，我们第一次开始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族运动的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在爱尔兰，工会至少有 25 000 名会员。这些会员属于爱尔兰北部和南部。在爱尔兰北部，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了大规模的室内集会和室外游行，奥林奇派分子和天主教徒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一起开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组织劳工反对资本主义——而奋斗。在爱尔兰，像在英格兰一样，工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英格兰的资本家再也不能利用被驱逐的爱尔兰农民来反对他们的英格兰兄弟了。下面这段话无论在都柏林菲尼克斯公园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还是在爱尔兰的北部和南部都受到了最热烈的欢呼：“让爱尔兰自由，但要让爱尔兰成为自由工人的爱尔兰。对爱尔兰的男人和女人来说，即使受民族主义者或奥林奇派分子剥削也没有关系。农业劳动者把地主看作是他的敌人，就像工业工人把资本家看作是他的敌人一样。”今天，爱尔兰北部和南部的工人正互相伸出自己的手，正向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弟兄们伸出自己的手。有这些成就都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取得的。

不管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的工作现在和过去多么重要，它的工作成果甚至比它自己的组织的成长更伟大。

码头工人的罢工

1889年的码头工人罢工现在已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勿庸置疑，这个非凡的运动是煤气工人工会获得的胜利的 direct 结果。数百名工人在码头工作和煤气工作之间变换工种。既然煤气工人能够联合起来，为什么码头工人不可以联合起来呢？问题一经提出，答案就是肯定的。码头工人能够联合起来。是的，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最贫穷、最被人看不起、最没有希望的一部分。但他们能够证明，他们不是加在其余工人身上的负担。他们也能够站在一起，也能够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确实做了许多“熟练工人工会”不能做的事。这里无须大谈特谈“大罢工”，我们只打算指出：(1)“大罢工”是煤气工人运动的直接结果；(2)“大罢工”反过

来帮助无数其他工人组织起来了。

码头工人工会并没有成为起初所希望的那种进步工会，这是事实，也是令人遗憾的。它不是帮助，而是阻碍所有熟练工人工会结成联盟。直到最近，它甚至反对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它在1890年的“五一”游行中，和“旧工会”而不是和“新工会”站在一起。但是，也许这与其说是码头工会的过失，不如说是它的不幸。对它的过失要负责任的不是大多数会员，而是它的领导人。码头工人能够联合，能够组织，能够斗争，能够赢得意义重大的胜利，这些都是事实。随后发生的错误不能降低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大致叙述一下大罢工后这个宏伟的运动的发展情况恐怕要写一本书才行。这个运动不仅把20万至25万名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了，而且还帮助唤醒了死气沉沉的旧工会。如果说在工人运动中没有“睡美人”，那么肯定有贪睡的伙伴。我们从许多例子中仅仅举出一两件来说一下。木工和细木工工会20年来满足于作一个疾病补助和救济的团体，现在却仿效非熟练工人进行斗争，它认识到较短的劳动时间毕竟是工会所能给予会员的最大好处。还有像装订工人工会这种有贵族气派和保守的工会，它也要求实行并几乎普遍赢得了八小时工作日。

如果说，从劳资斗争的经济方面来看，新工联主义今天代表工人的比较有战斗性的部分，那么它也代表那些相信可以利用政治机器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人。在这方面，“旧工联”又一次逐渐接受了“新工联”的教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较老的和较保守的工会在1890年利物浦工会代表大会上力量比较强大，但在会上提出的70项决议中，有44项决议呼吁政府或市政当局进行“干预”。在利物浦和像在其他各地一样，代表大会的议题就是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

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朝着真正实现八小时工作日的目标迈进的最初几步是由两类工人即非熟练的煤气工人和熟练的矿工开始的。但是，当煤气工人一开始就宣布赞成**普遍的**和**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时，矿工们过去和甚至现在大都把兴趣主要放在他们自己关心的事情和他们自己的特殊劳动问题上，他们自己甚至还没有就八小时工作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过去，八小时工作日问题一度被社会主义者和那些甚至在社会主义措施受到推崇以前就不怕公然提出同样主张的新工联列为工人阶级鼓动纲领的主要“条款”。即使如此，直到1890年之前，八小时工作日问题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由于筹组五一节游行的工作，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1890年的“五一”游行示威

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五一”游行示威的历史是值得注意的和有趣的。当然，“五一”游行示威这个主意是在1889年巴黎罗舍舒阿尔街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倡议的。出席这次大会的两位代表认为自己有责任促使英国工人注意由22个国家的代表签署的这一决议：

“应在一个作为永久规定的日子里，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工人们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通过立法把工作日限制在8小时以内。”

结果，1890年1月，先是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一星

期之后是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决定在海德公园举行游行，表示支持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

由上述每个团体的3名成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筹备这次游行。1890年3月16日，来自各工人阶级组织的75名代表召开了会议，作出了“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游行示威”的正式决议。在下次规模更大的代表会议上，任命了现在已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由于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反对游行示威，由于所有的旧工联和甚至极少几个新工联（它们愿意用旧方法，即通过工会联合的手段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对实行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持极端敌视的态度，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

首先，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游行示威这个主意是新的。英国工人像细木工斯纳格^①一样记性不好。把游行示威的想法变成大家的想法，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做不少工作。伦敦工联理事会原来也完全不愿意搞游行示威，但是终于发现，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无论如何是可能的。于是就决定举行游行示威，但拒绝和中央委员会一起搞游行示威，并坚持要删去“法定的”一词。值得记载下来的是，今年（1891年）出现的许多最积极的赞成“法定的”一词的游行示威者，在1890年时甚至还激烈反对任何这样的政治行动。1890年4月23日，在工联理事会在纪念馆大厅召开的会议上，一位著名“领袖”曾庄严宣称，英国工人尚未“成熟”到能够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程度。在同一场合，另一位“领袖”同样强烈地反对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定的”方面。公正地指出，12个月以后，这两位先生转变了自己的立场，以常见的热心精神为

^① 莎士比亚的戏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译者注

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示威大声疾呼。他们发现，并不是工人，而是他们自己尚未“成熟”到采取政治行动的程度。

1890年的五一劳动节

在英国像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原来打算在5月1日举行游行示威。但是后来发现这是完全行不通的。于是，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示威便定于5月4日即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工联理事会在同一天和同一地点组织了他们的不合法的游行示威。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这两种游行示威都举行得很成功，但是合法的游行示威无论从参加的人数或出色的组织工作方面来说，都有许多值得工联理事会学习的地方。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工联理事会到海德公园去只是为了谴责政治行动和夸耀他们所作的努力胜过立法方法。

在1890年9月的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上，第一个好兆头是专门就八小时工作日问题进行的讨论和表决。在这次大会上，主张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以193票对155票获得通过，而这项决议在12个月以前（在邓迪代表大会上）曾以88票对63票被否决。

只有当有必要再组织下年度的五一劳动节时，这种表决的现实意义才能完全看出来。1891年，我们已不再有分别组织了两种不同的游行示威的中央委员会和工联理事会了，而是有一个十人委员会，其中5人代表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游行示威委员会，5人代表工联理事会。星期天，即5月3日，浩浩荡荡的游行群众（至少有25万人）涌向海德公园。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走了一英里又一英里，高呼“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同一天，

爱尔兰最大的工人游行示威是在都柏林的非尼克斯公园举行的。我们虽然不能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运动有大陆国家那样普遍，但是可以指出，1891年5月3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各地方城镇的数量比1890年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地方城镇的数量要多得多。我们还可以断言，明年的五一劳动节集会在人数和重要性方面都会有新的增长。英国的五一劳动节庆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说句公道话，这应归功于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因为它发起了这个庆祝活动；也应归功于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举行庆祝活动，因为它再次走在其他旧工会和新工会的前面。最后，就1891年说，游行示威都与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劳工同盟有关。

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劳工同盟

这个同盟是第一次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的直接产物。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中央委员会虽然做了许多事情，不仅使游行示威取得了成功，而且还促使不愿举行游行示威的工联理事会行动起来了，但它仍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说，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必须在工人面前不断坚持下去。于是，所有帮助组织过1890游行示威的人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1）必须成立一个常设组织；（2）该组织的目标是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争取还没有体现在英国成文法中的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3）成立一个独特的、以巴黎代表大会决议为最低纲领的工党。会议还决定，努力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建立联系，优先吸收它们入盟，其次才努力吸收单个工人入盟。像大多数新的、有活力的组织一样，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劳工同

盟也是一无所有，但不乏朝气。到目前为止，这个同盟除了主要对 1891 年海德公园的游行示威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外，还向无数集会派遣了演说者。在它存在的不长的时间里，它吸收了 30—40 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团体，此外，还吸收了大批单个的帮助者。同盟自然是承认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性的，同盟的代表出席了加莱工会代表大会、里尔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和去年 10 月的哈雷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

我们谈到的几乎完全是城镇工人的组织。这些组织大都是男人的组织。还有两类其他工人必须谈一谈，哪怕是顺便谈一下也好。不幸的是，这两类工人几乎都没有组织。他们是：（1）农业工人；（2）女工。

农 业 工 人

一个令人遗憾和我们必须注意的事实是，英国农业工人今天的组织情况还不如前些年。最近曾多次试图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但都明显地失败了。努力尝试的理由和这些尝试失败的理由都是同样清楚的。对英国城镇工人来说，特别是对非熟练的城镇工人队伍来说，农业工人是对他们的最大威胁。正像英国资本家利用被爱尔兰地主驱逐的农民来对付英国工业工人一样，英国雇主一旦和他的雇工发生纠纷，其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农业工人。煤气工人、码头工人、无数的“非熟练”工人都清楚地懂得这一点。因此，帮助教育和组织农业工人这是城镇工人自卫的问题。

但是，这些农业工人是难以组织的。首先，他们对城里人有一种奇怪的怀疑。其次，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20 年前描写这些农业工人的贫困状况的每一个字今天都更加真实，因为这种贫困

状况大大加剧了，除了贫穷外，他们愚昧、孤立、极度依赖牧师和地主。但是，形势在一天天变得有希望。即使是这些农业工人也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保护自己和反对他们的剥削者。他们一天天领悟到（在这里资本家又一次帮助他们为自己挖掘坟墓）自己和城镇工人是患难与共的兄弟。甚至当我们写这份报告的时候，我们还听说在这些男女农业工人中掀起了新的大有前途的运动。鼓动工作刚开始不久，还很难说这个运动取得了什么肯定的结果，但是至少可以说，在一个郡，8周内就有2 000名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

女 工

如果说组织农业工人难，那么组织城镇的特别是伦敦的女工大概就更难了。原因很简单：甚至大多数男工都把操持家务的妇女看作是家畜，看作多少是他个人的一点财产。妇女挣得的钱通常被看作是对家庭总收入的一点点补充，而不是被看作根据实际贡献付给独立工人的工资。妇女陷入了最悲惨、最绝望和最依赖别人的地步。妇女，即使是从事比较熟练的工种的妇女，所挣的工资一般还难以维持温饱。她们除了为雇主长时间地劳动外，还要为监管她们的工头做“家务事”。如果她是一个寡妇，或者是一个带着不能脱身的小孩的未婚母亲，或者，甚至当她在世界上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时，通常在男人们大都停止工作以后还要苦干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她愿意，她能有多少时间去参加会议或组织呢？但是近年来，事实的无情逻辑也教育了女工，正像它教育了非熟练的男工一样，迫使她们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地位。首先，男工开始看到，凡是没有女工和男工一起工作的地方，雇主

就利用女工来对付男工，因此，男工甚至出于自我保护的简单动机，都必须尽量帮助女工和他一道进行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和剥削者的斗争。在这里，工人运动的蓬勃复兴所产生的影响（间接说，是煤气工人争得八小时工作日的胜利的结果；直接说，是码头工人胜利的结果）是引人注目的。近两年来，几百名妇女被组织起来了。我们已经说过，在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男女是平等的。不用说，在一切社会主义组织中也都是如此。承认有必要把女工普遍组织起来（特别是由男工来组织她们），这是最近两年进行鼓动的结果，而这种鼓动，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则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是说，以前就没有做过把妇女组织起来的尝试。布赖恩特和迈城的火柴工厂的女工们的令人惊叹的罢工，许多著名的妇女为把她们的工人姐妹组织起来而作的努力，这些都是任何有一点关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知识的人不会忘记的。但是，这些成果与所作的努力相比，往往小得令人失望。

需要补充一点，在北部的许多工厂城镇，妇女组织得像男人一样好。但不是所有的城镇都这样。例如，在曼宁汉的那些大工厂里，妇女就完全被忽视了。直到男人同“老板”展开生死搏斗时，才发现忽视妇女是一个错误。错误一旦认识到了，就变成好事。这样，资本家处处都不自觉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联 盟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不管是男工还是女工，都开始认识到他们的事业是共同的。有了这种认识，他们就进一步懂得了全国的和国际的联盟的必要性。正如上面指出过的，在某些非熟练

工人工会中不幸存在的妒忌，更正确地说，在这些工会（不是熟练工人工会）领袖们中存在的妒忌，阻碍了全面的联盟。曾经作过一次建立联盟的尝试，但是由于特种行业工会拒绝承认另一个工会的联盟资格，由于有人想要把联盟仅仅限制在特种行业工会的某些分支的范围内，这次尝试失败了。但是，这种错误做法就像“停止发展”新会员的错误一样，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管个人的意见如何，工人群众还是倾向于建立一切工人的全国的和国际的联盟。

资本家同盟

资本家通过他们的团结和成立资本家同盟的努力，又一次帮了工人人们的忙。近几个月来，传来了许多关于航运资本家同盟的消息，成立这个同盟的不加掩饰的目的是，同一般工会特别是同海员和司炉工工会作斗争。老板的同盟和工会的联盟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联合已经有了令人惊讶的结果。看来似乎遥远的工人联合现在已经近在眼前了。雇主们表明，尽管有各种竞争，资本家的利益是共同的。工人用同样的方法学会懂得，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利益也是共同的。

凡是知道把英国工会彼此分开来的明显界限的人，凡是特别知道“熟练”工人就像雇主看不起他自己一样看不起“非熟练”工人兄弟的人，都能懂得，这几乎意味着英国工人阶级的一般态度上的一场革命。

罢 工

资本家同盟和工人联盟的问题自然会产生罢工和闭厂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发生的罢工和闭厂的事件比前几年多得多。只要一提到这些劳工斗争的历史，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这里我们仅举出一两个事实。有一个事实肯定给工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如果一场罢工不能迅速取胜，那它就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的确，码头工人的罢工是一次旷日持久的罢工，并以胜利告终。但这次罢工是在相当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首先，必须记住，这次罢工实际上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澳大利亚获得胜利的。从澳大利亚汇来的3万英镑捐款保证了这场罢工的胜利。英国工人和其他工人普遍的冷漠态度，则使煤气工人工会的罢工遭到了失败。可是，获胜的罢工并不总是全赢，免不了要失败的罢工并不总是全输。有时，人们错误地套用桂冠诗人^①的诗说：“与其完全不斗争，不如斗争而失败。”其实，有时拒绝卷入毫无希望的斗争，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大的勇气。罢工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要唤起大家对它的注意。1889年大罢工以后，当码头工人成了世界上创造奇迹的人的时候，罢工也成了实实在在的流行病。工人满脑袋装的都是这样一种想法：只有罢工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工人为了获得所要的一切，就只有参加工会和进行罢工。南部大城市工人罢工、苏格兰铁路工人罢工和许多其他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实际上赢得的要比失去的多，因为这使工人认识到，单是工会的努力起不了多大作用，工人的经济自由只有通过他们自己掌握政

^① 坦尼森说过：“与其终身不爱，不如爱而失败。”——译者注

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才能实现。成功的罢工和不成功的罢工，如码头工人和南部大城市煤气工人的罢工，公共汽车驾驶员的罢工，海员和司炉工的罢工，船夫的罢工和鼓风炉工人的罢工，总之，近两年来数百次大大小小的罢工，都得出了一个教训：工联主义和单是罢工不能解放工人阶级。

英国的自由

罢工和劳工斗争问题还把我们引导到另一个问题。在大陆（近来在英国）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英国的工人现在幸运地摆脱了警察干涉和暴政。最近的事件清楚地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在普利茅斯，属于煤气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布里斯托尔和西英格兰的劳工联合会、一切“非熟练”工人工会的人，都因进行“恐吓”活动而受到控诉和判罪（他们的申诉现在还没有裁决），尽管他们总的罪名是命令本工会会员“停止工作”。为首的“恐吓者”说，“我们没有使用暴力，没有使用过激的语言，但是工人都平静地放下工作回家去了”。这一极其重要的案件伦敦工联理事会接受了，并将在最高法院打官司。理事会书记说：“如果这种合法的恐吓使劳动人民被判刑和受到监禁苦役的处罚，那么，好，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一点。”^①

的确，在最近发生的一切罢工中，警察不仅不适当地进行干

^① 正当这个报告付印时，法院已就普利茅斯案件作出判决，工人胜诉。普利茅斯市法院法官邦帕斯先生的令人震惊的裁决得到由英国首席法官和其他4位法官组成的法庭的一致通过。即使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号召工会会员停止为某个特定的老板或公司工作这并不是恐吓。这一判决结果是工人的伟大胜利，对于工人阶级运动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涉，而且还竭力挑起骚乱，政府毫不犹豫地出动了军队。在利兹，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赢得罢工的胜利，完全是靠斗争。他们不仅和警察斗，而且还和调到城里来“维持秩序”的400名士兵斗。有一次，根据贝克顿的煤气工人打算罢工的谣传（顺便说一句，纯系捏造），“就向查塔姆下达了着派3营军队向贝克顿进军的命令……内务部和国防部也确信形势是危险的……查塔姆的卫戍司令报告说：他可以出动大约1000官兵……这些官兵……在接受检阅……他们每人的子弹盒里备有20发子弹……他们正整装待发”。至于说到海员和司炉工工会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工会的书记因“恐吓”罪被判了6个星期的监禁，雇主同盟和工会之间的斗争正愈演愈烈。

劳 工 代 表

新工联主义和活跃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最显著的特点，大概是极为重视在各公共团体中的劳工代表。这种代表的必要性过去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承认的，甚至是得到那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的工人组织承认的。但是，只有英国北部和西部的少数大工会（主要是矿工工会）贯彻了这一思想，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在下院的劳工代表，除了两三个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两大政党之一的追随者。可是，大不列颠的和甚至爱尔兰的工人终究开始认识到，要使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他们的代表必须把劳工的利益置于党派利益的之上。所以，新运动要求当选为议员的人，如有必要，必须保证和两个政党作斗争，务使劳工的要求不被忽视。在这方面，伦敦和各个地方都在积极做工作。在伦敦，我们至少在6个选区推举了劳工候选人。他们的

竞选纲领介于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和费边社会主义激进派纲领之间。在各个地方同样开展了劳工代表竞选活动。在下次大选中可能有不少劳工候选人当选。

我们的外国朋友大概想象不出在联合王国由于一切选举都缺乏民主基础，工人阶级要想保证那些履行自己纲领的人当选多么困难。巨大的选举费用，国家不支付这些费用，会员不缴纳这些费用，没有第二次投票，选举权和户籍法的一系列复杂条件，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代表当选来说，是几乎无法逾越的资格上的困难。但是，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政党（上面已经提到过）。有希望的是：至少有一些工人阶级的候选人会在下次选举中选进下院，这将有助于成立一个具有明确的行动纲领的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政党。

由于上面提到的困难，新运动的政治活动便沿着一条同推举劳工候选人竞选的路线稍稍不同的路线前进。在选举期间，在任何一个选区，当我们发现劳工候选人不可能当选的时候，便在选民面前给其他党派的候选人施加压力，以致一个候选人能否当选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是否接受一般劳工纲领中的某些条文而定。这种做法不仅适用于英格兰和苏格兰，而且也适用于爱尔兰。在爱尔兰，无论帕内尔派还是反帕内尔派，今天都想争取得到劳工的选票。

但是，新运动在有关劳工代表问题上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体现在地方选举和市政选举中。教区会（不久就要被更民主的机构取代）、贫民救济委员会、郡议会和一切与人民关系最密切的行政机构，都被看作是未来公社的中央机构。工人认识到，这些机构必须拥有那些现在还被私人资本家控制着的垄断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劳工代表正在努力争取被选进市政代表机构，正像努力

争取被选进议会一样。在许多地方城镇，劳工代表被选入学校委员会、镇议事会等，结果往往使选民们感到非常满意。

在伦敦，工作也在迅速进行。在拜特席郡，一位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劳工联盟当选为郡议会议员。他在其他赞成他的观点的议员的帮助下，在郡议会促进了劳工事业。例如，没有承包人的调解，郡议会就拒绝承认雇主直接雇佣工人来做工的合同。对于那些不支付公认的标准工资的雇主，或对于那些不答应与合同有关的工会提出的劳动条件的雇主，郡议会均不发给合同。郡议会也同意按在多种行业中被认为是“合理的”工资标准付工资给自己的雇员。

这些是超过几年前在公共机构中盛行的旧制度的一个显著的进步。几年前，公共机构雇用的工人的工资往往低于私人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其他有劳工代表当选的公共机构仿效了伦敦郡议会的榜样。劳工代表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地扩大市政机构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在这一点上，市政机构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这些人不能认为是劳工代表，但他们希望市政机构拥有自己的有轨电车、煤气、水和电力照明设施，希望市政机构建造和维修工人住宅，希望市政机构在其他方面承担起至今仍由私人垄断的企业经营的职能。这方面的活动是社会主义者灌输到工人头脑中的思想获得进步的最令人满意的标志之一。

柏林协商会议

1890年在柏林召开了欧洲各国政府代表关于劳工立法的协商会议，目的是要为劳工立法取得国际基础。这个会议是工人阶级运动史上近几年来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是，柏林会议

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是劳工运动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标志。就这方面说，不应忘记德皇在他的著名“诏书”中提到了1889年国际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这一点。就联合王国来说，除了工厂法外，这次柏林协商会议毫无成果。工厂法的原则性条款是不顾实行措施的政府的反对在下院通过的。该条款试图用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童工问题上远远走在我国前面）相同的法律来取代联合王国有关童工的法律。英国政府代表对待关于参加柏林会议的国家禁止12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劳动的建议的态度暴露了英国政府的虚伪，因为英国政府反而将半工半读的学生的年龄提高到11岁。在其他欧洲国家这种法律已经失效，它们正根据柏林会议的建议行事。联合王国至今还在夸耀它的完善的劳动保护法。它将很快发现自己落在大陆最反动国家的后面。

劳工委员会

政府成立关于劳工问题的皇家委员会，是新运动对中上层阶级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证明。当第一次提出要成立皇家劳工委员会时，许多人还以为政府是出于想获得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准确情报的真诚愿望，以为政府会准备（如果必要的话）采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措施。但是，当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公开的时候，那些一时受骗的人完全觉醒了。原以为劳工代表在劳工委员会中至少要占一半名额，但是，“愚蠢的党”再也没有迪斯累里给与它灵感了，它让一次重要的机会从手指缝中溜走了。与希望的代表公平合理的劳工委员相反，在这个皇家劳工委员会里有6名劳工代表，21名资本利益的代表。“劳工代表”人选的确定更增加了人们对皇家劳工委员会这个机构的不满。只有一个提倡普遍法

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人被请到皇家劳工委员会工作。在皇家劳工委员会里，有一两个人赞成八小时工作日，但认为，只能通过立法的途径，给那些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人如矿工、铁路工人等规定八小时工作日。除了这一两个人之外，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所有劳工代表都反对通过法律规定限制成年人的劳动。无须进一步说明，任命劳工委员会的政府只是把劳工委员会当作竞选花招，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赢得工人的信任。政府正在把劳工委员会当作把诸如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搁置起来的托词，而这些问题已由新运动提到了首要地位，现在急需解决。

国 际 主 义

最后，谈一下在联合王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方面的巨大进步。我们只需提一提下面这些事实就够了：矿工代表大会；海员和司炉工为同国外同伴建立直接联系而作出的努力；最近几个月中一个国家的工人对另一个国家的工人所给予的财政帮助，如诺丁汉（英国）的花边工人帮助加莱（法国）的花边工人，加莱的工人帮助曼宁海姆的工人，英国工人帮助里昂的吹玻璃工人，奥地利工人帮助制砖工人；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提出的“在凡是法律允许委派书记的国家委派书记，他应同其他国际书记建立联系”的建议，在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委派这种书记是不可能的。但是，国际通讯已经由那些愿意做并且有条件做的人着手进行了。

结 束 语

总结起来说，近两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所做的工作比起国

外所做的工作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只是在下院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伦敦郡议会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有些地方城镇，像在伦敦一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地方委员会、镇议事会、教区会等。我们既不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比，因为它拥有 150 万张选票和 35 名议员，也不能和法国工人党相比。我们也承认，我们不像从丹麦到匈牙利、从瑞典到西班牙的欧洲工人那样拥有工人阶级的报刊，即那种属于一个稳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机关报。我们的报纸是私人的财产，多少是作为一种投机事业来经营的。虽然我们的报纸有时起过好作用，然而不能信赖的。它们虽然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但无疑绝对没有提供理论教导。至于像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正义报》那样的报纸，它具有宗派性质，不能打动工人群众的心。

但是，在英国终究有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它的成功自 1889 年以来就预示着一个不同于所有其他政党的工党的形成。首先，阶级觉悟和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有了出乎意料的提高和增强。其次，由此对全世界劳工的团结的理解也有了出乎意料的增强。每个国家都有并且必须有它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但不管它们是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目的在全世界都是共同的：解放工人阶级，废除一切阶级统治。

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团结万岁！

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

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和

国际劳工同盟

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

拜特席劳工联盟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在国际工人巴黎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几个月，即 1889 年初，奥地利工人党在海因菲尔德党代表大会上重新宣告成立。在经过几年停止不前，甚至是倒退的状态之后，党重新振作起来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状态已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有明确的、规定得清清楚楚的原则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劳动纲领的牢固的、统一的组织。在一个政治上落后、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因外部压力而陷入绝望的人民的的不满情绪的爆发上这种非常容易理解的、明显的错误已被克服。工人阶级中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在由卡尔·马克思奠定了理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一个知道自己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使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劳动资料，是完成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只有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本身才能成为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承担者）的政党，正如我们的海因菲尔德纲领所宣布的那样，必须把“在政治上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使它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使命，在精神和物质上使它做好并保持战斗的准备”当作自己的任务。

除了进行真正的、有原则的社会民主主义宣传之外，还必须进行争取实现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斗争，争取改善当前的生活条件的斗争。这 3 者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在所有这

3个方面，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遇到的困难，无疑比在任何欧洲国家中遇到的困难都大。我们还根本不想谈民族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还只是造成技术上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结果是：今天在奥地利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它把操德语、捷克语、波兰语、意大利语和斯拉夫语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像兄弟一样地团结在一起。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政治息息相关的民族沙文主义从来没有妨碍过我们党，我们党始终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党。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困难是巨大的。除了那些以最现代化的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大的领域里存在着剥削而外，我们还看到，有的地方封建主义还能采用家长制的剥削方法，有的地方还处在半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农民刚刚开始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奥地利的政治情况也与此相适应。除了按照自由主义样式剪裁的资产阶级宪法这个因素之外，还严重地存在着大量封建主义残余，以致在政治上奥地利不能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国家。

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它们的阶级利益不受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威胁，不仅使用了现代自由主义这个武器，而且还动用了警察国家武库中的全部武器，例如，几百年来教会的统治加在人民身上的锁链。宣传和组织的一切手段——结社权、集会权、言论自由、联合的权利——都受到极大限制，而且还被赋予了模棱两可的形式，以致它们很容易被为剥削阶级效劳的行政当局直接从解放的手段变成奴役的工具。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深入研究毫无价值，因为要使一个外国人了解，比如，“像在奥地利那样自由”这句名言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类警察的骗人花招，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奥地利我们还缺少选举权这

个最重要的宣传手段，这个衡量自己力量的最宝贵的标准。在奥地利只有缴纳 5 弗罗林直接税的人才享有选举权，因此真正的雇佣劳动者是享受不到这个权利的。所以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还必须提出在其他国家中作为不言而喻的、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条件早已实现了的要求。

1883 年至 1886 年间政府的继续摇摆不定的政策，对于工人运动来说，带有残酷的、嗜血的性质。几次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以及后来发生的几次幼稚的“爆炸事件”（那些无辜的肇事者们显然是受特务愚弄的天真的牺牲品）等等成了当局的借口，它没有遇到多大的反抗就使议会批准了两个戒严令，其中之一规定，一切“无政府主义的不法行为”都将提交特别法庭审判，而不再交给由法官和陪审人员组成的法庭审理。另一个戒严令规定，暂时停止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工业区的一切政治权利，特别是允许采取不经法官判决，单凭警察局的一纸命令就可以实行驱逐的措施。在维也纳这个工人运动的巨大中心，根据政府的这道命令，我们的组织便被一举摧毁了。成百的工人被驱逐出境，工会被解散，或被迫自愿暂时停止活动。在另一个大工业中心波希米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而且在那里人们甚至还用不着“合法的”这块遮羞布。在那里成百的工人被逮捕并被押往布拉格，以便在布拉格经过几个月的待审拘留之后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而他们的全部罪行往往只是订阅了一份公开发行的工人报纸。尽管法庭从据说在奥地利存在着一个遍及全国的社会主义秘密同盟这一至今还被当作把柄的捕风捉影的虚构出发，但它往往还是不能给工人定罪。不过当局却不时开庭审理“无政府主义者案件”，而这些案件的罪魁祸首们通常都能及时逃之夭夭，可是那些被他们出卖的可怜的、被引上歧途的、轻信的“同谋犯”却不得不锒铛入狱，坐上 8 年、10

年、12年甚至20年的牢，这些不幸的人大多数完全是按照为无产阶级事业做点好事的善良愿望行事的，但他们多半已在监狱里死于坏血病和结核病。还有一些人试图用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传播煽动性的传单，他们也因为这种行为被送上了冷冰冰的断头台。

不言而喻，从占据统治地位的政党那里是丝毫也得不到什么帮助的。至于说到奥地利的对内政策，那么这里有3个因素——上层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在进行斗争，争夺具有绝对权威的皇帝所施舍的一点权力的残余。与此同时，民族纠纷被人当作幌子来利用。由于出现了一些临时性的结盟，形势就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教权派的尾巴。小资产阶级在沦为无产阶级的道路上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它看见了自己面前的深渊，却企图从过去中寻找获救的办法。它是反动的，任何一句反动口号它都会毫无主见地欣然接受。

所有这3类人都装出一付“工人之友”的样子，然而他们对工人特别是工人组织提出的一切要求都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是在对付无产阶级方面他们事实上只构成“反动的一帮”。因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过去和现在都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甚至对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来说，政治自由也早已不再是他们纲领中的重要条款了。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我们党新确定的纲领和重建与扩建工人阶级组织的双重任务便成为一个重大的任务，我们可以怀着愉快而自豪的心情说，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这里我们想一开始就谈政治部分，而只用三言两语简单谈谈我们所取得的进步。首先，我们通过最广泛的宣传使居民不仅了解了我们的原则，而且也了解了我们的策略，从而证明了戒严

令是荒谬的。两个戒严令都不起作用了，因为它们成了大家的笑柄。过去对秘密同盟进行的数不清的审判已失去任何依据。现在在许多家报纸上，在无数次集会上公开阐明自己纲领的人，再也不能被当作秘密同盟的会员来定罪了。当然取得这些成就是要付出大量牺牲的。当 1889 年 6 月著名的电车工人大罢工使维也纳居民群情激昂时，当社会民主党人懂得把电车公司的职工组织起来，并不顾当局、警察的干涉，大声疾呼唤起群众对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他们取得重大胜利时，党在维也纳的机关报《平等报》被当作“无政府主义的”报纸而受到了压迫，该报编辑被当作“无政府主义者”起诉，并被监禁。在波希米亚、施泰尔马克、的里雅斯特、加里西亚，情况也是如此；在那些地方只要你敢动一动，马上就会惹出一场祸事来。但是尽管如此，运动还是没有停止。当局终于无可奈何地表示听天由命和承认，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存在着，承认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我们在报刊的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最为明显。我们的报刊除了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而外，还被禁止沿街零售。传播方面的困难超过了编辑方面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下面这些数字是很有价值的。1889 年初我们出版了 6 种政治报刊（月刊和半月刊），其中有 2 种是用捷克文出版的，1 种是用波兰文出版的。这 6 种报刊总共有 15 400 名购买者。到 1891 年 6 月底，也就是说，两年半以后，在维也纳举行党代表大会时，我们已经出版了 16 种报纸，其中有 7 种德文、5 种捷克文、2 种波兰文、1 种意大利文、1 种斯拉夫文报纸，总共有 56 000 名购买者。此外，还要加上一些“专业报纸”，它们虽然是为个别行业办的，但完全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的。这类报纸从 4 种增加到了 19 种（6 种是捷克文的）。这些报纸的订阅者也从 6 000 人增加到 44 000 人。总计起

来，今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刊物的发行量已达到 128 000 份，而 1889 年只有 22 000 份，因此在两年半中它们的发行量增加了 5 倍。

说明我们党有了发展的另一个证据是，我们利用了今年 3 月举行的帝国议会选举来进行充分的宣传。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奥地利选举权是受财产资格限制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根本没有指望获得委托书。但是我们抓住机会在无数次选民大会上说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散发数以百万计的用我国各民族语言印刷的选举传单，有时可以说甚至是作为不速之客把我们的名片送到资产阶级政党那里去。这些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是从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将近 6 000 张选票的角度来看，而且还要从我们的宣传在那些平常和我们非常疏远的人群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我们党的同志都增强了自信心这两方面来看。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同时坚决地反对了我国的反动的选举制度，并把争取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我们今后再不会让这项任务从我们的日程上消失了。

现在我们离开真正的政治领域来谈谈结社制度。奥地利法律把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团体严格区别开来。政治性团体不能同别的团体发生联系，它的会员必须向当局登记，等等，而警察局就利用这种事实上无法作出公断的区别来取缔那些它们感到讨厌的组织。撇开少数几个成立不久的政治团体不谈，工人阶级建立的组织都是非政治性组织，它们本身同社会民主党根本毫不相干，它们的创始人、领导人和成员只是偶然加入社会民主党的。这些组织是专业团体，或者（这在我们那里完全是一回事）叫做工会、教育协会和读书协会。据不完全的统计，1888 年底这类协会的数目达到 104 个，1891 年中达到 230 个；在同一期间，会员的人数

从 15 600 人增加到 48 000 人。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工会组织现正处在蓬勃向上的发展中，几乎每一周都有几个新的团体成立，它们的会员也迅速得到增加。工会组织的影响往往超出全体会员本身，凡是正在为工资进行斗争的地方，它们当然定会构成一支起决定作用的核心队伍。奥地利工会组织的特点是，它们卓有成效地把女工吸引到运动中来，同样，它们不仅允许非技术工人参加，而且还竭尽全力吸收他们参加组织。这两种做法不仅对于当前目的说来非常重要，而且在政治上也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新近成立的一些协会不再把真正的救济工作（救济病人、救济因伤致残的人等等）当作自己的目的，而专门从事这种救济工作的，其成员有数十万之众的工人协会则没有列入我们的统计之内。相反，对失业和外出寻找工作的人则给予救济和津贴。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是筹集抵抗基金，因为奥地利当局也在干预工人协会的内部组织和活动，当局经常受到一笔较大的现金的引诱，准备随便找一个借口来解散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困难也渡过了。在奥地利尽管大家都承认，工会的普遍集中非常有必要，但是只要存在着当局随后可以一举粉碎整个组织的危险，这种集中就会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满足于成立地方协会作为临时措施，这些地方协会将逐步合并为州级组织，而在各州级组织之间又将通过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建立正常联系。1890 年底和 1891 年初举行过这种代表大会并获得极大成功的有：锻工、细木工、制帽工、鞋匠、纺织工人、矿工和冶炼工、五金工人、制革工人、面包师、建筑工，不久裁缝们也将聚会在一起。

这些组织要达到的目的首先是缩短劳动时间。虽然奥地利已经明文规定正常工作日为 11 小时（当然有大量例外），然而由于国家没有进行认真的监督，所以这个规定执行得很马虎。此外，这

条法律只是适用于工厂工业，因而归根到底，11小时还是对劳动力的剥削者的过于巨大的让步：在奥地利工人阶级中再没有任何要求比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更受到群众的拥护了。为了实现这个要求，为了提高少得可怜的工资，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近年来在某些部门劳动时间缩短了，然而在到处都发展得最多的金属工业部门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劳动时间少于10小时，只有印刷工人争取到了9.5小时工作日；他们在最近一次罢工中要求把劳动时间缩短为9小时，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英勇斗争暂时还未获成功。

工会组织的另一个目的是阻止没有获胜希望的罢工，但是，在具备了罢工条件的地方就要有计划地、不屈不挠地使用这一斗争手段。正好1890年这一年在奥地利也像在世界各地一样，爆发了一连串罢工事件，这些罢工是由于工资待遇太低和劳动条件恶劣引起的，因而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在物质手段和精神条件方面准备不足，这些罢工多半都失败了。即使有的地方取得了相当多的好处，但是根据一个坚强的组织的指示采取有计划的行动的必要性，仍然越来越迫切，尤其因为在奥地利，企业主们在他们的卡特尔中，除了有步骤地诓骗消费者而外，也开始非常认真地考虑组织起来对付他们的雇佣奴隶。正是在这里，现实的需要表明，单是全国联合会根本不能达到提供世界劳动市场的信息和概况的目的，这里必须经常建立和调整国际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能够取得有价值的实际结果。

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告诉大家，对各国工人运动说来开得很成功的1889年社会主义者巴黎代表大会给各国政府的推动（它导致了著名的柏林劳工保护会议的召开），对奥地利的立法

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奥地利的劳工保护丝毫没有有什么进展。政府满足于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 1885 年的法律在柏林给它带来的荣誉，它认为，用不着着急，等其他国家赶上了它盲目自诩的进步后再说，并企图隐瞒奥地利的劳工保护在许多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外国这一真相。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首先是，奥地利没有真正的联合的权利，而只有这个权利才是劳工保护的最重要的保证。国际劳工保护变成了国际剥削者保护。

相反地，人们却热衷于为了国家的缘故，用强制性的组织把工人阶级束缚起来。把小工业企业联合起来的所谓“合作社”（据说它应重新唤起已经失去的行会理想），凡是在它能够建立起来的地方，当然，由于工人的毅力和智慧，都或者被变成了无害的组织，或者被改造为工人手中的有效武器。现在大工业企业里的工人和矿山工人也要享受到成立类似组织的荣幸，有阶级觉悟的、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精神的良好教育的奥地利工人也会知道如何对付它们的。

统治阶级和替它效劳的政府的国际联合毫无希望取得进展，相反，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者巴黎代表大会却为工人运动本身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有关原则问题的协议在极大程度上对这个发展作出了贡献，那么有关五一节的具体决议至少也是同样如此。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故意避而不谈，为的是在我们报告的末尾比较详细地来谈论它。因为奥地利工人运动有许多东西要特别感谢国际工人节这一伟大思想。在巴黎举行的要求通过立法手续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的影响，远远超过原来估计的范围。这次示威游行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示威游行。当人们回想起我们对奥地利政治形势的肤浅概括时，他们会发现，我们面对每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庆祝活动这一决议，

感到有点难堪，是可以理解的。游行、集会、庆祝——所有这类活动，十之八九注定会被警方直接了当地禁止；在一个像奥地利这样的国家中，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这就是停止工作，以人民的名义庆祝节日。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奥地利也有人会愚蠢地指摘我们，说我们“违反合同”；正是这些人，当他们继续进行剥削已无利可图时，他们会毫不在乎地一连几个月把成千上万的工人抛向街头，或者当他们认为方便时立即让工人“干半天活”，这伙人为了阿谀逢迎地炫耀某个君主的节日是不惜放假让工人去进行庆祝的；我们知道，当工人在一年中有一天想用几个小时来履行他的最崇高的任务时，这伙人是会大喊大叫说我们“违反合同”，说我们损害“国民劳动”的神圣利益的。我们还知道，国家权力机关始终乐于在对法律可以作有利于剥削者的解释的地方运用法律。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成功了。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工人报刊曾号召无产阶级纪念自己的节日；为此目的，举行了无数次集会，散发了几十万份传单。敌人的报刊违反自己的心愿竟给我们帮了忙。它们先是厚颜无耻地嘲笑我们，后来当他们看到我们当真要庆祝时，便预言5月1日这一天将是世界的末日。

我们的宣传深深地打动了工人阶级中那些对庆祝五一节还比较不太关心的人，这种现象是从来没有过的。五一节这个工人节日的信息真正传遍了全奥地利，直至最偏僻的角落，它使人们感到又惊又喜，使人们充满希望。而最重要的是，随着关于五一节的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国际的思想也到处发扬光大了。

我们无须在这里描绘，1890年5月1日这天在奥地利是怎样度过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威武雄壮的游行使全世界意识到，有阶级觉悟的奥地利无产阶级已经赢得了并肩走在最前列的权利。

如果说宣传鼓动、思想武装已经给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带来成果，那么近年来的成就、光辉的胜利和广泛的、深入的组织工作，在许多方面都正是直接同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分不开的。

在 1891 年困难更大了。事情进行得更不顺利。五一节那天是星期五，比 1890 年的星期四更不利；企业家们进行了更坚决的抵抗；当局始终怀恨在心，我们在去年获得的使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的成就激怒了他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坚持停止工作，而情况表明，今年也到处都这样干了。不过，今年没有去年过节时那股空前的新鲜劲头和资产阶级的畏缩胆怯给这个节日带来的光彩，这倒是事实。但是这次庆祝的性质是同样严肃认真的，去年不曾参加庆祝活动的无产阶级中的一些阶层今年也参加进来了。当然，我们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在有的地方，如瓦伦斯多尔夫、比利兹一比阿拉、耶格恩多尔夫，成千的工人被老板解雇了；虽然解雇的时间只有几天，但是对工人的打击还是相当沉重的。同样，某些同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处分，也要求予以特殊救济。但是奥地利工人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庆祝五一节的重大意义完全足以弥补我们付出的代价，他们在 1891 年 6 月底举行的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庆祝五一节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

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清楚，正像我们在布鲁塞尔也要直言不讳地声明那样，如果五一节失去了它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节日这个国际性质，那么它的价值也就丧失了一半。如果不仅在巴黎规定好了的庆祝方式，而且在哪一天进行庆祝都变得各不相同了的话，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德国和英国的同志们可以提出他们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把五一节放到星期天去庆祝的理由，我们准备聆听并尊重他们申诉的理由。我们决不进行不适当的干涉，但

是我们认为下述看法还是值得考虑的，即在这里不单是本国的情况值得非常重视，而且还有国际义务也非常值得重视。在德国和英国推迟庆祝不仅会对五一节的高尚内容、精神作用产生不利影响，还会使这个本来就不太容易举行庆祝的节日在奥地利更加难以进行庆祝。因此，奥地利代表受托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坚决主张规定一个统一的庆祝五一节的日期。

在快要结束时，我们把我们的报告归纳一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全力以赴地完成它的任务。随着经济的变革，资本主义的进步，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努力，人们的思想也在逐步革命化。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变成工人们意识到的对立，把大批听人摆布的、日益贫困的雇佣奴隶变成一支有组织的、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战士的大军，使这支军队在物质上做好战斗准备，并给它提供精神武器，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伟大事业。我们意识到，这个事业正在向前推进。我们看得出，受奴役的穷人到处都领悟到了这样一种崇高的思想：为自己的解放而工作就是为人类的未来而奋斗；他们在文明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里都不仅有共同遭受患难的同志，而且还有共同进行斗争的同志。我们的党纲中写道：“反对剥削的斗争必然是国际性的斗争，正如剥削本身是国际性的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祝大会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并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万岁！

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

维·阿德勒博士

1891年8月于维也纳

比利时工人党的报告

自 1889 年巴黎代表大会（我们曾向这次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比利时的报告）召开以来，我国的总形势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工人运动发展了，它的组织工作改进了。工人党的活动体现在组成党的 4 个部门中，这 4 个部门是：职业工会、政治同盟和宣传、合作社和互助会。

在党的支持下，各种不同的行业都结成了全国联合会。结成全国联盟的有：矿工、冶金工人、木材工人、油漆工、烟草工人、石头雕刻和琢磨工人，以及乘务员，其中有些全国联盟，例如，矿工全国联合会，已和别国的同行结成了国际联合会。

合作社坚持了一条严格的社会主义路线，它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一支力量，因为它在进行组合和经济教育方面卓有成效，它为党的政治工作和党的经济斗争提供资金。根特是工人运动的摇篮，但它已被中部的约利蒙，以及布鲁塞尔赶上了；在安特卫普，运动有了惊人的进展。在列日、佛尔维耶、圣吉尔、瓦姆、弗拉默里和勒芬存在着强大的合作社团体。面包业是合作社经营的主要行业。以下的简要统计表明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约利蒙的“进步”每天生产 12 000 公斤面包；根特的“前进”每天生产 10 000 多公斤面包；布鲁塞尔的“人民之家”每天生产 9 000 多公斤面包，

“工人”每天生产约 5 0000 公斤面包；这就是说，这 4 个企业生产的面包可供 10 万人消费。如果我们再加上全国所有其他合作社，如果我们把它们的生产量也加进去，那么，这个数字可能差不多要增加一倍。合作社为宣传工作提供的资金，估计每半年可能在 4 万法郎以上。

* * *

我们的政治运动的发展是激动人心的。尽管国家受到寡头政治的压迫，我们仍然是一支使政府本身都感到它的影响的力量。由于我们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进行了选举改革的宣传，对宪法的修改正在进行中。被我们看作是解放工具的普选权，已基本上为进步党人，即自由资产阶级和甚至天主教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一年来，在比利时没有其他任何政党提出过普选权的要求。我们已经做的一切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同一时刻，我们刚刚终于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议会报告，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进行修改；这是在议会中进行修改的第二阶段。为了促使政府——它应当继我们的引起全国关注的运动之后保证改变选举制度——明确表示赞成修改宪法，5 月大罢工势在必行，这次罢工的参加者多达 125 000 人：矿工、冶金工人、木材工人、码头工人和其他无产者都停止了工作。

这些停工只是在短时期内造成了神经紧张。今天，我们的力量差不多到处都重新组织起来了，并已准备好参加新的战斗，如有必要的话。

工人党本来希望这次罢工能延期举行；但是，由于庆祝五一节，这一天工人都发动起来了，以致党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站到了鼓动的前头，于是鼓动立即具有了更加坚定、更加守纪律的

性质，结果，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和庄严的要求在近期内修改宪法的声明。

在发生这些严重事件的期间和之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迫害、逮捕和监禁。

* * *

近几个月来在比利时，具体地说，在布鲁塞尔和佛尔维耶，举行了几次代表大会。尤其是在大规模集会上，全国社会主义工人力量的团结更紧密了，从前的分裂完全消失了。除单独拥有自己的联合会的劳动骑士组织之外，在比利时，一切社会主义工人组织都团结在工人党的红旗下。

在我们去年的年度报告中引用的一些情况可以补充说明我国的形势。必须指出，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教权派这个不共戴天的和顽强的敌人比其他地方都多。

这些教权派保守分子用他们的“工人之家”来同我们的“人民之家”对抗；用他们的教会合作社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对抗；用他们的群众大会和演讲来同我们的对抗；用他们的下流的宣传报纸和文章来同我们的报纸和小册子对抗；他们在他们的报刊上歪曲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要求，诽谤和败坏工人党代理人的声誉。他们的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 * *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年度报告中所引用的一些细节可以补充我们的说明。

除了去年9月14日和今年4月5日举行的代表大会而外，在工人党的协助下不同行业的工人和学生团体举行了17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大会的工人和学生团体是：雪茄烟工人、矿工、互助会员、冶金工人、青年近卫军、木材工人、裁缝、合作社、卷

烟工人、社会主义大学生、佛兰芒小组、大理石加工工人、石匠和采石工。

在过去的一年中举行了多次选举。

在去年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工人党提出了大批候选人。在布鲁塞尔和首都各郊区，党的候选人当选了。在瓦隆地区的许多地方，情况也是这样。

去年6月莱昂·德菲索公民在蒙区获得15587张民众选票后，只获得了404张缴纳选举税者的票。

产业和劳动委员会也多次进行选举。各地的选举都对工人党候选人有利。

有27个新协会在去年加入了工人党。

1890年5月1日和1891年5月1日对我们的运动来说，是两个光辉的日子。

在每个重要城市，在每个工业中心，成千的劳动者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

有好几个工业区和整个矿业区，工人都停止了工作。

这个国际劳动节是工人思想的一次大检阅，比利时在这个大检阅中当之无愧地占有自己的位置。

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特别肩负着反对服兵役的宣传义务，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勇敢和毅力。他们成立了一个联盟，把布鲁塞尔以及外省的大批青年近卫军小组联合起来了。

在快要抽签的时候，发生了反对服兵役的示威游行，并举行了群众大会，应征士兵向执政机关递交了反对令人憎恶的军事制度的抗议书。

通过报刊进行的宣传不再是没有成效的了。为了发动1890年8月10日的政治示威，出售或散发了6万多本小册子。为了迎接

5月1日这一天，出售或散发了5万多本小册子。

正如我们在上面作了摘要的那个报告中所说的，比利时工人党和国际社会民主党遭到了巨大的损失。我们的令人怀念的塞扎尔·德巴普去逝了。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不幸者的事业，献给了探索建立一个比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美好、更公正、更人道的社会的事业。我们遵照他的遗愿，已把他的遗体运回布鲁塞尔。为这位勇敢的人，这位伟大的公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甚至国王都没有享受过这样大的殊荣，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向他表示极大的和痛苦的敬意。

代表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

书记—报告人：

路易·贝尔特朗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丹麦约有 200 万人口，其中一部分人从事农业和渔业，一部分人也靠工业为生。

农业是居民的主要行业，但从前居民是在比今天大得多的程度上以农业为生。大约在 100 年前，丹麦的工业还少得可怜，但是在此期间它已获得相当大的发展。

从事农业生产的那一部分人民，就全国范围来说在相对减少，但就某些地区来说却在绝对减少，而工业人口却不断增加。

根据 1891 年 2 月 1 日的人口调查，在最近 10 年中全国人口增加了 203 000 人，而人口增加的地方几乎完全是下面这些地方：首都哥本哈根、各州首府以及农村中较大规模的工业活动占支配地位的地方。

农业人口占优势的那些地方，即人口在绝对减少的那些地方决不是最贫瘠的地方，相反，那些地方是最富饶的地方，那里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

在那些地方，人口下降的原因是由于使用农业机械和改进设备引起的，其结果是一部分劳动力成为多余的了。

国家宪法是一部受到限制的君主制宪法。

国会（议会）由两院组成：

1. 福克庭（众议院），由直接选举产生。直接选举虽然是按

照普选权的原则进行的，但是对普选权加上了许多限制。

2. 兰德斯庭（参议院），通过间接选举后任命。在间接选举中资本家阶级可以行使享有财产特权的选举权。

关于劳工保护只有 3 条法律，这就是：

1. 1873 年 5 月 23 日通过的关于在工厂和按工厂方式经营的工场内干活的童工和青工的劳动法，以及对这条法律执行情况的公开监督权。

2. 关于陆地上的蒸汽锅炉管制法。

3. 1889 年 4 月 12 日通过的保护劳工、防止工伤事故法。

由于颁布了这几条法律，从 1885 年 10 月 24 日至 1891 年 3 月 31 日（这个报告所包括的这段期间），在 1 949 个工厂和按工厂方式经营的工场里行使了监督权。在这些工厂和工场里劳动的总共有 29 613 名成年男工，6 918 名成年女工，2 796 名年龄在 14—18 岁之间的未成年男工，649 名同样年龄的未成年女工，2 124 名年龄为 10—14 岁的男童工和 395 名同样年龄的女童工。

其次，对 1 365 个由管家或承租人管理的产业和农村企业，以及由机械动力推动的其他 81 个企业进行了检查。

上面提到的第一条法律（1873 年 5 月 23 日通过的关于童工和青工在工厂等等里就业的问题）要求，年龄在 10—14 岁之间的童工只准在法律规定的企业里干活，每天劳动 6.5 小时，上班时时间早上不得早于 6 点，晚上不得晚于 8 点。

14—18 岁的青工也只能在许可的企业里每天劳动 12 小时，上班时时间早上不得早于 5 点，晚上不得晚于 9 点。在允许的 12 小时劳动时间内，必须保证青工至少有 2 小时用餐和休息的时间。

此外，关于餐馆和有碍健康的劳动，这条法律还有各种不同的规定。

这条法律一般不涉及成年工人（18岁以上）。

另外两条法律包含有关于对蒸汽锅炉进行监督和允许使用某些有安全保护设施的由机械动力推动的机器的规定。

在上述两条法律中，一般没有考虑不使用由机械动力推动的机器的真正的手工业和农业企业。

在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监督的权利，由政府方面委派的两名视察员行使。

在上一次报告所包括的期间内，向监督机关报告的在使用机器的企业里发出的工伤事故有 327 起，实际上比这多得多，因为有大量工伤事故没有上报。

由于违反上述法律的行为，在同一时期内对雇主提出了 50 起诉讼案件，然而这些诉讼案照例是以判处少量罚款作为了结。

* * *

1870 年丹麦工人开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分支机构。

政府不久就取缔了这个组织，把它的领导人关进了监狱，并企图用一切手段把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下去，然而枉费心机。

从那以后，丹麦工人在两个基础——政治基础和行业基础——上进一步组织起来了。

名叫“社会民主联盟”的政治组织，包括 140 个团体，共有约 17 000 个成员。在这些团体中有 90 个农业工人协会，它们的会员约有 6 000 人。

行业组织包括 300 多个团体，大约有 35 000 个成员，不下 12 个行业，这些行业是：木工、泥瓦工、细木工、卷烟工人、裁缝、织工、制桶工、铁匠和机械制造工、杂工、画匠、白铁匠和鞋匠。他们都有强大的、组织得很好的协会，这些协会在全国都建立了

广泛的，为数众多的分支机构。

此外，全国各地的印刷工人也彼此建立了组织联系。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实际上比上面那些数字所表明的还要大，因为许多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一部分由于贫穷，一部分由于雇主方面施加的压力，未能成为各种协会的成员。

哥本哈根的行业组织通过一个共同的中央领导机构而联合起来，这个机构的名称叫做“共同行动行业协会”。哥本哈根各行业协会理事会负责组织全体讨论会，选举了一个事务管理委员会来处理日常事务。

在许多较大的首府里也成立了类似的共同的代表机构。

政治组织（社会民主联盟）是由 17 名选举出来的委员组成的总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党的国会议员和党的机关报的编辑也是总执行委员会委员。在 17 名选举出来的委员中，有 7 名来自哥本哈根，其余 10 名来自全国各地。

整个国家分为 9 个宣传鼓动区，其中每一个区由一个宣传鼓动委员会负责。

这些行业组织以及政治组织通过发表宣言、出版物等，共同发挥作用。

今年 5 月 3 日（星期天）组织了一次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大规模游行。参加这次示威游行的人单是在哥本哈根就有 60 000 党员，在各州首府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有大批农业工人参加。

丹麦社会民主党办了 5 种社会主义报纸；在哥本哈根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每天发行 22 000 份，其余 4 种报纸在日德兰出版，总共发行 6 000 份。

此外，党还出版了一份社会主义的讽刺幽默报纸《乌鸦》。

其次，我们党还出版了一系列社会主义著作和小册子，其中只需提一下下面这几种著作就够了：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贝努瓦·马隆：《社会主义史》；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党用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拉萨尔、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威·白拉克、多梅拉·纽文胡斯、保尔·拉法格等人的社会主义著作，一部分是用原文出版的，另一部分则是译成丹麦文出版的。

丹麦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有5名议员，他们是：P. 霍尔姆同志、C. 赫尔杜姆同志、哈拉尔德·耶恩森同志、C. C. 安德森同志和彼·克努森同志，其中前面三人是福克庭（众议院）议员，后两人是兰德斯庭（参议员）议员。

在国会里，丹麦社会民主党党团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参与一般立法。

丹麦社会民主党党团向国会提出了几项自己制定的法案，在这里只需提到其中的一项法案，即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法案就够了。

* * *

关于丹麦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在党员彼·克努森同志出版的一本统计学著作中有详细的阐述。根据这部著作的统计，工人的平均工资如下：

	年平均工资（克朗）
哥本哈根的手工工人（熟练工人）	754—884
哥本哈根的工业企业工人（非熟练工人）	711
哥本哈根的挖土工人	500—600
各省会的手工工人和工人	600

膳食自理的农业工人 371-- 400

膳食由雇主提供的农业工人 224—238

在工业企业里劳动的男工将近 83 000 人，其中约有 52 000 人要挣钱养家。

农业工人将近有 133 000 人，其中约有 125 000 人要挣钱养家。

工资和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很不协调：38 000 户或 70% 的工业工人家庭（农业工人家庭自然不包括在内），根据科学的计算，每年短缺 400 克朗的生活费用，这些家庭缺乏足够的食物。

至于其余的家庭，工资也同样不够用，即使短缺的程度不那么严重。

* * *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丹麦社会民主党通过两条途径进行斗争：既通过政治的途径，也通过行业的途径。

在政治方面所作的努力，上面已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就行业方面来说，斗争始终持续不断，有时是进行罢工，有时是同雇主进行谈判。

结果是各不相同的，不过在大多数行业工资情况在颇大程度上有了改善；同样，在别的方面，例如，在缩短工作时间方面，——现在在大部分行业中工作时间已限定为 10 小时，——在对工人采取较人道的态度方面，等等，情况也有所好转。

目前哥本哈根的家具工人正在进行顽强的斗争，争取保住两年前在雇主们上演的同盟歇业把戏后取得的较好的工资待遇，现在雇主们又想把这种较高的工资从工人们那里夺走。

这次罢工已持续了 7 个月，看来有希望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结束。

* * *

在我们向国际社会党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提交本报告的时候，我们以整个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向大会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彼·克努森 西格瓦尔德·奥尔森

马丁·奥尔森

1891年8月于哥本哈根

农业工人

丹麦社会民主党对农业工人问题的态度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一切国家中都是首先在工业工人当中开展起来的，并且主要是由工业工人来进行的。只有在较晚的阶段上，农业工人才开始接近这个运动。无疑还有一些这样的国家，在那里社会主义至今还没有传播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当中去。

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在促进它的一般目的——使劳动资料社会化和推翻资本的统治——的实现的过程中，对工业工人的特殊利益的关心应超过对单独涉及农业工人的那些狭义上利益的关心。

然而社会民主党为了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有计划地也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取得联系。为此目的，它必须努力指出能够促使土地转化为公有财产的办法。同时，也同样有必要弄清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用什么方式方法能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争取到较好的生活条件。

在那些绝大多数居民都靠农业为生的国家里，必须首先把这一点当作自己的目标。

丹麦无论如何是属于这类国家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比例，稍后，我们将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丹麦社会民主党近年来在农业工人中获得了颇大的发展。一

方面，由于这种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对这个国家的农业工人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的认识的加深，丹麦社会民主党在其最近两次代表大会上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

不过在我阐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之前，我将对我国农业的一般状况作如下概述。

丹麦的土地和对土地的经营

丹麦的土地（水面不包括在内）约有 689 平方丹麦里。

一平方丹麦里稍稍超过 55 平方公里。因此丹麦的土地面积约等于 37 964 平方公里。

丹麦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叫做“峒”（Tonne）。1 峒土地等于 14 000 平方埃勒（Elle），或者约等于 55 000 平方公尺，或 0.55 公顷。

因此，按照丹麦的丈量尺度，1 公顷约等于 $1\frac{4}{5}$ 峒土地。1 平方丹麦里约等于 10 000 峒土地。

从土地经营的方式来看，这 689 平方丹麦里分成以下几类：

耕地、草地、园圃	约 $513\frac{1}{2}$ 平方丹麦里
森林	$37\frac{1}{3}$ 平方丹麦里
荒地	$86\frac{1}{2}$ 平方丹麦里
沼泽	$21\frac{1}{2}$ 平方丹麦里
流沙地	9 平方丹麦里
多石地	5 平方丹麦里

因此未开垦、未耕种的土地面积总计约 122 平方丹麦里，也就是说，约占全部土地面积的 $\frac{1}{5}$ 弱 $\frac{1}{6}$ 强。

未计算在上面列举的统计数字中的那部分土地为建筑工地、庭院、荆棘灌木丛、道路等等所占据。

税收单位和财产形式

在丹麦通行的地产税的单位是 1 吨谷物。

土地的肥力不同，对其征收的赋税的税率也不同。最肥沃的土地大约每 6 峒征收 1 吨谷物，反之，全国的耕地平均计算大约每 17.3 峒土地征收 1 吨谷物，而在国内土地税额定得最低的那部分地区，甚至 43.5 峒土地才交 1 吨谷物。

丹麦的全部谷物约有 382 000 吨，其中约 7 000 吨由各城市消费，其余的约 375 000 吨归农村地区本身消费。

下面的阐述只涉及真正的农村地区。

在丹麦从事农业的人的财产分为“庄园”和“家园”两种。

庄园又分为“大庄园”或“地主庄园”和“农民庄园”两类。“大庄园”或“地主庄园”指的是按照上面所说的标准计算缴纳 12 吨以上谷物的地产。凡是缴纳 1 吨到 12 吨谷物的地产都算作是“农民庄园”。

丹麦农业地区的“大庄园”或“地主庄园”有 2 041 个，它们缴纳的谷物约 57 000 吨。

“农民庄园”约有 73 000 个，它们缴纳的谷物约 274 000 吨。

“家园”分为“有耕地的家园”和“无耕地的家园”两种。凡是拥有缴纳 1 吨以下谷物的地产的家园都叫做“有耕地的家园”。“无耕地的家园”只占有少量土地。

“有耕地的家园”约 152 000 个，“无耕地的家园”约 37 000 个。前者总共缴纳约 41 000 吨谷物。

“大庄园”或“地主庄园”的平均土地，按上述纳税标准计算，相当于缴纳约28吨谷物的土地。“农民庄园”的平均土地相当于缴纳4吨谷物的土地。

“有耕地的家园”的土地平均占有量只相当于缴纳约1/4吨谷物的土地。

约58 000个农民庄园是它们的所有者的自由财产。其余的农民庄园是“租佃庄园”，它们依附于大庄园，每年必须向大庄园的所有主支付一定报酬。这类租佃庄园中大约有10万个被承认是“可以继承的”，它们的占有者不仅有权把这些庄园作为遗产传给他们的后代，而且还有权出售这些庄园或把它们当作抵押品，这一切都在他们的占有权范围之内。由此可见，这类庄园差不多也是它们的所有者的真正财产。其余的约5 000个“租佃庄园”则在较多的限制条件下交给它们的所有者经营。

在家园中约有156 000个（包括无耕地的家园在内）或者是它们的占有者的财产，或者是保持着继承租佃关系的家园。其余的约33 000个家园按照下述两种方式之一交给它们的占有者使用，但占有者每年必须向所有者缴纳报酬。这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是，所有者的权利要求在所有者去世后即行终止（“租佃家园”）；另一种是，到一定期限后所有者的权利要求可以宣布作废（“租赁家园”）。

家园的所有者称为“家园主”。农民庄园的所有者称为“庄园主”。家园主照例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耕地的附属物^①——耕地一般都有附属物——给他们带来的收获不够他们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家园主都不得不为大庄园主和其他占有

^① 指耕种土地所需的农具、牲畜等。——译者注

较多土地的地主提供雇佣劳动。

采邑和不能转让的世袭地产

丹麦地产的占有形式还有以下两种，即不能转让的世袭地产和采邑。属于这类地产的在丹麦有 19 个伯爵领地、14 个男爵领地、37 个封建家族祖传家园和 9 个“不能转让的世袭地产”，后者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名称，只是因为它还不够大，不能归入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类。

这 79 个庄园总共生产 37 500 吨谷物，约占全国谷物总产量的 1/10。

所有这些庄园都是国有财产。它们当中的大部分起初都是由丹麦的专制君主授予某个贵族的，而且是按下述方式授予的，即该贵族本人和他的后代虽然享有受益权，但那些庄园却不是他们自己的财产。

在前面提到的“庄园”和“家园”两类土地的划分中也包括不能转让的世袭地产在内。

一个采邑或不能转让的世袭地产通常都包括几个庄园——既有地主庄园，也有农民庄园——和家园。

教士庄园

丹麦的僧侣（哥本哈根和各省会的僧侣除外）可以利用一块或大或小的地产以及属于该地产的建筑物作为他们所领取的奉禄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就称为“教士庄园”。丹麦的教士庄园共有 951 个，属于它们管辖的土地总共生产约 7 000 吨谷物。

这些教士庄园中有一些和地主庄园完全一样，或者说，在它们的利用上比起地主庄园来毫不逊色。——有 77 个教士庄园每个庄园所生产的谷物不少于 12 吨至 20 吨，有 116 个教士庄园每个庄园所生产的谷物不少于 10 吨至 12 吨，其余的教士庄园每个能生产 6 吨至 10 吨谷物。

在丹麦的 3 个行政区，即哥本哈根州、腓特烈堡州和霍尔拜克州，共有 40 740 个“有耕地的家园”，这些家园生产的谷物不超过 7 000 吨左右。951 个教士庄园所占有的土地刚好等于 40 740 个家园拥有的土地的总和。

地 产 抵 押 债 务

丹麦地产的全部价值估计约为 40 亿克朗（1 克朗 = 1 马克 12 芬尼）。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部分土地是归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占有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己的财产越来越成问题，因为不断增长的土地抵押债务把财产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大资本的手中。

在丹麦为占有土地而担负的土地抵押债务总计约有 17 亿克朗。在 1866—1885 年这段期间土地抵押债务增加了约 7.73 亿克朗。具体地说，在 1866—1870 年这 5 年间增加了 1.3 亿克朗，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增加了 2 600 万克朗；在 1871—1875 年这 5 年间增加了 1.87 亿克朗，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增加了 3 700 万克朗；在 1876—1880 年这 5 年间增加了 2.25 亿克朗，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增加了 4 500 万克朗；最后在 1881—1885 年这 5 年间增加了 2.31 亿克朗，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增加了 4 600 万克朗。

这些数字是土地抵押债务净增的数额，因为在同一时期内已

经结清了的债务，已被扣除而没有计算在内。

如果丹麦的全部土地抵押债务的利息按年利率 4% 计算，那么土地占有者每年必须向抵押土地的所有者缴纳的税就总共有 6 800 万克朗。

丹麦国库的年收入约为 5 400 万克朗。因此，丹麦的土地占有者每年必须向资本家缴纳的税，比丹麦国库每年的进款大约还多 1 400 万克朗。

如果上面提到的丹麦土地占有者必须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资本家的那笔钱，不是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而是作为工资分配给农业工人，那么每一个农业工人的工资每年大约可以增加 500 克朗。

农业工人的人数

根据 1880 年的人口调查，丹麦的全部人口为 1 969 039 人，其中居住在哥本哈根和各州首府的城市居民为 515 758 人，其余的 1 453 281 人则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3/4，而哥本哈根和各州首府的人口加起来仅仅约占全国人口的 1/4。

全部农业工人主要由前面提到的“家园主”构成。不言而喻，没有耕地的家园主是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大多数有耕地的家园主也同样要到农民庄园主或大地主那里去寻找生计，因为他们自己拥有的地产照例远远不能提供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资料。此外，家园主照例还必须为大地主干活——多半是干收割的工作——作为家园主在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大地主向他们免费提供畜力的报酬。

在农村，有相当大一部分房屋是由于手工业者、商人、教师、渔

夫等人居住的。因此，“房主”的人数和房屋的数目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农村除了房主之外，还有另一类工人，即所谓的“租单间的人”，他们由于租不起一座房子，只好满足于一间屋子。

在农村完全靠做零工或者主要靠做零工为生的男工总数将近 133 000 人。此外，在农业地区替地主家当佣人的男工还有大约 90 000 人。

现在把城市的情况简单叙述一下，以作一个对比。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男工，包括哥本哈根和各州首府的短工在内，总计约 83 000 人。在哥本哈根和各州首府当佣人的男工约 8 000 人。

农业工人的劳动条件

丹麦的农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考察，他们的处境是最悲惨的。雇主支付给他们的报酬有时完全是货币，有时是货币加食物。纯粹的农业工人的工资通常是按日计算的，而佣人的工资则是以一年或半年为期计算的，此外东家还向他们提供膳食和住宿。下面的阐述只涉及工资按日计算的纯粹农业工人。

扣除雇主提供的膳食费用之外，在夏季农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约为 90 欧尔（约合 1 马克），但是实际的日工资往往低于这个数目，在许多情况下，它被压低到 50 欧尔，甚至比这还少。在收获季节的少数几个星期里，工资有所提高，具体地说，平均可以提高到 1 克朗 33 欧尔和 2 克朗，但是它也经常降低到 83 欧尔和 1 克朗以下。在冬季平均工资不高于约 60 欧尔，而且经常降低到 25 欧尔，甚至还降低得更多。

如果工人自备膳食，在夏季平均工资标准约为 1 克朗 33 欧尔

至 1 克朗 50 欧尔，但经常降低到 1 克朗。而在收获季节，自备膳食的工人的平均工资为 1 克朗 60 欧尔至 2 克朗，但是它也经常下降到 1 克朗和 1 克朗 33 欧尔。在冬季，自备膳食的工人的平均日工资在 1 克朗 10 欧尔至 1 克朗 20 欧尔之间。有时雇主往往只同意每日付给 1 克朗的报酬。我们也看到在冬季工资标准被压低到 50 欧尔，甚至 50 欧尔以下的大量例子。

在农业企业中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添置机器，这使越来越多的农业工人遭到失业。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工资情况每况愈下。一个农业工人的年收入，如果膳食由雇主提供，平均为 224—238 克朗，但是往往降低到 150—200 克朗。自备膳食的工人的年收入，平均可达 370 克朗左右，但是经常降低到 300 克朗，甚至比这还少。

人们立即可以看出，一个农业工人的劳动报酬这样少，是不可能以符合人的尊严的方式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生活的。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法尔贝-汉森几年前作过一个计算，一个只有两个成年人和两个儿童的农民家庭，如果要过勉强能维持温饱的生活，每年必须要有 500 克朗的生活费用。毫无疑问，要获得真正良好的、充分的营养，需要更多的开支。然而即使根据法尔贝-汉森教授的计算，只需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农业工人，为了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勉强能够维持温饱，每年都缺少 130—200 克朗。至于那些有 5—10 口人的大批工人家庭所过的生活还要悲惨得多，那就更不言而喻了。

景况最坏的工人家庭，是它们的供养者需要雇主提供膳食的家庭。这种工人的货币工资有一部分要被扣除，这就使得他们更难维持他们的本来就很难维持的家庭生活了。这种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一般每年只有大约 20—50 克朗的营养费，或者就全家来说，

一年的营养费还没有雇主因向其丈夫一个人提供膳食而从他的货币工资中扣除的那笔钱那样多。

由于丈夫不在家里吃饭，全家的伙食费简直少得可怜。吃的东西几乎只有土豆、面包和一点点脂肪以及大麦粥。但是，就连这些廉价的食物也不能比较充分地得到保证，因为少得可怜的工资买不起。

同这种营养不良的饮食比较起来，居住条件的恶劣和衣着的寒碜更令人触目惊心。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要求

丹麦社会民主党不相信，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农业工人（以及其他的工人）的状况能够得到充分改善。因此党始终认为，必须把劳动资料转归全民所有，以便由社会来调节全部产品。

基于这一基本要求，丹麦社会民主党也为解决尽可能改善包括农业工人在内的全体工人的状况这一问题而奋斗，保护劳工的要求；其次，通过立法途径来调节的和缩短了的工作日的要求，改进整个教育制度，尤其是在儿童学习期间向他们免费提供膳食的要求；最后，提供合理的医疗服务和给老年人以人道赡养的要求——这些要求，以及丹麦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许多其他要求，指出了既使农业工人的也使工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的途径。

除了这些总的要求而外，丹麦社会民主党还提出以下专门涉及农业和农业工人的要求：

“采邑和属于教士庄园的土地应予以没收，其他正在出售的地

产应由国家收购。

荒地和其他未开垦的土地应收归国有，以便在条件许可时对它们进行开垦、经营等等。

国家把属于它的和按照上述办法收归国有的一切不动产的经营权和受益权都交给农业工人，以便使土地得到开垦和耕种，同时还向农业工人提供必要的经营手段，使他们能够受益。

国家应扶植对地产的经营并努力简化土地转让归国有的手续。为此目的，国家把土地抵押银行纳入国家机构，其任务是接受土地作抵押以提供贷款。

国家在最合理的范围内在农业中促进合作社经营方式的发展，使从事合作经营的工人也能获得充分的劳动收益，当然要扣除按规定应向国家缴纳的税。

由国家出资把一部分属于国家的土地办成示范农场。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农村家政学校，使家园主和农业工人能在这些学校中接受义务教育和上进修班。

国家制定一套修建出租住宅，出租房屋和佣人居室以及关于利用和进行适当监督的制度。”

没收不能转让的世袭地产和属于教士庄园的土地

如上所述，在丹麦有 79 个采邑和不能转让的世袭地产，它们总共提供 37 000 吨谷物，这些地产，根据上面说明的情况来看，已经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财产，它们的受益权是从前的专制君主授予某些贵族家庭的。

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贵族家庭为了使它们的地产长期集于一人之手，便把它们置于国家的监护之下。这样一来，这些地产就

其占有和所有权来说，基本上获得了和国家元首直接赠给贵族作为他们的采邑的地产相同的形式。起初现在属于这些地产的土地是从农民那里夺去的，尽管农民现在甚至成了国家元首或封建主的负担。那些地产的来源，是一大批村庄被毁灭、农民等级的财产被剥夺和他们被逐出自己的庄园与故乡的历史。那些地产由国家元首赠给各个不同的贵族家庭，作为对它们在宫廷中所过的寄生生活的酬劳，或者出于类似的动机。下面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形。

位于西兰岛的荷尔斯泰因堡伯爵的领地就是国王腓特烈四世送给他从前的游玩伙伴荷尔斯泰因伯爵的礼物。同样位于西兰岛的布雷根特维特伯爵领地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同。布雷根特维特的这份地产是国王腓特烈五世送给亚当·哥特洛布·毛奇伯爵的，后者不久前才从梅克伦堡迁到丹麦来定居。这个人到丹麦来的时候还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贵族，但他去世时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富的大地主之一。布雷根特维特伯爵领地占有的土地达1万峒(=1平方丹麦里)。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类例子来证明采邑是怎么产生的。

除了土地之外，属于整个采邑和不能转让的世袭地产的东西，在丹麦还有一种所谓“不能转让的世袭资本”，这种资本总共约有1亿克朗。

这类采邑和不能转让的地产无疑还没有完全失去国家财产的性质，然而它们的受益权已经授予贵族家庭。面对这一情况，丹麦社会民主党要求，特权应予废除，土地必须重新由国家收回。同样，在国家对地产的关系不像在国家保留所有权的情况下那样肯定无疑的一切场合，社会民主党也要求废除那些允许地产集于一人之手，由他长期占有的特权，并要求采取措施，使这些地产尽

快交到国家手中，成为国家的财产。

根据党纲中规定的我们党对宗教所采取的立场，社会民主党对属于教士庄园的土地的观点是明确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件私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那些自愿结合起来组成宗教团体的人，对他们的神职人员也必须给予报酬，因此，神职人员的解雇也是一件和国家毫不相干的事。不过我们特别认为，如果国家本身把地产作为神职人员的奉禄的一部分而交给他们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党的这个要求希望达到的结果是，属于教士庄园的相当大一部分耕地，应当从神职人员那里收回而由国家用于别的目的。

至于按照我们的意见，国家在把采邑和不能转让的地产以及属于教士庄园的地产收回以后，应当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土地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比较深入地谈一谈。

如何开发和经营未开垦的土地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在丹麦未开垦的土地面积不下 122 平方丹麦里，或者说，介于全国土地面积的 $\frac{1}{5}$ 和 $\frac{1}{6}$ 之间，在这些未开垦的土地中，除了沼泽地和泥炭地而外，荒地共占 108 平方丹麦里，或者说，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frac{1}{6}$ 弱 $\frac{1}{7}$ 强。社会民主党向国家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对这些荒地的大部分进行开垦，使它们在经济上能够带来收益。

今天野草丛生的荒地，几乎完全是由本来完全适宜于耕种或培育森林的土壤变成的。在荒地上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残存的树桩。这证明，从前这些荒地是大片森林。同样，在别的荒地肯定也有不少表明其中大部分土地从前被人耕种过的标志。因此，毫

无疑问，对这些荒地重新进行合理的开垦，或者种植树木和加以利用，是可能的。

沼泽地大部分照例比真正的荒地更有用。特别是沼泽地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氮，如果把沼泽地的土壤同其他比较贫瘠的土壤掺和在一起，那么沼泽地的这种性质就能够使它变得非常有用。

最近几年来，丹麦的一部分荒地和沼泽地已经得到开垦：或者种上了庄稼，或者栽上了成材的树木，而这主要是私人发挥主动性的结果。在这方面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日德兰垦荒协会，该协会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国家每年都向这个协会提供津贴，不过津贴多少在不同年代是不相同的。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笔津贴总共达89 000克朗。此外，国家还自己出资在荒地上植树造林。

但是这些努力还不够，还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迄今为止在开垦荒地方面所进行的工作，绝大部分是贫穷的居民承担的。当然垦荒协会对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援助和支持。这种援助和支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如何开垦荒地进行实际指导，铺设输水管道，修桥筑路，建立种植园和开办植物栽培学校，荒地的居民可以从种植园和植物栽培学校得到幼苗来进行栽种。

然而，不言而喻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私人努力是完全不够的。私人垦荒者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必然希望尽快从他投入的劳动和费用中获得收益。如果长期得不到收益，那么他照例必然会重新放弃劳动，而经验随后也会教训许多已经开始进行垦荒的志愿者不得不重新放弃这项事业，或者因为他们的贫困不允许他们继续垦荒，或者因为他们栽培的作物不能非常迅速地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收益。

相反，对于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尽管通过一代人或两

代人所能获得的收益绝不是国家在开垦荒地方面投入的劳动的完全等价物，但是国家（也就是全体人民）还是得到了一种极大的好处：迄今为止尚未带来收益的土地被开垦了，变成有用的土地了。对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把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变成富饶的和令人羡慕的地方，使这块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哪怕真正的收益只有过了几代人以后才足以充分抵偿所投入的大量劳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国家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基于这些理由，丹麦社会民主党要求国家把荒地和其他未开垦的土地收归国有，以便进行开垦和耕种，使之造福于民。

在现存社会条件下如何利用国有土地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国家现在占有的，或不久后还能占有的土地，有相当大的数量，采邑和不能转让的地产以及属于教士庄园的土地能够生产约44 000吨谷物，约占全国全部谷物产量的11%。荒地和沼泽地，正如上面所说的，约有108平方丹麦里，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全部土地面积的1/6和1/7之间。仅仅教士庄园所生产的谷物就差不多和40 000个“有耕地的家园”所生产的一样多。

要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国家应如何利用它所拥有的土地？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必须坚持的第一项要求是，一旦收归国有的土地，绝不能再变成私有财产。社会民主党要求，一切劳动资料都应成为公共财产，尽管在现在这种形式上的国家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然而也没有任何障碍会妨碍国家现在就把土地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办法有两个：或者通过开垦荒地，或者通过废除地产占有者的特权和权利，例如，废除神职人员占有大

量土地的特权和权利来把土地变成全体国民的财产。当劳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的时刻到来时，如果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已经不再是私有财产了，那么，我们在实现生产组织社会化方面就已经走了——大段路程。

由国家占有的土地决不能再交给私人作为他的财产，也不应由国家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来经营，因为这样做只会造成如下结果，即耕种土地的农业工人将不得不在跟他们现在所处的同样艰苦的条件下劳动。此外，这些农业工人会受到极大的束缚。资本主义国家会用今天大地主剥削和压迫农业工人的同样方式来剥削和压迫他们，也许甚至还更厉害一些。

这样做在国民经济方面也没有为农业工人争得什么。此外，不应忽视，土地私有制反正会越来越明显，因为真正的所有权通过土地抵押贷款和企业贷款会越来越多地落入提供贷款的人即银行家和其他资本家的手中。因此，土地作为财产来转让对农业工人来说也是毫无裨益的。

丹麦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开发利用国有土地的方法，正像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概括在下面这个纲领要点中：

“国家把一切属于它的和按照上述办法收归国有的不动产的经营权和受益权都交给农业工人，以便使土地得到开垦和耕种，同时还向农业工人提供必要的经营手段，使他们能够受益。”

由此可见，只有土地和经营手段的**受益权**应交给农业工人，而土地本身和经营手段仍然归国家所有。受益权必须按照下述条件交给农业工人，即从经营中获得的全部纯收益应归有关的工人所有。

在把受益权交给农业工人的同时，必须注意最大限度地实行土地由几个农民共同耕种的经营方式。因为小规模经营是不经济

的，而大规模经营在经济上有巨大的优越性。这一原理在农业中也像在工业中一样行之有效。因此，必须立即进行宣传，使人们认识到，把土地划分成小块来经营无论对单个人来说还是对全体国民来说都是不利的，只有合作经营才是唯一有效的形式。

有鉴于此，丹麦社会民主党要求国家开办农业家政学校，对家园主和农业工人实施义务教育，同时创办示范农场，它的宗旨是，使那些献身农业的人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和本领。

从经济方面来看，这些措施可能会对农业工人的地位产生以下影响：

假定受益权交给农业工人之后，每一个享有一部分受益权的工人，像往常一样劳动，从土地的收益中得到的收入基本上多于今天支付给一个农业工人的劳动报酬，那么，立即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不单是那些得到国有土地受益权的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将会改善，而且还会为其他的人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状况。如果说今天我国大部分地区农业人口的数目都在减少，那么上面提到的那些措施将使农村经济能够养活比现在还要多得多的人口，而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显然会对那些今后还要在私人雇主那里找活干的工人的工资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丹麦社会民主党还努力用倡导其他新的经济活动的办法使农业工人的社会状况得到改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建议的这些措施显然有助于向生产社会化的过渡。被授予国有土地受益权的那些农业工人所获得的较好的社会条件，会使这种制度扩大，使它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甚至在私有财产主那里也能赢得拥护者，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财产状况，正如我们往后会看到的那样，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以致私有财产对他们来说已丧失其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制度中全部生产在最牢固的

基础上的合作化将会出现，而且是一举完成，因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必定会带来大得多的经济效益，还因为，一般说来，只有按照合作社的劳动计划实行经营的制度才能经受得住考验，才能创造出丰富的好经验。

今天国家对财产及其所有者的态度

上面已经提到，丹麦的地产承担着大约 17 亿克朗的抵押债务。这笔抵押债务在继续增加，只要地块还有足够的价值使提供的贷款有足够的安全保证，这笔债务增加的势头就会长期保持下去。抵押债务增加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地块从一个占有者手中向另一个占有者手中的转移，这种转移有时是通过买卖来实现的，但是有时是通过另外的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继承的方式**来实现的。今天如果一个土地所有者去世时留下好几个孩子，那么，那个继承父亲的全部产业而不把它分给别人的孩子，照例必须举借一笔新的抵押贷款，以便能够把其余的子女各人应得的一份遗产支付给他们。

土地抵押债务就这样不断增加，于是，真正的产权就越来越多地从它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提供贷款者，即银行和其他资本家手中。所谓的所有者越来越多地只保留着名义上的所有权，只要他们付不起利息和交不出税款，他们的所有权就会立即丧失。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越来越多地沦为租地农民，这种农民用每年偿付一定的款项（利息）的办法所获得的东西，不过是已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的地产的受益权而已。

使人们真正了解农业企业中的所谓财产目前的状况，必定会使社会主义更加容易地在农业人口中赢得同情和支持。通过这种

宣传人们会认识到，“社会党人想夺走农民的土地！”这一陈词滥调不过是一句蠢话，而实际情况却是：夺走农民土地的正是日复一日地在农民的地产中打开越来越大的缺口的**资本家**。其次，农民还会认识到，土地转变为合作社财产的目的决不是要**剥夺**农民的财产，而是要使农民以公民的资格**享受**他们对土地享有的天然权利，也就是说，让他们分享合作社的共同财产，而这是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目的之一。

因此，如果情况是这样，即土地的实际所有权通过抵押的方式转入私人资本家手中，那么丹麦社会民主党认为，国家现在已经能够用建立土地抵押银行的办法使这些资本家成为多余的。土地所有者现在试图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帮助，他们随后从国家那里也可以得到，而且他们完全有希望以比他们从他们现在的“帮助者”那里获得帮助的条件公平得多的条件从国家那里获得必需的帮助。如果国家通过这种银行成为抵押土地的所有者，那么，它也会起到我国土地的真正所有者的作用，就像今天私人资本家所起的作用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普遍转化为合作社财产就只是一件无须费多大周折就可以办到的事情。

为了改善目前的状况，丹麦社会民主党同时还要求国家尽量购买土地，而且国家对用这种方法获得的土地的处置方法，应和对那些由于改良土壤或者由于废除地主和神职人员的特权而转归国家所有的土地的处置办法一样。

这些要求和我们在上面较详细地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观点所持的出发点是，应尽量没收私有地产，并按照我们建议的办法把没收来的地产变成合作化生产的基础，做到土地收益必须归促进生产的劳动者所有。

关于改善农业工人生活状况的其他建议

缩短劳动时间

丹麦社会民主党根据自己的纲领提出的一项要求是规定最大限度的工作日。我们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致，要求把8小时作为最大限度的工作日的标准。我们党怀着这个目标向丹麦国会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法案，要求予以通过。考虑到农业工人的情况，在法案中我们的要求是这样表述的：

“第2条 在第1条第1款中提到的劳动时间（8小时）也适用于在其他行业，例如在农业、林业或挤奶业中干活的、年龄超过14岁的两性工人（包括帮工和学徒工在内）。不过对农业来说，家务劳动和下面这些同农产品的生产直接有关的劳动除外，如耕地、播种、饲养牲畜、收割草料和庄稼、把收获的产品运回家和把泥炭运回家等。

反之，在第1条第1款中提到的劳动，如修路、施肥、排水、开采泥炭、挖沟开渠等，则应遵守八小时制度。”

“第5条 内政部应尽快就第2条中提到的那些例外情况提出报告，以便确定在上面列举的那几类劳动中可以把劳动时间限制到何种程度的细则。这些细则随后应通过立法手续确定下来。”

由此可见，尽管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现在就已经能够限制在8小时以内，但是在人们就各行各业能在多大范围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一事作出决定之前，我们还得征求许多专家们的意见。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在一定的季节

需要完成某种劳动（例如收割庄稼的劳动）时，气候往往会起妨碍作用，因此，如果刻板法律规定必定会使个人或全体的大量财富有遭到毁坏的危险时，那么这样的立法是不应得到通过的。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精确地规定，在考虑工作日的标准化时气候条件的影响有多大的作用。仔细的研究肯定会证实，八小时工作日对于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的工人来说一般是行得通的，延长劳动时间只是在个别特殊情况下才有必要。在瑞典，由于私人倡议（主要是根据工人方面的要求）在许多庄园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定为 10 小时和 11 小时。由此可见，把劳动时间限定为一定的小时数，这一原则已被承认是行得通的，至于究竟应限定为 8 小时还是 10 小时，这个问题只有次要的意义。这个问题在多数场合都会由有效率的劳动力的增加来解决。

在我们提出的法案中，我们要求上面提到的征求专家的意见应由国家出面主持，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好的、最可靠的方式进行必要的调查，这是因为国家拥有私人所缺少的手段。不言而喻，这一要求并不妨碍我们党在此之外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以便加速解决这个问题。

劳 工 保 护

在丹麦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除每天的劳动时间之外，在其他领域内涉及劳工保护问题的要求表述如下：

“通过工人协会和仲裁法庭对劳动和工资的情况进行监督，以便调解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纠纷。

目前被置于特殊法律管辖之下的仆役、海员和其他同胞，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应和其余的公民地位相等。

禁止在星期日、节日和夜间加班，不应出于国民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认为有此必要。

对工人住宅和指定工人在那里停留和睡觉的地方进行卫生检查。

由工人推选的人员对工作场所，即工厂、作坊和经营场所，以及对商业和鱼业的运输工具进行监督。”

这些有关一般的劳工保护的要求，当然也适用于农业工人，不过除此之外，党纲里还为农业工人提出了在这个报告中已经加以阐述的如下要求：

“国家制定一套修建出租住宅、出租房屋和佣人居室以及关于利用和进行监督的制度。”

在党纲中提出这个特别用来保护农业工人的要求并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国的农业工人，尤其是从居住条件方面来看，比工业工人的境况还要糟糕得多，因为他们的住宅大部分都极其简陋。丹麦政府在1875年成立的工人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在农村较好的工人住宅的数量同大量农业工人不得不租赁来居住的无数简陋的住宅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委员会还承认，一大批农业工人今天的居住条件比上一代人的居住条件还差，住得比他们还挤。

因此，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更差了。不仅那种东倒西歪的老房子（在上面的叙述中它们已遭到了谴责）条件很差，就是新房子也是这样。在《丹麦统计学》这本学术著作中强调指出，丹麦缺少农村地区建筑法。只有有了这样的法律，才能促进更多更好地建筑主要是用来出租的房屋的事业。该书谴责现在正在农村里建设的出租房屋，说它们“往往是不负责任地粗制滥造的产物”。工人委员会关于这类房屋的评语

是，所用的材料是劣质的，建筑地点也选择不当，因此，房屋往往建筑得很糟糕，毫无舒适可言。

这些指摘表明，农业工人的住宅有一部分，而且显然是大部分，建筑得非常糟糕，它们是用劣质材料建成的。由于它们的不讲求实效的安排，建筑地点不卫生，它们对工人的健康非常有害。不仅如此，这类房屋还有更大的害处。大庄园主们往往利用收回出租房屋作为一种强制手段来把那些由于采取了独立自主的行动而遭到主人忌恨的工人逐出家园。这种做法对那些为庄园主当固定长工、作为他们的报酬的附加物允许他们在一间属于庄园的所谓雇工房居住的工人来说，是特别不利的。这类房屋在全国都遭到人们的切齿痛恨，因此被称为“奴隶制牢房”。

为了根除这种现象，丹麦社会民主党要求对这类房屋以及在它们的使用、建筑和安排的安全细则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极其必要的，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

教 育 事 业

丹麦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而农业工人的贫穷自然更加剧了由此产生的弊端。

学生在公立学校受教育，公立学校受乡镇监督。在这种学校里，一名教师在非常差的教学条件下，必须教育多至 100 名年龄不等的儿童。从前全部农村居民中的儿童都要上公立学校，但是最近几年来，大多数公立学校只有农业工人的孩子才经常上学，而有产阶级现在在农村已为有产者的子女建立了自己的学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受有产阶级代表控制的乡镇，更不愿意考虑如何改善公立学校的状况了。

为了证明乡镇对公立学校多么不关心，领导多么不得力，我们在下面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有一个乡镇，年龄已经适合到公立学校去念书的儿童有 100 名，可是这个乡镇却只有一位老师来教所有这些儿童；后来它接到文化大臣的指示，要扩大这所学校，还要聘请第二位老师。然而它却拒绝服从这个指示；它对大臣告了一状，并在全国最高法庭上打赢了这场官司。由此可以断定，乡镇有权让 100 名儿童在一所学校里由一位老师来教书。不言而喻，把持着乡镇的有产阶级的代表会利用这个权利。要知道在公立学校受教育的不是有产阶级的孩子，而只是农业工人的孩子！情况就是这样。很明显，乡镇宁愿节省开支，也不愿让工人的子女受到正规教育。

每一个人在心里都会想，像一名教师必须教 100 名儿童这样一种教育，不可能取得什么特别的效果，即使这种状况还没有因为下述原因而进一步恶化，即农业工人由于贫穷不得不耽误他们的孩子上学的机会。一个有好几个孩子的农业工人，仅靠他那点少得可怜的报酬，是无法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因此，他不得不让他的孩子们去给农民干活，通常是照看牲畜，以便挣一点钱来弥补家用。他们上学的时间自然要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便在农民那里尽量多干些活。结果自然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儿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的是，宗教课又占据了节省下来让儿童去上学的那点时间的绝大部分。

考虑到教育事业的状况，丹麦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提出以下要求：

“教育事业应由国家承办。儿童应全天受教育。应实施免费的、公共的和义务的（强制性的）教育。国家免费供给每个儿童充分

的食物，并成立儿童教养院。宗教课应放到校外进行。”

仅仅扩大义务教育的范围是不够的，因为农业工人的贫穷是造成恶劣状况的原因之一。正是贫穷迫使农业工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民那里去干活，而不让他们上学。如果我们现在增加课时，使儿童不能靠做工来弥补家庭的生活费用，那么这样做必然会使农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如果我们不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采取预防措施的话。因此，丹麦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增加课时而且是由国家负担经费增加课时的同时，还应在学校中免费为儿童提供膳食。这样才能实现改善农业工人的经济状况，同时又使儿童在德智体方面受到较好的、健康的教育的目的。

病人护理

不言而喻，如果农业工人生了病，不能出卖他的劳动力时，他的本来就很拮据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恶化。他的经济条件只允许他在很小程度上参加医疗储金会。在丹麦的全部农业工人中，只有不到30%的人是医疗储金会的成员。反过来农村医疗储金会在农业工人生病时照例只付给他们一笔很小的医疗费，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参加了医疗储金会的农业工人，由于太穷，付不起很高的会费。

其次，在农村不管是请医生看病的机会还是药房和医院都非常少。1880年哥本哈根平均每819个居民才有一名医生，每120个居民才有一张病床。全市共有10家医院和16家药房。全国各地平均计算，每3341人才有一名医生，每 $5\frac{1}{2}$ 平方丹麦里才有一家药房，每 $8\frac{1}{3}$ 平方丹麦里才有一家医院，每902人才有一张病

庆。自从 1880 年以来，这些数字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或惊人的变化。单是由于这个原因，急需治疗和药物的病人就会遇到特别巨大的困难。在我国许多地方，住院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无论是医生还是药房和医院，都分布得很不均匀。正像哥本哈根的情况相对说来比全国其他地方都要好得多一样，各州首府的情况又比农村地区好得多，而比较偏僻和人烟稀少的地方，简直没有人关心医疗事业。

丹麦社会民主党努力争取改善这种状况，它要求为全国组织公共保健和病人护理。为此，它制定了一个法案，该法案规定，必须在全国各地建立必要数量的医院，配以药房和接病人用的运输工具，使病人能够就近得到医治。医疗机构的设置必须做到在全国各地每两家医院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一丹麦里。在较大的地方，除了医院而外还应设立医疗站，病人随时可以在那里就医。一切医疗帮助，一切药物和医院护理都应由国家免费提供，家境贫寒的病人，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每天都应得到救济金。

为实现这一建议，国库每年所需的经费，应通过实施累进所得税的办法来筹集。

老年人的赡养

无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由于年龄增大都会逐渐衰老，以致或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其劳动力，那时他们就会连自己都无法糊口。这种情况大概无须赘述。同样用不着多说的是，没有一个工人能积攒足够多的钱，使他能够安渡晚年。工人在年轻的时候所挣的工资，几乎总是低水平的工资，它几乎不够维持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因此根本谈不上积攒一笔钱来作为将来的养老金，不

管这种积攒现在设想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是一切都由工人自己单独去挣，还是假定国家或别的什么机构会给工人积攒的资本提供一些补助——，都谈不上。

根据这些以及其他我们在这里未能详细论证的理由，丹麦社会民主党要求，国家应向一切穷苦的人提供人道的老年赡养，而不以工人或穷苦的人必须多多少少有些积蓄作为享受赡养的条件。对老年人的赡养必须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即照例应当以实物的形式向为赡养老年人而设立的机构提供生活费用，同时受到赡养的老年人还有权从他们在赡养机构里国家供给他们的生活费用中取出一部分钱来作零用，这笔钱的多少应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国家用这种方式花在老年人赡养上的费用全年估计约为1 600万克朗，这笔钱，也像社会民主党要求的病人护理费用一样，可以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的办法来筹措。

结 束 语

除了前面所阐述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为改善农业工人的经济状况而提出的要求（其中部分要求的目的是既改善农业工人的状况，也改善工业工人的状况）之外，它还提出了一系列别的要求，这些要求一旦得到满足，工人的状况一般都会得到改善，因而这种改善也会有利于农业工人。不过在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特别是与农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关的那些要求，为此必须补充一点，社会民主党想用来给公共社会生活指出一个可能使贫困的阶级的状况得到改善的方向的手段，自然会涉及到当前的问题，同样也不会不对农业工人状况的改善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丹麦社会民主党完全清楚，如果它要成功地实现

本文中提出的，以及那些在这里尚未提到的要求的话，它必须拥有实力。不过同样不容忽视的一个可能性是，一旦它拥有能使它的要求受人重视的实力，它大概不会满足于对在这里提到的那些方面将会作出的安排，相反它必定会要求在社会设施方面还要进行更深入彻底的改变。最后，丹麦社会民主党决不会看不见，唯一能够使完美的社会状态实现的一切，都是同生产资料转化为公共财产，同合作化的、纯粹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建立联系在一起。

在丹麦，社会民主党做的工作越来越多，它在不停地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作为实现它的要求的先决条件的实力地位。尽管我们在丹麦遇到了阻力，正像在其他国家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样，但我们党的影响还是在不断扩大，并同居民加深了联系。

在1890年夏天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党组织包括109个政治团体（共约14 000名成员）和281个行业协会（共约31 000名成员）。属于我们党的政治团体有10个在哥本哈根，约有6 000名成员；有35个在各州首府，约有5 000名成员；有64个在农村，约有3 000名成员。行业协会中有64个在哥本哈根，约有20 000名成员；有200个协会在各州首府，总共约有11 000名成员。

自从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1890年）召开以来，丹麦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大批拥护者，尤其是参加我们组织的农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

不过始终必须指出一点，和我们党观点一致的人，比正式参加我们组织的人要多得多，这是因为贫穷、社会贫困、雇主施加的压力等使大批工人不能参加组织。下面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最近一次福克庭（众议院）的选举中，我们的一位同志（哈拉尔德·耶恩森）在一个县（奥胡斯州 III）获得了胜利，因此该县参加福克庭的代表现在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选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只有 400 人，但是，我们的哈拉尔德·耶恩森同志在选举中却获得了 700 张社会民主党选票。如果我们想一想，在丹麦只有年满 30 岁的人才有选举权，而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县，以社会民主党名义所投的票数几乎超过当地有组织的党员的人数的一倍，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明白，我们党在农业工人中的影响比有组织的党员的人数所表明的要大得多。

丹麦社会民主党党务领导人

彼·克努森

西班牙工人党的报告

我们党在西班牙实际上是由几乎分布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切地区的 29 个团体组成的。

在去年 5 月工人们举行了对我国来说极其重要的示威游行之后，党的力量大大增加了。在最近一次立法选举期间所进行的宣传，对这个结果的出现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次选举中，尽管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资金，没有预先成立的、比较有效的选举委员会，我们还是获得了 5 000 多张选票。

在最近一次市政选举中，在毕尔巴鄂有 4 名社会主义工人候选人当选了，在阿沃莱达（在比斯开矿山）有 1 人当选。

目前，党出版的报纸有 4 种：《社会主义者》，在马德里出版；《社会战争》，在巴塞罗那出版；《人民呼声》，在阿利坎特出版；《阶级斗争》，在毕尔巴鄂出版。这 4 种报纸都是周报。

尽管抵抗组织即各协会和行会联合会没有参加党，但党还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尤其是在罢工中向它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我们有一个“劳动者总同盟”，抵抗力量的一切联合会或协会都被吸收参加了这个同盟。还有 4 个行业联合会，即毛纺织工业工人联合会（手工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锁匠联合会，木桶匠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后一个联合会加入了“劳动者总同盟”。

这个同盟被要求在近期内支持抵抗力量的大部分协会。

至于劳动和劳工保护制度，在西班牙正有待建立。这里刚刚有了工人立法。1873年在共和国期间通过的关于童工的法律，从未付诸实施。

参议院刚刚批准规定星期日休息的法律草案。草案主要是受宗教精神支配的。直到下届会议之前，这个草案将不提交众议院讨论。

政府方面，在几年前成立的、丝毫没有进行过任何改革的社会改革委员会的赞同下，起草了两个尚未提交议会讨论的法案：一个是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案，另一个是关于工伤事故的法案。

此外，在西班牙还有十分严重的农业和工业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带来的后果——劳动力的缺乏。我们将懂得，西班牙工人会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无一例外地都声名狼藉和不得人心了，这大大有助于这种对我们力量的发展壮大完全有利的形势的造成。

书记 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关于美国犹太无产阶级中的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告

我们的组织叫“犹太人工会联合会”(United Hebrew Trades)，因为所有会员都说犹-德方言。

我们是从我们有组织的德国同志那里采纳这个名称的，他们有一个叫做“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工会中央组织。

同德国工会联合会一样，我们的组织和宗教与民族是不同的，只是由于所有会员都使用的语言才采纳这一名称的。

这个联合会的所有工人都同时属于“中央劳工联合会”，这是美国人、德国人等的激进的联合会的主要中央组织。

目前，美国有3万多犹太人组织在讲犹太语的相同的工会中。但是，按照各自不同的职业，参加各美国工人联合会的犹太工人的数目，还要更多些，当然还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犹太人中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开始不久；但是，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却已取得了巨大进展，获得了一些辉煌成就，并且引起了美国和德国工人的重视，甚至热情的支持。

成千上万的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的犹太人来到美国，除了少数的个别例外，大都加入了无产阶级行列，并且成了组织起来的工人中最忠诚的反资本斗士。

几乎所有与服装业有关的职业都让犹太人占了。因而这些职

业所有的联合会或工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由犹太移民组成的，他们除了犹-德方言外，不懂其他任何语言。

他们现在所进行的斗争就是反对克扣工人工资的血汗劳动包工制度。雇主利用这种包工制度，并且利用他们不懂语言，付给他们低于一般的工资，并且迫使他们接受延长工时（不确定工资）的工作。

最近 20 年来，美国工人运动史中，劳工反对资本的最重大的斗争，是由犹太工人发动进行的。

例如，最近“大衣工人联合会”（由 8 500 名成员组成）发动了一次反抗雇主的罢工，百万富翁的雇主们成立了雇主协会，坚决要摧垮工人联合会。

罢工持续了 14 周。工人已完全没有收入，然而尽管他们看到所有资本家的报刊都制造舆论反对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一致表决继续罢工，表示宁愿饿死，也不在他们的权利得到全部满足之前退却。

凭借这样的英勇气概，罢工者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资本家一个个来到联合会的书记处签字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雇主联盟被粉碎。当英勇的大衣工人们庆祝自己的胜利时，受到了各种语言和各个城市的伙伴们热情祝贺。

这次罢工是去年美国最大的一次工潮。但这次事件并不是单独的。纽约以及费城、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的约 37 个犹太工人联合会都曾发动过类似的罢工，除了一次例外，所有罢工都取得了胜利。

他们反对血汗劳动包工制的运动并不是不见成效的，最大的一家大衣厂已被迫取消了这一制度。

其他工厂作出了一些较小的让步；所有的工厂都被迫承认了

工会。

我们的短期目标就是为犹太工人争取和美国工人相等的经济待遇，我们可以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资本家雇主们注意到他们的联合在组织起来的工会面前被粉碎了，他们的百万财富在斗士们的团结力量面前不起作用，于是就开始求助于政治措施。

于是，检查官、警察等美国资本主义的忠实走狗就设法歪曲现存的法律；工会最合法的行动都被借用判例而受到攻击。

这里举出一些最突出的例子。怠工抵制被指控为“阴谋”；经劳资双方同意，雇主应作出让步，支付赔偿，却被追究为“勒索钱财”。

警察开始了一系列逮捕，诉讼都是最野蛮而荒谬的。

所有的报纸都在议论这些事件，其他行业的资本家雇主也开始仿效他们的同伙的榜样。

形势要求进行政治斗争，因此，现在一些最保守的工人的工会也被迫考虑必须同资本家进行政治斗争。

犹太工人在学习英语，并迅速与他们的美国工友打成一片；但是，由于这些工人中大部分还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他们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工人报》，它拥有 8 500 家订户，它不仅能支付自己的费用，还有积蓄来出版一些社会主义小册子。人们准备出版一份同样的俄文报纸《进步报》。

接受战斗的社会主义的犹太工人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在一些城市中有美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佛兰芒人支部和犹太人支部等。

在美国的 8 个城市中有 8 个这样的犹太人支部。

在这些工人中，有一些参加了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是这个运动的最忠诚最热情的朋友。

以所有这些工人的名义，向讲其他语言的工人致以兄弟般敬礼。

出席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
的美国犹太人工人代表

A. 凯南

法国工人党的报告

参加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时，法国工人党已分裂成一些地方小组或区域小组，它们之间除了纲领是共同的而外，没有别的联系。自 1884 年以来再没有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自 1885 年以来再没有中央机关报了！

加来、里尔、鲁贝、蒙吕松、阿尔芒蒂耶尔、科芒特里、波尔多、兰斯、图尔宽、圣康坦、特鲁瓦、里昂、圣法尔若等地的代表不等代表大会结束，便在 7 月 19 日的全体大会上宣布在巴黎成立一个临时全国委员会，它的权限自那以后已经为 1890 年 10 月里尔代表大会所确定，这个委员会由 7 名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委员组成。委员每年改选一次。

在里尔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从理论上把我们全体党员联合起来的纲领中补充了一条总则，它规定，向每个党员颁发每年更换一次的党证和党员必须每月缴纳 5 分钱党费。

自从在党的不同派别之间恢复了经常的、必要的关系之后，党组织的人数和重要性就显著增加了。1889 年党包括 145 个政治小组或工会小组。从 1890 年 10 月起派代表参加里尔代表大会的政治小组和工会小组已有 231 个。

自从新的团体在阿莱、鲁昂、特鲁瓦、索特维尔、马罗讷、埃尔伯夫、达尔讷塔勒、鲁贝、博瓦、科德里、大弗雷努瓦、富尔

米、维涅耶等地成立或合并以来，我们在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代表的这类组织和第一线的力量，几乎已增加了两倍，包括诺尔省、加来海峡省、埃纳省、马恩省、奥布省、下塞纳省、阿列省、卢瓦尔省、罗讷省、加尔省、埃罗省、罗讷河口省、奥德省和吉伦特省的大工人中心在内。

有两年，党只是在诺尔省有一家周报，现在拥有的报纸除了中央的《社会主义者》报而外，还有 6 家区域性报纸：

里尔的《劳动者呼声》；

圣康坦的《保卫劳动者》；

鲁昂的《诺曼底社会主义者》；

科芒特里的《警钟》；

波尔多的《社会问题》；

马赛的《斗争》；

最后，党在里尔创办了一家印刷所，我们的大部分报纸都是由它排印的。它已经出版和再版了几千份报纸和大量宣传性小册子。

* * *

如果说在 1889 年的立法选举中，我们只有两个同志当选为议员，这就是奥德省提名的费鲁勒和阿列省提名的蒂弗里埃，那么，在加来、马赛、里尔、鲁贝、蒙吕松、塞特、里昂等地却以 2 000 张至 3 000 张不等的选票获得了重要的少数派地位。而且这个地位是在有人认为我们党在布朗热分子和反布朗热分子这两派互相厮打的资产者中间被压垮了的时候争得的，对于这两派人，我们以同样的名义和他们作斗争，而不愿在卡德街和塞泽街之间作出区别。

和中央革命委员会共同起草的致劳动者的宣言，在三个省里

赢得了 15 万多人的拥护。这个宣言说：“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像在君主制度下一样，使你们遭受痛苦的唯一祸害是资本主义封建制，为了它，机会主义者或激进派今天正在进行统治；为了它，布朗热曾经进行统治和大砍大杀。——既不是费里，也不是布朗热，只有社会主义共和国才能通过剥夺权力和资本的占有者而获得成果。”

今年在部分立法议员的改选中，在下塞纳省，我们的两个候选人按照党的纲领竞选，获得了 4 000 多张选票。

在省议会和市议会部分议员的改选中，我们已经获得了更加有利的结果。在加来，我们有一个候选人以 2 673 票当选省议员；另一个候选人在科芒特里以 2 319 票当选省议员；一区议员在蒙吕松以 2 042 票当选；另一区议员在里尔以 1 500 票当选。在塞特和马赛这两个地方，我们的竞选失败了，我们的候选人分别以 1 389 票和 1 150 票的记录离开了投票箱。

在塞特，我们党在市参议会中占有多数议席。在罗阿讷和纳博讷，情况也是如此，在罗阿讷，我们党的两个积极分子已当上市长的助手。在纳博讷，参议员们（除一人外全是社会党人）把一位国会议员即公民费鲁勒送进了市政府。

在科芒特里，党已经控制了市参议会。另一方面，在鲁贝、加来、蒙吕松、圣埃卢瓦—莱米讷、马基斯、许姆布勒、罗利科讷、朗基埃、德尔以及其他方的市参议会中，都有党的候选人当选。

在博丹、布瓦埃、库蒂里埃等地党的议员，即使和其他当选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也只占微弱的少数。在这些地方，党的议员只能进行质询，提出法案，或者在讨论草案时提出修正案。

根据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自 1889 年以来我们已把大会上通过的劳工保护立法草案完整地提交议会审查。

我们提出的其他一些草案包括下述各项倡议：

1. 取消老板窃据的对工人进行罚款的权利和修改车间工作条例；修改工作由地方劳动委员会进行，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工人、老板各占一半；

2. 用从工资中扣除的罚款设立的（不管雇主同意提供多少）或作为来源的救济基金和互助基金全部交给工人自己管理；

3. 禁止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挑起的冲突中使用军队；

4. 制定惩办雇主妨碍工人根据 1884 年的法律成立工会或妨碍工会发挥职能的行为的刑法；

5. 在最高劳动委员会中，工会、劳动介绍所和其他合作组织选出的委员至少应占一半；

6. 在由国家收回和经营的火柴厂中，劳动条件是：八小时工作日，规定最低工资额（男女工人一视同仁），不准雇用 12 岁以下的童工；

7. 从获得特许权的公司手中收回的、由这些公司雇用的劳动者在公司的监督下和为了公司的利益而经营的煤矿，交给国家支配。

这最后一个由费鲁勒提出并被列入议事日程的提案，在讨论关于圣艾蒂安发生的灾难事件时，获得了 63 票。

党的议员对政府提出的关于管理童工、未成年女工或成年女工的法律草案，提出了大量修正案，——由于议会的偏见，其中没有一条获得通过。

这些修正案是：（1）允许参加工业劳动的童工的年龄从 12 岁提高到 14 岁；（2）把家庭商店和作坊（不管它们的劳动方式如何）纳入受未来的法律约束的机构中；（3）宣布绝对禁止夜班和每周必须休息一天；（4）对于地下工厂以及一般工厂和作坊，分

别委托保护青工安全的代表，以及由男女工人在那些经过竞选后被宣布为有资格当选的人中直接选举出来的视察员负责执行法律。

这个在男女工人不分性别一律享有普选权的基础上改组监察机关的提案，当时获得了 109 票。

* * *

“鉴于按行业把工人组织起来对于抑制资本家剥削是必要的，这对组织社会生产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里尔全国代表大会已敦促全体党员登记加入他们各自的行业所属的工会，以便在那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吸收拥护党的纲领和政策的人入党。

这个敦促并没有变成一纸空文。在所有的地方，党员不仅把他们各自的工会重新联合起来了，而且还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建立行业联合会和联盟。

这些努力已产生的结果是：卢瓦尔省和罗讷省的纺织工人成立了区域联盟，再过几个月，通过在里昂召开的纺织业全国代表大会，它将发展为全国联合会。

另一个全国联合会，即机织花边工全国联合会，由于德尔克吕兹和萨朗比埃发起的运动，正获得顺利进展；加来—圣皮埃尔的织罗纱工人成立了工会之后，就和朗格朗的织罗纱工人一起推动科德里和圣康坦的同行们组织工会和成立联合会。

另一方面，在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支持和协助下，商业海员、海上渔民和其他劳动者在马赛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法国全体登记注册的海员即将成立的全国联合会的序幕和保证。

矿工也是我们工作的对象。由于阿列省各党小组的热忱和忠诚，矿工全国代表大会终于于 3 月在科芒特里举行了。参加这次

大会的有卢瓦尔、加尔、上卢瓦尔、伊泽尔、阿列、索恩-卢瓦尔、克勒兹和多姆山等省煤田的代表。这次大会为全国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个全国组织已在几天之后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扩展到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

* * *

党深信，正像我们的德国兄弟的纲领草案说得很好的那样，“劳动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切国家的劳动者协调一致和合作。为此，党努力加固团结的基础，这个基础应当超越国界把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它们变成一支单独的、统一的大军。

因此，党在向孚日河彼岸的社会民主党人馈赠一笔小小的捐款以支援他们反对帝国及其非常法的竞选活动后，又决定派遣——这引起了我国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一阵狂叫——两名全国委员会委员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哈雷代表大会，以便在两国政府的对抗面前证实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并高呼：德国工人万岁！

同样，我们曾派遣我们的对外联络书记前往伦敦，以便在1890年5月3日的海德公园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后来在不可能参加英国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首届代表大会和奥地利社会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我们托人在都柏林和维也纳代表我们向大会表示支持和祝贺。

党在国际上不单是进行了这些政治活动。从联合的观点来看，它使法国的工人组织和外国的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使它们共同投入了同样的、持久的斗争。

例如，当去年10月加来的织罗纱工人罢工的时候，有一位党员，即公民勒泰约，到英国去向诺丁汉的织罗纱工人和海峡对岸的其他工联组织募捐。这些捐款对迫使雇主投降作出了不小的贡

献。

又如，后来当曼宁汉宣布举行罢工的时候，党荣幸地看到，这次轮到加来的织罗纱工人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他们决定，为支援英国同伴，每人每周捐献 50 生丁。

在里昂玻璃制造工人罢工期间，我们的对外联络书记，即公民拉法格，充当了法国工人抵抗力量和英国工人声援运动之间的联系人。

当几个月前英国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提出“由各国任命的国际劳工书记，以便在同资本发生冲突时，劳动者马上就能了解情况并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时，党迅速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不失时机地为未来的国际工人组织的成立奠定第一块基石，即委派我们的积极分子、加来海峡省议员德尔克吕兹公民代表法国参加“国际劳工书记处”。

* * *

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曾提议，“在 1890 年 5 月 1 日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工人们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通过立法把工作日缩短为八小时”。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在小规模上作了这种游行示威的尝试。

1889 年 2 月 10 日，根据我们的波尔多和特鲁瓦代表大会的两次决议，在我们建立了组织的所有各区，代表们都纷纷强烈要求当局赋予多年来历届工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改革要求以法律效力。为此进行的鼓动获得了巨大效果。

但是，如果说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令人鼓舞的，那么，谁也料想不到，“国际团结精神”的这第一次“付诸行动”，在法国会有这样大的规模，以及它必然对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

的影响。

有 100 多个大城市向执政机关派遣了确实使它们惊慌失措的代表团（这些代表团使人想起上一世纪的革命“请愿团”，并且是它们的继续）。代表们在群众的护送下出现在议会、省政府、县政府和市长官邸。在马赛，护送的群众有 50 000 人；在里昂，有 40 000 人；在鲁贝，有 35 000 人；在里尔，有 20 000 人；在加来，在波尔多，在圣康坦，各有 15 000 人；在兰斯，在特鲁瓦，在圣艾蒂安，各有 10 000 人；在科芒特里，全市的居民都出动了，还加上邻近的一些区的劳动者；在蒙吕松，在土伦，各有 6 000 人，等等，走上大街的游行总数在 400 000 人以上。

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并没预先规定庆祝 1891 年的五一节。这次庆祝是由我们党的里尔代表大会和工会加来代表大会自己决定的。这次庆祝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丰富多彩。

甚至那些不只是避不参加去年的示威游行、认为这次示威游行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搞起来的并以顽强的精神与之斗争的人，也勉强参加了今年的示威游行。尽管 1890 年的游行是和平的，尽管组织者一再声明，“我们只是采取足以对执政机关施加压力的合法行动”，有产者和统治者还是只有动员所谓的国民军来反对工人阶级，派军队占领大城市和一切工业中心，才感到高枕无忧。

1891 年 5 月 1 日在巴黎向议会派遣了一个国民代表团（议会拒绝接待它），这个代表团由 1 000 多个工会团体和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组成。代表团成员共有 28 人，他们来自罗讷河口省、奥德省、吉伦特省、卢瓦尔省、阿列省、下塞纳省、加来海峡省、诺尔省，等等。加入他们的行列的还有一位下院议员，公民肯宁安-格莱安。这一天只“英法两国劳动者在争取法定国际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积极联合的证明”。

这一天，在各省骑兵队横冲直闯，逮捕和判决逞凶肆虐，最后以“富尔米的大屠杀”而达到顶峰。

受法国工人党委托
书记 茹尔·盖得

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告

公民们：

我们有幸向你们尽可能简短地说明一下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起源、结构、策略和目标。

公社失败和各个“国际”支部解散后，许多有阶级觉悟的法国工人被屠杀，被送到海船上服劳役，被监禁，被流放，有些人被迫保持沉默。因而直至 1878 年我们才能重新成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组织。

几个月以后，在马赛代表大会（1879 年 9 月）上，法国工人党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它主张劳动资料社会化，支持革命行动。

马赛代表大会奠定了法国工人力量的组织基础。6 个区委员会负责把工人群众联合和团结起来。工人群众在互相了解之后，就能把他们的共同努力同其他国家工人党的努力联合起来。这是“工人国际”在另一种形式上的复活，因为它几乎已被凡尔赛的屠夫们消灭了。此外，由于政客们的阴谋和那些心胸狭窄、想把和他们意见分歧者革出教门的人的宗派主义活动，以及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雇佣的密探钻进了国际支部，所以“工人国际”完全崩溃了。

在马赛代表大会的工作刚刚结束，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被

迫释放了大批 1871 年的战败者，这是采取更广泛和更彻底的措施的开端，也就是大赦的前奏。12 个月后，所有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幸存者被释放回家，回到了他们的工人伙伴和战友那里。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便展现在法国工人党面前。

既然这种战斗力量的增加同时还带来了更紧密的团结和对为社会事业作出必要牺牲的更好的理解，那么，工人党应取得多大的进步呢？

应该说，不幸的是：某些成员的漫无节制的非分要求、野心和被许多伙伴推到了极端的对某些人的个人崇拜，阻碍了希望的实现，使分裂代替了联合，使雇主又夺回了失去的阵地。教训是沉痛的。我们希望这个教训将得到借鉴和被证明是有益的。的确，1891 年 6 月在巴黎举行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恢复原则和排除怀有野心的个人。

因此，我们认为，并且乐于这样认为，那种小里小气的竞争、琐碎无聊的从会议到会议的辩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群众已赶来支援对资本主义的巴士底狱的攻击。工人组织像被魔召唤出来似的到处涌现。看来，法国工人决心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决心和其他国家有强大组织的无产阶级并驾齐驱。

对于这种突然出现的大好形势，必须展开双臂用坦荡、高尚的情怀来欢迎它。各种学派的、职业的或民族的差别都必须搁到一边。

我们必须为人类共同的祖国、种族的融合和人类对抗的结束做好准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有强大的力量去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此外，还要把经济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因为这样做才能使他们具有进行斗争所必需的精力和采集胜利果实的能力。因此，这是共同纲领，是每个国家都要

坚持的崇高工作。

在说明了这些情况之后，现在让我们谈谈大会议程。

关于第 1 项：“从国内和国际角度来看劳工保护立法的状况，以及为有效地制定和扩充劳工保护立法而应采取的手段。”法国工人党过去为、将来还要更加努力地为扩大 1874 年关于童工的法律提供的保障而奋斗，它将要求把这项法律的执行委托给市政官办公室的代表，同样还有目前正在制定的关于女工的法律也要委托他们执行。同样，党还不断进行成立劳资调解委员会的宣传，并主张把这个委员会扩大到一切工业部门中去。这个宣传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果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下更大的决心，将来可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谈到“血汗制”这个工人的耻辱，情形却不是这样。1848 年颁布的法律始终是一纸空文。尽管进行了若干值得嘉许的反抗，工人仍然在被迫流血流汗，使资本家大发横财。此外，劳动时间的调整还有待改进，由于工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庸俗的似是而非的概念，他们之中多数人当真以为，劳动时间的减少就一定意味着工资的相应减少。他们轻率地反对调整劳动时间的措施；尽管这种措施在保证他们的工资不降低的同时能减少他们的劳累，并使他们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增长他们的技术、科学和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使这些实际结果得到普遍承认，是社会党的主要目标和关心的事情。五月一日这个节日将用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关于第 2 项，“从国际角度来看联合权及其保证、罢工、联合抵制和工会运动”。

我们党最先利用 1863 年法律。该法律给了相同职业的工人共同保护自己工资的权利。通过对这项法律的宣传，工人又争得了

1884年3月的法律，此项法律承认了工会，并赋与它们公民的身分，但又要求它们必须有行政官员用自己的名义替它们作保，而且这些保人必须是法国人并拥有市民权和公民权。这最后一个条款把工人划成两类(法国人和外国人)，并使工会服从警察的管制。党坚决反对这一条款，并掀起了持续不断的运动。

关于罢工。法律一方面正式承认罢工，但另一方面又给罢工设置了重重限制，由于大多数工人不知道这些限制，所以它们就更加危险。刑法第414条和第415条是使许多人在罢工中被捕的陷阱。1849年6月的法律对这两条作了补充，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集会和游行示威，甚至授予当局实行军事管制的极权，如像在福尔米和图卢兹实行的戒严那样。

至于联合抵制，我们应该承认，在法国至今都不可能采取这个办法。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尝试都是在没有交会费的作坊和工厂进行的。向法国工人提出更多的要求就是去碰钉子。党在这里看到了缺陷，看到了令人遗憾的缺乏善意。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工会运动在迅速前进，不久就可能成立许多有国际联系的联合会。这项工作必须在国际劳工立法通过之前完成，以便赋予后者以充分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让我们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为成立这种组织而奋斗吧。

第3项，“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和责任”。

党确信，消灭军国主义和废除一切军队是社会主义工人的根本目标，因为这样一大批准备随时充当自己同胞的刽子手的人的存在，构成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经常威胁；因为军队是工人阶级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为当人民变成唯物主义者，不愿再受传教士这伙精神领域的警察的奴役时，资产阶级就只有用军队来保卫它的特权和权力；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设法废除军队，以便

结束暴政、战争和人剥削人的现象。

第4条，“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有觉悟的工人除了相信人类的团结外没有其他宗教信仰。我们认为，所有旨在复活宗教仇恨和种族仇恨的企图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野蛮行为。社会党应该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谴责在反犹太主义的借口下煽动人民互相残杀的流氓无赖的罪行。人民的唯一敌人是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让我们把所有的打击都指向资本主义。

第5项，“利用议会制度和普选权”。

我们认为，议会制度和普选权纯粹是进行鼓动和宣传的手段，它们绝不能给工人带来解放。迄今议会制度只不过给空谈家和阴谋家带来发迹的机会，而使劳动群众及其诚实的品质受到巨大损害。社会党人应向工人揭穿政客们每日都应受到谴责的背叛行径，从而防止犯严重的错误。

在工人力量的组织成为既成事实之前，在人民代表获得确定的授权之前，投票就不是公正的和真正普遍的。对人民代表授权这是工人不能忽略或轻视的。没有这种授权人民代表的席位就会立即丧失。如果必要的话，还会对他们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人们只要看一看自1848年以来就有了普选权的法国的情况，就立即会明白，对于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的人来说，这个成就的价值多么渺小！

第6项，“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结盟”。

可以说，这种联盟和普选权一样，谁相信它，谁就会上当受骗。

第7项，“废除计件工和包工”。

我们党的每次代表大会都谴责这种劳动制度，并主张在达成某些明确的协议之前实行计时制和协作合伙（见排字工人的组

织)。

第 8 项，使“五一节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调整劳动和维护和平服务”。

法国工人党完全赞成这个建议。

第 9 项，“世界各国工人党的名称”。

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巴黎，1891 年 6 月)

第 10 项，“国际工人组织的宣传”。

通讯、社会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应当归每个国家的总书记负责，他们互相之间应经常保持联系。每个国家的联合会和工会要给上面提到的总书记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负责统计劳工人数、了解各国不同职业的情况、在发生罢工的情况下组织救济。

总之，负责一切带有纯粹工会性质的事务。这个委员会将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并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它将像“劳动介绍所”的代表机构那样发挥作用。

法国工人党赞成出版《社会主义年鉴》，不过它建议，这个年鉴应该特别讨论农业无产阶级的问题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

第 11 项，“1893 年芝加哥代表大会，下届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日期和地点的选定”。

法国工人党相信，1893 年芝加哥城将把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召集在一起。在精力、机智和组织一切有关工人的重大活动的方面，我们的美国同行堪称模范，这使我们每次都想郑重地接受他们的邀请。

假如芝加哥代表大会开不成，那么社会主义的工人应于 1893 年 9 月在日内瓦聚会，并委托瑞士工人党筹备下届国际社会主义

者代表大会（法国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

公民们，代表们：

这就是扼要叙述的法国工人党全体党员的决议。我们深信，你们就要通过的决议将充满对公正和人人平等的热爱，同时也将充满你们对一切暴政的痛恨和厌恶。我们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高呼：“世界工人党万岁！社会革命万岁！”

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委员会

法国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报告

1886年，即工会法颁布之后的第三年，在里昂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法国全国工会和同业工人小组联合会，是按行业成立大规模组织的起点。成立这样的组织是必要的，但是，直至那时，由于缺少协调手段，它的组成部分不是根本没有，就是完全不够，因此，成立这样的组织是不可能的。

里昂代表大会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它除了把行会力量组织起来之外，还显示了全部有组织的雇佣工人的看法和观念的一致。在里昂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又召开了蒙吕松代表大会，这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它给与法国工会运动的发展以新的推动；然后是1888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波尔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前两次代表大会的当之无愧的和慎重的继承者，它在行会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889年2月向执政机关举行的、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第一次示威游行和1889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这是法国行会觉醒的真正起点，或者勿宁说强大杠杆）这两次活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大部分，我们都应归功于波尔多的全国理事会。

我们想指出，我们的联合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轮流在各个行政区召开。我们的全国理事会总是设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

过去召开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都有它的作用，并以不同的名义采取对法国工厂的无产阶级来说切实感觉得到的行动。但是，直到那时，我们几乎还没有参加任何国际活动。我们的活动几乎总是局限于我们唯一的法国，尽管少数有远见卓识的人曾热情关注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今天这个少数已变成多数。

加来代表大会，即我们组织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90年10月，正当罗纱织造业工人罢工之际，在加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使我们越过了拉芒什海峡。这要归功于英国同志的团结互助精神。我们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深切的谢意。顺便说一句，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捐助的一大笔钱使法国劳动者提出的要求获得了结果。

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本来只是行业性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它讨论了关于八小时工作这个紧迫的和普遍的问题，以及由于一位代表英国八小时同盟的英国代表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具有了另一种性质。

于是就建立了同业工人的国际联系，这种已更加普遍地扩大了联系，我们早在1889年的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已经见到过了，它对各国工人都有利，尽管这里所说的国际联系还仅仅涉及有关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

事实上，我们看到，不久曼宁汉（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并得到了法国手工织布工人的经济支援。拉芒什海峡上的桥梁架设起来了，两国无产阶级现在已习惯于这条道路了。这条道路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即他们的主人而开辟的。

必须也在连接其他国家的国境线上打开缺口，并为了劳动的最高利益而扫除一切孤立和削弱各个国家的个别努力的障碍。

* * *

如果说法国全国工会联合会像过去参加 1889 年巴黎代表大会那样参加 1891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那是因为它已经重新认识到为了尽量使两个半球无产阶级的行动协调起来和步调一致而出席国际大会的好处。

不过,它到布鲁塞尔来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就是,有 679 个工会的代表参加的加来代表大会授与了它委托书。

这个报告就是以上述代表大会的指示为依据的,它规定了我们的发言内容和建议;另外,它还参照了自从我们报名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来所收到的各种报告。

我们首先应当声明一下,如果说我们在转入我们打算强调或提请代表大会审查的正题之前说了一段相当长的开场白,那么,这只是为了表明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好处,组织起来是为了同时朝必定要实现的解放前进,而我们应当用一切手段,也依靠各国劳动者的联合和共同努力的强大声势来力争实现这一目的。

我们受加来代表大会、法国全国工会和同业工人小组联合会全国理事会的委托,谨向代表大会提出以下要求:

1. 坚持五一节,两年来它在发展工会会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比 10 年继续不断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还大。

五 一 节

代表大会,

鉴于,根据 1889 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于 1890 年 5 月 1 日举行的示威游行,已在两个半球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鉴于,几百万无产者在同一天,几乎在同一时刻,为了同样的要求走上街头;坚决表示一致赞成通过国际立法缩短工作日。

2. 缩短工作日和国际劳动立法。

代表大会，

鉴于，历届工人代表大会都一致宣布赞成把工作日缩短为 8 小时；

这一措施可以制止资方削减工资的要求和他们强迫对生产者处以不公正的罚款的企图，因为它使供求规律的作用变得更加有效；

鉴于，把劳动日缩短为 8 小时将迫使雇主为了保持原来的产量而雇用大量工人，从而使劳动后备军——贫困使他们无条件地受雇于老板——减少到足以允许劳动者有效地坚持他们的要求的程度；

鉴于，较长的工作日加上机器的进步所必然造成的条件，以及现存的生产方式会损害男女工人的健康；较长的工作日使工人得不到休息，没有一点空闲，根本没有自由来从事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以便要求得到他们改善生活的权利；

兹宣布：

赞成把工作日缩短为 8 小时；

赞成规定最低工资额，通过它的实施，将保证工人阶级得到最必需的生活资料。

另外，还宣布：

支持采取各种不同的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措施，以便实现上述目的。

报告人

3. 支持矿工在停止一切活动之前实行总罢工。

总 罢 工

代表大会，

鉴于，自从 20 年前资产阶级共和派掌权以来，无产阶级的命运没有丝毫改变，他们始终遭受资本家的剥削，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

鉴于，在 1889 年 2 月 10 日和 14 日，以及 1890 年 5 月 1 日的和平示威游行之后，无产阶级未能从我们那些没有能力为劳动者办事的领导人那里获得他们所要求的東西，即把工作日缩短为 8 小时，他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前进，以便实现他们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的彻底解放；

赞成矿工举行国际总罢工，宣布支持它，并竭尽全力确保全体劳动者总罢工的原则，同时吁请国际代表大会研究在最短期间内将其付诸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一个愿望

生产力的社会化

鉴于，国家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此伏彼起的罢工就是这种恶化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标志；

鉴于，这种形势正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并使那些最有头脑的人深感不安；

遭到这一危机的打击的城乡劳动者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腐败的社会制度的牺牲品，而这种制度是那个压迫他们，使他们忍饥挨饿的阶级用暴力和掠夺强加给他们的；

鉴于，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他们的悲惨境况，并正当地要求他们的生产和消费的权利；

在生产过剩的时代，这样合法的愿望应当得到实现，执政机关应迅速予以解决；

相信民众阶级的代表有义务使统治者认识到这种极其糟糕的状况，并同时向他们指出补救的办法；

基于这些理由，

加来代表大会代表希望（他们的这个愿望可以在一切由选举产生的、有社会党人参加的大会上增补和修改）：

土地、矿山、机器、原料、铁路、船舶成为公共财产，总之，公共财富的一切生产力应实现社会化。

5. ①同盟要求建立国际通讯、工人统计和按行业订立国际协定（统一税率等等）。

6. 废除计件工作。

全国理事会希望下届代表大会或者在瑞士召开，或者在意大利召开，如果在芝加哥召开，我们行业组织的代表，由于经费短缺，可能将无法出席。

* * *

小结。——同业工会的组织具有很大的规模。由于频繁的局部罢工，我们工会的基金一般说来总是空虚的，因为始终必须支援罢工；这是我们组织的一个最不完善的方面。

联合会代表

A·德尔克吕兹

① 原文没有“4.”。——译者注

荷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告

第一部分

1889年7月18日，星期四，普列汉诺夫在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这样表示：“在俄国，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胜利，否则它就永远不会胜利。”人们可以把这位代表针对俄国所说的话运用于荷兰。自我们的代表多梅拉·纽文胡斯在那天谈论了荷兰工人的状况之后，总的情况的发展没有任何改善。工人还一直被剥夺选举权，因而没有机会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中发挥自己的直接影响。然而工人的努力仍然有了直接效果，他们迫使最顽固的保守党人作出了有关扩大选举权的允诺，因为他们害怕工人采取更激烈的举动。确信自己力量的工人将把争得选举权作为一项坚定不移的任务。

在税制方面，也没有出现改进。在这方面，工人阶级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在一些文件中，人们用一些无可辩驳的数字揭示了各种不可忍受的缺陷；但是，统治阶级似乎丝毫不打算改变他们这种上层阶级政府的面目，没有任何减轻非资本家的财政重荷的意图。工人在承受着苛刻而沉重的捐税，而人们却为上层阶级的节日，为赛船、航海节、赛马，为奢糜铺张地接待外国国王（如接待德皇）这样大肆挥霍；仅仅为了这个暴君人们就浪费了50万

荷兰盾，与此相对照，在像 1890—1891 年度那样的严寒的冬季，又有如今天这样的百业萧条时期，工人的请求却始终遭到有地位的人们的回绝。人们总是对工人说，市民公众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

教育方面稍有变化，但这一变化也只是对那些教士神职人员有利。对人民的发展最必需的免费义务的普及教育则并没有实现。在上次议会大选中获得多数，即将组阁的自由党于 1890 年在它的代表提交给议会的提案中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实现义务教育。因此，它执政一开始，就必须顾及到这个方案。普及大众教育协会已经拟定了一个立法方案，支持者都是新议会中的议员。现在拥有多数的自由党会背信弃义到忘记它的正式声明吗？最近的将来我们将会得到答案。

然而，我们尽管也认识到义务教育的益处，但是我们自然还是认为争取吃饭的权利是更为必需的。一旦解决并得到了吃饭的权利，争取精神食粮的要求就必然会自动提出。给人们足够吃的东西，他们就会学习念书。

整个诉讼程序都是经过周密的组织设计的，各方面都符合于一个模范的阶级政府的要求。一切都规定得很详细，任何人，甚至是最穷的人都说不出法律在纸面上给他的权力比给富裕公民的少。

然而，为了得到正义，有如此多的困难要克服，以至只有富裕的人才有可能求得法官的帮助。对工人来说，一般都是有困难的，因为法律上没有严格的条文限制法官参与工商企业。许多从事律师事务的人以及其他公务官员都日益更多地利用这一方便谋取利益。在官方的通报文件中，可以不断看到一些官员的名字就是某某企业的创办人。尽管有关于法官的公正和要求回避的权利

等良好的规定，但工人把这些漂亮的言词看作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远没有一个由人民建立和授意的法院，司法官员是占有者手中的镇压工具，以便防止阶级的怨恨。尽管到处传说法官的独立性和廉正的废话，而在实际生活中，根本就看不到这方面的任何事迹。

集会权与结社权是一项每人具有的由法律保障的权利。经验证明，在统治阶级嘴里，这一权利没有任何意义。工人曾多次在集会时遭到世界上最野蛮最愚蠢的警察用棍棒和军刀驱散。不少市长和警察局长无耻地违反法律，而最终却得到政府的支持。对那些向这种蔑视法纪的行为提出抗议的人，甚至不加理会，并且采取发放销售酒精饮料的方法，使集会权利化为幻影。许多客栈老板怕失去谋生手段而屈服。这种间接的压力是虚伪的标记，引起了许多弊病。不用说，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人阶级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当我们在下文了解到他们所处的经济状况时，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必然会引起我们的尊敬。

富裕阶级常说，荷兰工人的经济状况是值得羡慕的。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他们不同工人交换一下处境。简要概述一下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情况，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许多年来荷兰在农业上是名列前茅的。而农民的状况总的说来严重恶化了。大部分田地更多地只是名义上属于耕者所有，实际上它们是公证人——抵押银行或债主的财产。大资本在这里像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样，一点一点地吮吸着一切。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仅举出以下事实为例，即抵押债务总额在1867年是4.62亿盾，而现在已达到10.8亿盾。这就是说，20年来增加了1倍多。工人的状况自然也恶化了。据政府指定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一个报告说，[虽然工人似乎没有钱储蓄，但他们的

情绪是饱满的。儿童们]①由于食物太差，小小年纪就夭折了，或者，他们虽然活下来了，却很早就得不到父母的照顾，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了生活，必须双双到田野里去干活，因而不能照管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简单的，有时看来甚至是淡泊的和穷困的。劳动时间往往特别长。工资为每周 1.80—4.50 盾（供膳宿），或 3—9.50 盾（不供膳宿）。劳动时间长达 9—14 小时，许多地方工人从一大清早劳动到晚上。然而，必须指出，这样的工人一年中只是一部分时间有工作，因而他们的工资不能作为计算一年的工资的标准。至少根据政府的报告，固定的农场工人的情况就是这样。辅助工的情况肯定要糟得多。赤贫现象成倍增长。这些工人的绝大部分都不得不为了每天挣得 30—80 分（=60 分—1.6 法郎）的工资而劳动。

然而，官方的报告有待补充。在这里不妨引用别的人在弗里西亚进行的研究的结果。例如，弗里西亚人民党在《弗里西亚工人状况》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在收割庄稼和刈草季节，劳动日照例长达 17 至 18 小时。在靠饲养牲畜为生的地方，劳动日夏天为 17—18 小时，冬天为 14 小时。诚然，工人并不是整天都在劳动，不过他们必须留在原地轮流干活。为了吃饭，他们只能中断一会儿工作，就像收割庄稼时那样。如果耕地离农场较远，晒草工人就支起麻布帐篷，并整周住在乡下。

根据这个报告，工资比政府报告中所说的还低。在某些地区，工人夏天挣的工资每小时是 5—7 分（=10—14 生丁），冬天每小时是 3 分；女工每小时是 4—4.5 分。但是在夏天工资每周超过 6

①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原文版中刊印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报告第一部分摘要译出的。——译者注

盾；大部分人每周挣 4.2 盾；在冬天每周工资是 3 盾，更不用说有些人连分文都挣不到了。

此外，他们还被强迫必须在雇主开的商店里买东西，因此辛辛苦苦地挣来的工资的一大部分就又被搜刮了。农村的雇主通常开一家商店，工人在那里能够（应用**必须**一词来代替**能够**）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事实上，他们没有任意选择地方买东西的自由，因为如果他不雇主的店里买东西，他肯定马上会被解雇；而雇主则以比最好的商店贵得多的价钱出售货物。

尽管唯一的社会党议员多梅拉·纽文胡斯在 3 年前即曾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法案，反对这种强制在指定商店购物的规定，但该法案有待讨论，法律也一直没有颁布。而今这一法案已告消失，因为提案人未再当选。同时，政府的反对方案也已被免除了，因为内阁不久就下台了。短时期内，一切情况如旧。

按照非官方的看法，所谓的官方报告根本不重视弗里西亚之外的其他省份的工资情况，这不应使人感到惊讶。关于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在那些地方童工占有极大的比例。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学校几乎是没有人，因为儿童都到田里干活去了。人们可以按照成年人的工资任意克扣儿童的工资。然而，必须指出，有些地方童工回家时带回的工资是每周 25 分，为了挣得这点工资，他们必须天天干活。不管是田间劳动还是开采泥炭的劳动，人们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雇用年龄最小的童工。如果说农村工人的状况真是十分悲惨的话，那么工厂工人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根据政府指令所作的调查结果可以证明，社会党多年来关于许多工业企业的悲惨情况的报道都是真实的。说真的，许多工人不敢在委员会面前说真话；那些胆敢说出真实情况的工人的勇气使他们大为吃惊，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地、对明显的事实作

出必然的结论。在正式场合，人们否认工人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

为了否认工人不敢公开发表意见，他们用了特文特的一个工人的事例。这个工人说出了他对工厂的种种抱怨和不满，声称自己的工资太少，不能适当地生活，但是最后他却向调查委员会主席表示，他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任何不满，而且还觉得过得很舒服！尽管有这些障碍，官方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一般说来，工人的劳动时间过长，他们每天照例要劳动 12—16 小时。有一些工厂，工人从上午 9 点劳动到半夜。手工织布工人的工资估计平均大约为 7.5 盾，通常每天劳动 11 小时。

在荷兰，工厂车间的卫生条件很差，即使最简单的规定也没有照办。在大部分车间，老板们对通风和排除污浊的、危害健康的的气体的设备的安装都不够重视，工人亲身感受到了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政府任命工厂视察员一举尽管引起了轰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博得工人的好感，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没有能力完成他们的重要任务，还因为他们人数太少，不能有效地监督一切。

而且，政府往往不怀好意地任命一个本人就是蒸汽机制造商的人去担任工厂视察员，这个人对企业太偏向，或者说对企业总是有些偏向，因此他的判断就不足以被认为是独立的，不偏不倚的。政府似乎不理解，若要使监督获得成功，首先必须任命医生作视察员，在必要时，医生可以请求工程师和机械师的帮助。根据这种情况，人们可以理解荷兰工厂从卫生角度来看还是很落后的。

但是，政府严重忽视真正异乎寻常地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从事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的长时间劳动的现象，可能会消失。但雇主们知道并坚信，他们会受到政府的偏袒；就这个问题，他们

甚至联名给部长写信。

那些用他们的劳动帮助驱走冬天的寒冷的工人的境况更加悲惨。尤其是在弗里西亚开采泥炭的工人，还有那些在其他泥炭田里劳动的工人，他们过着一种简直是无法描写的生活。如果你也是一位这样的工人，当你收到这些不幸者的来信的时候，你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诅咒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呢，还是同情那些像牲口一样驯服地倒下去的不幸的人。开采泥炭的工人每周一般干4天半活，他们在这几天里挣的工资是7盾或8盾；在这几天当中，他们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在挖泥炭的时候，他们住的是窝棚！晚上他们就躺在稻草上睡觉，身上盖的是马背上的披毡。他们吃的东西有：用从泥水坑里打来的水和的面做的食物，用植物油或动物油炸的土豆，还有黑面包。其他地方的矿工的状况都要比我们这里的泥炭开采者的状况好。简言之，他们的工作是人类的耻辱，而且他们都是未成年就过早地被雇佣。他们的手像爪子，他们的背向下弯曲，犹如四足动物。

最近这些天来，在荷兰人民面前又展现出一幅极其动人的、表明了铁路职工的状况的图画。把人累得精疲力竭的劳动，过长的工作日和微不足道的工资，迫使这些奴隶联合起来，他们抱着一个希望，即希望通过集体行动，他们在将来能够获得较好的工资待遇。成立了协会，并开始秘密进行工作；这就是说，协会的全体会员都编了号，因此用不着担心被人知道。在铁路公司的各个部门供职的8000名男女职工中，约有5000人是这个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发表了一个关于铁路职工状况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描写：机修工和司机的劳动时间每天经常长达15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长达18、20至24小时，这样一来，机修工终于处于一种使他们无法充分照管乘客的安全的状态。管理人员的

工作日也长得可怕。他们的工资为每天 1.4—2.5 盾。但应注意到，他们的开支同样也比较大，因为他们经常离家在外。养路工和扳道工的工资每天为 0.95—1.60 盾，他们的妻子往往都在道岔口值班，照看栏杆，每天可以得到 0.25 盾的报酬。养路工和扳道工由于工资菲薄，被迫过着一种不是食不裹腹，就是始终靠举债度日的生活，而最后陷入无法继续生存的绝境，因为再没有人借钱给他们了，他们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铁路公司下属的车间里，有一些超过 20 年工龄的人，他们不得不满足于每小时 8 生丁的工资，而另一些每天工作 10 小时拿固定工资的人，有时则要劳动 14—16 小时，而且这部分延长的工作时间他们得不到任何报酬。车间里怨声四起，因为不注意通风，工人几乎经常处于烟雾迷漫之中。

人们不给一天假日，甚至星期天也难放假。列车的锻工有时每隔 15 天有 4 小时的休息，擦地板的工人 4—5 星期休假半个星期日，司机 8 周休假一个星期日，扳道工 6 周休假一个星期日，车站工人每月休假 1 天，车站工人（同时是扳道工）30—40 天休假一个星期天。

政府自己公布了一个关于铁路职工状况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和协会的调查结果完全相符，这个调查结果可以概括如下：人员应当增加，工资应当提高，服务时间应当缩短。

最近，铁路协会致信铁路管理机关，坚决要求改善这种状况，但可能会遭到拒绝。因为经理们是贪婪的，他们的理想就是给股东们提供高额的股息（荷兰的铁路都在个别企业手中）。在近期内，可能发生罢工。还出现了一些迹象，有人希望在各国铁路员工中成立一个国际联合会，这将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手工工人争取生存的斗争，也同样是极其艰苦的。木工、泥

瓦工、油漆工、锁匠，所有这些人都是为社会利益献出了他们一生的精力。但是，他们获得的工资不允许他们对生活作任何改善的想法，过长的工作日，过低的工资，迫使荷兰工人发出绝望的呼号。同时他们还不得不艰难地同长期无人雇用这种情况作斗争，尤其是在大中心，工人在这方面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城市雇主们从外省找来一些多半是拥护教权的工人，并使用这种驯服的工人。雇主们付给他们的工资之低简直令人难以相信。雇主们用这种办法大大压低工资率。手工工人的工资为每小时12—25分。他们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4点或5点至晚上7点或8点，当中有1、1.5或2小时休息时间。总的不利之处在于，工人通常必须干些额外的工作，这就必然延长了许多劳动时间，而使其他的人失去工作。

雇佣仆人一般支付的工资是每年50—150盾，主人提供膳宿。虽然这种仆人还不打算联合起来，但是他们已经多次试图采取联合行动。除了一个希望由法律宣布男女平等，但并没有去努力争取普选权的妇女团体而外，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它们正直接奔向自己的目标。它们明白，只有获得社会主义所希望的经济独立，妇女的整个地位才能发生人们希望看到的那种变化。同样，只有社会党才渴望实现男女平等，才能在这方面准备解救妇女。

荷兰是一个小小的贸易国和小小的农业国，在荷兰也像在其他各国一样出现一些同样的现象：知道转向大工业和由此产生的结果。资本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准备好了自己的失败，社会主义也在同样程度上准备好了安排生产，因为资本家已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了。在将来，政府宁可管理事务，而不是统治人。

第 二 部 分

由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人民的精神力量被摧毁了，这是容易理解的。因而荷兰的工人运动在共同的斗争中没有达到其他国家已经达到的程度，这也是并不奇怪的。但是我们仍然热心地从事这一艰巨的工作，唤醒工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落后的。

最早的工人协会是荷兰工人总协会。数年前，它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建立的，目的是摧毁国际及其支部的力量。开始时，这个协会是唯一人数相当众多的。协会表现软弱，缺乏勇气，过分地妥协顺从。工人的问题似乎只有依靠非工人的帮助才能解决。这些人有时装得很关心工人。情况后来恶化了，协会的领导坠入了自由党的圈套而不能自拔，有一个托伦及其他一些人甚至被选进了众议院，甘心成为走狗，为自由党的先生们服务。这个人当时曾经是个强有力的人物，而现在却在自由党外交官的沙龙里寻觅朋友。他本来应该同这些人首先进行最有力的斗争，因为在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剥削者。

协会衰落了！过去，它曾有一份周报《工人使者》，每周出版一期，在一些时期甚至每周出版两期。然而，今天则成了一份月刊，主要读者都不是工人，工人很长时间只对它有所耳闻，但从来也不读它。和这个协会相似的还有一个新教徒工人的协会（名为“祖国社”）。它比工人总协会强得多，然而后来很快蜕化成为一个神学文艺社团，并不关心工人的利益。近来，人们不时看到它的一些变化。这个协会的重大错误在于，它不知道摆脱特权阶级，相反，却以为可以在特权阶级中找到保护人。它认为工人阶级状况

的改变应首先依靠祈祷上苍以及资本家与劳工的合作。根据这一理论，“祖国社”认为在资本家阶级那里寻找支持，并不背叛工人的事业。然而相反，“祖国社”从经验中感到，这种依靠圣经的合作并没有产生有益的结果，因而有必要在内部进行一次严肃的斗争。结果是工人成员顺从了，但实际上这是消极的态度，早晚会导致解体。“祖国社”拥有一份报纸，名称同协会名称一样，每周出版一期。

一些年来，人们建立了另一个工人协会，称作荷兰天主教工人协会。这个协会内部有各种身分、各种地位的天主教徒，并由神甫直接监督。各支部由一个委员会领导，事先不经神甫的咨询，委员会什么也决定不了。

这个协会由一个总委员会领导，后者直接由主教监督。经神甫咨询顾问作出的大会各项决议必须经主教批准，成员必须服从这些决定。这个协会的整个组织与其说是一个工人的协会，毋宁说是一个宗教机构，始终遵循着由教皇规定的制度，必然成为阻碍工人阶级发展的羁绊。它禁止工人成员阅读教会作品以外的书。集会只许会员参加，其他学说的拥护者不许参加工人问题或政治问题的讨论，如果偶而一次允许某些人参加讨论，则规定的条件是：不准反对已经宣布的原则。该协会现在办有一份机关报《人民旗帜》，每周出版一期。

这个协会展示的力量似乎很大，但实际上则微不足道。神甫在教堂中再也找不到足够的力量阻挡工人的不断的发展。就在教堂旁边，设立了这么一个协会，试图加强控制，这显然证明教会的信徒们已不再是那么顺从了。从这一经验中，可以发现工人将日益看清安慰思想的实质，传教士竭力用这种安慰思想来安抚财富的生产者，结果操纵武器的人将被武器所伤害，玩火者必自焚。

除工人的解放外别无其他目标的协会是民主社会主义协会。它的内部组织不必叙述了。只须知道，它包括一些支部，每个支部都有自己的委员会，整个协会归名为中央理事会的总委员会领导。

然而最高权力属于每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每个支部都向代表大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即使是那里通过的决议也还不是最终的法规，因为这些决议首先应交给所有成员，通过全体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通过全体投票选定的，以避免任何特别照顾或追求好职务的偏向，同时也是训练成员，使他们了解将来的人民政府的完整的含义应该是怎样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执行机构。

它是由所在地的支部选举组成的。凡年满 18 岁的成年男女均可成为协会的成员。人们为年龄不到的少年建立了一个少年协会，与此并列的有一个少女协会。在社会党存在于荷兰期间，它可以因一系列成就而自豪。在它的鼓动下，反动的政党被迫拟定了一些本来无疑是不会有的法律。在社会主义的宣传下，制定了一个有关童工的法律。虽然这项法律本身意义并不很大。随后又有一项关于工厂劳动的法律，总的是要保护女工和不满 16 岁的少年。实际上，这些法律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它制定的范围太窄，因而对工人来说，即使有一些好处的话，也是极微小的。但是应该提到它们，因为它们是社会党鼓动的结果。这些法律的制定使资产阶级感到害怕，是日益扩大的社会主义从统治阶级那里强行夺来的果实。我们的宣传还获得了其他的结果。过去不同的党派互相勾结，从来不允许下层阶级置身插足，而自从社会党人的集会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所有其他党派也都组织起公开的集会。

实际上，自由党人是尽可能地逃避争论，天主教会一贯排斥

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双方都尽量避免接触。但是，今天公开讨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权力的机会则多得多了。另一个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激进党。这个党起源于自由党与天主教，它尽力想在资本与劳工的斗争中起中间调停作用，这是在混乱的时期经常有的。但是它似乎又并不愿意表白和平是对它自己有利的思想。

在社会党的迫使下，反动派甚至派工人当资产阶级在市议会的代表。虽然这仅在某几个城市出现，但是这表明，人们已被迫向工人讨好。1888年，社会主义者成功地把党的机关报《大众权利报》的编辑多梅拉·纽文胡斯选进议会。今年由于自由党和激进党首领的阴谋，我们丧失了这一席位。激进党的首领在这件事情上背叛了他自己党的利益。全国人民在大选中只有一个口号：“赞成或反对普选”，各个不同党派都联合在这一口号下，而激进党领袖特累伯先生则完全违背了这一协议，认为在众议院的代表中驱逐社会民主党人比保守党的协议更为体面，尽管他曾多次宣秒自己是保守的自由党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却与这些自由党人缔结和平。由于这一背叛，他获得了成功。

然而，这次落选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我们党的倒退。现在在弗里西亚的农村地区，没有哪个党强大到足以占少数派联盟的上风。1888年时是这样，今天同样还是如此。在最近一次的大选中，社会党甚至赢得了最多的选票，但由于所有各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党，使我们居于少数。由于一个激进党候选人不小心地作了承诺，表示拒绝支持比例选举制，所以如果他的同党政治伙伴中有一人在其他地方被提名，就要重新进行选举。如果多梅拉·纽文胡斯同意当候选人，他很可能已被选上了，但是他觉得这样依靠一个激进党人，并作为他的代理人的方式进入议会，有损社会主

义的荣誉，因而他退出来了。

此外，虽然选举权是极有限的——4个男性成年人中只有1人能投票——社会党在选民数量上还是增加了。比1888年增多了4000票，当然，这证明宣传工作在中产阶级中获得了进展，因为工人没有选举权。如果他们有，我们相信，我们有8—10人能选上。所以，我们有理由感到满意。

社会主义的鼓动尤其推动了工人的联合。在弗里西亚，建立了一个农村工人的党，叫做兄弟信任会，该会坚定而有力地促使分散的工人进行联合，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它以一种少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与热情发动并坚持着农村工人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细节在一本由让·斯塔普写的题为《兄弟信任会的建立》的小册子中有报道。一年多来，农业工人发动了罢工，但是，尽管作出了许多牺牲，由于资本的优势，他们退却了。该会附属于社会党，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党，参加该党的人都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又不能完全接受社会民主的各项原则。这个在弗里斯建立的党只要坚持不反对工人，而且站在他们一边，就能有效地发挥有益的影响，与工人党合并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事物发展逻辑的趋势，人们应敢于接受它，这无疑将在几年内完成。社会主义的宣传促成建立了教师工会。有一个教师工会拥有不少支部，参加的人有信仰社会主义的，也有非社会主义者，他们坚定而有力地宣传着民主理论。另一个教师工会的会员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以口头或文字的形式尽力传播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个工会出版了一份月刊。最强有力的协会——人们可以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果——是铁路工会，这个工会的成员包括铁路雇员的大多数，它秘密工作，出版一份半月刊《信号台》，人们不知道它的编辑部在那里，文章的作者都只用数字号码标记。

最近还建立了一个邮局与电报工会。这个工会也将在全国建立支部。在短短的时期中，已建立了两个支部。这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果，而且是在不顾反动派反对的情况下建立的。反动派对社会党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进行中伤诽谤。在这方面，尤其是自由党已同教皇极权派相勾结，自由党的发言人甚至声言社会民主党不能担任公职。你们可以想象，荷兰是以自由的美德而自豪的，而在自由的名义下，却能做出这样的事。自由党曾建立了一个雇主协会，但今年这个协会已经解体。然而，一些领导人却还站在台上。由于似乎感到不可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日益发展，自由党人就投入了教会的怀抱，并且支持天主教徒的协会，希望依靠它们来帮助扑灭工人运动，或者则是利用救世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唆使工人离开可诅咒的社会党人。下述情况证明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社会民主党有份每日出版的机关报《大众权利报》和一个周刊《人民论坛》。还有一些在地方上出版的周刊：《激进》、《人民事业》、《钟》、《人民之友》、《人民报》；弗里斯的《人民报》每周两期；一份讽刺幽默刊物《社会党人》。此外，各工会还出版：铁路员工协会的《信号台》、《烟草工人》、《木匠》、《灰石工人》、《教师》等。因而虽然有许多障碍，荷兰的社会主义宣传还是完成了任务，唤醒了工人的良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社会党始终要使工人懂得劳工的解放是工人的使命。实现这种愿望的证明就是让工人在他们自己的机关报上讨论他们自己的利益，报纸由他们自己编辑，自己的人领导。

工人觉醒的结果是，在荷兰人们也已开始把罢工看作是战斗的手段。没有哪种运动比罢工更清楚地表明每个真正革命的步骤都是由工人自己的意志决定的。工人刚刚开始作初步的练习，所以他们要求掌握他们自己认为有必要加以改善的手段。他们看到，

罢工是一种手段，因此，每当他们断定必要时就运用它。像荷兰这样一个工业如此微弱的国家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罢工，如昂希代织布工人的罢工，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码头工人的罢工，比尔特农业工人的罢工，北方泥炭工人及库朗堡烟草工人的罢工等。第一个失败了，原因是由于天主教神甫阿里昂的影响，他利用宗教的巨大力量支持资本家。第二个罢工几乎在各方面都胜利了，然而工人在赢得这个辉煌的胜利后却没有想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工会，而各自分手了。但是，他们现在则又重新与英国的工会联合。最重要的是后面几次罢工，比尔特的罢工事实上失败了，罢工者被开除，现在支持罢工的工人还须在财务上给这些被开除的人们以帮助。夏天，被开除的工人尽量集体地到处去找工作，相当成功。在冬天，人们收购亚麻，再由他们加工。这些工人都是上文曾提到过的兄弟信任会的会员。

库朗堡的罢工事实上还是受到了打击，工人非常正确地坚持了罢工，他们所表现的坚韧精神足以为其他工人人们的楷模。但罢工还是失败了。

凡是注意观察荷兰工人运动的人都会明显地感到工人运动的影响是出乎意料地快速。当你看到，我们的宣传在农村几乎没有遭到反对，你就会同意我们的看法，不应低估我们在荷兰所取得的进展。我想我已在上面提到过，最重要的是工人在没有结束自己的困难处境之前是不会停止斗争的。

只有工人自己才能办到，当时机到来时，他们会想出必要的手段去完成这件事。当他们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日，并为此而提出强烈抗议时，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引导者要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开始懂得缩短工时是必要的；所谓的引导人只是提出工人的愿望，他必须按照工人的意愿制定目标，荷兰的社会主义

宣传工作就是这样理解并且这样实行的。

五月示威证明了这一点，它获得了重大成果。

无论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海牙，在工业的特文特还是农业的弗里西亚，在格罗宁根还是在泥炭沼泽地区，人们都热烈地庆祝八小时工作日，全世界所有地区，在同一天提出了同一个口号，这是从未见过的事件，使我们对未来产生了更多的希望。

辉煌的普选示威也证明了这一点：5月份为了争取普选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示威。示威人数在4万到5万之间，这充分表明了人民的要求和热情。

我们并不认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而是认为大家都是为了相同的任务而联合起来，大家都有权利争取相同的利益。我们为社会主义民主所提出的伟大目标而合作。

有时，为了争取这样的合作，为了完成宣传任务，我们作了努力，我们是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作为目的而这样做的。我们荷兰人认为，通过议会道路并不能赢得解放，所以，我们不十分重视议会辩论。

自然，我们要利用选举和议会讲坛为我们的事业服务。然而，这对我们来说，这永远只是个手段，甚至是有危险的手段，因为尤其在成功的情况下，必须防止犯错误，无产阶级应当意识到个人主义特性所具有的危险，并通过对当选者的严肃的批评与控制来避免这种危险。

所以我们有时也参与合作开发资源，并得到好处，但人们永远不能使我们为了现实的利益而牺牲无形的事业。不，无论是合作还是议会讨论都不会使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并不左顾右盼而是径直走向目标，只有鼓舞我们冲向敌人——资本主义——的战歌才是最可贵而神圣的。我们有一副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炽热

的心,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同时我们也要求获得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一方面尽力发展理论以增强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让工人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努力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荷兰在各方面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此,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说,在世界性的劳工反对资本的斗争中,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无愧地捍卫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尽管我们做了一些事,我们仍然还有巨大的任务有待完成。在某些时候,情况似乎显得很严重,但我们绝不能后退。片刻的犹疑会造成灾难性的退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工人解放的工作,促使工人自己摆脱自己的枷锁。为此,我们始终一贯地向我们的同志说明我们的斗争是国际斗争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理解到单独一部分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只有所有的工人都获得了自由,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所以荷兰的社会党人并不认为单单依靠他们亲爱的祖国就能获得幸福的生活。贫困是没有国界的,因此我们的斗争也是没有国界的。有关我们荷兰的报告就快结束了,我们为我们的原则不断前进而欢呼,我们不只是为荷兰民主者欢呼,也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而欢呼;我们站在所有各国的共同的旗帜下进行战斗,我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们的斗争是统一的。种族、国籍、宗教、肤色都不能使我们分离,因为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任何人也不要害怕,我们为我们的解放而共同工作!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关于荷兰烟草和雪茄烟工业、 荷兰雪茄烟工人和烟草工人联合会 组织情况的报告

在烟草和雪茄烟工业工业有 20 000 或 25 000 名工人(其中 5%是女工)。这个行业多半都是由一些小厂经营的。例如,在阿姆斯特丹有 50 个雪茄烟厂和 800 名雪茄烟工人。在多特有 24 个雪茄烟厂和 111 名雪茄烟工人。大量工厂主只雇佣 2—20 名工人。这个情况对工人非常不利。在大城镇,平均每日工作 11 个小时,每星期工资 9 盾。在小城镇,平均每日工作 13 或 14 个小时,每星期工资 6 盾。在许多小村镇,每日工作 15 或 16 个小时,每星期工资是 4 或 6 盾。妇女的工资通常比男人的工资少。学徒工的人数非常多,然而却没有任何培养熟练工人的基础教材。

雪茄烟工人的工资是按堆支付的,没有任何规则。他领到的原料完全没有或几乎完全没有整理好,他不得不亲自整理,或者出钱雇人替他整理。

许多工厂都采用了罚款制度。相反,奖赏是极少给予的。工厂的照明、取暖和清洁卫生费常常从工资中扣除。

工厂的设备一般都很差,甚至安装的最新设备也是极不完善的。工厂法刚刚颁布不久,工厂视察制度刚刚建立,很不完善,还没有见什么效果。

组 织

有一个雪茄烟工人和烟草工人的中央组织，名叫“荷兰雪茄烟工人和烟草工人联合会”。它有 26 个地方分会，在那些地方劳动的有 4 000 名左右雪茄烟工人、1700—1800 名烟草工人和对烟草进行分类分级的工人，此外，还有 2 500 名男女学徒工。联合会有 2 000 名会员。

每个会员每星期缴会费 10 分(2 便士)。这 10 分的用途如下：3 分用作中央基金(因此每个会员可以得到周报看)；2 分用作中央抵抗基金；1 分用作旅行基金(为此，每个会员有权利用这个基金到凡是有联合会组织的城市去旅行，每年两次)；1 分用作国际抵抗基金；3 分用作地方基金(负担地方费用)。

每个地方分会都有自己的领导机构。联合会的首脑是中央领导机构。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凡是有联合会分会的地方都设有一个联络处。外出旅行做小买卖的兄弟可以找联络处帮忙，那里会把旅行费分给每个会员。

联合会通过报纸和公共集会进行宣传。这两种宣传手段的力量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联合会的目的是通过逐步改善工人的非物质的和精神的状况来实现社会主义。

此致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以中央领导机构的名义：

F. W. 格宾(会长)

N. M. 吕特曼(书记)

关于匈牙利社会民主主义 工人运动的状况

匈牙利工人运动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朝气蓬勃,大有希望,但接着就陷入了令人担忧的停滞状态;只是在国际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89 年)的影响下,才获得了新的生命。最近 10 年来政府积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与此相联,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迅速沦为无产阶级。由于这两个原因,才真正为现代阶级斗争创造了经济前提。在这种对认识阶级状况产生了有利影响的情况下,关于在巴黎举行的无产阶级世界议会的消息,像一股电流一样,也震惊了匈牙利工人阶级,使它欢欣鼓舞,充满了喜悦的希望。

在巴黎起草的决议传到了这个国家最偏僻的角落。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很快就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景象——多年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沉闷气氛为之一扫。

党的两个机关刊物《人民之声报》和《工人周刊》(1891 年 1 月 1 日改称《工人报》)的发行量很快就增加了,并开始以更合乎时代精神的方式进行编辑。同时,在迄今为止注意得最少的方面,即在出版短小精干、有教育意义的著作方面,也开展了必要的活动。用匈牙利文、德文、有时还有斯洛伐克文编写的各种小册子和传单出现了。《匈牙利工人丛书》的出版,满足了长期以来的需要,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向匈牙利工人介绍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最优秀的

社会主义著作；《丛书》也出版原著。

为了支援国内外的罢工运动，救济被捕者和受处罚的人，为了设立宣传基金等等而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增强了同志间的团结感。

1890年初开始有了工会组织，而在此之前，工人组织的活动主要是救济病人，而且它还一再蜕化变质，成为瞎闹一气的团伙。

最近成立了6个工会组织，其中有4个是全国性团体。此外，还成立了许多工人教育协会。

工人阶级正对公共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一点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重新表现在1890年3月就星期日休息法案表明态度时采取的统一行动上。在这次统一行动中，许多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集会。1890年5月1日的群众大会，就其统一性而言，是非常雄伟的，就其庆祝过程而言，是庄严的。在这一天匈牙利工人感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过去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在这一天，首都有6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各州首府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争取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第二个重要的步骤是1890年12月7日和8日在布达佩斯召开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比起过去几次代表大会来有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不仅表现在大会的组成（各州代表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和大会上提出的观点更加成熟这两点上，而且还表现在下面两件事事实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机会主义的残余被粉碎了；党由于接受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终于自由而公开地表示拥护社会民主主义。

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委托书的代表共121人，其中87人来自布达佩斯，34人来自下列各地：阿拉德、布鲁斯、迪斯、德穆舍德、埃

劳、芬夫基兴、大拜克斯克雷克、卡兰塞贝斯、克劳森堡、克隆斯塔德、内迈特—博格山、诺伊萨茨、欧罗什哈佐、潘克索瓦、普雷斯堡、雷希特查、鲁特卡、苏托、施图尔韦森堡、塞格丁、泰梅什堡、泰莱西奥佩尔和韦尔雪兹。

这次代表大会的后果很快就反映出来了：党的两个机关刊物的订户有了可喜的增加，宣传经费也增加了。在工会组织方面，可以看得出活动异常频繁，因为从代表大会召开以来，细木工、裁缝、花边编织工、金匠、鞋匠、方格花样织工和吹奏乐器制造工相继迅速地成立了全国联合会；在机器制造业中干活的铁匠，以及陶器工人目前正在酝酿成立工会组织，石匠办起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专业报纸（德文和匈牙利文的），鞋匠和细木工也办起了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专业报纸（都是匈牙利文的），这些报纸的创办都是和工会运动密切相关的。

此外，阿拉德及其近郊的同志们在 1891 年 4 月为南匈牙利创办了一份用匈牙利文出版的党的机关刊物《公共福利》。遗憾的是，由于匈牙利地方当局的亚细亚式的专横，该刊出版还不到 4 个月就被迫停刊了。

鉴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急剧高涨，政府迅速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甚至使目光最短浅的人也看清了“匈牙利的自由机关”不是为工人存在的。这些往往是非法的措施可能在有的场合阻止了我们运动的前进步伐，但是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它们使阶级矛盾更尖锐地表现出来，从而促进了反对这个国家里已经滋长过盛的沙文主义的行动。

不仅政府，还有有产阶级都在疯狂地进行攻击，攻击的矛头主要针对着国际劳动节。这种攻击的结果是，1891 年庆祝五一节的群众集会比起上一年来的群众集会来大为逊色。政府、警察和雇主联

盟采取高压手段和一切想象得出的非法措施来破坏劳动节的成就,当然,这并没有完全得逞。但是,由于使用了恐怖手段(威胁要进行惩罚等等),成千的党员同志没有参加示威游行。因此,在首都参加庆祝活动的工人只有约 14 000 人。引人注目的是,在各州首府,五一节庆祝活动的规模相对来说要大一些,有的地方甚至还超过了上一年。

针对农业工人中间新崛起的运动采取的措施特别严厉,不过关于这个运动的情况传到国外去的报道有些夸大了。事实是,自从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以来,贝凯什州《人民之声报》的订户引人注目地增加了。这个现象可以从下面两个原因中得到解释:一个是,从前很富饶的贝凯什州的中等阶级地位下降和小农完全沦为无产阶级是最近出现的事情;另一个是,贝凯什州的多半信仰加尔文教的农民受过相当良好的学校教育。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农业短工中有些人读过毕希纳的《力和物质》,并且懂得这本书。有些人读过达尔文的著作,并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

这些人感到用匈牙利文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太少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方面理解得很透彻,而且怀着满腔热情去宣传它,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他们就一窍不通了。

农民中间这个带有一点朴素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就从贝凯什州蔓延到邻近的琼格拉德州、阿拉德州和托隆塔尔州,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办得很好的《人民之声报》的读者范围扩大了这一现象中得到证实。在短时间内,许多乡镇的农业工人都成立了工人教育协会。田间工人计划在 5 月 1 日进行庆祝活动,这给当局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来无耻地在居民中挑起骚乱。

在欧罗什哈佐,5 月 1 日这天早晨,在工人教育协会租赁的一座房子的庭院里升起了一面白绸旗,旗帜的两面分别用金线绣着

“自由、平等、博爱!”，“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睡眠!”两条口号，——当局毫无道理地把这面旗帜没收了。这激起了令人担心的场面。然而由于那些头脑冷静的人的好言相劝，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贝凯什—乔包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那里5月1日这一天发生了流血事件。当地人民银行不久前的破产、地方税的突然大幅度提高和官吏的骇人听闻的贪污受贿行为，已经使人民群众极端不满，因此，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足以引起群众不满情绪的爆发。

现在政府找到了它希望得到的借口。在此之前，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举行的集会，现在完全被禁止了。正在成立的协会要求批准它的章程的申请遭到拒绝，已经存在的协会被解散了，推销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商人受到威胁和刁难，不得不放弃报刊零售工作；例如，单是在欧罗什哈佐，零售额就减少了300份。由于采取了向欧罗什哈佐的许多因为工资低而无力一次付足订费的读者暂时免费赠阅《人民之声报》的措施，才避开了这个打击。

在此期间开始的田间劳动(劳动时间每天持续16—20小时)给人造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宣传似乎削弱了的印象，然而有产阶级却大错特错了。一个面对警察和士兵的刺刀敢于说“你扎吧！开枪吧！我们的命本来就是一钱不值的！”的人民，是决不会投降的。

比较冷静地考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必须承认，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在近期内不会获得巨大意义。成立田间劳动者的所谓工会组织的事，首先鉴于在上匈牙利有报酬要求很低的斯洛伐克工人的竞争，是无法考虑的，更不用说要把没有文化的工人组织起来是多么困难了。

但是，不可否认，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已在不可低估的规模上深入农村居民中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在田间工人当中已奠定了大有希望的开端，并将随着土地这一农业资本的积累集中到越来越少

的人的手中，在田间工人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有强大影响的因素。

在匈牙利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方面表现在成立工会组织和因此而获得的益处上，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民主党报刊发行量的增加上，特别是表现在我们的党组织已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的、有阶级觉悟的政党上。

如果用适当的数字来说明我们党的活动成果的话，那么和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比较起来，这些数字当然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不过应该考虑到，从经济方面来看，匈牙利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业化的进度才刚刚超过初期阶段不远。

然而，有一点现在多少还是可以值得慰藉的，这就是，匈牙利的无产阶级运动经过努力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已走上了正轨；既然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正在以坚韧不拔的、越来越大的干劲朝着既定方向奋勇前进，那么我们终于就有了保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力量的发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也将同时壮大起来，它在争取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国际斗争中，将自豪地同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并排地站在一起。

波兰代表团的报告

由于我们的叙述必须简短，我们想简明扼要地阐述一下近两年来发生的，能够说明我国社会问题的状况的一些重要事实，同时也想提出一些使我们了解到我国的状况和在波兰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鼓动的发展情形的观察结果。

我们从普属波兰开始，在这里，社会主义运动力量最单薄，社会主义鼓动才刚刚起步。

一个问题是：在波兰的这部分国土上，尽管德国社会党给我们树立了如此光辉而令人鼓舞的榜样，但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发展得最缓慢，在这里，怎样做才算正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除上加里西亚外，普属波兰从经济方面来看，是德意志帝国最不发达的部分。没有工业中心，过时的生产制度，受外国人控制的商业和高级工业，被围困在沙文主义的和天主教的政治中的小资产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鼓动在这里遇到的障碍。此外，文化斗争、流放法令、日耳曼化委员会等等，在吸引人民的注意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即把反对派的政治交给贵族、地主、工商业暴发户和神父议员这些特权阶级来执掌。文化斗争给神父议员罩上了一个虚幻的殉道者的光环。

最后，我们注意到，在波兰的这部分国土上，社会主义鼓动只能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制度下进行，并且已由我们的原籍是俄属

波兰人，而在这里的身分是外国人的伙伴着手进行，他们受到当地警察蛮横无理的对待。此外，甚至我们在波兹南的伙伴所受的惩罚比起在德国的伙伴来也要严厉得多。普鲁士政府想借助警察的暴力来扼杀方兴未艾的宣传鼓动。

鉴于在普属波兰经济条件还没有达到足够成熟的地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鼓动在这里不会发展到像在一场内部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那样大的规模，而这个危机的最初征兆已经出现了。文化斗争结束了；至于我们的民族党，它通过它的代表——议员科米罗夫斯基、科西尔斯基等人之口向国王发表了效忠的声明，从而使最天真的人也擦亮了自己的眼睛。因而，我们的国内政治也正在发生危机，可以说，破产已经正式宣布了；至于破产的管理人，这只能是波兰社会党，它正迅速组织起来，尤其是自从党的机关报《工人报》创刊以来，这个报纸从今年初起便开始在柏林出版。

在加里西亚，即奥属波兰，确切地说，工人运动是从 1890 年 5 月 1 日开始的。这个由社会党人领导的运动是建立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上的。1890 年 11 月，加里西亚工人党成立了，它的第一个目的是，把一切工人组织引上政治运动的轨道。当这个党开始组织职业工会的时候，它很快就在加里西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奠定了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

现在，在伦贝格、克拉科夫和斯坦尼斯拉沃夫都有由社会党人领导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都能根据我们党的需要迅速增加。

我们党在加里西亚有两个机关刊物：《劳动报》和《工人报》。

加里西亚波兰社会党人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1891 年代表大会，从而证明，不仅在经济问题上，而且甚至在奥地利帝国国内劳工政策问题上，他们都和德意志、捷克以及奥地利境内其他民

族的工人组织携手并肩前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俄属波兰的情况。这个地区受到俄国沙皇政府的锁链的束缚,处于最困难的政治条件下。俄属波兰尽管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迫(这种压迫是任何其他专制制度,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专制制度,都无法比拟的),尽管处在一个一切工人组织、工会或行会都被严格禁止的国家的统治下,它仍然站在波兰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前头。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以及由于经济情况有相当发展,俄属波兰已卷入欧洲国际生活的漩涡。不幸,这块土地在 1861 年和 1863 年又浸透了鲜血,当时在贵族波兰的坟墓上盛开着现代资本主义思想之花,而在实证主义的军旗下工业被理想化了。然而革命传统决不允许这个流产的自由主义在精神上扎下太深的根。从 1878 年起,在华沙开始有了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起初具某些宗派性质,然而却始终倾向于成立一个阶级组织。从 1878 年起,在华沙工人中间建立了抵抗力量的秘密基金。

1883 年斗争思想获得进展;斗争的需要,通过初次尝试成立一个名叫“无产阶级”的集中组织,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1884 年以来,我们的组织的迅速增长使俄国政府感到震惊。尽管沙皇政府并不比别国政府聪明,但它决不是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它也想对一个只把经济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运动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策略在其他政府中往往找不到实施的对象,对我们只能有利;为了避免一切误会,每一次,我们的组织都不得不强调这一政治态度。

直到今天所取得的成果表明了我们的伙伴的干劲。我国的政治情况去年已经允许庆祝五一节,而今年已在华沙进行了庆祝,参加庆祝的工人有 20 000 多人。同一天,罗兹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日拉尔杜夫的一家纺织工厂的全体工人(9 000 人)停止工作

来进行庆祝。我们读到了从波兰最黑暗的农村寄来的、写给那些远离自己的故乡来寻找工作的波兰工人的信。这些信表达了对五一节的感人肺腑的信心和殷切的希望。

一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实是，当社会主义者在5月1日进行的庆祝在我们这里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5月3日举行的保守的和爱国的示威游行却遭到了真正的大失败。群众中发生的这一变化，赋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组织一项新义务：革命党要想成为我国最强大的党，就必须肩负起领导全民族的重任，并表达它的主要愿望。波兰社会党人要更加坚决地履行这一义务，因为受到在法国掀起的试图扼杀那里的共和国的犯罪鼓动鼓舞的沙皇似乎想在欧洲政治中扮演一个侵略者的角色。面对这一事实，波兰无产阶级将不会忘记它作为国际社会主义家庭中的一员所承担的义务。

出席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由波兰3个部分的代表组成的波兰代表团认为，为了在波兰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和为了国际社会主义政治的利益，只成立一个单独的组织是必要的；一方面，这将使它的反对在波兰的3个部分都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敌人的阶级斗争易于进行；另一方面，这将使它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内发挥出色的政治作用。

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的政治条件和法律条件为把社会主义工人组织起来的活动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在这两个地区，波兰党按照和同一国家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签订的协定行事。至于俄属波兰，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群众的合法政治活动问题，在这里，波兰社会党人在对待他们的俄国同伴方面，始终遵循万无一失的国际团结的原则。

罗马尼亚工人党的报告

罗马尼亚基本上是农业国。在罗马尼亚,农民是人数最多的、最重要的劳动者。这类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是由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状态过渡的方式,以及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农民(1864年的法律)的方式所决定的。

在罗马尼亚,刚刚统治了30年的自由资产者的地位,是以和西欧完全不同的方式确立的。罗马尼亚根本没有强大的、依靠不断的斗争最终能够战胜封建制度的第三等级。这个国家几乎完全是农业国,根本没有大工业,几乎完全没有大资产阶级。由开小铺子的商人、面包师、屠夫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尽管人数众多,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单靠这些力量本身还不能使现存制度发生某种巨大变化。战胜封建制度的决定因素不是国内条件,而是国外条件;战胜了封建的罗马尼亚人(旧贵族和地主)的不是罗马尼亚资产阶级,而是在西欧获胜的资产阶级,它保证了相对说来非常软弱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对相对说来非常强大的罗马尼亚封建制度的胜利。

资产阶级只是在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才开始有了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而在罗马尼亚,毋宁说,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毫无疑问,我国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对我国的社会生活

来说,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只要紧紧抓住实现这种转变的方式,我们就能想象得出罗马尼亚农民阶级目前陷入极端贫困和无比悲惨的境地的原因。像这样的贫困和悲惨的境地,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见不到第二个例子。

罗马尼亚农民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对这个国家和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都极其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一点,以便很好地认识这种状况。

引进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之一,显然是在旧贵族和农民之间废除了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

不废除这种关系,当然就谈不上资产者的个人自由问题,谈不上劳动的自由问题,谈不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更谈不上其他一切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毫无效果的问题了。

1848年革命者首先关心的事情,是直至1864年才实现的废除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即解放农奴。但是,用使农奴立即和劳动工具脱离,立即和土地脱离,并把土地交给旧贵族的办法来解放农奴,是办不到的。解放农奴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即把一小块土地作为个人的、不能转让的财产交给每个农民,而不顾旧贵族保守分子的抗议、嗥叫和绝望。

农民得到了一小块劣等土地,靠它提供的产品农民无法维持生活。鉴于罗马尼亚的耕作方法是粗放的,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一般说来质量是低劣的这一事实,在耕种几年之后,就会使地力完全耗尽,就会使土地不能提供维持农民家庭生活所必要的收成。此外,农民完全没有饲养牲畜所必需的牧场。

为了获得牧场,农民不得不去请求大地主照顾;加之,农民的土地往往离他的家很远,他要到地里去干活就得经过旧贵族的土

地,而贵族们则不让农民自由地通过他们土地,说这是侵犯他们的财产。农民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没有牧场,他的一小块土地往往又是一块插花地,周围全是地主的,因此,没有旧贵族——他原来的主人——的允许,他就无法到那儿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获得解放后,不要多久就会处于完全依赖的地位,处于经济上真正受奴役的地位。

在收割完庄稼之后,地主或农场主就拿走他们的一份,这部分决不少于整个收成的一半,有时甚至占全部收成的 2/3。

然而,除了这些实物地租之外,农民还有其他一些附加义务:他必须按照规定的天数在旧贵族的耕地上劳动,还要用一定时间来把旧贵族的粮食运进谷仓;他必须按规定的数量向旧贵族缴纳鸡蛋、鸡、鸭、鹅、羔羊等等。另外,为了取得通过和饮牲口的权利,农民还要履行一连串名目繁多的义务:他,他的妻子,或他的孩子必须去给人干几天活,有时是耕地,有时是在玉米地里锄草,有时运东西,等等。

如果有人敢于反抗,地主和农场主拥有强迫农民就范的一切行政手段,外加军队;负债累累的和倔强的农民受到压制,被拷打,被折磨,被强迫劳动,这就是他的天职!这在西欧是闻所未闻的事,然而在我们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东方习俗的国家里,却是每日都可见到的令人憎恶的现实。

1864 年分配土地后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其结果导致农民财物的全部丧失和他们沦入可怕的赤贫境地。

1864 年的法律宣布农民的土地是不能转让的,然而,这些土地却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落入资产阶级之手,罗马尼亚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就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

1880年前后,1848年民主派的幸存者们对他们的行为的后果感到震惊,其中之一,真诚的和多愁善感的民主主义者、罗马尼亚自由派公认的领袖C. A. 罗塞蒂,在当内务部长时,曾下令进行农村调查,调查的结果证实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个劳动日的工资等于5分钱!目前在巴黎和比利时学习的罗马尼亚青年社会主义者搞了一次募捐活动,以便铸造一种纪念章,纪念章上面有一句题词:“一个劳动日值5分钱”。请注意,这样的合同绝非例外!

罗塞蒂部长设法通过了一条法律,自此以后,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一切非法契约,也就是有关转让土地的契约,都被宣布“无效”。

不幸的是,这条法律几乎没有付诸实施,可是,资产阶级却不能原谅罗塞蒂的这种胆大妄为;他被迫辞去部长职务。代替这位民主主义者的,是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前1848年革命者扬·布拉蒂安诺。他毫无保留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甚至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化身。从那以后,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真正胜利的进军才开始了。农民阶级确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没有正义,也得不到保护,任凭地主和农场主对他们进行肆无忌惮的和不受限制的剥削。

为了说明对农民的压迫严重到何种程度和对农民的保护措施缺乏到何种程度,我们即使只从罗马尼亚报刊根据各种简单事实的重要性逐日所作的记载中也可以引证大量的事实。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点就够了,即行政当局,地主和农场主,像在中世纪那样对农民滥施酷刑和拷打,这类事件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里层出不穷,以致它们既不令人感到愤慨,也不使人感到惊奇。

罗马尼亚人的国家,有辽阔的地域作为国家的财产。这片地域受到资产阶级的掠夺和蹂躏;它的一部分以极低的价格被出卖,另一部分以更低的价格卖给了农场。全国的农场主又把这部分土地分割成许多小块,然后通过土地契约并依靠行政当局的帮助把它

们租给农民。他们越来越多地摧毁农民的财产。这就是在我国发生的原始积累过程。

土地有一个天然保护人：它的所有者；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的、没有任何保护人的农民，则命中注定要成为农场主的猎获物。对农民进行的这种残酷的剥削的结果之一是，地租大大提高了。一个具有特征的事实是：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首领、总理扬·布拉蒂安诺在一次议会演说中自吹自擂地说，在一个极短的期限内，在他的统治下，地租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国家财富的增加。真是弥天大谎！要知道，事实是最近几年来，粮食的价格不仅丝毫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事实是，资本根本没有被用来改良土地，土地的肥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明显降低了。

地租的这种大量提高，只能导致劳动力价格的大大降低和对农民的剥削的加重。

1885年访问过罗马尼亚的比利时经济学家德拉维勒耶先生赞扬了罗马尼亚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所过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但是，当他看到罗马尼亚农村和农民的小屋时，给他留下的却是令人难忘的痛苦印象。他说，这些小屋甚至还比不上非洲中部的住宅。这位比利时经济学家无意中泄露出来的东西，就是穷奢极侈和极度贫困之间存在着解不开的连环套。极度贫困是穷奢极侈的反衬。农民虽然跌落到了社会底层，但仍然试图对地主施加本来可能行之有效的压力：大批逃亡。

在农民当中有人开始逃往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逃到塞尔维亚的农民的遭遇相对说来要好一些。由于罗马尼亚政府的干预，这股潮流被武力制止了。保加利亚不让罗马尼亚农民越过它的边界。逃亡的农民太多了。1888年爆发了被称为罗马尼亚农民起义的运

动。这次起义毋宁说是示威运动,但由于发生了以下两件事,示威运动变成了暴力行动:一是杀死了一个非常残暴的农村镇长;二是一个官吏和某些生性残忍的乡镇委员会委员受到了虐待。

但是,这种暴力行为足以使空论家和文人(青年派)政府首脑的威信扫地,因为他们把这次部分地区的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次农民起义还有待于历史家们去评说,他们会描述军队根据青年派政府的特别命令所下的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罗马尼亚议会和青年派政府被农民起义和社会主义宣传吓得惊慌失措,魂不附体,它们赶紧投票通过一条新土地法,这条法律宣布,国家的全部地产将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这条已表决通过的法律不过是一个大骗局。关于向农民提供贷款,以使用来购买农具的提案被否绝了;相反,人们决定在每个村庄向富裕农民出售大片土地,从而形成一个农村小资产阶级,它将是防止革命倾向的堤防,实际上它应当压倒农民阶级,办法是并吞更穷的人的土地,把他们变成经济上受奴役的阶级。

现在,我们打算谈一谈产业工人的情况。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奠基人感到,有必要建立大工业,这是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机构发展的首要条件。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证明,对于资本来说,建立新的产业部门非常困难,而要使现有的农业生产贫困化则十分容易。

这个拥有方便的积累手段的资产阶级,当它着手建立强大的工业的时候,总是证明了自己的明显的无能。尽管捐税很高,尽管消费者必须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但昨天诞生的民族工业始终停滞不前。由于资本家的最无耻的剥削,这种情况还难以维持下去。有些刚刚勉强建立起来的工厂,让工人每天从早上5点钟一直干到晚上9点。不用说,他们的工资都少得可怜。举一个例子来说,皮瓦耶什蒂有一家雇有200多名工人的纸板厂,该厂的工人有一

半是青工，尤其是 10—14 岁的女青工。这些不幸的人每天劳动 16—17 小时才获得 30—35 分钱的日工资。至于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他们的工资顶多到 1 法郎。

现在罗马尼亚处在马克思所说的以少量工厂和大量小作坊为代表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这一工业发展阶段。马克思断言，在这个时期，对工人的剥削特别严重。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几乎所有的作坊都很狭窄、肮脏、不通风，繁重的劳动一天持续 16—18 小时，工资菲薄。相反，作坊老板的态度却残暴、粗野到极点。生产奢侈品和工艺品的工人，以及那些要求有较长的学徒期的行业的工人，可以稍微多获得一点报酬。印刷工人每天劳动 12—14 小时，每周工资为 20—25 法郎。机械工人、制铁工人和木材工人、高级制鞋业工人等等的情况也大致相仿。

工资上的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自 1880 年以来，由于农业、商业、金融方面的剥削，以及其他种种盘剥，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开始变富了。今天，资产阶级是一个人多势众的和强有力的阶级。这个有钱人的阶级正在寻找最近 30 年来有相当大发展的城市。为了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必须大量进口各式各样的外国商品。由于保护关税的限制，有些可以在罗马尼亚的城市制造的产品不得进口。为此，不得不从国外聘请国内缺少的能工巧匠。自然，这些工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祖国到一个工资比他们本国低的国家里来，因此，他们要求大大提高报酬。

在罗马尼亚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店员阶级。经营小商店的商人接受儿童当学徒，让他们无报酬地劳动 4 年或 6 年，这是老板认为学会做生意的必要期限。其实，只需一个月就可以学会做生意的本领。学徒工在 4—6 年以后，每月可以挣得 40—50 法郎的工资。

这些商业小奴仆每天劳动 17 小时，连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因为商店在星期天不关门。

从最小的年龄起就被剥削的第二类不幸的童工，就是古老行会的最后残余——手艺——的学徒工。这些学徒工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就像商店伙计一样受到剥削。的确，他们一天要干 16—18 小时的活，而老板除了供给食物之外，其他什么也不给。

他们不能上学读书，看到父母这样穷，他们命中注定没有可能超越这个社会条件，因此，这些不幸的人的生活是可怕的。他们从黎明一直劳动到半夜，每天只在干活的房间里躺在悬吊起来的普通木板上睡五六个小时。至于学徒制的经济后果，我们仅指出两点，即被承认是工人的工人中的激烈竞争和这种状况造成的必然结果——工人工资的减少。

* * *

现在，谈谈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形。直至 1874 年，在我国不存在社会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这个词也没人知道。此外，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在罗马尼亚存在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不可能在这里开始。

欧洲社会主义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即通过俄国，从西方国家输入罗马尼亚来了。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是这个原因，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带有这个时代的俄国社会主义的标志。这种俄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巴枯宁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以及道德形而上学宗派主义的混合物。一些俄国侨民和在罗马尼亚避难的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人，在雅西这座边境附近的城市带来了社会理论的这个混合物。他们开始在学生中，在中学教师中，在小学教师中，总之，在有教养的社会中，到处积极进行宣传。

在工人中进行的宣传未能取得多大效果，这是由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它拥有的宣传手段很少所决定的。过了一些时候，雅西的社会主义者出版了一份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报纸《比萨拉比亚》。这个名称使人想起被俄国兼并的比萨拉比亚。

罗马尼亚的这个无政府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青年人大部分都有严肃的科学的文化素养，这种文化素养和无政府主义的概念水火不容。由于自由党政府的迫害，《比萨拉比亚》报在存在了几个月之后就消失了。

自由党政府仇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它的理论宣传。在这个政府看来，社会主义是空想，是儿戏；然而，社会主义也使它感到不安，它只是在等待有利时机，以便消灭社会主义。时机不让人久等。

1881年3月18日，雅西的社会主义者决定举行示威游行，以庆祝巴黎公社周年纪念日。准备工作已得到警察局的允许。

俄国驻雅西领事得悉此事后，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抗议，借口是，这次有俄国侨民参加的、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处死后第六天举行的示威游行，看来是对俄国恐怖分子的赞许。自由党政府禁止了这次示威游行。

我们之所以首先研究雅西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运动最早是从这里开始的。同样的运动在布加勒斯特也发展起来了。在布加勒斯特，像在雅西一样，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只限于在有教养的阶级中进行宣传，这个宣传在大学生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有才能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开始在一个名叫“弗兰茨拉尔”的大厅里举办一系列公开的演讲，这些演讲对青年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84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我们已经说过，社会主义者怎样在抛弃无政府主义的公式时，迅速向

欧洲的科学社会主义转变。1884年在雅西出版了一份由扬·纳德伊德主编的《社会评论》杂志，该杂志的理论部分是由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者康·多勃罗热贾努-格里亚撰写的。

《社会评论》杂志使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带上了西欧已经存在的国际社会主义性质。

这家杂志，从它的内容来看，只能影响有教养的人。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因为绝大多数民众都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因此不能掌握阐明的理论，从而无法接受社会主义宣传。这个缺陷为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一种日报《人权》所弥补了。这家报纸用社会党的适当措词，使《社会评论》杂志上阐明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了。由律师、记者和大学生主编的这家报纸不仅受到了爱好者的极大欢迎，而且更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欢迎。不幸的是，突然发生的巨大物质困难，迫使报纸停刊了。

* * *

在继续阐述社会主义运动之前，我们应探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对那种不相信社会主义在罗马尼亚有存在的可能性的观点作出回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甚至怀疑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最奇怪的是，这种怀疑竟然是以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为依据的。

在这个国家，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而正是这个阶级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者；所以，在资产者看来，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活动不过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事，它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它只是一种诚实的和徒劳无益的模仿。这个社会主义标签顶多只能掩盖一个激进党的成立。对所有这类说法，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已经不止一次地用发表在《人权》报上的文章予以回答。为了同一目的，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想干什么》的书。

我们说，正像1848年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它必需的经济基础事

先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在这个社会甚至不是由极其大量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情况下,依靠这种制度已在西欧获得胜利这一事实,还是在罗马尼亚形成了一样,我们革命社会主义者,正在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引进社会主义组织。

除了已经说明的理由之外,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还有人数众多的农业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后盾,他们正在或将要更多地把这个阶级吸引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另一个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因素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团结。

这个因素不仅非常强大,而且还将以一种比欧洲资产阶级对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帮助更有效得多的方式来帮助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此外,社会主义的完善组织决不会日益遭到损害,与此同时,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机构本身,不顾对劳动生产力的破坏,正为社会党开辟道路和扫清地盘。

对于这些从历史本身的发展中提出的反驳论据,罗马尼亚资产阶级避而不答,而只是继续不停地叫嚷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舶来品。

无可否认,欧洲或美洲的社会主义必然负有领导运动的使命,这是因为在那些地方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宣传的条件要比在罗马尼亚有利得多。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从策略的观点来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应当拥有自己的武器,即经济条件和经济场所,它必须在这个经济场所上进行活动,因为这是它自己的经济场所。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保护劳工并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个在西欧非常引人瞩目的问题,在罗马尼亚决不应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问题。可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农业契约问题,因为关系到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反对地主的剥削,所以这个问题对罗马尼亚来说,将比所有其他问题都重要。

罗马尼亚社会党之所以有理由存在以及它和欧洲社会主义关系密切的原因在于：它们两者都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建立一个团结和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劳动工具都将属于社会所有。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各国将视自己本国的特殊情况而定。

* * *

我们党的实际活动的最初表现是在农民中积极开展鼓动工作，这项工作是由雅西的社会主义小组，尤其是我们的不辞辛劳的朋友扬·纳德伊德进行的。在1887年开始的这个鼓动工作，由于涉及农民的直接利益，也就是说，由于提出了实施土地法的要求，所以使农民感到关切，并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还在C. A. 罗塞蒂时代制定的这条法律，某些方面对农民有利，但是，由于当事人施加的压力，乡镇行政当局将它束之高阁，不予理睬。

社会主义者的鼓动的价值在于使农民了解这条法律。这个鼓动所取得的成功也是相当显著的。农民大量汇集到雅西来要求土地。我们感到，在出版专门为了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的《工人》周报的同时，还必须成立一个劳动者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也就是在劳动者中间，社会主义者将告诉劳动者他们遭受苦难的真正原因和实现他们的正当要求的方法。

在罗曼、巴克乌、瓦斯卢伊、普特纳等城市也进行了同样的宣传。在罗曼，这些宣传鼓动的效果是，莫尔宗当选为罗马尼亚议会议员。同年，在扬·布拉蒂安诺政府垮台之后，在农民起义之后，扬·纳德伊德不顾行政当局的令人可憎的压力，成了雅西第三选举团（农民选举团）的代表。议会解散后，V. 莫尔宗再次在选民面前亮相。这一次，他成了第三选举团和第二选举团（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选举团）的代表。纳德伊德也将出席议会。在布加勒斯

特, 律师、社会主义者米勒和该市的社会主义者一起成立了一个俱乐部, 它应当成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中心, 尤其是在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次选举之后。

首都是这个国家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在首都, 社会主义必然具有它在西欧所具有的那种性质。围绕着这个俱乐部, 成立了几个行业工会, 即制鞍工人工会, 制鞋工人工会, 印刷工人工会, 等等。布加勒斯特劳动者俱乐部的特点之一是, 其中有许多外国工人。这些人多半都是邻近国家的劳动者, 他们不是长期居住在布加勒斯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 并把他们学到的社会主义理论带回去在他们的同胞中间进行宣传。关于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些学院中学习的外国青年(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的情况, 也可以这样说。因此, 布加勒斯特成了东欧社会主义的策源地。

现在, 罗马尼亚社会党, 即“工人党”, 有 3 个主要俱乐部: 布加勒斯特、雅西、加拉茨; 在其他一些城市, 如罗曼、布勒伊拉、普罗耶什蒂、福克沙尼等, 还有大量会员。我们还要强调指出巴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大学生俱乐部, 它为党提供了许多积极分子。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活动可以概括如下: 通过举办演讲会、出版小册子和《工人》周报等方式进行的宣传, 通过劳动者的政治组织, 以争取政治权利, 即普造权, 争取直接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 通过组织劳动者, 以争取把工人从政治奴役和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罗马尼亚, 社会主义宣传的成效已经以庆祝五一节的方式表现出来。为履行 1889 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曾派遣 5 名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的决议, 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加拉茨等地庆祝了五一节; 仅仅在布加勒斯特, 1890 年参加五一

节庆祝活动的有 3 000 人,1891 年有 4 000 多人。这些数字尽管对西欧的城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在其他性质的示威运动中,这却是难以达到的。

关于社会主义者在农民起义和在制定关于把国有土地出售给农民这条法律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还必须讲几句。我们已经说过,1889 年苦难达到了顶点,瓦拉几亚的农民在许多地区造反了。

社会主义者没有参加,也没有鼓励这个运动,而是在尚未爆发起义地方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个运动的发生。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是:罗马尼亚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关于自己的要求他们还没有清楚的想法,他们的起义只会被淹没在血泊中,而他们的整个阶级将受到更残酷的奴役。

摩尔达维亚的农民派了一个代表团来找扬·纳德伊德。他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向农民们说明,他们的起义多么有害,同时还向他们指出,为了获得胜利,他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行动路线。这就是说,要组织成为一个阶级的党。无可否认,正是社会主义者的影响阻止了摩尔达维亚起义的爆发。罗马尼亚的某些社会主义者批评党的这种态度;他们倾向于一种更加革命的态度,但是他们以守纪律的精神服从了大多数人的决定。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在制定关于把国有土地出售给农民的法律这件事情上,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们要求不要把占全部国土四分之一的大面积公有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相反,还要购买一些私人财产来扩大它,然后,再把这样形成的大面积土地划分为农场,以略为提高的价格卖给农民和农民公社。此外,国家还应当向他们提供购买劳动工具、机器和役畜等等的资金。

这个草案被资产阶级议会否决了。工人们甚至没有时间来了解修正案，他们本来是可以对议会的表决施加一定压力的。关于出售小块土地的法律就是这样草草通过，从而变成既成事实。

* * *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经过 15 年，尤其是最近 6 年的激烈斗争后，已有了自己的俱乐部，自己的刊物和一个政党。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资产阶级党派都毫不犹豫地建议和这个政党结成选举联盟。这个党已经把自己的代表送进了罗马尼亚议会，并迫使舆论承认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存在。今天，15 年来一直忽视和轻视社会主义的人和事的舆论，承认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是当然事实。每个农村都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在更偏僻的农村，农民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的宣传鼓动的影响。在许多公社，农民推选社会主义者当自己的代表。社会主义者每天都在取得更多成就。不过，党还太年轻，又遇到大量困难，显然对国家还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我们获得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它使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大军中的一支小分队。

瑞士职业工会联合会的报告

瑞士这个国家工业很分散；它的 22 个州的立法机关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它的人民操 3 种不同的语言；这里有大量外国工人定居；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运动必然带有特殊的性质。

600 年来我们都生活在共和制度和自由制度下。但是，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已经向我们证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君主国之间没有多大差别。最近在瑞士建立的政治警察，就是一个新的证明；政治警察的建立擦亮了长期以来昏昏欲睡的瑞士劳动者的眼睛。

过去，搞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乎完全是外籍工人，主要是德国人；现在，瑞士工人已开始加入运动，因为他们懂得了他们备受称赞的自由，不过是幻想而已。因此，对外国人怀有的沙文主义仇恨正趋于消失。

今天，大部分行业协会是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仅要求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且首先想要加强无产阶级大军的队伍。

然而，我们几乎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宣传，因为工人们不懂得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和采取共同行动的好处。

瑞士意大利语区和法语区的文化水平较高。我们在这两个地区的同志同时要办的事情太多，没法写出大量像样的作品。德裔瑞士工人什么也不干。现在情况已发生变化。然而，不应陶醉于幻想。

在棉花、生丝和羊毛工业，以及花边饰带业中，工人仍然不愿意参加运动。

在有 20 000 从业人员的刺绣业中，只有少量工人参加了工会，其余的人仅仅参加了他们的互助协会。每 8 个司机中，只有 1 人是工会会员。在钟表制造业的 30 000 工人中，有 12 000—15 000 人参加了他们的职业组织。在伐木工人中，有 1/8 的工人是工会会员。

至于主要是在瑞士东部各州即圣加尔州、阿彭策尔州、图尔高州、格拉鲁斯州和苏黎世州兴起的刺绣业，那么，这个行业的工人所遭受的最大痛苦，是生产过剩造成的痛苦。要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并不总是集中在工业中心，而是分散在农村地区。

钟表制造业在侏罗地区，即索洛图恩州、伯尔尼州、诺伊尔堡州、弗里堡州和日内瓦州较为发达。在这个行业的 40 000 名从业人员中，有 12 000 人不是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不算强大，它防止老板雇用非会员工人。这些工人同他们的德裔瑞士伙伴没有关系。

印刷业包括两个集团：德语集团和拉丁语即法语和意大利语集团。前者拥有 1 000 名工人，后者拥有 500 名工人。这个协会起初一事无成。1889 年它提议为全瑞士的劳动力规定统一的价格。在老板拒绝这个提议之前，印刷工人已决定举行总罢工。经过顽强斗争，印刷工人获得了胜利。

然而，必须指出下列行会的那些无与伦比的工人，他们最先认识到了职业工会的好处。这些工人是：冶金工人、玻璃工人、订书工人、制鞋工人、毯垫工人、裁缝、油漆工人、编筐工人，他们成立了“瑞士行业团体联合会”。

这个协会在 1883 年有 7 000 名会员和 193 个小组，非常兴

旺。1885年以后,这个强大的协会已把它的会址从日内瓦迁往苏黎世。1886年,这个协会的工人建立了支援罢工的预备基金和资助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救济基金。这两个基金都设在伯尔尼。

然而,工人联合会在1888年分裂为一些纯粹的政治团体;与此同时,第一个工人行动委员会成立了,以便最终让位于“瑞士社会民主党”。

1888年,当分裂发生的时候,罢工基金由一个七人委员会管理。由于党的这个委员会遇到了困难,1891年1月25日召开了一个有270多位代表参加的大会。

大会精心草拟了联合会章程,现将它的主要条款摘录如下:

1. 瑞士行业团体总联合会包括瑞士行业团体的一切组织。

它的宗旨是:保护行业,维护工人利益,结束工资制度和按照社会民主党纲领实现生产资料的联合。

5. 每个小组保证享有自治权。它加入联合会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使工人运动保持统一方向。

6. 联合会拥有预备基金,它应当用来帮助劳动者进行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斗争。

7. 为了支付宣传鼓动费用和管理基金费用,每个会员每一季度缴纳0.60法郎会费,其中10分用于基金管理。

9. 联合会的内部事务由联邦委员会管理。联邦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委员每年改选一次。在它之外,还成立一个检查委员会。

同样,将任命一位领工资的联邦书记。迄今为止,这位书记尚未任命。

21. 如某个行业团体想举行罢工,它必须把它的声明告知中心委员会(如果有这个委员会的话),并接着告知联邦委员会,同时加上关于工资、劳动时间、罢工人数等等说明。

26. 只有得到行业团体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的允许才能举行罢工。联邦委员会将探寻在工人和老板之间是否有达成协议的可能。

29. 一个小组必须在加入行业团体联合会 3 个月之后,才能指望罢工得到联邦委员会的支持。

向罢工工人提供多少救济金,将由委员会作出决定。

另外,印刷工人和伐木工人还有私人基金。

行业联合会有自己的机关报《工人之声》,这份报纸有很多读者,它也同样属于瑞士社会党。

一个把所有瑞士工人协会集中起来的运动正在形成。在瑞士的一些大城市,这种联合已经实现。在伯尔尼就有 40 多个结成同盟的小团体。

自 1889 年 6 月以来,在瑞士爆发了大约 30 次罢工。已经证实,这些持续时间很长的罢工,对劳动者说来,是来之不易的胜利。

我们还要证实一点,由于工会的干涉,避免了大量冲突。

我们在瑞士工人中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概括起来就是这些;我们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致敬。我们现在要对他们说瑞士代表曾经在巴黎代表大会上说过的话,

再见,

两年后愿我们在瑞士再相会!

报告人

奥古斯特·梅尔克

1891 年 8 月 12 日于

苏黎世 - 赫尔兰登

挪威工人党的报告

挪威工人党成立于1887年。它包括17个团体,共有2500名党员,其中400名是女党员。

党拥有两家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工人之声》报;前者在克里斯蒂安娜出版,每周出3次;后者在卑尔根出版,每周出2次。

工人党的最强大的对手是自由党人。尽管他们拥有金融手段,但是,我们已经有可能夺回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我们每年为争取普选权和八小时工作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分别在5月17日和5月1日),受到大多数劳动者的热烈欢迎和同情。

挪威是一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国家。在我国缺少宣传员和鼓动员,因为在一个多山的、面积比比来时大10倍的国家里进行宣传是非常困难的。举个例子来说,在这个国家,从一个大城市到另一个大城市,需要走两天半,它们之间的距离很远。

由于地理位置非常不利,思想发展面临巨大困难,人们应当了解这一点。但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还是日益兴旺,一切工人组织都将赞成社会主义原则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一般说来,民主思想在挪威占统治地位,但是,只有6%的居民享有选举权。

党在选举中通常都是和自由党人一起投票,后者已把普选权列入他们的竞选纲领。党还没有提出自己的代表,但是,在挪威王

国的第二大城市，自由党人的一半席位将属于社会主义者。

工人党已经开始在市镇选举中单独竞选。它的候选人提出了自己的涉及广泛问题的纲领，他们有希望大批进入市镇议会。

阿根廷共和国工人党的报告

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正处在绝望的经济危机中。大地主阶级的成员通过军阀掌权这种专制暴政统治着我们。这是一种极不公正的寡头制度，它允许大地主阶级成员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进行疯狂的、无限制的剥削。

由于这个制度，国库资金已被盗窃 4.94 亿比索，即 24.7 亿法郎；14 个省，甚至全国政府都濒临崩溃的边缘，以致于无法偿付它们的债务；5 家官方银行和其他 7 家私人银行被迫宣布没有偿付能力；如果共和国总统的正式讲话可信的话，3 年来国家财富所遭到的损失已高达 10 亿多比索。

资本的集中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国家财富有一半掌握在 200 个大财主手中。

1889 年移民入境差不多有 30 万人，现在变为出境了，而且出境移民的人数与日俱增。据估计，今年出境的移民超过 10 万劳动者。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了解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工人阶级的生活只能是最悲惨、最令人绝望的。

我们的大批伙伴已经离开阿根廷到巴西或欧洲去了，其他的人也准备离开；必要时他们甚至不惜卖掉自己的最后一件衬衣，以筹措路费，因为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大批工人回到农村去了，在那里为了挣得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工资，他们在种植园和家畜饲养场同印地安人竞争。大批内地人只要有口饭吃就肯干活。

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这里那样，生命和财产随便听人摆布。

工人阶级，无产者没有权利，没有保障。

1890年我们成立了阿根廷工人联盟。我们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要求保护劳工（八小时法，等等）的请愿书，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受到重视。因此今年我们又重新提出了请愿书。

我们原订在今年五一节举行的游行，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严重干扰，他们喋喋不休地鼓吹总罢工，袭击商店和社会革命。

我们不愿意受被无政府主义者的荒谬言论激怒的警察的蹂躏，因此，我们没有参加上述游行。这次游行导致了警察对示威者的攻击，在冲突中有人受伤，有人被捕。按照我国的惯例，被捕者不能很快获释，不管他们多么无辜——而喋喋不休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及时躲开了，他们像怕得要命的羊群那样溜掉了。这就是他们的策略。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秘密集会的方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普拉塔、查斯科马斯、圣菲、门多萨以及其他地方庆祝了劳动节。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尤其是通过我们的机关刊物《工人报》（西班牙文版）和《前进报》（德文版）来宣传社会主义。

我国的工人报刊还有以下几种：《人民之友》（共和派，意大利文版）；《工人联合》（反社会主义的，不定期刊物，西班牙文版）；《印刷工人》（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版）和《被迫害者》（无政府主义派，西班牙文版）。

我们正竭尽全力同和我们作对的命运进行斗争，以利于解放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崇高事业，——我们决不放松。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联盟委员会：

L. 巴塞斯、卡里特、G. 乌梅尔、
C. 科甘、A. 库恩、C. 毛利、帕拉斯、
普雷拉、J. 皮克尔斯、里戈利、
罗卡、D. V. D. 图森

俄国社会党人的报告

自从我荣幸地向巴黎代表大会(我受几个俄国社会主义小组的委派出席了这次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专制制度的斗争情况的报告以来,已经过去两年了。对我关于这个时代所作的简略概述,我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要补充。但是,我的巴黎朋友们和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在新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向来自世界各国的社会党人表示他们的俄国同志的赞同和兄弟情谊。在资本主义世界处于防守一方的国家鉴于自相残杀的战争而结成三国同盟或四国同盟的庄严时刻,在眼看这场战争日益临近、《马赛曲》这首从前的革命歌曲和对一位把生命垂危的病人送上绞架并把妇女和儿童鞭笞至死的暴君的颂歌不伦不类地掺杂在一起的时刻,我们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是,向一切国家和一切种族的社会主义者表达我们的兄弟情谊,以及我们对戴皇冠的专制政权和剥削资本的仇恨。

俄国的情况没有多大的改变。缺乏任何有组织的工人的政党,缺乏任何强大的、把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组织,这始终是我们的宣传事业和我们的活动发展的巨大障碍。自由派方面,面对专制政府,同样缺乏干劲,这使它不能形成一个在国内有影响的政党;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这样的党的核心,将来只能由那些坚定不移地宣布他们的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组成。

俄国青年知识分子继续不经判决而往往只是根据怀疑而遭到大规模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方各省去。一切因自己的真正科学的著作而产生影响的教授,一切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出鼓舞人心的号召的作家,也同样成为警察怀疑的对象,并有被看作是国家的敌人的危险。

俄国犹太人所遭到的野蛮而荒诞的压迫,已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操英语的国家激起公愤。我国的所谓“慈父般的”政府由于未能有效地预防帝国 20 个省内发生的并可能危及其余各省的饥荒,而再次证明了它的无能和对人民的漠不关心。

只有彻底摧毁俄国现存的制度,彻底摧毁这个反动的和在各方面都腐败透顶的制度,才能指望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的的生活有所改善。由于事物的同样逻辑,俄国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承认革命社会主义的旗帜,而不是别的旗帜;他们只能在明确肯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范围内寻求拯救祖国的办法;他们正在进行,并将继续进行他们反对帝国专制制度的斗争,而决不妥协。

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高兴地看到,他们的斗争得到了他们的外国兄弟的同情,甚至也得到了那些在俄国运动中只看到政治革命的旧因素的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甚至明显地表现在仅仅偶然涉及我国的真正运动的一些事件上。有几个俄国青年流亡者被指控在巴黎制造爆炸装置。他们并没有搞这种活动,有关当局只是根据毫无道理的推测把他们判处监禁。于是,人们纷纷对被监禁者进行声援,这种声援不仅来自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哈雷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且也来自各国人士和自由派团体。一个俄国前警官已请求巴黎方面予以协助。尽管官方进行迫害,尽管渴望复仇和耽于可能同俄罗斯帝国旧式专制政府结成同盟的幻想的法国各政党陶醉于爱国主义的狂热中,我们仍然得到了法国社会和报刊的意外同情。在

大洋彼岸有一个名叫坎南的人，他在热情洋溢的演说中和重要的文学著作中坚决地、公开地维护俄国革命事业。在英国和美国为数众多的团体组织起来支援俄国的革命运动，尽管它们多少受到了一点那些企图无视我国革命者具有的社会主义因素和宁愿把他们说成是在 1688 年的英国和 1789 年的法国进行斗争的那些党的幽灵的报刊的迷惑。毫无疑问，俄国社会主义者对所有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同情他们的斗争的人只有表示最热烈、最衷心的感谢。但是他们不想隐瞒，他们的唯一的旗帜是国际社会主义的红旗；他们正在为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尤其因为这个专制制度在俄国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致命障碍；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肯定自己是先前在俄国以及其他地方为人类进步而进行的一切斗争的真正的实际继承者；他们从前只是作为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他们希望重新组织起来，以便形成一个有影响的政党的核心；最后，他们号召专制制度的一切敌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以便尽快推翻俄国现存的反动制度。

正是这种信念把我们和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我们，我的朋友们和我，向参加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我们的兄弟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他们的组织是我们赖以建立我们未来的结构的唯一政治基础，他们的胜利将是我们的胜利。国际社会主义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在我们心中燃起新的希望。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兄弟！请永远记住，我们的斗争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是为了同样的、也是鼓舞你们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即为了最终解放劳动而进行的斗争。

彼得·拉甫罗夫

1891 年 8 月 9 日于巴黎

圣雅克大街 328 号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 给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91年8月于布鲁塞尔)的报告

公民们！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派代表参加今年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他们的缺席不会给你们造成任何实际困难：在你们的决议中，我们的声音不会有多大的重要性，更确切些说，它不会有什么分量。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向你们说明我们不参加的原因还是有益的。

公民们，你们大家如果有时间和愿望来阅读这篇报告，就能了解10年来在整个文明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俄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

我们开门见山地说，既没有无益的客套，也没有响亮的词句。任何掩饰对我们的运动来说都是有害的，对你们这些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来说，都是不适当的。

向你们讲真实情况是我们的义务，这个义务之所以更易于完成，尤其是因为我们的实际情况远非暗淡无光，相反，现在在俄国的经济生活中可以看到许多现象，使现存制度的反对者们真正有理由对未来抱有希望。

正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国政治状况的特点是，我国的专制政府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这个专制政府把我们的惨痛记忆中的西方专制制度的最坏的方面，同东方专制制度的全部丑恶结合在一起。俄国沙皇政府同时依靠欧洲的科技发明和农民的亚洲式的愚昧无知。它利用科学来更好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来宣称政府是最适合俄国人民**民族精神**的政府。

可以想象得出，这个臭名昭著的民族精神不过是政府臆造的，绝妙地用来替它的存在辩护的荒谬诡辩。无须证明，没有哪一国的人民生来愿过沙皇陛下的臣民所过的那种卑贱和贫穷的生活。俄国人民根本没有类似愿望。政府称之为人民的**民族精神**的东西，不过是俄国经济不发达造成的这种精神的**不发达状态**而已。

这种经济不发达状态被认为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非常引人注目的表现。我国的亲斯拉夫的反动分子和革命的巴枯宁分子一样，只是异口同声地称赞这种民族精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他们的理论中都同样热心地把民族精神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立起来。俄国已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抗阶级及其斗争中被拯救出来了，——这就是他们同唱的一个调子。因此，反动分子作出结论说，威胁欧洲的社会革命，在俄国不可能发生。因此，巴枯宁分子说社会主义在我国将很快获得胜利。这是这两派在理论上的唯一分歧点。

向你们这些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强调现代无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肩负的革命使命是多余的。同样，要证明哪里没有无产阶级，那里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多余的。你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代社会主义只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凡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

如果要证明我们的论断的话,那就要用完全不同的材料。你们可能会对下面这种学说感到惊讶,即**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当代,在某些不管什么样的国家的革命者中可能找到信徒。

然而,如果你们想一想,这种古怪的理论同巴枯宁的宣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不会使你们再感到难以置信了。你们可能知道这个人的矛盾的、晦涩的和形而上学的学说。此人有时被人当成卓越的辩证法家,其实他不过是一个拙劣的诡辩论者。

在 10 来年中,俄国是巴枯宁主义的牢固阵地。由于巴枯宁主义者的宣传,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本身在俄国革命者中被搞臭了。1883 年年底以前,当我们开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对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我们同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行动。

这种抨击的确是有根据的:我们是同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向我们的同胞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了解它的理论和它的行动对俄国人来说是必要的,尤其因为俄国人,甚至在西欧的俄国人,直到那时所研究的都是巴枯宁主义者的学说和实践。

我们被逐出了革命党,遭到世人的诽谤,受到政府的迫害,许多年来我们不得不同巴枯宁主义者的各式各样的学说进行斗争。这是一件苦差事,不过已经差不多完成了。现在我们可以庆幸,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障碍已经扫除了,虽然巴枯宁主义者的偏见在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上还留下不少痕迹,不过在那些传授哪怕只带有一点点革命色彩的思想的人中,再没有人敢把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同情视为罪行。相反,在俄国革命者中,这种同情正与日俱增。

说真的,我们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有时甚至在西方社会

民主党人中引起了恐惧，他们认为这个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他们担心，我们的宣传会在革命党内引起纠纷，会削弱革命党反对政府的斗争。但是这种恐惧尽管是十分正当的，不过幸而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不是为了理论而牺牲革命运动的实际成就的教条主义者。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俄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取决于，即使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保持巴枯宁主义者的偏见的話，我们是会默不作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不得不承认，巴枯宁主义已成为使我们的运动削弱的根源。因此，我们同巴枯宁主义进行斗争，正是为了恢复我们的力量。

公民们，请注意，我们所说的巴枯宁主义者不单是指无政府主义者。已故的彼·特卡乔夫自认为是布朗基的拥护者。他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斗争，并同巴枯宁本人论战。然而他关于俄国社会条件的整个思想却打上了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的烙印。

和巴枯宁一样，他把我国经济生活的落后状态看作是我们将很快获得进步的保证。和巴枯宁一样，他在理论上也把俄国农民同西欧无产者对立起来。在他看来，俄国农民充满了**共产主义理想**。

同样，在受著名的“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民意”党看来，俄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只是一部悲惨的历史。这个党不遗余力地寻找俄国落后状态的证据。它找到的证据越多，它对胜利就越自信。把俄国同西欧对立起来，是这帮作者最心爱的题材。

这个党是由在我们这里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组成的。也就是说，它的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军队中的各式各样的军官。他们并不反对工人，但是他们不重视同工人结成联盟。在他们看来，一个军官的作用比 100 个工人的作用大得多。

“民意”党不愧是一个俄国的党。由于它，反对政府的斗争空前

高涨。但是，几乎完全来自“知识分子”的“人民意志”的拥护者，不可能有很大的数量。他们的力量足够用来进行辉煌的小战斗，但不能用来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这个党的名称是同我们这里叫做恐怖主义斗争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斗争的方式就是对沙皇政府的官方代表，直到沙皇本人进行暗杀。

这种斗争方式不是“民意”党发明的，但是“民意”党以最大的干劲把它付诸实践，并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有人认为我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是“恐怖主义”的反对者。但是，原则上说，我们决不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我们只是在它表现了革命党的软弱这一点上才反对它。在暂时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恐怖活动”时，它最终只不过使个别人受到威胁，而对制度没有损害。

有人死了，他们的位置马上就会被别人顶替，沙皇政府不仅仍然是稳定的，而且还加强了，因为它得到了既被上头的反动，也被恐怖主义者的大胆行动吓坏了的上等阶级的支持。

革命党消耗掉的力量比它赢得的力量大。不难猜测，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在亚历山大二世于 1881 年 3 月被人暗杀以后，我们的运动明显地衰落了。

某些新的暗杀行动的成功，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局势。亚历山大二世死后 3 年或 4 年，在俄国出现了好几个由或多或少地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组成的小组，但是，在俄国没有哪个党，没有哪个秘密革命团体，对沙皇政府哪怕构成一点点威胁。

这还不是一切。可以证实，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迄今为止一直是运动的倡导者的那个社会阶层中，革命激情减退了。

很清楚，如果革命者不能把新的社会阶层吸引到自己队伍中

来，他们的事业就会彻底失败。在这方面全体革命者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但是当问题涉及决定应同哪个阶级、哪个社会阶层接近时，在革命者当中就出现了分歧。

一些人主张，革命者应融合到“社会”中去，也就是说，融合到上等阶级中去；另一些人建议转向产业中心的无产阶级。

前者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自由主义；后者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

我们的自由派根本不能掌权；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在我国政府的眼里是一个可疑的人。

作为反对现存制度的党，我们的自由派显然是我国的一支进步力量。

不幸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同政府进行积极斗争。他们根本不敢越过“和平的”和“合法的”反对派这条狭隘界限。

革命者只有放弃全部革命活动才能同自由派融合。

此外，应当看到，我们的自由派的软弱性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们的理论。

迄今为止，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只有微弱的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自由派如同那些老的、受过锻炼的巴枯宁派革命者一样，属于俄国人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对于这个社会阶层的大批人来说，自由主义往往只是一个演变阶段。

身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者”，只要文凭一到手，找到了职业和有了地位，就会变成“自由派”。

因而，毫不奇怪，我们的自由派丝毫没有摆脱“俄国社会主义”的某些偏见。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津津乐道阶级斗争和劳资之间的对立在我国没有意义这一话题。

如果我们的自由派没有把这一理论发展到荒谬的地步的话，

那对他们来说，这个理论将是非常方便的。既然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在俄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自由派不向俄国劳动人民求教呢？为什么不把他们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来呢？然而，在这里我们俄国自由派的思想 and 西欧自由派的思想之间的巨大分歧就出现了。

西欧自由派说，工人同资本和平共处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俄国自由派甚至否认在俄国存在着无产阶级，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的自由派所说的人民，指的是**农民**。

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对农民没有影响；这一点自由派知道得很清楚，而他们也根本没有进行努力，以便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农民漠不关心，无产者“根本不存在”，剩下来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由派本身身上了。但是，这班先生们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这种骗人的希望有多大价值。

公民们，你们知道，凡是在自由派对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有影响的地方，他们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应归功于人民，尤其应归功于无产阶级。没有他们的宝贵支持，自由派就会失去他们的一切力量，因为脱离人民的自由党，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而光杆司令们，单是他们自己，是吓不倒任何人的。

同样，俄国自由主义装着看不见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甚至否认这个无产阶级的存在，不愿接近我国大城市中的劳动群众，好像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此，俄国自由主义已经注定完全无所作为。

因此，沙皇政府丝毫也不害怕这样的敌人，事实上，它根本不怕他。

我国那些夸大革命党的力量的反动派，对自由派采取蔑视的

态度。他们嘲讽地给我国的自由派取了一个绰号：**伪自由派**。他们将是有道理的，如果我国自由派继续无视绝对必须接近我国大城市的劳动人民这一政治斗争的基本常识的话。

但是，如果他们不预先抛弃关于俄国社会生活的全部陈腐观念，他们就不能理解这个基本常识。

他们只愿意知道俄国生活处于经济停滞状态中；——他们应当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俄国生活，他们应当承认**现实的**和**不断发展的**状况，而不是留恋过去**存在的**，现在越来越成为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怀念的东西。

从这个观点来考察的俄国经济结构，有一个同旧的东西完全不同的方面，不管对我国的反动派，对我国的自由派，以及对我国的巴枯宁分子来说，旧的东西是多么珍贵。

在“不朽的”尼古拉在位期间，人们还能把“神圣的”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同“腐朽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对立起来。

把俄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制度，给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交通线完全是原始的；工商业非常不发达；交换还没有进入农民的农村经济。

看来，警察保护的粗手好像使一切进步运动都完全不可能发生。

但是，早在这个时期，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我国的旧经济制度已不能继续保持不变了。

在尼古拉统治的末期，工商业已获得巨大发展，连内务部也不得不确认，农奴制和俄国的经济利益是不相容的。

尼古拉逝世后，改革的时代来到了。恩格斯写道，克里木“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

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①。

这场社会革命一直延续至今。离开土地或没有必需的生产工具的农民的人数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统计表明,这类农民已占俄国全体农民的60%。

农村小资产阶级完全统治着农民,而大资产阶级则购买日趋没落的贵族的土地。

旧经济制度的解体,使资本主义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然而国内市场再已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了。

俄国资产阶级遇到了外国资本家的,它谴责为不诚实的竞争。于是它力图在中亚,在波斯,在蒙古,在中国,直至阿比西尼亚,为自己开拓销售市场。沿里海修建的铁路帮了我国工业家的大忙。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将使他们获得更多好处。总之,如果说尼古拉皇帝只是士兵的皇帝,那么,亚历山大二世则是资产阶级的皇帝,而在这方面,他的儿子正忠实地效法他的榜样。

作为我们时代的特点,可以援引一个自称为**俄国党或民族党**的党的理想。1890年这个党的一个党员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有教益和非常有趣的书。这位沙皇政府和正统派的爱国辩护士努力告诉他的法国读者真正的俄罗斯精神的最优秀的品质是什么。这是一个表现亲斯拉夫倾向的很好的题材!但是,只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5页。

当作者谈到俄国贸易的前途时，他才是雄辩的。他写道：“俄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注定要成为亚洲大陆的产品同西方国家交换的天然转口站……因而不久的将来，俄国注定要成为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贸易的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将来，在俄国修建的铁路直接达中国的腹地的那一天，在它的实力雄厚的、不管打着什么旗号的航运和转运公司在近东的海洋上穿梭来往的那一天，——在这一天，英国将失去它的海上霸权。”

“但是”——它继续写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不能只满足于一条从俄国东方各省通往亚洲的道路；还必须有一个连结大动脉的水陆交通网。正因如此，俄国统治黑海的思想是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堡由于自己的位置，可以成为整个亚洲的帐房和货栈”，等等。^①

这就是我国反动派的理想。你们看，如果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即使是部分地实现了，就会使俄国变成一个对西欧，尤其是对欧洲无产阶级说来危险的国家，这个危险将不仅是由它的大炮和刺刀造成的，而且也是由它的工业造成的。

我国政府正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一爱国纲领。

正是由于这一巧妙的策略，我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没有倒向自由主义反对派（它的成员尤其来自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边。

欧洲无产阶级再不能继续把俄国看作一个只是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初级农产品的国家。俄国的工业在东方市场上将同西欧的工业进行有力竞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切身利益是同俄国工人运动的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① 多韦林-切尔诺夫：《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俄国民族精神》，1890年巴黎版。

一支重要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在俄国的出现,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事件。近百年来,关于俄国的欧化,人们议论纷纷。许多亲斯拉夫的作者,因为对这种欧化的做法表示惋惜而获得文学桂冠。然而,长期以来只有贵族才不反对欧洲文化。其余的一切阶级,尤其是农民,都过着一种完全是亚细亚式的生活。现在,欧化涉及俄国的经济结构,因而也涉及整个俄国人民。在我国历史上,与工业无产阶级一起第一次出现了一支能够推翻沙皇政府并使我国加入文明民族大家庭的革命力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国未来的一切演变都取决于俄国无产阶级的智力发展。

旧时代的俄国农民和欧洲的文化及自由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愚昧无知,是沙皇专制制度的最好基础。俄国无产者正在努力学习、掌握欧洲文化。凡是帝国书报检查机关允许民众图书馆继续存在的地方,工人读者都成群集队地涌来。每次举行群众报告会的时候,参加的听众都非常踊跃,以致会场容纳不下他们。

显然,一切似乎对人民有教育意义的东西,都要受到吹毛求疵的检查。用合法的方式来宣传即使只带有一点点进步性的思想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出版反对现存制度的书籍和小册子,不得不求助于秘密印刷所,或者不得不在国外印刷,更不用说,这类出版物只能偷偷散发了。

这个情况迫使革命党采取明确的和合乎逻辑的方法来遵循纲领。

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在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工人协会,以便进行宣传和鼓动。

俄国无产者在革命运动中将不是一个生手。你们知道,在1880年2月去炸皇宫的是一个俄国工人。搞这个活动的思想本身产生于一个工人小组。将近20年来,尽管政治警察尽了最大的努

力,但革命小组依然存在。

只要我国的革命者还囿于巴枯宁主义者的偏见,他们就不能对无产阶级产生巨大影响。他们的眼睛紧盯着过去。他们看不见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他们轻视政治自由,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诡辩。如果说他们偶尔也向工人呼吁,那么这是为了号召他们参加一场“**纯经济性的**”革命。大约在1879年初,一个秘密工人团体“**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发表了一个纲领,它把政治自由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要求。几乎由清一色的巴枯宁主义者——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土地和自由社**”这个著名的革命团体认为,它必须同工人团体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

在俄国,正如在全世界一样,工人运动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才能蓬勃发展。

社会民主党对政治自由绝不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俄国社会民主党深信,**俄国工人党必须首先努力争取获得这种自由**。

一个主要从“**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党不可能推翻沙皇政府。它甚至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实行进攻。它只能进行所谓恐怖主义的斗争这种**游击战**。工业无产阶级加入战斗将使**我们走得更远**。从今以后,受到威胁的再也不是坐在沙皇宝座上的**某一个人**,而是沙皇宝座本身的存在。

亲爱的公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表白。我们肩负着建立起一个遍及全俄国的工人团体网的任务。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之前,我们将不参加你们的会议。在这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切代表都是冒充的。

我们不愿看到冒充现象。

我们深信,不久以后,我们将不再有理由缺席了。很可能,在下

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上你们就会看到俄国工人的真正代表。

目前,我们相信,你们大家不分民族都会祝贺我们取得巨大成功的。

社会民主党万岁!

世界各国无产者团结万岁!

受《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委托:

格·普列汉诺夫

维·查苏利奇

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代表名单

德 国

- 奥尔巴赫, A. , 雇员代表, 柏林。
巴德尔, F. , 社会民主党代表, 柏林。
倍倍尔, 奥. , 国会议员, 德累斯顿。
伯纳, A. , 纺织工人代表, 格腊。
伯耶尔, A. , 纺织工人代表, 勃兰登堡。
波克, W. , 制鞋工人和民主派代表, 魏伦费尔德。
布莱尔, E. , 社会民主党代表, 多特蒙德。
布鲁姆斯, J. , 社会民主党代表, 不来梅。
德累斯巴赫, A. , 社会民主党代表, 巴登。
艾瓦德, Fr. , 勃兰登堡代表, 卢肯瓦伦。
芬德里希, A. , 社会民主党代表, 不伦瑞克。
费舍, Ed. , 社会民主党代表, 法兰克福。
弗兰克尔, L. , 德国社会主义者俱乐部, 巴黎。
弋德斯泰因, H. , 社会民主党代表, 德累斯顿。
哈尔姆, F. , 社会民主党代表, 巴门。
亨宁, P. , 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党代表, 奥尔登堡。

胡格, P. , 矿工代表, 汉诺威。

伊雷尔, E. (女公民), 德国男女纺织工人联合会, 科特布斯。

李卜克内西, 威·, 国会议员, 柏林。

吕赫, H. , 萨克森-安哈尔特民主党代表, 德累斯顿。

迈斯特, C. , 科隆民主党代表。

迈斯特尔, H. , 汉诺威民主党代表。

麦茨格尔, W. , 汉堡民主党和德国冶金工人代表, 汉堡。

莫尔肯布尔, W. , 国会议员, 纽伦堡。

缪勒, E. , 莱因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纺织工人代表, 科隆。

普尔齐图尔斯基, B. , 柏林波兰社会党代表, 柏林。

赛吉茨, 符腾堡社会党代表, 斯图加特。

施米特, E. , 巴伐利亚社会党代表, 慕尼黑。

施米特, J. , 卡尔斯卢厄社会党代表。

施米特, R. , 柏林社会党代表。

舒马赫, G. , 索林根社会党代表。

施瓦尔茨, Th. , 梅克伦堡社会党代表。

辛格尔, P. , 国会议员, 柏林。

斯塔德哈根, A. , 社会党代表, 下巴门。

乌尔利希, C. , 黑森社会党代表。

瓦尔斯特, O. , 旅美德国社会主义者代表, 柏林。

韦施, C. , 社会民主党代表, 亚琛。

威梯希, M. , 萨克森社会党代表, 德国雕刻工人代表, 慕尼黑。

武尔姆, E. , 萨克森社会党代表, 格腊。

楚拜尔, F. , 萨克森社会党代表, 柏林。

英 国

- 艾威林-马克思,爱·,煤气工人和杂工总联合会,伦敦。
- 艾威林博士,煤气工人和杂工总联合会。
- 伯罗斯,Herb.,造船工人,伦敦。
- 班克斯,Gh.,印刷工人联合会,伦敦。
- 班迪奇,社会民主联盟,伦敦。
- 迪金,J.-J.,沃尔沙尔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伦敦。
- 菲尔德,Arth.,肯特八小时同盟,梅德斯通。
- 吉勒斯,F.,各种行业国际联盟,伦敦。
- 霍布森,C.,设菲尔德工联理事会。
- 霍姆斯,J.,莱斯特工联理事会。
- 亨特拉兹,W.,社会民主联盟,伦敦。
- 约翰,J.,冶金工人联合会,伍尔弗汉普顿。
- 约翰,F.-G.,社会民主联盟,伦敦。
- 朱更斯,R.,斯塔福德郡工联主义者联盟。
- 基,W.,海员和司机、使用摇动器的矿工国际联合会,森德兰。
- 莱斯纳,F.,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者协会,伦敦。
- 麦克唐纳,A.-W.,印刷工人联合会,伦敦。
- 奥吉尔弗雷,约翰,苏格兰工人党,邓迪(苏格兰)。
- 奥利德尔,S.,社会民主联盟,伦敦。
- 帕内尔,W.,木工联合会,伦敦。
- 皮斯,E.-R.,费边社,伦敦。
- 奎尔奇,H.,劳动同盟,伦敦。
- 桑德斯,W.,八小时国际同盟,伦敦。
- 斯普罗,W.,海员和司机联合会,伦敦。

斯诺, W. , 社会民主联盟, 伦敦。
泰勒, H. -R. , 伦敦工联理事会。
索恩, W. , 煤气工人和杂工总联合会。
沃克, 约翰, 木工联合会, 伦敦。

奥 地 利

阿德勒, 维克多, 博士, 奥地利社会党, 维也纳。
赫尔曼, Ad. , 奥地利社会党, 维也纳。
希伯什, J. , 捷克工人联盟, 波希米亚。
考茨基, 路易莎, 伦敦。
波科尔尼, 路德, 奥地利社会党, 维也纳。
诺伊曼, Jac. , 奥地利社会党, 维也纳。
里格尔, Ed. , 捷克工人联盟, 波希米亚。
罗歇尔, Fr. , 波希米亚纺织工人, 赖兴堡。
施恩, H. , 维也纳冶金工人联合会, 伦敦。
岭堡, 弗兰茨, 捷克工人联盟, 波希米亚。

比 利 时

安塞尔, 爱德华, 根特工人联合会, 根特。
巴斯蒂安, 阿尔图尔, 社会主义小组, 蒙斯。
巴特斯勒, E. , 木工互助会, 布鲁塞尔。
贝尔特朗, 路易, 总委员会, 布鲁塞尔。
伯康多尔普, E. , 镜子制造工人工会, 布鲁塞尔。
博雷曼, A. , 雪茄烟工人协会, 安特卫普。
博略, 亨利, 木工协会, 列日。
博齐耶, J. -E. , 工人同盟, 布鲁塞尔。

布格纳, H. ,糖果制造工人联合会,布鲁塞尔。
布拉瑟,吉约姆,志同道合者,布鲁塞尔。
布朗德尔, Jos. ,德国社会主义者小组,布鲁塞尔。
布里尔, E. ,锁匠工会,布鲁塞尔。
布里斯梅,马丽娅,女公民委员会,布鲁塞尔。
布律伊朗,阿尔伯,镀金工人,布鲁塞尔。
比里翁, J. ,中部互助会员联盟,乌当-艾姆里。
卡勒韦尔, J. ,劳动骑士联合会,瑞梅。
卡西曼, L. ,糖果制造工人联合会,布鲁塞尔。
库克莱尔, Is. ,油漆工联盟,布鲁塞尔。
库埃朗, H. ,工人同盟,圣若斯-唐-努德。
库埃朗, J. ,工人同盟,库克尔贝赫区。
孔律,保尔,工人同盟,拉卢维耶。
德克勒尔鸠,阿德勒,女公民委员会,布鲁塞尔。
德斯诺普, G. ,钢琴匠工会,布鲁塞尔。
德科斯泰, J. ,钢琴匠工会,布鲁塞尔。
德福, J. ,互助会,艾讷—圣保罗。
德菲索,莱昂,博里纳日联盟,布鲁塞尔。
德弗内,古斯塔夫,总委员会,布鲁塞尔。
德耶格尔, J. ,服务员工会,布鲁塞尔。
德尔波特, Ant. ,总委员会,布鲁塞尔。
德律克, F. ,不信教者国际联盟,布鲁塞尔。
德尔沃, J. ,社会主义宣传小组,布鲁塞尔。
德尔温克,制鞋工人工会,布鲁塞尔。
当布隆,瑟勒斯坦,民众合作社,列日。
德穆兰, J. ,座椅制造工工会,布鲁塞尔。

德沃, J. ,工人同盟,布鲁塞尔。
德乌伊德尔,根特联盟,根特。
德瓦特里蓬, L. ,工人同盟,布鲁塞尔。
德威尔德, A. ,木工协会,布鲁塞尔。
德万内, Aug. ,人民之家,布鲁塞尔。
杜尔, N. ,平民(体育工作者),布鲁塞尔。
迪姆兰, F. ,工人同盟,斯哈尔贝克。
埃格里克, 让,工人同盟,于克勒。
埃尔伯, Ferd. ,冶金工人联盟,布鲁塞尔。
法布里, C. ,顶棚抹灰工,布鲁塞尔。
福维沃, 埃利泽,矿工联合会,瓦姆。
费隆, 塞尔韦,工会地方联盟,瑟兰。
福尔顿, P. ,社会主义宣传小组,布鲁塞尔。
富卡特, 让,根特联盟,根特。
富尔内蒙, 莱昂,不信教者,布鲁塞尔。
加莱尔, 吉约姆,矿工工会,蒂约尔。
吉斯贝尔根, 埃尔维尔,女公民委员会,布鲁塞尔。
吉斯贝尔根, 朱尔,平民(体育工作者),布鲁塞尔。
热拉尔, Em. ,铅工和白铁工工会,布鲁塞尔。
热尔默, J. ,安特卫普联盟,安特卫普。
热尔维, J. ,顶棚抹灰工,布鲁塞尔。
格雷格瓦尔, Ch. ,裁剪师协会,布鲁塞尔。
吉尔莫, Jos. ,抵抗组织,普尔瑟。
阿洛, H. ,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列日。
阿尔丁, Ferdin. ,根特联盟,根特。
奥特基特, E. ,帽子原料剪裁师联合会,布鲁塞尔。

埃尔兰, A. , 中部冶金工人联盟, 拉鲁维耶。
埃尔歇尔, J. , 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 伊克塞勒。
厄泽, L. , 木工协会, 安特卫普。
于央, N. , 设备油漆工工会, 布鲁塞尔。
于伊涅, Prosp. , 工人同盟, 热特—圣皮埃尔。
卡敏斯基, O. , 钢琴匠工会, 布鲁塞尔。
科特利茨, E. , 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 布鲁塞尔。
拉奥, B. , 公平劳动者, 圣吉尔—列日。
朗比洛, J. , 劳动骑士联合会, 瑞梅。
朗佩尔, J. , 工人同盟, 圣吉尔。
勒西安, C. , 社会主义侦察兵, 圣若斯—唐—努德。
勒德让, Isid. , 油漆工工会, 布鲁塞尔。
勒鲁瓦, J. -B. , 压制工和制毛毡工工会, 屈尔热姆。
勒蒂尔鸠, 设备油漆工工会, 布鲁塞尔。
勒韦克, I. , 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 布鲁塞尔。
马斯, G. , 社会主义宣传小组, 布鲁塞尔。
马厄, 约瑟夫, 工人同盟, 斯哈尔贝克。
马朗普雷, J. , 民众小组, 昂西瓦勒。
芒萨尔, J. , 前进中部矿工联盟, 拉埃斯特尔。
马格, 皮埃尔, 工会地方联盟, 瑟兰。
马尔奈特, 恩斯特, 北部同盟, 列日。
马罗瓦勒, D. , 工人合作社, 弗拉默里。
马蒂厄, 沙尔, 那慕尔联盟, 那慕尔。
梅尔斯科, J. -B. , 工人同盟, 圣吉尔。
默勒芒, Ch. , 卢万联盟, 卢万。
米歇尔, Ant. , 工人同盟, 库尔塞勒。

米切尔, Ch. , 莫伦贝克区合作社, 莫伦贝克区。
莫特尔曼, E. , 安特卫普联盟, 安特卫普。
穆宗, Eug. , 民众合作社, 列日。
南德兰, J. , 那慕尔联盟, 那慕尔。
奈伊康, E. , 社会主义侦察兵, 圣若斯—唐—努德。
奥克托, A. , 工人同盟, 布鲁塞尔。
佩尔曼, Ch. , 铅印石印工人协会, 布鲁塞尔。
帕尼, L. , 服务员工会, 布鲁塞尔。
皮克罗, Ch. , 韦尔维耶联盟, 韦尔维耶。
皮埃隆, Ev. , 冶金工人全国联盟, 布鲁塞尔。
皮尔勒, V. , 糖果制造工人联合会, 布鲁塞尔。
波利阿尔, J. , 劳动者协会, 布鲁塞尔。
雷耐尔特, A. , 机修工人协会, 布鲁塞尔。
罗宾, J. , 工人同盟, 伊克塞勒。
罗歇特, L. , 裁缝协会, 布鲁塞尔。
罗埃朗, P. , 皮革染色工联合会, 莫伦贝克区。
隆达斯, J. -B. , 大理石加工工人工会, 布鲁塞尔。
努斯, G. , 镀金工人联合会, 布鲁塞尔。
罗塞伊, P. , 工人同盟, 热特—圣皮埃尔。
卢梭, Em. , 中部同盟, 费伊。
卢梭, E. , 中部互助同盟, 若利蒙。
桑特, Alex. , 友好工人, 艾讷—圣保罗。
桑特, 奥古斯特, 工人同盟, 艾讷—圣保罗。
桑特, F. , 乌絮矿工协会, 艾讷—圣皮埃尔。
萨斯, 弗朗索瓦, 木材工人联盟, 布鲁塞尔。
塞尔弗朗克, P. , 工人同盟, 热特—圣皮埃尔。

塞尔维,格雷古瓦,布鲁塞尔同盟,布鲁塞尔。
塞尔维,维克多,志同道合者,布鲁塞尔。
斯洛韦尔,F.,镀金工人联合会,布鲁塞尔。
斯庞特,H.,埃斯塔勒蜂群,埃斯塔勒。
斯塔热,埃米莉,女公民委员会,布鲁塞尔。
斯汤德尔,C.,志同道合者,布鲁塞尔。
斯蒂尔曼,A.,服务员工会,布鲁塞尔。
斯蒂尔曼,E.,工人同盟,库克尔贝赫区。
斯特罗伊梅特,E.,裁缝协会,布鲁塞尔。
斯蒂伯,Fr.,木工互助会,布鲁塞尔。
特尔克拉韦尔,H.,木工协会,布鲁塞尔。
托尔德尔,A.,前进印刷业同盟,布鲁塞尔。
于伊特雷尔斯特,J.,工人同盟,库贝尔贝赫区。
范艾尔斯特,E.,面包师工会,布鲁塞尔。
范伯韦朗,Edm.,根特联盟,根特。
范伯韦朗,J.,镀金工人联合会,布鲁塞尔。
范登布朗登,Fr.,木工协会,布鲁塞尔。
范德尔黑根,P.,铅工和白铁工工会,布鲁塞尔。
范德尔林登,Gull.,工人同盟,拉埃肯。
王德威尔得,艾.,社会主义大学生,布鲁塞尔。
范德尔冯德伦,L.,工人同盟,圣若斯—唐—努德。
范多伦,J.,制鞋工人工会,布鲁塞尔。
范哈韦尔贝凯,H.,铅印石印工人协会,布鲁塞尔。
范英,H.,乐器匠工会,布鲁塞尔。
范伊姆佩,A.,设备油漆工工会,布鲁塞尔。
范里尔伯尔格,E.,工人同盟,热特—圣皮埃尔。

范里尔伯尔格, Gust. , 工人同盟, 热特—圣皮埃尔。

范勒达, 让, 雪茄烟工人同盟, 布鲁塞尔。

范卢, R. , 前进印刷业同盟, 布鲁塞尔。

韦尔林登, J. , 压制工和制毛毡工工会, 屈尔热姆。

韦里肯, 洛朗, 总委员会和蒂比泽冶金工人, 布鲁塞尔。

沃尔德斯, 让, 总委员会书记, 布鲁塞尔。

瓦特勒, L. , 翻砂工, 埃斯塔勒。

维里, G. , 制鞍工人工会联盟, 布鲁塞尔。

威尔马特, E. , 裁石工人工会, 布鲁塞尔。

丹 麦

克努森, 彼·, 社会民主联盟, 哥本哈根。

奥尔森, 马丁, 木工联盟。

奥尔森, 西·, 联合工会联盟, 哥本哈根。

彼得森, Nic. -L. , 革命社会主义者联盟。

西 班 牙

伊格列西亚斯, 帕·, 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马德里。

美 国

加汉, 亚伯拉罕, 犹太语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 纽约。

霍恩, G. -A. , 芝加哥工人联盟, 芝加哥。

麦克韦格, G. -H. ,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纽约。

萨尼亚尔, 吕西安, 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纽约、布鲁克林及新泽西工人联盟, 纽约。

沃尔斯特, O. , 美国社会主义联盟, 开姆尼茨。

法 国

阿列曼,让,巴黎,圣素韦厄街 51 号。

阿尔吉里阿德斯,巴黎,里沃利街 49 号。

博丹,议员,巴黎,坎提尼(沃日拉尔)街。

布隆多,巴黎,沙佩尔街。

博尼埃,沙尔,巴黎,马达姆街 75 号。

布里瓦,乔治,巴黎,米肖狄埃街 20 号。

康比埃,巴黎,米拉街 72 号。

卡梅斯卡塞,塞纳,贝松街。

尚皮,巴黎,夏蓬街 24 号。

肖维埃,市会议员,巴黎,波日雷内尔广场 1 号。

克莱芒,J.-B.,沙勒维尔,荣札格街 7 号。

科隆巴,巴黎,洛里翁街 45 号。

科洛(小姐),巴黎劳动介绍所。

库勒,让,马赛,和平街 11 号。

克罗济埃,圣艾蒂安,里昂街 3 号。

德克努瓦,巴黎,福康尼埃街 9 号。

德让特,巴黎,特努瓦-弗雷尔街 43 号。

德尔克吕兹,加莱,富尔阿肖街 35 号。

德雷伊,巴黎,库尔德万塞讷 48 号。

德斯普雷,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巴黎,圣日耳曼林荫大道 116 号。

迪梅伊,议员,巴黎,马尔街 67 号。

迪努塞,约瑟夫,蒂济(罗讷)。

法雅,加布里埃尔,里昂,圣塞巴斯蒂安山坡 21 号。

法布雷加, 马赛, 宫廷法官街 5 号。
费努尔, 议员和市长, 纳博讷。
菲特(德), 图卢兹, 封丹街 14 号。
富朗, 沙尔, 市议员, 罗阿讷。
热利, 安得烈, 巴黎, 博士街 14 号(马丽住宅区 9 号)。
格鲁西埃(A.), 巴黎, 路易·布朗街 59 号。
盖得, 茹尔, 巴黎, 奥尔良大街 26 号。
吉耶梅, 巴黎, 费尔阿穆兰街。
阿梅兰, 巴黎, 佩尔内蒂街 42 号。
埃庞艾梅, 巴黎, 马尔卡什街 48 号。
雅克拉尔, 巴黎, 勒皮克街 55 号。
让诺, 塞特大道街 18 号。
拉法格, 保·, 塞讷, 香榭丽舍大街。
莱内, 巴黎, 圣雅克街 288 号。
恩贝尔, 阿尔丰斯, 里尔, 弗努瓦沙尔街 5 号。
朗德兰, 巴黎, 共和国大街 257 号。
拉沃, 巴黎, 维克达济尔街 2 号。
拉维涅, 波尔多, 拉格朗热街 197 号。
勒丹, 圣艾蒂安, 特雷伊勒街 83 号。
勒佩尔, 鲁贝。
勒拍, A., 巴黎, 诺伊沙托的弗朗索瓦街 1 号。
利穆赞, 乔治, 沙泰勒罗, 科尔贝街 10 号。
勒鲁瓦, A., 巴黎, 格拉色街 37 号。
马隆, 贝努瓦, 巴黎, 烈士街 8 号。
马洛里, 马尔塞兰, 蒂勒, 维克多·雨果大街 100 号。
马丁, 巴黎, 贝勒维尔街 82 号。

马提内,图尔,巴黎街 14 号。
梅塞,巴黎,巴尼奥勒街 167 和 169 号。
穆拉尔,埃尔伯夫,甘必大街 46 号。
奥凯基(德),亚历山大,巴黎,游行队伍街 34 号。
奥尔西埃(德),巴黎。
帕科特,勒瓦卢瓦一佩雷,马耶兰街 3 号。
佩德隆,特鲁瓦市大制革厂街 23 号。
普律当,德尔维埃,巴黎,帕斯卡勒街 50 号。
勒尼亚尔,A.,巴黎,格伊·吕萨克街 35 号。
勒努,维克多,巴黎,马里奥街 3 号。
努阿内,巴黎,弗洛孔街 2 号。
努塞尔,巴黎,皮加勒街 48 号。
罗济埃,阿尔图尔,巴黎,斯坦维通道 6 号。
蒂弗里埃,议员,巴黎,蒂朗街 64 号。
絮西尼,博士,巴黎,巴尼奥勒街 60 号。
瓦扬,巴黎,贝托勒街 6 号。
瓦拉东,巴黎,瓦托街 5 号。
瓦勒特,艾林(夫人),巴黎。
旺德尔,D.,里尔,东街 6 号。

荷 兰

纽文胡斯,斐·多梅拉,荷兰社会民主党,海牙。
德茨瓦尔特,Ch.,油漆工协会,阿姆斯特丹。
德吕克尔,W.(女公民),妇女自由协会,阿姆斯特丹。
格宾,F.-W.,卷烟工人联盟,阿姆斯特丹。
范德尔,葛斯,P.,铁路职工联合会,阿姆斯特丹。

范科尔, L.-W. ,大理石加工工人协会,阿姆斯特丹。

范德尔缪森(女公民),妇女协会小组,阿姆斯特丹。

弗里根, W.-H. ,印刷协会联盟,海牙。

匈 牙 利

恩格尔曼, P. ,社会民主党书记,布达佩斯。

库尔希纳, J. ,社会民主党,布达佩斯。

意 大 利

克罗塞,约瑟夫,制手套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党,米兰。

库利斯西奥夫,安娜,博士,社会主义同盟。

梅林诺, X. ,工会联合会,伦敦。

屠拉蒂,菲·,工人党,社会互助小组,米兰。

波 兰

达申斯基,伊·,加里西亚社会主义工人党。

邓勃斯基, Alex. ,“无产阶级”党的一个支部。

卡尼奥夫斯基, J. ,俄属波兰社会革命党。

门德尔松, M. ,“无产阶级”党的一个支部。

门德尔松,斯坦尼斯拉斯,加里西亚社会主义工人党。

罗 马 尼 亚

迪阿曼狄, G.-I. ,《工人》杂志,布加勒斯特。

莫尔宗, V. ,议员,社会主义劳动俱乐部,布加勒斯特。

米勒, C. ,律师,布加勒斯特劳动者俱乐部和制鞍工人协会,布加勒斯特。

拉科维查,雅西工农俱乐部,雅西。

拉多维西,I.,巴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

塔拉努,D.,加拉茨劳动者俱乐部,《工人》杂志。

瑞 典

布兰亭,亚,社会民主工人党,斯德哥尔摩。

瑞 士

布兰特,保尔,圣加尔。

鲍姆加特尔,Th.,格留特利工人联合会,温特图尔。

曼茨,J.,巴黎苏黎世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苏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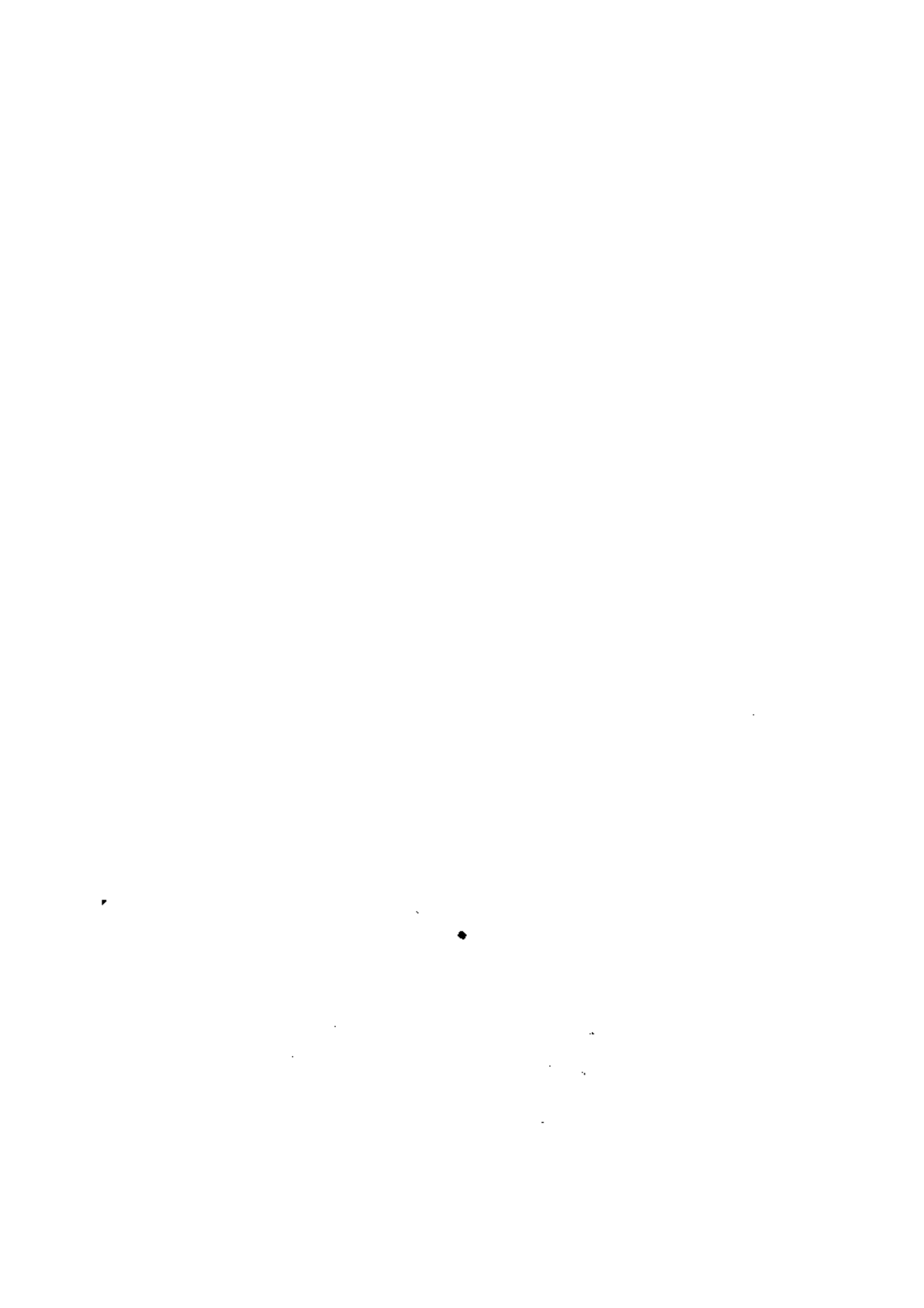
赛德尔,罗伯特,格留特利工人联合会,苏黎世。

武尔舍格尔,E.,社会民主党,巴塞尔。

齐格里斯特,巴塞尔和阿尔萨斯的花边和纺织业工人,巴塞尔。

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893年8月6—12日于苏黎世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组织委员会通告

致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工人的公开信

亲爱的同志们：

根据 1891 年 8 月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瑞士将荣幸地在 1893 年迎接世界各国的工人代表。

无产阶级的代表将从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来到瑞士，以便共同讨论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来为被压迫者谋福利，来拯救和解放各国人民。

瑞士工人阶级具有伟大的、前途无量的解放世界的思想。现在，摆在瑞士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是，在若干天内当好殷勤的主人，为代表大会的顺利举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不言而喻，组织起来的瑞士工人阶级，必定会竭尽全力使代表大会开成一个庄严、壮丽的大会，并向各国工人代表保证将做好代表大会的一切组织工作。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尽早开始进行准备。

因此，瑞士三大工人组织——**社会民主党、格留特利联盟和工会**——的代表于今年 1 月 10 日举行会晤，并作出以下决定：

1. 代表大会在苏黎世召开。

2. 上述3个组织各派5名代表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由它负责领导，立即着手进行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的筹备工作。

3. 代表大会的经费应通过自愿捐助（出售认捐券）的办法来筹集。

组织委员会现已经成立并开始工作。它向各国工人组织通报了它的成立，并请它们就代表大会的议程表示愿望和提出建议。

我们现在向我们的瑞士同志们提出一个请求。这次为期8天的代表大会，大概会有400名代表参加，当然，组织这个大会需要一大笔经费，估计要花5000—6000法郎。这笔费用单靠上面3个组织的预算来负担是不行的，而必须用募捐的办法来筹集额外的资金。

认捐券将由我们的司库送交各联合会的领导机关，捐款的数额视各该联合会的大小而定。我们请求你们设法出售认捐券，并将筹得的现款寄给我们。

由下面签名的那些人组成的委员会，完全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它呼吁我们的同志们大力予以协助。

国际工人运动万岁！

1891年2月于苏黎世

**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卡尔·毕尔克利，主席

罗贝尔·李德尔，秘书

奥·梅尔克，司库

组织委员会：

社会民主党代表：

J. R. 耶格尔

X. 卡雷尔

奥·兰格

罗·宰德尔

A. 维德梅尔

格留特利联盟代表：

卡·毕尔克利

赫·格雷利希

Fr. 海菲利

A. 伊尔格

约·福格尔赞格尔

工会联合会代表：

E. 贝克

C. 康采特

A. 吕梯

卡·曼茨

奥·梅尔克

注意：凡是负有分发认捐券任务的联合会，或者自愿从事出售认捐券活动的同志，可以到我们的司库那里去领取认捐券。

第一号通告

致各国工人的公开信

工人们！同志们！

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一致决定：

“下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应于1893年在瑞士召开。”

这个决议使我国感到光荣。这个决议赋予我国一项与它的中立的国家制度，它的人民具有的国际性质，它的各种机构，以及它的自古以来所享有的自由相称的任务。

谨以瑞士工人阶级的名义感谢各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作出的这个决定。我们将全力以赴，使1893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为团结和解放世界各国劳动人民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为了贯彻布鲁塞尔决议，温特图尔的瑞士格留特利联盟、苏黎世的瑞士工会联合会和巴塞尔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这3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于今年1月10日召开了联席会议，并作出以下决定：

1. 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苏黎世**召开。

2. 每个中央委员会指派5名代表组成组织委员会，会址设在苏黎世。组织委员会负责进行召开代表大会所必需的和有益的一切筹备工作。

我们现在荣幸地通知你们，上述瑞士最大的3个工人团体已

推选出它们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代表，组织委员会已按下述方式组成，并开始进行活动。

我们向一切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发出友好的邀请，而不管它们属于什么派别，只要它们承认工人组织及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就行，邀请它们于 1893 年夏天派遣自己的代表到苏黎世来赴会。

我们可以预先向代表们保证，他们将在佩斯塔洛济城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将在那里会见自己的战友、朋友和兄弟。

为了尽快结束代表大会的必要的筹备工作，我们希望一切工人联合会尽早把它们通信地址告诉我们，并在 1892 年 6 月底之前把它们希望列入议事日程的主张和建议按照我们的秘书的地址给我们寄来：

罗贝尔·宰德尔，苏黎世（瑞士）

我们打算根据我们收到的主张和建议以及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指定要我们讨论的问题在短期内拟定一个暂定议程，并予以公布。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看到，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业已开始工作了。但愿这一切能够激励你们迅速行动起来，为这次争取自由、和平和福利的国际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做好准备是它获得胜利的条件。

世界各国工人大团结万岁！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万岁！

致兄弟般的敬礼和握手！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卡尔·毕尔克利，主席

罗贝尔·宰德尔，秘书

奥古斯特·梅尔克，司库

组织委员会：

社会民主党代表：

J. R. 耶格尔

X. 卡雷尔

奥·兰格

罗·宰德尔

A. 维德梅尔

格留特利联盟代表：

卡·毕尔克利

赫·格雷利希

Fr. 海菲利

A. 伊尔格

约·福格尔赞格尔

工会联合会代表：

E. 贝克

C. 康采特

A. 吕梯

卡·曼茨

奥·梅尔克

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会、 工会理事会和工人组织

同志们和工人弟兄们：

一封邀请你们参加将于 1893 年 8 月在苏黎世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信，已经送交今年 9 月在格拉斯哥召开的工联代表大会。1890 年利物浦代表大会曾经收到一封同样的欢迎参加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信，这封邀请信当即予以宣读，并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被代表们一致接受。不列颠的工人组织派了足够的代表出席的这次布鲁尔国际代表大会一致委托我们筹备苏黎世代表大会。因此，使我们感到惊讶和难过的是，我们发现在格拉斯哥（1）有人明显地企图扣压我们的邀请信；（2）当我们的邀请信在一些代表施加了不少压力之后终于公开宣读时，代表大会实际上根本没有注意它的内容。代表大会在通过英国工联提出的“立即”召开一次大会来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决议案和否定敦促联合王国工联参加 1893 年国际代表大会的修正案时，向我们，并通过我们向我们所代表的全世界有组织的工人表示了粗暴无礼的拒绝。我们的邀请信如石沉大海，连一张收条也没有收到。

然而，我们确信，联合王国有一大批工人组织仍然希望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我们确信在许多情况下，格拉斯哥的表决是出于误解，因此，我们邀请一切工会、工会理事会和工人组织派遣

代表参加将于 1893 年 8 月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兹随信附上送交工联代表大会的邀请信，并请每一个联合会和每一个工人组织把它当作是向它们发出的邀请信。

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澳大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等这些国家的一切重要组织都已经表示了它们的愿望，即根据它们各自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将派代表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并且已经把它们打算向这次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的倡议寄给我们。因此，即使我们想放弃委托给我们的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也完全办不到了。此外，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自己负责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每一个有理性的工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只能是共同谅解的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我们想指出一点，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是在格拉斯哥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年就决定了的。它是由世界各国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召开的，它将讨论的问题不只是八小时工作日问题，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与工人的解放密切相关的紧迫问题。

有关代表大会的一切事宜请和

罗贝尔·宰德尔，瑞士苏黎世，

进行联系。

你们的诚挚的、友好的
伙伴谨启

受 1893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委托：

卡尔·毕尔克利，主席

罗伯特·宰德尔，秘书
奥古斯特·梅尔克，司库

组织委员会：

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

J. R. 耶格尔
X. 卡雷尔
奥·兰格
罗·宰德尔
A. 维德梅尔

瑞士格吕特里联合会代表：

卡·毕尔克利
赫·格雷利希
F. 海菲利
A. 伊尔格
约·福格尔赞格尔

瑞士工会联合会代表：

E. 贝克
C. 康采特
A. 吕梯
卡·曼茨
奥·梅尔克

1892年9月28日于苏黎世

致工联格拉斯哥代表大会

我们受 1891 年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委托筹备将在苏黎世举行的下一届国际代表大会。为了完成委托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我们正在把邀请信分送给世界各国有组织的工人，因此，我们通过你们的代表大会恳切地邀请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组织参加将于 1893 年 8 月上旬或中旬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你们的代表大会会想起，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接受了参加 1891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邀请信。我们把这封邀请信送给

你们的代表大会是因为它所具有的代表性，是因为我们知道，通过这个代表大会，我们可以和联合王国的一切工会建立联系。不仅如此，尽管过去曾经对如像邀请的性质这类问题产生过某些小小的误会，我们还是真诚地希望你们把这次对你们的充满兄弟情谊的呼吁不仅看作是向贵国的一切工会和工会理事会发出的邀请，而且看作是向贵国的一切工人组织发出的邀请。同时，我们恳请每一个工会联合会和工人组织把这封信看作是向它们发出的特别邀请，并且采取必要措施以便能够出席 1893 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对你们来说没有必要强调这些国际代表大会对于工人阶级运动所具有的无可估量的价值，而当各种专门行业的国际代表大会次数正在不断增多，影响正在日益扩大的时候，必须承认，最有效的代表大会是一切国家、一切行业和两性工人都有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而它的主导思想，与其说是讨论五花八门的、具体的劳动问题，不如说是讨论整个劳动问题，就是说，讨论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在伟大的阶级斗争中奋起反抗资本家阶级的问题。即使最近几次国际代表大会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结果，而只是孕育了波澜壮阔的法定的八小时运动，那么，这些代表大会的召开也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1890、1891 和 1892 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多次举行了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迫使人们把这个问题摆到重要地位，因此，用不着告诉你们，这些国际性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起源于 1889 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当然，我们像你们一样知道，在当前条件下不同国家甚至不同行业的工人，容易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劳工问题，但是，我们大家都同意，劳工问题是存在的，只有通过共同协商和把整个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起来才能使之得到解决。基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理由，我们真诚地吁请你们同我们合作，使 1893 年的国际代表大会开得甚至可能比前几届大会更成功。今后有关的事宜将通过适当的途径通知你们的议会委员会，毫无疑问，后者将会转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会联合会的。——你们的兄弟，卡尔·毕尔克利。1892 年 9 月 1 日于苏黎世。

第二号通告

致各国工人的公开信

工人们，同志们：

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的第一号通告在全世界的工人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澳大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切重要工人组织都向我们通告了它们将出席 1893 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意图。一系列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已经作出参加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许多组织已向我们提出它们的希望和建议。

我们现在就已经能够确有把握地说，1893 年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将有許多代表参加，将开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工人大会。

遗憾的是，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决定通过英国工联议会委员会立即召开一次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会议。尽管我们在一封致格拉斯哥代表大会的专门信件中诚心诚意地邀请一切英国工人组织派代表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但是，这个不切实际的决议还是作出了。

在这个决议公布之后，我们立即给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一切工人组织发出一封通告信，在阐明实际情况之后，再次邀请它们前往苏黎世。我们在这封信中写道：

“即使我们想放弃委托给我们的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也完全办不到了。此外，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自己负责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每一个有理性的工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只能是共同谅解的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我们想指出一点，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是在格拉斯哥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年就决定了的。它是世界各国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召开的，它将讨论的问题不只是八小时工作日问题，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与工人的解放密切相关的紧迫问题。”

这封通告信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中受到了热烈欢迎。英国的工人报纸认为格拉斯哥决议是错误的，并希望议会委员会不要执行它。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工人有的通过他们委派的代表，有的通过代表大会决议表示反对召开国际八小时工作日代表大会，并宣布决不派代表出席。他们坚决支持联合的、合法的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

鉴于这个通告和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的利益，我们呼吁一切工人组织也坚决地支持将于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劳工代表大会。

和过去的做法一致，我们确定代表大会在

1893年8月初

举行。希望各国的同志们都为这个日期做好准备。

至于代表大会的议程，迄今为止我们一项都没有公布过，因为好几个大国都还没有提交任何提案。到现在为止我们收到的建议和提案主要有以下这些：

1. 在国际上贯彻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
2. 社会民主党人在人民直接立法问题上的策略：

- (1) 议会活动；
- (2) 国家社会主义。
- 3. 国际的权利和义务：
 - (1) 在劳资间发生比较严重的冲突的情况下；
 - (2) 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尽力制止战争。
- 4. 国际组织：
 - (1) 成立国际劳工书记处；
 - (2) 成立国际通讯局。

这只是暂定的议程。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加以讨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你们还有新的提案，请最晚在 1893 年 2 月底以前给我们寄来。我们想在 1893 年 3 月底最后确定将向大会提出的议程，一俟确定之后，就立即予以公布。

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这次代表大会成为战斗的劳动人民的目的和愿望的表现。我们只有团结才能强大；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世界。

致兄弟般的敬礼和握手！

1892 年 11 月 15 日于苏黎世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卡尔·毕尔克利，主席
 罗贝尔·宰德尔，秘书
 奥古斯特·梅尔克，司库

组织委员会：

社会民主党代表：

J. R. 耶格尔
 X. 卡雷尔

格留特利联盟代表：

卡·毕尔克利
 赫·格雷利希

奥·兰格

罗·宰德尔

A. 维德梅尔

F. 海菲利

A. 伊尔格

约·福格尔费格尔

工会联合会代表：

E. 贝克

C. 康采特

A. 吕梯

卡·曼茨

奥·梅尔克

致瑞士全体党员、格留特利联盟 和工人团体的公开信

亲爱的同志们：

根据布鲁塞尔筹备会议的决议，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定于今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举行，也就是说两个多月后就要举行了。与此同时，铁路工人、纺织工人、冶金工人和木材工人以及制鞋工人的国际代表大会也将分别召开。苏黎世代表大会将成为历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一次，因此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异常繁重，开支也会相当大。

为使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能给瑞士带来荣誉，正像我们过去已经对你们讲过的那样，必须筹集约6 000法郎的经费。这笔钱，我们希望瑞士的同志们自愿捐助。

我们曾于去年2月把认捐券分送给你们，迄今为止，我们收到的出售认捐券获得的捐款刚刚超过原定数额的1/6，相当大一部分联合会的捐款都还拖欠着。许多联合会把认捐券原封不动地寄回来了，有的说明了原因，有的没有说明，还有许多联合会把尚未售出的认捐券寄回来了。

用这个办法自然筹集不到所需的经费，因此，我们向所有的联合会和同志们提出一个迫切的请求，请求你们这一次也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工人团结互助精神，尽可能给我们提供一笔补助金，以

弥补会议经费的不足。

绝大多数联合会只售出 5—7 法郎的认捐券。我们认为，在 15 个月中，即使最小的联合会也应当能够筹集到这样多钱。

如果我们在本国筹集不到这笔经费，那我们就不得不请求外国同志提供部分捐助，瑞士工人当然不希望看到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再次请你们尽快把**出售认捐券**获得的捐款以及在 8 月份还**卖不出去**的认捐券给我们寄来。往后，认捐券可以在我们的司库那里购买。

藉此机会，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不好的现象，有的联合会退给我们的认捐券已经残缺破损，无法继续使用，我们希望避免再出现这种现象。

致以同志般的敬礼！

1893 年 5 月底于苏黎世

受组织委员会的委托：

奥古斯特·梅尔克，司库

泽林格尔街 47 号

注意：你们的联合会已把转交的认捐券及时退回，但有一部分捐款尚未付清。

第三号通告 致各国工人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特此敦请你们选举你们的代表，如果已经选举完毕，就请把他们的名字通知我们。根据布鲁塞尔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委员会的建议，代表大会将于8月6日至12日在

苏黎世音乐大厅

举行。

我们租用的这个厅相当大，足以容纳大批代表，在整个会议期间都供大会使用。还给各国代表团预定了单独的房间供它们开会使用。我们将及早做好准备，保证代表们的住宿地点舒适，价格公道，膳食价廉物美。

瑞士工人，特别是苏黎世的工人，将利用这个机会像接待受欢迎的客人那样来接待自己的工人兄弟，使他们在里感觉到像在他们自己的兄弟中间一样。在大会开幕那天，即8月6日，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游行和露天群众大会来欢迎各国代表。在这一周的某个晚上，我们将安排一次盛大的晚会。在会议闭幕那天，即8月12日下午，我们希望能为我们亲爱的客人安排一次在美丽的苏黎世湖上乘船游览的活动。

这里的许多同志已准备好为代表大会服务，同样，他们也愿

意为那些希望利用早晚时间在苏黎世周围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散步的代表当导游。

我们将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安排好代表们的住宿，做好大会的各种工作，以及组织好闲暇时间的娱乐活动。因此，我们希望，你们也尽你们的最大努力从各国派遣大量代表前来参加这次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用不着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在这方面也做了贡献：最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工人组织在各国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主义运动到处都变得更加强大了，它波及的范围更广了。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定将为这种蓬勃发展带来令人赞叹的新气象。代表大会将在一个享有现在存在的最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和城市里举行，因此，它的一切活动都非常自由。我们请你们派遣尽可能多的代表来参加这次各国工人兄弟团聚的盛会。愿苏黎世代表大会使我们能在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号召方面向前迈进一步。

致兄弟般的敬礼！

1893年6月15日于苏黎世

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卡尔·毕尔克利，主席

罗贝尔·宰德尔，秘书

奥古斯特·梅尔克，司库

组织委员会：

社会民主党代表：

J. R. 耶格尔

X. 卡雷尔

奥·兰格

罗·宰德尔

A. 维德梅尔

格留特利联盟代表：

卡·毕尔克利

赫·格雷利希

Fr. 海菲利

A. 伊尔格

约·福格尔赞格尔

工会联合会代表：

E. 贝克

C. 康采特

A. 吕梯

卡·曼茨

奥·梅尔克

注意：我们把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草案和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草案同这封邀请信一起寄给你们。这两个草案由组织委员会起草，在3月26日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上经修改后获得通过。它们只是一些建议，目的是为了节省代表大会的时间。代表大会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一切问题都将依照它的意志来作出决定。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把暂定的议程和我们已经收到的提案一起寄给你们。不言而喻，代表大会本身将最后决定它的议程。

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①

代表大会议事规程^②

① 规定全文见本卷第325页，此处从略，参见第328、343—344页。——译者注

② 议事规程全文见本卷第320—321页，此处从略。——译者注

代表大会议程

1. 在国际上贯彻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
2. 关于五一节的共同规定。
3.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
 - (1) 议会制度和选举宣传。
 - (2) 人民直接立法。
4.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
5. 保护女工。
6. 工会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组织。
7.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组织。
8. 其他。

收到的提案

(根据议程上的各项问题整理)

1. 在国际上贯彻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

瑞士格留特利联盟、工会联合会、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提案

代表大会宣布：

八小时工作日是使工人阶级从资本家的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也是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最重要的措施。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将减少失业，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工资和提高工人的购买力。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将改善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家庭生活，并可能使儿童得到更多的关怀。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能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增强活力，提高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能使工人阶级得到时间去建立工会和政治组织，并进行活动；只有这样政治权利和自由才能发挥作用，才能真正用来实现人民的社会解放这一目的。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必须在所有国家内开展，因为只有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立法才能保证其持久性和发挥造福社会的作用。

代表大会认为，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办法是：

在全国和国际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由这些组织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宣传鼓动工作。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工作要通过传单，通过报告，通过社会主义报刊，通过游行示威，在集会上和政治团体中，在议会里，在各种国家机关和市镇机关中进行。在社会主义报刊上要开辟“八小时工作日”专栏来报道有关的事实和活动；在政治机构内工人的代表要随时提出缩短劳动时间的提案，特别是缩短受国家和市镇雇佣的工人的劳动时间。

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应就**通过立法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达成共同谅解**。工人的工会组织要同雇主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非政治性的、自由的斗争，以便为对整个工人阶级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立法开辟道路**。

II. 关于五一节的共同规定

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提案

代表大会决议：

五月一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游行示威，将来在每个国家中都应表现工人不惜任何代价，准备使用一切手段，不顾反动政客和资本家的阴谋维护国际和平的坚强意志。

巴黎劳动介绍所的提案

鉴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只是工人们骨肉相残的大屠杀，它使资产阶级获得最大利益和满足，因为资产阶级把战争看作是保护他们的财产的最有效的手段；

还鉴于，统治者的野心和赎武主义者的愚蠢，企图掩盖和平对于各国人民不仅是最神圣的义务，而且是最高的利益这一无可辩驳的真理；

正是工人们流洒的鲜血使军官们荣获十字奖章和勋章。作为回报，军官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是用火枪（在 1848 年），或者，用机关枪（在 1871 年）向工人扫射；

最后，鉴于，一切骨肉相残的战争都只是史前时代、野蛮时代的最后遗迹，那时胜利者吃掉死者的尸体是战争的目的，

我们要求：

1. 在 5 月 1 日这天举行游行示威，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
2. 这个游行示威还应当成为争取维护国际和平的游行示威。

法国东部区域代表大会的提案

1. 消除欧洲战争。
2. 最近 50 年内被兼并的一切国家的当地居民有权选择自己

的国籍。

3. 上述提案由欧洲各国议会通过后，即获得法律效力。

4. 成立国际仲裁法庭，由欧洲各国议会指派代表参加，每 100 万居民指派 1 名代表，任期 3 年。

5. 仲裁法庭一经成立便立即着手解决普遍裁军问题，解决保证能够对那些需要表决的问题自由进行表决的措施问题。各国之间的一切纷争都应由这个仲裁法庭最后裁决。

III.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

a. 议会制度和选举鼓动

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提案

代表大会决议：

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坚持不懈地进行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活动，因为只有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消灭了特权和阶级，剥夺了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的财产的时候，它才能够着手建立以平等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共和国。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提案

1. 鉴于，阶级斗争不可能以议会活动而告结束，代表大会要求各国工人党：

(1) 把选举只当成一种宣传手段来利用；

(2) 允许它们的某些代表进入议会，只是为了在那里抗议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决不允许他们参加任何议会活动，譬如，制定法案，等等。

2. 代表大会宣布反对某些社会党人起劲地鼓吹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可能实现的劳工保护立法、想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仅仅是调

节雇佣劳动的东西，变成一种新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

3. 希望代表大会考虑，革命社会党人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是否可以达成谅解。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提案

加入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前提是，承认反对阶级统治和剥削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它的目的必然是**夺取政权**。只有那些参加这场政治阶级斗争，并在斗争中使用工人阶级能够使用的一切政治斗争手段的人，才能被认为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成员。

F. 维斯纳的提案，于得克萨斯州贝尔德

代表大会宣布，将来在有社会民主党参加的一切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都必须严格保持其革命性质，党决不能因为通过选举有的党员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被推荐为某些官职的候选人而承认现存的统治制度。

舒赫、费斯特纳、弥勒、埃尔斯特、舒耳茨和伦纳的提案，于肯塔基州卡温顿

鉴于，

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参加政治选举看作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 and 信仰社会民主党学说的一种手段；

社会民主党人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正在努力打破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废除一切享有特权的权力关系和阶级关系，并把在现存制度下只由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交给整个人民；

现行的法律只是阶级的法律，就是说，它们是为了维护统治

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它们是针对工人的。因此，每一个依照这些法律和为了实施这些法律而选举出来的官吏，在宣誓就职后都必须而且将要利用这些法律来反对工人；

最后，社会民主党人通过选举当上这种官吏之后，革命精神会变成反动精神，特别是在美国这里，党将受到贪污受贿、腐败、收买选票等行为的腐蚀；

代表大会宣布：

将来社会民主党无论参加任何公开选举都必须严格保持革命性质，党决不能因为有的党员当选为总统、省长或市长，以及其他这类官吏就承认现存的统治制度和阶级制度。

b. 人民直接立法

瑞士格留特利联盟、工会联合会、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提案

鉴于，

法律是立法者的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利益；

立法时应以全民利益为重；

根据经验，立法机关与其说是代表工人的，不如说是代表资本家的。因此，它们制定的法律对资本家有利，而对劳动阶级有害；

凡是在议会制度不受约束地进行统治的地方，必然发生贪污受贿和欺骗人民的现象；

人民只有通过直接干预立法，才能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解放劳动阶级所必需的力量，

代表大会宣布，废除一切阶级统治的先决条件是，劳动阶级把**人民直接立法**当作最强大的政治斗争手段，有了人民直接立法，人民就将行使**提出法律的权利（倡议权）**和**表决法律的权利（公**

民投票)。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

IV. 社会民主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提案

代表大会决定，各国工人党要做好准备，一旦政府宣战就立即用普遍罢工予以回答；凡是在工人能对战争施加影响的地方和在有可能进行战争的国家里，就用拒服兵役来回答宣战。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提案

工人对战争的态度，已经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中充分表明了。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要在各国动员一切力量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欲望，越来越牢固地加强全世界工人团结的联盟，不断地谋求消灭把人类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和煽动各国人民互相仇视的资本主义。随着阶级统治的消灭，战争也将消失。推翻资本主义就是世界和平。

V. 保护女工

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的女工联合会的大批先锋战士和会员的联合提案

鉴于，

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拒绝任何合法的、有利于女工的保护立法，把这看作是同妇女的自由，同妇女争取享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的努力相抵触的；

它这样做，一方面忽视了建立在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今天的社会的性质；

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认识到由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妇女的特殊作用，即她们作为**孩子的母亲**对社会未来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声明：

凡是在考虑按照巴黎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实施保护措施的地方，各国工人代表的义务就是，坚决要求用适当的方式首先对**女工**实行这些保护措施。

VI. 工会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组织

巴黎劳动介绍所的提案

国际成立之初认为它已把社会主义组织置于重要地位，今天它承认，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正在兴起，我们指的是**工会联合会**。

这些联合会是新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它们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

为此，我们向苏黎世代表大会提出下列提案：

1. 成立全国性和国际性同业联合会。

2. 凡是已经成立工会的地方，工人应要求市政府建立隶属劳动介绍所联盟的劳动介绍所；凡是在工人已入主市政委员会的地方，他们应自己去建立这样的机构。这些劳动介绍所结成牢固联盟以后，会成为一股连专制暴君也梦想不到的强大无比的力量。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议之一，要求成立一切联合会都有代表参加的**全国劳工书记处**。

一切工会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联盟都要把责任移交给这种**全国劳工书记处**。

伦敦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的提案

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提出的供代表大会考虑的提

案：——

应当考虑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传播使社会主义能够比较容易地运用于一切工业部门（只要出现这种运用的可能性）的技术知识。

我们建议考虑以下两点：

1. 商讨如何在一切工会内成立技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和报告它们各自的工会如何能最好地履行国家的、市镇的或其他的合同，而不让任何资本家中间人插手。

2. 把商业无产阶级，如办事员、商店职员等等，总之，商品分配和交换领域内的一切雇佣人员争取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来的最好办法和着眼点是，要考虑到比较容易实现商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以及工业财富的收益的社会化。

VII.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组织

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提案

中央革命委员会认为，它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出并被指定交给苏黎世代表大会审查的提案是正确的。这个提案的内容是，凡是派代表出席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并接受大会决议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切派别，都应取一个同样的名称。

我们建议，这个应包括一切流派和派别而又不损害它们的独立和性质的党的共同名称叫做：

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决议：

凡是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并赞成大会决议的社会党和工人党的一切派别，都应使用一个共同的名称，即：

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决议：

指定筹备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瑞士组织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决议执行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使命尤其在于，帮助不同国家的全国劳工书记处彼此建立联系和探索准备成立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并促其实现的办法。

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提案

为政治流亡者负担费用的问题由国际来作出安排。

巴黎 6 个革命团体的提案

应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起草一个所有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学派和团体都能接受的两个半球革命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条约。

曼海姆《人民之声报》的一位德国同志的提案

长期以来，早就有必要赋予社会民主党的各种目标的国际性以每个人都明白和理解的表现形式。

在我们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实际措施之一，是我们的一个同志当年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经全体德国代表在支部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就经济变革的必要性阐明我们的目的的第一部分，应当采用同样的措词，因为各国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在涉及我们的最终目的时，纲领中这个对各国来说都是共同的部分，应根据每个国家的需要补充加进第二部分，这就是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向当时的国家提出的政治要求。这一部分现在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各国的宪法是彼此

各异的。某个国家已经达到的许多东西，也许正是其他一些国家尚待努力争取的东西，因此，必须把它们列入纲领的政治部分。

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小组联合会的提案

研究全体社会主义者或者通过一项条约，或者通过联盟成立国际联合会的办法和途径。

VIII. 其 他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提案

代表大会决议，凡是在有必要实行政教分离的一切国家，工人党都主张实行政教分离。

伦敦坎宁镇社会民主联盟支部的提案

社会民主联盟坎宁镇支部的成员认为，采纳一种欧洲语言为一切国家的工人除了他们的母语之外都必须掌握的语言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因此他们慎重地要求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作出决定，他们认为哪种语言最适合于这个目的。

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提案

代表大会建议工人们学习 Volapük^①语。

① 德国人施莱尔于1879年创立的一种世界语。——译者注

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

(1893年8月6—12日)

前 言

如果说这个记录的出版推迟了，那不是记录员的过错。他完全按要求送出了记录稿。当按照事先的决定把校样交给组织委员会成员时，出现了分歧。问题在于，记录的编写是否应该不受拘束。委员们对大会上的某些事件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人们一再安排时间进行注释和纠正，但毫无结果。

最后人们在一次会议上达成协议，就对记录作某些改动一事同记录员取得谅解，这一点在短时间内就做到了。于是组织委员会一致同意出版记录，但是让整理人对记录的内容负责。

为了避免对这一决定的意义产生误解，我在这里受组织委员会的委托明确宣布，这个记录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一个人尽可能仔细认真地整理出来的，我们要感谢整理人所做的努力，因为他所做的工作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没有一个人有时间去做。

哪些句子可以不要，哪些几乎不能回避，这方面的问题在于，发言人表达的意见在报告人的母语中漏掉了的，在其他语言中多半更详细地翻译出来。还有这样的情况，报告人外语讲得很多，而记录是以习作为基础的，而这种外语习作的语句自然比母语中包

舍的语句少。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大会上的大部分翻译中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翻译是紧跟在发言人之后，凭新鲜的记忆进行的。

如果想改变这一不良现象，就应在今后的代表大会上像其他代表大会已经做到的那样，采取这样的措施：在每个发言人讲完话后就立即请他用自己的语言把发言内容写下来，或者必须为大会发言指派速记员，或者必须为每一种语言找一个记录员，然后从所有这些不同的记录中综合出正式记录。后两种方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经费，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目前还无能为力，因此对于目前这份记录不应用过高的标准来衡量，而只能用当时可以支配的经费的多少来衡量。

推迟出版的部分责任当然应由前言作者本人承担。由于一大堆事务性工作及眼睛发炎严重影响本人的工作能力，在这里我要请读者原谅。

* * *

组织委员会想在此简要介绍一下它在代表大会之前所做的工作，就代表大会本身作些说明，而这些是记录本身包括不了的。

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决定，下一次代表大会于1893年在瑞士召开。1892年1月10日，瑞士3个最大的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党、格留特利联盟和工会联合会——的委员会举行了会晤。它们决定：（1）代表大会在苏黎世举行；（2）由3个联合会各派5名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3）大会的经费通过自愿捐助（出售认捐券）的办法来筹集。

组织委员会由3方代表组成。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J. R. 耶格尔、X. 卡雷尔、奥·兰格、罗·宰德尔、A. 维德梅尔；格留特利联盟的代表是：卡·毕尔克利、赫·格雷利希、F. 海菲利、

A. 伊尔格、约·福格尔赞格尔；工会联合会的代表是：E. 贝克、C. 康采特、A. 吕梯、卡·曼茨和奥·梅尔克。卡·毕尔克利当选为主席，副主席是H. 赫·格雷利希；秘书：罗·宰德尔；记录：J. R. 耶格尔以及司库奥·梅尔克。

向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发布了第一份用德语和法语书写的通告，向他们说明代表大会的意义，并为筹集资金组织出售认捐券，当时估计为5 000—6 000法郎。

紧接着，也是在2月，向各国工人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其中包括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对参加代表大会和提出建议和提案的首次邀请。邀请是向所有“承认工人组织及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必要性”的工会和社会党发出的。通告印成德语、法语和英语发往我们知道地址的一切地方。

全体委员会通常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其间，根据需要经常召开规模较小的执行委员会。详细的通讯报道都要送交全体委员会传阅。地方上的筹备工作也及时展开。

1892年9月1日，组织委员会主席向正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年会发出了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特别邀请。

但是，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这个年会毫不重视我们的邀请（只是在多次提出意见之后才引起他们的注意），反而委托议会委员会立即在伦敦召开一次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委员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它首先向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会、工会理事会和工人组织发出了一个特别通告。通告指出，苏黎世代表大会是在格拉斯哥代表大会之前一年在布鲁塞尔有不列颠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确定的，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只有经过国际协商同意后才能召开。通告继续指出，最重要的一些国家的大工人组织已经决定向苏黎世代表大会派遣代表，并且在向格拉

斯哥代表大会发出邀请书的同时，还特别邀请不列颠工会派代表参加我们的大会。

继9月28日的特别通告之后，我们不久又于11月15日向各国工人发出了第二号通告，向他们介绍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通知他们暂定的议程，并表示希望他们最迟在1893年2月底之前把新的提案送来。

在发出这两个通告之后，组织委员会收到大量的来自各国，其中也包括来自英国的赞同声明，于是议会委员会收回了它的邀请，并为误解表示道歉。

因为至1893年2月中旬收到了大量提案，看来有必要就其分类，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草案和关于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取得一致意见，遂订于3月2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预备会议。被邀请参加预备会议的单位如下：法国是中央革命委员会、工人党和劳工联合会；德国是党的委员会和工会总委员会；英国是议会委员会、伦敦工联理事会、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和一些较大的联合会；此外还有比利时、丹麦、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典社会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一些距离较远的国家大概根本不可能参加会议。

通告还附加了经过组织委员会讨论的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草案和大会议事规程草案以及按照材料分类的提案。根据后来对组织委员会提出的反对意见来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届代表大会如此及时地向参加者提供这样多草案供他们预先讨论。

预备会议按预订时间在布鲁塞尔举行，几小时内就完成了它的工作。根据它的决议筹备工作进一步展开了。由于没有关于大会的一项主要议程——八小时工作日的提案，组织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以瑞士组织的名义制订一份草案，同样，还要制定一项人民

直接立法的草案。包括全部提案和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及给代表们的其他通知的第三号通告于6月15日发出，以便欧洲和美洲的组织能及时收到它。

7月初接到法国和德国同志的申请，他们希望把代表大会推迟到9月17日举行，因为法国众议院可能于8月20日举行选举，选举前几周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宣传工作，所以很难向代表大会派出代表。

组织委员会立即于7月4日就这一申请进行了认真商讨。虽然有关选举的正式通知目前还没有公布，但仍然还是立即采取了必要步骤，以确保代表大会一旦推迟以后的地点问题。同样还就推迟代表大会问题发电报询问法国同志。之后又去电询问不列颠工联议会委员会，推迟代表大会是否会同年会发生冲突从而使工会代表不能出席。

对我们的紧急询问没有人迅速给予回答，所以组织委员会到7月12日才有可能讨论这件事情。法国的选举日期始终没有正式宣布；在巴黎的瓦扬同志认为，选举日期推后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议会委员会认为，推迟代表大会将使大不列颠不能派大批代表参加。对较远的国家的组织只能用电报方式通知推迟的意见，但澳大利亚代表接到通知时已在旅途中，美国代表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根据这种情况，组织委员会认为推迟已不再可能，因而不改变已确定的开幕日期。

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赶紧把这个决定通知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同志们；遗憾的是，有一项通知耽误了一些时间，结果遭到了指责，但很快就满足了所提的意见。

现在剩下不多的时间要用来结束地方上为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供参加大会的代表支配了。如果说开这样的大会抱怨是

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我们希望代表大会的参加者能获得这样的印象，即组织委员会做了一切事先能够预见到的准备工作，以便促进大会顺利召开和为代表们创造尽可能好的住宿、交通和交谈的方便条件。工人阶级中许多力量对此进行帮助和热情参与各种活动，在此应表示谢意。

代表大会的开支结算要比预计的高出很多。帐目直到现在尚未结清；开支接近 8700 法郎。在这里所以要提一下这件事，目的是为了以后开这种代表大会的地方对开支能有一个估计数。

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普遍性及代表性的最好证明，就是大量印发的关于各国运动的报告；提供这样大量的报告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提供报告的有下述国家，它们的报告所使用的语言在括弧内注明：澳大利亚（英文），保加利亚（德文），丹麦（德文），德国（德文），大不列颠，社会民主联盟（英文），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合会等（英文），意大利（法文），挪威（德文），奥地利（德文），匈牙利（德文），克罗地亚（德文），波兰、全国代表团（德文）、《工人事业》（德文），罗马尼亚（法文），瑞士（德文和法文），瑞典（德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法文），劳动者总同盟（法文）和美利坚合众国（英文、德文和法文）。

所有这些报告加起来有本小书那样厚，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将这些报告作为代表大会记录的附件出版。但翻译和印刷的费用相当可观，只有大批销售才能补偿，但能否有这么大的销售量还是一个问题。因此不得不暂时放弃出版。

当然苏黎世代表大会也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现象，一部分是由于法国代表团中重要先驱战士的缺席而造成的缺陷，这件事使组织委员会比任何人都感到遗憾；一部分是因为有些人坚持要求

挤进来，而关于这些人代表大会多数代表一无所知。参加大会的条件问题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变得十分尖锐，这个问题可能对今后的代表大会十分重要，它的解决使将来能避免许多无益的争论。

社会主义运动的反对者当然很看重这些不和，遗憾的是社会党人自己在这方面也帮了他们的忙，但要否认或抹煞苏黎世代表大会已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枉费心机的；这次代表大会粉碎右的和“左”的阴谋而成为国际社会民主工人运动的一次盛大集会，它克服一切“分裂”行为而向深度和广度胜利进军。

赫尔曼·格雷利希

受委托撰写

1894年5月15日于苏黎世

第一次会议

1893年8月6日，星期日，上午10时

巨大的音乐厅装饰着用参加代表大会的16个国家的文字写成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幅瑞士艺术家玛格丽特·格雷利希画的马克思的出色画像，画像周围饰以红旗。

卡尔·毕尔克利致欢迎词

10点刚过，组织委员会主席、欧洲社会主义的老战士卡尔·毕尔克利宣布代表大会开幕，致欢迎词（然后他又用英语和法语重复一遍）：

尊敬的同志们！我能在我出生的城市欢迎各国工人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庄严的大会，感到十分高兴。我曾经参加60年代最初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日内瓦、洛桑和巴塞爾的代表大会。今天与当时多么不同啊！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年代中无产阶级运动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当时**是一些朝气蓬勃的人的小小的协会，而**今天**聚集在这里的真正是千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并且还有千百万人在注视着我们的工作。

资产阶级曾经许诺过但没有兑现的东西，就是组织起来的无

产者当前的任务：和平、自由和所有人的福利！资本主义使欧洲堆满了武器；这些武器首先是用来对付奋发向上的无产阶级的；这些武器阻止人们去争取自由、民权和参与分配无产阶级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权利。为了给不断增加军费寻找借口就要想方设法对各国人民进行煽动，好像各国人民也有一点点兴趣去互相残杀。

资本主义造成大多数民众的贫困，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资料恶化，毁坏了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力，给他们带来了忧虑、饥饿和痛苦。

资本主义是私人掠夺经济，甚至使大自然荒芜，滥伐森林，耗尽地力和使气候变得恶劣，造成如傅立叶早在80年前就预言的气候剧变：干旱和洪水，酷热和严寒，还有可怕的暴风雨和大雷暴。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获得利润，以便使“掌握着掠夺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富堆积如山。但丁的《地狱篇》没有描绘出这种群众的贫困，也没有勾划出资本主义的天堂。

只有无产阶级才对消灭当今社会的荒谬现象——世界经济和不断出现的战争危险；少数人拥有大量财富和群众性贫困——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必须以公有经济替代私人掠夺经济；如果确实存在人类发展规律的话，那么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必然要代替今天的发展阶段。必须要有这样一条规律，它装在全人类的胸中！全世界无产者已开始去完成他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他们开始去夺取政权和获得权利；他们在一切地方为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斗争，以便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积聚力量。

各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一致认为，**各国无产者的团结**是促进各国人民的团结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次代表大会应在指导和组织的我们斗争手段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它应赋予我们新的力量去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

因此我们欢迎你们大家，你们来到这里为的是在我们瑞士的国土上开会，瑞士以其不同人种（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勒托—罗马人）的联合和以其民主的人民权利成为**欧洲联邦**和未来的世界共和国的**小小榜样**。

解放这个词在这里应不受任何约束。愿作为代表大会标记的兄弟情谊的精神在凡是出现观点分歧的地方也鼓舞我们每个人。在使我们团结起来的伟大思想面前这些分歧是微不足道的，这个伟大思想就是：**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热烈鼓掌。）

大 会 议 事 规 程

在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工人书记格罗伊利希的主持下，代表大会开始讨论大会议事规程。

代表大会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辩论后，以 243 票对 53 票通过了由瑞士组织委员会提出的议事规程。

代表大会议事规程

1. 各国代表于星期日上午 9 时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在组织委员会指定的地点集合，等候进行资格审查；同时他们要委派他们参加主席团的代表，包括翻译人员在内。

2. 10 时全体代表在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集合举行开幕式，确定议事规程和大会议程，以及成立讨论议程上的各个问题的专门委员会。

（下午向代表大会公开致贺词。）

3. 代表大会每天举行两次会议，上午 9—12 时和下午 3—6 时。星期六下午休会。

4. 代表大会在第一次会议上任命每天会议的主席，从各与会国中选出。由每个国家派出的代表组成的主席团，从其成员中确定担负各种实际工作（秘书、翻译等）的人选。

5. 讨论议程上的各个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由各国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

6. 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和现状的报告不作口头叙述；这些报告要用印组织委员会通告那样大小的纸张（每页长 193 毫米、宽 109 毫米），用德文、英文或法文（也可以同时用 3 种文字）印好后，交组织委员会分发给与会代表。

7. 发言者须向主席团提出书面要求。

8. 所有提案要书面提出。专门委员会的提案以及至少有 10 名代表附议的重大提案，用法文、德文和英文印发给各个代表。重大提案只有在印出来发到代表手中后才能进行表决。

9. 报告人讲话时间为 20 分钟，其他发言者 10 分钟。还没有就一个问题讲过话的发言者可以在要求第二次发言的人之前讲话。同一发言者不能就同一问题作两次以上的发言。

10. 提案、报告和讲话将翻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

11. 一般按人头表决。在涉及重大问题时，对一个国家的提案按国家进行表决。如多数国家赞成，提案就获得通过。

12. 代表大会的一切会议都是公开的；新闻报道员报到后由组织委员会单独安排座位。

由于参加大会的瑞士人当然特别多，为了避免在进行表决时出现瑞士人占绝对优势的现象，瑞士同志们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宣布，在表决时他们只有 20 人参加投票。宣读了来自各国（德国）的许多电报。会议于 12 时后休会。

* * *

下午2时苏黎世工人举行了游行，这在苏黎世还从未见过；许多城市的联合会和代表团也来参加。仅温特图尔市就开来一列载有1500名参加游行的人的特别快车。参加游行的单是有组织的工人就至少有10000人。当游行队伍从挤得满满的城市街道穿过时，数以千计的抱同情态度的苏黎世工人居民以友好的欢呼向游行队伍致意。当然在整个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当局对人民采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的特点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例如，这里的当局没有做任何可能给游行带来困难的事情。当高级中学保守的校长拒绝让游行队伍在州立学校体操馆举行集会时，州政府毫不犹豫地同意提供使用。同样，苏黎世市政委员会也命令有轨马车联合会，从下午2点半到6点在游行队伍通过的所有街道停止营业。

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十几面旗帜；各个工会组织都举着自己行业的标记（部分是复制的，部分是原件）。例如，木工举着用刨花制作的一面旗帜，上面有一幅象征协会目标的漂亮的画；装订工抬着一本写有“知识就是力量”的大书。印刷工人举着一个大标语牌，正面写着：“国际工人报刊万岁”，反面贴有欧洲和美洲各国工人报刊的名称，名称周围有一句题词：“文字比刀剑更有力量”。游行队伍的后面有一个大标语牌，上面画着一只大蝗虫，在它下面写着：**资本主义**。这个贪婪的、把土地变成沙漠的资本主义的象征在整个游行过程中最受人欢迎。

儿童队伍受到特别的欢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穿着白色连衣裙，头戴弗里季亚小帽，肩上扛着一面红旗。另一个女孩扛着一幅标语牌：“父辈的努力将造福于我们”。跟在后面的是几百名拿着花束的男女儿童，一支由女童工和女工组成的壮观的队伍跟在儿童们后面。游行队伍在晴朗的天空下经过阳光灿烂的街道走向

州立学校的高地，在那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几千人集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格雷利希**、设菲尔德的**霍布森**、布鲁塞尔的**沃尔德斯**、**倍倍尔**和米兰的**屠拉梯**都讲了话。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向火车站广场进发，在那里人们尽情地高呼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随后就解散了。

第二次会议

(1893年8月7日，星期一，上午9时)

通过主席团人员组成

格罗伊利希宣布开会，他根据议事规程提出建议：会议主席安排如下：第一天德国人，第二天法国人，第三天英国人，第四天奥地利人，第五天比利时人，第六天意大利人。这项建议没有人反对，一致通过。第一个坐上主席座位的是保尔·辛格尔。

主席团由下列人员组成：辛格尔（主席）；阿尔吉里阿德斯（副主席）；屠拉梯、路易莎·考茨基、约翰·霍奇、德莱昂（记录）；艾威林夫人、斯密斯、雷曼、博尼埃、安·肖伊（翻译）。

辛格尔对委托他担任主席表示感谢，他说：我今天以特别愉快的心情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担任主席，因为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今年8月的这些日子同时还引起了我们愉快的回忆。再过几天就是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纽伦堡代表大会通过国际章程25周年纪念日。德国无产阶级用这个行动承认了通过阶级斗争的国际组织推翻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从那以后我们在德国就关心促进国际团结，在我们的一切斗争中我们都感觉到，我们是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连在一起的；而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不仅在我们受迫害的困难时刻声援我们，而且经

常地向我们表现出高度友谊和国际团结精神，并且在几个星期前再次表现了这种友谊和团结精神，因而我在这里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对此表示我们的感谢。

如同迄今所做的一样，我们将来也将继续做下去；因而这个工人议会也将成为工作议会，我们的工作将给我们迎来社会主义的红旗在全球胜利飘扬的那一天。（十分热烈的鼓掌。）

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

代表大会开始讨论布鲁塞尔预备会议提出的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这些规定如下：

“1. 一切工人工会，以及承认工人组织和政治行动的必要性的社会党和团体都可以参加代表大会。

2. 每个国家审查自己成员的代表资格，制订合格的和可能不合格的代表的名单，并把名单和委托书一起交给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印刷，然后再送交代表大会主席团。

3. 在是否允许参加的问题上如果发生争执，首先由大会主席团作出裁决；如果对这个裁决还有争议，则由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4. 被确认的代表由组织委员会发给他们写有他们的名字的代表证。”

考伊弗尔（巴黎，排字工人）提议删去参加条件中关于政治行动的那一段。所有政治派别的无产者都来到这里，他们同战斗的无产阶级手携手地共同前进，他们怀着最好的愿望，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不赞成政治行动。正如我们已经同意的那样，一切扰乱秩序的人将被赶出去，但必须允许每种政治观点在这里发表，并给每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这个大厅里保

留一个座位。我受法国代表团多数派的委托提出下述关于参加条件的修正案：

“一切职业性的工联，以及一切承认工人组织的必要性的社会党和团体都可以参加代表大会。

P. 阿尔吉里阿德斯、A. 崩讷、J. 莫容奈、A. 考伊弗尔、圣多米尼克、E. 德盖、E. 盖拉尔、B. 莫蒂埃、V. 勒努、路易·费里、莱昂·雷米、马尔尚、玛丽安妮”

亨特·瓦特（英国）：工联的代表们决定，坚持布鲁塞尔预备会议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第1条的全部内容。当然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工联或许也会被排除在外，因为它部分地也不代表政治行动。所以第1条必须在对它作最广义的解释的基础上加以保留，这就是每个工会代表都可以参加，而不管他所属的工会是否参与政治活动。关于无政府主义者，英国人认为，必须拒绝每个坚持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人参加，但是如果那些签发代表证书的工会或协会本身并不实行无政府主义理论，则不应拒绝。

博尼埃（以法国代表团少数派名义）主张保留布鲁塞尔的规定：今天工会运动要脱离政治已不再可能了；自然没有一个工会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这同工会的本质是矛盾的。今天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头脑糊涂的人就是挑衅分子的代理人。

兰道威尔（柏林，《社会党人》编辑）基本同意考伊弗尔的观点；他提议取消关于承认工人组织的必要性的规定，因为每个团体、每个政党和工会都满足了这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同样也应取消关于政治行动的规定，因为如果这不是指议会活动的话，这句话就毫无意义；关于这个问题应由代表大会来决定。应该允许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像他那样——是社会

主义者的话。（全场大笑。）

然后他想强调指出，根据德国通行的结社法，代表根本不可能由政党和联合会来选举。相反，代表一般都只是由公开的群众大会来选举的，而这种群众大会似乎是受到某一党派支持的。根据他的这种说法，在昨天德国代表团的预备会上他当然因此而被倍倍尔说成是警察局的好细；这是严重的侮辱，他对此表示抗议。

因此，他提出一个建议，所有那些在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当选的代表，如果他们背后有某个政党的支持这个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就应当得到承认。根据这一观点，参加代表大会的条件应作如下规定：

“一切工人工会，以及社会党和团体都可以参加代表大会。有些国家由于现行的刑法和结社法的束缚，不能选出真正的代表，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在公开的群众大会上选举出来的代表都应得到承认，如果看出来，这种集会受到一个政党的支持的。”（有人激烈反对，也有人鼓掌赞成。）

莫勃雷（伦敦，国际裁缝工会代表）：不应搞宗教裁判所。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有权发表意见的公开集会。我们不想对所有意见施加影响。但多数派只想开成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他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有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会会员，但同时又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举个例子：我自己就是。（全场活跃。）少数派始终受到压制，如同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和代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所受到的对待那样。——政治行动这个概念伸缩性很大，无政府主义者也根本不反对任何政治行动，难道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就不是政治行动？德国社会党人或迟或早也将不得不转向暴力的政治行动。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不应压制少数派。

主席辛格尔：有人送来下面这个提案：

“我们建议对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第1条作如下补充：

所谓政治行动指的是，工人政党努力利用或设法夺取政治权利和立法机构，以促进无产阶级利益和夺取政权。

阿德勒博士、B. 爱德华、
奥·倍倍尔、卡·考茨基、
李卜克内西、杨科夫斯卡
娅-门德尔森夫人、奥托·
兰格”

我将这项提案提交讨论。

倍倍尔：在论证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提案之前，先回答兰道威尔的个人质问。兰道威尔昨天在德国代表团会议上严重警告从德国来的各个联合会的代表不要参加代表大会，因为这样做会同现行的法律发生冲突，并且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兰道威尔：这不是事实。）倍倍尔：您假装不知道您昨天在发言中讲过这些话。（热烈的赞同声。）我仅仅表示了我的惊讶：一个平时喜欢自诩为最激进的人，在这里讲起话来却像一个警察。根据兰道威尔今天的发言来看，我的这种观点没有什么要改变的。（鼓掌，无政府主义者激烈打断他的话。）关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了结。

兰道威尔今天的讲话有一个作用：这个讲话使我相信，布鲁塞尔决议的文本是可以作种种解释的。在布鲁塞尔每个人当然知道，对所谓政治行动应作何理解。但是为了避免发生任何误解，我同考茨基、阿德勒、兰格、爱德华、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上面宣读过的提案。

我们的态度是从经验中得出来的。把无政府主义者同我们分

开的是原则性的对立；我们的立场是如此不同，以致每次讨论都是多余的。在所有原则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使允许无政府主义代表参加将只会带来一个后果：浪费时间和最终使代表大会的讨论毫无结果。对工会的提示是毫无意义的，所有的工会都是立足于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它们都同意使用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能保证它们获得胜利的一切手段；它们也都一致同意用政治斗争来实现它们的要求。正是英国工会多年来通过它建立的议会委员会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凡是在它相信靠它自己的力量不能够实现它提出的要求的方面，它都在利用议会主义手段和立法机构。

前几届代表大会都采取了这种立场；不管巴黎代表大会决议还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在劳工保护立法问题（八小时工作日、禁止使用童工和禁止上夜班等）上，所有这些决议都是在它们应该得到实现，而只有通过立法道路才能实现的前提下拟定的。如果所有这些要求构成我们的讨论的基础，如果我们商谈的目的就是就夺取政权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这班先生们在这里就什么也捞不到了。

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只是这次代表大会才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手段作出决定，因为荷兰人也反对议会活动，这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同荷兰人有分歧，但是在有一点上我们同荷兰人有共同的基础。荷兰人没有根本拒绝参加普选，而且他们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就是以争取普遍的、平等的政治选举权为目标的。我们之间的分歧点仅仅在于参加议会斗争的规模。

无政府主义者是另一回事。他们拒绝参加任何议会斗争；哪里有普选权，他们就放弃使用它；哪里需要为工人阶级争取普选，他们就进行抵制，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多余的。

在这种原则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们德国人决定结束辩论。

要知道，先辩论3天，然后再请这些人出去，因为他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这肯定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兰道威尔：您特别想把我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使您不舒服！]我们德国人当然希望你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你们可以为自己召开一个**特殊的代表大会**，就像那些持基督教—社会观点的人所召开的单独的代表大会一样。在这方面正如我们在右边划了一条分界线一样，我们同样决定在左边也划一条分界线。

今天当这班先生们尽量把无政府主义者排挤到次要地位时，他们就冒充社会主义者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或“独立派”的先生们究竟想干什么呢？他们没有共同的立场，没有共同的原则，没有纲领，也根本没有共同的名称；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意见。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读一读他们的报纸，就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资产阶级根本不存在，他们的头号敌人是社会民主党。我们不能同这样一个宗派进行讨论，我们必须明确和坚定地说出来，谁可以参加代表大会和谁不能参加。

（倍倍尔的讲话一再被响亮的掌声所打断，讲话结束时受到代表们和旁听者的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在场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独立社会党人大叫大嚷，以致人们听不清楚讲话者的声音。因此辛格尔要求瑞士组织委员会的一些同志设法维持秩序。

美国犹太工人代表卡恩：出席代表大会的法国代表们无权在这里充当法国的代表。当我们在这里还在辩论是否要参加政治行动的时候，恰恰是那些正在做政治工作的人没有在这里，而我们还想在这里就政治工作问题进行表决。如果这些法国代表出席的话，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当我们美国代表出发时，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组织的代

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自然不知道这点；这当然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时刻都在改变他们的信念。开始时他们像反对任何一个组织一样反对工会组织，现在他们正在投入工会运动，但他们只是把工会运动当作为宣传他们的思想的幌子。当我们在这里想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时，无政府主义者有多少，我们就不得不听取多少种意见；他们只有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任何代议制。但是如果有人是代议制的反对者而又在这里作为一个组织的代表发言，那么在我看来就像有人想吃油炸冰淇淋一样。在这里独立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要最温和的工人运动形式——工会，但如果他们到美国去，他们在那里就会同持炸弹的人握手。有人在这里把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扯到辩论中来，以此证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也可能是一种政治行动。但这是完全错误的。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并由此更加使人确信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必要性：他们之所以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恰恰因为他是代议制的反对者。我和美国代表们将投票赞成布鲁塞尔预备会议的提案和倍倍尔的修正案。

科尔纳利森（荷兰）：在布鲁塞尔预备会议上已经决定，关于参加大会的规定的第1条必须附上少数派提案的意见，即荷兰人希望取消最后一段。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使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互相排斥。如果人们一方面允许一切工人工会参加，那么另一方面也应该允许一切社会主义团体参加。我们可能会问，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确信工人组织的必要性，然而谁是受一个组织的委托而来的，他对这个问题已作了肯定的回答。——还有一句话是反对倍倍尔的。倍倍尔说“年轻人”不是一个党派。但倍倍尔无权对年轻人是不是一个党派作出判决。在涉及布鲁塞尔决议的问题上我们赞成法国代表团的观点，荷兰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

的；没有任何对此会持不同意见的宗派。只是偶尔有一两个人声言反对我们……因为他们有钱。我们希望法国人的提案能被通过成为决议。（法国人和荷兰人鼓掌。）

上午会议休会。

第三次会议

(1893年8月7日，星期一，下午2时)

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

(继续)

英国代表们通过霍布森发表声明，他们提议结束辩论；如果这个提案遭到拒绝，他们将在每个发言人讲话之后重新提出；他们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结束这个无益的辩论；这只能是浪费时间，因为事实上这个问题要在讨论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时才能得到解决。

绝大多数代表决定结束辩论。对沃尔德斯提出的下述决议案进行了表决：

“由于只有比利时代表团坚持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参加大会条件的决定和布鲁塞尔预备会议的决议，比利时代表团提议，代表大会在通过已提交大会的规定文本时按国家进行表决。”

按国家进行表决的结果：德国、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挪威、荷兰、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俄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一致赞成，奥地利除3票反对外都赞成，英国除7—8票反对外都赞成，瑞士除2票反对外都赞成，西班牙反对。法国弃权。——荷兰事后声明，它认为，只是在这个提案表示允许无政

府主义者等参加的情况下才赞成这个提案的，否则就不赞成。

对倍倍尔及其他同志们的提案也要单独进行表决。沃尔德斯反对这样做，他根据议事规程声明说，既然通过了比利时的提案，其他任何提案，包括倍倍尔的修正案在内，也就无效了。由于主席团里有人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辛格尔便要求大会进行表决：对倍倍尔的补充提案是否要单独表决。代表大会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除倍倍尔的补充提案外，其他一切提案和修正案由于已进行的表决而归于无效。

倍倍尔的补充提案随即得到通过。按国家表决结果如下：德国（除兰道威尔、威纳尔等人外，他们的委托书没有得到承认）、澳大利亚、保加利亚、意大利、丹麦、美国、罗马尼亚、俄国、塞尔维亚、挪威、匈牙利一致赞成；英国（除6票外）、奥地利（除3票外）、瑞士（除2票外）赞成；比利时一致反对，荷兰（除2票外）反对，西班牙缺席；法国和波兰弃权。

表决之后，印刷工威纳尔（柏林）在整个大厅叫喊：“我们抗议，这样一个工人代表大会。”

威纳尔及其一伙的骚扰造成几分钟的混乱。在台上的独立党人试图冲进大厅。大会讨论由于骚乱而陷于停顿；最终不得不把威纳尔、兰道威尔等人赶出大厅。

恢复平静之后，德盖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声明，法国所以在表决时弃权，只是因为他们的提案并未付诸表决。他们根本无意谴责政治行动；那些表示反对布鲁塞尔决议的人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革命委员会、工联组织、劳动介绍所的代表……

但是他们不想把这些人排除在外，这些人同其他的战斗的无产者只有一点区别，就是他们摒弃政治活动。有一些人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承认工会

运动的必要性。当人们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用各种文字挂在墙上时，也就应当允许一切派别的无产者参加。如果通过法国提案，那就不会发生我们刚刚亲眼见到的那种尴尬事件。

最后他用法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他们完全赞成昨天的游行，但是不能不表示有点遗憾。昨天在庆祝大会的会场上瓦扬被阻止入场而让比利时人沃尔德斯代替他讲话。沃尔德斯确实讲了很动听的话，每个法国人都同意他的话；但伟大的法兰西民族也应该有权讲话。勒努同志已经被指定为庆祝大会的演讲人，但却不让他讲话。

格罗伊利希马上声明，他在这样多的参加者中间没有注意到勒努，否则一定会让他讲话的。但首先勒努应自己到讲台上来。要组织这样一场大规模游行，而且还要去寻找勒努公民，这未免太那个了！（场内活跃。）

勒努声明，他个人不同意德盖关于他的打算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的声明。但对格罗伊利希他也要提一点意见，他当时离讲台很近，因而是不难找到的。

沃尔德斯以比利时人的名义声明，反对对倍倍尔的补充提案所进行的表决，他认为，通过第一次表决这个补充提案也就无效了。

伊格列西亚斯（西班牙）说，他之所以在第一次投票时反对决议案，只是因为他理解错了，他本来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及倍倍尔的补充提案的。西班牙社会党人仇恨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看透了无政府主义者。

根据德国代表团的提议，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其他规定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

代表大会议程

接着开始讨论大会议程本身。

有一项提案，要求全部接受已书面提出的大会议程。

米勒（罗马尼亚）提出一个提案，要求把对罗马尼亚和其他欧洲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农业问题列入议程。苏黎世代表大会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由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遗留下来交给它解决的。

支持这个提案的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代表团。

代表大会决定，把农业问题列入议程。

法国代表团提议，把总罢工问题也列入议程；对这个提案按国家进行了表决。12个国家赞成，它们是：澳大利亚、美国、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法国、荷兰、匈牙利、塞尔维亚、挪威（以上一致赞成），英国微小的多数票赞成；6个国家反对：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一致反对，德国除3票外反对，瑞士除1票外反对；罗马尼亚弃权。

现在大会议程包括以下各个问题：

1. 在国际上贯彻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
2. 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共同规定。
3.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
 - （1）议会制度和选举宣传；
 - （2）人民直接立法。
4.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
5. 保护女工。

6. 在国内和国际上扩大工会组织。
7.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组织。
8. 农业问题。
9. 总罢工。
10. 其他。

下午会议于 6 时休会。

第四次会议

(1893年8月8日，星期二，上午9时)

阿尔吉里阿德斯（法国）任主席，王德威尔得博士（比利时）任副主席。

阿尔吉里阿德斯宣布开会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今天在这里的法国人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代表一切派别，首先是代表劳动的法国，代表真正的无产阶级。如果说法国人流露出来的感情和他们表达意见的方式比较强烈和激昂，那么这是由于他们的气质造成的。但法国人希望，大厅里在马克思的画像旁边也能挂上其他国家的先驱者的画像，如布朗基、傅立叶、圣西门的画像，因为这些人对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全都做出过贡献。

主席向代表大会宣布收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独立社会党人就他们被赶出会场一事提出的抗议和拉甫罗夫的一封贺信。抗议信如下：

“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名的人被我国的一个小组宣布失去代表资格。我们对此提出最坚决的抗议。他们以意见分歧为理由把我们开除。我们不承认任何人有这样的权利，因为我们和代表大会的许多参加者有不同的政治信念，或者因为我们大概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把我们排除在代表大会外。我们不是一些没有委托书的单个的人，而是工人组织的代表，这才是唯一和代表大会有关的事。”

奥地利代表团提出下述提案：

“为了支持目前正在罢工的英国成千上万的矿工为他们的良好权利同时也为全世界工人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举行的苏黎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对他们表示声援并预祝他们获得最圆满的胜利。”

代表大会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通过了这个提案，同时还决定在代表们中间进行募捐以支援进行罢工的矿工。

皮卡德（英国，英国议会矿工议员）对这个声援声明表示感谢；虽然人们在这里讲的语言多种多样，但在这里占优势的是心中的语言。至于谈到物质支援问题，那么尽管现在有 20 万矿工踟蹰街头，但眼前还不需要物质支援，当然他们会把这些捐款当作声援他们的诚心诚意的表示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下来。

德国代表团表示为支援矿工捐款 500 法郎，法国代表团捐款 270 法郎。

纽文胡斯说，他和整个荷兰代表团昨天获得这样的印象，即随着对沃尔德斯的提案进行的表决，其他一切修正案也就无效了；只是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才投票赞成沃尔德斯的提案，但是主席又让对倍倍尔的提案进行表决。他抗议这种做法；他首先问自己：“如果那是诚实的”，当然是以良好的信任为前提的。倍倍尔的修正案意味着对自由言论的一种限制；通过对这个修正案的表决就把多数人的观点强加给了少数人。荷兰抗议对参加大会的条件作出限制，并提议重新进行表决；他相信，如果对沃尔德斯的提案重新进行表决的话，那么得到的结果将会同昨天的表决结果有很大的不同。根据昨天的表决所得到的印象，必须将上面这张画像（马克思像）蒙上黑纱，因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已被贬低了价值而成为一句空话了。

沃尔德斯也以极为不满的方式批评昨天会议主席处理的方法，并要求代表大会重新进行表决。他毫不怀疑，比利时人的提案排除了所有修正案，同时也不怀疑，德国代表团中也有许多人不同意倍倍尔的修正案。

阿尔吉里阿德斯向代表大会询问，是否还要对昨天的提案重新进行一次表决，或者直接转入大会议程。

奥利弗（英国）主张结束辩论和转入大会议程：今天已经浪费了一个半钟头来谈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议程上还有 11 个重要问题要讨论；如果头一天决定了的事情第二天都要再来批评一通，那会把大会引导到哪里去。

接着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决定转入大会议程。

组织委员会秘书宰德尔向大会通报收到了许多贺信和贺电（见附件^①）。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

接着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报告。

英国 65 名代表，代表 44 个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其中有 9 个组织完全是由犹太工人组成的；奥地利 34 名代表，其中包括 7 名捷克代表，代表所有政党和职业组织；澳大利亚 1 名代表，代表 5 个社会主义组织，其中有一个是德国人组织；拒绝了所谓工人党和工会中心派出的代表，因此只给予社会党人派遣代表的荣誉；比利时 17 名代表，其中有 2 名妇女，代表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保加利亚 2 名代表，代表 31 个组织；丹麦 2 名代表，代表社会民主

^① 见本卷第 639—642 页。——译者注

党（有 150 个组织，共 17 000 人）和哥本哈根工会（有 90 个协会，共 20 000 会员）；**西班牙** 2 名代表：伊格列西亚斯代表社会民主工人党，加尔西亚代表工会；**美国** 3 名代表：卡恩代表犹太工会，德莱昂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萨尼亚尔代表纽约工会中央联合会；第四位代表（亨利奥特，家具工人工会）的委托书不予承认，因为这个委托书是授权他参加国际木材工人代表会议的；**法国** 39 名代表，代表 54 个各种不同的组织；**荷兰** 6 名代表，其中 3 名代表社会民主联盟，其余 3 名分别代表印刷工人、糕点师傅和社会主义教师协会；**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地区组织）共 9 名代表，代表政党和 23 个工会；一份委托书被宣布无效，因为这个代表已被开除出党；**罗马尼亚** 5 名代表，代表党和工会；**俄国** 1 名代表（普列汉诺夫），代表彼得堡秘密组织“劳动解放社”（但普列汉诺夫声明说，即使这个组织是秘密的，它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在俄国根本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基础，因为俄国社会党人是站在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上的）；**塞尔维亚** 1 名代表，代表各种社会主义协会；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还非常落后，以致遗憾的是还没有可能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工党；**瑞士** 101 名代表，代表格留特利联盟（有 15 000 会员）、工会联合会（有 15 000 名会员）、社会民主党（有 5 000 名党员）；**德国** 92 名代表，有代表党和工会的 153 份委托书，其中 1 名妇女代表社会主义女工联合会；10 名代表的 11 份委托书由于不符合参加代表大会的条件而被拒绝；**挪威** 1 名代表；**意大利** 21 名代表，代表党和工会；**波兰** 11 名代表，其中 1 人的代表资格不予承认。

一部分意大利、德国和瑞士代表提议，代表大会应对正在进行竞选的法国代表表示声援，代表大会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同意了这个要求。英国代表团报告说，鉴于法国和英国之间由于暹罗问

题而产生了敌对情绪，代表团一致决定，宣布同法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让资产阶级去互相为敌，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而共同斗争。因此，英国代表团要公开宣布他们的兄弟情谊，并向法国工人及其大选表示最衷心的祝愿。

上午会议于 12 时休会。

第五次会议

(1893年8月8日，星期二，下午2时)

萨尼亚尔提议发表一项声援美国工人的声明，美国工人由于目前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久也将波及大陆）已有成千失业。——代表大会在欢呼声中通过了这项提案。

倍倍尔等对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第1条 补充提案的声明

倍倍尔要求把下述声明列入记录：

“由于倍倍尔和同志们对参加代表大会的规定的第1条提出的补充提案不断引起误解，下面署名的提案人要求把下述几点声明载入记录：

1. 提出确定“政治行动”概念的补充提案我们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兰道威尔先生在德国代表团中和在代表大会上以无政府主义者及其朋友们的名义声称，“政治行动”这个词毫无意义，你愿意怎么理解就可以怎么理解。这样一来，在这次代表大会和以后各次代表大会上这个词就可能被人滥用，并且为无止境地浪费时间敞开了大门。

2. 补充提案绝对不是说，每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要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一丝不苟地按照我们的定义采取政治行动。它只是要求承认工人有根据是否符合促进工人阶级利益的标准利用本国的全部政治权利，并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权利。

3. 因此我们决不是站在偷偷塞给我们的器量狭小的立场上。我们只是声明同下述这类人进行有效合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以最狭隘的和宗派主义的观点束缚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手脚，想限制他们只能使用一定的手段；这些人认为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投入那些使用别的手段而不是他们自己赞成的手段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怀抱，以利于剥削者的政党。

4. 此外我们声明，根据补充提案现在作了修改的规定，不会把真正具有工会性质的工人组织排除在这次代表大会和今后的代表大会之外，或者在选择它们的代表时受到限制。所说的补充只涉及到非工会性质的协会和小组。

倍倍尔、爱德华、考茨基、奥托·兰格、阿德勒

讨论通过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王德威尔得作关于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他宣布2份意大利的、1份波兰的、1份匈牙利的和11份德国的委托书无效。2份意大利的委托书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签发的，因而无效；1份波兰的委托书被否决是因为它是由一家其编辑部根本没有人知道的报纸签发的；主席团认为这1份和匈牙利的1份委托书是有效的。对未被承认的德国的委托书主席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多数人提议，拒绝威纳尔和兰道威尔的委托书，拒绝瑞士“独立党人”代表的委

托书，这些人在被瑞士人拒绝之后就转向德国代表团；另1份委托书必须宣布无效，因为所有的15个签名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达申斯基要求拒绝不符合条件的波兰委托书，这家报纸只出过一号，无法判断其倾向性；谁也不知道向这里派出一位女代表的这家报纸的编辑是什么人。

卢森堡小姐宣称这个事实同俄属波兰的特殊情况有关。报纸是由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协会出版的，应把它看作是波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出版物。

经过较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决定拒绝这个女代表。主席团对表决结果表示怀疑；波兰提议按国家进行表决。7国承认，9国不承认委托书，3国弃权。

吉勒斯（伦敦）认为被否决的德国委托书是有效的；但英国代表团声明，他们没有委托吉勒斯发表讲话。吉勒斯在德国人的激烈反对中声明，选举是合乎规定的，被拒绝承认的这些代表代表着同样的目标，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仅仅是有点自吹自擂而已，有些人甚至明显地颂扬矛盾。代表大会不应树立一个表明它是如此宽容，以致拒绝奉行另一种策略的社会主义者的榜样。

德莱昂（美国）：德国人无疑不是始终没有缺陷的，但他们无可争辩地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没有这样的印象，即独立党人真诚地这样认为；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他们只不过是说蠢话。

德国人的利益在于，他们在其宣传活动中不要被这些人所搅乱；德国人自己能最好地作出判断，他们是否能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因此应根据德国人的提案作出决定。

霍布森提议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英国人对于这种无目的的辩论已厌烦了；他们中每个人都知道，他应当怎样投票。我

们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讨论，我们对我们的委托书负有履行我们的义务的责任；如果代表大会根本不能开始讨论议程上的问题，那么英国代表团就只能遗憾地被迫退出大会。

马尔尚（法国）：英国代表团当然有权阐述他们的看法，但是这里涉及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些代表（针对德国人）昨天扮演了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而今天恰恰首先成为秩序破坏者。不准参加谈得很多，而允许参加却谈得很少；他要求再一次宣读被宣布无效的委托书，好让大家知道究竟是干了些什么。

结束讨论的提议被接受，并按国家付诸表决。一致赞成取消持有未被承认的委托书的德国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有：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西班牙、美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俄国、塞尔维亚、挪威；奥地利赞成（2票反对），瑞士赞成（8票反对）。——反对取消代表资格的有：荷兰（1票赞成），法国（2票赞成）。——代表大会以热烈的鼓掌欢迎投票的结果。

倍倍尔提议取消明天上午的会议，以便分别按照议程上的各个问题由各国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能够开会，商讨它们要采取的立场和起草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只有做好这些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才能按步就班进行工作。代表大会一致表示赞同。会议于6时休会。

第六次会议

(1893年8月9日，星期三，下午3时)

议会委员会代表、去年工会代表大会主席、英国人霍奇任主席。他在开那个代表大会时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得到主持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荣誉。他将不偏不倚地然而将果断地主持大会。直至现在我们在完成我们的委托书所赋予我们的任务方面所做的事情还很少。至今他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存在一种阴谋在阻碍我们去完成任务。

会上提出了两个提案：第一个提案要求将报告人的讲话时间规定为10分钟，辩论发言时间为5分钟；每个发言人只能发一次言。

第二个提案要求：对议程上的每个问题的讨论时间规定为1个半小时。

英国代表团支持这两个提案，并指出，我们还有10个问题要讨论，而可支配的时间只有18个小时。

两个提案都被通过。

契普里安尼对昨天通过的关于拒绝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决议提出抗议。抗议书全文如下：

1893年8月9日于苏黎世

致苏黎世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先生们

先生们！

我来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时抱着这样的希望，正义和友情将成为它的一切讨论的基础；但是我痛心地质望了。

从第一天起你们就表现出一种可悲的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态度，而这是有失社会主义尊严的。这种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情况已发展到如此地步，竟拒绝让我发言。我之所以要讲话，是为了替那些无缘无故地被粗暴地赶出代表大会大厅的代表辩护，并对这种驱逐行为提出抗议，因为这种驱逐玷污了你们首先信奉的思想。这些人被赶出去了，因为他们是革命者。——如果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竟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到如此程度，迫害不同思想，那么还是不要称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为好，它像关押和压迫我们的那些政府一样是反动的。

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使你们聚集在一起的这面红旗，来自埋葬着 35 000 名被凡尔赛的独裁者杀害的法国无产者的墓地，他们是为一切人的自由，为一切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一个小宗派的利益而牺牲的。

我们的死难者的社会主义是不排除任何人的；这种社会主义主张统一而不是分裂，主张爱而不是恨，主张自由而不是压迫。

你们，先生们，在这 3 天里把所有这一切践踏了；你们毁灭了国际，由于这一罪行，你们一定要在人类的法庭面前在世界历史的法庭面前受到审判。

为了忠实于真正的国际——不是你们的这个国际——的原则，我退出这个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气味的代表大会；我同被驱逐者，同你们的专横和你们的粗暴的牺牲者一起行进，以便在斗

争中重新找到我的位置，而这一次，是为了阻止你们扼杀自由和骨肉相残的勾当扩大影响，以致最后毁灭殉难者的事业。

阿米尔卡雷·契普里安尼

代表大会以沉默的态度表示对此不予理睬。

瑞士同志们对吉勒斯的行为提出了抗议，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企图嘲笑蔡特金同志。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吉勒斯对这种指责的根据表示怀疑）之后，主席团委托调查这个事件。

代表大会开始讨论大会议程上的第 1 个问题：

在国际上贯彻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

报告人是洛桑州议员**福奎茨**：委员会除法国外确认了瑞士各联合组织（格留特利联盟、工会联合会、社会民主党）的提案，其中包含有英国人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国家会议的修正案。波兰提议，这些规定不适用于劳动时间少于 8 小时的工人；荷兰提议把劳动时间减少为 7 小时或 6 小时；法国人提议，如果各国政府在一年之内没有响应召开国际性的国家会议的要求，代表大会就应下令在世界各国举行总罢工。法国代表要求接受规定最低工资和取消包工的提议。所有这些提案都被拒绝了。他要求大会通过委员会多数派提出的决议案。

蒙塔加尔作为委员会少数派的代表，建议拒绝接受委员会的提案，因为它没有考虑少数派的合理愿望；特别是关于规定最低工资的要求，少数派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这个规定可以阻止各个城市互相压低工资的做法，这样工人就不会为了获得较高的工资而被迫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从而压低他的同伴们的劳动力价格；另一方面，在实行最低工资制的同时可以

贯彻统一的工资等级表。

肖塞提议接受加班劳动的要求。由工人组织来选举工厂视察员，以代替至今由资产阶级政府任命的办法；他对国家会议不抱什么希望，决议提出的要求只能靠工人自己来实现。

列奥·弗兰克尔提议，也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即凡是在那些有可能以多数通过而资产阶级方面不会设置障碍的地方，所有市镇议会都有责任对所有由市镇雇佣的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如果这些工人是独立承担公共劳动的话。在那些市镇工程交给雇主去完成的地方，市镇议会在实施细则中要承担雇主的责任，即保证对所有根据这种合同雇佣的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他表示十分遗憾，在法国同志们中间经常表现出对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的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同上一世纪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是一样高尚，一样崇高。正像当时资产阶级的代表同封建主义的所有敌人，包括从贵族队伍中来的人，手携手地前进一样，这方面只要举出米拉波侯爵的例子就够了，他的光辉的、雄辩的演说才能成了这场思想斗争中的最有效的武器。我们今天也 必须同所有从资产阶级队伍中向我们走来为了同我们一起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人手携手地共同前进。那么为什么要拒绝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呢，而且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几乎总是比手工工人还苦。他本人对此知道得最清楚；不要责备他，说他作为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而只顾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他曾是手工工人（金匠），今天他成了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他可以坦率地说，他作为手工工人的社会地位比作为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的社会地位好。

科达（来自洛桑的意大利代表）：对于英国人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国家会议的提案，他请求大会最好把它的注意力转

向规定最低工资的问题。八小时工作日和规定最低工资的要求必须相互联系在一起，否则工人运动就会倒退 100 年。资本家由于生产过剩会乐于同意八小时工作日，但同时会减少工资，如果不用法定最低工资加以阻止的话。像官员有固定的最低薪俸一样，工人也要有这种保证。澳大利亚工人现在不会接受八小时工作日，如果另一方面又要降低他们的工资的话。失业工人的人数不会由于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而减少，相反工业后备军会不断增加。

主席通知说，又来了两位法国代表，因此法国代表的人数现在已达到 40 人。

鉴于对福奎茨的讲话翻译得不完整，格里伦贝格尔对委员会内的讨论情形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应该通过经过字斟句酌，顶得上个完整的报告的瑞士人的决议案，以便达到统一的目的。委员会也做了十分值得称道的工作。已接受了关于召开国家会议的英国补充提案，虽然德国人根据最近一次柏林劳工保护会议的经验对再次要求召开这样的会议没有作出热情的反应。但是英国人指出，在英国恰恰由于柏林劳工保护会议的结果，作出了十分重要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关于限制童工的规定。德国人宁意采纳著名的巴黎代表大会决议的最后一段，这一段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国际协商的精神向各国政府施加影响。荷兰人提出，对八小时工作日要求不要过于片面地、过于肯定地强调；今天我们十分看重其作用的希望很快就会证实是幻想，当然如果能马上达到 7 小时或 6 小时工作日那就再好不过了。奥地利人还想同时解决庆祝五一节的方式问题。但是——（讲话人被打断，因为 5 分钟时间已到）。

福奎茨首先抱怨给讨论这样重要的问题规定的时间太短；同时他也抱怨来自法国人方面的怀疑，但是他不屑回答。——规定

最低工资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这是需要单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的问题。他个人赞成接受规定最低工资的要求，但他也认为，现在就实行最低工资还不合适，应首先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因此只应接受瑞士人提出的决议案。

克莱因斯（英国）反对少数派的提案，因为要讨论这些问题花费时间太多。首先应解决八小时工作日问题；英国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人固执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工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他们反对议会制，虽然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不相信，劳动时间问题能与议会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的代表在议会中向各国政府提出，在国际范围内解决劳动时间问题。英国资本家给工人的劳动时间始终比大陆的要长；对此应向工人指出，必须通过国际途径来解决，以便使他们认识到，可以利用议会制度的手段来解决八小时工作日问题。

大会进行表决。提出的修正案全都被否决。对有关规定最低工资的要求，赞成的有美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挪威；荷兰弃权；其余各国都反对。由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在欢呼声中获通过。决议全文如下：

“代表大会声明：

八小时工作日是使工人阶级从资本的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也是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最重要措施。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将减少失业，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工资和提高工人的购买力。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将改善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家庭生活，并可能使儿童得到更多的关怀。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能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增强活力，提高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能使工人阶级得到时间去建立工会和政治组织，并进行活动；只有这样政治权利和自由才能为争取人民的社会解放发挥作用。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必须在所有国家内开展，因为只有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立法才能保证其持久性和发挥造福社会的作用。

代表大会认为，在国际上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办法是：

在国内和国际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由这些组织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宣传鼓动工作。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工作要通过传单，通过报告，通过社会主义报刊，通过游行示威，在集会上和政治团体中，在议会里，在各种国家机关和市镇机关中进行。在社会主义报刊上要开辟‘八小时工作日’专栏来报道有关的事实和活动，在政治机构内工人的代表要随时提出缩短劳动时间的提案，特别是缩短受国家和市镇雇佣的工人的劳动时间。

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应就通过立法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共同行动达成谅解，并敦促一切工业国家的政府举行一次国际会议。

工人的工会组织要同雇主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非政治性的、自由的斗争，以便为对整个工人阶级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立法开辟道路。”

意大利代表团要求将下述声明载入记录，即它之所以一致投票反对瑞士人的决议案，只是因为这个决议案同英国人的提案是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关于庆祝五一节问题的委员会和讨论社会民主党政治策略的委员会尚未就它们的决议案取得一致意见，代表大会开始讨

论议程上的第4个问题：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

报告人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委员会有两个提案，荷兰人的提案如下：

“代表大会决定，各国工人党要做好准备，一旦政府宣战就立即用普遍罢工予以回答；凡是在工人能对战争施加影响的地方和在有可能进行战争的国家里，就用拒服兵役来回答宣战。”

德国人的提案如下：

“工人对战争的态度，已经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中充分表明了。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要在各国动员一切力量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欲望，越来越牢固地加强全世界工人团结的联盟，不断地谋求消灭把人类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和煽动各国人民互相仇视的资本主义。随着阶级统治的消灭，战争也将消失。推翻资本主义就是世界和平。”

在讨论过程中，**博尼埃**（法国）提出一个提案，认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已把全部问题解决了；**史密斯**（英国）提出一项补充修正案，工人必须在各地努力更牢固地建立他们的相互关系，加深他们的友好关系，以便通过这种国际团结使战争打不起来。

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后，决定接受德国人的决议案；它排除任何沙文主义思想，同时又保证每个国家能够根据本国的情况进行消灭战争的工作。同样必须认识到战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如果资本主义消灭了，战争也就会自动消失。——在委员会里有人提议对荷兰人作某些让步，即允许荷兰人在战争发

生时有按照他们的提案采取特殊立场的权利，但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了。最后德国人的决议案除 3 票反对外被完整地通过了。荷兰人的决议案被否决的原因是：普遍罢工在今天社会的基础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无产者没有拥有实行普遍罢工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总罢工，那就是说经济权力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那么总罢工就是可笑的迂腐之言。

至于军事罢工^①的问题，只有在一个军国主义不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猖獗的国家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在这两个国家里实行军事罢工是荒唐的，这只能导致全体游行示威者被一举消灭的结果；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军事罢工也可能走向原来打算的反面。军事罢工首先恰恰会解除文明国家人民的武装和把西欧出卖给俄国哥萨克。俄国专制政府会消灭我们的全部文化，并用俄国的暴力统治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自由（对这种自由来说军事罢工是一个光辉的标志）。看来如此革命的荷兰提案会走向反革命的反面。

反之，德国人的提案却向各国人民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应采取的态度，同时与荷兰人的决议案相反，它完全没有模糊的乌托邦思想。

只有德国人的决议案是真正革命的。为了自由、文明和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应该通过这个决议案。（热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主席宣布收到了一系列贺电和伦敦木工的一封贺信。

会议于下午 6 时休会。

① 原文是 *Militärstreik*，它的含义有拒绝服兵役，或者在服役期间拒绝打仗、执勤以及拒绝从事军工生产等等。——译者注

第七次会议

(1893年8月10日，星期四，上午9时)

施米特（奥地利）任主席，他简单地讲了几句话，表示了奥地利代表团的感谢，并声明，奥地利工人将全力以赴地贯彻这里通过的决议。

主席团通告关于吉勒斯事件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对吉勒斯的指责是由于误会造成的，因此予以撤销。

摆在议程上的问题是：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

(继续)

纽文胡斯希望他作为第二报告人能有10分钟发言时间。大会同意了。在讲话中他的讲话时间又延长了10分钟。——纽文胡斯说：我们的决议案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蒙上一层多么厚的灰尘！如果到处都像我们在荷兰那样宣传这种思想，那我们已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呀。我们的对手在反对我们的关于用一切手段进行战争^①

① 原文如此。根据上面荷兰人提出的决议案来判断，此处应理解为“用一切手段反对战争”。——译者注

的观点的争论中，究竟提出了什么论据呢？没有，绝对没有。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赞成这样的看法，一种思想在人们想到要去实现它之前，首先必须在头脑中产生。

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在 1891 年维护的思想，早在 1868 年的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不仅已经谈到过，而且甚至是被一致接受了的。我被称为梦想家、空想家和乌托邦分子。——但是同我一起共享这些美名的还有龙格（他在 1868 年在布鲁塞尔提出了这项提案）、塞扎尔·德巴普，甚至还有整个代表大会。当时的一个决议在对战争表示反对之后这样写道：

“代表大会建议工人们在战争发生时停止一切工作；出于对所有国家团结一致的信任代表大会希望大家在这场战争中都来反对战争。”

塞扎尔·德巴普当时提出两个方法：

1. 拒绝服兵役，或者，这是一回事儿——普遍停止工作，因为军队需要赖以生存的给养。

2. 对社会问题作彻底解决，就是说在欧洲发动社会革命。

从 1891 年回到 1868 年，是一种前进还是一种后退？

如果你们不抱偏见地来阅读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两个建议，那么就可以作出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两个建议的目标当然是相同的；两者都想使战争打不起来，两者都把资本主义视为大敌。但是我们的建议提出了战胜这个敌人的一种手段，而第二个建议却没有。

第二个建议说：“工人对战争的态度已经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中充分表明了。”因此我不得不重提一下布鲁塞尔决议。如果你们无偏见地阅读这个决议，你们自己就会说，这是某个和平同盟的很好的决议，但不是一个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工人政党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法？抗议，坚

决抗议！但谁来关心这件事呢？

抗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句话，一句空话，而且我认为，用一纸抗议来回答枪炮的火力这是最大的空想。但是赞成德国人的决议案的朋友们走得还要远：“他们要使各国政府对人类历史负责。”对负责的这种解释真是令人捧腹不已……但列强将把这样的声明补充到和平同盟的声明中去，和平同盟已经可以把这类声明装订成洋洋大观的巨著。

有人说德国人的决议案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一致的。如果说这是一致的，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不一致的了；这个决议案是一篇空话，再没有比这更含糊不清的东西了。“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要在各国动员一切力量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欲望。”——也要反对社会党人的沙文主义欲望吗？这种欲望一点不存在吗？我没有忘记，人们在德国是如何鼓吹反对俄国这个“死敌”的战争的，没有忘记，当问题涉及这个死敌的时候，倍倍尔本人如何用一块海绵把资产阶级的一切罪恶行径抹掉的。——当人们把俄国说成是残酷和野蛮的庇护所而德国好像是文明和善良的庇护所时，能不令人发笑。德国有同俄国完全一样的残酷到极点的暴君，却还要自夸什么德国的自由！海涅在他的游记中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德国人无须冒险，这倒不是说，我们或多或少甘愿受奴役。人们正用皮鞭的统治来威胁我们，但当我肯定知道我们的敌人也将遭到鞭挞时，我宁愿忍受一些皮鞭之苦。但是我敢打赌，我们的敌人将投奔新的权贵，将温文尔雅地装出一付笑脸并提供最卑贱的服务，像他们一向所做的那样。为此，他们将乞求享受荣誉皮鞭的特权，因为既然总还要使用鞭子”。（倍倍尔：这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但海涅也许今天还会作这样的描写！

这种对俄国的担忧，普列汉诺夫也表现出这种担忧，好像用

学狗汪汪叫的声音来吓唬孩子一样。如果倍倍尔把俄国（场内出现反对意见）说成是残酷和野蛮的庇护所，那么法国也可以对德国提出这种指责，因为法国是一个共和国。如果社会党人都对其他国家提出这类指责，那何处才是尽头？——普列汉诺夫曾说，他在一瞬间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俾斯麦在向我们的代表大会讲话。当在德国散发哥萨克来了的传单的时候，他^①必须问一下，这种入侵最终是否会造成很大的不幸。希腊、罗马都是由于野蛮人的入侵而被摧毁的，但文化并没有被消灭。我们今日的文明正处在发展的初期，它的发展要归功于吸取了这种古老的文化。当倍倍尔在帝国国会发表这样的演说时向军国主义伸出了手，并放弃了“不给军国主义一个人，不给军国主义一分钱”的口号。（倍倍尔：直到现在 we 仍然坚持这种立场，从未放弃过。）你们堕落到人民党的立场上去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德国的厌恶。（倍倍尔：出于纯粹的爱。）法国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在那里也一次都没有抗议过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常备军，而在于后备军。后备军是民兵的一部分，阻止动员后备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现在有人说，拒绝服兵役是不可能的，拒服兵役的人会被起诉和被按军法枪决。我们这样来想一想：每个村庄有 5—10 个后备役军人，如果这些人都拒绝服现役，那么谁会迫害他们呢？警察吗？公民吗？但是拒绝的结果当然是内战，但我们宁愿要内战而不要各国之间的战争；内战至少能反对真正的敌人——资本主义。

在这里同时还在举行一个铁路职工代表大会；这些人只要停

^① 这里的“他”指谁，记录不清楚。从后面的论述来看，应指倍倍尔。——译者注

止工作就能使任何战争都打不起来，如果我们还能争取到妇女的话，那么结束说空话和开始干实事的时候就到了。时代的许多征兆都赞成我们的决议案。在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发生的军队哗变，1871年在蒙马特尔发生的革命（在这场军队哗变中，“高举枪托”的士兵拒绝服役），仅仅是一场自发的行动——我们必须首先开展我们建议的**有组织的**罢工。请你们一致通过我们的提案，然后你们会看到，君主们是如何在他们的宝座上发抖的，他们在发动战争之前将三思而行。

大会决定，在这场辩论中，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发言人。

门德尔森（波兰）：纽文胡斯指责了德国的沙文主义；只有在对欧洲政治状况公然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种指责。荷兰处于孤立隔绝的情况之中，只有懂得这一点才能理解荷兰的国际主义，它同社会主义的革命国际主义是不一致的。纽文胡斯指责倍倍尔的讲话是沙文主义。这个所谓的沙文主义讲话恰恰促进了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唤起人民的原来的革命的历史的精神。这是倍倍尔的沙文主义在一个对德意志帝国没有特殊好感的国家里产生的影响。波兰人在委员会中提出了讨论另一项议程的建议，因为布鲁塞尔的决议是明确的，同时我们必须最终结束没完没了地把这些问题向每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做法。我们这些受压迫的波兰人希望重建波兰并为此而工作；但我们不是受沙文主义思想支配的，而是争取重建，以便使社会主义精神进入人民生活之中。

察尔凯（匈牙利）：荷兰提案是无法实行的，所以我们反对。在匈牙利，尽管人们“喋喋不休地侈谈”自由，但却使用武力来对付罢工工人，把他们当成野兽一样枪杀。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反对军国主义。但我们还是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尚处于组织建设

的开始阶段。荷兰人的观点在我们那里根本不能表达出来。匈牙利是一个小型的欧洲。在它境内有 8 个民族（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等等）。统治阶级挑起这些民族相互对立并进行煽动。沙文主义还只是藏在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中心。我们将通过我们衷心拥护的德国提案向我们指出的道路把它克服。（鼓掌。）

李卜克内西：这个题目我不想像一开始那样扯到个人上来；但我还是要驳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指责。据说倍倍尔在帝国国会的演说带有沙文主义色彩。如果我要回敬说我们有沙文主义的指责的话，那我们有更多理由指责纽文胡斯有沙文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忠实于它从一开始就已采取的立场；谁如果说它哪怕稍微偏离了这个立场，那他就是在撒谎。有人企图煽动法国同志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他愿意提醒大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从 1871 年以来一直反对并吞阿尔萨斯—洛林，谴责并吞是一个政治错误，是一种政治罪行，就在最近我们还重复了这种谴责。我们不是在豁免权的保护下这样做的，我们是向整个军事力量，向整个国家提出抗议并承担后果的。（热烈鼓掌。）纽文胡斯说，我们似乎也放弃了不给军国主义一个人，不给军国主义一分钱的立场。这也是谎言。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成立以来没有同意过给军国主义一分钱。对任何军事提案我们都提出抗议并投票反对。但我们并不满足于盲目的抗议；我们还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在人民中进行鼓动。如果说不久前军国主义继续存在的问题被当作竞选口号，如果说现在德国人民的多数都宣布反对军国主义，那么这只能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雷鸣般的掌声。）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冒着枪林弹雨，在同政府与警察的经常冲突中进行着这场斗争，党为此付出了总计被判 1 000 多年监禁的代价。我们德国社会党人没有必要说空话，我们的行动在为我们说话。我们认为，对

于这种指责继续替自己作辩护是有损我们的尊严的。(十分热烈的鼓掌。)

现在谈谈实质性问题。我不想重复我昨天在转述普列汉诺夫的讲话时说过的话。我们面前有两个提案：荷兰人的和我们的。纽文胡斯说，德国人的提案是空话；荷兰提案，即使经过掺水稀释后也比空话还空。刚才匈牙利代表已经声明，如果荷兰人的提案行得通的话，他会投票赞成它。但它不仅行不通，而且完全是一种不能实现的愿望。从远处来看，这样一个提案是容易理解的；荷兰没有军国主义，而有军国主义的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如果军事罢工和经济罢工不只是不能实现的愿望，如果欧洲和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有力量进行这两种罢工，那么欧洲就会出现任何战争都不可能爆发的局面。我们还没有造成这种局面。汗已经流了许多，有些人倒下了，但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目标，最艰巨的任务还在前头。如果我们想要求士兵开小差和拒绝执勤，那么我们会向军国主义这个摩洛赫^①提供新的祭品，并向它提供以铁拳打倒社会主义运动的机会。推翻摩洛赫当然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奋斗，用社会主义的精神使他的铁臂瘫痪；但是在兵营里进行幼稚的策反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我们只有在人民中孜孜不倦地进行宣传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努力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使人们在进入兵营前已是社会主义者。这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我们正走在达到这个目的康庄大道上。军国主义像养育它的资本主义一样，必然还要不断扩展，不断扩大它争夺的范围，还要吸收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新兵，这样，它就

^① 摩洛赫是古代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译者注

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最后军国主义不再成为资本主义的堡垒。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都在为德国进行这场斗争；它将把这一斗争继续进行下去，直至打败和消灭军国主义为止。（雷鸣般的掌声。）

荷兰人提出一个经过修改后的提案：

“鉴于民族对立根本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却符合压迫者的利益；

鉴于一切现代战争都是资本家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引起的，是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摧毁革命运动力量、通过延长最可恨的剥削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鉴于，因为没有哪个政府会承认挑起战争的错误，战争是资本主义国际意志的产物——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声明，有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将拒绝履行后备役军事义务，特别是在所有同战争有关的工业部门普遍进行罢工，号召妇女拉丈夫和儿子的后腿，以此来回答政府方面的宣战。”

阿德勒博士（维也纳）：我以奥地利代表团的名义声明，我们赞同德国人的提案。我们同荷兰人完全一样是军国主义的反对者，我们同荷兰人一样是革命者，我们也同荷兰人一样怀有愿望，让各国统治阶级和政府知道，这里集合着一支要把世界从资本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队伍。但我们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也不要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能力。多梅拉·纽文胡斯认为，如果我们通过荷兰人的提案，各国政府就会发抖。它们不会发抖，而会嘲笑我们。（热烈鼓掌。）正如格雷利希在庆祝开幕式的集会上所说的：只要我们不离开事实这个可靠的基础，我们的事业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飘在幻想的空中，我们就要失败。除了我们自

己之外，没有人能消灭我们。统治阶级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放在第二位考虑的问题，放在第一位的是无产者对我们会有什么评价。如果我们在这里通过那些我们自己也知道行不通的决议，那么我们的拥护者就会分成两部分。他们中间知道行不通的人会说：这是一个轻率的决议，在我们这些崇尚武力的国家内是行不通的。对于群众，对于积极分子，那些一知半解的，虽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还不十分确切知道如何消除这种状况的人，我们的决议就会成为一种引诱，一种虚伪的欺骗。（热烈的赞同声。）我们向他们指出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我们这样做——请多梅拉·纽文胡斯原谅我这样说——是一种对无产阶级大众的犯罪行为，因为我们想使他们相信，走荷兰人的决议案所指出的那条道路是会获得成功的。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开成仅仅是一伙只是表达虔诚愿望的人的聚会，那么今后无论在欧洲的统治阶级那里，还是在欧洲的被压迫阶级那里，我们的劝告都不会有任何价值。（热烈鼓掌。）我们要出的主意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想做的主意。如果我们生活在像荷兰那样的不崇尚武力的国家里，那是很容易提出这类建议的。对瑞士人赞成荷兰人的决议案我也不会感到惊奇，但是这样做的人太明智了。（全场活跃。）多梅拉·纽文胡斯指责我们对俄国人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好，如果我们不想给俄国开辟一条通过波兰殉难者的躯体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想把半个社会主义欧洲奉送给它，那么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所说的俄国，不是指俄国人民，不是指那个对国际社会主义作出许多贡献的人民，而是指沙皇政府。在每一国家里——在我们奥地利也是一样——我们对沙皇政府已经受够了。我们不想为沙皇政府铺平道路，荷兰坚持自己的立场将继续孤立下去。如果说我们站在欧洲政治的中心，站在被剥削者和压迫者之间的一场决战的战场上，如果说我

们正在同俄国的野蛮行径进行斗争，那么我们指的是沾满鲜血的沙皇政府！（热烈鼓掌。）（多梅拉·纽文胡斯喊道：他讲得同卡普里维^①一样！）阿德勒博士：如果卡普里维这样讲的话，我很高兴！（场内充满大笑声。）但愿你们（朝向荷兰人）把我们看作是不好的革命者；如果时机到来，如果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人们就会知道，谁是善于行动，而且是一贯善于行动的人，谁是善于说大话，而且是一贯说大话的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约翰逊以挪威代表团的名义简单宣布，他们将投票赞成荷兰人的决议案，认为它是可行的。虽然这会带来流血，但要比战争带来的流血少得多。

上午会议休会。

① 卡普里维，列奥（1831—1899）——伯爵，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将军，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译者注

第八次会议

(1893年8月10日，星期四，下午3时)

主席施米特通知说，由于一封从巴黎拍来的涉及波兰人卢森堡小姐的被宣布无效的委托书的电报，主席团再一次研究了卢森堡小姐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但这牵涉到波兰代表团的声明，这个声明不承认她的委托书。他建议大会开始讨论议程上的问题。法国人激烈抗议，但多数代表赞成开始讨论议程上的问题，于是代表大会继续进行辩论。

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

(继续)

德莱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问题在美国看来与其说是一个实际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人道问题。一般说来，美国人同情荷兰人的提案；但我们必须对它进一步加以研究，而这样一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军事罢工在开始实行的最初一瞬间就失去了罢工的性质，因为这样做就是暴力革命；但经济罢工逐渐成为多余的了，因为工人们看到，这样做的结果资本家阶级得到的好处要比工人多。问题主要在于，社会主义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人民之中了。当然不一定要就此问题做出回答，但必须问一

下自己，本末倒置地采取这个步骤是否可取。美国工人因为将来在他们的行动中也要估计到政治形势，所以不能受代表大会决议的约束，在表决时自然弃权。

艾威林（代表英国代表团）：英国代表团以压倒多数的名义宣布同意德国人的提案。英国工人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把战争看作是一种罪行，因为战争的负担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都落在工人头上，并使他们流血。英国还从未派出过有这样多人和这样大的代表性的代表团参加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65位代表中绝大多数人来自纯粹的社会主义组织；另一部分人是由那些反对保守派和自由派阵线的、站在社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独立的工人政党派遣的。第三部分人代表工会。这是工会第一次同社会党人手携手地一起前进和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纲领。这些事实当然使我们产生了最美好的希望，因为老的工会在它们的青年时代承担了工资斗争的所有重担，今天也还承担着这副重担。最近看起来好像德国和法国之间要发生一场战争；因此德国工人声明他们不想同法国工人发生争执是必要的，反过来法国工人也必须回答说，他们把德国工人看作是自己的兄弟。（热烈鼓掌。）同样，不久前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威胁要进行一场战争时，英国人要是发表一项类似声明就好了。事实上，我们必须一致声明，我们只知道，只承认一种正义的战争：**阶级斗争**。（热烈鼓掌。）

英国人同意荷兰人的提案的思路，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同意。但是，问题在于实行的方式。如果我们强大到足以进行军事罢工的程度，那么我们会去干和这完全不同的事情，那时对我们来说要干的事情就是把资本主义送进天堂或者送进地狱。（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进行国际罢工问题，而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并取得一致认识，并且要表现出，所有的

心都为一种感情而激动，这就是我们强烈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心情。

埃里蒂埃（日内瓦）：我十分怀疑，在战争问题上能够立下各国人民共同行动的严格规章。我也赞赏荷兰人的决议案的精神，但我同样认为它是实行不了的。通过决议案是一回事，把决议案变为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什么时候曾经有机会把军事罢工付诸行动的话，那么今年春天就有这种机会，当时荷兰士兵曾奉命枪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但是既然荷兰人当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都未能做到这一点，那他们又怎能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世界呢？我们的任务是，启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它强大到足以应付一切不测事件，这样我们就有强大的后盾，使我们能够在任何一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排除它。德国人的决议案包含有这种精神，因此我们赞成这个决议案。

沃尔德斯（比利时）：德国人的提案还不够，所以比利时人用一个决议案来补充它。德国人是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的，即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就是进行反对战争的最好宣传，而反对战争的专门宣传则好像是多余的了；但只要存在战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占统治地位。因此战争必须成为专门的攻击点。比利时被卷入战争的危险虽然很少，但被吞并的危险却很大；因此比利时人也有一切理由要采取精确的立场。所以他们也努力在军队中展开鼓动工作，把社会主义宣传带到兵营中去；他们在兵营附近举行集会，让士兵们能听到真理；他们在报刊上撰写反战文章，并因此而遭受惩罚，但这是他们愿意承受的。因此他们提出下述补充提案：

“工人阶级在一切立法会议中的代表有责任拒绝军事拨款、抗议军国主义和赞成解除武装。”

法国阿列曼派代表**德让特**表示反对德国人的决议案。他希望，

参加大会的只有工人，而不是多数代表是职业政治家，如果是这样，代表大会的观点大概就会完全不同。他不认为，由于害怕军国主义的优势就可以放弃军事罢工和总罢工的手段。在5月1日这一天也将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者，然而这不能阻挡无产阶级举行一次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示威游行。比利时人的行动也证明，总罢工不是空想，而是十分可行的。我们不应关心讨论个别国家内的事，而只应关心共同目标，因此我们要在所有的地方建立反对军国主义的组织，同时马上组织总罢工。法国代表团的多数从这种观点出发赞成荷兰人的决议案。

屠拉梯（意大利）：他不想继续已进行的讨论，而只想说明，他的同胞赞成德国人的决议案。荷兰人的决议案的想法固然是崇高的，但是要在今天实行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把它推迟到我们有力去实行的那一天，而那时又会不必要了。我们害怕为这样一项决议负责。如果我们不想当吹牛大王，而是要当行动的巨人，我们就必须执行决议。从我们同志们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中我们知道，他们会在达不到什么目标的情况下牺牲生命。普遍罢工会成为普遍屠杀。他还想补充一点，即由资产阶级和政府人为地制造的仇法情绪在意大利社会党人中间是没有市场的；沙文主义在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心中已经死亡，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宣传一直是反沙文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同时各国工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已深入人心，并已成为事实。（热烈鼓掌。）

拉柯夫斯基以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名义声明，保加利亚人正积极组织既反对本国的专制主义，同时也反对德国和法国的政府和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的阵线；战争支持这种专制主义；保加利亚受俄国专制主义的威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因此保加利亚代表团赞成世界和平。我们摈弃军事罢工，因为它是不可能做到的，因

为它会成为反动派用来对付我们的一种新武器；如这个行动失败，它就会把社会主义长时期地打倒在地。我们也反对工人总罢工，因为这是一种幻想，而任何幻想都会给工人带来祸害。

斯犹沙（澳大利亚）：我来自一个既没有军事力量又没有外交手腕的国家。因此我不能理解，兄弟之间怎么能接受命令去相互残杀；如果我接到这样一道屠杀命令的话，那么我会第一个起来杀死我的司令官。根据这个理由，我赞成荷兰人的提案。

纽文胡斯：在荷兰开展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也是有危险的，根据我在布鲁塞尔提出的决议案以煽动颠覆的罪名对我进行的审讯说明了这一点。荷兰社会民主军事联盟打电报来希望通过荷兰人的决议案。

普列汉诺夫致结束语。他说：说德国人的决议案是不对的；这个决议案不是别的，而是两年前在布鲁塞尔由代表大会多数通过的德—法决议案，它是由瓦扬起草的，瓦扬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英勇代表，他的名字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享有很高声誉。但是由于一种错误的先入之见，人们老是说德国人的提案。然后普列汉诺夫对瓦扬的论述作了相当长的概括。瓦扬指出，三国联盟并不比俄法两国联盟更可耻。法国在100年前宣布了人权，而今天却跪倒在俄国沙皇的脚下。这是一篇坦率的讲话，没有任何沙文主义色彩，我们也应本着这种精神来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提案。法国代表团的部分代表从这种观点出发也发表一项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认为不能同意多梅拉·纽文胡斯的决议案，因为照我们看来这会引起无益的屠杀；且不说它根本没有指出军事罢工应如何进行。此外我们认为，即使那些同意纽文胡斯观点的人，也不能拒绝德国人的提案，这个提案声明，使战争消失的唯一手段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而结束阶级斗争。纽文胡斯的决议案对我们来

说是危险的幻想。每个社会主义者都能够而且应该赞成德国人的提案，不管他对多梅拉·纽文胡斯的建议有什么想法。

雅克拉尔德（社会主义报刊联合会），博尼埃（工人党）、德察伊（革命中央委员会），维贝尔（独立社会党人）”

纽文胡斯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他已把提倡推广世界语的提案付诸实施，因为他的讲话这样没有逻辑和意义。（荷兰人发出喊叫声。）他指责了德国人的沙文主义，但是他的整个讲话的目的只是为了勾起法国人对德国的嫉妒心。是的，先生，我们不应有任何一点沙文主义感情，那些带着这种感情到这里来的人是可耻的，那些（法国人激烈地和长时间地打断他的讲话）心怀民族嫉妒和民族仇恨的人是可耻的；——我，难道我会有这种应受到十倍诅咒的感情吗？有人指责德国人有这种情绪，有人在这里引用了倍倍尔的一次演说，据说它是鼓吹反对俄国的民族仇恨的。我要反驳这一点。当倍倍尔说出了真实情况时，人们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而我，一个同意他的观点的俄国人，于是就成了我的祖国的背叛者！然而事实是否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呢？倍倍尔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他究竟鼓吹了些什么样的民族仇恨呢？好吧，公民们，他讲到了反对官方的俄国，他控诉了沙皇，他把沙皇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的，在这方面我们同我们的朋友倍倍尔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正是结束俄国沙皇制度的时候了，这个沙皇制度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耻辱，是欧洲和平和文化进步的经常威胁。我们的德国朋友对沙皇制度的攻击越多，我们就越要感谢他们。干得好呀，我的朋友们，揍它的脑袋，把它拉到被告席上来，只要你们哪怕有一点可能，就用你们拥有的一

切手段打击它。至于俄国人民，那么他们知道，我们的德国朋友希望他们获得自由。

没有人通过接受我们的决议案就表示反对俄国人民，毋宁说只是反对了沙皇制度。但是如果荷兰人的决议案得以通过，那就只能使沙皇的地位得到加强，而沙皇是一个压制自由、使人民挨饿的人，他必须同其整个制度一起垮台，如果俄国人民，如果自由要想获得胜利的话。如果德国军队越过边界进入我国国境，那么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进来的，正如 100 年前建立了国民公会的法国人来到德国是为了作为胜利者越过诸侯把自由带给人民一样。

有人说俄国的威胁根本不严重。但你们忘记了，俄国沙皇已同你们的（朝向法国人）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沙皇是谋害波兰的凶手！法国怎么能把自己革命的过去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愿意通过接受荷兰人的决议案而成为沙皇制度的帮凶呢？（法国人发出喧闹声。）

荷兰人的决议案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把它付诸实践，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像法国少数派所指出的那样，导致一场屠杀，而且是使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遭到屠杀，而不会给专制主义带来丝毫的损害。据说不存在俄国的威胁，但是请你们问一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代表，俄国沙皇政府对他们有多大的威胁。

纽文胡斯说，德国资产阶级正在煽动强烈的仇法情绪，德国军队或迟或早总要入侵法国。那么德国入侵的危险就比俄国入侵的危险小吗？

这完全是对实际情况的错误判断。法国和德国都有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因此两国人民都必须关心使这种入侵成为不可能。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法国和德国铲除任何一种沙文主

义。为了做到这一点，请你们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作为和平的示威，作为强大的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力量的示威。

法国人、部分荷兰人和其他一些代表经常打断他的讲话，并出现长时间的喧闹声，普列汉诺夫的讲话时间已经超过，他不得不停止发言。在他的讲话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后，他获得了十分热烈的掌声。

对荷兰人的决议案按国家进行表决的结果是，赞成的有澳大利亚、荷兰、法国、挪威，其余 14 国反对。接着对比利时的修正案：“工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有责任反对一切军事预算和赞成普遍解除武装”^①进行表决。这个修正案被大多数通过。在表决包含比利时修正案在内的德国人的决议案时，澳大利亚、美国、荷兰、法国和挪威弃权。其余 14 国投票赞成。

会议于 6 点 30 分休会。

^① 参见本卷第 368 页提案文字，原文不一。——译者注

第九次会议

(1893年8月11日，星期五，上午9时)

沃尔德斯（布鲁塞尔）任主席，他请求在今后的讨论中尽可能讲得简短一些；只有两天时间来讨论这么多的题目了。

纽文胡斯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提出抗议：普列汉诺夫利用致结束语的机会散布谎言。布鲁塞尔决议不是法德决议，因为法国人在布鲁塞尔是赞成他的决议案的。

李卜克内西代替不在座的普列汉诺夫发表声明，他认为在代表大会上掺进个人争执是不严肃的。决议是法德决议，因为这个决议是法国人瓦扬和德国人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并为代表大会的多数所通过。

他还通知一件事。参加代表大会的有20个国家的代表；但直到现在只有19个国家投了票，另一个国家**巴西**弃权了。这个委托书是巴西社会民主工人联盟交给他的；但是为了防止委托书过多地集中在一个人那里，他至今还未使用这个委托书。如果至少从现在起还不使用这个委托书，那对巴西人是不公正的。

大会讨论的下一个题目是：

五 一 节

阿德勒博士（维也纳）以委员会的名义作报告，委员会同意下述决议案：

1. 代表大会更新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下述决议：

为了保持5月1日的真正经济性质：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确认阶级斗争。

代表大会决定：

5月1日是世界工人的共同节日，在这一天工人们要宣布他们的共同要求和他们的团结一致。

只要各个国家的情况允许，这个节日应成为休假日。

2. 代表大会决定对此作如下补充：

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有责任争取把5月1日变为休假日，并支持每个地方和每个组织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切努力。

3. 代表大会还决定：

5月1日举行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集会同时也应该是表达工人阶级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差别，并由此走上通向每个国家人民内部和平以及通向国际和平的唯一道路这种坚定意志的大会。

阿德勒博士论述提出这项提案的理由，牵涉到两件事情：委员会面前摆着一系列提案，5月1日不仅要成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而且要成为争取国际和平的示威。其次，我们奥地利人也提出了一项提案，它不涉及五一节的内容，而是涉及庆祝五一节的形式。

关于和平示威问题，委员会收到一系列表达了这种思想的法

国提案。同样有许多法国党小组也发表了声明，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这种思想。委员会中的奥地利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等认为，在5月1日这天举行特殊的和平示威是多余的，因为五一节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和平示威。比利时声明，国际和平示威是危险的，因为这是一件非常惬意和不用付多少代价的事情，连资产阶级这个完全无害的和平大会的拥护者也会参加国际和平示威的，只要他们不做生意。资产阶级和平协会会员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也通过反战的决议，然后他们又以议员的身分批准他们政府的军事预算。我们不想同这些人打交道，我们不想同这些人在一起。（热烈的赞同声。）但英国人这次特别希望把和平示威同五一节结合在一起。工联决定，这次赞成5月1日为休假日（鼓掌），并且认为，如把争取国际和平也作为五一节游行的目的，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德国人提出了一项相应的提案，奥地利人和其他国家都表示赞成。按照这个提案5月1日的和平示威要这样来举行，即无产者在用一切手段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示威的同时，也为争取和平而示威，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使我们同带有宗派色彩的资产阶级的“和平天使”保持一定的距离。第二个问题引起了更多的意见分歧。我们奥地利人提议，对布尔塞尔决议中关于5月1日应成为休假日的规定不仅要更新，而且要采取尖锐的形式。我们觉得，有些国家在对待5月1日这一天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上过于轻率。只有通过停止工作才能保持5月1日作为真正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示威的鼓动性质。（鼓掌。）布鲁塞尔决议已谈到了这一点。投票反对这个决议的英国人曾表示愿意服从。然而，他们根本没有在5月1日举行过庆祝活动，而是又把庆祝活动安排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德国一开始就属于不可能停止工作的国家之列。在法国，虽然在巴黎极少可

能停止工作，但在外省在5月1日却能举行大规模的、隆重的庆祝活动。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向前迈一步，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就会停顿。（赞同声。）但我们奥地利人把这种庆祝活动看成是宣传鼓动的最有力杠杆，是激发无产阶级热情的最好办法。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节日，而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节日，是一个阶级的节日。因此我们认为，对于那些使用另外的方法举行示威游行的国家来说，对五一节不能采取过于轻率的态度。由于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的态度，使我们奥地利人的宣传鼓动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害。（赞同声。）我们不向德国人发火，我们理解他们的行动，但我们不能原谅他们。在德国也有一些人赞成停止工作，甚至有的整个地区都准备这样做，但是由于德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被阻止了。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瑞士、意大利和英国都表示附议的关于停止工作的提案在委员会里是由德国方面提出来的。从现在起英国也将在5月1日停止工作。很可能不久后在英国会出现比在德国规模更大的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如果通过我们的提案，那么布鲁塞尔的决议就理直气壮了；在那些不是不可能的地方停止工作。但这样一来每个党都要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在今天还不可能停止工作的地方使之成为可能。德国人应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能只声明一下这办不到就把事情了结了。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大国，我们确实不能说，停止工作是可能的或者是办不到的。在德国也像在奥地利一样，停止工作在一些地区是可能的，而另一些地区则办不到。但是在德国，人们遵守不把五一节作为节假日的决议比重视在5月1日而不是在5月中的任何一个星期日举行庆祝活动的决定更为严格。（赞同声。）至今还不可能停止工作的所有国家的党今后要使停止工作成为可能，并鼓励那些愿意举行庆祝活动的组织，而不是去泄它们

的气！（有人喊：说得好！）我们奥地利人不是梦想家，也许是这个大厅里有些人过于理智了。当我们把五一节当作首要宣传鼓动方法来看待的时候，不是出于幻想，而是出于现实。头脑当然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五一节能唤起直至最后一个无产者的国际团结的感情，这是我们的说理工作完全做不到的，这种感情因素也是一种现实。（有人喊：说得好！）假如我们忽视头脑或者忽视心灵，我们都同样是不好的政治家。（热烈鼓掌。）

沃尔德斯以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他们不参加辩论，但将同意决议案。

马克思韦尔（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英国人的多数派对决议案表示赞同。英国由于考虑到强大的工会的力量至今是在星期日庆祝五一节的。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在是到了改变这种情况，在5月1日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了。开始一两次游行规模可能不大，但逐渐会变成强大的示威游行。由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议会已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必须进行争取国际和平的示威游行，这样也就能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去。

斯特德曼（来自伦敦工会委员会）以英国人少数派的名义赞成保留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庆祝活动的意见。星期日工会的游行示威非常强大，不仅对居民有影响，而且对两个大政党即自由党和保守党也有影响。他们对庆祝五一节的热情并不比其他的人少，但是实际效果支持他们的态度，因为只有在星期日才能举行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群众示威游行。

王德威尔得（布鲁塞尔）提请注意文字上的差别。法国人说的是示威游行，德国人讲的是节日；这里必须要确定一个统一的措词。决议在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国立即受到欢迎，但法国人会反对节日的提法。因为在富尔米发生的流血事件不能称为

节日。必须显示力量，而不是举行庆祝。如果想举行庆祝，那就要离开工厂，停止工作。

沃尔德斯提请大家注意，在布鲁塞尔已经作出决定，为了消除一切怀疑，将5月1日定为显示力量的日子。他希望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是否同意在文字上作这种改动；他建议，以法国方案为基础。

倍倍尔：我的朋友阿德勒在开始阐述他的观点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委员会中多数人的意见是，必须修改布鲁塞尔决议的措词，使之更加尖锐，因为有些国家很容易规避布鲁塞尔决议，这也是针对德国而言的。在布鲁塞尔对休假日作了决定，只要它的实施不是不可能的。人们是从这样一种想法出发的，即必须区别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因此必须保证各个国家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庆祝五一节的形式自由。当然不管是在本国同志还是在外国同志中间，对在个别场合选择什么样的庆祝五一节的形式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应该相信，每个国家对必须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自己能作出最好的判断。在阿德勒也参加了的德国党代表大会上，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以223票对6票作出决定，不考虑在5月1日停止工作。大会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党代表大会也指出，停止工作是庆祝的最隆重的形式，至于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每年的党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具体的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来作决定。因此这里不存在原则性的对立，但是我们必须保留由自己决定停止工作还是不停止工作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同意所建议的决议案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同重申布尔塞尔决议的第一部分有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布尔塞尔曾明确承认，每个国家有权自己决定庆祝的形式。他们今天重申这个决定，但同时又要每个国家承担义务，以完全确定的形

式进行庆祝，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怎样付诸实践呢？假定在一个集会上—小部分人决定停止工作，绝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党代表大会则作出了与此相反的决定。结果会怎样呢？根据这个决议多数人必须服从少数人，必须违反真诚的信念去执行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有害的决议。这恰恰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对此不仅要承担道义上的而且还要承担财务上的责任。成千工人将失去生存手段，流落街头；另一些工人将由于违反合同而受到法律惩罚。（奥地利人喊：我们那里也是如此！）。1891年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制定了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成千的德国工人还要受罚而损失整整一周的工资。那时我们有义务从物质上补偿所有这些损失。（其他国家的代表喊道：不，不！德国人喊道：是这样！）

如果德国作出停止工作的决定，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以**庄严的形式**贯彻这个决定。于是就会发生一场在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出现的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战斗。如果我们接受这场战斗，那么我们也想自己选择进行战斗的日子。（热烈鼓掌。）

奥地利人抱怨我们说，由于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使我们给他们的斗争造成了困难。这一点我始终承认并表示极大的遗憾。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自己，不能仅仅为了减轻他们的斗争困难而使我们自己的党及其生存利益遭受最严重的损害。像他们一样，我们在这方面也必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1890年有一个城市——那里有我们党的最遵守纪律的同志，他们拥有最严密和最强大的组织以及最丰富的资金——在5月1日试行停止工作。这个试验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也使我们获得一个教训：付出的代价不仅和已取得的成果而且和可能取得的成果是绝不相称的。我讲的是汉堡，其他各地也是如此。

还有一点，德国有 75 万在铁道、邮电和矿山等部门工作的国营企业工人。这几十万人由于那里规定的纪律，不能贯彻这样的决议。另一方面，在德国有一些大区，我们党在那里很强大，但是由于就业条件特别困难根本不能要求工人停止工作。

德国代表团中最多只有几个代表赞成这个决议案。特别是决议案的第三点，即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来消灭阶级差别的提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这个提法，许多德意志邦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在法律上就完全通不过。（鼓掌。）

英国代表希望结束讨论，或者根据沃尔德斯的建议，把发言人的讲话时间限制在两分钟之内。

舒迈耶尔（奥地利）：如果说多数英国人已相信在 5 月 1 日举行庆祝是可能的，如果说现在还声明反对在这一天进行庆祝的其他工会组织将来也会相信这是可能的，那么一向走在工人运动前头的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却落后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停止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决议案的第二点已作了可能作出的最大让步。当德国人坚持他们的拒绝的立场，根本没有勇气进行停止工作的试验，从而使 we 继续受到损害时，我为德国工人阶级和奥地利工人阶级之间的亲密关系深感惋惜。

澳大利亚代表**斯犹沙**首先抱怨说，他经过 5 000 英里海路来到这里，由于讨论最后的提案他的讲话被打断了。

沃尔德斯宣布斯犹沙现在重新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是完全合理的，于是斯犹沙接着说：

澳大利亚对庆祝五一节持一种特殊的态度。5 月在北半球是春天的开始，但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南半球却是初冬，大约相当于 11 月。再者，澳大利亚已经有了一个无产阶级的劳动节日，这就是工会胜利纪念日，在这一天人们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斗

争，并且政府也已承认这一天为劳动节。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还是赞成代表大会的决议，5月1日这一天也举行庆祝活动；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节日，而是社会民主党的节日。即使社会民主党现在还很弱，但它已为发展打下了有力的基础，社会主义在无产群众中的传播越广泛，5月1日也就会越来越成为普遍的无产阶级的节日。

沃尔德斯通知说，委员会决议案第三点中的“社会革命”一词将用“社会改造”来代替，现在决议案全文如下：

1. 代表大会更新布鲁塞尔会议的下述决议：

为了保持5月1日的真正经济性质：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确认阶级斗争。

代表大会决定：

5月1日是全世界工人的共同示威日，在这一天工人要宣布他们的共同要求和他们的团结一致。

只要各个国家的情况允许，这个示威日应成为一个休假日。

2. 代表大会决定对此作如下补充：

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有责任争取把5月1日变为休假日，并支持每个地方和每个组织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切努力。

3. 代表大会还决定：

5月1日举行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集会同时也应该是表达工人阶级通过社会改造消灭阶级差别，并由此走上通向每个国家人民内部和平以及通向国际和平的唯一道路这一坚定意志的大会。

根据倍倍尔的建议每点分开表决。第一点和第三点被一致通过。第二点按国家进行表决；赞成决议案的有：荷兰、奥地利、英国（多数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比

利时、法国、瑞士、匈牙利、波兰（5票赞成、3票反对）。反对决议案的有：德国（除8票赞成外其余都反对）、丹麦、保加利亚、俄国。弃权的有：瑞典和澳大利亚。

表决之后，辛格尔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要求将下述声明载入记录：刚才讨论的决议案在不同的文本中措词是不同的。如果按照英文文本的措词进行表决，**德国代表团就会一致投票赞成**。关于这个问题德文文本说，每一个工会在每一个地方所进行的每一种试验都应受到支持，英文翻译满足于下述形式：

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有责任争取把5月1日的庆祝活动变为休假日，并支持**地方组织**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

法文文本的措词也与此相仿。关于第三点的英文译文少了“**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差别这句话。辛格尔继续声明说，德国同志也像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一样，衷心和真诚地赞成停止工作的原则，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单独的规定。（鼓掌。）

第十次会议

(1893年8月11日，星期五，下午3点)

由于议程上第3个问题的决议案尚未提出，因此辩论议程上的第5个问题：

保护女工

报告人路易莎·考茨基（维也纳女工代表）受委员会的委托论证并建议通过下述决议案：

“鉴于，

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拒绝任何有利于女工的特殊保护立法，把这看作是同妇女的**自由**，同妇女享有争取同男人平等的权利的努力相抵触的；鉴于这一运动一方面忽视了建立在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今天的社会的性质。

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认识到由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妇女的特殊作用，即她们作为**孩子的母亲**对社会未来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声明：

实现下列措施，最坚决地维护对女工的法律保护是一切国家工人代表的义务：

1. 妇女每天的工作时间最多不得超过 8 小时, 18 岁以下的少女最多不得超过 6 小时;
2. 规定每周有一次连续 36 小时的休息日;
3. 禁止上夜班;
4. 禁止在一切对健康有害的企业使用女工;
5. 禁止孕妇在产前 2 周和产后 4 周劳动;
6. 在一切有妇女从事劳动的工业部门委派足够数量的女工厂视察员;
7. 上述措施适用于一切在工厂、作坊、商店、家庭工业中劳动的妇女或作为农业工人的妇女。”

在委员会的两次会议上决定,除最后一句外保留原来的提案。坚决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两位比利时女代表。比利时的这两位女代表反对任何保护立法,特别是反对决议案的第 7 点,理由是,所有这些法律只会歧视妇女而有利于男人。她们的建议只是针对专业学校、职业学校和糕点铺的。这些建议被委员会的其他代表拒绝了。相反,意大利人关于把农业女工也包括在内的补充提案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现在的这个决议案除比利时女代表及法国人考伊弗尔外被大家一致通过,考伊弗尔表示愿意同意这个决议案,但要列入另外一些要求;从讨论中可以看出,在一切国家里妇女劳动所受的剥削最重,到处都是妇女劳动的时间较长而工资较低。实物工资制在女工中要比在男工中普遍得多;还有,男人下班离开工厂后他的劳动就结束了,而对于妇女来说,家务劳动、教育孩子才开始。——已婚妇女的工资只能当作是男人工资的额外补贴。迄今为止妇女越来越成为保护男工的攻城槌,因为在那些男女工在一起共同工作的行业里,缩短妇女的劳动时间也会造成缩短男工的劳动时间的结果。从这一观点出发,必须重视对妇女的

保护。必须注意到，让妇女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而又付给她们低工资，会造成整个工人阶级退化的恶果。——我们提出保护妇女的要求，不是为了我们妇女的自身利益，而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男人们直至今天只用一只手臂进行斗争，而缺乏妇女这只左臂相助；如果妇女参加进来，这样才会有完整的战士。（鼓掌。）

俄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一些代表提议，还要提出“同工同酬”的要求；**克莱斯小姐**（比利时）赞成这个提案。英格兰和爱尔兰女工联合会提出下述补充提案：

“代表大会摒弃中间阶级的企图，他们自称要保护劳动妇女，但却反对一项想打破雇主强迫加班加点和付给低报酬的权力的立法。

代表大会声明反对用低工资雇佣女工和童工，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反对男工和压低男工的报酬。

为了同这种弊病作斗争，代表大会希望全世界工人一致努力，让女工和童工接受协会或工会的教育，并保证使她（他）们获得同男工一样的报酬。

此外工人们必须善于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以便把关于有损健康的工业部门的、关于缩短劳动时间等等的一切法律，既运用于女工，也运用于男工。”

肖伯纳（伦敦费边社）还提出下列提案：

“国际代表大会声明，一切国家的工人代表都有义务坚决要求在一切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委派一定数量的女工厂视察员，并决心反对一切旨在为妇女采取保护措施但同时适用于男人的法律草案。”

埃米莉·克莱斯（比利时）：比利时委员会声明反对这个决议案，不是由于它原则上反对保护女工立法，而只是因为人们对这

个问题的处理方法。我们确信，这种做法恰恰会导致同我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当我们一方面想保护女工的健康和道德的时候，另一方面就不该加重她们在这方面可能招徕的危险。我们特别不赞成要求更多地缩短妇女的劳动时间，而不是跟男人一样；我们不为妇女要求特权。此外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妇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太广泛了，不可能把它硬塞进这样一个决议案里去。而且如果我们不想欺骗自己的话，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有害的东西，这些东西会使任何实现这些要求的保证和防止滥用这些要求的保证遭到破坏。我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我仍然认为，妇女问题必须同雇佣工人问题分开处理。

德沃夏克小姐（奥地利）：我们不要求对我们妇女有什么特殊的保护，当然产前2周和产后4周休息除外，对这种特殊保护大概没有一个男人会责怪我们的。我们确信，这项在奥地利已实现了的保护措施实在太不够了。因此我们提议，产后要有6周调养时间，但这遭到了英国人的反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完全没有法律规定，因此必须从最低要求开始，以便至少能取得一些成就。但我们认为首先要强调的是，必须把家庭工业置于保护立法的监督下，因为那里的劳动时间照例为13—16小时。

库利肖夫夫人（米兰）主张同工同酬，因为否则就会造成妇女排挤男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此外也会造成大批妇女被迫卖淫的危险，因此她对决议案提出一项补充。

克拉拉·蔡特金：关于规定最低工资的问题没有列入大会议程，所以对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讨论；此外要求制订关于最低工资或同工同酬的法律是一种空想。前面一位发言人说，如果不提出规定最低工资的要求，工业部门里的女工就会完全排挤男工，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最好是通过缩短女工的劳动时间同时也缩

短男工的劳动时间，这样对劳动力需求就会增加，于是工资也会提高。还有一种说法，受保护的女工中会有更多人去卖淫。经验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卖淫的人不是受保护的女工。此外我也要反对克莱斯夫人的说法，这位代表所持的立场是旧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必须反对承认女权主义者所持的视每个男人为女人的敌人的立场，这对一次无产阶级代表大会来说是有原则意义的，我们作为无产阶级妇女必须同她们一刀两断。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总是忘记，在资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阶级对立。女工们必须大声对这些人说：我们不会为你们火中取栗；你们的特权造成我们的贫困，你们的文化是建筑在强加给我们的愚昧无知上面的。你们口中的“劳动权”只是意味着允许你们去从事高贵的职业！关于普遍的人权的空话也没有使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妇女下到矿井去或者把石料运到工地去，日复一日地每天干 14—16 小时的活。妇女不是要为扩大所谓的女权，而是要为限制剥削的自由而斗争。

欧文夫人（英国）表示，总的说来同意决议案，但希望删去反对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段落和尖锐的措词，因为这些话会引起那些同我们携手前进的人的反感。

万科尔夫人（荷兰）表示反对决议案。她认为在决议案中没有消除妇女劳动所产生的弊病的充分保证。她担心，成百万未婚妇女，如不允许她们参加任何劳动，也就是说剥夺了她们的生计的话，为了逃脱贫困会被迫做出可怕的选择：要么去卖淫，要么投入死神的怀抱。

辩论结束。

肖伯纳抗议没有把他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讨论。

比利时、西班牙、罗马尼亚、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

大批代表提出下述决议案：

“鉴于在一切把妇女作为女工使用的行业里，她们的劳动时间几乎到处都比较长，而她们的劳动报酬却比男劳力低一半，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可怕的竞争，而且还使工人经常被解雇；

代表大会决定：

为了保护妇女劳动，首先必须坚决限制对妇女的剥削，不仅要缩短劳动时间，而且也要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

路易莎·考茨基夫人作为报告人赞成接受肖伯纳的决议案作为原决议案的修正案，因为它仅仅是原决议案的文字上的补充；但她反对关于要求实行同工同酬的修正案。工资法不单是为男人制定的，因此这个要求是无法实现的。

原来的文本以鼓掌的方式获得通过，同样，关于实行同工同酬的补充提案也通过简单表决的方式以绝大多数票赞成获得通过。

一些奥地利代表要求将下述声明载入记录：

“投票反对保护妇女决议案的奥地利代表们，为了避免引起任何误解，特此声明，他们之所以投票反对这个决议案，只是因为对他们来说，特别是第五项要求是非常不够的，甚至苏黎世政府委员会当前的法案也比它走得远。

Joh. 雷泽尔、舒迈耶尔、斯卡雷特、约瑟夫·施泰纳、Jos. 汉尼希、托姆西克、罗雷尔、卡尔·德第、约·希贝什。”

转入讨论大会议程上的第 3 个问题：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

报告人**王德威尔得**（比利时）阐述由委员会提出的下述决议案：

I

鉴于政治行动只是达到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一种手段，
代表大会

援引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阶级斗争的决议声明如下：

1. 为了反对剥削制度把各国工人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组织到工会和其他组织中去是绝对必要的。

2. 不论是为了宣传鼓动和公开阐明社会主义原则，还是为了争取迫切需要的改革，政治行动都是必要的。

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各国工人争取和行使政治权利。为了使工人的要求在一切实立法机构和管理机构中受到最大的重视，为了夺取政治权力手段，以便把它从资本统治的手段变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争取和行使政治权利证明是必要的。

3.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方式应让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自行选择。但是代表大会声明，在这场斗争中必须把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的，即从经济、政治和道德上彻底改造今天的社会置于首要地位。绝不允许把政治行动用来作为有损于我们的原则或我们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妥协行为和结盟的借口。

II

鉴于在现今社会中代表机构不能真实地反映其所代表的人的

思想和要求；其次，鉴于几乎大多数国家里盛行的选区制度是与按多数决定原则进行的选举相适应的，而这种人民意志与代表的表决不协调的现象还在加剧；为了充分实现人民主权，代表大会声明，除了代表制之外，赞成实行法律建议权和法律认可权（提出倡议和全民投票），以及实施比例选举制。

王德威尔得：委员会收到了许多建议；我不想涉及那些没有被决议案采纳的东西；我只想提一点，阿列曼的关于直接立法的详细建议之所以没有被接受，不是因为它在原则上遭到了反对，而是因为它在形式上远远超出了这样一个决议案的范围。此外，还有荷兰人提出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问题，另一个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没有研究，因为通过代表大会的态度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已明确地确定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也没有研究，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只是用德文书写的，所以无法进行讨论；另一方面，由于这个问题很重要，应由下届代表大会讨论。于是一致通过了目前这个文本的决议案。

可以断定，议会策略只能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主要目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利用议会制度之外，还必须使用其他手段，首先是工会运动和组织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即使有了强大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会运动本身也是决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完善的工人组织就不可能对劳工保护规章的实施进行监督。每一个工人都必须成为本厂的视察员，但是只有当他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作为后盾时，他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工会运动同政治组织站在同一行列里。因此把这种活动或那种活动挤到次要地位都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同意那种为了有利于工会活动而完全忽视政治活动的观点。相反，我们通过我们的

决议要求各国工人，凡是在他们已经拥有政治权利的地方使用他们的这种权利；凡是在他们尚未拥有政治权利的地方用他们可以支配的一切手段去争取这种权利，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夺取政权这一目的。

可能有人说，劳工保护法什么也没有保护，它对工人毫无用处，因此参加制订劳工保护法是白费力气。但英国工人运动证明恰恰相反。通过宣传十小时法案，为工人阶级的体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开辟了道路；这正是我们希望从劳工保护立法中得到的东西。

我们不能低估议会制度的腐蚀作用，因为议会制度会导致最勉强的妥协，甚至导致背叛原则。但是这种腐蚀作用的根源不在于议会制度本身，而在于议会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一旦议会掌握在解放了的无产阶级手中，这种腐蚀的根子也就被铲掉了。由于我们认清了资产阶级社会议会制度的危险，我们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我们要求进入议会的工人代表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他们忽视阶级斗争，不允许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哪怕稍微有损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妥协。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胜利。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彻底打翻在地，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胜利；而任何妥协都会阻碍消灭资本主义。

自由——平等——博爱，今天的社会已提出了这个要求。但这个三位一体的要求在今天的社会中只是一个骗局。唯一实现了这句话的和只有它才能实现这句话的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党——平等实现在人所享有的一切的经济关系中，博爱实现在精神世界中。

妥协和结盟问题在委员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在无产阶级政党获得充分发展，政党已相当

强大的国家里，任何妥协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但在委员会中也有人主张，在工人政党还不太强大，还没有实行普选权的国家里，严格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任何妥协会束缚工人的手脚。因此委员会的多数决定，对这些国家作一些让步，这就是不完全禁止那里的工人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但要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通过这种妥协不允许作出使工人事业的原则哪怕只是遭到一点点损害的最微小的让步。在这里各国的任务就是，努力使这些规定到处都得到遵循。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各国无产阶级是团结一致的。我们早已知道，这场斗争比以往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更持久、更可怕和需要作更多的牺牲；我们也知道，政治斗争像经济斗争一样会带来一些失望，毫无疑问，政权问题不会在议会基础上得到解决，因为今天存在的议会是违背民意的。为了使立法机构尽可能符合人民的意愿和需要，为了消除民意和议会决议之间的矛盾，为了开辟人民主权的新的源泉，我们在委员会中一致同意争取实行直接立法，就是说，争取人民的法律建议权（倡议）和对法律的表决权（全民投票）。不久前我们在德国看到，在最近一次选举中产生的议会是怎样违背民意的。人民反对军事提案，而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却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提案。如果实行全民投票和人民倡议就可以使这类现象完全成为不可能。

其次，依照委员会个别委员的观点，继续强调了比例选举制的必要性，这种选举制可以防止多数人强奸少数人的意志。

最后，我还要以奥地利代表团的名义希望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声援正在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的奥地利同志的声明，从而向奥地利工人表示代表大会的道义上的支持。通过一致通过的决议，我们将促进他们的斗争，使他们易于取得胜利，而这个胜利同时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胜利。

还有一句话：在代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们进行过辩论，它让敌人产生了这样的希望，似乎我们中间不能取得一致；有过这样的情况，它给人一种假象，即似乎有些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遭到的小小的失败感到幸灾乐祸。让我们抹掉这种印象，让我们向敌人阵营表明，我们是一致的，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如果我们一致通过提交大会的这个决议案，我们就用最好的方式，最明显地表示了这种一致。

弗里根代表荷兰多数派讲话。委员会的决议案接受了我们的大部分要求；只有一点我们还不满意。我们同意接受经济斗争。政治行动始终只能是争取工人阶级经济权力的一种手段。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相反。这个思想在德国人的决议案中没有包括进去。可能主义的特点是把手段当作目的。在一些国家里人们是按照可能主义的原则办事的，尽管他们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写。我们并不摒弃议会制度，而是想限制它。有些好的东西体现在政治行动中，选举季节也是鼓动季节。普选权为我们提供一种进行组织工作的好手段。议会制度不好的地方是腐蚀作用。阿列曼在委员会中给议会制度的后果描上了一层非常黯淡的色彩。但是不仅在被选中会出现腐化现象，而且在选举人中也会出现腐化现象。为了使候选人能够当选，就同资产阶级政党妥协。人们掩盖了党的原则，仅仅追求眼前的目标。我没有时间用事实来说明我的论点，但事实确实存在。（喊声：赶快说。）我的话不仅是针对德国说的，而且也是针对英国和法国说的。所以也是对全世界说的。两年前我们在布鲁塞尔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立场；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就没有什么妥协。——很多朋友要我们接受直接立法。我们有一个责成我们投票赞成我们的提案的限权委托书；因此我们不能赞成委员会的决议案，但也不投反对票，因此我们将在表决时

弃权。

荷兰决议案如下：

“鉴于如果各国政府同意通过劳工改良法案使劳动阶级的状况得到小小的改善，而且政府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肯这样做，即这种改善要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

鉴于这种改善会导致通过政府渠道控制劳动，并使工人处于当局的监护之下；简言之，会给我们带来国家社会主义，即使统治者是通过普选选举出来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也仍然会保留它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

最后，鉴于在生产手段私有制的基础上不可能持久地改善劳动阶级的境况；

代表大会声明：

各国工人的任务是，在规定劳动合同时，保护有关工人的自决和自治的原则，这样将把一切用来压迫工人的武器改铸成解放工人的武器；

其次，工人只能在改善他们的状况有助于改善他们的斗争地位的意义欢迎在今天的社会内改善工人状况，并且把这作为使他们更好地组织起来和更便于对有产阶级进行剥夺的手段。”

由于高温和大厅通风设备差，代表们普遍感到疲倦，原定的晚间会议取消了，下午会议于7时休会。

第十一次会议

(1893年8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时)

屠拉梯—库利肖夫同志(米兰)任主席。人们没有期待她发表长篇讲话；纪律、忍让和平静——这是今天向代表大会参加者提出的要求，以便使讨论顺利结束。

代表大会继续讨论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

(继续)

李卜克内西第一个发言：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在经过几天的激烈讨论之后现在在议会制度问题上出现了美妙的和谐。反对荷兰的人提案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我们之所以没有接受这项提案，只是因为我们在一次新的代表大会上论述国家社会主义问题。昨天弗里根对于我们也认为政治行动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表示惊讶。这相当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对我们已产生了一种狭隘的和非兄弟的感情。人们对德国的运动同样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要满意地向荷兰人声明，在我们的纲领中已清楚而明确地表达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在国际的纲领中，在1868年于纽伦堡举行的我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已经接受了这一段。我

们感到幸运的是，代表大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已看清了资产阶级和警察所散布的说我们德国人不再站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神话。在兄弟党的所有纲领中，我们的纲领是最激进的纲领。世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像我们那样清楚。攻击我们的那些人是先向我们学习的。（鼓掌。）关于策略问题也阐述过。策略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革命的策略和反动的策略，而只有达到革命目的或达到反动目的的策略。策略是随机应变的。如果一天之内情况发生了 24 次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改变 24 次。（赞同声。）我们的策略视敌人的态度而定。如果在德国出现了像在俄国出现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采取虚无主义者的策略而外别无他法。（暴风雨般的掌声。）引起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混淆了因果关系。关键在于目标！在今天德国的现实情况下，我们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委员会中除荷兰人外也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赞同）是，我们有责任利用国家和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手段来反对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我们利用普选权，在这一点上荷兰同志也是同意我们的。只是荷兰人想限制议会活动，说我们在议会中只应提抗议，因为这个代表机构是反动的，同时参加议会工作会导致妥协和腐化。这里也是把实际情况弄混了。正如不存在革命的策略或反动的策略一样，国家机器本身也不是反动的。它只不过是行使权力的工具，是一种强大的、锐利的武器。如果敌人用武器来攻击我，我不会因为藐视武器而战胜敌人；如果我不想亲身尝尝武器的滋味，我就要奋力夺走敌人手中的武器。我们面前的这个政权，我们只有夺走它的利剑才能战胜它！（有人喊：“说得对”！）这是一场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在政治的基础上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以便把我们的敌人 100 年来狡猾地用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立法机

构掌握到自己手中。(荷兰人科尔纳利森喊道：请您读一读《共产党宣言》!)在您还没有出世之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只希望这位荷兰同志学会理解它。(热烈鼓掌。)腐化问题是一个党的组织问题！英国人还没有坚强的党组织，因此那里有些领导人由于被敌人收买而腐化堕落了。在我们这里如有这样的议员，他马上就会成为一个无用的人，声誉扫地，被可耻地开除出党。(热烈鼓掌。)在委员会中只有一个问题存在意见分歧。这就是同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问题。我们德国人反对任何妥协。我们希望在决议案的有关段落中加上排除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最尖锐的措词。但在委员会中有人认为，有些国家里的党还年轻，那里的情况有时不允许拒绝妥协。由于我们没有权利给那些有可能实行妥协的国家里的同志们规定他们的策略，所以我们同意某种妥协，但有一个条件：这种妥协不能损害党的独立性和原则的纯洁性。在德国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鼓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像德国那样意见一致，那么这个问题就根本用不着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旦我们之间的革命空话云消雾散，这一点马上就会看得清清楚楚。社会民主党必须从空话中解放出来！(热烈鼓掌。)单是革命空话就能引起种种丑闻。对于来自鏖战中的汗水淋漓、血迹斑斑的朋友必须怀有兄弟情谊，而不是去窥探他的弱点！当然什么都不干的人也就不会有任何缺点。(暴风雨般的掌声。)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很容易离开路线向右或向左跨一步。但是路线必须正确。德国运动的路线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已通过这个决议案推荐给整个国际工人阶级。请你们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暴风雨般的掌声。)

埃伦博根博士(维也纳)：如果我们奥地利人也没有低估议会制度的危险的话，我们同意所提出的决议案。在我们那里把工人

阶级排除出立法机构意味着给统治阶级进行秘密勾当开了方便之门，使它能在这种情况下满足其统治欲望。我们需要议会制度，以便强迫我国资产阶级（它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为所欲为，好像奥地利是一个亚洲国家一样）至少尊重它自己制订的法律。我们要把阶级斗争带到议会中去，这一点统治阶级是知道的，因此它们处心积虑地想把我们排除在议会之外。其次，我们需要议会制度还有一个理由——在这一点上我们同荷兰迥然不同——，就是要在议会中进行想象得出的最有效的宣传。王德威尔得昨天说，在一定意义上讲妥协也许是必要的，我们奥地利人相反，我们站在坚决拒绝任何妥协的立场上。

根据这种精神我们提议，代表大会认为在一切国家开展争取男女普选权的普遍运动的时机现在已经到来了。我们已开展了这个运动，在比利时所取得的成就已对我们本国的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在我国工人中而且在统治阶级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请你们通过这个决议案，这将是你们对奥地利工人的最有效的支持。

屠拉梯（米兰）支持王德威尔得的意见，并争辩说，在小党中进行妥协是可行的。相反，一个强大而团结一致的党绝对不能同资产阶级政党妥协，否则就会有丧失自己的某些作用的危险，而恰恰是年轻的和较弱的党可能怀着嫉妒的心理，它们必须以最彻底的纯洁性保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卡恩（美国）：我们赞成面前的决议案，迄今为止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中选民已经投了 23 000 张社会主义选票。但我们还要求更多的东西；在议会中不仅要做宣传工作，而且也要做真正的实际工作。只有通过积极的工作为群众做点好事，我们才能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德国。如果德国人对军事提案仅仅简单地原则上提出抗议，那就会在群众中

造成混乱；所以他们积极地进行工作，并争取到了成千名新的拥护者。关于腐化的危险，纽文胡斯作为前议员从反面提供了最好的证明，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却没有被腐化。

辛格尔建议，讨论到此结束，对这个问题以及以后涉及的问题，只听取报告人的讲话，然后马上就所提出的决议案进行表决。

科尔纳利森：那我们就成了投票牲口！（法国人发出吵闹声。）

王德威尔得：辛格尔在提出他的建议时当然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做就取消了两位已经登记的法国人的发言权。他提议，先让这两位法国人和一位英国人讲话，然后就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这个提议被通过。

阿列曼（巴黎）为他的关于直接立法的建议进行辩护；但因受讲话时间限制未能发完言，他提出抗议后离开会场。

荷兰人提议，代表大会在讨论完这个问题之后结束，尚未解决的问题留待下次代表大会去讨论。有人提出一项修正案，认为农业问题和工会问题也应当讨论，代表大会对此进行了表决，结果9国赞成，8国反对，决定同意荷兰提案。

科莫（巴黎市议会）：他的小组也赞成政治行动；现在是由工人来结束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中的丑恶事件的最好时机。他指出巴拿马丑闻和袭击劳动介绍所事件。必须铲除这种议会制度，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也可以采用最极端的方法：号召进行社会革命。

奎尔奇（伦敦社会民主联盟）：工人政党必须在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外独立地开展政治活动。但这不是唯一的手段；还必须强调工会组织的经济斗争。许多英国工会不喜欢“革命”这个词，但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大家是一致的。在同资产阶级政党妥协方面英国人获得了最痛苦的经验，妥协简直起了破坏性作用。

所以英国代表团十分坚决地声明反对任何妥协。

在表决时，18个国家赞成委员会的决议案，荷兰弃权，挪威缺席。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表决结果被大会接受。

弗里根代表荷兰人提议，在这个问题完了之后就结束代表大会。不经讨论就进行表决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最好是让代表大会就此结束，尚未解决的问题留待下次代表大会去讨论。此外必须在剩下的短短的时间内决定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时间。

格雷利希反对上述意见，他认为在农业问题上不会有什么矛盾，至少应听取报告人的报告，然后就可以简单地通过决议案。

意大利代表和罗马尼亚代表声明，农业问题对他们来说极端重要；美国代表和英国代表声明，解决工会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将来是否参加国际代表大会，取决于在这里是否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荷兰人同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在这之后，代表大会决定（9国赞成，8国反对），在对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和全国范围内改造工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后才结束代表大会。

拉布里奥拉教授（由于结束了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他再没有发言的机会）要求将下述声明载入记录：

“拘谨，意大利人在这里的举止非常拘谨；这种举止对于那些代表一个刚刚成立的党的人来说多么恰当。因此我们也没有资格在这里高谈阔论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我们愿意等待，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行动能够赋予我们的忠告和言词以份量。但是我们意大利人，作为有阶级觉悟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愿失去这个机会来向正在进行普选权的斗争的奥地利人表示我们最衷心的同情，希望他们的运动从刚才通过的决议中得到最有效的支持。我们知道，奥地利是什么国家，我指的当然不仅

是过去的专制的、官僚的、教权派的奥地利，而且也是指今天的假立宪主义的奥地利。我作为意大利人为能同奥地利同志们握手而感到十分高兴和骄傲。意大利社会党人和奥地利社会党人之间没有流过罪恶的血。这个事实为将来带来自由和幸福的一切机会，是各个民族和种族的兄弟情谊的一切希望之所在。我们没有什么办法来从旁协助正在同政府进行斗争的奥地利兄弟们，我们只能在这里表示我们最美好的祝愿，并愿共同努力以实现刚才通过的决议。硬要意大利人承担严格的爱国主义义务把所有的奥地利人都当作专制者和专制者的帮凶来仇恨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残暴地统治着我们大家，特别是统治着意大利的是巴拿马三国联盟。但是当我们今天支持奥地利无产阶级时，我们意大利人在当前这个时刻也不是对过去正当的爱国主义不忠诚了；因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党人在继续为反对奥地利政府、反对老的专制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而斗争。”

接着讨论下一个问题：

农 业 问 题

雅克拉尔德（巴黎）作为报告人对决议案作了简单的说明。这个委员会只决定了一般的措词；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予理睬的态度必须放弃。在德国的选举中，农业无产者的选票大量增加；在法国，农民们选出了社会主义的乡镇议会。他请求一致通过下述决议案：

“代表大会拥护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原则。

代表大会认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除了把工业工人组织起来外也要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并吸收他们

参加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战斗队伍。

代表大会决定，所有国家都应向下届代表大会提交一份关于农村宣传工作进展情况和有关国家农业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应特别说清楚，社会主义者认为什么立场、什么宣传手段和什么鼓动方法最适合于本国的情况，最适合于无产阶级、小私有者和佃农等等。

由于农业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前几次代表大会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代表大会决定这个问题应列入下届代表大会的首要议程。”

这个决议案被一致鼓掌通过。

最后讨论议程上的第 6 个问题：

在国内和国际上扩大工会组织

艾尔姆（汉堡）作为报告人对决议案加以说明：

在整个委员会中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认为有必要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国际上加强工会运动；委员会承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斗争的决议。

只有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各国工会在国际范围内最好地联系起来的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这方面要考虑到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律上的困难。

德国参加工会的大多数工人同英国人有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一个松散的组织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组织同今天经济发展情况不相适应，必须实行集中，这种集中的最好形式是中央联合会。在建立全国中央联合会的过程中，德国工人曾经同某些邦政府进行持久的斗争。在德国有 26 种不同的结社法；即使一个工

会侥幸避开了一个法律的确石，那它大概很快又会落入各自为政的各个小邦的立法网布下的其他法律的魔爪中；地方当局作出的裁决往往是最武断的和矛盾百出的。在这个迷宫中要找到路径，需要有特殊的机敏和长时期的经验。

今天在**整个德国**成立全国性的**联合会**还不可能，组织固定的国际性的联合会更不可能，这种组织会立即使德国工会同检察官发生冲突。在这方面只能考虑有选择的进行联系的形式。通过国际卡特尔条约或协议能够在双方有良好愿望的情况下达到通过建立固定的国际组织所达到的同样的东西，印刷工人和烟草工人已经提供了证明。至于国际工人书记处问题，委员会多数成员认为，首先在各种不同的职业中成立全国性的书记处是最适宜的，这些书记处能相互交换关于工人运动、罢工和开除事件等一切有意义的消息，以及交换各个工会的年度报告；成立主要的或国际性的书记处的任务必须交给一个共同确定的国家。在那些当局可能制造麻烦的国家里，全国性的书记处可以由在公共集会上或在国际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深孚众望的人组成。唯一的-一个国际性的书记处要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工会做组织工作会太不灵活；它最好是做一些有关国际工人事务的咨询工作。

关于成立劳动介绍所的问题在委员会中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工会必须把劳动介绍所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职业介绍所机构可能被利用来压迫工人。

讲话人然后简要地阐述了根据美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代表团的提议在委员会中获得一致通过的决议案，并建议代表大会予以通过。

讲话人最后指出，在先前的辩论中已强调过，除了争取政权的斗争外，加强工会运动是必要的。从向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来看，

在许多主要国家中组织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德国有一个强大的工人政党，但德国的工会运动却很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持续的危机，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德国参加运动的自由很少造成的。促进工会运动对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来说是非常迫切的。在本届代表大会上，要是英国工人代表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在政治策略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就好了。讲话人说，我们在分手的时候向我们的英国兄弟们保证，我们对他们在英勇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十分钦佩，我们承认他们的组织是模范的组织，同时我们愿意在组织起来的道路上努力赶上他们。如果能把工人群众很好地组织到工会中来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那么我们不久就会达到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伟大目标：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他请求通过下述决议案：

“在考虑到和承认 1891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罢工和联合抵制的决议的情况下，1893 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决定：

只有工人组织才能统一和有效地开展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斗争。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义务是，参加他们各自的组织。工人政党和工人报刊的义务是，大力促使工人在工会领域内组织起来；工会负有成为未来的社会组织的支柱的使命，因而除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权之外，工会的组织建设是绝对必要的。

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努力，要求工人在工会范围内把力量更大规模地联合起来，要求所有国家的全体工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差别）互相关照和认识到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要求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切斗争中有力地相互支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代表大会建议：

I

1. 建立同一职业的全国性联合会；
2. 缔结旨在保证提供相互支援的国际协议；
3. 建立一切联合会都参加的各劳动部门的全国性工人书记处；工人书记处所担负的义务是，相互交换关于工人运动、罢工和开除事件等一切有意义的消息，以及交换各个工会的年度报告；
4. 为了统一组织职业介绍所，工会必须在各地要求市政当局成立劳动介绍所，其领导权只能掌握在有关城市的工会组织手中。

II

专门关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鉴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两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这两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的纯经济组织，如果不迅速被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基础上的政治行动所代替的话，将变成绝对软弱无力的组织；

其次，鉴于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世界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它们具有的世界性质对于欧洲无产阶级的存在使命和社会革命的进展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代表大会强烈要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人组织不仅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同欧洲有关组织建立联系，而且尤其要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还要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以便同它们的欧洲兄弟们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前进。

III

意大利代表团鉴于国外流入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对工人组

织产生的有害影响——压低工资，阻挠罢工，有时引起激烈冲突，要求那些出现“不正当的竞争”的国家里的所有社会党和工人联合会，在移民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它们自己方面，意大利社会党人将提供它们可能提供的帮助，如散发用移民的本国语言写成的小册子，或者专门在侨民主要中心进行宣传工作。代表大会考虑到上述事实的普遍意义，决定：

“在那些因国外流入的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的竞争而引起的弊端已变得明显的国家里，社会党和工人联合会必须致力于扩大宣传组织无产阶级和宣传国际团结精神的工作。

上述国家的社会党和工会联合会将请求工人外流的国家的联合会中央代表机构和有关的政党，直接地或通过全国工人书记（如果设有这样的干部）的媒介提供报告和帮助。”

沃尔德斯提出下述相对提案：

“代表大会坚持在布鲁塞尔通过的关于工会组织的决议，并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有义务参加行业协会组织。

因此代表大会声明，工业工人、农业工人和海员工人有责任：

1. 成立职业协会，以便维护职业利益，保护他们的工资以及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削；
2. 利益一致的同职业的职业的工会，凡是在有可能做到的地方都要联合成全国性的联合会；
3. 通过全国联合会的相互了解，组成一个已组织起来的职业的国际联合会，以便把各国的组织联合成一个巩固的联盟；
4. 只要有可能，就要在地区、全国和国际范围内把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起来，以便各种团体的工人在工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
5. 通过由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工人秘书处（它的职

能必须得到保障)，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以及必要时通过受到委托的国际工人秘书处，向全国联合会通报特别是和各个团体有关的一切消息；

6. 通过工人的倡议或者执政机关的干预，在那些没有劳动介绍所的地方建立这样的机构，以便工人能更容易找到职业，而且也更容易加入工会；

7. 举行各种职业的特殊国际代表大会，以便各种联合会能在会上讨论自己的问题；

8. 参加各种组织的工人（不分种族和职业）组成一个紧密的集体，以便在政治活动中，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拥有足够的力量，确保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接着是委员会提案中的第Ⅱ和第Ⅲ节。

英国：阿·格林伍德；比利时：让·沃尔德斯、E. 皮埃隆；意大利：菲·屠拉梯；美国：L. 萨尼亚尔；澳大利亚：F. 斯犹沙；罗马尼亚：曼尼、米勒；西班牙：伊格列西亚斯；保加利亚：加布罗夫斯基；塞尔维亚：Iv. 巴罗伊契奇；法国：莫蒂埃；荷兰：多梅拉·纽文胡斯、科尔纳利森

在对决议案的第Ⅰ节进行表决时，12个国家赞成沃尔德斯的提案，6个国家（德国、奥地利、丹麦、瑞士、匈牙利、波兰）赞成委员会的提案，2个国家（瑞典、俄国）弃权。

在表决第Ⅱ节和第Ⅲ节时通过了委员会的提案。

欧仁妮·科隆讲话表示，希望这些组织从现在起按照无政府主义的精神进行宣传。

勒努对关于提供工人情况报告的巴黎决议至今尚未得到执行深表遗憾，他要求各个工会提供它们的地址。

日内瓦州议员**西格**通知说，社会主义大学生及过去的大学生国际代表大会将于12月21日至24日在日内瓦召开。

在通过荷兰人的提案后代表大会的议程全部结束。

霍布森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建议下届代表大会于1895年在**伦敦**召开；那时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要比人们一般想象的大得多。

辛格尔声明说，德国人愉快地接受英国人的邀请，但希望代表大会在1896年召开。

11个国家赞成1896年，8个国家赞成1895年。因而决定下届代表大会于1896年在**伦敦**召开。

奥地利代表团提出下述提案：

“代表大会决定：现在所有尚未实行普选权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发起一场为不分性别和种族的所有成年人争取选举权的进攻的时候了。大会要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

这项提议未经讨论很快被通过了。

库利肖夫夫人：代表大会的事务至此已经结束。我只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会。无产阶级的光荣先锋战士、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先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此刻正在我们中间。主席团一致决定，请他担任名誉主席，并主持代表大会闭幕式。

这个通知和恩格斯的出现受到热烈欢呼。恩格斯非常健康，充满活力。在代表们和走廊里的旁听者中间不断响起激动的欢呼声，欢迎这位忠诚和英勇的同志。在大家平静下来之后恩格斯发表了下述演说：

恩格斯致闭幕词

弗·恩格斯：男女公民们！——请允许我把这个讲话（演讲人刚才是用英语和法语讲的）译成我所喜爱的德语。你们对我的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盛大欢迎，这种我只能以深受感动的心情接受的欢迎，我不是为我个人接受的，而是作为一位伟人（他的肖像就挂在上面）马克思的同事来接受它的。自从马克思和我参加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第一批社会主义文章以来，整整50年已经过去了。从那时以来，社会主义已从当时的一些小宗派发展为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那么欧洲和美洲没有哪一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回顾自己的毕生事业。还有一个周年纪念日。1873年举行了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同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这不是一个多余的决议呢？巴黎的、布鲁塞尔的和现在的这次代表大会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国际停止以旧形式发挥作用。在那时，喝饱了光荣的公社的鲜血的反动势力猖獗到了极点。旧的国际如果继续下去，就只会造成得不偿失的牺牲；国际把自己的会址迁到了美国，也就是退出了舞台，让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以自己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国际现在比以前强大得多了。我们应当根据这种精神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变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必须继续维护共同的立场。松散的联系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团结，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再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个胜利。——这里有许多英国代表出席，这一点使我感到

特别高兴，他们在组织工人方面确实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尽管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也毕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他们可以学习的新事物。——我在德国周游了一趟，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反社会党人法的破产表示惋惜。同警察作斗争也许更加有趣。像这样的战士，全世界任何警察、任何政府都是制服不了的。

我受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国际无产阶级万岁。

（全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欢呼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与会者全体起立齐唱《马赛曲》。）

* * *

还有两个来不及讨论的问题：关于世界性罢工问题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问题，两个委员会提出了下述决议案：

关于世界性罢工的决议

鉴于罢工只能在特定情况下和为了达到特定目的才能有成效地进行，而这些情况和目的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

鉴于单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世界性罢工就是无法进行的，而从世界性罢工可以进行的时候起，这种罢工已经没有必要了；

其次，鉴于即使是一场局限于一国范围内的总罢工，如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罢工者首先会遇到饥饿问题，并且会被迫投降——而一场暴力罢工则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

代表大会声明：

在当前的社会政治情况下最好是各工业部门举行总罢工，这

种罢工有可能获得胜利；

其次，群众性罢工也许不仅是经济斗争中而且也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最有效的武器，但要有效地使用这一武器，工人阶级必须先成立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各国社会党，全力以赴地促进这种组织的成立。关于世界性罢工问题大会不予讨论。

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

鉴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迫切希望用一个共同的名称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反动法律对结社自由所作的种种限制，目前这个愿望还无法实现。

代表大会承认所有那些承认阶级斗争，承认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并拥护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决议的组织、协会和政党为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代表大会号召一切党员和工人组织——不管是工会性质的还是政治性质的——一切成员加紧努力，为废除一切限制结社权的法律而坚持不懈地施加影响。

代表大会希望，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阐述经济改造的必要的第一部分要使用同样的措词，第二部分，即包含应采取的手段的部分，则由各国根据自己的经济政治条件来确定。

记录负责人：

H. 路克斯博士，于马格德堡

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向大会的报告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情况的报告

当我们就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情况向国际工人苏黎世代表大会作此报告时，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个从冷酷无情的雇主利益和极其残暴又极其狭隘的警察专制立场出发颁布的非常法，企图压制反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状况和进展的任何言论，企图彻底绞杀政治运动以及工会运动，长达 12 年，但是却枉费心机。每 3 年一次的帝国国会选举，向统治权力表明，它虽然可以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表现方式，但是却无法遏制这一运动的发展壮大。

仅仅几个月，皇冠便二易其主。当今德皇接连发出诏令，宣布将采取步骤，主要是在社会立法的基础上彻底改变体制，使最广大阶层产生了种种希望。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新的大选临近了，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从 1887 年的 78 万张一跃而为 1890 年的 142.7 万张，所获得的帝国国会议席从 11 个增长到 35 个。简而言之，上层各界本指望皇帝在著名的二月诏书中那些动听的许诺会“使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一筹莫展”。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社会民主党在竞选中取得了不容争

辩的胜利。

从而决定了反社会党人法的命运。大选结束后不过几个星期，那位万能的首相便倒了台，数月之后，他那绝无仅有之作，当代耻辱的纪念碑也无声无息地随他而去了。

社会民主党恢复了活动自由。现在看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选票的增长并不像敌人所断言的那样，仅仅是暂时的政治上不满情绪的表达，这一选举结果表明了德国工人阶级的严肃的意愿，它不仅抗议现存的统治制度，而且同样强烈地、明确而坚决地抗议现存的社会制度，抗议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自那以后3年过去了，德国资本家阶级向所谓新路线的吹捧者们强调表明，在今天的社会内，任何政府都只能奉行为掌握经济实力手段的那个阶级服务的政策，换句话说，任何政府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关心资本家阶级的事务。所谓社会改革的鼓噪已沉寂下来，劳工保护立法自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来毫无进展，“新路线”完全是“旧路线”的继续。镇压去年萨尔矿区皇家模范矿井煤矿工人暴动时所使用的办法；皇家矿务局宣布暂时或长期解雇成百上千的一家之主，以惩处他们试图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行动，从而使妇女和儿童遭受饥饿、窘困和贫穷之苦时所依据的规章；国营工场工人的结社权被断然取消时所持的那种毫不留情的态度，这一切彻底揭露了现政权的阶级性质——赤裸裸的资本家阶级的统治。

不言而喻，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未怀疑过新路线的性质；无论是1890年大选期间，还是在那以后的3年当中，党对政府或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则立场和策略方针从未动摇过，从未使人产生过怀疑。党仍然是过去的党，党仍然是党：现存阶级统治、现存工资制度不妥协的敌人；党的宗旨仍然是：夺取政权以推翻阶级统

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 * *

总的说来，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的3年，是我们党组织恢复、发展和团结起来的时期。党在行动和思想上的一致，同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在哈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表明的一样，是极其出色的，尽管形形色色的敌人百般希望我们出现分裂，但是那时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一再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团结一致。有时外国兄弟党内似乎有人听信了敌人报刊的报道，担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着两种思潮，即所谓“青年派”，他们赞成一种更加“革命的”立场和“激进的”行动；还有所谓“老年派”，他们好像想否定自己革命的过去，把运动引向目光短浅的种种改革的航道，甚至急于同现存社会和解。

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什么矛盾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小撮人无谓的喧嚣和对于党的代表进行人身攻击，这一小撮人的威信、品质和能力同他们的要求是成反比的。一家爱好耸人听闻的报纸通过十几名记者利用在公开集会上所散布的诽谤，企图败坏党的声誉，削弱党的宣传的作用。因此才使得这种危害党的行为短时间对外有所影响，结果促使党的领导通过一个呼吁书，将这一问题提交给1891年10月14—21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解决。该呼吁书写道：

“近来柏林第六选区召开几次党的会议，讨论了党的策略和党的执行委员会及帝国国会党团的态度。从《前进报》的有关报道可以看出，反对派的先生们乘机对业务工作和对个人都提出了极其严重的指控。他们说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有步骤地腐化党并把党引向堕落，尤其是党的执行委员会随意把党的钱款提供给寄生虫和阿谀奉迎之徒，而置党的最重要的利益于不顾。

如果这些指控成立，那么党的领导人就应该**受到声讨而被驱逐出党**。

全党亟待仔细了解那些指控的真实性有多大；鉴于即将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是有权最终审查和解决这些指控的唯一机构，因此我们要求，反对派的先生们认真陈述他们的指控，并且附以必需的证明材料，提交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这是他们对党应尽的义务。

但是，如果这些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或是捏造的，那么反对派的先生们就必须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们相信，无论如何党的代表大会定将本着党的荣誉和利益的要求妥善处理。”

在各种集会上和在一份传单中提出的所谓反对派的全部指控，党的执行委员会均汇集一起并印发给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开了几次会，详细讨论了这些指控，但是无论哪一条指控都找不到丝毫证据。由于这些先生们拒绝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任命的调查委员会为他们的指控提出辩护和证明，而同时他们又缺乏道义上的勇气公开收回指控，所以，党的代表大会根据有关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批准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决议开除提出这些指控的几个代言人出党。

由于驱除了诽谤分子，对党来说，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在第二年举行的柏林党代表大会上，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喜悦的心情庆贺，党终于不再对这些分子的言行负责了”。几星期前“1893年6月”出版的一份传单上，所谓青年派的代言人联名撰文承认：“人们还会**认真对待无论哪一方的独立运动吗？不会的，资产阶级并不害怕我们，而是在嘲笑我们。**”

下列统计数字也可说明那些分子对于党是绝对微不足道的，他们是毫无影响的。1890年，柏林第三和第五选区以及柏林农村

选区特尔托—贝斯科的候选人，是以后成为反对派代言人的那些人。当时党获得的选票计：

柏林第三选区	12 287
柏林第五选区	7 234
特尔托—贝斯科	19 169

1893年，由于人口迁移，柏林第三选区和第五选区的选民人数分别减少1368人和650人；所减少的选民全是工人人口，尽管如此，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却是：

柏林第三选区	12 732
柏林第五选区	9 729
特尔托—贝斯科	31 424

并且在复选中，这3个选区大获全胜。

* * *

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产生新的党纲。在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所确定的党纲，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已不再适合党的理论观点和实践需要，然而由于外部情况，使得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不可能着手制订新的纲领。在爱尔福特一致通过了下述纲领，这个党纲再好不过地驳斥了那种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好像否定了自己的革命性质，或者似乎在原则问题上热衷于让步妥协的言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绝对必然地导致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规模经营的衰亡。它使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资料相脱离，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同时生产资料被为数

较小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

随着生产资料被垄断，庞大的大规模经营逐渐排挤了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生产工具发展成为机器，人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这一变化的种种好处都被资本家和大地主所独占。对于无产阶级和每况愈下的中间阶层——小资产者、农民——来说，这一变化则意味着他们生存不坚定、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与日俱增。

无产者的数量越来越大，过剩的工人的大军人数越来越众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残酷，这一斗争把现代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而这是所有工业国家的共同特征。

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危机，范围越来越广，灾难越来越深，使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因而更加扩大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同时证明，今天的社会已驾驭不了生产力，生产资料私有制同合理地使用和充分发展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生产资料私有制从前是确保生产者占有其产品的手段，如今则变成了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同时使不劳而获者——资本家、大地主占有劳动者产品的手段。只有把生产资料（土地、矿井和矿山、原料、工具、机器、交通手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和把商品生产转变为为了社会并通过社会来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才能促使大规模经营和社会劳动不断增长的收益能力，由迄今造成被剥削阶级贫困和压迫的根源，变成它们的高度福利和全面和谐地完善的源泉。

这一社会转变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意味着蒙受今天状况之苦的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这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

因为其他一切阶级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种种利害冲突，但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并以维护今天社会的基础为共同的目标。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政治斗争。没有政治权利，工人阶级就无法进行自己的经济斗争和发展自己的经济组织。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权，就不能促使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

使工人阶级的这一斗争成为自觉的和统一的斗争，并为这个斗争指明其绝对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在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随着世界交往和为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的扩大，每一个国家的工人的状况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国家工人的状况。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一致参加的事业。鉴于这个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感觉到并宣布自己同其他各个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斗争，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消灭阶级本身、为了不分性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从这些观点出发，党不仅反对剥削和压迫雇佣劳动者，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不论其矛头是指向一个阶级、一个党派、一种性别还是指向一个种族。

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最近的要求：

1. 凡年满 20 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选举和投票的所有阶段，均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在实行比例选举制以前，根据每次人口普查依法重行划分选区。立法期两年。选举和投票在法定假日举行。对选出的代表支給薪金。除剥夺权利的情况以外，

废除对政治权利的任何限制。

2. 由人民行使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进行直接立法。在帝国、各邦、各省和各行政区实行人民自决和自治。由人民选举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均负有责任和义务。税收逐年批准。

3. 普遍的军事教育。用民兵取代常备军。人民代表机构决定宣战与媾和。通过仲裁法庭的途径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4. 废除一切限制或压制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5. 废除一切在公法和私法方面不利于妇女而有利于男子的法律。

6. 宣布宗教是私事。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公共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团体，完全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

7. 学校的世俗性。公立国民学校实行义务就学。在公立国民学校中实行免费教育、免费提供教材教具和免费供应伙食，在高等学校中对那些根据本人能力被视为适合进一步培养的男女学生也实行本规定。

8. 司法免费和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由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刑事案件实行上诉。赔偿无辜被告、被关押和被判刑者的损失。废除死刑。

9. 医疗（包括助产和医药）免费。丧葬免费。

10. 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公共开支，征收级差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应自行估计税额。根据遗产规模和亲属等级征收级差累进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以及为少数享有特权者的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其他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最近的要求：

1. 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劳工保护法：

- (1) 规定最多为 8 小时的标准工作日。
 - (2) 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的儿童从事营业劳动。
 - (3) 禁止夜间工作；按其性质、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公共福利的原因而需要夜间工作的工业部门不在此列。
 - (4) 向每个工人提供每周一次最少连续 36 小时的休息。
 - (5) 禁止实物工资制。
2. 由帝国劳动部门、各地方劳动局及劳动委员会对全部工商业企业进行监督，研究和调整城乡劳动关系。厉行营业卫生。
 3. 使农业工人和仆人同工业工人享有同等权利；废除奴仆规约。
 4. 确保结社权。
 5. 在工人拥有决定性权力参加管理的情况下，由帝国接管整个工人保险。

* * *

柏林党代表大会（1892 年 11 月 14—21 日）所要解决的是 1893 年的五一节问题。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坚持 5 月 1 日这天是游行示威日，并没有把在 5 月 1 日停止工作作为原则条件。因此党的领导通过自己的报告人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下述提案并说明了理由：

“5 月 1 日是纪念节日。这一天，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将同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一道，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本着众所周知的巴黎决议案的精神对劳工保护立法进行国际调整而举行集会游行。

为使节日成为统一的节日并从而就其对外界影响来说成为尽可能声势浩大的节日，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将来同去年一样，这个节日要由政治组织即由党来领导。

党的代表大会认为，停止工作是节日最庄重的庆祝形式。但是，鉴于无论是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均未把停止工作作为绝对的义务，而是由各国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采取行动；另外鉴于节日庆祝的方式首先是由各国的营业情况来决定，所以，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作一成不变的规定，而由一年一度的党的代表大会就节日庆祝方式作出规定。

考虑到当前笼罩着经济困难，致使明年以前绝无可能出现营业繁荣，党的代表大会认为，宣布 1893 年 5 月 1 日普遍停止工作是无法实行的，因此决定，5 月 1 日晚上举行庆祝活动。”

不少人，特别是阿德勒同志（维也纳）代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发言拥护在 5 月 1 日停止工作；记名投票表决结果，以 236 票对 5 票否决了 5 月 1 日停止工作的提案，两名代表弃权。赞成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庆祝活动的只有 73 名代表，而赞成在 5 月 1 日举行庆祝活动的有 167 人。从而 5 月 1 日举行庆祝活动便成为党的决议，并且在德国数以千计的城镇凡有我党组织的地方，我们党的同志便在 5 月 1 日这一天向成千上万的人宣告他们与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表明他们不打碎阶级统治和人剥削人的桎梏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同时，五一节还是拥护国际和平反对统治阶级国际挑拨行径的庄严表示。

* * *

除了五一节，德国工人运动最近几年没有机会显示威力。危机对纺织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和建筑业的压力最重，它使得数以千计的产业后备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悲惨的经济形势，危机的重压，不言而喻也阻止了工会采取任何进击行动。煤矿工人由于对企业主的经济优势认识不清和估计不足，而试图以暴动作为武器来反抗剥削者毫无收敛的残暴和一再降低工资，这一行

动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沉重的失败和矿工组织深受其害。自那以后，白色恐怖一直笼罩着萨尔矿区，当地矿工组织已荡然无存，它们的机关报停刊，它们的储金会破产。然而，威斯特伐利亚煤田的矿工们只是由于他们团结得比较好和政治教育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为声援萨尔矿区煤矿工人而举行的同情罢工就没有付出放弃自己组织的代价。

从来也没有像这次罢工这样使得工人更清楚、更令人信服地看到我们这个阶级国家的性质。矿工运动的“领袖们”在罢工的最初几天便被捕入狱，据说当局指控他们煽动撕毁合同或散播假消息。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他们被判相当严厉的刑罚，这些行为过去一向是不受惩罚的，而为了惩治这些行为，现在刚刚昭示刑法典的一个条款——第 110 款：煽动撕毁合同，或者更确切地说，煽动不服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两难局面：数以千计的矿工举行罢工从而撕毁合同，这是刑事上不受惩罚的行为；但是号召举行罢工却要受到几个月、甚至几年监禁的惩处！然而法官和原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些受到起诉的领袖们谁也没有直言不讳地号召撕毁合同！**但是罢工是在撕毁合同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任何间接号召罢工，任何间接号召坚持到底，同时也就意味着间接号召撕毁合同！于是，对于此次煤矿工人罢工竟然宣判总计长达 **15 年的徒刑**。煤矿工人们从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几个月以后的帝国国会选举便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多特蒙德选区，1890 年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获得 10 422 张选票，1893 年则是 17 170 张选票；在波鸿—盖尔森基米，1890 年是 8 388 票，而 1893 年则是 19 585 票；在西里西亚煤矿区瓦尔登堡，1890 年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是 6 344 张，而这一次却是 11 386 张，一名社会民主党人煤矿工人第一次被选进帝国国会。

工会一般活动的表面平静绝不等于工会鼓动的停顿，不等于工人解放思想的倒退。工会斗争、工会组织的兴旺，只不过是营业繁荣和营业活动活跃的另一面，反之同样，营业危机的后果就是工会组织成员数量减少，工会斗争出现间歇。

不过，在工会被迫耐心等待的情况下，工商业仲裁法庭选举给它们提供了机会教训企业主阶级，使企业主阶级看到，德国工人阶级经过艰苦努力现在确信，今天只有一个政党准备着并且能够毫无保留地去维护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由于一系列敌视工人的规定，例如把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分别提高为 25 岁和 30 岁，女工没有选举权，法律具有完全的授权性质等等，所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内投票反对这一法律。就在该法律通过以后，同志们在各地纷纷参加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但是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一选举的意义。这种情况表明，在所有较大的工业城市中，社会民主党人提名的候选人仍然取得无可争辩的胜利。有些地方，一般在人数上无足轻重的、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公开站在社会民主党人一边；但是，在他们与敌人相勾结提出独立的名单的地方，他们则处于可悲的少数派地位。在诸如天主教的莱茵省、巴伐利亚和西里西亚那些城市和地区，多数工人在选举中一向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而赞成社会民主党人的敌人教皇至上派，并且对于我们的努力抱着公开敌视或者无动于衷的态度，恰恰在这些地区，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各个地方的企业主们都对此次选举的结果大吃一惊。令我们感到高兴的事，就是他们感到恐惧的原因：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就是说，过去无动于衷的群众被布署在阶级斗争广阔的战线，从而确保了社会民主党未来的胜利。

除了这些情况以外，**工会报刊**的情况也出色地表明，工会运

动这一整个工人运动的分支已深深地扎根于全国。1891年第三季度工会运动拥有54家机关报刊，同今天的数量相同；但是1891年只有24种周报，如今则有29种，这表明工会运动内部的巩固。工会报刊的出版情况如下：

	1891	1892	1893
每周3次	1	1	1
每周2次		—	
每周1次	24	28	29
每月3次	3	3	2
每半月1次	22	20	18
每月1次	4	3	4

尽管由于结社和治安规定方面的原因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在形式上是严格分开的。但是，鉴于国内的历史发展，鉴于遭到同样的迫害和警方的刁难，同时鉴于我们党的强大，德国党的运动和工会运动已经成为两个意义相等的概念，在数量上微不足道的所谓希尔施—敦克尔分子是个例外，然而这个例外正在彻底消失。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追求着相同的最终目标，两个运动具有相同的思想，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组织方面和报刊方面都是这样。

* * *

政治生活表面上比较活跃。社会民主党各种党报的情况再好不过地表明，自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来，我党的形势十分稳定。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并不像剥削者统治阶级所断言和期望的那样，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一个内部团结的政党赢得了斗争基础和武器，就拥护者的数量来说，党应该掌握这些武器。1891年第三季度党的政治报刊拥有68种，今天已达72种，计：

	1891	1892	1893
每周 6 次	27	32	33
每周 3 次	23	20	24
每周 2 次	7	6	4
每周 1 次	10	12	11
每半月 1 次	1	—	—

此外，还有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一种学术周刊《新时代》，两种半月一期的社会主义幽默画报，和在汉堡出版的一种文艺性周报《新世界》，这是党报的一个星期日附刊，发行量很大。

如果说数字上的增加尚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每天**出版的党报增加了 6 种和除此之外各种报纸的订户数以千计地增加则不可辩驳地证明，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它对德国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党的报刊不断批评所有政治事件和经济活动，党的报刊和大量著作论述政治上、经济上受压迫和不能自主的根源，此外，主要还有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和邦议会议员的**议会活动**以及各地方领导机关党员同志的活动，经常给我们党输送新的追随者，经常促使更多的群众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使他们冲破冷淡主义这一敌人政治势力的堡垒。

揭露具有军国主义性质的那些虐待士兵的行为；揭露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严厉谴责按照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法则去指导国有工厂，那里工资低微，那里存在着令人屈辱的依附和对下级职工的压迫；控诉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劳工保护法得不到充分的实施，视察员的数量微小，他们缺少行政权力并且对那些亲企业主的管理官员无能为力；要求修改和认真改造所谓的**社会改革法**——医疗储蓄保险、事故保险、残疾保险和养老保险——所有这些控诉的

矛头一齐指向今天的统治制度，通过数十万份议会报告和报纸报道而深入到我们那些其他方式的宣传所无法接近的阶层，这些都证明是传播我们思想的最有效的鼓动演说。除此之外，我们的议员也没有忽视提出各种议案，如取消一切压榨广大人民群众的粮食关税，要求实行民军制度，讨论去冬遍及全国的贫困状态等。通过这些议案，他们从帝国国会这个到处都可以听到的讲坛证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从极左翼到极右翼，既无能力，又不准备认真消除当今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这些资产阶级政党为了大大小小企业主剥削者的利益，正一致努力去维护和加强他们的阶级国家现存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心安理得地而且毫不夸张地确证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逐渐在全国超出了党的范围并纳入一个不可遏制的**群众运动**的轨道，这个群众运动使得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种关系都具有阶级斗争的精神。

近两年，凡是在举行政治代表机构的选举时，党就有机会以自己的力量同敌人的力量较量，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按财产划分等级制度或者间接选举人制度使得参加个别邦议会选举往往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时常几乎不可能，但我们党在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仍从 15 000 张增加到 34 000 张，所获得的议席从 7 个增加到 11 个。我们的同志由于选举获胜，也进入了**阿尔滕堡、罗伊斯、哥达、迈宁和巴登**的地方议会，就在几周前我党在**巴伐利亚**也终于成功地以压倒多数赢得了邦议会 5 个议席。正是在巴伐利亚，这个卑鄙的间接选举制度竟然使我们在诸如纽伦堡和慕尼黑等选区被赶出了各级代表机构，而在这些地方，我们党历年来均获得了多数选票。所有这些选举的胜利之所以意义更加重大，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更加可贵，原因就在于，所有

这些胜利都是在同敌人毫无妥协，依靠党自己的力量丝毫没有放弃我们的纲领的情况下取得的。

* * *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893 年 6 月 15 日帝国国会选举中强有力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已不可抗拒地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下根。众所周知，由于军事法案被否决，政府解散了国会。在帝国国会里，我们的代表进行斗争不是单纯着眼于赋税重负的增加，而是根本反对军国主义——资本主义所绝对必要的补充，因此，我们党进行竞选也不单纯是为了反对军事法案，而是根本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并且首先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性的基本要求。在德国政党形势发展的条件下，我们方面不再可能有其他的竞选；如果我们的同志忽视这种原则上的对立，不去强调这种原则上的对立，那么敌人就会提出来，就会指责我们党怯懦和虚伪。恰恰是最近这次竞选，因为格外鲜明地强调了社会民主党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间这种原则上的敌对而表现突出。国会解散前几周，在整个德国，敌人串通一气取胜的呼声甚嚣尘上。教皇至上派和新教徒，容克地主和工厂主，行会分子和维护国家的社会改革派，他们一致认为，社会民主党经过数天对所谓未来国家的辩论，在帝国国会内从学术上已被战胜，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敌人数百万份竞选传单一再转载那几次辩论的摘要，从而使得这一对抗本身变成了竞选口号，当然，同在帝国国会一样，在竞选中敌人也没有好下场。

我们相信，把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为说明 1890 年选举情况而陈述的那些地方和数字再次列举于此，同时把今年获得的票数一并列出以作比较，就会更清晰更公正地说明我国运动的面貌，并通过选举结果反映出我们的运动。在德国几个最大

的城市我们获得选票的情况：

地 点	1878	1890	1893
柏林	51 164	126 317	151 122
汉堡	29 629	67 303	70 552
布勒斯劳	13 065	21 555	26 205
慕尼黑	5 249	28 218	29 907
德累斯顿	17 303	25 079	29 455
莱比锡	5 822	12 921	11 784
科伦	2 189	10 646	12 093
马格德堡	6 253	17 261	16 633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4 080	12 663	13 482
科尼斯堡	1 108	12 370	10 964
汉诺威	6 588	15 789	19 538
斯图加特	4 136	10 446	13 340
不来梅	6 304	14 843	14 572
杜塞尔多夫	486	8 228	9 367
纽伦堡	10 162	17 045	18 015
但泽	114	3 525	4 265
亚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	141	4 773	5 206
开姆尼茨	9 899	24 641	23 296
爱北斐特-巴门	11 325	18 473	19 005
阿尔托纳	11 662	19 533	20 448
施特廷	914	7 759	9 586
亚琛	909	1 744	3 029
格累费尔德	467	3 030	3 730
不伦瑞克	7 876	13 621	15 470
哈雷	1 046	12 808	12 991
卢卑克	1 588	6 393	7 339

在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处于所谓小戒严状态的那些地区，敌人方面 1890 年时的选票猛增，纯粹是对警察压迫的一个抗议，根本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信念的一个证据。此次我们在这些地区所获得的票数（柏林、汉堡—阿尔托纳、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施特廷上面已经列出）如下：

选 区	1878	1890	1893
下巴尼姆	2 775	13 362	17 044
夏洛滕堡	4 763	19 169	31 424
波茨坦 施潘道	---	3 997	10 140
哈尔堡	1 763	6 860	9 055
奥滕曾 品内贝格	5 452	10 820	13 097
劳恩堡	347	2 072	3 287
莱比锡（农村）	11 253	30 127	33 349
美因河畔奥芬巴赫	5 557	10 343	11 063
施普伦贝格	1 242	5 610	6 542

上面列举的这些地区全部是工业中心，由于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这些地区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近几次选举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纯农业区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给敌人的心脏插上了一支箭，这些选举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所谓“工人之友”的那些令人陶醉的博爱空话，没能阻止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工业雇佣奴隶当中胜利进军；同样，农业无产者那种所谓反集体主义的农民头脑也没有拒绝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在勃兰登堡省（柏林除外）社会民主党得票数为：

	1878	1890	1893
波茨坦行政专区	9 975	54 192	87 280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行政专区	5 034	29 139	41 326
	15 009	83 331	128 606

在普鲁士的时代——波希米亚省，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按各个选区排列）如下：

	1881	1884	1887	1890	1893
安克拉姆—德明	—	—	—	—	577
乌泽多姆—沃林	—	—	—	1 730	2 631
兰多—格赖芬哈根	159	770	3 786	8 422	10 508
施特廷市	910	1 139	4 276	7 759	9 586
施塔加特—比利斯	—	—	18	763	2 331
埃加特—累根瓦尔德	—	—	—	84	352
格赖芬贝格—卡明	—	—	—	—	1 125
施托尔普—劳恩堡	—	—	—	148	903
比托—施拉韦	—	—	—	—	652
科尔贝格—克斯林	—	—	—	227	2 626
贝尔加特—德拉姆堡	—	—	—	—	765
诺伊施特廷	—	—	—	—	10
施特腊耳宗德—吕根	—	—	—	735	2 382
格赖夫斯瓦尔德—格里门	—	—	112	763	2 860
总计	1 069	1 909	8 192	20 631	37 308

梅克伦堡是纯农业区，至今还没有宪法。1878年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地区获得2 070张选票，1890年就已经达到28 235张，而1893年达到32 220张！

在巴伐利亚王国，有职业的居民80%属于小农阶层。1878年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为22 532张，1890年为101 100张，1893年为125 952张，这些选票遍布在所有选区。亚尔萨斯—洛林无疑工业十分发达，但同时小农也有势力。几十年来，这个地区在选

举中为新教徒资本家或者教皇至上派取得不容争辩的胜利帮过忙，现在则开始逐渐转向社会民主党阵营；1878年社会民主党得141张选票，1890年得19 157张选票，而1893年得了44 885张选票，并且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

关于选举结果的正式数字统计尚未公布，但是估计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总数为180万张，不会差多少。诚然，这不是从1887年的78万张选票增加到1890年的142.7万张那样的飞跃，但是此次这样巨大的增长却也是始料未及的。过去可从外部因素（例如政府执行压制政策）找到解释的突然增长的时代，随着党的内部的巩固而告结束；现在选票的增长是从数字来表明，社会民主党已进入有机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目前我们正处于经济危机，而1890年选举则是工业高潮刚刚结束，那么所取得的成绩就更加了不起了。此外，在城市中，由于去年冬天遇到巨大的困苦（例如莱比锡或汉堡由于霍乱流行），成千上万的工人领取贫困救济，从而失去了选举权。同样，就勃兰登堡省、梅克伦堡等地农村各界来说，应考虑到，夏季我们在这些地方要失掉成千上万张选票，这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如船夫、木材筏运工、砖窑工整个夏天都不在家，或者像泥瓦匠和建筑工人整个星期都在夜幕沉沉的城市里上工，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因此选举日他们不在家也就无法投票了。然而不仅在选举日我们失去选票，更为重要得多的是，这样一来，我们党在农业地区就没有了鼓动员，带有传单和选票的极其有效的小型鼓动几乎根本搞不成。如果说尽管这样我们在纯农业区仍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那么这些进展的意义就更加重大。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用得上这句话：我们不应单纯计算选票数量，而且还要称称这些选票的分量。

实际的成就同票数是相符合的。在第一轮选举中有24名社会

民主党议员当选；在 85 个选区中，我们的候选人凡获得微小多数或较大的少数者均进入复选。不过，只是在我们党本身有足够力量的地方，我们在复选中才能赢得或保持那里的席位，这一点不言自明。敌人在各地纷纷投向政府一边，把他们自己的领袖、纲领和竞选诺言丢弃在竞选战场，这是此次竞选的特点。各地的敌人都组织成为“维护国家”分子的“反动的一帮”来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相抗衡。鉴于敌人联合起来形成这种利害联盟，我们 85 人复选除 20 人外全部丢掉也就可以理解了，几乎所有地方的复选都是所谓资产阶级那些貌似激进的自由思想党的拥护者在左右着大局。因此，根据复选的这一结果，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中的议员数增加到 44 名，而上届国会是 36 名。

* * *

虽然反社会党人法已经废除，但是，在执行“新路线”的情况下，警察迫害、由于一些其他任何党都不会因此遭到迫害的过失和事件而受到法律制裁依然如故，同旧路线时期毫无二致。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每月综述中记载了，由于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或者确切说**整个工人运动**，而在全国所判处的各种刑罚逐年数字列表如下：

	徒 刑	罚 款
1891	89 年 2 个月 13 天	18 302.30 马克
1892	117 年 零 26 天	20 532.10 马克
1893	77 年 5 个月 12 天	13 894.80 马克

1893 年执行的刑罚包括 1892 年 10 月至 1893 年 6 月。虽然数字庞大，这个表还根本不可能把各种刑罚完全统计出来；实际数字，尤其是罚款的实际数额要大大高出，还有，被判刑的同志

如果不打算让法警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拿去抵押，那么，就必须牺牲成千马克向国库交付辩护费、特别是诉讼费，这些钱是数不清的，要超出罚款总额许多倍，这里根本没有举出。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顾种种迫害仍在稳步前进。统治阶级看到，它的覆灭如同一场不可阻挡的灾难正在临近，它感到它脚下的地面每天都在塌陷；它最后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农业无产阶级已经动摇。它惊恐万状，四处寻觅救命的手段。它无论采取什么做法，结果都是自己倒霉，它锻造的用来对付我们的法律武器，结果证明利弊参半，使用这个武器的人反受其害；只有一颗希望之星还在它的头顶闪耀，这就是常备军！不过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随着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父亲和母亲教育出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儿子们，同样，随着小农阶层和小市民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随着在工农业中大资本占有的状况越来越不稳固和工商业形势越来越令人不堪忍受，这颗星也会越来越暗淡，以至熄灭。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统治日落西山之前将决不停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自己取得成就和满怀斗争的喜悦之情时，它永远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它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

苏黎世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与会各国，均就上次代表大会以来近两年的工人运动提交报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无疑写得很好；从报告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我们那里的工人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且同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等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完全是荣辱与共。

因为我知道，我也是在为无产阶级战胜剥削和压迫而斗争，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最终取得胜利而斗争，所以，尽管我对形势和对一些人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我仍不揣冒昧从我这方面就在我的观察中所反映的德国工人运动作一报告。凡是社会民主党报告中肯定已经非常充分地写到的具体情况和意义不大的细节，以及那些令人感到疲倦的数字统计表，我尽可以放在一边不谈。

在国外，人们常常乐于从一个实际上强大的并且发挥着比旧的资产阶级政党更为巨大的吸引力的社会民主党的存在得出结论说，德国工人运动的进展非同凡响。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应当首先考虑到，我们这里的政治生活还非常年幼，非常不成熟，党的每一项新的教育之所以有希望在那些不满意者（那么谁不是不满者呢？）当中取得成就，原因就在于，大家不再相信旧政党的那些许诺，或者是这些旧政党所能拿出来的东西显得不够。例如，反犹太主义党去年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它可以把尚未接受启蒙教育

的群众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它的吸引力堪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一番较量。尽管论据幼稚，反犹太主义本身也不失为一种新产品，何况其代表人物还向群众漫天许愿。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许愿，一会儿是改革，一会儿是黄金时代，然而它只知开展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及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彻底的原则性启发教育，而后号召人们采取行动，它几乎完全没有打破这套陈规的能力了。追随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依赖的是画饼充饥，而且党的领导人还在人为地去培养这种依赖性。

被一向眼睛朝上的迷信的党员群众极端神化了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很会阻止和约束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把它纳入议会制度的航道，使它变得极其浅薄平庸。

在我们这里，群众几乎只是在选举时才有所行动；社会民主党差不多忌讳大的经济行动。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举一动都是战战兢兢，担心冒遭受牺牲的风险和遭到失败。群众把社会民主党人请出来，但是他们却害怕群众，因此用铁的纪律来控制群众；现在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革命热情爆发出来。他们或许本来就十分相信，党必然变得更大些，新的群众必然会涌来，而忍无可忍的无产阶级还得长时间地忍耐下去；为了不致流血，无产阶级就仍然不许行动。

一个党从一开始便自视为未成年人的主宰，并且从不考虑，每一个追随者都明白要热情而又冷静清醒地思考，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和在具体时刻要做些什么，这样的党有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所运用的策略则几乎根本不可思议。人们担心达不到某一个目标，于是就更加迅速、更加有力地向这个目标冲击，要么是推倒一切障碍，要么是同归于尽。可是我们的

情况却颠倒过来了：社会民主党害怕前进得太快，所以就不慌不忙、慢慢腾腾。它打击那些最优秀的拥护者；动摇那些无主见者对迅速取胜的信念，从而使这些人变得更加没有主见；对那些新争取到的拥护者，既不去教育他们掌握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也不想方设法使他们做好准备为自由的新社会独立地进行斗争，他们是拖住党的后腿的可怕的累赘，正在把党引向议会合作和妥协的泥潭。

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没有勇气进行实际的斗争，对我们的最终目标也没有热情。人们反而陶醉于虚假的成就，陶醉于一切可能有的选举的胜利，这些胜利同消灭私有制，同结束剥削，同自由和正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现在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些人，昨天选的是德意志自由思想党人，而明天说不定就会选反犹太主义者。不满者是些什么人呢，是经济上受压的小市民，他们没有任何主见，也无能力采取自己的行动、独立地奋起，在举行秘密选举他们不担什么风险时，他们时刻准备哪个党叫得最响就投那个的票。社会民主党自从变成议会党以来主要指望的就是这些分子，所以它必定也要善于百般蛊惑人心，必然更多地反对各种各样政治上的不公正，主要反对间接税，相比之下，对于建立在受国家保护的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压迫却反对得不够。

在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党内，强烈而坚决地反对放慢速度、反对纯改革策略的呼声很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上次召开的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以后不过几个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正式审判了反对派，这是在党的执行委员会推动下干的，把完全赞同在柏林散发的一份反对党的现行策略的传单上那些思想的大会代表

们全部**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像爱尔福特那里如此不光彩的审判异教徒法庭还从来没有过。持有和党的执行委员会不同意见的人解释说：这个或那个应该是党的策略，应该做这做那，自然这一切说的时候声调是尖锐的，然而却由此罗织出崭新的罪名：**诽谤党**。难道一个党是能够被诽谤得了的吗？不可能。这一点连党的执行委员会法庭顾问们也看到了，于是撰写起诉书的奥艾尔只好公开**伪造**传单的正文，以证明个别人进行了诽谤，同时通过补充一些伪造的言论把泛泛而谈的谴责描述成针对某些人的。要知道当时反对派的力量已经相当强而且十分危险，所以不得不采取公开的和永远也不可否认的扯谎手段！

当时挺身而出打算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一番改革并给它注入新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努力仅此而已）的那些人是真诚的、经过考验的，他们多年在社会民主党内工作、斗争和受苦受难。当他们敢于持有与党的执行委员会不同的意见时，一下子把这些全忘掉了。最糟的是这种自上而下流进群众中间去的极其卑鄙的猜疑的毒汁。凡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当时都被称作是密探和警察特务、流氓和叛徒，无一幸免。

然而提出忠告的反对派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一点在过去的两年中表现得再充分不过了。

在德国出版了一种由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民主党人写的历书，叫做《新世界历书》。同所有其他历书一样，前面有全部天主教圣徒的名字，明年大概就要附上社会民主党的圣徒，目标坚定的同志或许真的会按他们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呢。接着是对1892年5月至1893年5月发生的事件的回顾。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进展的部分开头是这样写的：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过去这段时间是精力充沛地前进的一

年。鼓动工作在稳步地、不断地开展，在农村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在阿尔滕堡、罗伊斯、哥达和麦宁根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各有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在柏林市议会复选中，我们的选票迅速增加。在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中，我们全线获胜。12月16日斯图加特市民委员会14名委员中，社会民主党人有2名当选。在1893年5月3日多特蒙德的补选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特耳克得到的选票比1890年增加差不多1/2。”

无足挂齿的幼稚把戏在社会民主党看来都是无比重要的。相反，若是真的由于一时冲动和没有人命令而在工人中间发生点闻所未闻的大事，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会勃然大怒，因为个人的以及群众的任何独立自主行为都是违反纲领的。

1892年2月，柏林大部分工人证明了，他们同有学问的、会算计的社会民主党有点不同。失业，尤其是建筑业失业现象严重，困难巨大。社会民主党试图以提出紧急法案、派代表团和请愿来解决问题，自然毫无结果。此外，它仍然善于利用失业进行鼓动。不过，说到这里也就足够了。失业工人只能充当感人的点缀品，用以装点人民领袖们辉煌的演说，他们必须闭上嘴巴，勒紧饥肠辘辘的肚皮。然而却令人吃惊地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失业的建筑手工工人集会开完之后，爆发了一场饥饿暴动，起初带有一种危险性，继续了数日。本能驱使着成千的无产者来到普鲁士国王的王宫前。国王在前一天曾向勃兰登堡马尔克的王公贵族们发表演说，其登峰造极之处是要求那些牢骚满腹和心怀不满的人离开德意志祖国去流浪！拥挤在皇宫前的一群群工人的这种做法想要说明什么呢？尽管天寒地冻，许多人真的穿着破烂不堪的拖鞋，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靴子，衣衫褴褛，没有帽子。或许他们想请求皇上发给他们旅费去美洲吧？种种眷恋的纽带肯定不会把他们滞留

在勃兰登堡邦的。也许他们想向皇上证明，假如所有有理由心怀不满的人都要出走的话，那么他虽然不是没有国土的国王但却会成为无臣民的国王了？无论如何，成群结队的人涌到这里来，既为了进行示威，也为了鼓起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因为他们是齐心协力的。群情激奋到了何等地步，下面的事便是最好的证明：夜间，各个城区成群的人走过街头，沿街的售货店被一抢而光。

这样的骚乱无须过高估价。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这样做搞不出什么名堂。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为此感到高兴；我们感到与之休戚相关，我们愿望，资产阶级真的重视柏林的失业现象。最主要的是，失业工人聚集起来表明了他们的贫困，并表示他们不愿再长期忍受下去。在这些天里，他们起码是革命的无产者。

那么社会民主党又怎样呢？它的所作所为还从未像这次那样卑鄙无耻。第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根本就置若罔闻，并且声称，整个骚乱纯属资产阶级报刊的捏造；可是当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并且出现抢劫再也无法否认时，《前进报》及其主编李卜克内西用一句老话大骂失业的暴动者，说他们是流氓无产阶级，不是工人，《前进报》就是这样写的。于是便开始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堪入耳的侮辱和谩骂，就像一个不知所措的老太婆对待妨碍她的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们一样，什么戴绿帽子的、无赖等等，那些闹事的人就被扣上了诸如此类的帽子。究竟为什么呢？因为社会民主党已经有了议会活动的的能力，不能再毫不犹豫地声援热情和群众本能的任何发泄，因为失业工人独立自主的行动根本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温和的策略。社会民主党有3条路可走：要么客观地报道，既不表示同情也不表示反对；要么完全而且多少是理直气壮地站到失业者一边，因为失业者对整个现存制度在大声疾呼而又明确地发出令人畏惧的控诉；再不就是

对这些被推上绝望的无产阶级，像使徒彼得对他的主所说的那样：“我不认识这个人。”社会民主党采取的是最后一个做法，并且同时有一号《前进报》警告柏林工人要冷静从事，这一号报纸大量散发了。社会民主党人称这一切为外交手段，可我却说这是卑鄙！

德国社会民主党阻挠每一个令人钦佩的、真正独立自主的行动，或者阻止不了就加以诽谤，它以此作为自己的一个任务，在其他一些事件中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清楚。

我们首先来谈“五一”吧。各国无产者都赞成在这一天停止工作来作为国际工人阶级一致的示威行动，以此来庆祝“五一”这个无产者的节日。促使五一节产生的最初的原因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已逐渐退居次要，所有工人在同一天拒绝上工这件事本身就有许多极好的激发革命情绪的因素，所以“五一”的思想只能是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奥地利无产阶级首先证明，通过停止工作可以非常出色地庆祝“五一”。然而那里的经济形势决不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有利。有人挑剔说，奥地利人主要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游行示威的，这使得他们有采取这种行动的力量。可我们是有普选权的，是不是这就使我们的力量削弱了呢？

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上次在柏林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终于确定了，通过晚上举行集会而不是拒绝上工来庆祝“五一”。

为什么在奥地利可以做到的事，在德国就办不到呢？倍倍尔说：越是大党就越要谨慎从事，以免遭受失败。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应该是一年比一年更勇敢，群众的冲击应该更有威力、更有热情。不过，我们同奥地利最大的区别就是：奥地利人还必须争取政治自由，而我们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合乎逻辑的结论

应该是：我们要更为有力地开展经济解放运动。但是社会民主党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忙于种种琐事，绝口不谈最终目标，不谈消灭私有制。为此不许搞示威游行，否则无产者就会很容易不习惯于议会活动。因此在德国，“五一”看来最终就要流于空谈。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大规模总罢工所采取的也是相应的态度。1892年底，萨尔矿区爆发一场煤矿工人大罢工，随即蔓延到了鲁尔区。对于资产阶级敌人来说，造反的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码事：在帝国国会里资产阶级也把谴责的矛头指向社会民主党，这不足为奇。社会民主党则极为恼火地否认任何这类共同之处，他们说，罢工工人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选民，而是教皇至上派，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萨克森矿工就一直很平静。好一个保障平静的社会民主党！于是当然就要说：“亲爱的祖国，愿你平平静静！”在我看来，虔诚的天主教工人虽然平时仍然相信彼岸，这次却同自己尘世间的剥削者吵翻了。社会民主党竟然否定他们，这真是耻辱！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它预见到，现在正值经济危机，罢工会失败吗？不错，可是如果工人不采取有力的行动去改善经济状况，经济状况究竟怎样才能好起来呢？

严肃的社会主义者绝对不会相信，无产阶级的解放通过参加议会活动就能获得，即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也不真信这个。这些人分成两大类，一类人根本不再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通过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冲击，社会主义即可获得胜利；他们是纯改革派，如福尔马尔先生便是，他们至多出于旧习惯而有时使用革命的言辞，然而在他们口中这只不过是一种空话而已。另一些人现在还是摇摆不定。他们仍然愿意相信革命，但他们又不采取革命的做法。在内部，他们为自己的策略辩护说，我们在议会中提出的法律草案根本不会被通过，它只是为了把广大群众争取到我们

一边来。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许诺才赢得人心。

但是，有时在议会中宣布的东西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提案搞成了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样子。

我们有过这样一种耶稣会士的策略吗？但是耶稣会士还从来没有完成过什么革命。

如果我们所孜孜以求的胜利应该是进步和自由与正义的胜利，那么，我们就只能用无限制的真理，只能用真理去斗争才行。

丢掉一切妥协！为了革命的目标，采取革命的办法！

但是在最近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却截然不同。在国外，大概人们常常对此次选举运动有着一种完全虚假的印象。

180万张选票——这听起来是令人鼓舞的，尽管社会民主党人预期的远比这高。不过取得这些成绩用的是什么手段呢？绝对不是通过宣传社会主义！只是通过反对军事法案和反对赋税的重压！社会民主党大多数选民同其他反对党选民的不同之处，既不在于他们的思想，也不在于他们的意图。其他反对党的选民拥护的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进行改革，他们比社会党人截然不同是比后者更诚实。

就连反对军事法案的斗争也绝不是反对军国主义本身的一个原则斗争。有些传单和党的执行委员会公告就明文写着：社会民主党人不赞成削弱我国的军事，一旦国家受到攻击他们也准备参加战斗（似乎打起仗来还能把自卫者和侵略者分清！），他们只是争取减轻负担。因此社会民主党拥护民军体制，好像民军体制照样可以被资产阶级使用这一点，在瑞士和美国还没得到过证实似的。

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成绩平平，是恶劣透顶的虚假成绩，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为之陶醉。坚定的革命拥护者不会因为这些

无原则的鼓动就被争取过去。

只有通过真理的热情语言，通过有关现存社会及其基础的彻底的启发教育，通过和流传至今的关于国家、权利、习俗、道德等传统概念彻底决裂，才能把这些拥护者争取过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归根结底，只有通过不倦地传播无国家的和不加强制的社会主义自由思想，通过不倦地传播可用一个词“自由”来概括的造反观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斗争的，今后也将坚定不移地这样斗争下去，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者不畏惧来自一个党的辱骂和诬蔑，这个党事实上有充分理由通过这些手段打算把其他较比自由的派别置于死地。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英勇无畏的行为才能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只有在建立没有统治、没有民主原则、没有任何高高在上手握决定权的人物或领袖们的发号施令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对此我们满怀信心。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思想必将战胜一切敌人和一切假朋友！

自由万岁！

G. L. ①

① G. L. 即古斯塔夫·兰道尔 (Gustav Landauer)，是德国“青年派”的代表人物。

澳大利亚社会民主联盟的报告

同志们：

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党仍处于幼年时期。尽管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开明、有组织 and 数量上占优势，但澳大利亚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是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最晚的国家。除了 1882 年几个意大利和法国的流亡者曾试图在悉尼成立已解散的“国际”的支部外，1885 年以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的宣传工作没有取得多大成就。澳大利亚直到那时还是“工人的乐园”，还没有感到需要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我相信，只是到了 1887 年才在阿德莱德和墨尔本分别成立了“南澳德意志总同盟”和“前进”同盟（这两个团体的会员都是德国人）。继他们之后，1889 年在悉尼成立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同盟”，该组织夸耀说，它成立 3 年以来，在整个新南威尔士共有 15 个支部和 9 000 名盟员。接着成立了维多利亚社会民主同盟和昆士兰社会民主联盟。

乔治分子掀起的在大陆南部土地国有化运动大大地帮助了我们的学说在这里的传播和被人接受。许多著名的“单一税倡导者”，或亨利·乔治的追随者，经过争论和犹豫之后无可争辩地和毫不踌躇地得出结论说，既然私人占有土地是一种掠夺，那么个人占有其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是一种掠夺。于是，他们终于转入了我们的阵营。几次大罢工的失败使得许多工联主义

者加入我们的行列。最近3年中，最成功的宣传工作是由分布在大多数城镇及本大陆的采矿和牧畜中心的社会主义会友们进行的。他们宣传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挫败了某些损害工人利益的资本家的计谋，领导了几次罢工。他们已有一些殉道者和一小段可夸耀的光荣历史。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够了：领导有名的布洛肯希尔罢工的人是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同盟地方支部的领导人。

目前澳大利亚的公开承认的和积极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难以与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相比。但是，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工人是无意识的社会主义者，民众的个人主义思想愈来愈少，立法倾向有利于社会主义。不断加剧的工业萧条和失业，以及最近发生的银行倒闭和欺骗事件，增强了上述精神和倾向。人们到处纷纷要求国家帮助、成立国家银行和对私营企业进行监督。土地国有化、政府开矿、建立国营或市营工厂等，纷纷要求取消那些明显敌视改革的机构。群众举行集会，要求把失业者安置在公有土地上，要求创办像行政长官、主教和保守党的其他著名人士所领导或提倡的合作农场。这种群众集会在各大城市屡见不鲜，具有深远的意义。

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者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在某些地方这里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堕落成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危险。至于斗争方法问题，他们大都是“合法主义者”，讨厌使用暴力，尽管不乏红色革命分子。他们相信组织的作用和议会活动。

上面提到的5个社会主义组织中的4个组织的代表于去年12月26—28日在悉尼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把澳大利亚的一切社会主义团体联合成“澳大利亚社会民主联盟”，接受共同纲领和准备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参加本届和将来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尽管澳大利亚的资产阶级报刊用“沉默的阴谋”来反对我们的这一举动，但是这个事实在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上将是不可磨灭的。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工人才第一次承认了工人问题和国际主义，并宣称愿意和整个文明世界从事艰苦劳动的伙伴一起为共同事业奋斗。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已在同雇主进行艰苦的斗争。我们的南方同志们要做的事只是按照我们的理论去教育他们，把他们现有的组织改造成纯粹的社会主义组织。

现在我简要叙述一下“澳大利亚工会”的地位和力量以及导致它成立的事件。

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多数人已听说过关于澳大利亚庞大的工人组织即“工联”的情况，听说过关于它们的会员工资高、工作时间短和其他通过“工联”派到澳大利亚苦工中的代理人而得到保证的利益。你们知道，世界把目前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归功于澳大利亚“工联”；你们知道，是它们的黄金帮助具有历史意义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赢得了胜利。有一段时间工联在澳大利亚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能够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资本家。但是这种状况注定不会长久。资本家仿照其对手的模样，已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决定不再听任别人支配。借口是容易找到的。船主依靠其他资本家组织的支持，拒绝承认他们的船员的结社权利，用立即解雇来威胁船员。这是一个涉及雇员的尊严和自由的原则问题。船员勇敢地离开了工作。坚决支持船员的水手也罢工了。接着司炉工、装料工、装卸工、码头工人、搬运工等举行了罢工。于是1890年的海运大罢工开始了，中途又受到剪羊毛工人的罢工的鼓舞，持续了整整4个月，几乎使澳大利亚的贸易陷于瘫痪。这

次罢工以工联主义者的大失败而告终。几千名工联主义者至今都感受到那次失败的可怕后果。

有组织的工人暂时消沉了。说也奇怪，他们被工人压垮了，被那些流浪工人压垮了。排外的工联主义者使流浪工人沮丧和孤立无援，从而把他们投入不择手段的资本家的怀抱中，充当杀害工人兄弟的雇佣凶手！几个月以后，昆士兰的工人试图抬起头来。在澳大利亚的中部的银矿产地，工人又作了一次尝试。但是这两次都失败了，只不过在艰苦的劳动道路上抛下一些新的牺牲者，使挣工资的人的情况变得更坏。有人说，澳大利亚船员、矿工和新开垦地移民的这几次失败是指挥无能的结果。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下述事实造成的：工人尽管组织起来了，但不能和有组织的资本家较量，因为他们控制着政府机器和一支失业大军。工人想从资本家手中得到公平待遇或赔偿的任何尝试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除非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斗争手段。在海员罢工期间，我们的一些同志公开提出了这个观点。他们劝说工人大胆走上政治舞台，争取把政府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样就会得到劳动群众的响应。1891年大选前夕，在新南威尔士的几个选区迅速成立了工人选举联盟。工人候选人大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获得提名，并取得了惊人的选举结果：37名工人代表被选进了共有139名议员的议会；在总计268 500张选票中工人候选人得票103 780张。

于是，“工党”在新南威尔士成立了。它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进入了议会。它在内阁派（49个议席）和反对党（50个议席）之间掌握着决定权。它的指导原则是“对让步报以支持”。它曾经使帕克斯政府倒台和促使政府实行新的财政政策。遗憾的是，在财政政策问题上党内发生了一两次争论。一些党员发誓支持新政府，显然是为了推进劳工立法。尽管他们有分歧和不怎么团结，工党议

员还是赢得了几项重要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双重投票制。由于实行这一选举改革，工人阶级将能在下届立法机构中使自己的代表增加一倍。

工党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一院制议会中的议员人数如下：

殖 民 地	议会席位总数	工党在本届议会中的席位	工党在上届议会中的席位	增加的席位	注
新南威尔士	139	37	0	37	在上届议会中工人议员还没有成立独立的政党。
维 多 利 亚	95	12	6	6	
南澳大利亚	54	13	2	11	在议会常设委员会中也有 4 名工党议员。
昆 士 兰	65	17	4	13	
新 西 兰	70	15	?	15?	还有 24 名“自由派”（执政党）议员，他们和工党结成联盟，他们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合 计	423	94	12?	82?	

从表上可以看出，几乎 1/4 的澳大利亚议员来自工人队伍，他们的观点和愿望（如果不从他们的纲领来看）多少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议会中的工人代表人数和在劳工立法问题上远远走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前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工人占选民 65% 或更多一点，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作风和偏见，与某些欧洲国家流行的习惯相反，他们的政府在选

举中不施加任何不正当的影响。因此，我可以有根据地说，澳大利亚这个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国家，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人们现在正努力争取实现的劳苦阶级的解放的国家。

1893年8月8日于苏黎世。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澳大利亚
社会主义者代表

弗朗西斯·苏沙

关于比利时工人党和比利时 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

争取普选权的斗争

自从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比利时工人党的活动，主要是争取实现年满 21 岁的全体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多年来，授予普选权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积极宣传的主题。

与工人党一起诞生的选举改革，是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的推动下向议会提出来的。这个改革只是在一次罢工的压力下才得到了解决。这次罢工把通过在全国的一切重要中心和乡村举行的报告会和群众集会而长期受到教育的 20 多万人卷入了上述运动；在罢工过程中全国各地散发了成百万份宣言、小册子和报纸；在城市里举行了有 2 万人和 10 万人参加并通过工业区的示威游行；还举行了好几次政治性罢工；在根特、阿洛斯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以及其他 20 个地方，举行了一次民众意见磋商（公民投票）。

凡是年满 25 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的原则，今天已经成为事实，但是，这个原则只是在进行了积极活动和去年 4 月罢工之后才争取到的。恐惧动摇了议会的惰性并结束了它的长期反抗。

选举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使充分的普选权得到实现。因此，工人党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新的选举制度，即复选制，因为这种

制度没有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

选举权的争得使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在罢工之后，全体战士都成了压迫的对象，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判处了巨额罚款和长期监禁。

总罢工的结果

就结果来说，罢工使工人阶级更加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罢工向工人阶级灌输了团结精神。这一点的证明是，成立了新的工会组织，我们旧有的一些小组扩大了，有相当多的人入党，佛尔维耶的手工织布工人两个多月来都在为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额而斗争。

女工的觉悟空前提高，她们意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正准备献身于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 and 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新战斗。人们越来越懂得成功的秘诀在于组织。这是我们的政治斗争的最有特色的结果。

社会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肯定无疑的。8年来在宣传过程中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滋长；这些种子已经长出了茁壮、坚强的幼芽，它们在长得根深叶茂之后，将把资本主义制度窒息。

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既对我们的敌人，也对劳动者阶级内部有巨大影响；政府、立法机构和评议会都受到党的道义力量的影响；资产阶级报刊经常议论我们的组织和我们信得过的人，这

是我们的组织和我们信得过的人具有真正的重要性的证明；军队这根资本主义的支柱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其证据是，在兵营周围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士兵小组，以及在总罢工期间被陡然地镇压下去的造反行动；大学教育正向新学说发展；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团体纷纷成立。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在产业和劳动委员会以及劳资调解委员会的工人代表的选举中，他们通常全都以压倒优势获胜；一些与党建立了联系的行业的全国联合会最终成立——这些行业是：冶金工人，林业工人，烟草工人，油漆工人，车厢装配制造工人，碎石工人，制鞋工人；另外还有3个同样与党建立了联系的联盟，它们是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和前大学生联盟，互助协会，社会主义者音乐、合唱和戏剧协会；自从1891年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与党建立联系的团体约有100个。我们的《人民、前进、进步之家》的繁荣昌盛与日俱增，其中有些单位已拥有将近10 000名成员，在这些地方每天消耗的面包大约有15 000个。

各党派的改组

敌视，长期敌视扩大选举权的各政党，企图从扩大选举权中获利，竟侈谈选举。斗争是激烈的。作为地产保护人的教权派保守主义，代表金融界和大工业的理权派保守主义，依靠小资产阶级的进步主义，将进行竞争。工人党挺立在它们面前。在所有这些党派中，为了未来的斗争而进行改组的问题已提上日程，并且正在实现之中。

工人党的组织

工人党不等新选举制度诞生就认真组织起来了。

在党的支持下，全国已分为若干自然区和工业区。各地区的大部分无产者已组成小组，然后联合为地区联盟，这些地区联盟同时也是政治、工会、合作和互助组织。

工会（总共约有 200 个）主要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劳动者的利益而成立的；由积极分子管理的并以“人民之家”著称的合作社，保证着我们的运动的活力和连续性；成百的政治小组、学习和宣传小组负责研究市镇政策，宣传社会主义原则，传播党和工人组织的报纸的工作；互助会、医疗服务、救济基金用直接利益来吸引劳动者，并使他们做好加入我们的其他组织的准备。

这就是比利时工人党的组织结构。

音乐、合唱、戏剧艺术、击剑和体操团体、青年近卫军（它的使命是通过散发宣言、小册子，散发《新兵》和《士兵》这两种专门报纸，在军队中宣传社会主义）等机构是对我们的组织的补充。

最后，还有 7 个全国性行业联合会，其中一部分已经签订国际协定，其余的也全都打算这样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一切和党建立了联系的工会都必须分别加入它们的联合会。

所有这些组织都赞成赢得政权，以便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比利时工人党已完全形成了，它只需要时间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任何利益都会受到保护，任何需要，不管是物质方面的需要还是思想、精神方面的需要，都将得到一个防御性或进攻性机结

的答复。

工人代表大会

自从上一次，即 1891 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在我国组织精神的发扬已得到新的证明：召开了 9 次各行业全国代表大会，5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5 次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其他地区性或全国性会议，3 次国际代表大会：矿工，大学生，制手套工人。

自由工人的联合

除了受高级僧侣、贵族和金融界操纵的弱小的天主教工人(1)组织之外，在我国还有几个虽然没有与我们党建立联系，但经常和我们并肩前进的团体，它们是：制手套工人联合会，还有排字工和印刷工协会，互助协会全国联盟和劳动骑士团，后 3 个组织全都被经常纳入党的宣传活动的范围。

总之，比利时的工人组织都是在红旗下前进。

新 纲 领

新的选举制度的诞生，促使党完善自己的纲领。将提交于明年 10 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审查的纲领草案，包括一整套政治和经济改革方案，其中有关于产业工人的专门措施，关于农业工人的其他措施。还提出了市镇改革纲领。

因此，我们的组织工作差不多已经结束。我们准备去向农民

宣讲农业社会主义，向产业工人宣讲为了斗争而组织起来，在全国各地传播将使社会主义获胜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和榜样。

工 人 报 刊

我们在比利时这个操两种语言的国家有 3 种正式机关刊物，这就是为法语区出版的《人民报》和《人民之声报》，以及为佛兰芒语区出版的《前进报》。还定期出版几种报纸——各行业的机关报：《裁缝》、《雪茄烟工人》、《林业工人》、《雇员》、《印刷业联盟》、《制手套工人》。此外，还有几家友好的报纸：《社会主义大学生》、《工人》、《社会主义者联合会》、《雇员机关报》、《比利时合作社社员》、《社会主义者》、《正义报》。

我们每年都出版廉价的年历和大量廉价小册子，因为我们认为，书面宣传是最好、最有效的宣传。

教权派的反社会主义

随着选举战和经济战的临近，天主教反动派企图用下述手段来瓦解社会主义运动：它继前几年用沉默的阴谋来扼杀我们党的存在之后，又进行了恫吓和诽谤。在看到这一策略所产生的结果只是使工人党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孚众望之后，它变换了手法。今天它力图把天主教工人网罗到所谓的“工人之家”中去，这是用教会资金修建的仿造我们的“人民之家”的冒牌货。它还用一大堆既恶毒又枯燥无味的小报来和我们的报纸对立；它用它的团体来和我们的团体相抗衡。教权派反社会主义者已被人们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拙劣模仿者”。他们正在把工人阶级中态度最冷淡的

分子组织起来；这是一项很快就会使我们受益的工作。基督教的劳动者像具有自由思想的劳动者一样，只有一面旗帜，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红旗。

五 节

由于群众在政治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在比利时，到去年为止五一节都具有特殊的性质。然而今年在各大城市和工业区都共同进行了庆祝，尽管我们在较长时期内都没有进行鼓动工作和大规模政治罢工。休假庆祝五一节的思想取得了进展。我们一致同意保留五一节游行中原有的经济性质，因为这种性质使游行产生巨大影响，并使它带有阶级斗争的特点。

全国劳动书记处

今年在根特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利时工人劳动统计书记处不久就要开始履行职能，并将同我们的外国兄弟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

妇 女 问 题

妇女问题每年都有重大进展。已经有若干妇女团体以女工工会、储金会、妇女同盟等形式组织起来了。她们有自己的专刊《妇女》。其余的出版物也是专门保护妇女的。这些组织和这些报刊大部分都同力求实现男女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平等的工人步调一致。

我们的委托书

由于同自由派进步党人结成了临时联盟，我们党在旧的、在欧洲限制最多的选举制度下，把工人代表送进了 20 多个重要的市镇和工业区的市政委员会，还把工人代表送进了两个省的委员会。

国家的经济状况

两年来法律没有使工人阶级的命运得到任何改善。某些所谓的社会法尽管业经议会表决，但仍然是一纸空文；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有效实行。

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目前也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糟糕地步：矿工的工资大幅度地降低了；在许多煤矿，矿工们一周中只劳动 4 天或 5 天；在其他产业部门，失业人数也相当可观，他们往往为了获得菲薄的、不正常的工资而争夺别人的位置。去年冬天我国已有大批失业者成群结队地穿着破衣烂衫在我们的一些大城市的商业大街、贵族聚居区和政府所在地高呼“要工作！要面包！”在根特已开始发生骚乱。今年，鉴于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工资都被大大压低，还鉴于农业歉收和某些食品将要涨价，同样，鉴于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搞的税率战争，可以预料，失业工人的运动会更加汹涌澎湃。很可能，在下一个痛苦的冬季里，我们将看到由饥饿引起的新的骚动！

罢 工

统计证实我们的估计：

罢工 次数	行业	原 因
1891 年 (8—12 月)。——6 次罢工		
2	冶金工人	1 次是由于降低工资。 - 1 次是因 车间条例
3	手工织布工人	2 次由于降低工资。 - 1 次因工头 的行为
1	煤炭工人	1 次要求增加工资
1892 年。——72 次罢工		
33	煤炭工人和矿工	38 次由于降低工资，有时降低幅度达 到 30%
5	手工织布工人	20 次要求提高工资，1 次要求尊重最 低工资额
5	采石工，凿石工	3 次由于专横的条例
3	制鞋工人	
3	火柴工人	
2	军火制造工人	
2	印刷工人	
2	玻璃制造工人	
2	雪茄烟工人	
2	林业工人	

2	建筑工人	
	1893年(1月—7月20日)。——58次罢工	
22	其中有2次波及3和4个市镇的煤炭工人罢工	26次由于降低工资,12次为了增加工资,9次由于专横的条例或专横的措施
8	冶金工人	5次为了缩短劳动时间
2	军火制造工人	1次由于解雇工人
5	采石工、凿石工、加工大理石工人	1次由于工作场所不卫生 1次为了最低限度的税率
3	林业工人	
1	雪茄烟工人	
2	火柴工人	
1	油漆工	
2	煤炭业工场工人	
1	手工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继34家织布厂和纺纱厂的罢工之后还发生了10次左右小规模罢工)	
12	其他行业	

比利时罢工的原因在于为工资而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防御性的,这就是说,这个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工资的比率,防止工资下降;它不是为了获得更优惠的工资条件,而是为了保存现有的条件。

比利时不仅是一个工资低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劳动日长的国家。它的劳动日从未低于 10 小时，它往往长达 14、15 和 16 小时；平均约为 12 小时。

目前在商行的雇员和推销员中正在开展一个争取“星期日休息”的运动，它在几周之内就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可以预言，这个运动将获得成功。

如果说比利时劳动者的政治状况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关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就不能这样说了，相反，他们的经济状况在日益恶化。

怎么办？

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孜孜不倦地进行斗争！
为无产阶级的经济、精神和政治解放而奋斗！

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

报告人：塞尔维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向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首先想到和讲到的只能是向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代表们致意。保加利亚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除致以兄弟般的问候之外，它的代表还有一项崇高的使命，这就是把小国保加利亚正式引到社会主义思想发达国家的大家庭中来。

在开始叙述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目前情况之前，请允许我们在本报告中用一点篇幅来谈谈保加利亚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简史。这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目前形势以及近几年的社会政治生活。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世界各文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们日理万机，无暇研究保加利亚经济发展的历史。而且我们觉得，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向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作报告的机会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尽量简短。

这段历史开始于，西欧几乎是突然惊奇地看到，波斯普鲁斯海峡两旁患病的巨人那庞大的消化器官已不能顺利地工作了。这个病人只好放弃一些小国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只剩下保加利亚人还在期待着从穆罕默德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与此同时，起初几乎纯属军事组织的穆罕默德部落逐渐变成一个国家，于

是货币和商品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1853—1854年同俄国的战争是这一转变的顶点。在那以前，奥托曼大帝国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

土地归苏丹从而也就是归所有帕莎和官员们所有，因为苏丹把土地作为馈赠赐给了他们。保加利亚人不得不只是劳动而把收获缴给这些帕莎。留给他们的仅仅是使他们不致饿死的一点点。每一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若能找到空地，他就可以去开垦耕种。如果一块地一个人连续5年没有耕种，那他就失去了继续耕种这块地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占用耕种。^①这时期手工作坊和行会活跃起来，产品主要还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有部分出售。1853—1854年塞瓦斯托波尔一战只在下面一点上使得土耳其帝国跻身于欧洲国家的大家庭之中，即土耳其政府为满足钱款上的大量需要而颁布一项条例，要求帝国全体居民，凡愿意把所种土地作为**世袭的私有财产者**，可前往专区首府，按地块大小交付一定的款项，便可得到买地的文书。所有其他财产也都照此办理。

突然间，保加利亚民族感到自己占有了帝国田地的绝大部分。从而过去只由有钱的官员们经营的原料产品贸易，现在则由每一个人来经营了。这样土耳其帝国就向对外竞争敞开了大门。这种竞争使得土耳其帝国的生活渐渐欧化。不过，私有财产仍然是我们国家得以发展的最大的因素。经济上的任何一个哪怕是微小的变化都将引起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发生变化，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恐怕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保加利亚的情况这样更好的说明了。旧的生活基础一下子都被推翻了。土耳其政府越来越倚仗着人民的

^① 显然，每一个家庭只能耕种全家劳动力所能负担的那么多耕地。土耳其人的蹂躏政策及其绞架屠刀政策已经想到使每个家庭拥有足够的土地。

钱袋。所有人的行动都是自己独立作主！所有的人都在发财致富。教育事业兴旺起来！保加利亚人摆脱了君士坦丁堡希腊大主教的宗教束缚！同希腊人的这场精神之战逐渐变为反对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战争，而这些运动导致了由各民族虚伪的解放者俄国来解放保加利亚民族。

保加利亚的政治解放彻底激发了自货币和商品经济与私有制实行以来已经活动起来的一切社会经济力量。在土耳其人当中业已形成的资产阶级一下子掌握了政权，于是还十分年轻的资本的庆典便开始了。土耳其政府早就使我们从贵族那里解放出来，而在摆脱了这个解放者之后，资产阶级却成了独裁者。

沿巴尔干山脉一带，长期来已经发展起大规模的家庭纺织工业。土耳其政府在斯利文还建了几座毛纺工厂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我们解放后，极短的时间内工厂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每个工厂的建立都夺走了数千人的饭碗。最初几年，使用机器的工业就已表现出了它所带来的后果：繁荣的家庭工业和小工业开始百病丛生，逐渐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从前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小工业者变成了无产者，不得不去工厂做工。在斯利文、索波特、卡尔洛沃这些工业十分发达的城市，发生了反对使用机器的工业的暴动和骚乱，妇女由于挣钱的路子受到机器的威胁也参加了骚乱。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这里也同各地一样：资本主义以现代这种形式——使用机器的工业——胜利发展的势头无可阻挡。工厂在急剧增加，尤其是在兼并了东鲁梅利亚以后，那次兼并是对保加利亚人民的极其不合理的安排的结果。北保加利亚和东鲁梅利亚之间以巴尔干山脉为界，但是这里是整个保加利亚工业最发达的部分。这是人们不得不付的关税导致了兼并。保加利亚是欧洲货物运往东方的必经之地，这种地理位置也是铁路网越来越扩大的重要原

因。修筑铁路的工作几年来一直连续不断。明年即将动工修建舒姆拉—梯尔诺沃—索菲亚这条最长的铁路干线。近年来采矿业也有飞跃发展，特别是煤炭工业。最大的煤矿在佩尔尼克附近，大约一个月前已有铁路同索菲亚相通。在这种条件下，手工业者等级渐渐无产阶级化，对此恐怕可以无须提及。

这里应该再描述一下工厂工人和女工的境况。上边我们已经说过，我国年轻的资本现在正经历它的鼎盛时期。过去，保加利亚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最初几年，政府是小工商业利益的得力的代表，现在则死心踏地地、可以说全心全意地成为资本家的朋友和保护者，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者。

无论哪个资本家都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特权，例如，制作鱼罐头的特许、造纸工厂股份公司的特许、火漆制造厂的特许等等。政府不惜为工业开支颁布了种种资助工业的法律。这还不算！大笔钱款投进了资本主义这个贪得无厌的无底洞，而且是无息的，例如一个股份公司，一给就是 15 万法郎，因为该公司在加布罗沃有一座工厂失火烧毁（1889 年）。为这种事故设立了一项救援基金。光是最近 3 年，纺织厂的数目在加布罗沃由 3 家增加到 6 家，在斯利文由 12 家增加到 16 家，在特里亚夫纳新建了 3 家（纺纱厂和织布厂），在卡桑利克新建两家。在政府方面如此照顾的情况下，上述种种不足为奇。1892 年在全保加利亚有 105 家烟厂，数千名工人。但是，在这工业繁荣时期，工人却不得不每天劳动 12、14、16 甚至 20 个小时，而工资则童工为每天 20—50 生丁，女工为每天 50—60 生丁，男工为每天 1—2 法郎。由于缺少劳工保护立法，所以工厂主在工厂里俨然以专制君主自居。在加布罗沃和斯利文常有工厂主亲手殴打工人的事件发生！卫生条件要多糟有多糟，遇有工伤事故，自然无人关心受害者。所有这一

切推动着工人在最近几年参加了政治斗争。政府在改善工人的状况方面毫无作为，以至去年在菲利普波利斯召开的实业家代表大会，鉴于社会主义宣传日甚一日，竟然亲自出马要求政府调节劳资关系。

我国人民的农业状况是一言难尽的。在上述条件下，耕地进行了相当平均的分配。但是，在保加利亚获得政治解放后，便出现了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趋势。土耳其居民移居国外尤其加速了这一集中的过程。在保加利亚东北部，这个过程最为迅速。据 1888 年财政部报告，全保加利亚有 174 个农庄，每个农庄的规模有 50 个配备齐全的家庭农庄加起来那样大（每个家庭农庄约耕种 15--25 公顷土地）。^① 我们不要忘记，我国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最初几年，政府各部都曾忙于把土耳其大帕莎遗弃的农庄土地分给保加利亚农民，特别在保加利亚西部，是在卡拉维洛夫所主管的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总的来看，当时政府各部是农民和小企业的部。

至于农业工人的状况，那是再坏不过了。每年二三百法郎的工资在我们这里称得上是一笔不错的工资了。可想而知，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劳工保护立法，这一点无须重复。

多瑙河和黑海沿岸的商业同样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布尔加斯州的商业由 10 家贸易公司操纵，卢楚克州商业由 11 家贸易公司和利亚霍沃由两家贸易公司操纵等等。

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除去工厂、工人数目、商业等等这些实证的数据以外，在某些前提下，只拥有自己双手这一劳

^①从 1884 年起，农业也开始使用机器。

动力的人的数量同全体人口数量的百分比也是一个标志。据法国作家拉米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保加利亚》）统计，在 320 万保加利亚人口中约有 150 万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据官方统计，在工厂、作坊、港口、商店、农村等地劳动的工人人数计有 85.7 万人。

关于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史和目前的经济状况就讲这些。

保加利亚在政治上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也摧毁了束缚国家经济力量的锁链，并且创造了新的政治形式，虽然实际上还是有缺陷和片面的，但毕竟为发展国家经济力量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自然，由于政治形式的片面性，只是富人利用了新经济自由的一切好处。资产者资本家阶级异常迅速地形成了并且在不断成长。当然，在我们这里也同其他各国一样，这个阶级一出现，便立即伸出巨掌去抓国家治理，最后把政权完全交给一群只为资本主义金钱效力卖命的教士兼忠实的奴仆去独断专行。这个教士集团的首领便是现今保加利亚的独裁者斯塔姆布洛夫。

无产者参与我国的政治生活，只有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客认为有用和被他们利用了的情况下才得到允许。根本没有工人的组织。事情就是这样。这时个别人士开始传播工人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的思想，这是俄国社会主义书刊和西欧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影响的结果。

当然，个别人甚至成群人所作的这一切努力，假如不同时具有天然的适宜的上壤，那也只能蜕变为用心良好但却不能生存的实验。不过，正如我们刚刚叙述的那样，保加利亚虽说是欧洲最年轻的文明国家，却没有因而幸免于资本主义的分化，甚至这一分化过程来得更为迅速，因此，如所预料，在新生的无产阶级当中也存在着植根于坚实土地上的工人政党的真实的幼芽。这些唯

一有能力防御分化过程因而使国家健康的真实的幼芽现在虽然还很微小，但却在一天天，甚至一小时一小时地成长，从而使人们完全有理由确信，一支不可战胜的未来力量正稳步发展。

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是 1891 年成立的。已经存在着的社会主义小组于 1891 年 4 月在梯尔诺沃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代表大会制订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当年又在博斯鲁扎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由各小组代表通过纲领和组织章程。纲领及章程均获得通过，15 名代表中 12 人赞成。按照章程规定，社会民主党由叫作“德鲁日纳”（分部）的组织组成。1891—1892 年分部数量增加，差不多每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尽管并非全部都加入了党。

根据加布罗沃州各小组的倡议，1892 年 8 月在菲利浦波利斯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发表党的纲领和创办党报。党的机关报的名称叫《工人报》，自 1892 年 11 月出版，由尼克劳斯·加布罗夫斯基主编。《工人报》主要读者是工人，订户数量达 1 200。

主要由于党的机关报的热情宣传，我们这里在下列地方又新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组织，计：斯利文、加布罗沃、德列诺沃、旧扎戈拉、维丁、扬博尔、哈斯科沃、梯尔诺沃、菲利浦波利斯、拉斯格拉特、索菲亚等。

党决定出版一套《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作为宣传的一个措施。自 1891 年起，党已经出版了 16 种。翻译的书籍和小册子中最重要的是：奥·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盖得和拉法格的《工人党纲领》、格·普列汉诺夫的《五月一日》、拉法格的《资本的宗教》和《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等。

一个月前在梯尔诺沃召开了特别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上党决定创办一个月刊。此外党还决定参加今年 7 月 30 日的议会

选举。在现存统治制度下，党不可能希望取得什么成就。政府千方百计阻挠社会民主党人。执政党在各城市都纠集起一帮歹徒，为确保政府在选举中获胜，他们不惜纵火和谋杀。例如在旧扎戈拉就发生过两起政治谋杀案，当时报刊都确认此事。新闻法是自由地发表言论和批评时政的巨大障碍。谁要是对其某个官员提出控告，那他自己反倒要受法律的制裁，了解这一点就足够了。即使证人很多，也不允许竟敢了当地向法庭控告官员。这一切不管看起来多么荒谬，却明文规定写在新闻法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希望在选举中取得什么成就。梯尔诺沃和菲利普波利斯的社会主义者在选举前举行的集会，被警察驱散了。^①我党在选举前发表了一个宣言，在全国收到十分良好的反应。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作用，从庆祝5月1日可以明显看出。根据1889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索菲亚、菲利普波利斯、梯尔诺沃等许多城市都庆祝了这个工人的节日。

最后我们希望能够这样说：我们小国这个年轻的党必将越来越壮大，并将能够对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成就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感到幸福的是，我们的声音能同全世界的声音汇合在一起。

以解放各族人民为使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参加苏黎世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尼·加布罗夫斯基

于1893年8月

^①刚刚得到消息说，我党在加布罗沃州的候选人波斯特姆皮洛夫同志被警察驱逐出该州。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丹麦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支队伍于1871年成立，并且迅速取得了根据当时情况看是显著的发展。党的领导立即着手出版《社会主义者》周报，一年以后周报扩大为日报。内部组织是由各工会支部组成，置于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之下。

日益成长的社会民主党很快就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同样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也把它们全部的仇恨都指向了社会民主党。还在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因为警察法令而遭到禁止，可是这次禁止到一年以后才由帝国（即最高）法院判决予以确认。

国际工人协会被强行解散后，丹麦党的同志们立即又开始组织起来。“自由行业工会”纷纷建立，这些协会联合于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之下，中央领导机构由各工会的代表组成，同时这些行业工会还通过了一个符合“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的纲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在随后数年间满怀信心地稳步前进。1876年在哥本哈根召开了丹麦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此次代表大会的有75名代表，他们代表5500名工人，55个组织。

1878年我们决定取消行业协会的中央领导机构，代之以新的组织，其专门任务就是进行宣传鼓动以传播社会主义的原则，同时代替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活动，而行业协会则继续以为工人谋求工会方面的利益为己任。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是1878

年2月12日建立的，名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组成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会现有大约150个分会，约17 000名会员，即在哥本哈根及其周围地区有13个分会（主要是各选区的社会主义选民协会），约6 000名会员；各省城有50个分会，约6 000名会员；各地方行政区有87个分会约5 000名会员。

除了我们党的这一政治组织，还有工会组织，目前约有400个总计约35 000名成员。哥本哈根大约有90个工会，约20 000名会员，其他地区约有310个，约15 000名会员。在21个行业部门建立了工会联合会，在全国各地均有自己的分支机构。此外，有些行业打破民族界线组成了民族间的工会分会。

追随丹麦社会民主党的人数实际上要大于上面统计的数字，因为许多工人（尤其是农村）部分是由于贫困，部分也是由于劳动力雇主施加压力而被迫呆在我们的组织之外。

1878年工会运动与政治运动虽然分开了，但是丹麦社会民主党在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仍然继续保持着。这种联系后来具有了稳固的组织形式，因为哥本哈根的各种工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名称叫作“总工会”。各协会均由自己的执行委员代表参加总工会的会议，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参加，同样，在总工会设立的、范围较小的业务委员会中，党的中央执委会也有代表。

许多省城的地方组织也建立了卡特尔，其组织基础同哥本哈根的情况一样。

自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分开以来所召开的历届丹麦党的代表大会，参加者只是社会主义政治协会（即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分会）的代表。在此基础上，我们党于189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了第

五次代表大会，共有 104 名代表出席。

除了我们自己的党代表大会，还要召开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工人代表大会，丹麦、瑞典和挪威的所有工人协会均可派代表出席。第四次斯堪的纳维亚工人代表大会是 1892 年在马尔默（瑞典）召开的。参加此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 131 人，计丹麦 68 人，瑞典 53 人，挪威 10 人。这里必须说明，马尔默城的位置对于瑞典南部和丹麦来说十分有利，但是距离瑞典北部和挪威很远，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上述两地派代表出席大会。

除了社会党代表大会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工人代表大会之外，已经组成联合会的工会还专门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

丹麦社会民主党一方面通过口头宣传鼓动，另一方面通过报刊，努力把劳动人民团结在社会主义原则周围。目前我党出版 5 种社会主义日报和一种讽刺幽默周报。党的中央机关报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在哥本哈根出版，每天印刷 25 000 份。其他 4 种日报分别在日德兰半岛的奥胡斯、霍森斯、兰讷斯和奥尔堡出版，总印数为 6 000 份。此外，党还出版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我们党拥有 3 座协会大楼，各有一个大会议厅和若干小的场所。其中有一座在哥本哈根，价值 22 万克朗（约合 24.6 万帝国马克）。其他两座分别在省城奥胡斯和赫尔辛格，每座价值都有大约 6 万克朗（约合 6.7 万帝国马克）。党在哥本哈根还拥有一个合作社面包房，营业额约有 50 万克朗（约合 56 万帝国马克），以及在外地的许多类似的设施。

根据丹麦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它的原则和主要目标如下：

“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因此劳动的全部成果均应归劳动者享有。

在当今的社会，劳动资料（土地、工厂、机器、运输工具等

等) 被资本家占有, 这样他们就攫取了千年劳动的成果。资本家掌握劳动资料, 是政治不自由、社会不平等和民族分裂的根源, 这一切把社会的生产成员推进贫困的深渊。私人资本主义不可能造成一个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社会, 同时生产毫无计划, 从而使得巨额财富遭到破坏。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使劳动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凡不承认这一任务就是国家目的的党派, 都是社会民主党原则上的敌人。

根据上述原则, 社会民主党设法争取国家的社会权力, 以借助这一合法武器使劳动资料为人民所公有。只有把现在由私人资本家、股份公司、国家和公社所领导的生产置于人民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之下, 即通过废除现存的雇佣劳动, 劳动的成果才能按照公平合理的尺度进行分配。实行社会生产这一巨大事业的人民立法手段, 是没收劳动资料。

丹麦社会民主党主要是在一国范围内从事活动。但是它完全承认,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 社会主义需要全世界工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支持。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都必须是彻底解放所有的人, 不分性别、肤色和民族。”

此外, 我们的纲领还包括一些特殊的要求, 部分是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需要实现的。

工会运动同样也要纳入社会主义, 这一点从 1892 年在马尔默召开的全斯堪的纳维亚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下述决议中可以看出:

“工人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着共同的任务: 集合全体工人为争取充分尊重他们的天赋人权而斗争, 争取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尽可能好的经济条件和尽可能大的政治自由, 以及教育启发工人认识到社会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影响。

为最大限度地达到持续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须力争对立法施加影响，为此，它们的活动一方面要使工人在政治上同社会其他阶级权利平等，另一方面要使人民代议机构讨论研究工人的经济地位和作出立法，以保障工人免遭资本家的无情剥削。

因此，这两种组织必须随时研究那些就其性质来说对工人有意义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均须进行研究。

应该看到，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向是实现社会幸福和满足的障碍，所以代表大会声明赞同社会主义原则。”

过去的斯堪的纳维亚工人代表大会也曾通过类似的决议。

另外，工会组织还一方面通过和雇主谈判，另一方面于必要时通过罢工来设法促使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在1880—1890年的10年间，哥本哈根工会在罢工和资本家封闭工厂期间用于救济的款项总数约为70万克朗（约合78.4万帝国马克）。

丹麦社会民主党目前在帝国议会中有4名议员，即福克庭（众议院）2名，兰德斯庭（参议院）2名。我党还在哥本哈根市议会有2名议员，在省城赫尔辛格市议会有1名议员。党在农村乡镇委员会里也有代表。

在最近于1892年4月举行的下院选举中，丹麦社会民主党提出了15名候选人，共获得20 000张选票。

我们党的议会议员在议会就贯彻八小时工作日提出如下法律草案：

“第1条 无论是在手工业企业或工厂企业，无论从事农业、水利或是铺设铁路等等，无论是在商业、运输业或是在事务所，凡作为工人或帮工为他人进行劳动的、14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均

规定每日劳动时间最多为 8 小时。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在国家、乡镇或其他公共机构供职的人员。就餐和休息时间不包括在上述 8 小时之内。8 小时工作时间也适用于从事教学的人员。

有些企业因其性质而不得不昼夜开工，在这些企业中须实行分班劳动，而且每个工人（辅助工或徒工）的实际劳动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

有些企业开工要取决于变化无常的自然条件，在这些企业中劳动时间可以超出 8 小时，但每个工人一周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 48 小时。

第 2 条 第 1 条第一段规定的劳动时间，也适用于从事农业、林业或牛奶业为他人劳动的、14 岁以上的男女工人（包括辅助工和学徒工）。但是，就小型农场来说，家务劳动和与生产农产品直接有关的劳动，如耕地、播种、饲养牲畜、收获干草和粮食、把收获的产品运回和储运泥炭等均属例外。

相反，第 1 条第一段规定的劳动时间却适用于筑路、施泥灰质肥料、排水、挖掘泥炭、修渠等等。

第 3 条 货轮和客轮的船员要有足够的人数，以保证在正常气候条件下，所规定的值班时间每天（即每 24 小时内）不超过 8 小时。

第 4 条 出现不是第 1 条最后一段所提到的自然事件，或发生海难，或船只在航行途中遇有生病和死亡而无法正常工作或要求增加工作量时，在这些情况下，前述规定对于同这些事件有联系的劳动暂停生效，但是，不得超过上面列举的原因不再居于主要地位时的时间，同时也不得超过存在消除上面列举原因的可能性的时间。如果属于防止海难，或者属于保护人员或货物免遭迫在眉睫的危险，本法律的规定同样不再适用。

第 5 条 在内政部进行筹备期间，应尽早收集有关第 2 条所提到的例外情况的报告，以便据此对所列举的企业中的劳动时间可能的限度作出规定。随后，这些规定应在法律中加以确定。

有关捕鱼业的报告，应按同样的办法和本着同样的目的进行收集。

第 6 条 凡违反本法律的雇主，在本人或其代理人得知这种违法行为后，处以 20—200 克朗的罚款。同时雇主要付给每个超过规定时间为其役使的工人以 5 克朗的罚金。如再次违反并且变本加厉，则可加重惩处，直至 3 个月监禁和付给每个超过规定时间为其役使的工人以 10 克朗的罚金。”

这个法律草案业已提交上院，但遭到拒绝，没有能够进行二读。理所当然，我们的议员在帝国议会里再次提出此案，终于成功地贯彻了这一极端重要的立法措施；这个立法措施就是我们在丹麦每年举行的、有大批劳动人民参加的五一游行集会中所一再提出的要求。

今年 5 月 1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了 5 个群众大会，同样在许多省城也举行了人民集会，参加集会的人很多。在所有这些集会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

“遵照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 1889 年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大会要求，通过法律上统一规定工作日的最高限（经济先进的国家可以规定为每日 8 小时），应使人的劳动所具有的、现在同过去相比提高了的生产率有利于工人。

为论证这一要求，大会作了如下说明：

现在多数部门劳动时间长，使得工人过度劳累，健康受到损害并缩短了他们的寿命。劳动时间长增加了失业者的人数，而闲散劳力供应增加，势必造成工资降低。

与这些弊端相反，八小时工作日有以下一些好处：

八小时工作日将减少失业和由于劳动力需求增加而为提高工资创造条件。

八小时工作日将提高工人的购买力和引起生产的提高与销售的增长。

八小时工作日将使工人有休养生息以及改善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时间。

八小时工作日将保护工人的健康并促进其劳动才干和精神的提高。

此外，大会认为八小时工作日是可行的，理由如下：

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一方面在国家和地区的各行各业，同时另一方面又作为有关国家的一条普遍准则。

此外，在国外许多部门通过私人的努力也争取到了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限定工作时间为每日几个小时的原则，在几乎所有国家和绝大多数部门都是可行的，而且经验表明，凡工作时间很短的部门，通常都为工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经济条件。

最后，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国际性的。它是所有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人提出的，因此，不会对各个国家的竞争能力有任何妨害。

鉴于上述理由，大会要求政府和议会，在最近的将来实行最多 8 小时的法定工作日。”

此外，丹麦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地方代议机构，均力图通过参加立法工作和研究地方的种种事务来谋求社会民主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 * *

下面一些情况可以进一步说明以上所介绍的丹麦社会民主党

活动的情况：

丹麦的总人口约为 200 万。农业是居民的主要职业，差不多半数人口从事耕作。工业人口大约占总人口 1/4 强，其余的人则以经商、航运、捕鱼和从事其他职业为生。

国家制度是有限的君主政体。

帝国议会由两院组成，即福克庭（众议院）和兰德斯庭（参议院）。

福克庭的议员根据普选权的原则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不过有许多限制。例如，只有年满 30 岁才开始有选举权，领取地方贫民救济的人将丧失选举权等等。过去凡是领取贫民救济的人便几乎永远被剥夺了选举权。这点现在已经改变为，根据当事人的要求 5 年之后免除救济，可以重新获得选举权，这是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多方努力的结果。

福克庭的选举制度也是很不可取的。每个选区只有一个投票站，因此，选民（尤其是在农村）去投票站往往要走好多里路。选举时只要获得简单多数便可当选，因为一个选区提出的候选人有三名以上，而只选出一名议员，尽管获得的选票不足半数亦可当选。这样第一轮选举便可决定，所以不举行复选。这里也不实行什么秘密投票。投票是口头进行，就是说，自己想投票选哪个候选人，把他的名字告知记录员即可；而记录员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投票工人们的工头。

兰德斯庭的议员是通过**间接选举**选出的，而在选举中，资本家阶级有双重投票权，单单他们就可以选出半数选举人。此外，他们还有权和其他无特权的选民（即选举福克庭的选民）共同参加选出另一半选举人。

哥本哈根市议会的选举权以拥有 1 000 克朗（约合 1 200 帝国

马克)的收入为基础,因此大多数工人便被排除于参加选举之外了。

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然是困难重重,而且为了赢得所取得的成绩,就需要十分广泛的鼓动。

我们怀着在丹麦这里社会主义也必将取得胜利和资本统治必将被消灭的信念,以不可削弱的力量为我们伟大的事业努力奋斗,同时我们力求无愧于我们在强大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致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彼·克努森 J. 耶恩森

1893年8月1日于哥本哈根

所有给丹麦社会民主党的通报材料请寄:哥本哈根K. 罗马大街22号彼·克努森收。

所有工会方面的通报材料请寄:哥本哈根K. 布罗累格尔大街11号J. 耶恩森收。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报告

自从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以来，这两年的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在英国有进展，与此相较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的进步则是很不够的。由于英国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目前采取的方法不同于大陆上通行的方法，巩固不同于一切其他政党的社会主义政党，比起争取看来可能的在报刊、讲坛和街道上公开辩论的自由来要困难得多。的确可以说，现在大不列颠各地都允许的辩论完全自由，使对抗趋向缓和，而这种对抗正是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所需要的。虽然为维持在街道拐角处和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而作出的努力，使伦敦民主联盟的许多盟员遭到罚款和监禁（国内其他地方有少数盟员也遭到罚款和监禁），但是统治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及其在英国的倡导者的政策要比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统治阶级推行的政策灵活得多。大不列颠的政党领袖们不再因为人们所持的观点而把他们投入监狱，从而使他们备受折磨，而是尽量从社会主义者那里采纳一些治标的建议，以便暂时削弱后者的鼓动，同时还竭力拉拢最积极的宣传员，使他们脱离社会主义组织（不幸的是，不能说这种意图完全没有成功）。与此同时，所谓新工联主义的发展壮大，使许多善良的、认为按照旧工联的方针把熟练工人组织起来是通向无产阶级解放目标的捷径的男人和女人，不再积极拥护社会主义。这种新

工联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但远不能推进大不列颠的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新工联主义通过把争论问题搅浑的办法，通过向工人灌输只须在雇佣制度下组织起来就可以获得很大好处的思想的办法，它的确——不管它的领导人的意图多么善良——在一段时间内阻止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前进。这样说绝不过分。但是对于通过过去 12 年或 13 年艰苦卓绝的工作而形成的坚固的社会主义核心来说，1889 年至 1893 年的新工联主义会落得像约瑟夫·阿奇领导下的农业工人运动那样的下场。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对舆论的普遍影响非常令人注目。现在，不仅政界人士而商界和财界人士都把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值得考虑的思想来进行讨论。甚至许多毫不同情我们党的观点的人的公开言论中也出现了社会主义者的词汇。资产阶级报刊上的通讯，甚至文章表明，同情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以致报刊编辑居然把那些可以吸引社会主义者阅读的材料刊登在广告栏中。英国国教牧师和非国教牧师经常努力证明，社会主义中一切好的东西以及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表现出来的、他们无法否认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实际上应归功于基督教的影响和拿撒勒的耶稣的教导。这种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变成有利于流行的宗教教条的东西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承认我们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进步。某牧师和神学家比这走得更远。例如，著名的国教教徒、达勒姆的主教（甚至超过天主教主教凯特勒和德·孔德·曼的说教）连续两年在向他的教士们的“致词”中公开宣称，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词决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后一个词。

经济压力促使人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不管社会主义是否能解决现代社会目前面临的迫切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在高级财政部

门和国际贸易部门正在迅速衰落下去。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的伦敦，不仅没有从1890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且近3年来一直处在比那次同巴林家族的名字相连的危机更广泛更毁灭性的危机中。每个部门的首创精神都没有了。无论是在英国这个古老的国度，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阿根廷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殖民地，金融家和商人阶级的智囊们都没有能力以对公共有利的方式掌管现代社会的权力，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与此同时，银行的无力支付和工业的衰退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整个大不列颠的农业情况甚至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严重。我们大城市的劳动力补充基地现在小得可以说不存在了，因为这些城市劳动人民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以致这些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农村输入新鲜血液来维持为资本家剥削所必需的生力军。目前，很多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中有同情心的人越来越感到要支持那些防止人民在身体上、道德上和精神上堕落的措施。这种愿望与其说已付诸实践，不如说正在形成舆论。尽管如此，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人的甚至是伪善的观点，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减弱他们对改革的反对态度。

所谓市政社会主义不过是热心提倡由市政团体提供煤气、水、电车等等，并且保证市政团体的雇员得到那份实际上并不确定的被称作“工会标准工资”的服务酬金。这种市政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进步。在伦敦，郡议会设置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经过比较广泛的选举产生的，它的议员有较高的教养，可能消除大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常对立，而目前激进党人、进步党人、费边分子和其他人提倡的市政社会主义只能使这种对立永久化和固定化。只有把集体所有制土地、工厂和矿山结合起来，使城市和农村在这种结合中融为一体，才能防止单纯改善城市状况而不注意居民在整个农村地区的迅速重新分布这种做法引起的危险。

自从 1891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以来，社会民主联盟作为一个组织取得了最令人满意的进步。过去两年中，社会民主联盟在伦敦成立了 5 个新支部，在地方上成立了 20 个新支部。另一方面，有 7 个支部由于各种原因解散了。但是这些支部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失去组织关系，他们加入了别的支部。

1891—1892 年，就在彻西区（伦敦西南部的一个区）一个叫“天涯海角”的地方举行集会一事，社会民主联盟同警察局进行了长期的、令人厌烦的斗争。警察局禁止在这里集会，但是社会民主联盟的盟员一个星期天接一个星期天地试图在这个地点开会。在斗争了 6 个月之后，我们才在街道上和违警罪法庭上赢得了胜利。直到今天，我们的彻西支部都在这里举行露天集会。在斗争中总共有 26 名盟员被捕，他们中大多数人被判各种不同期限的徒刑、罚款或具保释放。几乎用不着怀疑，如果不是我们的盟员坚持不懈的斗争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露天的社会主义集会可能已经被放到伦敦其他地方去举行了。

不幸的是，这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正好发生在伦敦学校管理委员会和郡议会选举的时候，这大大妨碍了我们参加这些机构的竞选工作，否则，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一些。尽管如此，我们的候选人的票数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在格林威治的候选人沙拉尔德获 10 109 票，在西朗伯斯的候选人罗杰斯获 11 993 票，这两个候选人再有几百张票就会当选。在西朗伯斯，社会主义者获得的票数比 1888 年增加了 3 577 张。社会民主联盟在其他机构的候选人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票数。

伦敦的郡议会或市政机关选举举行以后，紧接着进行学校管理委员会的选举。在这个选举中我们肯定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我们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还是比 1886 年获得的选票多得多。在旺兹

沃思，约翰·华德获 2 724 票，而在 1886 年我们在这个区的候选人里士满只获得 969 票。伦敦郡议会的选举投票是在与伦敦学校管理委员会选举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

资金缺乏阻碍了社会民主联盟推举候选人参加已决定要参加的去年的大选竞选。只有两位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他们是伦敦的 H. R. 泰勒和南索尔福德（曼彻斯特）的 W. K. 霍尔。泰勒获得选票不多，但还是证明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对我们党是有感情的。在英国没有第二轮投票，这就不允许在第一轮投票时投表示赞成原则的票。W. K. 霍尔在南索尔福德获得 553 票。哈尔被提名为候选人以后，当选的机会被一位官方的自由党人的插入竞选破坏了。自由党人在这个场合的行动表明，他们“多么好地”遵守了他们同情“工人候选人”的表白。因此，当得悉这位自由党候选人最终未能获得席位时，我们十分高兴。

英国的选举像在大陆一样，没有第二轮投票，这一事实严重影响了真正的社会民主联盟的竞选。因为正如前面说过的，没有第二轮投票就不允许在第一轮投票时投表示赞成原则的票。一个公开宣布的社会民主联盟候选人在任何机构（议会或市政机关）的选举中首先获胜这样的事是难以预料的。自由党和激进党的候选人就利用这个事实来欺骗工人，劝说工人把票集中投给宣布赞成实行某种改革的自由党候选人或激进党候选人，其实，他们根本不想实行改革或看到有什么改革。但是保守党候选人会宣布反对这种改革。因此，尽管工人比较起来还是喜欢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往往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因为他们担心，投那些其原则虽然众所周知是正确的，但其当选的可能性则是不确定的候选人的票，会白白“浪费”自己的选票。

在最近举行地方学校管理委员会选举中，舒弗雷勃撒姆保持

了他在博尔顿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席位，斯诺保持了他在托特纳姆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席位。在这两次选举中，社会主义者的选票有了较多的增长。约翰逊也选进了纳尔逊学校管理委员会。我们的同志在其他地方城镇经常提出候选人参加各种地方选举，他们获得的选票大约在 100 至 800 之间，或者更多一点。

今年 4 月，有 32 名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竞选伦敦和市郊的济贫法监护人，共获 25 683 张选票，他们当中有两人当选。济贫法监护人的选举与伦敦学校管理委员会和郡议会的选举相比，有不同的投票手续和投票区，但都有财产资格的限制。

去年，社会民主联盟趁自由党政府重新执政的机会再次提出恢复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1887 年 11 月 13 日，在广场上集会的人曾被警察和军队驱散。社会民主联盟邀请其他团体共同行动。激进党人在他们的政敌执政期间曾经大声疾呼要求开放广场。这一次尽管起初他们似乎不赞成伦敦开放广场，但最后还是和我们联合起来了。1892 年 11 月 13 日，即广场被封闭 5 年后重新开放了，这一天在广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和成功的公众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我们用无数红色标语和旗帜很好地表达了社会主义。会上发表演说的人大都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

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在英国不断增长的另一个证明就是：我们的同志亨·迈·海德门和哈·奎尔奇被召到皇家劳工委员会作证。

最近两年来，社会民主联盟能够派同志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宣传。这些同志进行巡回宣传的地区有：兰开夏郡、北森伯兰、达勒姆、南威尔士、约克郡、英格兰中部和苏格兰。这些巡回宣传的效果（特别是在兰开夏郡、苏格兰和英格兰中部）是极其令人满意的。社会民主联盟兰开夏郡地区委员会包括一个由 20 个支部

组成的联盟，这个地区委员会支持 W. K. 霍尔当组织者，A. G. 沃尔夫正被总委员会派到各个地区去。

我们还必须提一提，我们现在已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印刷厂。由于有了这个印刷厂，我们已能把我们的周刊《正义报》的篇幅和发行量增加一倍。要知道，《正义报》到现在已存在 10 年了。此外，我们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的和工会的出版物。

在过去的 6 个月里，我们的盟员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大有改善，这使我们感到，我们 12 年来针对英国工人的愚昧和冷漠不关心而进行的艰苦的和不屈不挠的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终于获得了部分果实。我们比较有理由确信这是事实，因为尽管近来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出现什么“突然高涨”的现象，但是正常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在不间断地继续进行。

关于社会民主联盟的情况，我可以向这次国际代表大会宣布，尽管我们的盟员人数始终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多，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让那些将个人向上爬或一己私利置于事业之上的人留在我们的团体内。社会民主联盟自始至终坚持纯洁的原则和大公无私的行为。我们毫不怀疑，在即将来临的激动人心的时代里，这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将充分发挥作用，尽管在将来也像在过去一样，这种决心或许会使我们偶然失去一些有才能的、追求个人私利的人的服务。

目前，社会民主联盟每星期在伦敦和各地召开 130 次宣传会议，它们或者是支部生活会，或者是委员会会议，或者是其他会议。因此，在从现在起到下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召开这个期间，我们希望社会主义原则将在整个大不列颠获得广泛传播，我们的组织将在全英国获得巨大发展，以便使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同志们受到鼓舞，就像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和给

我们注入热情一样。

我们实际上正处在各方面都在发生转变的时期。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在漠不关心和冷淡可能使社会主义者丧失勇气的时期发现，坚决拒绝妥协或任何降低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的社会民主联盟，现在正以比其他任何组织更快的速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大不列颠的国土上前进。社会民主联盟经受住了敌人的污蔑和克服了可疑的朋友们的半心半意的支持。目前我们正着手在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建立一个中心，在现在面临的严重困难的时期，工人阶级可以围绕这个中心团结起来。甚至在澳大利亚，尽管那里工人群众的经济状况最近变得非常悲惨，但是我们队伍中受过教育的完全彻底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使日益增多的工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只有通过社会民主主义他们才能有最终获得解放的希望。

整个不列颠帝国的讲英语的人们实际上慢慢学会懂得了这一点：无论是自吹自擂的沙文主义还是装模作样的多愁善感，对将来都是没有好处的。经济形式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不可避免，使社会民主主义者更热忱地努力劝说他们的同胞相信：严酷变革的时机正在成熟，只是需要对各国生产者进行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造成一场全面的和自觉的社会革命。近来，与美国和法国的议会机构出现腐败现象的同时，大不列颠的中等阶级的议员中出现了腐化堕落行为，这就促使人们要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办法来解决现存的困难。所以，当普遍运动决定从掠夺阶级的无能的双手中把生产资料夺过来的时候，我们将毫不怀疑，在举世瞩目的这场最光荣的斗争中，我国的绝大多数居民将站在我们欧洲大陆的同志们一边。

社会民主联盟总委员会书记

H. W. 李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报告

引 言

我们写这个报告就像写致 1891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一样，我们不敢说这个报告是完美无缺的。它只是总结了自 1891 年国际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所做的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阶级运动有关的比较重要的工作。但是，今年的报告甚至在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 1893 年要比在 1891 年更有希望得多。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确实在发展，并且是以稳定增长的速度发展。

然而，我们仍不能以英国工党的名义发言，一个有绝对统一的纲领和方法的党目前在英国还不存在。我们这里只有若干誓以工人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共同的最终目的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在究竟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它们的共同目的这个问题上，目前尚未取得一致。因此，提交这份报告的组织尽管相信，报告的内容忠实地反映了实际情况，但它们还是要明确声明，只有它们才对这个报告的内容负责。无疑还有其他英国人的报告会向大会提交。

社会主义的传播

在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提到过旧工联主义和新工联主义，提到了它们的本质区别，提到了阶级觉悟问题，因而提到了新工联的社会主义纲领。过去两年中，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受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薰染的旧工联主义者和充满社会主义思想的真诚的新工联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加大了。英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社会主义，并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工业问题，这一点对工人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几年前，在室内或室外举行的会议上，人们听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会发出愤怒的叫喊和嘲笑，而现在，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都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和热烈欢迎。

说明这一点的一个有力证据是，在那些没有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的工人组织中政治意识增强了。全国各地都有迹象表明人们希望摆脱激进党独立提出劳工候选人，甚至在旧工联理事会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几年前，在任何一个工会理事会上或劳工组织中，只要有人建议为了劳工的利益提名某个候选人，就会引起一阵“不要政治！”“不要政治！”的狂吼。现在政治行动正渗透到劳工组织中去，并破坏着旧式劳工组织的基础，因为它们把工联主义仅仅看作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工人状况的手段，而不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

英国的代表

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邀请书是发给去年9月在格拉斯哥召

开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当时没有收到邀请书，然而通过了一项关于在今年早些时候在英国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决议。但是，后来人们终于发现，这项决议是行不通的，于是工联代表大会的议会委员会决定派代表参加讨论对劳工有普遍影响的问题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一个特殊问题即劳工问题的大会。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的组织和代表的数目，代表们所代表的组织的性质，比起 1891 年来有了显著的进步。英国下院第一次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有了代表。我们不是说下院自己派遣代表来出席代表大会，而是说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中有 4 名代表是下院议员。必须讲清楚，这 4 名议员中有 2 名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另外 2 名则属于“大自由党”。

腐朽和残酷

在英国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资本主义制度越是临近灭亡，其腐朽性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制度的绝望的捍卫者和越来越充满希望的无产者之间的斗争的残酷性就日益加剧。在这方面，我们这里也发表过“巴拿马丑闻”，也许它的规模不像在法国那样大。^①但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对付一些小规模的诈骗行为。再者，我们的骗子们多数是信教的人。

① 1879 年，法国的一批资本家为开凿巴拿马运河创立了巴拿马股份有限公司。1888 年该公司垮台，引起大批小股东破产和许多企业倒闭，受害者达 50 万人。1892 年，丑恶的贿赂内幕被揭开。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务状况和滥用新筹集的资金，曾广泛收买议员、部长、官吏、报刊编辑。不仅共和党和温和派头子被收买，连激进党的首脑克列孟梭也在受贿之列。——译者注

上次代表大会以来，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经历了异乎寻常地紧张阶段。去年冬天，全国各地劳动后备军急剧增加，队伍庞大，咄咄逼人。中等阶级及其报纸实际上表示了一点出自恐惧的同情。他们把那套惯用的江湖骗术搬出来作为救急办法。但是，最有意义的事实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江湖骗术是无效的，认识到失业是我们现存的贸易制度的必然结果，认识到消灭失业的方法只能是废除这个贸易制度。

至于说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残酷性，这可从以下几次罢工中看出。这些罢工是：达勒姆矿工罢工，纺织工人罢工，木工罢工，码头工人罢工，海员和司炉工罢工。木工罢工的最重要的实际结果之一，就是建筑工会联合会的力量增强了。这个组织正像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包括几乎所有与建筑有关的劳动部门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近来力量大增。大概在我们这个报告发表之前它将作出以团体的身分参加劳工政治活动的重要决定。

过去两年中工会遇到的困难是赫尔港发生的引起极大轰动的事件。从所周知，在这个事件中，船主们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工人的联合。我们在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过，船主们建立了自己的联合组织即航运同盟。他们蓄意选择赫尔港作为航运同盟和工会进行较量的战场。他们使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金钱、诬陷、恐吓、大量引进工贼、在工人中挑拨离间、利诱、威胁、收买、饥饿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他们武装他们的工贼，但幸运的是这只会给代理人带来灾难性后果。大自由党、激进党的格莱斯顿政府正处在这个事件的风头上。一旦需要向工人进攻时，它会像它的孪生兄弟托利党政府在对付 1891 年利兹的罢工时那样干得同样出色。显然，在谈到所有影响劳工的实际问题时，特

别是谈到实际斗争的问题时，保守党人和激进党人都是一丘之貉。在1891年的利兹罢工中，托利党人调来了400名士兵帮助警察制服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的领导人。而在1893年，激进党政府则把步兵和炮舰开到赫尔来帮助船主，企图“粉碎”码头工人工会。

在布里斯托尔，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及码头工人工会都遭到警察和军队的镇压。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一再遭到攻击的工会都是属于非熟练工人的工会，并且都属于所谓新工会。

贿赂作梗者

过去两年中对工人作了某些小小的让步或许诺。自由党的地位使它比托利党肯服从社会压力些。但是不要忘记，托利党（即地主党）与自由党（即资本家党）之间的旧的差别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这两个党实际上都是既有地主，也有资本家。自由党经常高价收买工人的选票，而许多所谓“工人代表”随着买价的提高而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自由党人不止一次地把所谓“工人代表”安排到报酬优厚的政府机关任职。自从他们这次执政以来，他们已经作了一两次这种我们称之为对无产阶级的贿赂收买的小小让步。他们改善了雇主责任法案，虽然此法案并不要求雇主在转换承包业务时保证给原有的雇员以工作。他们在支付雇员的报酬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他们委派了较多的工厂视察员，把一两名妇女安排在与劳动部门有关的负责岗位上。他们现在定期发表劳动公报，该公报刊登有关国内外工作条件的详细介绍和统计资料。他们起草了农村教区政务会法案（农村市镇条例），如果该法案得以通过并付诸实施，那么就会取消乡绅和教士在农村的行政管理权。他们对教育法作了重要的扩充，起草了较好的注册法。如

果托利党人有一位像迪斯累里那样有才能和有愤世嫉俗思想的人当自己的首领，那他们处理起事情来或许会比激进党人更迅速和更爽快。但是，如果自由党人或托利党人认为，靠这种较小的让步措施就可以轻易地平息工人阶级的迅速增强的愿望，那他们就肯定错了。工人阶级中到处传播着这样一种思想：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自由党和托利党的任何可以改善他们的状况或者给他们较多的政治权力的措施。但是，他们接受这些让步措施时并不表示感激，因为这不过是从吝啬人手里接过被剥夺了的生而具有的权利而已。每次接受统治阶级这种“恩惠”时，下面的呼声越来越大：“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完全彻底地还给我们！我们只要拥有我们赖以劳动的土地和原料、我们用以劳动的机器和我们生产的产品就满足了。”

八小时工作日

每年支持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示威安排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1892年是在5月1日举行的，1893年是在5月7日举行的。1892年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游行，组织了一次演说，作出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宣布，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是通向工人阶级最终解放的最直接的目标。1893年在伦敦举行了两次游行，组织了两次演说，作出了两项决议。在游行组织委员会（组成该机构的有许多社会主义组织、大多数工人俱乐部、几乎所有的进步工会、共产主义协会和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同盟等）的讲坛上通过的决议是前两年的决议。这个决议含蓄地声明，赞成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1893年伦敦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上通过的决议仅仅支持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

而没有声明这只是达到废除资本主义这一目的的手段。除了这两个决议外，曾经与工联理事会合作过的社会民主联盟通过了一个直言不讳的和明白无误的社会主义的决议。

伦敦海德公园的游行就参加者的人数、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热情来说不比往年差。1893年在各地（如曼彻斯特、布拉德福、普利第斯、伯明翰、爱丁堡、利物浦、格拉斯哥、都柏林）举行的游行参加人数远远超过了往年。

这些游行和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对大多数人民来说这是最鲜明的进攻信号，而这一点已为过去两年的事件所证明。旧工联长期以来反对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但是现在工联代表大会接受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虽然它提出了一个条件，这就是，任何特殊行业的工会，如果它的多数会员愿意，可以不受八小时工作日法令的约束。多年来反对八小时工作日的棉纺织业工人最近站到那些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人们这一边来了。大不列颠的矿工们在他们提出的口号中几乎一致赞成八小时工作日，只有一个地区的相对说来人数较少的矿工反对这个要求。在下院，矿工八小时工作日法案还正在今年5月游行之前通过了二读。一个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已经起草好了，尽管在这次会议上未能表决这个法案。这样，八小时工作日问题就进入了实际政治领域。

所有这些事实中意义最重大的是棉纺织业工人立场的改变。在棉纺织业这个最重要的行业中，那些大的和富裕的工会以强烈敌视规定劳动时间的立法而著称，它们现在终于决定支持八小时工作日的立法活动，这是献给1889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发起的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动人礼品。

大 选

上次国际代表大会之后，英国进行了一次大选。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的代表只想就这次大选对于劳工政策和劳工代表的影响作一点评论。作这样的评论是异常困难的。因为在这次大选中没有任何独特的工人政党根据明确的和共同的纲领提出候选人。许多候选人被评作“劳工候选人”。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当选了。这些人就他们的名称和职业来说是劳动者，但是就他们的纲领来说则是激进党人。被一般报纸称作“劳工候选人”、当选后被称作“劳工代表”的这些议员接受的是激进党的原则，他们不发表反对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声明，并习惯于投这个党的票。此外，还有一些没有当选的候选人，他们提出了许多带有一点进步性质的纲领，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他们都得不到任何真正工人组织的支持。许多“劳工候选人”靠不受任何工人阶级组织监督的那些人的个人捐款来搞竞选。当选的候选人是公开承认的社会主义者并明确声明他们同两个旧政党对立这样的事例只有两次。甚至在这两个事例中，候选人的纲领虽然原则上一致，但在细节上却是不同的。在这两个场合，社会主义者候选人都遭到了自由党的激烈反对，而当自由党发现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对它来说太强大了，于是它就撤回自己的候选人，然后把选举结果算作是自由党人的胜利。

这次选举再次使我们懂得，工人阶级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选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多大。我们没有第二轮投票。选民登记是不完善的和不公正的。选举不是同一天举行。许多选民一人可以投几票。候选人必须负担的选举费用数额巨大。对所有这些弊端进行改革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在这个国家就不能选出真正的工人

阶级代表。议会处理这些选举权问题的措施就像处理诸如八小时工作日之类的经济问题的措施一样重要。讲究实际的工人认识到，尽管他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他不肯不辞辛劳地首先参加必不可免的政治改革，那么这个政治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有人说得好：让一个人被“不要政治改革，只要经济改革！”的喊叫所迷惑，这不是好的政策。“不要政治改革，只要经济改革”这当然意味着两种改革都实现不了。只要工人没有获得保证他可以获得经济权利的政治权利，工人的口号就必须是“既要政治改革，又要经济改革”。

农 业 工 人

在这次大选中，农业工人起的作用比以往要突出。农业工人的投票过去一直受农场主、教士和地主的操纵，现在成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他们正在慢慢地觉醒，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上述3种人的利益并不相同，而和那些迁移到城镇的农友们的利益相同。在过去两年期间，所谓“红色大蓬车”作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一些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乘坐涂上红色的大蓬车到全国各地宣传，在各个城镇和乡村停下来召开会议。起初，他们受到的接待与其说是愉快的，不如说是热情的。但是现在他们多半已召开大型会议，并且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宣传国有化的根本道理，以便对农业工人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每次宣传时总是不忘提到其他“资料”的国有化。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大蓬车所做的工作多么卓有成效。从5月5日到7月9日，一辆载有6位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的大蓬车，沿途吸引了80多个农业劳动者加入农业工人联合会。这些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

随着大蓬车到各地巡游，除了发表演说和吸收会员外，还收集关于农业工人状况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整理后具有极大的价值。地主现在感到了这种新的宣传方法的影响，也开始向农业工人讨好，他们建立了由地主、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组成的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的“全国农业联合会”。而比较有头脑的农场主抗议说，这里根本不存在这种共同利益。但是更重要的是：农业工人也开始认识到这个同样的道理。

独立工党

1891年我们在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英国目前还没有单独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我们还指出，但是英国已经出现了“建立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工人政党的”好兆头。我们在这个报告中还说，工人无疑已开始感觉到了阶级已意识。在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报告中，如同过去已经说过的那样，应该说在英国目前还没有单独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也必须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一个新的组织即独立工党已经成立。这个新党的成立是上次预言的好兆头的应验，证明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已从模糊阶段发展到明确阶段。1893年1月13日和14日，在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举行了有115名代表参加的会议。这些代表中有91人代表独立工党的临时支部。其他24人来自主张为了工人的利益保持政治独立的各种组织。这次代表会议赞成正式建立独立工党，决定该党的宗旨是“保证对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实行集体所有制”。独立工党已经有许多追随者和支部，特别是在英格兰的北部和中部。它通过教育和组织工作努力为竞选和获得支持做准备。它的候选人在各种选举场合发誓要实现独立工党的宗旨，完全摆脱

两个旧政党的影响。

在这方面必须说明的是，除了独立工党外，在英国还有不少组织正在按照同样的方针开展工作，但它们没有必要隶属于独立工党这个新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有：社会民主联盟，在伦敦和拜特席、伍尔维奇、波普拉等市镇的各种地方工人同盟，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争取法定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劳工同盟。所有这些组织往往都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党，并且在各个方面完成了出色的工作。所有这些具有共同目的的团体，可望联合成为一个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党，即英国工党。

国 际 主 义

非常令人满意的是：在我们国家，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国际兄弟的情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几年前，英国的普通工人还把别国工人贬称为“外国佬”，而工人领袖还在大言不惭地谈“大陆革命者的浮躁和爱耍嘴皮”。现在，英国工人开始懂得，“外国”工人和他们自己实际上是休戚与共的。现在当有人在工人会议上习惯地说出“外国佬”这个词时，会遭到一片愤怒的斥责声。现在，只要一谈起外国工人和工人运动，就会受到工人诚恳和热情的欢迎。工人极想知道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他们对最近这次德国国会选举颇感兴趣，他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工人的集会上和联合会中获得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为祝贺我们德国同志的胜利而发表演说，向德国同志寄送贺词。这一切都是我们国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新现象。英国最进步的工人组织纷纷致函德国社会民主党，事前表示祝愿，事后表示祝贺。在工人政治运动史上我国工人第一次向社会主义选举基金捐款。当然捐款

数量不多，它是由独立工党赠送的。但是我们希望，“这块像巴掌一样的云”将来会变得遮天蔽日。

过去两年来，特种行业和工业的国际组织有很大发展。同上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况相比，这些组织的国际基础现在要广泛得多。在这方面一个有趣的证据是：在苏黎世为了筹备召开为期一周的规模宏大的总代表大会，特种行业组织召开了许许多种代表会议。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代表会议都有英国工人代表参加。

除了这些在苏黎世召开的代表会议外，国际矿工代表大会自1891年来举行了不止一次，有一次就是在伦敦举行的。最近国际玻璃工人联合会在伦敦举行了代表大会。

这些国际工人联合会不单是口头上的联合。它们正在做最重要的实际工作。国际主义精神得到普遍发扬，以致各国工人的组织机构和基金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利用来进行互相支援。例如，在英国发生法国磨光工人罢工期间，德国工人就小心地把汉堡港封锁起来，以防止德国磨光工人前往英国。大约在去年，欧洲大陆的玻璃工人多次掀起工潮。在工潮期间他们得到了英国工人的经常的和大量的援助。今年英国的玻璃工人举行一次持续16个星期的罢工。在罢工期间，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澳大利亚的工人组织一次又一次地寄钱来支援他们。

在工联中，煤气工人和杂工联合会与大陆的工人运动的联系特别密切。在这个工会的最近一次周年纪念大会上，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来自法国、德国和英国这3个不同国家的社会党议员在同一讲坛上发表演说这一异常壮观的景象。

过去两年来，在伦敦举行的支持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游行中，游行组织委员会的一个讲坛被公认为是国际讲坛。在这个讲坛上，

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波兰、俄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等国的社会党代表发表了演说或宣读了声援信。

结 束 语

最后作个总结。过去两年来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最惊人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英国，也像在别国一样，正确凿无疑地迅速走向灭亡；阶级斗争的双方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斗争；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和残酷；雇主阶级赤裸裸地动用警察和军队来对付工人；争取法定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大有进展；农业工人在觉醒；工人阶级政党和两个旧政党的界线划分得越来越清楚；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广泛和日益迅速的传播；英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之间的兄弟互助的国际精神得到增强。这种兄弟互助精神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将会得到促进和发扬。作为这些国际聚会的结果，各国的工人运动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和有生气。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将以更清醒的头脑，更愉快的心情，精神焕发地回到本国，更加朝气蓬勃地和满怀信心地参加这个既是国内的又是国际的伟大斗争。

关于荷兰民主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告

在布鲁塞尔与苏黎世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两年中，我们认为荷兰社会党经历了一场其他国的工人党从未经历过的斗争。

在车间和工厂里，我们的人的名字被编入黑名单已是经常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区，无论是天主教的南方，或自由思想的北方，大小资本家都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憎恨。

在我们的滋沃勒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马上就要讲到它——吕伐登市（弗里斯省省会）的学校教育当局发布了一个通报，禁止教师参加“社会民主联盟”，并禁止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就是在荷兰这个爱自吹为“典型的自由思想之国”的国家所发生的事。

真实的情况应该说成是：对社会党人可以采取任何措施！（然而为了尊重事实，我们应该指出：吕伐登市学校当局作出的这一不能容忍的事例，国内其他各地区确实没有仿效。）

如果要探讨这种迫害的原因，我们认为应该提到两件最特殊的事情。

首先在于这两年中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这在政府看来是不安的。为了证实这一判断，这当然会使在其他国家的朋友感兴趣，只要举出荷兰社会民主联盟下属的支部的数目在这两年内已比苏黎世大会以前增加了一倍多。事实上，联盟在苏黎世大会时期在国

内 56 个市镇中拥有 56 个支部，而现在则已是 118 个支部。而且目前在全国各地，新的支部还在天天建立。

弗里斯是荷兰城镇中社会主义思想最普遍成熟的一个城市，此外在格罗宁根省、上艾瑟尔省和盖尔德勒省等地，宣传已深入到农村人口中，工作进行得积极而聪明。我们喜欢选择在地区中心的乡村里组织会议，有时在大厅里，有时就在谷仓里，可能时就在野外露天召开大会。来自各地的人群，打着旗帜，常常由铜管乐队与合唱队相伴，纷纷汇集到举行会议的地点；尤其是这种在野外举行的会议，有时经常会与警察发生冲突。正像宗教改革时代一样，在公开场合中布道，有时会引起流血斗殴。

警察的野蛮干预，远没有使农民们丧失勇气而离开我们的思想，相反地却激起了那些还没有了解社会主义概念的人的好奇心，同时还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宣传工作者的热情。

因为国内许多地区的人民从本能上对警察当局的一切思想迫害都是反对的，因而他们倾向于站在那些为捍卫自己的思想而不惜以暴力回击暴力的人们一边。所以，我们支部数目的增长是我们朋友们的奔放热情的最好证明。

我们专门提到了两个北方省，弗里斯和格罗宁根，然后是上艾瑟尔和盖尔德勒，但南方各省也不应忽略，虽然社会主义在那里的传播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不仅在如此信奉天主教的林堡省站住了脚，尤其是在极为工业化的省会马埃斯特里特占领了阵地，而且社会主义的地方报纸《人民论坛》在外省的其他一些市镇也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在这些省里，尽管遭到狂热的天主教徒的反对，但是我们也能成功地组织集会。在这些地区，我们不仅要抗击政府当局，还要对付煽动人民反对我们的教士，我们在斗争中所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此外，我们在布拉班特省的一些主要市镇——这

也是一个天主教影响根深蒂固的省份，——在国内的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取得了立足点。

在第三个南方省热兰德，我们也成功地创办了一份社会主义的周报《未来》，宣传工作在那里的农村中进行得非常活跃。

现在，我们可以略为自豪地断言：在荷兰的 11 个省份中，社会主义都已渗透并扎下了根。

我们刚才谈到我们支部数目的增加，我们党的这一“明显的”进展，成为统治阶级方面迫害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荷兰社会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革命性。

1892 年 12 月在兹沃勒（上艾瑟尔省）召开的我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原则宣言”，宣言的革命性是无可怀疑的。宣言声称：“劳动人民所要支持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一种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是从属于它的。”党在接受这项宣言时，明确宣布：“党要保持旧国际的立场，这是与议会社会主义者的意见相抵触的。”此外，这一原则宣言断然确认，我们是一个革命的党。因为它不仅宣称，“无产阶级在现有社会基础上，不能获得任何持久的改善”，而且还明确表明，“在阶级斗争中，劳动人民应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斗争，无论是合法的或非法的，和平的或暴力的”。

一个有关党所遵循的策略的相应决议，也被通过了。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原则所明确表明的革命性质就是引起政府敌视我们的另一个原因。

实际上，在兹沃勒代表大会以后，不仅对我们党的宣传工作者加剧了迫害和制裁，而且从 1893 年 3 月开始，阿纳姆的上诉法院撤销了兹沃勒法院的判决，并且下令追究兹沃勒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并就此向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起诉——阿纳姆上诉法院的判决指出：“荷兰社会民主联盟在通过这些决议后，就已列入”

“非法会社”的范围。

然而，这一诉讼案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指令的结论是：**命令对被告不予起诉。**

解释这一集体免于起诉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迫害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广泛的谴责——甚至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表示谴责——特别是这次对中央委员会的迫害判决，更是引起了全国一致的义愤。

而且，对我们党的总委员会这样的迫害是一次没有先例的诉讼案件，这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对政府来说，如何结局，也是毫无把握的。对我们起诉所依据的法律实际上要追溯到 1855 年，在此之前不久的那个时期——该时期是在 1848 年宪法修订后结束的——资产阶级自由党本身就曾不止一次地发表了勉强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言论和著作，目前当政的自由党显然不敢进行这样的诉讼。然而，迫害我们宣传家的行动没有减少，当时下令追究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时——1893 年 3 月——我们被监禁在狱中的人不超过 54 个，而在我们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已不止这个数目了。

有些人因为在公开的会议发表了一些言论，或者是因为在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用某些词句报道了一次会议的情况，就被从自己的家中逮捕抓走。今年的最初几个月，政府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因为城市和农村，到处都存在失业，在全国各地区都发生了饥饿示威，并且举行群众集会。社会党人支持鼓励这种运动。

在格罗宁根省的萨帕米尔，骑兵与一个包装硬板纸厂的工人发生了冲突，当时，工人正在吃饭，因而没有防备。这次冲突中有 8 人受伤，其中两人有生命危险。政府无耻地把那些刚从医院出来的受伤的工人立即押送到法庭上。但是所有这些迫害没有给我们的宣传带来任何损害，恰恰相反，它只会更加激发人民的憎恨。

今年年初，接二连三的群众集会抗议阶级法庭对我们同志宣布的专横判决，致使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报刊看到这些判决引起的民愤，感到有必要警告政府有遭受秘密而致命的报复的危险。

甚至在资产阶级中，当局的这种做法也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为了解决失业，缓和饥饿，当局只知向这些不幸的地区派遣宪兵、骑兵和边防军），即使像加尔文教这样的（或反革命的）出版物，如《旗帜》及其他一些报刊，在这个问题上也同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随声唱和起来。

这种批评谴责发展得如此深入，以至在看到社会党人几个月来在金钱上帮助“阶级法庭”的受害者时，资产阶级激进派也这样做，他们在1893年3月建立了一个救济基金会，支援被捕入狱的社会党人的家庭。

因此，政府意识到做错了事，司法部长在向检察机关发去的一个通报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受到司法起诉的人数增多了，那些近年来警察人员增加的地区更是这样”。

“在全面评价警察的活动时，我相信有些官员不是经常能判别哪种情况是应该受到司法追究的，哪种情况是追究得对的，哪种情况采用司法追究是不对的。然而我相信，检察院在策略上也应该对不合时宜的过分的热情作一些纠正，这种不适当的过热现象甚至对一些政府的下级官员是有害的。”

但情况并没有得到纠正，司法部长自己也承认这点。

“公共利益根本未因这种不适宜的热情而受益，这不仅没有增进普遍的安全，反而常常引起不必要的激怒，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威信，并且使司法机关的其他官吏的工作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并产生更多的困难。那些开庭时作为见证人的警察官员也就失去了他们存在的必要，因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那些犯了轻罪的或不是故

意犯罪的人作证,以防止误判,因此这些官员有时会感到不安。”

部长因而表示,希望今后“检察院的代表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当涉及到不重要的、与其给予谴责不如加以宽容的事例时,特别是有些人目前已不再这样做了时,应考虑及时适宜地不予起诉。”

特别是在这些迫害的日子里,我们党的支部的数目增加了。

除了社会党,荷兰还存在一个“争取普选联盟”,它的组织中的确容纳了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但尽管如此,这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力量,社会民主党人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支柱。

荷兰社会主义者从鼓动的观点出发考虑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选举问题,他们认为,阶级斗争不能在议会解决;此外,工人只能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暴力革命并通过劳动阶级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在经济权力落入无产阶级手中之后,才能获得议会的多数。

对工人来说,这场斗争只能通过罢工、通过他们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力量来解决。我们重申,在议会的圈椅里,斗争是不能有什么好结果的。

另外,人民直接立法比议会主义更吸引荷兰革命工人。一切能削弱议会代表权力的都能吸引他们。然而,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对普选感到不安,那是因为,一旦实现这种选举方式,斗争会更受到限制。荷兰工人看到了法国和美国所发生的情况,使他们感到,在荷兰一旦实行普选,资本家在选举期间将表现得比以前更为骄横放肆,在议会中,“聪明人”将被“实用者”所取代。而且宗教对选举的影响将比金钱的影响要小。总之,选举权是一种所有公民都具有的不失时效的权利,荷兰工人不愿意受到任何损害。

因而,为了努力保持工人运动的纯粹的革命性,争取普选的斗争在荷兰是一个原则问题。在一个这样考虑问题的国家,不存在那

些在某些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使荷兰工人感到惋惜的矛盾。然而，荷兰也存在争取把工人运动完全推向政治方面的企图。在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1891年)上宣读的关于我们工人党的报告中，还提到过一个所谓的“人民党”问题。这个党在不久前的几年间，还起着某种影响，但只局限在一个省，即弗里斯省内。该党主要由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分子组成，他们主要是因选举上的合作而联合起来的。但是，荷兰的社会主义工人已经认识到必须将斗争限制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必须从他们的队伍中排除腐化变质现象。阿姆斯特丹全国代表大会(1891年12月25—26日)上决定“社会民主联盟”的任何支部都绝对不得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某点纲领而参加某种(政治的)组合。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人民党”就很快衰落了。这两年来，确实有个别人企图在社会民主党以外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建立一个政治上改良的党。到目前为止，这种企图在工人中没有得到任何成就。议会改良主义者口头上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是否能在未来获得某种影响，尚待观察。

荷兰社会主义者尽可能把争取普选的斗争工作交给争取普选联盟去做。但可惜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任何力量，如果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不支持争取普选运动，肯定就不会有什么成果。

这特别在1892年9月18日在海牙举行的全国争取普选和公民投票的大示威中看得出来。

争取普选联盟在社会民主联盟与各社会主义工会的支持下组织了这次示威。

在最后时刻，海牙市长先是禁止在公共道路上举行示威，然后，根据卫生委员会的意见——当时霍乱猖獗——禁止后来要举行的群众集会。但是尽管如此及时地提出了霍乱问题，军事行动却

照常进行，议会隆重的开幕式——它总是在海牙引起许多好奇——也一样进行。

于是，引起社会民主联盟干预此事。党的总委员会宣布，禁止集会是非法的，因为不是违法的集会并不需要请求市长的批准，所以决定不理采这项法令。

在同海牙的组织委员会晤商讨后，党的总委员会向所有普选拥护者发出呼吁，特别是号召社会党的各支部，邀请它们参加集会。

集会是在普遍不安的情绪中进行的，因为市长的禁令没有撤销，卫戍部队受命在兵营中集合听令，警察也全部整装待命。

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参加了集会，总计有 134 面旗帜，由音乐和歌唱队引导。当局放任未管。显然它不敢承担会引起一次暴力干预的责任，而且干预更是非法的。然而人们听说，直到最后时刻，海牙市长与中央政府之间在示威是否合法的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意见。

政府的行动从未这样使荷兰当局的威信受到如此大的损害。资产阶级的报刊——教会的、保守分子的或自由党人的——在示威行动过后一致用激烈的语言对政府迟疑不决的态度进行了谴责。

社会主义思想在荷兰工人阶级的传播，尤其是通过社会主义与工会刊物的状况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

在荷兰不存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日报。党的主要机关刊物《大众权力报》过去是日报，从 1892 年 1 月以来每周出版 3 期，现在仍然这样。因为这样便于农村居民阅读，他们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时间天天看报。

除了党的主要机关报外，在社会主义宣传的一切中心地点都

有地方机关报，大多是周刊。今年初（1893年），《大众权力报》的编辑部从海牙迁至日益成为荷兰社会主义宣传的主要中心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因为国内各省情况不同，所以地方机关刊物是必要的。除《大众权力报》外，荷兰还有如下几种社会主义报纸：

马埃斯特里特（林堡省）的《人民论坛》；

米德尔堡（热兰德）的《未来》；

鹿特丹（荷兰南部）的《自由》；

赞地克（荷兰北部）的《赞兰德人民日报》；

兹沃勒（上艾萨尔）的《人民之友》；

恩斯赫德（上艾萨尔）的《最终权力》；

伍尔维加（弗里斯）的《钟》；

格罗宁根（格罗宁根）的《先锋》；

萨佩米（格罗宁根）的《工人》——半周刊；

阿纳姆（盖尔德勒）的《前进》；

哈林根（弗里斯）的《曙光》；

犹太社会主义者机关报《我们的日报》——月刊，阿姆斯特丹。

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社会主义青年》——月刊，阿姆斯特丹。

我们明确声明（为了避免外国人的误会），所有这些机关报都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在有关原则与策略问题上，和《大众权力报》没有任何分歧。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定期机关刊物：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向导》月刊；《曙光》插图周刊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讽刺性周刊《红色魔鬼》。

为了使我们对运动的概述全面完整，还要提及一些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刊物，这些刊物在策略上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或者以不同

于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版。

荷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版《无政府主义者机关月刊》，出版地点在鹿特丹及瓦海德的利特，还有一个刊物名叫《光明与真理》。

此外，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些资产阶级报刊多少有点倾向于社会主义。例如，莱德的《荷兰人民报》及吕伐登的《弗里斯人民报》。

还应提到，关于我们刚才在上文提到过的弗里斯的“人民党”，他们是议会社会主义者，他们把该党过去的资产阶级机关报《斯尼克日报》改名为《新时代》，完全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每周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一期。

上文我们曾提到过有些工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相应地，社会党也全力支持各工会联合会。值得提到的有：烟草工人联合会、排字工人联合会以及铁路工人联合会（该联合会的名称是“勇往直前”，会员 4000 人）。这些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都是由社会党人主编的。

总的说来，工会运动仍然有待改进，近些日子以来已有了进展。同时，为了表明我们的思想也已在工会这个领域开辟了道路，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掌握在社会主义者手中的工会出版物。

烟草工人联合会的每周在鹿特丹出版的机关报《烟草工人》；

铁路工人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周刊《信号台》；

小学教师联合会每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机关刊物《人民教师》；

海牙出版的双月刊《细木工匠》；

阿姆斯特丹的月刊《建筑油漆工》；

阿姆斯特丹的双月刊《宝石工人》；

我们认为有必要重复提到的是，这些工会机关刊物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非常好，并且遵循党的策略。社会党与工会联合会相处

得十分和睦,经常互助鼓励。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劳动书记处的决定,在荷兰立即执行了,任命了一个党的书记负责国际通讯并收集各国工人运动的资料。

然而,为了富有成果地进行合作,有必要和各工会联合会相互配合,以组成劳动书记处。此外,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前,烟草工人工会已试图建立一个工会联合会。近几个月来,作了一切努力以便在这问题上达成协议。

这些努力由于以下工人组织的活动已获成功:

社会民主联盟;

荷兰细木工联合会;

烟草工人联合会;

铁路工人联合会“勇往直前”;

排字工人总联合会;

宝石工人工会;

木器工人联合会;

制刷工人联合会。

我们认为,在结束这个报告以前,有必要提一下“社会民主军人联盟”这一组织。这是一个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国民卫队士兵的联合会。它专门从事在军队中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在操练、打靶时期,在兵营中散宣言书。

此外,该联盟自己还发表文章,组织公开的集会,巡回宣传,尽一切努力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野蛮的好战思想。

祝今后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像在苏黎世代表大会前的这两年一样继续在荷兰发展。

意大利劳动党的报告

一、历史叙述

为了了解**意大利劳动党**的变化过程，首先应当讲一讲它在诞生和崭露头角时所处的环境。直至 1860 年，意大利始终分裂为许多小邦，处于本国的或外国建立的公国的控制之下。这些公国主要是外国建立的，但其专制程度是差不多的。到 1870 年，意大利才基本获得统一，定都罗马，所以很晚才出现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也不完全。不仅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耗尽了国家的一切有生力量，而且长期以来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关卡林立，这阻碍了工业发展，国家几乎处于中世纪的落后状态。

意大利革命是一场完全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即使最保守的作家、大学教授、政府部长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装束并不能掩盖事实。尽管革命受到了真诚的“空想”的鼓舞，尽管它带有传教者和殉道者的丰富幻想，但它只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完成的，而资产阶级总是想方设法要发财致富，要发展自己的力量，要同所谓兄弟国家的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斗争。因此，从字面意义上讲，这是一场**阶级革命**；然而像以往一样，无产阶级只不过充当了炮灰，直至殒上肉。

按照这种精神完成的意大利革命正是这样被人利用了。近代

历史上只有少数事件能够这样清楚地证明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按照这个理论,思想,即使最广博深邃的思想,如果不去适应物质条件和生产方式,就只是一种诱惑物,它将无所作为。给予人民的自由(每天又通过限制愈来愈多的法律和法律原则逐步收回)只是一句空话,一个没有意义的词藻,一个没有人会玩、没有人要把它留下来的玩具。相反,国家侵吞所谓不可转让的**法人财产**和僧侣财富,出售国有土地和市镇公有的土地,实行各种垄断,三番五次地与铁路公司在边境草率地对商品进行征税等等,这些只不过是加快大产业吞并小产业的速度的人为手段,是一套阶级致富和剥夺所有权的错综复杂的方法而已。这种方法已经使用了四分之一世纪,至今还没有取消。

二、空想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国家中(那里进行的一切斗争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斗争,即矛头指向王朝、大臣本身、政府形式的斗争),首先不可能造成适合于积极社会主义的宽松气氛,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从哲学家的纯粹思想或先驱者们的漫无目的的行动中产生。

在巴黎公社、国际以及巴枯宁理论的影响下,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学校的年轻人中间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团体,人们在这些地方深入讨论使现有制度得以维持下去的东西:祖国、家庭、宗教、所有制等。由于被宣扬的理论具有新生理论在新环境中所特有的蓬勃生气,它们立即变成了行动;有时,人们成立密谋组织,武装一些集团,企图夺取某个城市,在那里建立新秩序……当时是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盛行的时期,人们沉湎于浪漫主义之

中。其后审判案接踵而至，国际主义者受到可恶的怀疑法（人们称之为警告）的打击，他们像野兽一样遭到围捕，按照政府的法令被置于最令人恼恨的警察监视之下，被流放到荒岛上去等等。即使那些起先是左派后来爬上权位的部长，也以自由和人民权利的名义，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使用这些手段；那些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或曾经占有一席之地的朋友们，在他们幼年时期也应尝到过迫害的滋味。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心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主要是罗马涅地区，但它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史前时期。然而，它的功绩在于提出问题，使劲地敲响了造反的穷苦人的洪钟，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因此，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占有它的地位，一个光荣的地位。

三、行会工党

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意大利，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不能持久的，它没有任何固定目标，它只是一种抗议和骚乱，再加上它的积极分子所冒的无谓风险，这种抗议和骚乱也是很有限的，因此，社会主义很快便衰落下去了。工人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中有着朦胧的政治憧憬的那一部分人，组成了互助社团。他们不是在民主党中间，而是跟在民主党后面活动，他们支持民主党几乎纯粹是为了选举。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们进行了一次比较紧张的鼓动以便部分地扩大选举，他们获得了胜利。

但是，物质条件的发展加快了思想这种超人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的进程。尤其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不少机械工业，它们不断扩大，吞并或者扼杀昔日独立的行业，雇佣男女工人和童工，使他

们与土地分离。

而第一次工人运动恰恰发生在北部。工人开始认识到人们向他们灌输的激进的或民主的老调中一切空洞无物、令人失望和自我欺欺人的东西。他们认识到他们只有一条解放的道路，这就是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既没有老板也没有保护者、独立于其他政党的政党，通过有组织的抵抗活动，独立同资本进行斗争。就这样，在每个劳动者享有生存权利，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和反对一切寄生现象的旗帜下，第一个意大利工党建立起来了，而且它从一开始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发展。通过积极的宣传，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有 40 000 多人加入新成立的党。党的委员会最初设在米兰，后来又改在亚历山德里亚。几乎所有的人都阅读或由别人代读党的报纸《工人联盟》。这一切似乎预示着美好的社会主义的诞生。人们举行各种罢工，这些罢工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反对资本、反对工业流弊、反对工厂主和工头的残暴行径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当时的意大利，这是人们始终料想不到的。

但是，党所具有的完全的工人性质不可能为自己赢得资产阶级派别的同情，甚至也不能得到它们的宽容，尽管它们承认贫苦阶级的某些要求是正当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工党的性质是一种从第一次空想社会主义运动那里承袭下来的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新的行会主义倾向的混合物。为了摆脱曾经混进工人队伍并控制工人社团、谋求私利的保护者和背信弃义的朋友，工党必须严格按照马克思的话去做：工人的解放应当成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并给予它以完全具体的解释，举起体力劳动者的工装作为旗帜。资产阶级旧政党给工人带来失望的政治手腕，使工人恼恨一切政治，政治一词甚至也被摈弃了，成为狡猾的欺骗或背信弃义的马基雅弗里主义的同义语。

正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工党是反对激进潮流的战斗的党。除了某些信心十足和信念成熟的社会主义者以外，没有人敢支持这样的党，也不敢公开为其辩护。在选举时期（1886年）尤其如此，当时它在好几个选举团或者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当然都落选了，但有时也使激进派候选人落选），资产阶级民主党把所有的仇恨一骨脑儿都发泄到它的头上。运动的领导人受到无耻的诽谤，人们指控他们与警察沆瀣一气，指控他们是政府的代理人等等，而政府则正中下怀，从而向党发起猛攻：解散党支部，查抄党的文件，将所有在宣传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的人逮捕入狱。司法诉讼层出不穷，米兰重罪法庭准备审理一起大诉讼案。在预审中，指控谋反的罪名不能成立，但被告人却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为（如煽动罢工和内战）被判刑。

由于组织活动才开展不久，这些诉讼案对于它是不幸的。运动中出现了松劲现象，这几乎是一个昏昏沉沉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宣传运动始终在耕耘播种，新的意大利劳动党破土而出，就像长在一片覆盖着被焚烧的杂草和灌木的肥沃灰烬的土地上的幼林一样。

四、新的劳动党——米兰代表大会

这样我们就讲到劳动党了。可以这样说，它的诞生表明，意大利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地和坚决地投入了国际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工党已把运动中的精神倾向、即一切非体力劳动的东西和行会反抗排斥在外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工党，还不是广义的社会党；它甚至还多少要把自己乔装打扮

一番以引人注目。尽管它的积极分子，它的领导人、演说家事实上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都摘掉了党的帽子，只以个人名义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它在理论上热衷于半无政府主义，这是趋于瓦解的工业仍居主导地位、大工业开始出现的过渡时期和国家的必然产物。新的劳动党集中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两个互相补充的倾向，给运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即使运动具有了为夺取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为废除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为最终消灭阶级而进行阶级斗争的性质。

有好几个因素促成了有决定意义的米兰代表大会的召开，其中有外国同志们的榜样和对他们的活动的研究。自1891年1月起在米兰出版的、阐述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评论》双周刊，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意大利唯一和真正的社会党——劳动党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米兰代表大会（1891年8月），伦巴第、艾米利亚、托斯卡纳、利古里亚和皮埃蒙特的150多个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社会主义方法以压倒优势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或狭隘行会主义者的愿望。根据大会通过的议程，首先确定劳动者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宣告实行集体所有制的结果，而劳工保护法如果没有有组织的群众施加压力，迫使当局遵守它们，这些法律本身不可能产生肯定效果，哪怕是一般效果也不会有；然而，人们根据巴黎代表大会（1889年）指出的各个要点，需要这些法律来改善工人状况，帮助每天都处在阶级斗争中的劳动者。

代表们几乎一致同意把已参加或即将参加代表大会的所有工人团体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劳动党，通过**团结、反抗、宣传和合作支持以解放为目的的反对资本的垄断的斗争**。——一部分代表被委派参加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

五、热那亚代表大会——中央机关报

——纲领

由于费用庞大，而工人社团又无力预先支付，创办一份中央报纸的计划没有成功。经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同意，依靠一部分积极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捐助，1892年7月，即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意大利劳动者的报纸——《阶级斗争报》创刊了。该报每周在米兰出版一号，为代表大会做准备，因而被宣布为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报。可以说热那亚代表大会（1892年8月14—15日）真正诞生了党，而米兰代表大会则只是孕育了党，党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之后才具有了肯定、明确的形式。

大会第一天，出现了一些骚乱事件，这些事件使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终于彻底分离了。第二天，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尽管人数略有减少，但可以相互谅解，会议对纲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几乎一致通过了下面的纲领，这使党具有了纯粹社会主义的标志和“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此以后，党保持了这一性质，往后的历次代表大会又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况发展而不是改变了这一性质：

“鉴于：

在目前社会制度下，人不可避免地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方面是被剥削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是占有和垄断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本家；

不管男女雇佣劳动者状况如何，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他们构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被迫处于贫困、卑贱和从属的地位；

任何公民，只要他尽其所能为创造和保存社会生活中的利益作过贡献，就有享受这些利益（首先是生存的社会保障）的平等权利。

确认：

现存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只代表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垄断者对劳动阶级的统治；

劳动者只有在对生产工具（土地、矿山、工场、运输工具等）和生产的行政管理实行社会化以后才能获得解放。

鉴于：

这样的最终目的只有经过组织成为独立于其他所有政党的**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才能实现；这个阶级政党的使命是：

1. 为立即改善工人生活（工作时间、工资、工场规章制度等）而进行行业（或行会）斗争，劳工联合会和工人工会特别被指定从事这一斗争；

2. 进行更广泛的斗争去夺取政权（国家、市镇、政府部门），以便把这个从过去一直延续至今的剥削和压迫的工具改造成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剥夺统治阶级所有权的工具；

准备解放本阶级的意大利劳动者**慎重考虑**：

要以上述原则为基础成立**政党**。”

随后通过的党章就接纳社团的条件、代表大会的规章、包括7名委员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为因从事宣传工作而受到迫害的人设立救济金，总之就一切与党内生活有关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各支部保留自己的名称，它们的行政自主权也得到尊重，但它们必须首先接受党的思想和方法。参加竞选斗争的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即党要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这些斗争。还通过了一些其他决议，主要是关于在农村进行宣传、关于农业合作社、关于五

一节等问题的决议。《阶级斗争报》被确定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造成了暂时的混乱,好几位代表立场不坚定,但仍有近 200 个团体参加了热那亚代表大会第二天的会议(大会开幕时作的统计很不完全,只列举了 169 个团体)。上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许多协会、南意大利(那布勒斯和普耶),尤其是巴勒莫和西西里的积极分子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最近一个时期,这些地方成立了许多劳动者联盟(*Fasci*),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

六、党的目前状况——政治活动和竞选

劳动党和一切文明国家的类似政党一样,沿着一条明确的原则和策略的道路前进,即使是我们最公开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我党的成立在精神、社会和政治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不想夸大我们干部的影响(这样做将为我们自己设下陷阱),意大利所有的人都明白,出现了一支新的有组织的和强大的政治力量,它不断前进,日益壮大,从此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除了中央已经登记的 220 个社团(包括大约 200 000 名积极分子)^①以外,还应加上曼图亚省的 50 个加盟的农业联合会,总共有将近 11 000 名有组织的农民。顺便说一句,这是意大利农村无产阶级加入党组织的开端。只要积极地、灵活地进行宣传,振奋起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它将毫不迟疑地跟着社会主义旗帜前进。

在中央委员会的推动下,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社团,党的统一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好几个地区都成立了联合会,特别是皮埃蒙

^① 在这些社团中,有好几个是集体加入的联合会。西西里的一些联盟就是这种情况。

特和托斯卡纳,这两个地方成了推动地区性的、积极而经常的宣传的中心。——正是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五一节这一天的游行活动,通过广泛发行纪念邮票和散发党的宣言,通过出版 60 000 份大版带图片的《阶级斗争报》专号,通过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搞大规模的停止工作的庆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示了人们过去从未见过的既平静又宏伟的特征。^①在这一年,凡是发生比较重大的劳资纠纷事件的地方,委员会照例不是派去代表,就是送去救济金;最近正是在人们的帮助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们利用各地朋友们的勇敢而聪明的行为,激励和领导了贝加莫和克雷莫纳的胜利罢工和在纺织女工——这些数以千计的、被每日 15—16 小时的工作摧残了青春和健康从而换取可怜的 40 或 50 生丁工资的白衣奴隶——中新诞生的组织。——当发生对农业种植者(意大利勤俭的人)的疯狂屠杀、大批手无寸铁的农民在国民军的枪口下倒地死去的时候,《阶级斗争报》和巴勒莫的《社会正义报》(另一家党报)发起了募捐活动,为遇难者家属募集到了 2 600 法郎。——目前,人们建议(这个想法受到了欢迎),在一般社会捐助之外,每个协会会员每月多缴纳 5 个生丁会费,供党的中央基金支配,以满足总的需要。

最近宣布的政治大选使我们感到意外,党在各地全力以赴开展活动还为时尚早。不过,党在各个选区提出的候选人已不下 25 名,他们全都明确地高举劳动党和**阶级斗争**的旗帜。选举的胜利说明我们在**瓜斯塔拉**(雷焦-艾米利亚)的宣传是成功的。在这里,我

^① 在此应当回忆一下,伊莫拉(罗马涅)市政会议由于用发表宣言和停课等方式隆重庆祝劳动者的共同节日五一节而被政府用一纸法令蛮横解散,政府还派去一名王室专员,负责改造居民的思想,尤其是整顿选民名册。

们一位有声望的宣传员卡米耶·普朗波利尼战胜了得到反动势力中所有结盟政党支持的前民主党人、银行界上层代表人物而当选；在卡尔皮(摩德纳)，格雷格里·阿哥尼尼也取得了类似的胜利，他是农村短工劳动合作社的组织者，他揭发了不人道地贩卖从事水稻种植的妇女的行径；在**圣多尼诺镇**(帕尔马)，我们的朋友贝尔尼尼的胜利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其他同情我们运动的候选人，由于多少带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也获得了胜利，党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是，由于宣传**阶级斗争**不是他们竞选的唯一的真正因素，因此，这些胜利尽管很有益处，但确切地说，它们是时代的象征，而不是党的真正胜利。我们在伊莫拉的选举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候选人安德烈亚·科斯塔是国际主义者，长期以来是意大利议会中唯一公开的社会主义议员，他在敌人可耻的舞弊行为面前，以几十票之差而失利。在最近几个月举行的市议会部分改选中，选举结果比政治选举的结果更令人鼓舞。在都灵、米兰、贝加莫、克雷莫纳、帕维亚、布罗尼、斯特拉代拉、科莫，在艾米利亚、托斯卡纳等地，甚至在西西里的一些市镇，我们得到了对社会主义者非常认真、非常令人鼓舞的赞成票。总之，宣传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而这正是最重要的。从我们几次的失利中，我们可以得到和胜利一样多、甚至更多的东西。

我们的活动使我们得到最发达国家的社会党的关心和鼓励。与此同时，国际团结的精神也在我们的队伍中发展。在任何重要的时刻，我们都坚决出现在外国兄弟们中间，哪怕是寄去一封热忱的信。我们曾向卡尔莫的罢工工人和参加最近一次竞选的德国战斗的社会党人寄去了一小笔赠款。

我们在结束关于党的活动的概述之前，不能不讲一讲我们整个斗争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喉舌——我党的社会主义报刊。我们曾

经提到过《社会评论》双周刊，这是一本有精湛见解的科学杂志，它分析各种复杂的问题，它为我们从资产阶级的温和的知识分子中争取同情，使他们勇敢地同阶级意识决裂，走向彼岸；我们也提到了《阶级斗争报》，它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和支柱。但是，如果忘记了为数众多的小型周刊，那将是不公正的。鉴于我国的地区性很强，这些小型周刊对我们的益处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当中有：雷焦-艾米利亚的《正义》周刊，克雷莫纳的《人民回声》周刊，科莫的《科莫劳动者》周刊，都灵的《人民呼声》周刊，贝加莫的《人民》周刊，科雷焦的《布雷西亚诺劳动者》周刊和《火炬》周刊，伊莫拉的《火》周刊，弗利的《觉醒》周刊，拉韦纳的《集体主义者》周刊，埃尔萨山口的《警铃》周刊，巴勒莫的《社会主义》周刊，特拉帕尼的《海》周刊，奥内利亚的《锉刀》周刊，圣雷莫的《思想》周刊，摩德纳的《莫齐诺》周刊；社会主义印刷工人的报纸《前进报》以及《泥瓦工报》，这两种报纸都在米兰出版。所有这些报刊都是建党所带来的积极结果，它们不断地努力互相协调并同党的基本思想保持一致，它们就像管风琴上的风管似的，以一个声音发出各种音调。这种本能的协调能力增强了我们宣传工作的份量。

七、行会运动——劳动公会或劳工联合会 抵抗、互助和合作社团

除了我党的政治运动外，我们还进行行业组织运动；它与前者相联系，为前者创造有利于宣传的条件。几年来，这个运动趋向于集中在劳动公会或劳工联合会，它们正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迅速地发展着，并经常得到市政府的津贴，甚至在农村，人们也正尝试建立这样的组织。

劳工联合会的形式是我们从法国学来的。它集中和协调各工会的活动,但它不可能也不能够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然而,作为劳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中介,它通过调整供给,为劳动力的安排提供方便,在缺少生产部类的地方组织生产部类,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劳资调解委员会,在工厂主、市镇和国家面前代表工人,尤其是让工人在联合会中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互相接触,需要时能得到指示、建议,有时还得到帮助。劳工联合会在他们身上激发起团结友爱和力量的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工联合会对于社会党是有益的。

目前,已成立或正在成立的劳工联合会有 14 个,它们都属于一个总会,有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是它们几周前在帕尔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商定的。罗马的劳工联合会成立一年多,它有 29 个工会,3000 名会员。佛罗伦萨的劳工联合会正在组建,已有 2000 人加入。博罗尼亚的劳工联合会已成立 10 个月,它包括 60 个支部和 16000 名会员,其中 20 个支部在农村,大多数是短工合作社。帕尔马的劳工联合会刚刚成立两个月,有 10 个协会,1200 名会员。在普莱桑斯,两年前就成立了劳工联合会,它有 12 个协会。都灵的劳工联合会成立于 1891 年 5 月 1 日,它的发展似乎不太兴旺,因为它只有 12 个支部或职业小组,3 900 名会员。米兰的劳工联合会大约也是同一期间成立的,但它有 10000 名会员,分布在 40 个职业支部中,并在那里聚会。在帕维亚,劳工联合会刚刚成立,它有 19 个协会,600 名会员。在克雷莫纳,一旦把纺织女工组织起来,并将抵抗同盟的农民接纳进联合会来,那么现有的 1000 名会员将增加到好几千人。在布雷西亚一年前成立了劳工联合会,它有 14 个协会,1400 名会员。在帕多瓦也有这样多会员,这里的劳工联合会正在建立。在那不勒斯、维罗纳、贝加莫和科莫,一些委员会也正为

同一目的而工作。

我们最强大的抵抗组织有以下这些：意大利印刷工人协会，总部设在米兰，有自己的报纸；——意大利泥瓦工联合会，总部设在米兰，有自己的报纸；——意大利石印工人联合会，总部设在米兰；——国际手套工人联合会，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它的国际性报纸是《手套工人报》。

意大利有许多互助协会；有一些协会拥有丰富的资产，但将钱存于各储蓄银行；大部分互助协会由一些资本家赞助，作为他们的竞选机构，社会主义的春风还没有吹进这些协会。南部意大利尤其如此，但西西里除外，那里的联合运动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某些直接从国家或市镇找到工作的农村短工劳动合作社是由社会主义者组织和领导的（雷焦-艾米利亚、菲纳莱等）。分析它们在宣传方面所具有的好处、甚至它们所包含的危险，势必大大超出本报告的范围。我们仅仅指出，我们有好几位同志赞扬他们以这种方式取得的结果，以合作社形式开展的农村短工运动正好说明，在意大利中部某些省份，社会主义享有一定声誉。

八、展望与结论

我们希望我们的外国朋友将从对我党和我们运动的简略叙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主义方面，意大利不再是一个死角，它也正在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伟大和神圣的斗争中努力和姐妹国家并肩前进。

无疑，我国经济条件仍不发达，尤其是这种经济条件的千差万别，使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的差别几乎达一个世纪。再有，农村因素和农业经济中古老的封建形式与城市工业的先进因素相比仍

占主导地位,这些都不利于宣传运动的平衡和迅速发展。

然而,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和我们社会党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我们有信心,有干劲,这是不可动摇的,这种信心和干劲将彻底尽到自己的责任。

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共同前进的劳动阶级的国际友爱万岁!

中央委员会

**E. 贝尔蒂尼, G. 柯罗齐,
卡. 德拉瓦勒, A. 费尔拉,
康. 拉查里**

1893 年于米兰

挪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告

50年代在挪威第一次出现了激进的工人运动。它被使用强权镇压下去了，它的领袖遭到了逮捕。

这个运动是一个突破，它是1848年二月革命影响的结果。

尽管那时很快就出现了反动时期，但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鼓动为1885年诞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开辟了道路。同年在克里斯蒂阿尼亚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协会。

1887年组织起全国性的工人党。它现在有43个协会，其中32个在首都。

挪威社会民主党由于国土狭长、人口稀少，所以是在特殊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

更确切地说，挪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开展起来十分困难，原因是我国的一个大党的自由主义影响深广，它能够把许多激进的和不满现状的分子召集到自己的旗帜下。

同时在挪威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挪威工人联合会”，它拥有许多协会，拥护自由党的政策。

虽说该组织的工作和鼓动无足轻重，但是却能阻止工人群众接近社会民主党。

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几乎把一切利益都淹没了的民族运动，在目前情况下，其力量尚不足以建立组织，但却给挪威

社会民主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

可是我国人民由于经济上贫穷，需要国家预算有高度的计划性和更加节约，而这一点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做到。

这种认识在非工人阶级的各界中越来越清楚。

挪威社会民主党开展了有力的宣传鼓动，争取最多八小时工作日。

5月1日在首都举行的游行集会颇为壮观。在我国其他城市举行的“五一”游行集会中，也作出决议，社会民主党人将为实行八小时正常工作日而进行宣传鼓动，同时又有许多追随者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通过宣传鼓动，我们还使得国内的自由党承认了法定正常工作日的必要性，虽然该党本身并未同意8小时为最大限度。

在挪威获得普选权的条件是拥有800和500克朗（分别约合900和600帝国马克）的收入，这指的是城市和乡镇。

在40万经济上独立的男人当中，只有半数拥有选举权。

由于社会民主党坚决地、不断地提出普选权的要求，因此，自由党也把普选权作为它的一条竞选纲领；然而，民族运动的强大使该党对普选权的兴趣似乎减少了。

因此，挪威工人党不得不接过选举权问题上的领导地位，挪威社会民主党人目前基本上把自己的政治工作集中在这一问题上。

挪威社会主义工人党已开始逐渐参加地方选举，为此提出了一个纲领，其中有兴建地方工人住宅、对每个人实行免费医疗保健、为国民学校的儿童每天供应一餐饭、废除地方工作方面的拍卖制度等。

在地方上，社会民主党对自由党有一种彻底民主化的影响；因为，该党不得不同意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上提出的许多事情。

挪威社会民主党虽然正在成长之中，但是却开始成为其他政党不得不考虑的一支政治力量。它有希望通过全国选举在同其他政党进行斗争中很快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可以强行实现自己的要求。

当然，挪威社会民主党完全认识到自己的国际性，在日常政治斗争中一贯重视，合理的社会财政的必要条件是彻底推翻私人资本主义和社会关系的彻底革命。

挪威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
克罗格·约翰森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告

两年前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开时，我们向国外的朋友和同志们汇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立宪改革的情况；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记载下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了。

对于我党在奥地利所遇到的困难，上次报告中已作详细评价。在我们国家，由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只能慢慢来。一些大的工业中心拥有社会民主党认为是成熟的和易于接受各种事物的无产阶级，除此之外，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落后的经济形式在那里占据主要地位。与此相应的是，封建主义的绝对优势决定着奥地利的政治性质，封建主义利用现代的议会形式，迫不得已同资产阶级分享它的统治。当然，尽管迫于无奈，大土地占有越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相互融合就越明显，面对无产阶级，它们已经串通一气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竞争和英国一样，在奥地利也有过用廉价的让步（自由派在政治方面，保守派在劳动保护方面）把工人从对手那里争取过来的时代。但是，自由派同保守派的经济利益已基本上趋于一致，两派都看到，工人阶级既不能被收买，也不能被动摇，已经成为自觉的、因而与它们相对立的力量，从此那种竞争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这两个反动的党派把它们自私自利的爱转向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分子正面临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化，

因此他们自然要接受反动的试验,但是他们还是要逐渐走上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道路。在奥地利全国各地也都表明,这个往往以反犹太主义形式出现的小资产阶级运动,正在摆脱它的封建保护者的影响并最终要为社会民主党铺平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在奥地利刚刚开始便止步不前,受到了摧残和歪曲。议会主义用来勉强掩盖警察国家的那件现代立宪的外衣,本身就是专门为有产阶级准备的假面具;全部政治权利都是为形成有产阶级的垄断而设置的。因此,工人阶级只有自己依靠自己才能争得阶级斗争所迫切需要的武器,而在欧洲许多国家,这些武器是由资产阶级的胜利所提供的。请我们英国和法国的同志们设想一下,没有出版自由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结社自由的工会运动会是怎样的。请我们德国的同志设想一下,没有选举权,政治运动会是什么样。然而我们在奥地利的斗争条件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相当大量的工作就不得不首先放在争取合法的出版状况上。1892年冬,我们开展了十分热烈而又有成效的鼓动,目的主要是消除现行出版法为我们的印刷品的传播所设置的障碍。这个堪称可笑的法律怪物是我们鼓动的一大障碍,它首先使我们无法发展党的新闻事业,以致时至今日我们连一份日报都没有。我们完全是在孤军奋战;资产阶级报刊满足于自己的垄断,为了这种垄断,他们甘愿容忍书报检查的羞辱,诚然,书报检查对他们也不加以特别的压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通过加强鼓动促使议会去推动出版改革,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一个草案,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是获得通过就会消除那些最恶劣的弊端。我党一定有能力迫使议会还要去实现这前进的小小的一步,从而排除我们鼓动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争取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斗争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

意义，我们党正精神抖擞地进行着这一斗争。奥地利“宪法”使三分之二的居民蒙受无权之辱。只有三分之一弱的人有选举权，而且分配的结果是，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小集团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使没有财产的各民众阶级屈服于野蛮的阶级立法的桎梏，并且利用暴力来维护敌视人民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这种状况的荒谬之处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然而社会民主党的壮大也使敌人明白了，他们再这样下去是根本办不到的。大家公认，工人阶级在奥地利是目标最明确、政治上最成熟的阶级；它的组织有人尊敬也有人畏惧，它所获得的影响是人人都感觉到了的，但是在议会中却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这个议会与人民代表机构相差十万八千里，它把这个数量最大、政治上最干练的阶级排除在外了。这一事实越来越使无权者感到愤慨，但是也使特权者们越来越感到不安。

1893年4月，比利时党的同志们通过英勇的出击巧妙地迫使议会通过了普选权，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事件在如今已成为欧洲政治上极端落后国家的奥地利，犹如一道闪电。不仅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广大的各阶层人民也立即认识到，从现在起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也要在我们这里开展起来。甚至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也预感到，他们的垄断已经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1893年的五一节在全国都搞成了不仅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且还是**争取普选权**的出色的集会。在维也纳，150万男人和妇女像军队一样整队（这是前所未有的）行进在各个广场上、贵族的府邸前，在霍夫堡甚至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八小时工作日万岁！普选权万岁！”几星期后，在所有省份召开了各种集会庆祝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的胜利，再次表明了斗争的决心。于是在7月9日，5万名男女工人来到首都的中心——市政厅，声明不争取到普

选权“决不罢休，也决不畏惧任何牺牲”，结果，普选权在奥地利终于被提上日程，成为议论的中心。在这场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领导，它是唯一有勇气担起领导的政党，它将英勇无畏地坚持到底。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忽视，除去这些政治斗争，我们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唤醒无产阶级并把它组织起来**。过去一直漠不关心的广大阶层向社会民主党靠拢过来了；而且可怕的窘困，失业的空前蔓延，在 1891 年至 1892 年的冬季使得统治制度的破产显而易见了，同时也把更多的人引向我们一边；他们认识到，只有一个要消灭剥削、废除财产垄断、结束人与人自相残杀的**革命政党**，才能创造出**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认识到，唯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本身**才能够并且必将领导这一斗争。我们的鼓动已超出城市无产阶级的范围，开始在平原地区收到成效，尽管数百年间在精神奴役状态严密控制下的地区，主要是教会党为我们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们利用宗教作为外衣来掩护他们的统治和剥削。

不言而喻，这场斗也要付出牺牲；我们总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被捕入狱，就是现在，单单在布拉格有 53 名，在布尔诺有 36 名同志受到审讯，“罪状”是在当局非法禁止的一次集会上，他们没有默不作声地忍受警察和军队的武力镇压。

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取得进展的证明是数目众多的政治协会的产生和我们**新闻出版事业的壮大**。目前我党拥有 13 种德文、8 种捷克文和两种波兰文的政治性报纸（行业报纸不在其内），自然，所有这些报纸只能每星期或每半月出版一次，但是发行量却在逐月增长。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报》要出 19 000 份，维也纳的《人民论坛》有 9 000 份，《女工报》超过 4 000 份。尤其是我们出色的女同志于 1892 年 1 月创办的《女工报》的兴旺，是我们取得成就的

良好标志。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自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党的组织**的发展。在奥地利,恰恰这一点是最困难的,因为一方面必须避开陈旧的结社法的模棱两可的规定,另一方面还要避开可随意伸缩的秘密结社条款的障碍。再有,当局和法庭的观点是:社会民主党本身是“危害国家的”,因此参加该党是犯罪行为。前几年,仅凭“承认”订阅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被认为是“秘密结社分子”,而被预审拘留达数月之久并被“依法”判刑。对任何一点组织苗头的迫害有时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而奥地利的迫害者所掌握的法律伸缩性很大,它可以被用来任意杀人。1892年圣灵降临节在维也纳召开的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创立了党的组织。如果说从那时起,党的组织冲破上述重重障碍而事实上开始存在了的话,那么,这只应归功于由于形势的原因而涌向我党的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奥地利的官僚政治不得不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工人满怀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作为一个有觉悟的、统一的和意志坚强的机体屹立着。于是官僚政治顺应了这一事实。组织的产生相对来说没有遇到多少困难;它得到当局的默认,并且正令人满意地进行活动。

1892年维也纳党代表大会以**最彻底的公开性**作为组织的基础。组织的区域划分按行政区划分为大行政区和专区。几个地方组成地区组织,地区组织的受托人组成省委员会或专区委员会。大行政区会议至少每年要召开一次,起码每两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奥地利)还要选出由9人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处理党的事务并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我们的组织保障了每个党员小组有最充分的独立性,但是又能集中党的力量、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和把党的资金用于最需要的

地方。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这就是组织对于语言分布也给以相应的考虑，因此**捷克**同志和**波兰**同志尽管完全在整个组织的范围之内，但各自保有充分的自治。在同一个多民族国家奥地利，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民族纠纷而四分五裂、受到削弱，唯有社会民主党是既尊重各民族特点又是**统一的、严格按照国际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

说到这里应该明确指出，我们**讲捷克语**和**讲波兰语**的同志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巨大的力量和令人赞佩的英勇来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然而他们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机智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决议，以实现**妇女党员在纲领、组织和鼓动方面的平等地位**。**社会民主主义妇女运动**实际上取得了十分值得重视的进展。这一运动基本上是在吸收女工参加**工会**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它最近再次表明，我们的女同志在政治组织当中也是干劲十足、成绩卓著的。健康的社会民主主义女工运动最危险的暗礁是，和资产阶级发动的“**妇女解放**”混同，但是在奥地利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力地强调了女工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

工会组织在最近两年也大有进展，尽管雇主阶级拥有官僚机构、警察和军队，正在进行顽固的阻挠。我国的结社法是个严密的牢笼，对结社权的限制很严。可是，行政机构和个别官员的残暴却比结社法凶恶多倍，他们为所欲为，任意践踏工人的权利，工人的权利几乎毫无法律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革命的政党就得寸土必争，就必须借助我们的报刊一个专区一个专区、一个省一个省地促使法制的建立，同时还要教训那些帝王的官员们学会尊重法律。在奥地利，国家当局为富人效力卖命寡廉鲜耻到何等地步，从

下面的情况可以略知一二。在有些大行政区(波西米亚、加里西亚、施泰尔马克)几乎每一次罢工,罢工工人都有被政治当局作为无业“游民”而驱逐的危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卑鄙行径竟付诸实施。

尽管处于这种亚细亚式的条件下,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我们仍然成功地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工会组织。各行各业一年一度的会议和无数报纸加强了团结。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同时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奥地利将派遣众多人员前往参加,代表大会将确信我们工会组织的进展。

最后,我们就社会民主运动的国际因素说几句话。在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五一节,它是我们运动最明确、最受欢迎、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表示。对奥地利来说,它是鼓动的一个关键手段,其他国家或许不是这样。5月1日是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节日,是无产阶级使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希望的节日,是向统治阶级显示自己威力增长的节日。五一节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世界性的节日,在世界各国同时并且尽可能以同一方式表明社会民主党解放全世界的思想。我们奥地利人认为,庆祝五一节,停工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在1893年我们也贯彻了这一条,虽然不无沉重的牺牲,但却取得了成功。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弱小而年轻的党能够做到的事,德国、法国和英国那些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老战士也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看法毫不过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至少要遵守5月1日这个日期,遗憾的是没有被英国工人遵守,而1892年只有奥地利人以停工来履行决议,停工本应在所有“并非不可能的”地方一律遵守的,这不仅使得我们在本国原本就十分困难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且也大大削弱了这一节日的国际意义。因此,奥地利的代表们受命为了自己组织的利益,同时也是为国际组

织的利益,在苏黎世再次敦促采取统一的庆祝五一节的形式。

在结束我们这一枯燥地罗列事实的报告时,我们向世界各国的兄弟党致意并保证我们的团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将不遗余力设法完成交给它的艰巨任务,它将无愧于自己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地位。资本主义使得经济不断发生彻底的变化,其结果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民主党也在不断实现革命化。就在今天,各个国家都有一支具有阶级觉悟的男女无产者大军,他们勇于牺牲、满怀必胜的信念,正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愿苏黎世代表大会将推动国际的联合,祝大会工作顺利,并祝愿我们能早日看到我们的导师和先驱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和工人阶级摆脱阶级国家和剥削桎梏的实现。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奥匈帝国最南部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也有一名代表出席本届代表会，这还是第一次。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也没有幸免所谓的国民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传播开来也就是自然的了。要想在这里说明民族的历史发展，似乎篇幅有限，所以只简略地讲一讲。迄今居民差不多一直是从事农业，尽管家庭工业同过去相比显著倒退，但仍值得格外注意，原因就在于，恰恰在这个行业，人民受到深重的剥削。正常工作日或其他劳工保护规定的恩惠没有施与这个赤贫地区，因为为了所谓保护个人而制订的少数几个规章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点便说明了我国立宪制度形式的特点。

城市居民的遭遇和农村居民一样。所有在自己的出生地混不下去的人纷纷涌向工业企业，在那里每个人都物化成了短工或是其他什么东西，这要视老板的意愿而定。这种辅助劳力的绝大部分为木材工业所需，使用他们来锯木或在林间做工。

这种企业设在什么地区，对于给予这些人的工资报酬是很关键的。远离城市的人工资待遇最差，因为老板横行无忌，而当局在有人控告时又永远是偏袒老板，当局就是市长，他属下有一个宪兵所和一中队士兵。如果苛扣工资或对工人有其他什么不法行为，工人坚持自己的权利提起控告时，那么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工人们

更加受到欺骗,而老板会以仁慈的主人的面目出现,继续以最卑鄙无耻的方式进行剥削。

其他工业企业如采矿、玻璃磨制、纺纱等等,劳动生产者的待遇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剥削的形式有所区别罢了,因为在那里残暴地对付工人的是老板的强权,而这里则是法律的强权。农民和当短工挣钱的人是无权并且毫无保护的,然而从事手工业的伙计境遇也不比他们好。

基督教的教士们和所谓的贵族力图保持这种奴役状况,他们同摆阔气的老板们一道,在人民政治上无权的情况下组成所谓的地方议会,成了整个地区的代表。这样的代表所领导的这样的人民具有何种思维方式和处于怎样的教育阶段,是不难猜到的;而以教育和独立的人道思想为前提条件的社会主义思想要流传起来是多么困难,也不难理解。工党报纸纷纷创办,工人中的出类拔萃分子不顾当局的百般刁难,英勇地高举起崇高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因而促成了 1888 年在工人中召开第一次著名的会议。

这是在锡萨克,那里的工人协会“斯洛加”^①举行授旗典礼。

少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利用各种人物汇聚的机会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时刻可以被视为我们现在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当时一方面工人受着教士们的影响,另一方面敌对的报纸又经常发表欺骗报道来反对社会主义,这样就造成了在锡萨克作出的那些决定无法得到贯彻。此外,有人还利用不会读书写字的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去搞民族示威游行。他们用种种空谈废话去欺哄人民,目的只在于扼杀独立思考。然而无论诡辩如何骗人有术,它也无法向饿肚皮的人证明他们没有饿肚皮。如果在物质方面不能使工人

^① “Sloga”, 塞尔维亚文,意为团结一致。——译者注

满意,那么,正确思考的人就会明显地看出政治方面的阶级对立,而维护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人就会逐渐增多。

于是在首府就发生了制革工人和面包师的罢工,其他行业的老板即师傅们担心物质损失而甚至向工人做了种种让步,以防止罢工。

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同诸邻国一样,此次大会在这里也发生了影响,第一年,尽管只有在首都,我们就举行了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有500名工人参加了庆祝活动,但是尽管这样,一份全国发行的工人报纸却由于出版经费不足(其实数目很小)而不得不停刊。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居民中有2/3不识字,因此,印刷品的价值得不到劳动人民的理解。

鉴于这种情况,只有进行口头鼓动或者召开集会。但是召开集会也很难,因为法律规章设置了重重障碍。

尽管如此,1892年4月间我们仍然成功地出版了双周一期的报纸《自由》,该报现在还在出版。该机关报所持的是海恩费尔德纲领,拥有700个订户。它对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来说肯定是一个令人起敬的见证,因为敌人最大的一家报纸不过拥有1500个订户而已。从我们所能列举的成绩中可以看出报纸以及口头鼓动的鼓动效力。1890—1893年的罢工,是在备受剥削的非党工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爆发的,我们并未期望过高,因此可以不谈。但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一般的运动却表明我们是有鲜明原则性的,表明每个同志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政府认为,凡是对我们的思想能够有所促进的事物都是违法的,都要加以坚决镇压,因此每个同志都要坚守岗位就更加必要了。

行业协会的建立尚属不可能。例如木工、面包工人、裁缝的协会虽然章程已申报多年,但至今仍被有关主管当局束之高阁,未得

到办理。要成立一个政治性的协会,其章程几经拖延不办,可是过一年半之后却根据 1858 年的一个专门规定而遭到断然回绝,理由是不准许成立这种协会。新闻遭到扼杀,因为凡不为现行政体歌功颂德的东西,检察官一盖加以查禁。我们现在的境况,比起专制时代的境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句空话。政治上无权和经济上受奴役,我们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因此,大部分居民已不再听信在全国到处游说的民族沙文主义这个妖怪,而独立思考自主行动了。

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们承认国际友爱的必要性并且在这方面作出了第一个表示,在今年派出 3 名代表参加了布达佩斯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今年在阿格拉姆召开了一个鞋匠代表大会,一般说来这个大会是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开端。

不过艰巨的斗争就在眼前,并且从现实的角度看,要使我们的思想获得尊重,还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一个备受磨难的被压迫民族参加在这里聚会的同盟,所希望的是,这次代表大会将为被奴役的民族带来所渴望的政治自由和经济独立。

本报告将是我们的代表在对所讨论的各个问题表明立场时的补充。在结束报告时,我们谨向国际上所有社会党致敬。

关于匈牙利社会民主主义 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

现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取决于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决于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程度及其在剥削人民群众上发挥影响的程度，这一事实也决定我们要根据本国工业的水平和地位来评判匈牙利工人运动状况；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特别注意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在农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

不久前，匈牙利还被看作是纯农业国，它的大部分国土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确保这个国家在农业上将来也会占有重要地位。资本主义几乎一下子就占领了农业，对农村居民社会关系的改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后果是十分独特的，对此我们在本报告稍后的地方将作一简短的探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产业工人运动的进展。

工业是匈牙利政府的宠儿，这个政府是从有产阶级的代表中产生的，因此它唯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利益。现代国家对全国的生产能力提出的高要求，迫使这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那些可以适应这些要求的措施和办法。工业得到匈牙利政府最优先的支持，因为它可以养活众多的工人，从工人的劳动成果和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获取税收，来满足现代军事国家的需要。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为资本提供了在这方面所能想到的一切好处。为此目的所设立

的金融机构得到极其广泛的特许。保证对工业企业不征税。国营铁路获准降低运输原料和制成品的运费，大块地皮无偿赠与或者以抛售价格转让；简而言之，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和扩大。这些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各个国家资本的纷纷涌进，并且要求占据最有利的地位来剥削劳动力。我国的有产阶级利用爱国主义来诋毁国际工人运动，而对于外国资本残酷剥削我国人民，同时把它们所获得“纯利”的大部分转到国外这种现象却毫无反感。主要目的正在实现，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在生产方面由于使用机器而使得工人人数过剩；多余的工人人口在新的企业中找到安置；但是这些企业缺少工厂监督或相应的保护法，于是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加在工人所需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品上的间接税，给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大量收入，尽管这些收入的根源就在于下面这个应受谴责的原因：被资本家压到最低水平的劳动工资的价值，通过抬高消费品价格而变得更小。匈牙利政府的社会政策唯资本利益的马首是瞻，有产阶级独揽立法大权。居民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拥有选举权。

我国工人运动尚比较年轻，它通过国外这方面的事件和所取得的不断进展的成就而受到推动，现在在上面所谈及的社会状况中找到了沃土。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和农业使用机器，人民正以同等速度日益贫困化。被变得一无所有的人民群众，给社会民主党提供了散播自己的种子的土地，而且由于党的崇高目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期待它的发芽成长。

对全奥匈帝国的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宣传鼓动是由各种工人协会和工会会员来进行的，两种中央报纸《人民言论》和《工人新闻》沟通他们的思想联系。在讲德语的居民中，我们努力传播来自德奥两国的最优秀的宣传读物，而对于讲匈牙利语的居民则只

能提供这种读物的译本；在这方面几乎还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斯拉夫文字读物，除塞尔维亚做的几个尝试之外。在阿格拉姆每月出版两次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报纸《自由》，该报也拥护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原则。

在其他国家往往有出身于“有教养的”有产阶级的人，通过精神的或物质上的帮助，从而为了从物质方面和道义方面确保运动能够持续开展作出自己即使是微薄的贡献。但是，在匈牙利却没有这样的人。因为工资状况要多差有多差，而我们的鼓动一旦深入到一个部门，大多数情况便导致工资运动。毫无准备，没有什么纪律，参加者对采取这种步骤的意义又没有正确的理解，这样爆发的工资运动给有组织的工人造成种种牺牲，虽然这些牺牲对于运动总的说来并非没有成果，但也大大消耗着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力量，尤其是物质方面的力量，而对政党的巩固则毫无裨益。语言繁多是一大障碍，由于这个原因，维持鼓动力量也就更为困难，同时要求作出更多的牺牲。

尽管如此，我们也有把握取得可喜的进展，不仅在工会运动方面，而且也在政治情绪上。

在此，让我们回想一下五一节的影响和意义。在1890年这个节日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以后，尤其是从容而又严肃地进行了节日庆祝活动以后，有产阶级和政府吓得胆战心惊。第二年1891年颁布法令在全国禁止任何集会，甚至根据宪法应有的集会权在这一天也无效了，因此，在欧罗什哈佐和贝凯什乔包发生了令人遗憾的流血冲突。工厂主不遗余力地试图阻挠这个节日。整个工厂被关闭好多天，“暴乱头目”受到了制裁。接着1892年的5月1日恰好是星期天，因此，当局无法轻易地加以阻挠，但仍千方百计使我们不能大张旗鼓地庆祝。政府方面再次取消集会权，以阻止

工人阶级公开提出他们的要求。节日那天过得平静，布达佩斯的工人同外地的工人一样，以去远足郊游的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借此机会表达了团结的精神。1893年大家也考虑到，当局要依据已经提到的部颁法令对任何集会一概不准。5月1日前我们开展了热烈的宣传鼓动，除少数例外，工厂主在那天都给了工人一天假，而且当局也准许举行集会。无论在首都还是外地，节日都搞成匈牙利无产阶级庄严盛大的集会，有产阶级又一次认识到，工人团结的感情用暴力手段是压制不了的；同时工人阶级严肃地坚持自己最主要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政治上权利平等，这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这些问题越来越强烈地迫使人们去解决。这里应该谈到以下几个重要的工资运动：彼得罗沙尼的矿工罢工、“匈牙利军火”工人罢工以及不久前刚刚发生的芬夫基尔兴附近煤矿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都没有准备，其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在这几次事件中到处都无情地暴露了当权的粗暴武力，但是，在最近一次罢工中统治势力非人的野蛮行径特别应该予以揭露。工人们不愿对这些吸血鬼表示屈服，于是他们除了遭到当局的其他粗暴对待之外，又被武装暴力赶出家门，在一个广场上由军人包围起来，然后向这些可怜的人冲去并且大打出手，结果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受伤，并有不少人被打死。

一些行业发生过小规模工资斗争，在首都和外地都有。这些斗争所提出的主要要求全是缩短劳动时间，而且大多获胜。

对于组织的进展有意义的是1892—1893年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几个行业代表大会：奥匈木匠代表大会、匈牙利裁缝代表大会和炉工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全国宣传鼓动委员会，通过这些委员会的活动，成功地在各个地方为运动争取了工人。

在两年内，下述行业协会开始了自己明确的活动，在布达佩斯有：木匠行业协会、裁缝行业协会、鞋匠行业协会、车工行业协会、装订工及所属行业的行业协会、炉工行业协会、花边编织工行业协会、金饰工行业协会和粗木工行业协会。正在筹备成立的行业协会有：画匠、粉刷工、制刷工、泥瓦匠、制革工、模具工、钢铁和五金工人等行业协会。在普雷斯堡有：木工、鞋匠、面包师、炉工、裁缝、建筑工人等行业协会，许多较小的行业正在筹备成立。在阿拉德有：木匠、裁缝、鞋匠、制刷工和箍桶工等行业协会。在特梅斯瓦尔有：木匠和鞋匠等行业协会，其他行业正在筹备。克龙施塔特正在筹建的有：裁缝、鞋匠、箍桶工等行业协会。在厄登堡，裁缝、鞋匠等已将协会章程送审待批。芬夫基尔兴正在筹建的有：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和裁缝、矿工等行业协会。克雷姆尼斯正在筹建的有一个人民教育协会。米什科尔茨有一个工人教育协会的章程已经送审待批。新萨尔茨正在筹建的有裁缝和鞋匠的行业协会。此外，外地许多地方纷纷询问有关成立工人协会的事，最近在这方面的表现格外踊跃。

去年在党内出现了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这样就必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于1893年1月6、7、8日举行，一小部分代表因为不同意党代表大会关于议事规程的决议而退出了会场。后来代表大会的讨论依照议事规程顺利进行，并且在讨论“组织”这项议程时，通过了组织草案，根据这个草案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作为整个组织的核心，负责掌理一切事务。

这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全国同首都一样，呈现一派活跃的景象。首都以及外地的组织通过极其活跃的鼓动已经做了工作。最近以来，尤其是有许多工会和上面已经提到的协会正纷纷筹建。代表大会以后，普雷斯堡和特梅斯瓦尔的区组织分别出版了每周一

期的党报《新人民报》和《人民意志》。从 1893 年 5 月 1 日开始，还用德文和匈牙利文出版了一个裁缝行业报，该报坚决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原则。钢铁和五金工人的组织现在正在筹建，并很快要出版一种本行业的德文和匈牙利文的行业报纸。该组织将是全国最大的组织，单单在布达佩斯这个部门的工人就有 3 万人之多。

目前还有 4 家每周出版的党报和 5 家专业报，代表着全奥匈帝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

报刊的影响，在那些拥有自己行业报纸的部门里是一目了然的。尽管运动在产业工人中间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自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来，仍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这种进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对国际思想有了清晰和正确的领会。

由于工业人口同总人口相比所占百分比不大，所以，吸收其他人民阶层参加运动，对运动来说就更为重要了。在此应特别强调指出农业工人的动向。在贝凯什乔包和阿拉德两专区肥沃的平原地区，居住的都是纯马札尔民族居民，村庄和集镇规模很大，人口多，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已经站住了脚。我们匈牙利文党报的读者范围正日益扩大，在这些农村的居民中有《人民言论》最忠实和最准时的订户，来自那里的信件和通讯都证明，这种同情绝不是表面的，而是近来这些地区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仅引起普遍的不满，而且只有彻底改变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的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过去 15 年间，当地农民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改变了的生存条件恰恰促使这个一般认为是保守的农民阶级也要进行思考了。

这里也要考虑到国外农产品的竞争不是没有影响的。70 年代末，小麦的价格要比现在高出 50—80%，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也

大体相同的比例下降了。可以说，这些农产品出现价格暴跌，知情人并不认为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因为海外各国的农业在大资本控制下发展起来以后，这种价格暴跌是必然要出现的。美国谷物生产者由于运费低廉而能够不断扩大他们产品的销售地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匈牙利的谷物不是被从市场上排挤掉，就是必须在价格上同美国谷物进行竞争。

从那时起，匈牙利农业发生了突然的转变。这是由于出现困境造成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农业企业采取了较为经济的经营方法。使用机器的比例不断上升。要适应这种价格形势，就得加紧榨取土地和劳动力，才能获得比过去高的纯收益。

小农由于缺少需要的资本和土地七零八碎，只能沿用传统方法生产，和过去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的商品却被迫降价 50—80% 出售，所以当国家和乡镇当局日益提高对他们的要求时，他们必然处于无法维持的境地。

负债是他们破产的开端。高利贷者骄奢淫逸，小农等级则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大型农业企业采用机器促使小农加速破产，促使他们破产的原因还有一个，这就是使用机器的结果剥夺了他们一些手工活计和畜力车辆的工作机会，这在过去可以有助于补助他们那微薄的收入。

有些地方在 20 年前，小农等级的收入一直正常，至少不挨饿受冻；但现在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多数居民的财产被剥夺了；由于财产集中，使用机器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些人就完全成了多余，他们互相把工资压低，工资下降到百分之一百多^①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有产阶级的“聪明人”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恰恰是全国最富庶地区的农民倒变得“革命”了，最近两年里多次发生暴力流血事件；而在只能吃上粗燕麦粉和土豆的地方，农民倒是满意的。他们不理解，原因就在于，后面所说的这些穷苦人祖祖辈辈别的东西一概不知道，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生产不出更好的东西。相反，在富庶地区，不仅现在活着的人的父辈们没受过穷苦，而且他们自己在不到10年以前的生活也完全过得去，就是说，白面包和猪肉一向富富有余；然而现在，在这片由于大自然的恩惠收成总是最好的广阔的田地间，他们却不得不为这些食品操心，他们遭到了极度的困苦和匮乏。

这就是富庶地区的农民之所以具有革命精神的原因。这种发展的根源非但不能消除，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要越发扩大和越发明显。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尽管政府实行经常性的戒严，革命精神在当地仍然保持着，是绝对压制不下去的；相反，必将深入和扩展，以致这种精神将被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对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里我们只是例举几个行政区的情况，同时还必须补充一点，在全国正加速对小农的剥夺，土地越好的地方剥夺得越厉害，因为对于贪婪的资本来说，那里是取之不竭的。于是我们就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产业无产阶级的的发展，一个强大的农村无产阶级正在形成，它尚未被制服，正在不屈不挠地、顽强地索取自己的生存权。

匈牙利有46%的居民不会读书写字，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它妨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和深入扎根。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因而要求对社会进行改造，这一点必将发生作用，必将吸引我们同国际社会主义的潮流相汇合。

由于有产阶级毫无远见，匈牙利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因此社会民主工人党也把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摆在最前列作为自己的任务。例如，近来与奥地利的党内同志们同时开展了争取普选权的鼓动，结果在首都布达佩斯以及许多省城纷纷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有些是露天集会，通过了要求普选权的决议。

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前进中的运动对我们的影响也十分有利。我们满怀信心展望未来，同时确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主义必将不断广泛传播，匈牙利劳动人民必将同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为反对压迫、剥削和奴役而斗争，并且为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解放一无所有的人民而同其他各国工人党联合起来，从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于波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告

波兰所有 3 部分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自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来，忠实于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原则，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想简单叙述一下波兰各个部分的运动的主要情况。

加里西亚（奥属波兰）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自 1889 年巴黎代表大会作出关于五一节的划时代的决议时产生以来，已存在 4 年了。波兰社会主义者同奥地利各个地方的同志们一道，设法使自己的运动具有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自觉的阶级斗争的性质。

1892 年 2 月 1 日和 2 日在伦贝格和 1893 年 3 月 25 日和 26 日在克拉科先后召开的两次全地区代表大会，达到了加强全地区组织的目的。这两次代表大会是以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和奥地利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为基础的；党的组织章程的基本点同奥地利其他地区的工人组织是相似的，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贯彻并详细修订了党的组织章程。

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工人教育委员会，现有两家党的机关报《前进》（在克拉科）和《新工人》（在伦贝格），在各地召开了数百次公开集会，最后还有一系列审讯和迫害，当局试图以此来镇压党，但却丝毫没有削弱党。所有这一切证明了，运动已深入广大工人居民的各个阶层，它已从过去个别热情而有知识的同志的斗争，变成整个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运动也没有因为所谓的“独立派”的努力而遭到失败。同所有高度重视自己的纲领和希望在自己队伍中保持信任的党的遭遇一样，我们这里也有“独立派”。那些确实严肃对待无产阶级幸福的“独立派”，又回到了党的队伍中来了，而个别仍然坚持搞“独立派”的可悲行径的人，现在只能为个人烦恼所驱使，这对有组织的群众来说无关宏旨。

1893年，由于对争取凡年满21周岁的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普选权进行大力的宣传鼓动，党的活动扩大和加强了。比利时同志们的胜利，使得整个帝国的无产阶级满怀希望。经过近几年艰苦的政治斗争，无权的劳动群众受到了教育，他们千方百计使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成为经常性的斗争。1893年所举行的庄严的“五一”集会，参加的人数之多，如此隆重，都是前所未有的。5月1日参加克拉科和伦贝格两地集会的工人人数分别为7000人和6000人，还有外地举行的无数次集会，这证明，整个无产阶级都参加到党的队伍之中。

“五一”的激情并未熄灭；相反，紧接着又在6月间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多次集会（主要是露天集会）上表现了这种热情，这些集会都强烈地提出了选举改革的要求。

加里西亚的无产阶级和帝国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一样，绝不放弃这项事业，直至取得完全的胜利。

去年有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这就是在犹太无产者中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当犹太民族的同志们和我们手携手为反对行过割礼和未行割礼的剥削者而共同斗争的时刻，一切种族斗争的虚假的纲领在人民当中全都破产了。

犹太人的运动开头十分困难，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些困难的克服归功于犹太民族的同志们们的能力，对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最充

分的赞扬。

我们在加里西亚进行工作所处的政治情况是完全违反宪法的。各种禁令、查封报纸、解散工人协会的种种企图、在贯彻可以说是中世纪的新闻法和结社法当中的野蛮和狭隘，近几个月，在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戒严状态。作为我们对此的回击，同志们增强了准备牺牲的精神，团结互助并且越发加强了整个运动的革命性。我们镇定自若地展望未来，确信波兰的俾斯麦们将如同他们的先师一样不再有什么力量，他们的先师已经耻辱地葬身于德国反社会党人法的废墟之中。

普鲁士所属波兰的波兰工人们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891年创办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机关报《工人报》的活动，起初是由柏林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协会进行的宣传鼓动，都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工人报》订户数量的增长，该杂志在波兰无产阶级当中努力赢得的信任，在阿尔托纳、不来梅、柏林及周围地区、波森和布雷斯劳等地的波兰工人协会，从理论和实践立场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无数次集会——这一切都证明，在当地，我们的无产阶级也走上由群众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一唯一正确的道路。

不过，如果说在波森大公国或者在上西里西亚至今还看不出波兰无产阶级群众运动有更多明显的现象，那么，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仅举最重要的一些原因。这一部分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由在异邦生活和工作的同志们搞起来的，他们缺乏对实地情况的了解。此外，柏林的同志们派往上西里西亚的鼓动员，通常几乎立即就遭到了逮捕。他们先后被长期拘留审查，而后在审讯时被指控传播这些“犯罪”观点，例如李卜克内西同志的小册子和鼓动材料中的那些观点，其实这些观点在普鲁士其他地区从不被兴师问罪。

我们的宣传鼓动在这里同迄今唯一的尝试——本着资产阶级精神所推行的人民政治的尝试，就是说，同战斗的教权主义遭遇了。在这方面，将来还要进行决战。

我们的同志理解这一点，一年多来，同教权主义，同正在政治化的、自私的和惯于诉诸强权的宗教界已经在全线展开一场激战。

最近，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为使这一斗争尖锐化提供了一个显著的机会。虽然波兰社会主义者没有获得席位，但是，波兰社会主义者候选人所赢得的6000张选票表明，数以千计的波兰人不顾法庭、宪兵和天主教會的迫害，已经宣布他们不再听命于圣职人员和贵族了。

波兰贵族那种奴隶主义、那种忠顺的奴性，还有作为这类政治的结果所必然要落到人民头上的沉重的负担，将越来越有力地推动人民去搞独立的阶级政治。

在这场反贵族、反教会的运动中，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大喊大叫者的营垒中找到一个同盟者。但是，这些人过去除了提出浅薄的反犹太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也提不出来。同样，这次选举也表明，工人运动在迅速超越无产阶级的这个战友。

波森的小资产阶级候选人拥有一家已出版10余年的日报，他本人住在城里，并且在当地工作多年，他在波森所获得的选票并不比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莫拉夫斯基同志多。莫拉夫斯基从柏林来此地进行宣传鼓动才几年，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年轻的工人组织提供的一点微薄经费。

在俄属波兰所处的情况下，谈不到有什么正常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运动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只好不讲，这既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也是由于这些情况对我们来说虽然意义很大，然而对于本

报告的读者说来可能是次要的。我们只略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运动的全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使所有政治工作都封闭在秘密社团和小团体的范围之内，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就本质来说是一个人民的群众性运动的社会主义，会有什么样的前途。现在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断言，我们的同志已经找到走出这种两难处境的出路，这就是生活和 50 年斗争所指给他们的出路。由于他们在这期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群众鼓动，他们也就划清了秘密组织的活动界限。今天我们在整个地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和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虽然无法从组织上把整个运动包括进来，但是能够做到给予运动的继续发展以必需的武器这一点，也就是令人满意的了。只是仰仗我们来自华沙的同志从 1878 年起所进行的这种富于牺牲精神的工作，我们才能顺利避开社会主义运动正常发展的条件和本地区政治情况之间的矛盾，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过高估价我们同志的能力。不言而喻，这一出路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不尽相符，不过，它却保证正在遭受沙皇压迫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在临近的政治斗争中，将赢得第一流社会力量的重要地位。

为证明上述这点，我们通报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可以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组织不得不在多么可怕的环境中进行斗争，以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该是多么巨大。

1891 年，从 8 月份起，种种迫害把近 80 个人拉出我们的队伍。1892 年被捕的人数上升到 160 人；但是，如果把在罢工中和因为罗兹五月暴动而被捕的人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 1000 人。今年已有 150 人被捕，在被捕者中还有十六七岁的文科中学学生，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揭露。拘留审查的平均时间为

一年，虽然我们知道，有数十桩案件侦讯时间长达两年。有一些案件，在两年的监禁期间，受害者仅仅被提审过两次；每说一句“不知道！”就使他们付出监禁一年的代价。判决是通过行政的途径而不是通过法庭的途径作出的，而且通常都是2—5年单独监禁。

尽管如此，运动的发展还是越来越迅速。首先，真正的工人运动的急剧成长可以作为证明，因为，虽然协会（甚至行业协会）和集会遭到禁止，虽然受到书报检查的野蛮控制，这个运动逐年都在发展扩大。1892年五一节过后，在罗兹有60000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工人不得不同军队进行4天的巷战。1893年5月1日前，工厂主企图安抚工人，因此把工作时间缩短一小时，同时还相应提高了计件工资。1893年，我们终于看到，在华沙尽管逮捕了上百人以阻止五一节的集会游行，但是，不少行业仍然完全停工，并且罢工人数超过了6000人。

凡是政治情况不允许运动正常发展的地方，那里就有破坏性倾向和破坏分子的广阔土地。在我们这里也是如此。不过，自1891年以来，对这种祸患的觉悟提高了，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力量正联合在一个旗帜下和一个组织“波兰社会党”之中。

波兰社会主义力量的唯一组织创立的最初结果，是政治纲领在最终目标和具体细节方面能以得到扩充。在“波兰社会党”的纲领中，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努力争取推翻沙皇统治和取得波兰的独立地位。

波兰被俄国兼并部分的政治情况，需要来自外部的持久的援助。国内现有的秘密印刷所不是始终有效的，而且永远也适应不了最重要的需要。因此，流亡国外的人便集合起来，他们同秘密活动保持着接触。最近出现了联合所有力量创建“波兰社会党主

义者国外联合会”的动向，其机关刊物是《黎明》，其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同时也就是“波兰社会党”代表团。

近5个月期间，波兰社会党主义者国外联合会采取费用巨大的、困难的偷运办法，把1万册小册子运进波兰。

在国外还有两家波兰的社会主义杂志，即《晨钟》和《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后者是一个理论性季刊。

* * *

在被瓜分为3个部分的整个波兰，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均提供了无数证据，证明它们对待国际团结是严肃认真的。

通过来自波兰3个部分的代表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采取共同的立场，我们显示了波兰社会党在争取统一的努力中，决不是要使民族沙文主义复活，而只是想维护作为国际社会党阵营中的一员它所应有的地位。这种地位证明，同国际社会党阵营特别是德国同志当中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一致的，德国同志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声明在我们祖国的3个部分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从而我们确信，我们的观点同欧洲所有革命政党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将不停地去争取恢复被我国资产阶级卑劣地出卖掉的波兰的革命价值。

除本报告外，我们还刊印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现状和过程（1889—1893）的报告。致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是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编辑部写的。因为该报告谬误百出，所以我们不得不声明，波兰代表团成员对该报告概不负责。

波兰代表团：

达申斯基，伊格纳齐

格拉布斯基，斯塔尼斯拉夫
约德柯，维托尔特
柯察基维奇，扬
门德尔森，玛丽亚
门德尔森，斯坦尼斯拉夫
莫克洛夫斯基，卡齐米尔茨
佩尔，费利克斯
斯捷亨贝格，雅科布

关于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现状 和过程（1889—1893）的报告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

《工人事业报》编辑部

同志们：

来自俄属波兰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这还是第一次。

华沙和罗兹的工人从政治专制和顽固反动的黑暗王国派出自己的一名代表，同时也是我们的代表，来参加新旧两大陆的工人议会。

我们向大家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给你们带来令人高兴的消息，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在我们这里也已经扎根，同时尽管资产阶级同野蛮的警察政权相勾结进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红旗也已经成为波兰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指路明灯。当你们在西方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忠实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在东方正坚定不移地同俄国专制统治——欧洲最后一个最残暴的反动堡垒进行斗争。根本不同的政治情况迫使我们采用形式上不同的斗争方式。我们迫不得已以暗中密谋来隐蔽我们不间断的工作，一直在使自由和生命受到危险，因此，我们不能像你们那样自由和公开地行动，在个别情况下，如五一节，暂时无法采取你们那种斗

争方式。不言而喻，这一斗争的形式和手段也必然是不同的。所以，你们经过富有成果的讨论所作出的决议，只有少数几个适用于我们的情况，虽然在这些重要讨论中所考虑的手段和途径为的是使新旧两大陆的无产阶级达到崇高的目标，达到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

在所谓“会议桌上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存在差不多15年了，但是，直到4年前，它还不能称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建立了巨大的功绩；表达了社会主义最初各流派的思想并使它们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889年以前一直领导着运动，它虽然在形式上承认《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原则，但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政治情况截然不同于西欧各国的国家里去运用这些原则，谈何容易。该党未能解决这一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俄国革命政党“民意党”的英勇斗争对我们运动的影响。革命者同万能的独裁者所进行的英勇决斗，在整个欧洲受到高度的赞赏，无意之中唤醒人们的希望。因此，波兰社会党从和俄国革命者共同斗争的立场出发，完全受民意党的影响便不足为奇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和策略同正式纲领发生矛盾，表现了乌托邦式密谋的布朗基主义。

在当时革命者的概念中，推翻沙皇制度是同时并举的。当时的革命者和他们的兄弟党民意党一样确信，革命可以由一些坚决的、精力充沛和目标明确的密谋者们搞起来。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所起的作用仅仅在于，在决定性的时刻去支持社会主义的密谋者。

为了适合这一前提，党的宣传鼓动只着眼于通过宣言和恐怖活动来唤起革命的感情；对于在今天的社会制度中提高工人群众的精神和物质水平则想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想过。人们忽视了暂时需要迫使当今国家作出的社会和政治上的让步，应被视为最近

的目标，各国工人政党都是这么做的。党限于一方面争取个别人（这样做大大有利于以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容易开展）和另一方面唤起人民群众对君主专制和现存社会制度的仇恨；党生活在专制国家，它努力奋斗的直接目标就是在近期实现一场社会革命。党曾不止一次不得不参加群众独立采取的、旨在达到一些经济的或者政治的目标的行动，同样也参加过1890年庆祝五一节的活动。

但是，社会主义为了获得所赋予它的意义和成为工人的阶级斗争的真正标志，最终必然要同布朗基主义的传统决裂并立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基础之上。社会党人在观点和策略上的这种转变始于1889年，结果形成了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们终于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就在于，目标明确地去领导在资本主义下以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发展着的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认识到，在经济领域为争取劳动阶级当前利益的斗争，争取民主政体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在能够推翻当今社会之前所必须完成的教育。新的组织在其实践活动中一贯注意遵循这一观点。

同任何社会主义政党一样，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也努力吸引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精力充沛的分子并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但是同时却不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领导者，而是放在培养目标明确的鼓动员、培养工人阶级在实现自己一切任务和进行一切斗争的领袖。

备受剥削的波兰工人的贫困的物质状况必然要引起一场拚死的经济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应挺身而出领导这一斗争，给它以统一的计划，给它以组织，并设法使它具有明确的目标。

最近3年举行了大约30次罢工，几乎涉及许多行业。这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富有成果的罢工，都是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积极领导下进行到底的。这个数字在西欧恐怕几乎不值一提，但对我

们来说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罢工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是唤起冷漠的群众，带动他们去进行反抗的最佳手段。这是我们初步的实际成绩；它清晰可见地证明了团结一致的阶级觉悟的意义，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原则上的对立，暴露了政府的阶级性，指出同资产阶级和政府这二者进行斗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为调节这一斗争并使它顺利进行，社会民主党必须建立一些相应的组织。例如成立行业协会，谋求直接的经济上的好处，同时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奠定稳固的基础。为了同样的目的，设立一些图书馆和读书小组。

在两个主要的工业中心，设立了正规的罢工储金会，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参加。这些储金会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注视着工人们当前的物质利益，所以受到最广大阶层的赞许，并且通过它们的管理在长期的运动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成员，另一方面它们又为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提供合适的联络点。

就这样，社会民主党人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真正获得广大群众的爱戴和信任。

工人采取的坚决态度，迫使资产阶级和政府作出一部分让步，有时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一点或把工作时间缩短一些，政府迫不得已担负起劳动保护者的角色，监督只能是初步的劳工保护立法的完成，以便起码消除到处存在的极为明显的弊端；工厂视察组织和视察员的数量增加了。自然，在这里同推行“上边的社会政策”的所有国家一样，主要维护的是一些假象，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

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态度，使得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因为，一方面这个劳工保护政策是虚情假意，提供给无产阶级的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可怜的措施，而且绝大部分还是纸上谈

兵；另一方面，政府又千方百计使用警察粗暴镇压被剥削阶级的任何一个独立的行动。特别条例规定禁止罢工，如果无视这一规定而举行罢工，那么警察和军队就要去镇压。工人协会和工人储金会也是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参加的成员就有被判多年监禁的危险。这类事实，对工人来说每一桩都是实际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时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因为每一件事实都清楚表明，专制主义是一个障碍，它使得劳动阶级的现状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善，它阻挠整个社会主义的努力；无产阶级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以推翻这一障碍为宗旨，所有的力量都要放在以民主立宪来取代沙皇制度上。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口号，政治斗争，为劳动人民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斗争，在五一节那天响彻云霄。

在我们的无产阶级这里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五一节的全部意义。在1890年就有近万名工人举行庆祝活动，主要是在华沙，同全世界工人一道。第二年参加庆祝的人数就上升到25000—30000人，而且除华沙之外，还有施拉多夫和罗兹两个工业中心的工人。1892年五一节，仅罗兹就有80000工人罢工参加庆祝，由于警察挑衅发生了流血冲突，在当时为整个欧洲所瞩目。也是在这一年，尽管党由于许多人被捕遭到可怕的血腥镇压，尽管政府极尽残暴之能事并布下密探，有数千工人仍举起八小时工作日的大旗，只是由于在工厂城市动用了全部军事力量，才得以“维持住平静”。

五一节在我们这里的性质和意义同奥地利非常相近；但是对我们来说它有着更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我们公开表达群众意见的唯一机会。五一节唤起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鉴于我们这里的状况，停止工作是庆祝五一节的唯一的

方式。这类具体、鲜明的示威方式本身能够激发热情和发挥影响；它具有表明政治态度的性质，这同奥地利一样。在毫无自由和无权的情况下，它同八小时工作日、普选权、集合与结社权、信仰自由、语言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等项要求是互相结合的。在这时印刷的各种声明中都一一写明了这些要求。最后，五一节还是一个使我们的群众可以看到国际性的团结的唯一具体的形式；还可以说，它是使我国无产阶级感到自己属于强大的国际工人大军中的一员，并以此身分进行活动的唯一机会。

这就是最近4年来我们社会民主党活动的情况。根据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我们始终不渝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最近4年来，数百名同志失去了自由；4次五一节有2次类似富尔米那样，结果同军队发生流血冲突。1891年，工人们像各国一样平静而庄严地庆祝五一节，军队发起进攻，挑起一场流血斗争。第二年，罗兹的80000名工人给残暴横行的士兵提供了真正屠杀的机会，这又是由警察挑起的。逮捕每天都使一些同志离开了战斗的行列；华沙“要塞”常常人满为患，不能收容所有被捕者；但是不顾这种流血牺牲，斗争仍顽强地坚持下去。最近时期这一斗争有了新武器，这就是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纸《工人事业报》。

波兰王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我国资产阶级毫无历史传统，完全成了利润狂，为了政府保证对他们的物质利益给予保护这点小利，而公然玩世不恭地抛弃一切爱国主义的政治愿望。俄国的销售市场使他们能够从波兰工人那里榨取到剩余价值，从而把他们变成了“王冠和圣坛”的忠实支柱；他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波兰的小资产阶级反倒非常富于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它同因为与俄国的

联系而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在利害上的矛盾，燃起了它的爱国情绪并使之成为拥护波兰独立的热心人。但是，和大资产阶级一样，它也没有什么独立的作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唯一采取对立行动的成分是工人阶级。自然，每一种政治思想，每一个对立行动都试图使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代表。我们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方面不自觉地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也试图把工人运动引向爱国主义的航道；因此，这些“知识分子”近来屡次想把复兴独立的波兰帝国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融合成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杂烩。不过，试图把半爱国主义的性质强加给今年五一节的初次实践，遭到有阶级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有力抵制而宣告失败。

爱国主义的倾向、独立的波兰帝国的理想，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吧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争取过去。前波兰王国 3 个部分的经济社会史把工人阶级分别有机地同 3 个兼并大国合为一体了，因而每一部分的工人都有其特殊的愿望和政治利益。当世界市场逐渐饱和的时候，会议桌上的波兰的大工业今天之所以存在和发展，原因就是政治上同俄国共处，因而形成了两国间的经济纽带。这一经济纽带正在不断加强俄国的居心不良的政策统治，俄国执行的政策总的来看促进了波兰工业的发展。它这样做一方面是从俄罗斯化的利益出发达到争取波兰资本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俄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这种经济联系根源于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的逻辑。鉴于这一联系，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波兰国家的愿望缺乏任何现实的基础。面对这些事实，爱国主义便成了以其炮制者的主观愿望为基础，以爆发一场欧洲大战的种种无法预见的可能性为实现手段的一个纲领。我们的爱国者所指望得到的欧洲民主派的支持，尽管有着巨大的道义上的意义，但是，却无法代

替这一纲领所缺乏的物质基础。

复兴独立的波兰的纲领，因为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所以也就不会产生什么符合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活动。波兰 3 个地区当中一个地区有普选权，政治上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自由；一个地区在政治上只有争取普选权的一点权利；最后一个地区则完全处于专制的束缚之中。这样，要想有一个工人阶级最低的共同政治纲领，今天尚无实际的可能，因为工人政党的政治活动总是要同一定的政治形式相符合。在今天，接受那个纲领为政治纲领，恐怕只能意味着准备放弃任何政治活动。但是，工人阶级必须进行这样一种活动，只能争取工人阶级来拥护一些现实的要求，这些要求今天就可以以实在的、明显而重要的需要的名义形成实际斗争。今天，这样一种基于现实情况的政治行动，对加里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就是它同全奥地利的无产阶级争取普选权的共同斗争。对于波森和西里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政治纲领就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行动。对于俄属波兰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纲领则是，同其现实生活环境相适合的、俄罗斯帝国全体无产阶级的共同口号——打倒专制制度。这一纲领既是无产阶级日常经济斗争需要的产物，也是其整个社会愿望的产物。这一纲领使得俄属波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同时防止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因为纲领以争取到最能符合无产阶级地区性利益的这样一些政治权利作为无产阶级目的。最后，这一纲领将通过平坦的道路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使工人阶级接近这样一个时刻，那时将随着彻底消灭一切压迫而同时也消灭对波兰民族的压迫和根除一切文化上的压制。

这个纲领提出打倒沙皇制度为最近的政治任务，并不指望在其实现当中欧洲政治发生什么偶然的变革，它的存在不是因为个

别人和衰落了的人的阶级的愿望和理想。确切说，这个纲领是历史客观进程的产物，它使得宗法制的农民经济解体，从而破坏了沙皇制度的物质条件，它同时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并随之创造了必将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

我们的工人阶级努力本着自己的利益争取获得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自豪地意识到，他们正在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他们通过与欧洲反动派最强大的堡垒的斗争，正在切实地为伟大目标的胜利作出贡献，今天这些目标正把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关系。最后，犹太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并处于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府的摆布下。鉴于这些情况，人们能理解这一宣传开始是多么困难，宣传工作首先应归功于我们的不知疲倦的朋友若昂·纳杰日杰，同时，他也确实得到了一些犹太青年的帮助。

犹太工人的社会主义组织，使在工人中进行的一切排犹主义煽动都徒劳无获了。

然而我们的运动的最突出的事件是，1893年4月13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全国社会主义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在道义上的成功，超过了它的组织者的期望。来自各地俱乐部和工人团体的6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以前党分裂为地区性或地方性的集团，除了共同的纲领外，没有其他联系，而且有时遵循不同的策略。

大会的工作一方面是保证党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是补充并批准直到那时被默默遵循的纲领。

代表大会同时还表明了社会党对待反对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想以此来吸引城乡工人。无疑，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历史现实，即刚从奥地利的枷锁下解脱出来不久的马扎人统治阶级，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霸权而重又采取了可耻的压迫斯拉夫民族和罗马尼亚民族的政策。

在特兰西瓦尼亚，300万罗马尼亚人事实上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在议会中没有一个代表。他们遭到一个横行无忌的政府的不断的欺压。

这种事态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在罗马尼亚掀起了一个相当强大的抗议运动，而资产阶级则把这一抗议运动推向了沙文主义。社会党不能不关心这一民族主义问题，更不能不关心反犹太主义的活动。代表大会明确表示抗议马扎人政府的极不公正的行径，同时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要求工人阶级反对一切沙文主义的行为。

事实上，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的危险是来自俄国，因此他们更高的政治利益是应该互相接近。但是马扎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无产阶级在考虑到除了这一点之外，也不应忘记他们在共同的斗争中应该保持兄弟般的团结，因为他们的共同斗争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这个敌人则是没有民族性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代表大会一致谴责排犹主义不仅是一种原始的种族斗争的残余，而且对工人阶级更是一种欺骗，它企图隐瞒一个最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在工人的寄生虫中是没有种族与宗教的区别的。

我们最值得庆幸的成就是代表大会完成并实现了最基本的任务：

1. 奠定了一个有纪律的组织的基础，保证了党的行动团结。由全国代表大会每年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
2. 代表大会制定并批准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新纲领。

这份纲领首先是全面考虑了我们国家实现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理由，共分 3 个部分：

在有关政治要求的第 1 章中，罗马尼亚社会党提出了普选的要求，把普选作为要夺取的最必要最直接的目标。

直到目前，我们实行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无耻与欺骗的选举法。下述数字比一切评论更能使人理解这一点。所有罗马尼亚公民被称为选民，然而根据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选举法把选民分为直接选民与间接选民两种。在 500 万人中，只有不到 70 万直接选民，并分为 3 个选民团：第一选民团由大地主和资本家（约

11 000) 组成，提名 75 名议员；第二选民团包括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约 27 000）提 70 名议员；最后是第三选民团，由工人和农民组成，几乎全由代表团投票选举（50 人指定一个选民），据此，在第三选民团中只有 30 000 选民参与第二级选举，仅提名 38 名议员！罗马尼亚的选举是最不自由的，因为除了最无耻的精神上的压力外，人们还要反对由政府收买的帮派集团，因此，人们就容易理解，只要存在现在这样的选举法，我们就能利用它掀起政治行动。但是，同在议会的一切直接行动一样，历次选举的巨大成功却又在法律上禁止我们这样做。

在第 2 章中，论述了工业工人的直接要求。同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一样，我们的纲领也提出了类似的劳动保护基本措施。罗马尼亚处于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业发展的手工业时期阶段，其表现为少量的工厂和大量的小作坊。这一阶段工人受的剥削比在大工业时代还要厉害。

以上提到的只是我们纲领中有关政治和工业的两章，下面我们要着重谈一下我们的农业纲领，这是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在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罗马尼亚代表担负的特殊任务是提出农村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问题。

农业社会主义纲领是所有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都必须解决的，无疑在大的工业国家，集中在工厂、矿区里的无产阶级在改造现代化的社会中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由他们组成了阶级专政，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只需农业工人保持善意的中立就可以。而在像我们这样的农业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情况就并不如此。在这类国家里，人们可以在尚不十分发达的工业工人中招募干部，但是，要形成一支强大而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军，则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无产者，或者是正在转变中的农业无产阶级。

为了深入农村或把农民吸引过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不仅必须克服沉重的物质上的障碍，而且首先面临的是理论学说上的巨大困难。

在布鲁塞尔的报告中，我们叙述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强调了罗马尼亚农民的经济状况，并解释了他们向无产阶级化过渡的进程。

我们将用一些篇幅提出一些特出的事例，以帮助理解我们国家的特殊条件而在纲领中采取的一些条文和措施。

在1864年，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颁布解放农奴令，并且作为必然的后果，废除了农奴制的强迫依附关系，国家在农民中分配土地。但由于这一法令而产生的情况是：贵族被迫向他过去的农奴提供的小块土块，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足以农民养家糊口。

欺骗性地执行法令还克扣和减少了分配的土地，以致农民完全无法放牧自己的牲口。

这样，在一个广阔的农业国家，伴随小土地私有财产——这种小块土地还不断在其继承者的手中被分割得更加零碎——而出现的则是始终不断的兼并，土地不断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其结果是容易预计到的，大量的农民今天完全丧失了一切财产，尽管多数人还多少有一点，也只是一种虚幻的财产。实际上这多少有一点土地的农民比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更不幸；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必要时能迁移，寻找工资更高一些的工作，而农民则被极小的一块土地拖住了，迫使他们仍然只能在当地大地主的魔爪下生活。

从1864年起，被宣布为自由民的农民和大地主（或说得更确切些是他们的农场主，因为在罗马尼亚，大部分地产是农场化的）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愤慨和可悲的。同人们在最坏的农奴制所

能想象的一样，农民为了养家糊口，必须向大地主租一块土地，并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耕耘。收割完毕，大地主或他的农场主一般要取走他一半的果实，有时甚至是全部收成的 2/3。然而除了这种实物支付之外，农民还有其他额外的义务，他必须按规定的日数在贵族地主的土地上工作。他本人、他妻子、他孩子都必须在地主的土地上犁地若干天，在地主的玉米田里锄草若干天，等等。并且还必须贡纳一定数量的鸡蛋、鸭、羔羊等等。

农民有各种各样的义务，其类别、花样、数目是如此复杂繁多，以至不幸的农民都无法应付。

一些官方的调查报告，特别是民主报刊大量刊载的各种契约，揭发了可怕的事实。例如，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扣除了一个大地主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明细帐目后，一个不幸的农民为了 20 法郎的借款，他得付出 200 法郎的利息。一种极为普通的情况是：在冬天，农民必须商借玉米作食物，农场主便借此谋利，强使农民接受最无耻的高利贷并且承担上面提到的各种义务。

这种可耻的剥削甚至都是违反普通的法律的。

显然，在“放任自由”的统治下，被缺乏生活必需品逼得无路可走的农民不得不接受这些大地主强加于他们的野蛮契约，然而如果以后农民想解脱契约规定的义务，贵族就强制他们进行诉讼。而诉讼就意味着要审判费用，又要损失劳动力，因此判决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农民是极端穷困的。

而且年轻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已成了土地所有者——也在调解农民和地主之间关系的土地法的掩盖下，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一方面是司法制度的形式，一方面则由行政上给了地主以强大的力量，得以对农民实施勒索性的契约。在罗塞蒂好心诚实的鼓动下投票通过农业法，并未使情况变得更好些。由于资产阶

级的这种过度的剥削，不到 30 年，国家已失去了富裕的生产力，农民的贫困达到了顶峰。罗马尼亚农村人口的贫困与没落只有俄国的某些地方才能相比。农民缺乏最基本的人身保障，农民的政治影响至今几乎等于零。然而，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只有依靠农民并且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才能形成力量。

当代社会主义是大工业无产阶级的表现，因而很自然，战斗的社会主义集中一切力量从事组织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这个学说的主体。

因此，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在针对城市工人的宣传工作中只能遵循他们西方兄弟所走的路。而当涉及到在农村工人中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时，就不能这样采取同样的方法了。罗马尼亚的干部们感到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得不开辟一条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在策略方面不能不发生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必须在理论上作出真正的让步，而有些人则认为只须在表面上作些退让就行了。我国工人，特别是我国农民的生活条件同西方的是如此不同，因此我们的策略以及我们农业纲领中所提出的当前要求同样必须是适应我国的特殊情况的。为此，这里举一个事例，我们将重复指出，罗马尼亚农民常常还是一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尽管是极小的一块，但是毕竟实际上是一个土地所有者。由于这一情况，农民心目中最关切的并首先要求的，依然还是一块土地。

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站在农民运动前列的雅西的社会党人因而就注意到，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立法会议曾经通过一些立法，然而后来却又被政府小心地隐藏起来了，根据这些立法，规定各类在 1864 年未曾得到土地的农民有权要求并可在国家的领地上分得土地。然而，支持个人的土地要求，在某些理论家

看来是与集体主义和我们的原则相矛盾的。——这些人并不考虑这一情况，也不改变任何观点，在他们接触农民时，就完全按照正统的社会主义语言进行宣传。他们很注意向农民强调，即使他们一旦得到了自己的一块土地，最后也是会被大地主吞噬掉的，因此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就是剥夺大地主的土地，并将土地国有化。

还有一个因素决定了罗马尼亚社会党的这一态度，他们认为在这一观点上与欧洲各社会党的理论家和干部代表保持一致，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的，因为这样他们就成为与俄国接壤的东欧社会主义的先锋队。

然而，为了自豪地履行这一使命，罗马尼亚社会党需要吸引并正确地依靠广大的劳动人民，依靠农民群众。直到现在我们农民的处境的悲惨和愚昧是难以言状的。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受俄国密使的欺骗，相信俄国沙皇会来帮助他们。——而只有社会党已证明能够赢得农民的信任，能够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并看清沙皇的丑恶面目。但是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首先应该支持他们的土地要求，证明我们是和他们一起反对贵族的。

此外，一个更直接更紧迫的考虑促使社会主义者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运动实际上会不顾我们甚至反对我们而获得成功，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们在这方面的预见。农村的暴动都是在那些社会主义行动没有影响的地方发生的，而且都被残忍地扼杀于血泊中。然而当要求土地的请愿书开始成千上万地涌向议会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就感到惊惶失措，一致决定分批向农民出售国家领地。

如人们所料想的，上述法律的实施过程十分缓慢，而且执行中出现的差错和滥用条例的现象十分严重。

布加勒斯特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到农民坚持要求出售土地，决定不反对执行已通过的立法，但是确信，这种改良是不会见效的，甚至比 1864 年的改革更为渺茫。大会认为，罗马尼亚社会党应该宣传另一种解决方法，我们党从来没有忽视过对农民宣传这种方法。

为此，大会在它的农业纲领的开头就写进了下述条款：

“凡凭借公家支持而形成的个人所有的大地产均由国家逐步加以收购，并将收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特别优惠公社集体租用。”

或许会有人想在这个条文中找到过去的亨利·乔治与拉萨尔主义。但是，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实际上，罗马尼亚社会党人并不把这一改良认为是问题的最后解决，而只是看作是一个——有如八小时工作制那样的——过渡性措施，没有任何决定性意义，而只是一个行动的基础纲领。

另一方面，这不是空想或在我国不能实现的。罗马尼亚拥有近 200 万公顷属于国家的土地，并且最近已决定把它们全部卖给农民。至于关于政府赎买私人地产问题，则更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如我国最强大的自由党，已把这一点写入了他们的纲领。^①我们和他们完全不同的是在这些土地的用途上：他们主张出售，我们则主张租赁；无论如何，这已足以证明我们的要求决不是不能实现的。

在这个农业纲领的条文中提出了不少目标，这里提一下最重

^① 资产阶级政党的这种慷慨可说明如下：在近 30 年来，通过交通道路的建设，尤其是对农民惊人的剥削（见布鲁塞尔的报告），地租已大为增加，因而土地的价值也大为增加，所以向国家出售土地现在就成了极好的买卖。

要的问题：

有人强调认为，由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赎买私人地产，就会被该政府转变成为新的压迫手段，有如至今存在的这种情况，只能使资产阶级致富。

但是，应该注意到，将土地租赁给资产阶级剥削者（这些剥削者至今仍占有着我们国家的土地）和租赁给直接耕种者，这两种情况是有显著区别的。至于谈到压迫的问题，则明显地是只有在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压力下，并在社会党的监视下，地产才不会被转让；而按照我们的原则进行组织，则将是抵制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最好的武器。

另外，认为今天要探求一个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农业纲领和行动纲领的想法是近乎空想的。布加勒斯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确实存在缺陷和不足之处，然而我们认为，纲领仍然是具有许多可取之处的，我们可例举证据：

现在通过的纲领使我们能在农民中进行更为积极的宣传。实际上，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每当同农民在一起时，从不放弃向他们阐述介绍现代社会主义的知识。当雅西的社会党人在帮助农民向立法机关请愿，要求向农民出售地产时，他们不断地向农民解释，获得一小块土地只是一种暂时的治标的办法，并且向农民指出什么才是彻底解放他们的真正方法。社会党人对农民所显示的洞察力也感到惊奇。然而当这些农民一回到自己的村里，就很快忘记了集体主义，他们心里所牢记的是满足他们直接要求的東西，这就是获得土地和劳动工具，由他们个个拥有这块土地。我们纲领也倾向于使农民获得土地，然而要使他们获得土地的方式同社会主义更有逻辑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农民的要求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宣传就会更有成效。这就是我们的行动纲领。一

且我们的改革得以实现，我们认为，似乎开创的新局面将比现在的农业小所有制更适合于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们的农业纲领所涉及的其他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畜牧业问题。缺少用作牧场的土地是农民破产的主要原因；因此社会主义的纲领不仅要求采取保护措施和建立公共牧场，并且还要求向土地所有者出售邻近放牧所必须用的土地，交给农民共同使用。

我们在本报告中详尽地着重强调了农业纲领，因为如同我们出席上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我们受委托向你们提出讨论农业工人问题。

现代社会主义是从工业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宣传开始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所关注的几乎完全只是与工业工人及矿工有关的问题。这是事物本质所产生的合乎逻辑的进程。工业无产阶级决定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也是它将被指定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它的利益当然首先吸引人们的注意，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先锋队。然而我们相信，现在已经是社会党关心它的后备军、特别是农业工人的有利时刻了，我们乐于认为，不仅在苏黎世，而且在未来，与农业工人有关的问题将在今后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日程上占有突出的位置。人们将在大会上讨论有关宣传、组织的方法以及为满足农业工人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要求。

希望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作出决定，罗马尼亚社会党代表团第二次提出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关于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情况的报告

对于瑞士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和性质来说，有 3 个事实意义重大：

1. 瑞士居民在全国分布颇为均匀。只有一个城市即苏黎世有 10 万人口。拥有 10 000 多人口的乡镇只居住着总人口的大约 1/6。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和革命性的养成，在人少的范围比在集中于一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中要困难得多，理由是明显的。工业利用水利来弥补煤藏的缺乏，因此，工业沿着河流分布，这一情况对于尤其是工业分散不无影响。

2. 再有，我国政治生活较比重要的部分都是在各个州进行的。1848 年以前，瑞士不过是一个结构松散的邦联。那一年产生的宪法才建立联邦国家，该宪法于 1874 年进行了修改，宪法使得我们在国民院中有国民代表并将过去分由各州行使的许多权力移交给联邦。虽然自那时以来，中央集权运动有很大进展，但是，在国家生活的广阔领域（私法、刑法、司法、教育、工商业管理法、税务）中，各州都是独立自主的。后果是，我们没有什么瑞士政党（撇开社会民主党不谈），州政治那些狭隘的小问题纷纷突出起来，极大地吸引了注意力，使得人们眼界狭小，完全妨碍着提高观点和开阔思想。这种情况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是，要花费不小的

努力才能把各个团体和州的各个协会相互联系起来，并建立一个包括整个瑞士的、由统一思想指导的工人组织。3种国家语言的差别也产生同样的影响。

3. 最后一点，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着巨大意义的是州的和联邦的民主宪法。虽然各个州所代表的民主发展阶段十分不同，但是大多数都有法律主动性，都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公民投票，不仅立法委员会而且比较重要的行政和司法职务都经过人民推选。人民的民主权利对工人运动所发生的影响，用一句话是无法说清楚的：就一个方面来说，这些民主权利对工人运动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人民参与立法就给立法本身以确定的方向，就是说要本着充分考虑人民的要求这一精神进行立法，这方面的证明不难得到。诸如无偿提供教育经费、不仅小学而且部分中学和文科中学实行免费教育、免费丧葬等等制度，都是在民主政党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些让步。而低估其价值的人也得承认，通过我们的民主制度使得人民能以参加政治活动，总是有利于唤起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训练，启发他们提出组织起来的要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度无疑创造了有利于社会民主运动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使得人们难于清楚地认识历史的过程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它不是加强阶级觉悟，而是使之涣散或者说使之削弱；它掩盖社会矛盾，而不是去消除社会矛盾。由自己阶级利益所引导的无产者和由自己经过教养已成习惯的民主思想指导的资产者常常不谋而合。他们的目标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双方都甘愿将错就错。所以，他们的战友情谊得以长存，而长期谅解正是取决于他们的美好愿望。不过最终对这种错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无产阶级，这是不言而喻的。

* * *

认识到以上 3 个因素就可以非常容易理解瑞士工人运动，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成功地争取到一些重大进展而没有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为什么社会民主运动没有像德国那样强大和具有原则性。

有碍于工人运动的这些情况，尤其是缺少较大的工业中心，首先影响到**工会组织**。这方面的原因垂手可得。尽管如此，多年的努力总不是没有成就的。关于组织情况，应作如下说明：全部行业组织都建立有总联合会。多数联合会均属**瑞士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关于这个联合会，多年任书记的培克给我们写了下面的材料：

瑞士工会联合会近几年有了令人可喜的发展。不论情况如何，经济分化过程是不可遏止的。企业主无限制的竞争，再加上使用技术辅助手段，日益产生着对工人等级来说是灾难性的影响。为每天的面包而进行的这种奋斗，对于大批雇佣工人来说日益困难，以至最冷漠的人也必然醒悟，只有通过强大的行业组织才能有效地反抗剥削。共和派企业主们快要把工人逼到这种地步了。在资本的压迫下，工人到处都受奴役，不管是共和制政体还是君主制政体，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必然对工会运动十分有利。近几年各种各样的事件，企业主对于工人在争取较好的生存条件方面每一个独立行动的无情态度都确证了事物的这种观念。

在纺纱工人工会成立以后，例如沙夫豪森精纺毛纱厂厂长公然发布如下指令：“像‘精纺毛纱’工会这样的协会，我们是不能容许的，而必须断然要求该协会解散。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会撤销解雇 ST. 和 B.。”又如一个雪茄烟厂厂主写道：“我现在正准备重新雇用我的人员；如果您能带来一批品行端正的人，对我是合适的；但是将来只有那些**没参加工会**的人才能在我这里找到工作；总的说来，**威尔雪茄烟工人工会**必须解散。 泽恩—

吕提”。如此看来，结社权何在呢？

在这些情况的压力下，行业协会（约有 16 个）团结得更加紧密并且赢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通过定期缴纳会费，我们有一个所谓后备基金，这样就能在发生任何冲突时立即进行介入并迅速促成决断。

近来我们成功地把数量众多的钟表匠组织起来，或者换句话说至少把他们五花八门的派系集中起来了；不过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在瑞士东部的刺绣工人当中至今未能收到成效。

此外还应指出，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已深深扎下根，而且五一节也一年比一年意义重大。走在大家前面有进取心的是印刷业同盟，它在各个部门均已争取到九小时工作日。

尽管敌人不懈地通过目光短浅、毫无价值的刁难对前进中的无产阶级进行阻难，挥舞饥饿的皮鞭把最优秀的力量逼出我们的队伍，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气馁，因为我们明确了道路和目标；我们的口号是：前进，永远前进，直至把劳动从雇佣奴役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目标达到为止。

工会联合会总联合会

分会数目

印刷业同盟	21	裱糊匠联合会	5
装订工联合会	9	石匠联合会	7
裁缝联合会	12	泥瓦匠联合会	4
鞋匠联合会	10	漆画匠联合会	4
木材工人联合会	22	磨粉工联合会	5
金属工人联合会	40	制陶工联合会	5
铁匠和制车工联合会	6	编筐工联合会	5
玻璃工联合会	4	钟表匠联合会	60
烟草工联合会	4	其他各种行业	30

培克的材料就是这些。我们再补充一点：工会联合会拥有 28 500 法郎的财产，其中 15 800 法郎是准备用于罢工的。会员约有 12000 人。

再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瑞士工人联合会**。该联合会是瑞士所有工人组织的联合，包括工人的医疗储金会和救济储金会，其宗旨是以联合一致的力量努力争取有效的工人保护立法这一共同目标。工人联合会约有 20 万会员，遍布全瑞士，其组织机构计有：每 3 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和所谓领导委员会（委员均在一地并处理日常事务）。除此之外，工人联合会还有一个常设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工人书记及 3 名助手组成，其中一名助手驻在瑞士法语区。联合会每年要拿出 2 万法郎支付书记处的开支。其任务是，通过调查统计、调查询问等为社会立法进行准备。近几年，它主要是为已经原则决定的医疗保险和事故保险进行活动。工人书记现在是苏黎世的赫尔曼·格雷利希。

至于工人的政治组织，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瑞士的**格留特利联盟**。该联盟目前有大约 350 个支部，约有 15000 盟员。它有自己的报纸《格留特利盟员报》，每周出版 3 期（印数 14000，编辑汉斯·梅梯尔）；两年来还出版了历书，印数为 30000 册。报纸和历书均由自己的、管理出色的印刷厂印制，该印刷厂每日工作时间为 8.5 小时，成绩出众。除了这些机构，还有联盟书店，传播社会主义书刊和其他启蒙读物，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格留特利联盟的历史反映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历史。起初它坚持的是颇为狭隘的民族观点，有些胸襟狭小和宗派主义，同时缺少坚定的政治主旨，但是在它存在的 50 年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统一的阶级觉悟

的工人组织，直至今年在它的总章程中写上了这样的原则，“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在社会民主基础上的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格留特利联盟各支部（例如苏黎世和圣加仑各支部）均有自己的联盟大楼，其他工人协会在这里可以有安全可靠的活动场所。

工会联合会和格留特利联盟同**瑞士社会民主党**并肩站在一起，现在这种形式的瑞士社会民主党是1888年成立的。党的成员是按地方组织起来的，同工会联合会共同有一个单独的机关报《**工人呼声**》。该报有罗贝尔·宰德尔出色的编辑，在格留特利印刷厂印制，每期约出4400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目前在巴塞尔，有大约1700名党员；从数字可以看出，它只包括一部分瑞士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极其奋发有为的。

大城市的工人协会为宣传鼓动和政治活动组成独立的地方联合会。例如“苏黎世工人联盟”包括40个协会，有大约5000名会员。巴塞尔市工人联合会有一个现在每周出版一期的报纸《巴塞尔工人之友》，不久将改为日报（编辑为欧根·武尔施莱格）。最活跃的是伯尔尼工人联盟，它所取得的大部分成绩应归功于其不疲倦地工作的常务书记瓦西里耶夫博士。该工人联盟也出版一种报纸《起床号》（编辑为G.奥特）。类似的市一级组织在比尔、日内瓦、圣加仑、温特图尔、沙夫豪森和索洛图恩等地都有。

接下来值得提到的是瑞士的一些德国人协会，其中有几个已经具有50年的历史。在早期，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前这些协会对德国运动的意义可以说是众所周知。最大的是苏黎世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有自己的—所宽敞的协会大楼和约800名会员。

除上述报刊外，还出版如下几种工人报纸：《**瑞士印刷报**》（印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古滕堡**》（拉丁语瑞士印刷工人机关报），《**木材工人**》（瑞士木材工人联合会机关报），《**钟表匠**》（钟

表工人辛迪加机关报)。

瑞士工人组织正在出色地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工会运动**和站在前台的**社会民主党进行宣传**，这一点到处都如此。此外，在参加政治生活和使用倡议与全民投票时，我们就有众多的机会在对于其他国家的同志们来说完全或绝大部分是禁区的领域内进行活动。在联邦和较大州的 22 个立法机构的选举中，都有社会民主党人被提名为候选人，自然成绩一般（目前在联邦委员会中只有一名委员是社会党人）。

关于瑞典工人运动的报告

党的同志们，各国工人们：

瑞典社会民主党此次不得不遗憾地放弃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世界劳动议会。我们这里同样面临着帝国国会选举，对党的财力和有雄辩之才的人力的需求非常之多，因此，无法派遣代表团前去遥远的南方。但是，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工人们将得到我们最美好的祝愿，并且同 1889 年和 1891 年巴黎和布鲁塞尔两次代表大会一样，此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我们的报刊将把国际工人代表们的讨论情况和各项决议作为瑞典工人在无产阶级伟大的解放斗争中的策略准绳来向他们进行详细的宣传。一些重要问题已列入讨论日程，诸如关于议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时的立场等意见分歧，无疑将显得尖锐起来。我们坦率承认，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我们越来越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 20 年来所极其成功地忠实遵循的策略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他们革命的威力就在于，联系事物的实际形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去反对资本主义，并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和训练的工人阶级逐步争得有决定作用的政治权力。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一基本看法，对政治情况、民族传统以及个人气质等方面的不同之处给予充分的、应有的考虑，使得劳动大军中每一个战士必须有的运动自由都不会受到妨碍。那就让我们祝愿，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议

将向全世界明确证实，各国现代工人运动不仅目标一致，而且实现目标的方法也是一致的！兄弟们，同志们，你们为了加速劳动人民最终获得解放而聚集在瑞士这片美丽、自由的国土上，请你们接受瑞典同志们的诺言，我们保证，将永远不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红旗在遥远的北方倒下，我们将坚决地永远同国际工人大军其他支队共同前进。苏黎世代表大会万岁！以解放全世界为己任的世界社会民主党万岁！

* * *

当 1848 年的风暴席卷欧洲和宪章主义在英国、社会主义在法国已经成为工人中先进分子的战斗口号的时候，他们在瑞典的阶级同志还在沉睡，或者更正确地说，那时还没有瑞典工人阶级。但是，在瑞典也逐渐产生了现代工业化主义，破坏着旧的宗法制度。不过，说起瑞典，我们不应忘记，全体居民中大约有 1/5 拥有自己的财产（尽管近几十年同样渐渐筑起债台），而且在中世纪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压迫的小农，至今仍然按照先人的方式进行经营，他们形成了瑞典社会顽固保守的坚定核心，自 1865 年立宪改革以来又掌握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权力。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的工人运动就更是一种城市的运动，自然，除城市外，还应算上农村中的几个工业区。如果我们想到，在地广人稀的瑞典，几乎不到 20% 的居民生活在城市，那么，事先就会明白，在这个国家不能用大陆工人运动的尺度来衡量。

首先，推动瑞典工人组织起来的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成员，他们成立了所谓的“教育小组”，通过报告、讲座等等来促进普遍的启蒙。继这些“教育小组”之后，60 年代，出现了“工人协会”，同样是在自由派的领导下建立的，他们极力模糊工人和雇主之间利益上的不同。这些“工人协会”至今在瑞典差不多所有大小城

市中仍十分兴旺，实际上是社会各阶层的一个五花八门的杂烩：真正的工人为数极少，通常占优势的是手工业师傅，虽然并非大工厂主或社会的其他中坚力量把持着执行委员会的位置。在斯德哥尔摩，也有这样一个“工人协会”，尽管多年来它在工人中的影响等于零，可是，除去自由派的议员，总督和警察局长都以协会贵宾的身分前来参加它的周年纪念活动，然而几年前斯德哥尔摩的工人为集会权还同这些官员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乍看起来，似乎“工人协会”起码在纯政治方面可能要求对瑞典工人起领导作用。1879年，他们在诺尔雪平召开了“第一次瑞典工人代表大会”。会上发表主要讲话的人是国民小学教师和手工业师傅，有几位自由派新闻记者和工人作陪衬。此次代表大会以惊人的简朴而显得突出：敬畏上帝、文质彬彬、勤俭节约似乎足以提高工人的状况。但是，第二次代表大会（188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就有些激进的色彩了，而第三次代表大会（1886年10月在厄累布罗召开）实际上不顾保守的手工业师傅们的抗议，竟然通过一个旗帜鲜明的民主纲领。然而代表大会经过热烈的辩论，仍然拒绝同这时已经产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建立友好关系。对于工人中最有事业心的分子采取拒绝态度，使得本身并不太坏的民主纲领失去了吸引力，1889年当社会主义者另行组建政党时，绝大多数年轻的真正的工人协会、行业协会（工会联合会）便纷纷加入他们的阵营。第四次“工人代表大会”（189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认识到了，最好还是要团结队伍；他们想在第二年召开一个“社会政治代表大会”，作为此次大会的继续，凡对工人问题感兴趣的人，不论持何种观点均可自由参加。其实这些“工人协会”在政治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都已被近几年有巨大发展的争取普选权运动消耗殆尽了。

在 1879 年这一年，当着诺尔雪平代表大会心满意足，认为优秀的瑞典社会中什么都美好的时候，**松兹瓦尔大罢工**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瑞典工人阶级经济上受压制和社会上无权的状态。诺尔兰的滨海城市松兹瓦尔是瑞典木材制品大工业中心，四周有许多锯木厂，拥有大量工人。生活资料日益昂贵，使得工人不得不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是却遭到拒绝，于是他们便停工了，根本没有人组织。罢工非常平静而且秩序井然，应罢工者的要求酒馆和啤酒馆也关闭了，他们甚至在召开大会之前还要进行祈祷和唱赞美诗。尽管如此，几个锯木厂厂主仍恳求派军队镇压，而州长特赖芬贝格没有多久就被说动：他从斯德哥尔摩驻军调来部队，把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包围起来，他们对他们讲话就像对待普通的罪犯一样，他命令他们放弃造反的计划，逮捕几个工人，说他们是“煽动分子”，还威胁要把所有不再有正常工作的人一律作为流浪汉而加以逮捕，迫使其余人仍退回受压迫的地位。

然而，解决工人和雇主之间争端的这种断然做法，在全瑞典的工人中间掀起一场真正的愤怒的风暴，阶级觉悟终于开始提高起来。瑞典第一个社会主义鼓动家是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的裁缝，他在什列苏益格熟悉了德国的社会主义，1881 年他犹如一只海燕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上空，但是尚未取得什么成绩，便退回到瑞典的最南方，在那里，他克服重重困难在马尔默编辑一种小报《人民意志报》，并亲自在国内四处发售。1881 年，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工人集会认识到所谓“工人协会”是很不够的，因而决定按照英国的样子，在各行各业组织**行业协会**以维护工人的利益，反对雇主的利益。这种行业协会在“劳动贵族”即排字工人中，还有装订工中间早就有了，不过以前并没有任何普及起来的动向。但是现在木材工人、钢铁和金属工业的工人、裁缝等等加

入了有组织的工人的行列。

可是曾经有几年，蒸蒸日上的行业协会组织却由于一个怪异的现象而受挫，这个以“斯密斯社团运动”为名的怪异现象在瑞典尽人皆知。一个叫L. O. 斯密斯的烧酒酿造业老板试图动员工人拥护他的一套反对城市烧酒垄断的计划，办法是答应工人可以得到物美价廉的烧酒，此外还答应他们得到消费协会同时也是生产协会的种种好处，只要大家组成每百人为单位的“社团”，并受他领导。在社会政治方面几乎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纷纷集合在这位新的救世主的周围，此人为了这件事破费了一些钱并答应还要作出更多的牺牲；1883年，单是斯德哥尔摩一地，就有约2万名工人参加这种“社团”。自然，没过多久，整个肥皂泡就破灭了，而工人的状况在任何方面都毫无改善；斯密斯先生又搞起别的投机营生，他最亲近的人是个骗子，已逃往美洲，这整个美妙的事业除了一个普通的银行之外，在斯德哥尔摩只剩下一个大众蒸汽厨房；几年后，这家大众蒸汽厨房也不得不关门大吉。

1884年，行业协会运动特别在斯德哥尔摩重新兴盛起来，而且瑞典刚刚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哥本哈根一次锻工大罢工期间就提供了有效的帮助。1885年，年轻的运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机关报《时代》，一家由前大学生亚尔马·布兰亭编辑出版的报纸，在该报的领导下，短时间完成了由自由派观点向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发展。1886年《时代》不得不停刊，此时又有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继承其遗产；该报由布兰亭主编至1892年，接着由卡·纳·卡尔松（乌普萨拉省人，也是前大学生）主编，属斯德哥尔摩行业协会和社会主义协会所有，它曾是瑞典现代工人运动的中央机关报，自1890年起改为每天出版。这里我想先把瑞典工人报刊的情况谈一谈，自1887年起在马尔默有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

《劳动报》，也是从1890年开始每天出版，其编辑也是前大学生，名叫阿克塞耳·丹尼尔森，他以就连最凶恶的敌人都表示佩服的机智和魄力领导着意义十分重大的整个瑞典南方的运动；同时在哥德堡出版了《新时代》，由Fr. 斯特尔基编辑，这是当地从前出版的由P. 埃里克森编辑的社会主义工人报《人民之声报》被迫停刊以后的事，在诺尔雪平还出版了社会民主党周报《无产者》。瑞典的社会主义报刊共有1万订户。此外还有行业报纸：《制铁工人》、《木材工人》及几家较小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办的，再有就是自由派工人运动唯一一家机关报《瑞典印刷工人报》。

让我们再回到80年代。当时社会主义在瑞典工人中间正日益扎根，这实际上不足为奇。丹麦社会民主主义行业协会运动，经历了70年代几次危机，已经具有一种温和的色彩，较好地适应了丹麦的情况和民族特点；自1880年起，这个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丹麦的榜样不会长期毫无影响。斯密斯骗局使得大多数自由派工人的当代的伟人声名狼藉，对这场骗局的普遍失望使人们对于新的刺激易于接受了。对此，老的激进派领袖们，除去已经狼狈不堪的自由贸易主义以外，没办法拿出更好的货色来同这些社会主义的火热的年轻信徒相抗衡。这场精神战的结局是毫无疑问的。斯德哥尔摩的行业协会相继把社会主义者送进“行业协会中央委员会”，并且迅速占据该委员会，以致到1886年时，少数自由派干脆不再参加委员会的集会。与此同时，在公开集会中，旧时的工人领袖们也一个接一个被赶下台。斯德哥尔摩“工人研究会”有名望的创始人、医学博士安东·尼斯特略姆试图扭转事物的发展进程，但却枉费心机。此人其实是一个冷静而有能力的实证主义者，多年来站在维护工人利益的第一线，例如在行业协会运动刚

开始时，他曾尽力给以支持。在一次秩序大乱的集会后，旧的“工人协会”向社会民主党人关起了自己会议厅的大门，但也未能得逞。从这时起，在斯德哥尔摩，大规模公开集会的参加者都是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派，这一点在马尔默更为突出。

在瑞典全国各地的工人中间，社会主义宣传鼓动的浪涛一浪高过一浪，于是当局开始诉诸法律武器。奥古斯特·帕尔姆，过去所有人都嘲笑他，1887年因为污辱帝国国会而被判徒刑。1888年，保守的关税保护派借口法律上有缺欠而推翻自由派的斯德哥尔摩选举，从此大权在握，于是现在禁止集会、解散社团、没收报刊等等便层出不穷，更不要说把人赶出集会大厅之类的事了。提起刑事诉讼，要么是因为污辱，不管是污辱陛下、帝国国会还是污辱官员，要么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频繁出现的亵渎上帝；1884年瑞典著名诗人奥古斯特·斯特林德贝格就是因为这个罪名而受到起诉，但是没有成功，而几个主张宗教自由的鼓动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维克多·伦斯特兰德，他们的出现似乎使得当局对于上帝尤其更加多情了。阿克塞耳·丹尼尔森被判一年半徒刑，而接着先后几起判刑，其速度之快，以至例如1889年夏，各社会主义机关报的主编全部被关押起来。

1889年春，社会党人不顾这种种制裁，仍然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建党代表大会**。大约60名代表来自全国比较重要的地区。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议洋溢着青春的战斗气氛，给外界留下了自己的印象。大会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包括最后结论），纲领强调指出，同所有的即使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明确提出诸如普选权和正常工作日这些最近的要求，但是重点仍然放在对最终目标的宣传上。至于组织，则一律在工会和政治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天仍然是这样。瑞典社会主义

工人的基本群众因此不属于政治协会，而只属于他们的行业协会，一旦行业协会决定加入党，便向党的金库缴纳一笔不大的金额并同其他党的协会选举一个执行委员会。另一方面，瑞典各行业协会会员的基本群众是社会民主党人，且不谈那些大的工会联合会：制铁和五金工人联合会、木材工人联合会、泥瓦匠联合会、裁缝联合会、鞋匠联合会等等，在全瑞典都有分支机构，每个联合会各有自己特殊的组织，但是，只有通过党，一个地方的各种行业协会彼此才能联系。

政府连忙抛出一个**小型反社会党人法**来回敬这次代表大会。这项法律是1889年春帝国国会会议结束前提出的，但是基本上被第二院否决了，因为第二院的自由派担心自己会受制于这个多义的“笼头法”。从此，镇压政策的顶点已经越过，1890年大选，温和的自由派在第二院再次获得多数，这时资产阶级人士也认为不尊重工人集会权的种种做法是国家的一个耻辱；此后当局对工人运动开始逐渐采取比较缓和的做法。除了其他原因，这肯定也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现在的调子比最初在狂飚年代时的调子要更加冷静的一个原因。

由于大多数瑞典工人没有选举权，所以社会民主党只在它的两个中心城市斯德哥尔摩和马尔默参加了**1890年那届大选**。在马尔默，丹尼尔森作为社会党的代表在民主派的名单上获得300张选票；保守派候选人以约600票当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开端。索南地区的社会党人过去是党内的极左派，同丹麦温和的领袖们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后来逐渐把实际活动主要放在很快就可以达到的目标上，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策略使得他们能够把他们鼓动的影响和组织的影响颇为顺利地扩展到该省较小城市以及农村工人中间。最近在马尔默，党设置了两个堡垒：一座“人民

大厦”，是效法比利时搞的，包括若干个会议大厅、党的印刷所、“劳动”酒馆和一个饭店等等；还有一个“人民公园”，夏季这里不仅是马尔默工人的娱乐场所，而且也是哥本哈根同志们的娱乐场所，既可加强瑞典和丹麦两国社会党人的友好关系，同时也给党的金库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

1890年时，斯德哥尔摩的情况也有根本的变化。那里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自由派，他们许愿要实行普选权和形形色色的改革，并且污蔑社会党人是煽动不睦的主要的危险分子（在瑞典大选中只是相对多数起决定作用）。此外，大批选民决心要对关税保护派实行报复，因为这些人通过法律方面的阴谋诡计推翻了整个斯德哥尔摩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公开集会（参加者大多是工人）即使拥护社会党的、尤其是民主派的候选人也是徒劳，因为资产阶级选民选举的是那些不顾工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而推举出来的自由派“工人候选人”。例如，亚·布兰亭在第五选区只获得100张选票，而一个自由派房产主（前述所谓“工人协会”主席）却得到1000张选票，从而当选。

这一挫折在斯德哥尔摩为党内出现无政府流派提供了土壤，他们对选举、选举权之类，总之对当前纲领根本不感兴趣，并且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前撰稿人辛克·贝格戈伦作为他们的头头。此人头脑有些混乱，爱好荒谬怪论，讲述莫斯特关于“实际的宣传”等思想不无本领，希望唤起受压迫最深的各阶层工人的热情。这个运动受到布兰亭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尖锐抨击，它从来也没有深入下去过；它规模不大，但一时却能够在1891年在诺尔雪平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发难。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社会党人之间的斗争成了那次党代表大会的特点。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取得完全的胜利。代表大会通过了丹尼尔森和布兰

亭起草的反对无政府主义偏差的各项原则决议案，此外还作出一项有重大影响的决议，计划于1893年召开一次“人民国会”，以争取普选权。

再有，1890年和1891年两年在瑞典是真正的**罢工年**。在斯德哥尔摩，面包师帮工试图争取一个比较自由的地位，但没能成功。几乎同时，以前一直站在运动之外的700名博林德大机器制造厂的工人愤怒地停止了工作，原因是两名工人受大家的委托并代表大家提出几点并非过分的要求，就是由于这种反抗而被立即解雇。这次罢工，工人们也遭到了失败，不过制铁和五金工人的组织却有了显著的飞速发展。在格弗勒，因为工资降低，几家大锯木板厂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当宣布全市总罢工，局势有严重化的危险时，当局迫使雇主们服从仲裁法庭。当然，同12年前松兹瓦尔的情况完全两样了！工人们推举布兰亭参加仲裁法庭，法庭作出可以说普遍有利于工人的裁决。在马尔默，由于木匠罢工而演成一场相当严重的巷战，但是并不是有组织的工人们挑起的。

在这期间，最大和最顽强的劳资斗争之火，在瑞典中部一个矿区，在**诺尔贝里**燃起了。因为调整工资，一个矿井的工人坚持了4个月的罢工，后来，全矿区的矿工都决定停工，以迫使资方接受同伴们的要求。矿主们（他们当中多数人是瑞典的实业界大亨）害怕了，他们动员军队来对付和平的矿工，但是有一个州长还算通人情，他成功地成立一个仲裁法庭，是在格弗勒罢工之前成立的。矿工们得到了特别是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人物质上和组织上的支援，他们选举两个斯德哥尔摩人参加仲裁法庭，一个是有经验的自由派议员弗雷德霍尔姆，另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的编辑布兰亭。裁决结果大体上承认矿工们是对的。但是从此诺尔贝里再也没有恢复和平。另外一个矿井又有工人被解雇，在

这种情况下解雇，就使得同伴们认为是对仲裁法庭裁决的一个报复，于是他们停工了。并且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越轨行为，后来受到法庭十分严厉的惩治；例如，诺尔贝里遭到矿主憎恨的“罢工领袖”矿工夸恩斯特略姆只是因为是在罢工破坏者（斯卡勃）面前做了个打人的动作但没有碰到人，就立即被帝国法院判处4个月监禁。诺尔贝里第二次罢工解决以后，1891年11月，矿主要求工人重新签订合同，新合同将使工人对矿上的依附比过去更深，于是引起了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罢工。700名矿工由于全瑞典工人的支持把这场力量悬殊的罢工坚持了漫长冬季的6个月；但是工人不得不屈服资方的条件，因为胜利者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然而瑞典全国社会各阶级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了诺尔贝里罢工的全过程，并且肯定这场斗争必然从许多方面推动了，在我国把社会问题也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瑞典行业协会根本没有做到把钱集中到自己的金库里，这一点大家一定会理解。首先，瑞典工人组织的成员总被要求支援别人，而瑞典民族这种有些骑士之风的慷慨大方的性格从来都未拒绝过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工人们也认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反对无计划无准备并且不是雇主直接挑起的罢工，这种潮流在工人中越来越强大。近几年，无论是工会的鼓动，还是纯社会党的鼓动，往往由于缺钱而办不成。尽管如此，运动大体上还是在前进，最突出的证明就是国际性的“五一”示威游行所取得的成就，按瑞典的情况来说，这些成就可以说是巨大的。的确，五一节游行示威活动在瑞典一开始就是吉星高照。很久以来，5月1日在这里就是节日。然而，当1890年5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有15000多示威游行行列队开进练兵场时，至少已有两倍于此的人早就聚集在广场等候了。看到这种景象，无

论朋友还是敌人都为之惊讶。每年的“五一”游行，在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规模，而且在瑞典已经产生了实际成效，大多数农场过去通行 13—15 小时过长的劳动时间，现在则大大缩短了。

1891—1892 年的冬季，尤其在斯德哥尔摩失业严重，社会党人过去曾试图把行业协会运动推广到没有什么特长的工人当中去，现在则建立一个“失业者协会”，该协会引起斯德哥尔摩社会上的不安并且迫使市长及市议员们也作出一些让步。1892 年 2 月 1 日发生了小规模街头骚乱，原因是工人们要维护自由搬迁的权利而反对警方。但是，当检察官对著名的社会党人以“暴乱罪”进行起诉时，法庭拒绝听命于检察官。

1892 年夏，在马尔默召开了“第四次斯堪的纳维亚行业协会代表大会”。第一次是 1889 年在哥德堡召开的；当时在瑞典代表团中，自由派和社会党人差不多人数相等。但是从那以后，瑞典自由派工人运动迅速走下坡路。1888 年在哥本哈根开会时，自由派工人运动的协会干脆不再派代表参加，1890 年在克里斯蒂安纳时也是这样。1892 年代表大会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对瑞典社会主义来说，它开创了同年长的丹麦兄弟组织的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还确定同反议会主义貌似革命的空谈彻底决裂。无疑，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内仍然有这样那样的色彩，然而，看来它随时随地都在认真努力去消除一切宗派的性质。

瑞典工人认为，争取平等、直接的普选权是实行符合自己利益的新社会政策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近来他们更加全力以赴，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瑞典只有 1/4 的公民享有选举权，这当然没有妨碍其余 3/4 在迅速增加的赋税和军事负担方面挑起全部重负，近几年来尤其如此。扩大选举权，在 80 年代初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不过只有社会党人才为争取普选权而掀起轰轰烈烈

烈的大众鼓动。为了不完全失去对群众的影响，自由派后来也振作起来，开始在他们广泛发行的地方报刊上展开选举权的宣传运动，建立起遍布全国的选举权协会并最后把这个网集中到可靠的自由派手中。起初社会党人打算把自由派搞的选举权运动当作一场骗局来对待，但是以后他们逐渐改变策略并试图争取自由派对“人民国会”的帮助。自由派长期以来极力反对，选举权协会 1891 年哥德堡代表大会还曾拒绝“人民国会”，不过 1892 年 4 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却几乎一致赞同接受社会党人的建议，然而条件是 1892 年 10 月 1 日以前，起码要有 20 万瑞典公民在拥护普选权和普选产生的“人民国会”的请愿名单上签名，“人民国会”唯一的任务就是商议争取普选权的手段。主要由于选举权协会新任总书记、哲学博士大卫·贝格尔斯特略姆出色的组织工作，这一苛刻的条件才得以实现；请愿书得到大约 21 万个签名，在一个人口不到 500 万的国家中，这可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示威。在新年前后举行的选举除去实行普选权以外，同正规的帝国国会选举完全一样，有大约 15 万公民参加（包括数千名女公民）。我们可以作个比较，参加第二院选举的投票人数从来没有超过 13 万人。

“人民国会”的宣传鼓动工作，根据具体情况，自由派和社会党人之间彼此分工配合：社会党人主要负责大中城市，自由派主要负责平原地区。在选举时，为了避免不睦而使共同的敌人幸灾乐祸，也恪守这种 *Suumeuigue*（各管一段）的默契。城市工人无视部分自由派报刊的警告和威胁，几乎各地都选举社会民主党人，而平原地带选出的则是自由派的选举权协会的领袖们，但是却被社会党人冲淡了；在“人民国会”120 名代表中社会党人有 30 名。

然而斯德哥尔摩的情况却有不同的发展。在 1892 年 9 月第五

选区的**帝国国会替补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呼吁自由派，证明他们对工人友好和拥护选举权，办法是他们同意通过普选权来推举出整个民主派的候选人。但是自由派断然拒绝，虽然在试选时按照普选权社会民主党人布兰亭以 1 313 票对 53 票挫败了他的自由派对手，并且不顾一家很有影响的自由派报纸的警告：它表示担心它的党和有组织的工人的彻底破裂会产生恶劣的后果，该报直至最后一星期以前还坚决拥护社会民主党人，但是自由派却以普选权的名义使他们原来也是被同一普选权所赶走的候选人在终选时得以当选；尽管只以 381 票对 323 票和 302 票分别挫败布兰亭和保守派候选人。自由派方面的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慨；自由派在斯德哥尔摩人民国会选举中要求占有绝大多数席位，并扬言，出于他们的恩典或许接纳一两个社会民主党人，这时斗争的信号发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名单中给了前边提到的贝格斯特略姆博士和瑞典选举权运动首席代表、自由派议员 F. 曼克尔两个位置，而其余 10 个名字全是自己独立填写的，并且也是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单以大约 12 000 票对 9 000 票挫败了自由派和虔信宗教派串通一气的分裂主义者而当选。

这场争夺普选权在斯德哥尔摩的统治地位的斗争，引起全国的极大关注，1893 年 3 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民国会**上仍然有其反响，坚决与社会党人为敌的自由派国会党团企图阻止社会党少数派对第一次瑞典人民议会的各项决议发生任何影响。但是继续讨论的结果却十分清楚地表明，正如社会党人所预言的那样，无论国王，还是帝国国会，甚至帝国国会中自由派政党的领袖们都不会以任何方式赞成普选权，在人民国会中重心越来越移向左派。人民国会最重要的决议，如谴责一切扩大选举权的建议都是骗局，

为粉碎统治阶级的反抗请求考虑 1896 年新的人民国会采取比利时那些非常措施和方法，以召开瑞典非常人民国会的威胁来对付瑞典官方可能的战争威胁致挪威左派的声援书等等决议，都是本着联合起来的社会党人和年轻激进派的精神而且是以压倒多数作出的，就连人民国会致瑞典人民宣言也是出自社会党人的手笔，这是人民国会的政治宣言，而人民国会绝对不可轻视的示威集会。

无疑，在当前第二院新的选举临近时，瑞典工人定将在选举中把选举权作为主要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突出加以强调。未来将表明，是否现在就具有必要的力量迅速解决问题。在瑞典，统治者无论如何也绝对不能自我辩解，说他们似乎实际上已经证明，为了贯彻实行现代工人立法，工人阶级不需要选举权。工人立法至今还完全受到忽视。在此就这个问题谈点情况，用以结束经济落后国家这部工人运动发展简史。1881 年以来才有一个反对童工劳动过量的法律，但却附有许多例外并且也没有得到非常严格的遵守。1884 年，杰出的自由派议员 S. A. 赫丁在帝国国会提出事故、疾病和养老等保险问题。当时组成一个委员会，收集有关工人状况的极有价值的材料，例如他们发现工业平均劳动时间（据工厂主报告）为 11.2 小时，而平均工资为 612 克朗（政治普查的结果是 800 克朗）。处境很好的瑞典工人各阶层的情况尚且如此，农村工人群众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委员会的大多数建议在帝国国会中被否定了，但是总算制订了一个防止劳动工伤法，而且自 1890 年以来在瑞典终于有 3 个法律了，的的确确 3 个！由于工厂视察员的工作，法律才稍稍有所贯彻。然而 1893 年帝国国会还是否决了批一点钱来发表工厂视察员们的报告！为了说得更完全，还有一个医疗储金会法，但是，这项法律对于众多的医疗储金会和其他自助储金会用处不大。最近几年，一个新的委员会就老年

保险和残疾保险写了一个建议，该建议一部分是按照德国的模式，但是在重要方面是独立构思的，并且写得朴实无华；不过这个建议在今天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结果，仍需拭目以待，种种征兆表明，结果不会是令人鼓舞的。相反，我们的帝国国会却不顾激进派的抗议，连忙去加强保护“自由劳动”即保护罢工破坏者的法律条文。与此同时，要求根据瑞典情况至少研究一下正常工作日问题的不过分的建议，是斯德哥尔摩激进派 Fr. 贝尔格在帝国国会提出的，在 1893 年几乎没经过任何辩论便遭到了否决。

外国同志从本报告中想必可以看到，瑞典工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几乎全都有所欠缺，尽管事情刚刚开始有个良好的形象，而这是其他先进国家的工人经过火热的斗争已经争取到了的。不过我们这里也在进步。我们年轻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学习认识到，现存制度是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使之发生革命的变革肯定不是朝夕可得的，我们的纲领把这一点确定为我们活动的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量工作是艰巨的，但还没有艰巨到我们无法完成的地步，我们必须完成这些工作，我们一定会完成这些工作。在我们这方面进行斗争的是新生的力量，而站在解放斗争前列国家的榜样的力量也必定会迅速克服一些通常是顽强的抵抗。也正因为如此，瑞典社会民主党一贯认真遵循国际的精神；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你们的兄弟就是我们的兄弟，的确，我们将不是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种族或者哪一个教义的解放，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幸福和文明，为了“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一切”去永远奋斗的。

受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委托

亚·布兰亭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告

尽管西班牙的革命社会主义比起许多其他国家来相对地说不太发达，但是，自从 1891 年 8 月上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它已经有了进展。

只消说明某些情况，就可以明白社会主义思想在西班牙为什么进展比较缓慢的原因。根据地理和统计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材料，我国的人口 1889 年是 17552346 人。我国全体国民的教育程度从下面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得出来：602005 人只会读；5004470 人会写；11945871 人目不识丁。

下面的数字可以表明我国的经济状况或能力：4854742 人从事农业、畜牧业和其他类似行业；243867 人从事工业、大工业等等……；194755 人从事商业；115763 人从事机动运输业和畜力运输业；42565 人为铁路部门的专门雇员；823300 人在工艺部门就业；409549 人替私人、家庭服务，或从事其他职业。

尽管在西班牙绝大部分地产都掌握在寄生虫手里，但是，还存在着相当多小私有者，不用说，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极其困难的，不久，他们将变成纯粹领工资的人。

尽管群众缺乏教育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尽管生产力发展缓慢，但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每天都在劳动者中，主要是在工业中心，占领阵地，在这些地方，我们遇见了更多的改宗信仰者。

在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社会党大约由 30 个团体组成，而现在，它大约包括 50 个团体，其中 6 个是农业劳动者的组织。

1891 年党的刊物只有 4 种报纸；今天我们出版的报刊已经有 7 种了，它们是：《社会主义者》，在马德里出版；《社会战争》，在巴塞罗那出版；《人民呼声》，在阿利坎特出版；《红旗》，在帕尔马出版；《工人》，在费罗尔出版；《工人斗争》，在桑坦德出版；《平等》，在毕尔巴鄂出版。

去年 3 月，在立法团体进行选举时，社会党获得了 7000 票，比 1890 年选举时增加了 2000 票。

得票总数比起差额来不算太大；但是，如果考虑到社会党还没有一个稳定的组织，它拥有的资金还非常少，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在竞选中加入的新信徒，那么，我们就会懂得，这批选票的意义比它乍看起来所显示的意义大得多。此外，我们党不仅不得不同一切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作斗争，主要是同向我们党发动了一场激战的共和派作斗争，而且还要面对共和派联盟煽起的大量劳动者反对我们党的激烈情绪，这种情绪主要是通过选举目的激起来的，共和派在选举目的中提出了革命纲领。

充当资产阶级急先锋的政治流派掀起的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简直下流已极：从诽谤社会党候选人开始，直至强迫、收买、灌醉选民为止，总之，共和党人把一切卑鄙无耻的伎俩都使出来了。这个党的最激进的一派，即联邦派，在比利亚努埃瓦—赫尔特鲁（他们在那里控制了市政府）用收买的手段唆使一伙人在我们的伊格列西亚斯同志到达和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吹口哨和起哄，不让他解释我们党的纲领。

由于我们的外国同志们对西班牙共和党人持有一种非常错误

的看法，所以为了使他们了解这种情况，我们说，共和党人从未向我们提出过任何性质的联合，无论为了任何目的都没有这样做过，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也会予以拒绝，认为这是和阶级斗争对立的。他们的全部愿望是，争取我们参加选举并站在他们一边，起码是希望我们不提候选人，这就是说，想取消我们党。这些共和党人知道得很清楚，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击败他们的候选人，从而削弱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但是，他们知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工人群众会加入社会党，因而共和党同社会党是势不两立的。他们同我们党作斗争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给他们造成的损害，而是因为将来我们会夺走他们的力量。

此外，主要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在劳动者眼中已威信扫地的保皇党，采取一种暧昧态度，因此社会党必须进行斗争。这些人在国家和劳动者，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发生的一切问题上所表现的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行为，迫使社会党人不得不经常批评他们。

另一方面，由于知道共和党如果不加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保守性质就不能掌权，而且即使掌了权，它的政治改革也不可能获得成功，既然保皇派略施小计，承认写作自由和普选权，已基本上夺走了共和党的旗帜，所以社会党根本无须重视共和党人，它不仅设法削弱共和党人的力量，而且还要彻底消灭他们的力量。

总之，我们将使劳动者摒弃资产阶级政治，并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凡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我们就要争取做到。

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在西班牙的依靠力量每天都在减少)一直不停地帮助共和派搞反对社会党的运动。毫无疑问，他们不会忘记，在无政府主义思想深处隐藏着个人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和那些以极其顽强的精神同为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制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的人作斗争的人结成联盟。反过来，共和派对无政

府主义者的这种胆略也给予回报，每一次当他们不得不同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对后者总是另眼相看。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损害共和党人的最好证明是，尽管他们鼓吹弃权，共和党人并不因此而攻击他们，而是按捺住自己胸中的怒火，以便同社会党人作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在对选举制咒骂一通之后，还是同共和派一起投了票，而且投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其他候选人的票。

5月1日的游行示威在西班牙每年都有重大进展；社会党人忠实履行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在1892年和今年的5月1日都举行了游行示威。庆祝活动由于被禁止在大街上进行，所以只好改在偏僻的小地方。去年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但是，今年举行的群众大会次数更多，尽管这一天工人们照常上班。

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集会，要求颁布劳工保护法，即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劳工保护法，要求一切地方都实行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

在马德里，白天有10000多工人在名为“幽静的地方”的一些花园里集会，晚上有4000多人在马德里剧院集会；在巴塞罗那，参加集会的人特别多；在瓦伦西亚，有5000多人参加；在马拉加，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在这里正像在已经提到的几个城市里那样，群众的热情普遍高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塞斯陶、布尔戈斯、萨莫拉、毕尔巴鄂、马塔罗、费罗尔、萨拉戈萨、埃切尔、奥维耶多、格拉纳达、桑坦德、塔拉戈纳、科鲁尼亚、卡拉一德贝纳加尔翁、奥莱萨一德蒙特塞拉特、圣胡安一德比萨尔、特尔克、阿利坎特、帕尔马、新德尔马尔镇、希洪、阿尔梅里亚、哈蒂巴、利纳雷斯等地。

前几年我们的游行示威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搞的总罢工的

干扰。最近两年的游行示威是平静地、秩序井然地进行的。西班牙的活跃的无产阶级显示了高度的一致和思想上的巨大统一。

今年资产阶级报刊想贬低运动的重要意义，它们对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几乎只字不提；但是，这个节日所引起的兴趣，使绝大部分工人都离开了车间，从而使资产阶级报刊的打算完全落空。

工人党的组织虽然同纯粹的协会组织分开了，但是，后者对工人团体支持的罢工，仍然给予支持；另外，党的演讲人虽然没有商妥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们还是传播了联合的思想，并劝工人加入劳动者总同盟，这个组织渴望通过罢工和要求公共权力机关颁布有利于被剥削者的法律的办法来改善劳动者的状况。

直至今天几乎完全是由体力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它的成员中已经开始包括那些从事写作和科研工作等等的人。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医生。我们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当中就会有各个科学部门的工作者。

走在国际运动的前头的社会主义分子的经常胜利，我们党用它拥有的各种手段进行的宣传，已经促使西班牙的脑力劳动者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理论上来，并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长期坚持下去。

如果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到我们党内来同时也就是使西班牙的生产力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的话，那么，解放事业在我们这里就将得到巨大的推动。

西班牙社会党人把德国社会党人所获得的辉煌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他们已举行群众大会和晚间聚会来庆祝这个胜利。在这些庆祝会上，我们劝告大家效法那些同心协力地传播以拯救资本的奴隶和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学说的人的行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两年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

党所取得的进步，比起其他国家的社会党所取得的进步来，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在西班牙为吸引工人参加阶级斗争必须克服多大的困难，那么，人们就会不得不承认，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获得的成果是比较重大的，这些成果表明了我们的西班牙社会党人捍卫革命原则和平等的意志和始终不懈的热忱。

西班牙劳动者总同盟代表 提出的备忘录

“西班牙劳动者总同盟”是第一次参加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代表大会；它成立得比较晚，这个情况直到现在不允许它对历届国际劳工代表大会作出什么贡献，为此它还没有达到必要的发展程度。不过，它对国际工人组织的那些示威游行活动始终表示同情，而且，凡是巴黎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与它有关的地方，它都遵照执行。

我们决不认为我们有资格向代表大会阐述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性质、组织情形和倾向，因为我们只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哪怕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扼要地阐述我们组织的历史。

在国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成立区域同盟的不幸尝试遭到悲惨的失败之后，在西班牙成立一个能把全国各行业协会的分散努力集合起来，并使其他新组织易于建立的联合机构的必要性已日益迫切；但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工人的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它接纳所有接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朴素的思想的人参加。

这个想法在为此目的于 1888 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西班牙劳动者总同盟”宣告成立。

为了说明这个同盟的宗旨，最好在这里摘录它的章程的开头几段条文。

“‘西班牙劳动者总同盟’主张：

1. 联合各种不同的、旨在用抵抗的办法来改善和保护劳动条件的工人组织（行业协会、地方联合会或全国联盟）。

2. 在还没有行业协会的地方，倡议成立新的行业协会，并帮助它们组织地方联合会和全国联盟。

3. 依照目前形势的要求，在加入“同盟”的各个组织之间实现团结一致的原则。

4. 与其他国家抱有和“同盟”同样的宗旨的工人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和它们一起以同样方式尽可能实现团结一致的原则。

5. 要求公共权力机关颁布维护劳工利益的法律，诸如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规定最低工资额；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等等。”

“同盟”自成立以来，遵照这些原则，无论在推动原有的工人协会参加全国工人运动方面，还是在成立其他的、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各大工业中心的新协会方面，都获得了进展。

“同盟”是由 29 个协会和 3355 名会员组成的；1889 年它已拥有 38 个协会和 3896 名会员；1890 年拥有 54 个协会和 5457 名会员；1891 年拥有 79 个协会和 7170 名会员；1892 年拥有 110 个协会和 8848 名会员；现在它拥有 112 个协会和 8941 名会员。这些组织中有的印刷工人协会，有的是工人中心；前者自 1883 年以来就成立了联合会，后者是在某些首府通过地方协会的努力成立的、有点像劳动介绍所那样的组织。

在“同盟”存在期间，除了成立大会而外，已经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一次是 1890 年在比利亚努埃瓦—赫尔特鲁召开的，另一次是 1892 年在马拉加召开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将于 1894 年 4

月上半月在马德里召开。

全国委员会设在全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巴塞罗那；在某个时期，《工人同盟报》报道工人组织的情况。

工会这个工人组织还处在发展初期；因此，“同盟”直到现在只限于重新组织被无政府主义者的胡作非为和错误弄得人心涣散的工人力量。它在经济领域内同资本家的斗争还没有超出小规模冲突的性质。这些斗争与其说给劳动者的生活斗争带来了实际好处，不如说使他们获得了经验。然而，这些斗争已经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和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下去。

这个组织毫不怀疑，工人问题是一个带有国际性质的问题；毫不怀疑，这个问题的影响和必要性是无法避免的。

为了这个缘故，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尽管我们的组织没有派代表参加国际代表大会，但是，它还是坚定地履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自从巴黎代表大会宣布庆祝五一节以来，“同盟”的所有协会都以值得赞赏的态度支持了世界各国工人在5月1日的游行示威。它不仅履行了已经商妥的事情，而且还在马拉加举行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以下声明：

“‘西班牙劳动者总同盟’慎重宣布接受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定期庆祝五一节的决议。

‘西班牙劳动者总同盟’第三次代表大会声明从现在起赞成1891年8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达成的协议，并建议各支部更严格地执行这个协议，只要国际代表大会没有作出改变的决定。”

另外，考虑到成立劳工书记处将会带来的好处，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西班牙成立劳工书记处，同时赋予全国委员会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使它在今后能以稳定的性质发挥职能。

“西班牙劳动者总同盟”现在是西班牙不幸的工人阶级的希望。在国内，“同盟”虽然发展缓慢，但却是在稳步前进；在国外，它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关注，它事先知道它应当和其他国家值得景仰的组织一起起的微小作用，它将尽最大的努力为劳动者的伟大事业的胜利作出贡献，为此，它派遣它的直接代表参加本届代表大会。

安东尼奥·加西亚·凯吉多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告

为了评价和正确地理解美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考察一下美国的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

鉴于政治自由问题在美国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解决了，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就无须再讨论了。在这方面，美国无产阶级和欧洲无产阶级相比，有着决定性的优势，因为欧洲无产阶级首先必须作出极大努力去实现在美国已经自然地、可靠地实现了的目标。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它在我们的人民中培养了一种信念：我们的政治自由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足以医治现行经济制度的所有痼疾，而无须对这个制度本身作任何改变。这种信念几乎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势力，使得启发本国无产阶级并动员他们参加反对现存制度的政治斗争成为极其困难的工作。由于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这种工作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这种教育制度不引导人们对问题穷根究底，这样，就阻碍人们去了解已认识到的罪恶的原因，它还阻止人们参与任何有步骤地改变公共生活的活动。这种教育制度鼓励人们安于现状，或者顶多是从事一些时断时续、没有计划的实验，这些实验自然很快就会归于失败，而只留下破灭了的希望。最后，社会革命的宣告者起初大都是外国出生的人，他们带着知识和比较老的文明的经验来到这里定居，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但是他们的外国出

身被阴谋家和贪污腐化分子用来蒙蔽美国无产阶级，诱使美国无产阶级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从外面移植来的。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

美国经济仍在持续地迅猛发展，这固然导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持续降低，降到欧洲工人那样低下的水平，在工业中心有时甚至降到欧洲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以下。然而总的说来，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是高于欧洲工人的生活水平。结果，一部分过去在家乡时是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移民，来美国后获得的工资虽然不算高（在当地人那里这一定已经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但还是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因此，他们至少暂时不会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美国资本主义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开发方法和野蛮行为还没有完全毁掉这个在地理位置、历史发展、自然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的国家。再有，由于我国人口相对稀少（在相当于欧洲 3.5 亿人居住的地方，只居住着 6 500 万人），所以科学地说，还不能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已经枯竭。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还是存在，虽然不像先前那样多。因此，一般说来，我们承受的经济压力不算太大。

如果我们的欧洲同志正视这些事实，从这些事实出发来判断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工人运动的发展，那么他们就不仅能够清楚地了解我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而且也能够对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对激励他们的不知疲倦的精力和自我牺牲精神，作出适当的评价。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于 1889 年 10 月 12 日在芝加哥重新建立。当时，由于 1886 年至 1887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 1886 年纽约市市长选举中工人候选人获得近 7 万张选票；法院对所谓

的芝加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而掀起并达到高潮的革命工人运动浪潮已经平息下去了。由于社会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工会运动曾经蓬勃发展，在1878年至1885年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这时也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开始分崩离析了。由于异常繁荣的经济条件对工会运动十分有利，以致社会主义者警告工联主义者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单纯押在经济运动上，而要把群众引导到独立的政治活动上去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一切政治特别是独立的工人政治必须和经济组织保持距离这一陈腐而且有害的传统还过于强大，一时难以根除。一度是庞大的美国秘密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和随后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一样，在其首领的软弱而混乱的领导下，处于死气沉沉和麻木不仁的状态。1886年在纽约发生的、同亨利·乔治（这一年他恰好被工人提名为市长候选人）的名子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尽管受到社会主义精神的强大鼓舞，但仍然是孤立的运动，而且最后，一旦乔治（奇怪的是这次运动竟因他而得名）向世人表明，他和他的代理人不过是一群平庸的、没有原则的政治掮客时，运动立刻就烟消云散了。同样，1886—1887年芝加哥发生的悲惨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芝加哥工人阶级的组织几乎完全瓦解。

美国工人组织不愿把它们的原则带进政治领域的这种倾向，加上它们在资本家阶级控制的经济领域中不断遭到失败（资本家阶级已经从强大的工人经济组织的出现对他们的第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反倒联合成更为强大的集团与工人对抗并向工人进攻），使我们的一些同志低估经济运动的益处。他们在我们的报刊上就这一问题公开发表的言论，必然导致大批工联主义者离开我们党。因此，当社会主义者在1888年（即芝加哥代表大会前一年）的总统选举中提出他们在纽约州的总统选举人时，这些总统

选举人每人获得的票数只有大约 2 000 张。芝加哥代表大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它制定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今后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路线，宣布把经济运动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从那时以来，美国社会主义者主要致力于提倡新工联主义，后者在目标和方法方面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当然，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它的新工联主义者盟友在每次运动中都是采取独立行动。这种政策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890 年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州得到的选票已上升到 13 337 张，1891 年上升到 14 561 张。1892 年，当我们党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总统选候选人时，在纽约州得到了 18 147 张选票。这些数字虽然不大，但正在增长，而且已经远远超过了废奴党（要求废除奴隶制的党）1840 年（即在废奴党的废奴纲领实际贯彻以前不到 25 年）提出自己的第一个总统候选人时在全国得到的票数。除了纽约的社会主义者外，在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西部几个边远地区的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 1892 年的总统竞选运动。

所有这些地方提出总统选举人，当然都是为了集中社会主义者的选票。而现在几乎用不着怀疑，在下次总统选举时，我们将在全国（可能除了南部以外）有效地组织起来参加总统竞选。

我们党在下列各州和城镇有自己的组织（支部）：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1 个；旧金山 2 个。

科罗拉多州：普来布洛 1 个。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 1 个；哈特福德 3 个；麦里登 1 个；唐布里 1 个；纽黑文 2 个；诺维奇 1 个；罗克维尔 1 个；沃特伯里 1 个。

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1 个。

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7 个；恩格尔伍德 1 个；皮奥里亚 1 个。

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 1 个；印第安纳波利斯 1 个。

衣阿华州：克里斯顿 1 个。

缅因州：里斯本福尔斯 1 个。

马萨诸塞州：亚当斯 1 个；波士顿 5 个；菲奇伯格 1 个；格雷洛克 1 个；霍利奥克 2 个；劳伦斯 1 个；新贝德福 1 个；皮茨菲尔德 1 个；斯普林菲尔德 2 个；汤顿 10 个；韦伯斯特 1 个。

密执安州：底特律 1 个。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1 个；圣保罗 1 个。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2 个。

新泽西州：布卢姆菲尔德 1 个；坎登 1 个；伊丽莎白 1 个；格登伯格 1 个；哈肯萨克 1 个；霍博肯 1 个；泽西市 1 个；纽瓦克 1 个；佩德森 2 个；普兰菲尔德 1 个；尤尼希尔 1 个；西霍博肯 1 个。

纽约州：奥尔巴尼 2 个；布法罗 1 个；东布法罗 1 个；敦刻尔克 1 个；埃尔迈拉 1 个；布鲁克林 10 个；威廉斯堡 1 个；纽约 29 个；科勒吉角 1 个；埃费格林 1 个；长岛市 1 个；里士满港 1 个；罗切斯特 2 个；萨哈伯 1 个；斯克内克塔迪 1 个；斯塔普莱顿 1 个；锡拉丘兹 1 个；特罗伊 1 个；尤蒂卡 1 个；扬克斯 1 个。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1 个；代顿 1 个；托莱多 1 个。

俄勒冈州：波特兰 1 个。

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市 1 个；艾伦敦 1 个；伊利 1 个；费城 5 个；匹兹堡 3 个；康纳斯维尔 1 个。

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 3 个。

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 1 个。

佛蒙特州：拉特兰 1 个。

华盛顿州：西雅图 1 个。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1 个；希博伊格 1 个。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 个。

这些支部都按民族组成。在这些支部中除了有美国人和德国人的支部外，还有佛兰芒人、法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支部。支部多的州设有州中心领导机关。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代表大会在形势需要时召开。自 1889 年以来，全国执行委员会设在纽约附近的布鲁克林区。

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两种机关报。一种是用英文出版的《人民报》，另一种是用德文出版的《前进报》。除此之外，还在全国各重要城市用英语、德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匈牙利语、犹太语、波兰语和其他语言出版党的日报和周刊。

党充满了国际团结的精神。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例如最近德国举行选举时，都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证实。另一方面，国外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例如我们德国同志们的凯旋进军、英国独立工党在坚定的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建立、法国国民议会和市政机构中社会党议员的稳定增加等等，都鼓舞着我们党，因而也间接鼓舞着整个美国无产阶级。

美国无产阶级在过时的方针引导下，最近在斗争中——从霍姆斯特德事件到托纳旺达事件——遭到了无数次失败，这些失败迫使他们对自己的现状进行反思。工会报刊和劳动骑士团机关报上开始发表的重要文章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美国劳动无产阶级思想上的这一转变，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提倡、促进和巩固这种转变，启发我们的劳苦阶级，引导他们采取顺应时代需要的策略，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他们从经验中

获得的教益，完善自己的斗争方法，这就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肩负的使命。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将一如既往，不屈不挠地履行这一使命，它将永远从欧洲同志们的胜利中得到鼓舞。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

丹尼尔·德莱翁

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代表名单

1. 澳大利亚

斯犹莎，F.，悉尼（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社会民主联盟。

2. 比利时

万贝韦伦，艾德蒙，根特，（比利时）手套工联合会。

克莱伊丝，欧仁妮，比利时。

德布罗克尔克，路易，布鲁塞尔，社会学习联合会。

德弗奈特，古斯达夫，布鲁塞尔，人民之家。

哥特沙克，康·，安特卫普，安特卫普联合会。

万科尔，亨利，根特，统一工人组织。

万科尔，内利，布鲁塞尔，佛兰芒地区荷兰妇女同盟；妇女团结联盟。

拉丰坦，昂利，布鲁塞尔，正义社。

莱奥纳尔，昂·，比利时，中央联合会。

马朗普雷，J.，恩赛拉尔，高卢纺织工联合会。

皮埃隆，E.，比利时，全国冶金工人联合会。

萨斯，弗朗西斯，布鲁塞尔，木材劳动者总联合会。

塞尔维，维克多，比利时，布鲁塞尔人联合会。

斯汤德尔，卡米耶，布鲁塞尔，人民之家。

王德威尔得，埃·，布鲁塞尔，比利时工人党。

沃尔德斯，让·，布鲁塞尔，比利时工人党。

万莱达，让·，比利时，全国烟草联合会。

3. 巴 西

李卜克内西，威廉，柏林，巴西工人党。

宰德尔，罗贝尔，苏黎世，在圣保罗的德国工人。

4. 保 加 利 亚

加布罗夫斯基，N. Ch.，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特尔诺沃代表大会。

拉柯夫斯基，克雷斯塔，舒姆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联盟。

5. 丹 麦

耶恩森，J.，哥本哈根，中央行业联合会。

克努森，彼·，哥本哈根，丹麦社会民主党，同时代表瑞典社会民主党。

6. 德 国

阿尔布雷希特，阿道夫，哈雷，萨克森—安哈尔特省社会民主党。

安特里克，奥托，柏林，党员。

阿诺尔德，汉斯，康斯坦茨，党员。

奥滕里特，奥芬巴赫。

鲍德尔特，A.，阿波尔达，图林根的党。

倍倍尔，奥古斯特，柏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

贝克，埃米尔，苏黎世，德国社会民主党。
伯恩奥尔，H.，弗赖堡。
伯恩施坦，爱·，伦敦，绍姆堡—利珀的党。
比尔克，慕尼黑，党员。
伯克，W.，哥达，德国制鞋工。
布赖伊，Aug.，汉诺威第三和第四选区。
布鲁恩斯，J.，不莱梅。
布赫，弗里德里希，瑞士德意志联合会。
毕布，F.，埃尔富特区的米尔豪森。
卡尔韦尔，R.，不伦瑞克。
德姆普沃尔夫，弗里德里希，苏黎世，德意志团结协会。
多伊森，约瑟夫，沙夫豪森，工人教育协会。
迪内尔，奥古斯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党员。
德雷斯巴赫，奥古斯特，曼海姆，曼海姆社会民主协会。
杜伦斯，胡果，圣因格贝特工人选举协会。
埃尔姆，A. 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党员。
埃默尔，L.，萨尔布吕肯，党员。
费舍，理查，柏林，党员。
弗兰克尔，巴黎，德意志读书俱乐部。
弗莱斯多夫，J.，德累斯顿。
弗赖斯特滕，阿姆利斯韦尔，工人教育协会。
弗里茨，圣·，柏林，柏林的同志们。
格贝尔，阿尔伯特，贝格多夫，玻璃工人。
格里伦贝格尔，纽伦堡，党员。
格里姆佩，爱北斐特。
格律恩贝尔格，卡·，哈尔塔（萨克森），党员。

汉佩尔，库尔，德国工人教育协会。
哈塞，柯尼斯堡，党员。
豪格，J. F.，弗赖堡，党员。
豪普特，K.，阿波尔达，纺织工人联合会。
赫伯特，弗里茨，什切青，党员。
赫尔姆斯，巴塞尔，德国工人教育协会。
希尔德布兰德，卡尔，斯图加特，党员。
霍赫，哈瑙、赫希特和维斯巴登的党。
霍夫曼，A.，萨尔费尔德。
霍恩，格奥尔格，吕布陶，玻璃工人。
许布希，卡尔，柏林。
胡格，保尔，班特。
雅恩，R.，柏林，德国瓷器工人。
容格，A.，埃斯林根。
考伊芬奥尔，米尔海姆，党员。
克洛泽，C.，斯图加特。
列曼，哥.，多特蒙德。
列曼，C.，奥芬巴赫，帝国国会奥芬巴赫选区。
李卜克内西，威廉·，柏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员。
路克斯博上，马格德堡，党员。
麦斯特，科隆。
梅茨纳，Th.，柏林，柏林的同志们。
梅切克，A.，阿尔滕堡。
弥勒，爱北斐特。
奈特尔，奥托，柏林，五金工人。
平考，K.，莱比锡。

赖赫尔特，阿尔宾，布格斯塔特。

鲁夫，亨利希，奥尔登堡附近的奥斯特恩堡，玻璃工人。

索尔波恩，日内瓦，西瑞士德意志联合会。

舍特根，苏黎世，德国社会党人。

席佩尔，M.，克姆尼茨。

施米特，C.，柯尼希堡。

施米特，亨利希，苏黎世，德国社会党人。

施米特，皮尔马森斯，路德维希港的党。

肖贝尔，卡尔，磨工，拉文斯堡。

舒夫，S.，木工，拉文斯堡。

施美贝尔，埃尔德曼，阿劳，工人协会。

舒曼，布鲁诺，比勒费尔德，代表东威斯特法伦和利珀—德特莫尔德。

舒马赫，G.，索林根。

施瓦尔茨，泰奥多尔，卢卑克，党员。

泽基茨，M.，纽伦堡，德国五金工人。

宰弗特，J.，茨维考。

西贝尔特，Joh.，纽伦堡。

辛格尔，保尔，柏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

施佩贝尔，F.，罗森海姆。

施塔特哈根，A.，柏林，下巴门。

施塔姆，堪斯塔特，卡尔夫社会民主联合会和堪斯塔特的党。

施登格雷，G.，汉堡。

施托默尔，A.，汉堡，海员联合会。

施托尔佩，H.，布雷斯劳。

施蒂默尔，H.，汉堡。

蒂姆，J.，柏林，柏林的同志们。
特帕尔，弗里茨，卡尔斯卢厄，裁缝。
乌尔里希，卡尔，奥芬巴赫，代表黑森公爵领地。
乌尔里希，G.，新乌尔姆。
瓦赫特尔，Th.，斯图加特，党员。
韦希，C.，克雷费尔德和埃森。
维泽尔，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伦敦。
维勒，R.，汉诺威。
武尔姆，E.，格拉。
温克勒，库尔，德国工人教育协会。
策恩克尔，Th.，卡尔斯卢厄，党员。
蔡特金，克拉拉，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妇女组织（曼海姆）和柏林的党员。
齐洛伏斯基，奥托，奥芬巴赫，普福尔茨海姆的党。
齐纳尔，温特图尔，德国社会党人。
齐特，约瑟夫，奥格斯堡，党员。

7. 法 国

阿列曼，巴黎，印刷工人社会学习协会。
阿穆雷蒂，马赛，法国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
阿姆福克斯，艾克斯工人工会联盟。
阿尔吉里阿德斯，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阿尔芒蒂耶尔支部）和阿列省社会主义劳动者团结协会。
阿恩特，保尔，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巴黎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
伯赛，费南德，里昂制帽工人联合会。

崩讷，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巴黎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和第六区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工人党）。

博尼埃，Ch.，巴黎，《新时代》月刊，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博尼奥，夏纳，夏纳印刷工人工会联合会，夏纳及沿海地区厨师工人联合会，夏纳饭馆饮食业职工联合会。

科莫，茹尔，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沙泰勒罗社会政治行动学习和团结小组，巴黎雇员工会联合会，巴黎铁路工人工会联合会。

夏贝尔，马赛，法国行业工会全国委员会。

科洛，欧仁妮（女公民），巴黎室内装饰绒织工人工会联合会。

肖塞，巴黎，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总书记）。

孔顿苏扎克，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同盟。

科尔坦斯，马赛，马赛劳动介绍所。

德盖，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

德让特，巴黎，法国制帽工人联合会。

德米尔斯，巴黎制帽工人工会联合会。

迪萨尔，里昂，劳动介绍所，全国联合会，地方委员会。

杜布里埃，里昂，纺织行业同业联合会。

费拉，里昂，劳动介绍所，全国联合会，地方委员会。

菲利，路易，罗芒，佩奇堡的罗芒（德龙省）的革命社会主义劳动者小组，多菲内省社会主义联合会。

格罗，伊波利特，马赛，法国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

盖拉尔，巴黎，法国铁路职工联合会。

雅克拉尔，社会主义记者联合会，独立社会党人联合会。

考伊弗尔，奥古斯特，巴黎，法国书籍劳动者联合会，巴黎印刷联合会。

马丽安妮女公民，研究社会问题者。

马尔尚，南特，库埃龙冶金联合会，南特劳动介绍所，科里特劳介绍所，南特革命社会党人委员会。

莫容奈，第戎，科多尔省第戎劳动介绍所，东部（第戎）社会主义劳动者联合会。

蒙塔加尔，马赛，马塞劳动介绍所。

莫尔蒂埃，B.，圣艾蒂纳，法国冶金工人全国联合会，社会主义工人党委员会（圣艾蒂纳），法国冶金工人全国联合会（卢瓦尔—圣艾蒂纳分会）。

皮纳特尔，马赛，法国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

普朗托，巴黎，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同盟。

雷米，莱·，巴黎，中央革命委员会，巴黎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第六区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工人党）。

勒努，巴黎，全国劳工书记处。

鲁森，克萨维埃，巴黎，瓦尔、土伦工会联合会。

雷诺，马赛，法国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

西蒙，里昂，劳动介绍所，全国联合会（里昂地方委员会），罗阿讷劳动介绍所，瓦龙制鞋工人联合会，里昂制鞋工会联合会。

斯塔特巴赫尔，塔恩、阿韦龙和埃罗劳工联合会。

圣多米克，巴黎，巴黎—布达佩斯实证主义无产者和伦敦社会实证主义者联谊会。

韦伯，巴黎，社会主义者刊物，独立社会党人联合会。

8.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安德森，约翰，工联代表大会议委员会。

安德森，R. W.，约克郡费边社。

艾什顿, J. , 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

艾威林, 爱·, 伦敦, 煤气工人全国联合会。

巴克斯, E. , 贝尔福德, 托特纳姆, 社会民主联盟。

伯恩, Mich. , 曼彻斯特, 联合裁缝社。

钱皮恩, H. H. , 阿伯丁独立工党。

克莱韦斯, E. A. , 坎宁镇, 社会民主联盟。

克莱因斯, 约·罗·, 奥尔德姆, 奥尔德姆职业理事会。

克罗泽耳, H. , 伦敦, 社会科学工具制造者。

戴维斯, W. J. , 伯明翰, 黄铜制造者全国协会。

爱德华兹, B. , 伦敦, 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

爱德华兹, E. G. , 多佛, 肯特郡的独立工党。

菲尔德, 阿瑟, 莱斯特, 独立工党。

菲茨伯特里克, R. H. , 都柏林, 都柏林社会主义者同盟。

弗雷克, Chas. , 制靴工人全国协会, 伦敦。

加尔布雷思, 赛米尔, 达勒姆矿工。

吉勒斯, 费·, 伦敦, 工人生产协会。

格林, L. A. , 利兹, 独立工党。

格林伍德, 阿·, 伦敦, 大不列颠玻璃酒瓶制造者。

奎尔奇, 哈利, 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

哈福德, 爱·, 工联代表大会议委员会。

霍布森, Chas. , 设菲尔德, 工联理事会。

霍奇, 约翰, 工联代表大会议委员会。

霍姆斯, 戴维, 工联代表大会议委员会。

霍姆斯, 詹姆斯, 莱斯特, 全国针织工人联合会。

朱金斯, R. , 米德兰职业理事会联合会。

欧文, 玛格丽特, 格拉斯哥, 妇女长远保护同盟。

贾维斯，J.，坦布里奇韦尔斯，社会民主联盟。
约翰逊，约翰，达勒姆矿工。
莱斯纳尔，Frd.，布卢姆兹伯里，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
莱昂斯，路易斯，伦敦，国际裁缝、机工、印刷工联盟。
麦克唐纳，詹姆斯，伦敦，伦敦工联理事会。
麦克拉伦，C. 斯科特，伦敦，裁缝联合协会。
马丁，J. W.，伍尔弗汉普顿，费边社。
马克思-艾威林女士，爱·，伦敦，煤气工人全国联合会。
麦克斯韦尔，肖，伦敦，独立工党。
麦克劳德，Ed.，伦敦，裁缝联合协会。
莫布雷，C. W.，伦敦，裁缝联合协会。
莫里斯-斯帕尔林，M. 女士，伦敦，哈默尔史密斯社会主义协会。
奥基尔维小姐，J. 爱丁堡，苏格兰工党。
奥康瑞尔，J.，伦敦，运煤工联合会。
奥利弗，S.，沃尔沃思，社会民主联盟。
奥利维耶，悉尼，伦敦，费边社。
皮卡德，B.，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
罗宾逊，G.，诺丁汉和地区职业理事会。
罗兰，H.，国际裁缝联合协会。
索尔波恩，J.，马里列博恩，社会民主联盟。
肖伯纳，G.，伦敦，费边社。
肖伊，安德烈亚斯，伦敦，格林威治社会协会第三分会。
谢里登，E. F.，伦敦，商业运输工人同盟。
斯马特，罗素，伦敦，柴郡费边社。
斯密斯，J. H.，爱丁堡，苏格兰社会主义联合会。
斯密斯，Ad.，伦敦，妇女工会同盟。

斯坦利，A.，格拉斯哥，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
斯特德曼，W. C.，伦敦，伦敦工联理事会。
萨默斯，J. D.，巴特西，社会民主联盟。
泰勒，约翰，达德利，米德兰职业理事会联合会。
梭恩，威廉，伦敦，煤气工人全国联合会。
沃尔克尔，西奥博尔德，伦敦，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玻璃酒瓶制造者。
沃林顿，J. W.，格拉斯哥，联合职业理事会。
瓦茨，亨特，伦敦，社会民主联盟。
温切夫斯基，B.，犹太工会和社会主义协会。
沃兹沃思，G.，格拉斯哥，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

9. 荷 兰

科尔奈利森，Chr.，阿姆斯特丹，社会党。
多梅拉·纽文胡斯，F.，阿姆斯特丹，社会党。
格尔哈德，J. W.，阿姆斯特丹，荷兰社会民主教师协会。
霍温格，H.，阿姆斯特丹，“前进”印刷联盟。
万科尔，H.，阿姆斯特丹，糕点联合会。
弗里根，W. H.，马斯特里赫特，社会党。

10. 意 大 利

布西，雷焦-艾米利亚，合作社联合会。
卡布里尼，埃贝雷尼尼，帕尔马，社会主义协会。
卡内帕，奥内格里亚，社会主义者同盟。
科达，米兰，意大利泥瓦工联合会。
克罗齐，米兰，手套制造工协会。

达尔奥沃，帕维亚，社会主义者协会。
菲利佩蒂，A. 博士，米兰，社会民主联盟。
詹诺尼，罗莎，雷焦-艾米利亚，生铁铸造工联合会。
库利肖夫，安娜，米兰，劳动生产者联盟。
拉布里奥拉，那波里，社会主义者协会。
莱奥纳第，米兰，社会主义印刷联盟。
皮尼，雷焦-艾米利亚，泥瓦工合作协会。
普拉姆波里尼，米兰，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里卡尔第，泰尔尼，“在偶发事件中的军队”社会主义者联合会。
隆达尼，雷焦-艾米利亚，社会主义者同盟。
罗西，热那亚，社会主义者同盟。
塞拉蒂，米兰，家具制造者同盟。
索尔第，克雷莫那，农民社会主义抵抗同盟。
索雅，米兰，石印工人联合会。
唐齐，卡洛，米兰，米兰社会主义者同盟。
屠拉梯，菲力浦，米兰，威尼斯社会主义组织；巴勒莫，意大利
劳动党；莫尔费塔，普格亚的社会主义者联合会。
沃格哈拉，雷焦-艾米利亚，大理石雕刻者合作协会。

11. 挪 威

克勒格尔—约翰逊，克里斯蒂安尼亚，“挪威工人党”。

12. 奥 地 利

阿德勒博士，维克多，维也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艾希，威廉，非拉赫，克恩滕州组织。
博森博克，弗兰兹，维也纳，奥地利制帽工人。

达申斯基，伊格纳齐，克拉科夫，加里西亚州组织。

迪特里希，罗伯特，维也纳，奥地利制鞋工人。

德沃夏克，阿德尔海德，维也纳，下奥地利州组织。

埃伦特劳特，尤利乌斯，维也纳，下奥地利工人协会教育联合会书记。

埃伦博根博士，威廉，维也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哈里希，约瑟夫，苏黎世，苏黎世奥匈工人协会。

哈尼希，约瑟夫，施泰因舍瑙，施泰因舍瑙和海达的区组织和玻璃制造工。

亨利希，K.，维也纳，奥地利制帽工人。

赫格尔，卡尔，维也纳，奥地利印刷和铸字工人。

考茨基，卡尔，斯图加特，下奥地利州组织。

考茨基，路易莎，伦敦，下奥地利州组织。

基塞韦特尔，W.，赖兴贝格，北波希米亚州组织。

科查基维兹，扬，伦贝格，加里西亚州组织。

利希卡，约瑟夫，维也纳，奥地利五金工人。

莫克罗斯基，卡齐米茨·斯坦尼斯劳，加里西亚州组织。

诺伊路勒尔，彼得，维也纳，奥地利裁缝。

普雷豪塞尔，雅科布，萨尔茨堡，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州组织。

雷塞尔，汉斯，格拉茨，施泰尔马克州和克赖因州组织。

罗雷尔，弗兰茨，赖兴贝格，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纺织工人。

萨斯卡，伊格纳茨，因斯布鲁克，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州组织。

斯卡莱特，斐迪南，维也纳，奥地利木材工人。

肖伊，Jos.，维也纳，下奥地利州组织。

施米特，胡果，耶格恩多夫，迈伦和西里西亚州组织。

舒迈耶尔，弗兰茨，维也纳，下奥地利州组织。

斯特兴贝格，雅科布，伦贝格，伦贝格和克拉科夫犹太社会民主工人。

托姆席克，Jos.，维也纳，奥地利铁路工人。

捷 克 代 表

德迪克，卡尔，布拉格，州组织。

希贝什，约瑟夫，布尔诺，迈伦捷克州组织。

斯卡劳特，约瑟芬，布拉格，波希米亚和迈伦有组织的女工。

沙勒，弗兰茨，布拉格，波希米亚有组织的木工。

施泰纳，约瑟夫，比尔森，西波希米亚州组织。

13. 匈 牙 利

安塞尔，Joh.，阿格拉姆（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和木材工人。

迪茨，Jos.，布达佩斯，镟工工会。

雅斯蔡，赛米尔，布达佩斯，社会民主党。

基什，阿道夫，新佩斯，社会民主党。

基特尔，F.，布达佩斯，制鞋、雕刻工和镟工工会。

柯沙，路德维希，布达佩斯，制帽工、管道工、水管工工会。

拉第，亚历山大，新佩斯，社会民主党。

赖施，弗兰茨，布达佩斯，社会民主党。

舒尔德斯，弗兰茨，布达佩斯，木工工会。

察尔凯，阿洛伊斯，普雷斯堡，社会民主党和许多工会。

14. 波 兰

达申斯基，伊格纳齐，克拉科夫，西加里西亚州委员会。

格拉布斯基，斯坦尼斯拉夫，巴黎，波兹南波兰社会党。

卡尔斯基，华沙，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小组。

科查基维兹，扬，伦贝格，东加里西亚州委员会。

门德尔森，斯坦尼斯拉斯，伦敦，（俄属波兰）波兰社会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合会。

门德尔森，玛丽亚，伦敦，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合会；波兰社会党。

莫克罗夫斯基，卡齐米尔，马希茨，斯坦尼斯拉夫的波兰社会党。

佩尔，费利克斯，伦敦，波兰社会党。

斯特肯贝格，雅科布，伦贝格，犹太工人联合会。

维托尔特，约德科，伦敦，波兰社会党。

15. 罗马尼亚

迪格里姆

多勃罗贾努-盖雷亚，康·，

米勒，孔斯特，

巴诺切斯科，格雷哥里，

拉多维奇，让，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
布加勒斯特代表大会

16. 俄国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彼得堡，纽约俄国社会民主党。

17. 瑞士

阿佛尔特，雅科布，伯尔尼，工人联合会。

阿尔诺德，威廉，巴塞尔，巴塞尔工人联合会和瑞士党委员会。

倍尔切，尤利乌斯，巴登，工人联合会和工人总联合会。

贝格尔，厄里康工人联盟。

贝尔切, J., 温特图尔工人联合会。
贝尔钦格尔-胡格, 维尔弗林根, 温特图尔工人联合会。
比契, 苏黎世, 瑞士裁缝联合会。
布朗克, 费利克斯, 洛桑, 洛桑工人联合会。
波迈里, Rud., 日内瓦, 德国工人协会, 格留特利联盟等。
波斯哈尔特, J., 塔尔维尔, 社会民主党党员和格留特利联盟盟员。
布兰特, 保尔, 圣加仑, 工人联合会。
布鲁恩, 苏黎世, 画家。
卡德拉斯, J., 屈斯纳赫特, 格留特利联盟。
科达, J. B., 洛桑, 普通泥瓦工国际联合会洛桑分会。
康拉德, P., 霍尔根, 塔尔维尔和霍尔根木材工人工会。
康采特, C., 厄里康 (苏黎世), 厄里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人协会。
康采特夫人, 苏黎世, 苏黎世女工协会。
库勒里, P., 绍德封, 法语区格留特利联盟。
德根, 约瑟夫, 奥伯维尔, 奥伯维尔社会民主党党员。
杜斯特勒尔, Jak., 韦齐孔, 格留特利联盟。
杜波伊斯, A., 尼翁, 木材工人。
敦克尔, G., 苏黎世, 瓦工联合会。
敦克尔, 温特图尔, 温特图尔工人联合会。
埃格利夫人, 温特图尔工人联合会。
福凯茨, 阿洛伊斯, 洛桑, 洛桑工人联合会。
弗雷希, F., 苏黎世五金工人工会。
弗莱弥勒, J., 伯尔尼, 瑞士, 制鞋工联盟。
弗里克, K., 苏黎世, 瑞士, 工会联合会。
菲尔霍尔茨, 索洛图恩, 社会民主党。
加塞尔, 图恩, 区域联合会。

加塞尔，弗洛里安，蒙特勒，瑞士法语区家具木工。

格拉夫，W.，苏黎世，苏黎世格留特利联盟和书籍装订工联合会。

格美纳尔，路易，洛桑，木材工人。

格雷利希，赫尔曼，苏黎世，社会民主党。

格斯温德，斯蒂凡，奥伯维尔，奥伯维尔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巴塞尔州格留特利联盟盟员。

豪格，卡尔，克洛伊茨林根，格留特利联盟。

海迪格尔，塔尔维尔，塔尔维尔和霍尔根的木材工人工会。

海尔里，D.，圣加仑，圣加仑工人联合会。

赫尔，W.，苏黎世，瑞士男女裁缝。

亨斯勒尔，外锡尔，工业区格留特利联盟。

埃里蒂埃，路易，日内瓦，社会党委员会。

霍尔岑克西里，R.，库尔，工人联合会。

胡贝尔博士，温特图尔，社会民主党。

胡格，埃米尔，新明斯特，格留特利联盟。

洪格尔毕勒尔，苏黎世，瑞士工会联合会。

雅斯林，埃米尔，巴塞尔，巴塞尔饰带制作工联合会。

凯塞尔，F.，伯尔尼，瑞士，瑞士罗曼德地区印刷工联合会和印刷工协会。

凯尔，E.，苏黎世，瑞士工会联合会。

凯勒尔-施温格，J.，巴塞尔，大巴塞尔格留特利联盟。

凯斯勒，Ed.，索洛图恩，工人党。

科特曼，维恩塔尔，烟草工人中央联合会。

库布里，雅科布，内茨塔尔，格留特利联盟。

昆茨勒尔，Joh.，穆捷，格留特利协会。

朗多耳特，C.，苏黎世，瑞士联合会，装订工。

兰格，奥托，苏黎世，社会民主党。

莱维-伊斯利克尔，T.，巴塞尔，社会民主党。

林克，R.，格拉塞尔，沙夫豪森，沙夫豪森工人联合会。

路金布尔，R.，朗根塔尔，朗根塔尔的格留特利联盟。

麦德尔，圣加仑，格留特利联盟和工人联合会。

曼茨，C.，苏黎世，瑞士联合会，书籍装订辅助工。

毛赫勒，弗丽达，厄里康，女工协会。

毛赫勒，厄里康，社会民主协会。

毛里茨奥，亚当，伯尔尼，工人联合会。

迈耶尔，Joh.，沃里斯霍芬，沃里斯霍芬格留特利联盟。

梅尔克，奥.，苏黎世，瑞士工会联合会。

迈里，圣乔治，圣乔治铸造行业联合会。

迈里，厄里康工人联合会。

麦蒂埃，汉.，苏黎世，苏黎世格留特利联盟。

莫尔，卡尔，里斯，格留特利联盟。

莫尔夫，奥.，苏黎世，印染工工会。

莫尔夫，鲁道夫，苏黎世，五金工人工会。

穆格里，G.，温特图尔，格留特利联盟中央委员会。

弥勒，J. B.，圣加仑，格留特利联盟。

弥勒-奥特，巴塞尔，社会民主党。

奈弗，爱德华，乌兹维尔，铸造行业联合会。

奥斯特海姆，苏黎世，苏黎世印刷工。

彼得，K.，霍尔根，社会民主党和格留特利联盟。

菲力浦，菲力浦，温特图尔，裁缝工会。

皮契，赫尔曼，苏黎世，瑞士，裁缝联合会。

皮瓦茨，弗里茨，沃韦，木材工人。

赖夫，温特图尔工人联合会。

赖曼，G.，皮尔，钟表工人联合会。

鲁瓦，B.，苏黎世，木工工会。

鲁夫，奥.，苏黎世，木材工人行业联合会。

索尔波恩，日内瓦，裁缝联盟。

沙茨曼，弗里德里希，林茨堡，格留特利联盟。

申克尔，苏黎世，制鞋行业联合会。

施米德，雅.，苏黎世，苏黎世工人总联合会。

席勒，伯恩哈德，特斯，工人联合会。

施米茨，苏黎世，瑞士，工会联合会。

许恩贝格尔，温特图尔工人联合会。

施拉格，L.，伯尔尼，格留特利联盟。

舒马赫，维普金根，格留特利联盟。

施维泽古埃贝尔，A.，皮尔，钟表工人联合会。

宰德尔，罗.，苏黎世，苏黎世工人联合会。

西格，日内瓦，日内瓦社会党。

西格利斯特，爱德华，巴塞尔，社会民主党。

斯坦德哈特，苏黎世，玻璃工中央联合会（瑞士）。

施特克，A.，伯尔尼，瑞士，党委员会。

施泰格尔，古斯塔夫，伯尔尼，工人联合会。

施蒂恩齐，亨利希，外锡尔，格留特利联盟。

托伊弗尔，A.，洛桑，工人总联合会。

托曼，奥.，苏黎世，瑞士，工会联合会。

图洛韦，达沃斯。

福格特，施莱纳尔，苏黎世，工会（替代组织）。

瓦伦小姐，巴塞尔，瑞士，女工联合会。

瓦尔德福格尔，沙夫豪森，工人联合会。

瓦西里夫，伯尔尼，工人联合会。

韦贝尔，鲁道夫，阿福坦尔恩，格留特利联盟和工人联合会。

威纳尔，温特图尔，格留特利联盟中央委员会。

魏策尔，索罗图恩，工人党。

维德梅尔，阿洛伊斯，苏黎世，书籍装订行业联合会。

沃尔弗，汉斯，梅尔希瑙，格留特利联盟。

符尔格勒尔，苏黎世，苏黎世第三区工人教育协会。

维斯，J.，绍芬根，社会民主协会和格留特利联盟。

蔡斯贝格，J.，苏黎世，瑞士，工会联合会。

18. 塞 尔 维 亚

巴鲁克齐契，齐伏因，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和工人。

19. 西 班 牙

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马德里，社会主义工人党。

巴尔西亚-鲁恩多，奥.，巴塞罗纳，西班牙工人总联盟。

20. 北美合众国

卡恩，亚伯拉罕，纽约，纽约和布洛克林的希伯莱工会联合会。

德莱昂，丹.，美利坚合众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萨尼亚尔，L.，纽约，工人中央联合会。

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收到的贺电一览表

(截止 8 月 10 日)

格拉纳达：社会党人。——**里斯本**：工会联合会社会主义小组。——**旧金山**：劳动委员会。——**巴勒莫**：社会党人。——**贝尔加马斯科**：社会党人。——**那不勒斯**：社会主义小组。——**拉文纳**：革命社会党。——**伯恩利**（英格兰）：社会民主联盟。——**伦敦**：木匠。——**鲁昂**：工人党。——**马赛**：法国南部社会主义联合会。——**加来**：工人党。——**巴黎**：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布鲁塞尔**：机械师卡尔·亨克尔。——**克鲁谢瓦茨**（塞尔维亚）：工人，一批社会党人。——**贝尔格莱德**：工人和工商业者联合会。——**特尔诺瓦**：社会民主党。——**舒姆拉**（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人联盟。——**巴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维也纳波兰**革命者。——**阿姆斯特丹**：社会民主士兵联合会。——**阿姆斯特丹**：荷兰铁路和电车职工联合会。——**加芬迈耶尔**同志。

奥地利：**埃格尔**：社会民主党州代表机关。——**卡尔斯巴德**：裁缝和鞋匠行业协会。——**格莱斯利茨**（波希米亚）：当地的同志们。——**新韦尔特**：波希米亚里森山区的同志们。——**克拉陶**

(波希米亚)：党员同志们。——**赖兴贝格**：罗赫利茨的捷克和德国的社会党人。——**赖兴贝格**：北波米尼亚有觉悟的工人，州代表机关。——**阿拉德**(匈牙利)：团结起来的社会党人。——**阿格拉姆**(克罗地亚)：社会主义钳工。——**芬夫基辛**(匈牙利)：当地的同志们。——**布拉格**：组织起来的印刷工。

来自布达佩斯：匈牙利制帽工人。——管道工行业协会。——木匠行业协会。——裁缝工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报刊《工人》、《劳动卫队》、《钳子》和《印刷工》编辑部。——**普雷斯堡**：社会主义工人协会。——**耶格恩多夫**：当地的同志们。——**阿拉德**：当地的社会党人。——**德意志-利鲍**：当地的同志们。——**本尼希**(奥地利西里西亚)：当地的工人联合会。——**阿格拉姆**：党员同志们。——**菲拉赫**：书籍印刷工。——**布尔诺**：书籍印刷工，社会民主工党。——**因斯布鲁克**：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党代表机关。——普拉德勒的同志们。——**泰梅萨尔**：社会主义区代表机关。

来自维也纳：奥地利组织起来的书籍印刷工。——下奥地利工人歌咏联合会。——同志们。——维也纳炼铜工人。——锯木工人。——来自第十三区的同志们。——弗赖辛工人歌咏联合会。——下奥地利教育联合会。——制皂工人。——有组织的钳工。——五金工人。——有组织的裱糊匠。

马尔讷(荷尔斯泰因)：许多同志。——**布雷斯劳**：一个被监禁的社会党人。——**阿波尔达**：图林根自由体操运动员。——**索林根**：当地的同志们。——**科特布斯**：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园艺工人中央联合会。——**腓特烈斯哈根**：玛丽·库恩斯特代表被监禁的弗里茨·库恩斯特。——**罗伊特林根**：德国五金工人联合会。——**比勒费尔德**：联合起来的五金工人。——**爱北斐**

特：正在那里开会的1万名莱茵工人。——阿多夫：萨克森第二十三选区的党代表大会。——德累斯顿附近的洛斯维茨：当地的同志们。——哈尔伯施塔特：萨克森和安哈尔特州歌唱家联盟。——福伊尔巴赫（符腾堡）：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协会，斯托卡赫区。——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人。——普福尔茨海姆：同志们。——万茨贝克：党员同志集会。——卢卑克：社会民主党。——布龙贝格：129团度假人员。——勃兰登堡：同志们。——劳西茨：党员同志们。——洪堡：当地的红色新兵。——德累斯顿：党员同志们。——布龙贝格：东部公路工场。——奥斯特罗德：哈尔茨地区的同志们。——波恩：党员同志们。——莱比锡：社会民主党人。——莱比锡：铁匠。——汉堡：一些砖瓦工。——慕尼黑：讨论俱乐部的同志们。

来自柏林：第五选区的同志们。——红色售货员及辅助工。——民间职业音乐家自由联盟。——柏林第四选区社会民主选举协会。——柏林第二选区选举协会总集会。——柏林客栈帮工联合会——第六选区的同志们。

帕耶讷：国际工人协会。——因特拉肯：工人总联合会。——库尔：工人联合会。——绍德封：工人总联合会。——图恩和伯尔尼：联邦手工作坊工会。——图恩：裁缝行业联合会。

因巴赫（萨克森）：工人选举联合会。——伦敦：凯尔·哈第。——尼德兰：尼德兰木工联盟。——维也纳：维也纳木匠。

布达佩斯：一位同志。——巴黎：《新时代》。——科莫尔恩：裁缝和木匠。——纽约：约翰·斯温顿。——莱姆斯：社会党人。——煤矿工人。——维也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党代表机关。——汉堡：德国理发师、美容师和假发制造者联合会汉堡分会。